

储安平集

储安平 著

这半年是一个苦痛的半年。物价的高压，带有政治意味的中伤，以及当前政治环境的险恶，无不使我们在这半年中，身心交瘁，困惫不堪。然而我们在无比的忍耐和沉毅中，终于又苦斗了半年。照大势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写《观察》第5卷的卷终报告书，但是我们愿意向读者保证：只要本刊存在一天，我们必定努力一天。——储安平：《观察》第4卷卷终报告书

东方出版社

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了。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只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但储安平的《观察》时评好像是为今天而写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时评，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

——谢泳：《储安平评传》



ISBN 978-7-5060-4067-9



9 787506 040679 >

定价：69.80元

儲安平集

民國三大報人文集

儲安平 著
張竟无 編

责任编辑：刘丽华
特约编辑：钟晓云
封面设计：万有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储安平集 / 储安平著；张竟无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民国三大报人文集)

ISBN 978-7-5060-4067-9

I. ①储… II. ①储…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8055 号

储安平集

CHU ANPING JI

储安平 著 张竟无 编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刷：三河市顺兴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165 毫米×240 毫米 1/16

字数：549 千字 印张：35.75

书号：ISBN 978-7-5060-4067-9

定价：6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内政与政论

- 一、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3
- 二、失败的统治…… 7
- 三、论上海民乱…… 11
- 四、中国的政局…… 16
- 五、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27
- 六、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32
- 七、一场烂污…… 37
- 八、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40
- 九、国大评论…… 44
- 十、评翁文灏内阁…… 53
- 十一、政治失常…… 58

第二章 报纸、出版、编辑

- 一、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65

- 二、辛勤·忍耐·向前…… 71
- 三、323 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87
- 四、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
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95
- 五、艰难·风险·沉着…… 99
- 六、《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 114
- 七、白报纸！…… 118
- 八、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形…… 122
- 九、风浪·熬炼·撑住…… 129
- 十、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145
- 十一、吃重·苦斗·尽心…… 149
- 十二、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 167

第三章 教育、司法、农村

- 一、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
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 177
- 二、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 181

第四章 人物品评与交往

- 一、记田汉先生…… 193
- 二、幸 福…… 196
- 三、论张君勱…… 198
- 四、致傅斯年的信（二封）…… 202
- 五、读孙科谈话…… 205
- 六、致胡适的信（三封）…… 209
- 七、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213
- 八、论程孟明案兼论社会有心人
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 219

- 九、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224
十、悼志摩先生…… 229

第五章 杂 论

- 一、独幕剧…… 235
二、《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序…… 244
三、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246
四、诗…… 253
五、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254

第六章 英国与印度

- 序…… 265
一、从贸易进而为征服…… 267
二、从要求进而为抗拒…… 296
三、印度独立问题之观察…… 331

第七章 散 文

- 一、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 347
二、布洛克及其名作——《十二个》…… 349
三、偶感即记四则…… 354
四、平凡的故事…… 356
五、口 供…… 361
六、《第四十一》概略…… 373
七、残 花…… 379
八、小 病…… 382
九、母 亲…… 386
十、墙…… 389
十一、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398

十二、一段军行散记…… 403

十三、来京记…… 410

十四、豁蒙楼暮色…… 414

第八章 小 说

一、春 瘟…… 421

二、世纪与义务…… 429

三、断 想…… 447

四、人 世…… 464

五、无 名…… 469

六、乌鸦与马粪…… 480

七、原 记…… 488

八、说谎者…… 513

附录：《说谎者》自序…… 522

第九章 “客观一周”专栏

一、“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527

后 记…… 565

第一章

内政与政论

一、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有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

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人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

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二、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三、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

前，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四、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原载《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出版）

二、失败的统治

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 20 年。20 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何以执政 20 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

一个政党执政的成败，原因既多且极复杂，非执一言所能论议；然其成败之键，必有最基本的原因可寻。作者以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但欧美政党，恒以施政的政绩来维护其政权：国防务臻安全，外交总替本国说话，政治力求清明，经济尽量求其繁荣，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卫生、房屋、休闲各方面，无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标做去。所以欧美各国，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苏联，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励精图治，到底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在国内，能使人人衣食不愁，在国际上，能够打退强敌的侵犯。只要政绩良好，人心自然归附；人民拥戴政府，政权自然不愁动摇；而朝野分头努力，国家因亦可抵昌盛康乐之境。

不幸中国国民党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我们先看这 20 年来，我们的国家有什么进步？言军

事，我们根本谈不上“国防”，人家已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们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枪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言交通，20年来我们曾铺了多少铁路，造了多少轮船？甚至到现在为止，不仅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甚至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言教育文化，20年来我们的科学发明在哪儿？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在哪儿？音乐和绘画有何成就？其尤甚者，一般的教育水准及文化水准是在向上升还是往下降？至于经济建设，土地改革，这一切有关民生的大问题，大都空言多于事实，计划多于实效。然而20年来我们的执政党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一言蔽之，这20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养许多兵，是为了巩固政权；一切党团的组织、活动、训练，是为了巩固政权；特务和各种检查制度的施行，是为了巩固政权；就是公路的开辟、电话网的布置，也无一非出自军事及治安的观点，其目的仍是为了巩固政权。20年来，只有这项消极的政治控制工作，吸引着国民党无比的兴趣和重视，表现着国民党最大的勇敢、决心和魄力。20年来，我们做百姓的，只有这一个项目，使我们到处听得到、看得见、嗅得着，并感觉到它的紧张、严密、认真和不放松。但是也就在这一个项目下，这20年来，不知消耗了国家多少金钱，雇用了国家多少人力，浪费了国家多少智慧，糟塌了国家多少光阴！当前的执政党既倾其全力于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大大影响他在积极方面的种种建设工作。所以，20年来，我们的交通和水利没有高度的建设，土地制度没有革命性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和耕耘的工具依旧墨守陈规，种子和肥料毫无新的改进，人民的居室依然黑暗而污秽，民间的代步工具仍然滞留在原始阶段，一切近代的机器生活从无机可插入乡村，保健事业和社会救济有名无实，疾病与贫穷仍弥漫全国，一般人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观念，毫无改变，毫无进步。凡上所述，俱属琐碎，而无一非建国元气所系，但从来没有见到政府有兴趣和决心推行过任何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20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历观往史，

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治生活中本来潜有物理的作用：政绩腐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须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抑有进者，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这种政策及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必为无道不德之徒，流风所至，遗害难言；这是一层。其次，在一个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会中，有骨气的人，心难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洁身自好，柔弱者颓靡消沉。国家尽失梁栋，社会无复正气。其三，在唯力是视的社会上，断无是非公平可言。我们看这几年来，国人的意见，政府置若罔闻，而美国一言半语，当局无不重为考虑，因为美国有飞机大炮和金钱；无党无派小党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咙也是白费，而共产党的意见，就不能相应不理，因为共产党有枪杆；甚至教授罢教，政府可以听其自生自灭，而工人罢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只讲强力。只讲强力的社会必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亦即为一个乱的社会。其四，要求政权巩固，自然不愿政局发生不必要的波澜，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忠实”之徒，虽恶行多端，众口所诛，亦仍能安如磐山，行其所行。贤不肖不复有别，而国家取士之道尽失！

在一般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以为今日党的生存问题，其重点莫过于敌党之消灭。作者则以为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今日国民党的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党，自然更不是如何消灭敌党，而是自己能不能认认真真硬硬扎扎实实赶快做几件像样的事情。今日一般人民所要求者，是（一）没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二）没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三）没有饭吃的能有饭吃，（四）能让他们和平地安于他们的工作，乐于他们的工作。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则更进而希望国家有尊严，有前途。假如大家有屋住、有衣穿、有饭吃、能乐业，人心自然归附，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结实，国际上自有地位，整个国家的前途自然充满着光辉与希望，而今日批评政府者，亦必将拥戴政府之不暇。今日之世，未有国家垮台而政党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贫穷而国家可以富强者；富国先富民，兴党先

兴国。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20年的时间不算短；20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决无前途。

9月9日

(原载《观察》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14日出版)

三、论上海民乱

本年7月，上海市政当局，认为摊贩有碍观瞻，妨害交通，决予取缔。据吴市长12月1日广播：“警局对摊贩之处罚，第一第二两次违章设摊者处以罚款，第三次给予拘押。”又称：“当市府决定取缔摊贩时，亦曾充分顾及彼等（摊贩）之生计问题，故给予8、9、10三个月之限期，劝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在最近三四个月中，一般摊贩，因为政府将予取缔，生活发生问题，大都感觉忧虑不安。

11月26日，上海警务当局，开始严格执行命令，拘捕小贩。被拘小贩，据报载约达七八百名；分押黄浦老闸两区分局。适值寒流袭沪，气候骤降。被捕小贩家属，送衣送饭，狃于积习，诸多干格。同时谣传被捕小贩已有数人因饥寒死于拘留所中，群情激愤。11月30日清晨，被捕小贩家属多人，前往黄浦分局请愿，要求释放。其后闻风往者，愈聚愈众。警务当局，运用各种警卫方法，防止弹压。在这激荡的骚动中，若干商店被群众捣毁，全市歇业，交通阻断，警察鸣枪多次，多人受伤。全市陷入极度的混乱、动荡、恐怖、不安；详细情形，业见报载。这次骚动，延续至48小时之久，牵连的地区几占上海全部商业区域。直接参加这次骚动者，约在5万人左右，间接受此次骚动影响者，约在100万人左右，而同情关怀这次骚动者，至少在300万人以上；这些还都是最保守的估计。

我们对于这次骚动，默察其间因果趋向，不无感触。第一，这次骚动的性质，不仅仅是经济的，亦复为政治的及社会的。摊贩摆摊，为了生活。市府决心取缔，摊贩设摊如故，此非藐视政令，实为生计所迫。

市府虽然“给予8、9、10三个月之限期，劝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但“迁地”一节，当局迄未指定地点；同时摊贩经营，全靠闹区，如果迁他地，是否仍有“营业”，亦为问题。至于改业，国内经济萧条如此，遍地失业，空言改业，谈何容易。摆摊的人数所以越来越多，殆足说明找寻职业之不易；走此一着，聊以糊口；市府虽宽以时限，但政府给予摊贩的，只是改业的“时间”，而非改业的“职业”。政府若能解决摊贩的职业问题，则摊贩何乐而不改就他业？这种由摊贩事件所反映的广大的失业问题，牵涉到政治不安，币值不定，工商濒危，百业萧条；时论已多发挥，此处不赘。但此次骚动，除了经济意义以外，还包含有政治及社会的意义。就政治意义言之，今日人人需要和平，而内战烽火遍地，一切人力财力，都用以维持少数人的权力利益，竟将绝大多数人民的死活，置之不顾。政府官吏，发威作福，仗势弄权，贪污百出，无人过问，独子子小民，摆一个摊子，混一口饭吃，亦所不许，严为限制，人孰得平？据党部当局报告，骚乱群众中有呼“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等口号者。此说果确，则这些口号无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同时在这次骚动中，亦流露着阶级的意识。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场电影院的被打，过路汽车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种贫者仇视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就后者论，贫富阶级的悬殊本不合理，贫民阶级开始了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以行动表示其意志，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有进步。就前者论，我们一向认为20年来国民党的“训政”，无甚成绩可言，而现在一般民众居然敢公开抗议“为什么不要我们吃饭”，国民党当局亦大可引以为骄，因为“训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行使政权，而人民所以要取得政权的目的，终其极无非是为了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幸福。现在一般人民，受了20年的“训政”，终于能提出“为什么不要我们吃饭”，我们竟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训政20年，非一无成绩可言者。

第二，地方党政当局，都将此次骚动，归之于“异党”的阴谋。我们始终认为，这一次骚动，完全是逼出来的。在这次骚动的后期，是否有外力参加，我们没有充分根据，可作论断；但这次骚动的发生，完全是自发的。党政当局认为，骚动的第一天（11月30日），摊贩即已释放，则此事件应已过去，而第二天（12月1日）骚动的程度和范围，反

较第一天为烈为广，显有“暴徒”从中阴谋煽动。我们以为若就群众心理来观察，此亦事理之常。因为群众的感情一旦掀起，这种感情必须达到最高点，始能下降。骚乱的第一天，群众的情感刚被掀起，群众感情一被掀起，感情的发扬即愈来愈高，所以第二天的骚动情势，较之第一天反更严重。在第二天的傍晚，一方面地方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处置（即“格杀不贷”），同时群众的感情，已因经过三四十小时的宣泄，达到高潮，所以自第三天（12月2日）起，全部骚动，戛然而止。我们很怀疑，假如这次骚动，确是有“异党”在后面作严密而大规模的发动，这样一个严重的局面，是不是能在一夜之间，从最高潮一下子回复到原来的平静局面。以常情推测，在政争如此剧烈的今日，在任何社会骚动中，“异党”之插入，事属难免。但若谓此事纯为“异党”之阴谋造成，如非失之夸大，亦属有欠公允。至于就“异党”煽动一节而论，我们亦可附带一述我们的感想。我们一向主张民主法治，我们绝不同情任何政党，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从事于破坏社会治安，有损公共福利的行为；凡此皆法所不许。但就政治的观点言，在野党派之借机生事，以与执政党为难，实为事理之常。在野党如不处处与执政党为难，他将永无取得政权之一日。无论英美，莫不皆然。执政党唯一对付的方法，就是励精图治，拼命建设，提高效率，改革政风，以政绩和事实来对付反对派，来赢致人心。即以摊贩事件而论，摊贩要生活，如其政府能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则何来此次的骚动；“异党”纵欲借机生事，亦将无机可借；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所以党政当局，应当将注视此案的重心，转个方向。不要单在消极方面攻击“异党”，应该反躬自问，多在积极方面，做一点建设工作，改善民生；民生改善，社会自可安定，国家自趋太平，而执政党的政权，亦易巩固。

第三，在此次骚动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为其他任何社会骚乱案件所无者，即凡谈论此次骚动事件者，大都对政府表示不满。不过我们在此应当说明，“不满政府”与“同情摊贩”应为二事。先就一般人对于摊贩的态度来分析；从正面说，有许多人是同情摊贩的，因为摊贩设摊，无非迫于生计，其情已极可怜。从反面说，在此次的“摊贩事件”中，无一人对于摊贩表示指摘。不仅社会一般舆情如此，就是官方态度也是如此。无论是吴市长的谈话，或市党部、市参议会、江苏监

察使署等重要机关主管人对外的谈话，都无直接指摘摊贩的言论。由此可见，大家在良心上都承认着一个原则，即人人总得有饭吃，总不能逼人饿死。因为大家在良心上，无法否认此一原则，所以大家不得不想到一个极为实际而又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今日中国没饭吃的人实在太多了。目下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寒无衣，饥无食，住无屋，病无药。我们不能不承认，20年来的统治是一个“失败的统治”。无论是国民党员，不是国民党员，看到今日中国的局面，无不叹息焦虑。经济愈来愈近破产，社会愈来愈趋不安，而劳民伤财，人人咒诅的内战，仍在进行。我们相信，凡是尚有一点良心血性的人，对于现在国家的局势，定必感觉苦闷，感觉愤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骚动中，人人不满政府，批评政府。一般人不满意政府，批评政府，怜惜摊贩尚在其次，主要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太不像样，当前的危机太多太危急了。人人在要求着政府能立下决心，拿出办法，来挽救当前国家的危机。

此外尚有一点，我们愿意附带一述者，不满政府不一定就是不满市府。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只能在其职权范围以内，尽其职责。若以指责整个政府的理由，指责地方行政长官，或者要求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负起非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力量所能办到的责任，均欠公允。就原则上言，这次上海市政府在取缔摊贩一事上，无可非议。而且在这次骚动中，我们对于吴市长的处置，不能不加以公道的称颂。社会应当充分明白，当吴市长全力制止警察当局使用武力对付群众时，他本人也是受着他下属的不满和抗议的。然而有远见的人不能不承认他这种处置，具有高度智慧。在这样一个混乱激荡冲动中的骚动，造成“惨案”，易如反掌；设若如此，其后果诚难想象。我们所唯一批评吴市长者，即在这次骚动中，吴市长对于“暴徒”“阴谋”，强调过度，不免有损政治家的风度。关于警察，群情指摘。我们觉得这种指摘，亦属感情太重。一般下级警士巡官，他们也未尝不在自我良心和服从命令之中，感觉苦痛，以他们月入之微，职责之重，社会对于他们的要求不免过高。这一切如众所非议的情形，警察本身，不能全负其责，其中大部牵涉到社会风气及全盘政治的问题。我们现在愿意总结言之，这次上海的群众骚动，实含有极严重的意义；假如这仅仅一种地方事件，我们绝无意思浪费这许多篇幅加以论列。我们认为这次上海的民乱，就是一种国家将要遭遇革命的象征。

我们如此看法，其意非谓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将由这次骚动中的人物发难完成，而是说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已一天成熟一天。我们读报，这几个月来，这种大规模的骚动，何止上海一地？广州、福州、杭州、重庆，以及湖南、江西各地，迭见不鲜。《大公报》高唱“要变不要乱”之论；既然不变，那就势必于乱了。这次上海的民乱，对于当局是一个极其明白重要的教训。当局将因此项教训而加紧其政治控制，抑或反躬自省改进政治，那就得看执政当局的智慧、修养及造化了。

12月9日

(原载《观察》第1卷第16期，1946年12月14日出版)

四、中国的政局

一

大局已到了穷则变的阶段；虽未变出，确已穷极。

在最近几个月中，南京的高级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未有的。这个变化就是：他们已深切感觉大势之日非了。迫使他们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种的：马歇尔的离华，共产党的不妥协，一般舆论对于政府的抨击，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显已沦入黯淡与苦痛之中。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机。而还要花样百出，“帽子”乱飞，无异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厌恶南京政权的局面。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痛恶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

人离心，个个厌恶。现政权中的人，恐怕也未尝不顿脚叹息：为什么这些人都“左倾”了！假如不满政府就是“左倾”，那末老实说，在20年来国民党这种统治作风下，假如还不“左倾”，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就思想左倾而言，思想左倾和信奉共产主义本为两事；思想左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产党。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政争之中，一切不满现政权的情绪，其无异间接增涨共产党的声势，确为事实。共产党是有组织的，一般人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人之渐渐被有组织的人吸去，已为事理之常，而当局还采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来愈和共产党接近。不论这些不满国民党的分子和共产党有无联系，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产党，总之在国共的斗争中，凡此皆对国民党为大不利。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可，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美国军火快用完了，日本军火也维持不了好久，自己制造则远水不救近火。虽然大帅出巡，而未必有补于士气，因为将军们都吃得饱饱的，而士兵们已无意为少数人送命了。

二

据我们观察，现政权业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说，从抗战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动攻势，迄在反对派一面，特别是中共一面，国民党始终处于招架的地位；直到国大开会前一两个月，国民党突然争取主动，但国大一开，局势大僵，最近渲染政府改组，闹了几个月也无甚成就。再说军事，军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2月17日蒋主席在中枢纪念周上论及临沂之战时说：“不

管是共产党自行撤退或国军进攻，总之现已占领”（2月18日《大公报》），在过去蒋主席的演说中亦从无如此的语气。经济更是束手无策，上海的金价跳到960万，南京还在指派人员，组会研究。出口补贴，令甫10日，即行取消，简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抛售救济物资，现政权的穷形极相，实已毕露。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据我们的观察，现政权的挣扎，显然并未针对病源。举例言之，现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组政府。但我们不知照现政权最近两三月来努力改组政府的做法，这种改组，在政治上有何意义？还是想以此使国内人民一新耳目呢？还是为了对友邦一种表示呢？在我们看来，目前这种改组，无甚意义。第一，要改组政府无非要刷新政治，振奋人心。那就得大公无私，唯贤是用。被延揽的人总要德才孚望，能胜重任。可是现在政府所拉拢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闻也，有的根本在算盘子上没有地位。拉这些人入府，不足为国民党之助，反足为国民党之累；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诚，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伪。这是就改组论改组。第二，要使改组政府获得成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同时改革政治作风。而在我们看来，改革政治，远较改组政府为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添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老实说，单替国民党设想，国民党果有决心打开当前的局面，振奋人心，则改组政府，尽不必向党外拉那些不相干凑凑数的人，国民党里面未尝没有优秀开明的自由进步分子。给他们权力，给他们机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接受他们的作风，全国耳目，也会一新。今日国人，深受“训政”之赐，政治的经验与政治的认识，确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订建国大纲时所认为那样的简单幼稚了。他们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政治本质上的改变；何者为假改革，何者为真改革，他们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但是事实上国民党有无此种远见，有无此种胸怀，有无此种决心，我们简直怀疑。就说最近上海发生的劝工大楼血案，还不是一套老办法？工商界人平时对于民主运动，

本来不甚关心，处于旁观地位，可是给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许多反对派，真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权，一方面在北平大举逮捕。我们别的且不说，就说蒋主席所提的四项诺言，若能兑现，人心亦可渐渐拉回过来。诚则灵，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有决心，民心未尝不可收拾。传说当局对于目前局势，非常明白，忧虑焦虑，倍于常人。但是觉悟而无行动，这种觉悟仍是属于私人的，而无任何政治上的价值。20年的时间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远，要拉回来，须费大气力，我们怀疑现政权的人物有没有这大气力。

三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非永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谈判方式，插入政权阶层，徐图后举，自然最好；否则只好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论而言。就事论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各人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在政协阶段，共产党表示愿意还军与国，但须得到保障，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连合在国府会议中取得否决权的背景（当时民盟力劝共产党放下军队）。后来这个计划固未实现，就是实现了，共产党到底放不放心交出军队，还是一个大疑问。

计划中的联合政府，至今未能实现。实在说，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参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发挥有效能的政治力量，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相当赞成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我们希望在这个联合政府里，发生一种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在这个拟议中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即

使联合民盟)也只是一个少数派,容能 check,未必能 balance。但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坚强的党,是一个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政治计划与政治作风的党,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这个联合政府中,或能发生一种领导作用。现在人民实在太穷太苦,政府应当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借以改善今日一般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一再要求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从前共产党反对美国调解,主张美苏英根据莫斯科三国宣言共同调解,可是现在,共产党宣言反对任何外国的调解了(2月22日合众社延安电:周恩来谈话)。在过去和谈一年中,在共产党自身看来,他们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来氏返延后提出的和谈两前提,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其事之甚少可能。既无可能而仍提出,

也是有意使马歇尔和南京方面难过难过而已。共产党是现实的，所提和谈的前提，在我们看来，也只是一种幌子。即以国大及国大通过的宪法而论，周恩来氏既然同意由沪去京，至少表示共产党有一种“有条件的”参加国大的可能。假如共产党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其内容容有变更，但共产党之不参加国大，并非为了宪草，而是为了宪草以外的其他条件没有讲好。要是讲好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参加国大？而且去冬国大之所以开得成，也是因为政协承认了那批旧代表的缘故。要知这批旧代表，本无承认之理，但绝无承认之理者，政协那些代表们也居然承认了——只要自己的党得到利益，牺牲人民亦竟不顾！去冬国大之能开得成，至少与政协的承认这批旧代表有关；而关于这点，共产党也是同负其责的。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军队论，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就地盘论，他们有他们的价钱。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给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连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们不要。哪四个地方，他们不说，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省，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四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朝气和生命的力量的。不过上年他们在苏北一带的作风，却大失人望。苏北的作风，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呢？还是中共在延安一带是一种做法，在苏北这一类地带又是一种做法呢？还是苏北一带的作风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级干部干出来的呢？我们未能了解。但是中共必须认识，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的党员是中国人，他所企图起而统治的一个国家是中国。中国有中国的民性，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完全不顾他们所属于的这一个国家的民性传统，必将减少他们成功的希望而拉长他们离开成功的距离。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下，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①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宽其尺度，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我们对于共产党，私人方面无恩无怨，我这一番意见，我并不认为仅仅是一种消极性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积极性的建议。

五

现在再来观察国共以外的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自由思想分子”这个名词，本来是很笼统的。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则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分子。若以政党为别，则不仅国民党中很有一些开明进步的自由思想分子，就是在共产党中，恐怕也有这种分子。马歇尔的声明中曾抨击过共产党里的极端分子。按照逻辑说来，根据马歇尔的声明，则共产党中也是有温和的自由分子的。据我们所知，

^① 此处的省略号表示文字有删节。储安平在分析当时的中国政局时，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作了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肯定。但他对时局的认识也有偏面和不当之处，因此编者对这类的文字作了删节，用省略号代替。——编者注

恐是有的。问题是数量的多少，以及在那种严密的党纪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论述政治形势的文字，所以我们在此讨论“自由思想分子”，大体上系指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分子而言。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唯一联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有了“民盟”，不来借重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向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像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政治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张君勱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

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

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联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联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六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一、过去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中国有句话：“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自由思想分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都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但那个“相轻”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脱。譬如这次民社党和民盟的脱辐，政治上的看法固为主要的原因为，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事政治，必须有政治家的修

养。第一要看得远，认得清；大的要争，小的就不该争。第二要有气量，唯气量大，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抑平自己的感情，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顾全大局，争取目的，团结合作，开创前途。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但是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二、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党20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20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谈不到。2.经济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3.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20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哪还管什么是非呢？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①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

^① 此处有删节。——编者注

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不过若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看，这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显然失之消极。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这个要求是时代逼出来的。我们认为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虑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原载《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出版）

五、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大局浮动到了极点。到处不安，到处忧惧。旧局面正在瓦解之中。

一个局面趋向瓦解，总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所致。一个局面的瓦解，非一日之事。在开端时，昏庸之统治人物恒不以为意；但当它挟狂风以骤至的时候，台上的人物遂惊惶失色而莫知所措。近一月来泛滥全国的米潮和学潮，无不表现当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终日。我们早就认为这次政府的改组，无甚意义。现在改组已逾一月，改组后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尚无任何作为。张群内阁一上台，物价就抢先贺喜。米价在半个多月内陡涨至一倍以上。上海、杭州、无锡、芜湖、宣城、合肥、吴兴、衢县，以及远至四川的成都，无不有抢米的风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子子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挣扎其生命，这说明民间疾苦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抢米行为不限一地，竟然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到处骚动，到处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无一天不在逼着人民要起来革命。

这次各地学潮，原因不一。教育经费问题，教授待遇问题，学生副食费问题，男女分校问题，会考问题，人权问题，校长问题，迁校问题，护校问题……一连串的“问题”。本来是一些个别的局部的问题，经过多日蔓延演变的结果，据今天（19日）报纸记载，似又进了一步成为一个更扩大更严重的问题，在南方变成为一个“抢救教育危机”的问题，在北方变成为一个“反内战”的问题。这次学潮开端于教授的要求改善待遇，“停教待命”，其后接上几个大学的学生为争取他们本身各别的目的，请愿游行，而现在则在一种更大更普遍的呼吁与要求下，形成为一

种狂风暴雨式的全国罢课局面。从中国的南部到北部，东部到西部，几乎整个的国家都受到这种学潮的激荡，沉沦在一种无底的动乱与忧惧之中。我们无意在此就每一学潮一一论评，我们认为从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观察这如火如荼的学潮，其意义远为重要。我们首先要问，这种汹涌澎湃的学潮，其包含的政治意义究为何如？我们认为在这些学潮的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现状的普遍的不满。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当前局面实在怀有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度反感。我们先就教育本身来说，为什么多年以来，军费党费团费以及一切有政治性质的费用，动辄巨亿，而独独对于教育经费如此吝薄？为什么那些达官贵人，汽车洋房，享受优裕，而一般公教人员却不能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生活？为什么教育不当教育办，要任命那种有党办党有官做官的人物来做大学校长？为什么不能让青年的智慧思想自由发展，而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限制？为什么不能在根本上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整理课程，充实设备，增加经费，培养学风，使青年在校四年，在知识上能有所得，在做人上能有所立？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是衣履不周，三餐不饱，身体疲乏，精神萎顿，而一想到来日，则尤中心徬徨，莫知所往。在快要毕业的阶段，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自己空虚，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前途茫茫。这些还是在学校范围以内分析。要是再将视线放远，看到国家一般情形，更是绝望苦痛，欲哭无泪。八年抗战，幸未覆亡，国家总算乘此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努力，埋头建设？没有一个国人不在呼吁和平，没有一个国家同情中国这种内战，为什么内战不能停止？物质这样涨，涨到骇死人，为什么一天一天的过去，政府当局总是没有一点办法？为什么有些人的财产越来越大，而一般人则越来越没有饭吃？为什么政府对于那些最大多数的穷苦百姓，总没有一个办法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在今日这种社会上，那些一肚皮草的逐臭之徒，反可招摇过市，优游自如，而一切有智慧有人品的人物，反而在水准之下的生活中挣扎？这是不是社会的不公平？为什么政府容许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为什么汉奸大到像周佛海，竟然不死？为什么只要有枪杆子的人，翻来翻去总是“忠实同志”？为什么种种贪污不法的事情，报纸抨击，众口指摘，而政府对于这些案子总是雷大雨小，不能痛痛快快惩办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只要愿做尾巴，便可分到洋房，

配到汽车，做到大官，占到地盘？整个局面，混混沌沌，良心丧尽，道德荡然，纲纪废弛，人心麻痹，人人只知混水摸鱼，取巧为私，国运日敝，民生日蹙，凡此种种，对于那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青年，请问何能使之甘心！请问何能使之甘心！……无论从国家大事，或者到个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绪是苦闷，徬徨，失望，愤怒。他们看不到一点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在内心中渐渐郁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这一肚子火，碰上机会，自然得发泄出来。这是多年以来他们耳闻目击身受种种反感所累积而成的一种反应。反感越多，累积越久，在发泄的时候，其情绪也就越激烈，其态度也就越倔强，其意志也就越刚毅，而其汹涌澎湃，奔冲激荡的力量，也就越凶猛而难于遏止。

英大交大两校学生的赴京请愿，在当时看，实已构成极度紧张剧烈的场面。但事态发展到今天（19日），英大交大事件在这个还在发展中的学潮中，显然业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而仅仅成为这次整个学潮中的一个序幕。但我们即使就以旬日以前当局对于英大交大两校学生的请愿，彻夜奔走，如临大敌，甚且不惜拆断铁路，阻止请愿学生的前进为例，亦可想见这种“恶性学潮”是如何的使南京当局心惊肉跳。各校学生请愿，都有他们各别的请愿目的，这些目的，若就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说，大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局对于当时英大交大的请愿，所以心惊肉跳，乃是因为这些学潮，在表面上，虽然只限于它本身所揭示的要求，但从一种更广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它还包含着更重要的政治意义。英大学生在杭州车站所表现的力量，并非纯粹来自那几百个英大学生；同样，交大学生在上海北站所表现的力量，并非纯粹来自那一二千个交大学生。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那是看得见数得清的。看不见数不清的是在那些学生的后面，还有着更大更不安的社会。为学潮所连带反映的那种社会的不安，才是使当局所以为之震颤恐惧，日夜不安的原因。他们深恐此波引起彼波，尤怕因学潮而引起其他更可怕的风暴。果然如他们所恐惧的，这几天的学潮比英大交大请愿时，范围更扩大，性质更严重，来势更凶猛。照这两天（18、19）报纸消息，学潮显然已从局部的变成为全面的，从分散的变成为团结的，从不公开提到政治问题而趋向公开提到政治问题。历史上的事实，有时恒非当时所能预料者，共产党的拆毁

铁路竟亦大有助于国民政府，目下以京沪杭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业已携手，若非津浦铁路不通，恐怕南北两地的学生亦已携手同行。这次这个全国性的学潮，南方先走了一步，现在北方正在接踵而来。照蒋主席的谈话以及国府公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政府对于学潮似将采取严峻处置。我们除了感觉当前的学潮似乎正在发展扩大之中，尚未达到最高阶段之外，尚难预料这个学潮将在什么时候以及何种情形之下始能结束。只是我们愿意向政府进一言者：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一切处置徒然使事态更趋恶化。要知今日中国的学生已非严厉斥训或强力弹压所能骇退得了。政府必须在学潮中获取教训。政府必须明白，无论学生本身承认或不承认这点，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乃为对政府过去及现在的作风表示不满。他们显然在示威，在抗议。用着愤怒的呼声，愤怒的眼光，并以一种挨饿吃苦的精神，来斥斥并鞭策台上的人们。他们明言或默言，大家一致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使国家像样，而进入于康乐富强之境。在台上的人们要知今日中国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你们，仇视你们。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绝大多数人在心底里都以白眼报答你们。只是你们有权有势，有枪杆，有钞票，一般老百姓虽然受你们压迫，受你们欺骗，受你们侮辱，受你们剥削，但在你们的淫威之下，无可奈何你们。在这种局面下，学生挺身而出，对国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们所以能肩负这个责任，一方面因为青年都怀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种不平则鸣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们幸而能有一种组织，在集体中表现其意志，以幸免头颅与身体脱离的危险。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之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股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南京学生饥饿请愿的主席团说：“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16日《文汇报》）这是多么勇敢的一句宣言！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20年或10年以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

他们的尊严。在多年多种的锻炼下，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政治上的种种现象诚然常常使人失望悲观，然而赖有这批青年，才使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一点国家新生的希望。我们承认学潮的起伏足以增加社会的不安，但要使社会得到安定，先须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决不是大官的训话或一纸命令所能奏效，这要执政当局拿出良心和办法来，一一见之实行。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者，实莫过于执政当局之能够牺牲他们已得的一部分权利，唯有这样，人心才能平，社会才得安定！今日这批青年都是来日建国的梁栋，如何使这批青年的力量不致在消极方面消耗，就全看政府当局如何的领导这批青年。

5月19日

(原载《观察》第2卷第13期，1947年5月24日出版)

六、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我们在上期本刊论评学潮，叙至5月19日止。我们当时陈述三点：一、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是对现状不满；二、目下尚在蔓延之中；三、学生非强力所能慑服。现在忽忽又过一周，在这一周间，大局发展，和我们前述三点，大致吻合。就第一点论，学潮已从非政治性质转入政治性质；就第二点论，不仅在京沪平津一带，罢课声援的学校越来越多，就是远至昆明广州各地，最近亦均纷纷响应；就第三点论，国民政府虽于18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而19日上海依然有五千余学生饥饿游行，20日南京六千余学生依然在水龙、皮鞭、木棍之下冒死请愿，同时北平万余学生亦仍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下游行全市。日来各地当局虽已开始以行动来制止学潮，学生被捕被殴之事，陆续发生，但是学生情绪依然高涨，心中愤怒只有更甚。

这次学潮，最初是局部的、个别的、分散的。自从中大学生倡导“吃光运动”以后，遂使学潮在横的方面发展开来，形成一个学生间共同问题。京、沪、杭、平等地学生大都响应这个运动。其后上海学生又改名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俾使这个运动的目标更加扩大，意义更加严肃。“吃光运动”和“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多少已牵涉到了政治问题，因为学生没有饭吃与当前教育的种种危机，无不与内战问题有关。北方的学生在这个时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认为“饥饿源于内战”，要活非先停战不可。这个“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立刻为南方学生所接受。南北两地的学潮发展到这个地步，目标趋于一致，步骤亦渐统一，而真正成为有一个历史意义的学潮，遂开始在

南北两地，并肩迈进。

当学潮公开涉及政治问题以后，政府即认为学生的行为已越出应有的范围，并认为此次学潮，完全受人利用。政府对于学生这种指摘，我们难于同意。一个青年在求学时代，他虽然是一个“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法律并未规定，一个人要是入了学校读书，他就将丧失他公民的资格。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已过法定年龄，他们绝对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今日国人，大都不满现状，对于内战，尤其痛恨。因为在这种内战的局面下，无论是国家的或者是个人的前途，都被内战打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丝生路。我们曾在上期本刊分析今日青年学生苦闷失望愤怒的种种原因，并谓这种种原因逼得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而最近王芸生先生在《我看学潮》一文（见本期《观察》文摘栏）里，叙述这次学生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背景，尤其针针见血。学生在中国业已传统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寒暑表，在过去，学潮的激荡无不反映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在这种全国怒吼的局面下，当局不反躬自问：为什么那些学生要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为什么全国的学生都那样万众一心地游行示威？还是一味训斥学生；训斥不足，施以残暴，这种态度。绝对不能使人同情。我们亦绝不承认，此次学生请愿，系受他人利用。学生目击国家危急，身受饥饿苦痛，痛中思痛，一切罪恶皆源自内战，起而呼吁，起而反对，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受人利用？老实说，在今日这种局面下，假如还要受了他人的利用，才喊“反对内战”，我们真要向苍天呼号“人心何在”了！

政府又用了许多大罪名加诸学生，认为学生的行动，破坏交通，妨害秩序。关于破坏交通，姑以交大学生赴京请愿一事为例，交大学生实难担负破坏交通的罪名。交大学生本拟购票乘车（14日《大公报》第4版），晋京请愿。为什么政府不准他们购票？公务员可以购票，商人可以购票，农人工人可以购票，为什么学生就不能购票？赴京游览可以，赴京访友可以，赴京经商可以，为什么去教育部请愿就不可以？从法律观点看，交大学生购票赴京，并不犯法，为什么政府要命令车站拒绝购票？政府禁止学生购票，在我们看来，无宁说是政府在破坏交通。交大学生认为政府剥夺他们购票乘车的权利是非法的，自然心有不甘。政府既然蓄意破坏交通，他们只好自己出来维持交通；自驾火车，离沪驶京。本

来只要他们的火车一开，交通亦即不难恢复。不料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拆起铁路来，致使交通陷于停顿。无论如何，交大学生绝无存心破坏交通之意，事实上破坏交通的是政府，而现在政府反将破坏交通的责任，加诸学生，孰能得平！再说社会秩序，政府定出了一个“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维持社会秩序”而要“临时”定出“办法”来，大家想想看，这个“社会”还谈得上什么“秩序”。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秩序”，决不仅仅是指汽车可以在马路上驶行，火车可以在铁轨上驶行而言。“社会秩序”的意义非常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人人安全，都有饭吃。去年5月上海的客饭只有500元，今年5月上海的客饭涨至4000元，请问政府有没有维持这个“社会秩序”？深夜捕人是维持秩序吗？任意搜查是维持秩序吗？现在有许多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亦没有看见政府负起责任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社会本来是比较安定的，就因为政府无能缺德，所以弄到今日，社会越来越没有秩序。今日扰乱这种社会秩序的决不是那些学生，制止了学生的请愿游行，也未必就算维持了社会的秩序。政府不尽其本身的责任，停止内战，稳定经济，而独独以妨害社会秩序的罪名加诸学生，是不能使学生心服的。

政府认为学生请愿，是“聚众威胁”。我们认为“聚众”则有之，“威胁”却未必。学生手无寸铁，政府有的是骑兵宪警，学生对于政府，何“威胁”之有？乡间的百姓，看见军队来了，要米不敢不拿米出来，要柴不敢不拿柴出来，要他们去挑箱挖土，他们不敢不去挑箱挖土，这才是“聚众威胁”。政府认为学生请愿，便是“聚众威胁”，未免夸大其辞。有人又劝学生要体谅政府。老实说，假如政府处处体谅人民，不要人民去当炮灰，不要征人民的食粮，人民哪有不体谅政府的道理。“体谅”是相互的，在过去，人民“体谅”政府已“体谅”到有许多地方的人民连裤子也“体谅”光了，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赶快体谅体谅人民，先把这个万恶的内战停了下来再说吧。现在人人饿得慌，他们一天到晚只想吃饱，他们还有什么闲心情来和政府有意为难？

总之，我们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学生的意志绝对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他们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钱端升先生说：“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痛苦，已与人

民痛苦连在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我们完全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我们在上期本刊就说过：“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20年或10年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老年人或中年人所能想象。”从前的学生运动，是学生跟了先生走，现在则是先生跟了学生走了。我们看这次学潮，在南京，中大的教授虽然发动于前（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等等），结果是学生一开动就跨过了教授一大步。在北方，学生走在前面，教授不甘落伍，虚心而又热情地牢牢地钉在学生的后面。在上海，教授似乎永远被学生所遗弃了。这是青年人的骄傲，也是中年人的悲哀。也就这一点，更足证明今日学生之绝不轻易受人利用。在这次学潮之初，学生似乎都是为了自己的问题，然而经过水龙先生、皮带先生、木棍先生、石子先生的教训，学生在心灵上又骤然跨前一步，孕育出一种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精神。他们了然他们在今日这个时代中已肩负一种新的任务，亦即历史的任务。他们现在正企图以他们的热血来转旋这个天地！南京学生饥饿请愿团的主席曾说过：“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本刊北平通信亦说，北平的学生都以为这一次的学潮，就是一个“新五四运动”的序幕，他们要替人民呼喊。他们已深深觉得，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争，这个争是渺小的，必要替广大的人民争，这个争才是伟大的。现在全国的教授，特别是北方各校的教授，都站在学生的后面，全国的开明的进步分子，也都站在学生后面，这是一个坚强的阵线，一幅动人的图画，一首伟大的史诗。从各种形势看，当局显已开始用铁腕来冲散这一个阵线。我们尚难逆料一切前途的演变。但是我们相信，当学生在极端的团结之下，意志坚定，组织严密，胸脯挺起，脚跟站牢，这一条铁链，绝不是木棍所能打得断的，这一股洪流，绝不是几辆警备车所能拦得断的。我们绝不相信政府能把天下的学生都捉进监牢。我们看，5月25日在上海被捕的学生宣传队，那样义无反顾，从容地走上警备车的神情，这是多么壮烈的场面。被捕的八九十位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依旧慷慨高歌，声闻户外，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情景。我们坚信，在当前这种黑暗危急的局面下，

学生将永远发挥其力量，以挽救国家的命运。在这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终会爆出光彩夺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国就在这火花中孕育生长！

5月26日

(原载《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31日出版)

七、一场烂污

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战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这是20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面前低头的一个纪录！在这20年中，这一个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恶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无言的反叛”，这是20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苦痛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所以这种行为能同时发生在政府统治区域中的大小各地，因为这个风暴已是全国性的，所以这个风暴已经威胁到政府政权的安全。中国的人民是可怜的，在政府种种秘密的监视下不能有什么大规模的组织，因之也不能发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这次的全民抢购，骨子里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这个政府，然而可怜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国老

百姓从来不能正面站起来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全民抢购从政治的观点来说也只是一种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极反叛，然而只要是真正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或者如我前面所用的一个名词，“无言的反叛”，但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脉。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崭新的教训。

“纸币”本来只是一张纸，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系于发行这个纸币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报纸登载大幅的广告，质问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钞不去抢购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英镑不去抢购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圆券就要去抢购呢？这问题真是问得漂亮！可是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民在以前（在10月31日以前），有了美钞英镑并不一定要去抢购物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圆券，也一样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面自有道理。严格地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放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不太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

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战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诅，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70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70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

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年来拆足！烂污！

（原载《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11月6日出版）

八、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 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7月1日纽约《下午报》(PM)刊载合众社中国区经理伦道尔所撰一文，指责“蒋主席之姻亲使美国公司遭受损失而致富”，其言有曰：

蒋主席之姻亲能获得25000美元之外汇以输入化妆品，而化妆品为中国政府所颁布之紧急经济措施中所严格禁止入口者。同时美国进口商则无从获得31万美元之外汇，以输入能使中国工厂复工之机械器具。中国政府之购料机关，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车、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同时美国公司则申请中国煤矿复业所需之抽水机之入口执照，而竟未获准。中国豪门第一家，即蒋夫人之昆仲及远亲等所办公司，则能借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并向在中国历史悠久之美国公司之经销商勒索。豪门利益之支派不胜枚举，例如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及孔祥熙所办之中孚公司，宋氏弟兄皆蒋夫人之手足，而孔氏则为其姊丈。宋子文所经营之南洋烟草公司，其另一兄弟宋子安之中国建设银行，蒋夫人之弟兄姊妹合办之金山公司，宋子文宋子良所办之中美橡胶公司，宋子文所控制之扬子电力公司，宋子文之中加公司，蒋夫人之外甥孔令侃所经营之扬子建业公司，其他远戚疏亲所办之公司，亦不胜枚举。遭受不道德方法失去代理人之美国厂家，据悉计有西屋电气公司，该公司之经销权已由历史悠久之店号转予中孚公司，威利斯汽车公司可贵之吉普车经销权，亦由其

美籍代表让予宋家。美国安纳康达铜矿公司则在宋家压力之下，
取消其美籍代表。其他类似情形尚不知几几。

年来美国报章杂志所刊指摘中国局势的文章很多，而伦道尔此文，其性质实较其他指摘中国现状的文章为严重。第一，伦道尔此文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广泛空洞的指摘，他文内所涉及的都是有姓有名的人物以及具体的事实。第二，伦道尔此文所涉及的不只是政策上的问题，而已涉及了政治道德上的问题。第三，伦道尔此文所涉的人物，包括曾任中国前后 10 年以上的两任行政院院长，并涉及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我们认为此文已经不能仅仅视为是一个批评任何私人的问题，它实已涉及中国国家的荣誉。正因此种理由，我们对于此事不得不出而一言。

我们认为国民政府以及“蒋主席之姻亲”，其中以孔祥熙宋子文两氏为代表，对于伦道尔此文，不能不出而有所表示。伦道尔此文的主要动机当然是替美商争取利益，但该文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商的利益问题。孔宋两氏虽然先后曾任中国行政院院长达 10 年以上，但我们不能谓为一个行政院院长卸任以后即无经商之自由，但伦道尔此文所涉及孔宋的部分，并不是一个行政院院长有无经商之自由的问题。伦道尔此文所涉的问题，约如下述：

(1) “中国政府之购料机关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以供私下分配”的问题。

(2) 有助于中国工业建设之正当器材，无从获得外汇及入口执照，而用以购买化妆品及奢侈品者，反能获得外汇及并能入口的问题。

(3) 豪门“借其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特权”，向外商“勒索”，并以“不道德方法”压迫正当商人的问题。

我们认为伦道尔文中所述，或者是事实，或者是虚造，二者必居其一。假如是虚造，我们认为伦道尔此文对于孔、宋两氏及蒋夫人，已构成严重的毁谤状态，孔宋等氏对于伦道尔应即提出法律控诉，借以维护其私人的名誉。同时，因为孔宋两氏曾先后担任中国行政院院长多年，而蒋夫人则为今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国民政府应即循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责令伦道尔及刊载伦道尔此文的《下午报》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假如伦道尔此文所述，确系事实，国民政府应对此事

严格惩处，俾在外交上维护国家荣誉，在内政上以申政府的纲纪。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对于此事应即迅速采取适当步骤，以澄清国内国外因伦道尔此文所引起的混乱的观感。我们建议由监察院单独组织，或由监察院会同立法院及参政会会同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办理此事。在欧美，当国会自身发现国家机关或政治人物发生重大过失或不道德的行为，或外间舆论对于国家机关或政治人物的行为有所指摘时，不论此种指摘发自国内或来自国外，而那种过失或行为足以损及国家的尊严及荣誉者，国会常常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彻查此事。我们认为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步骤：

(1) 彻查国民政府购料机关自胜利以后自国外购入器材用品之全部单据，查究是否有为伦道尔文中所述“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车、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之情形，并公布彻查之结果。

(2) 政府曾经明令禁止奢侈品之输入，但事实上，奢侈品之输入并未绝迹。其中单单汽车一项，最新式之汽车时有输入。上海报纸对于此事屡有记载。政府应彻查此种明令禁止之奢侈品究由何人在何种方式下输入，并追究其责任。

(3) 政府应即公布自胜利以来核准外汇之全部情形，其中包括：(一) 申请人全部名单，(二) 核准购买外汇者之全部名单，(三) 核准之数目(包括申请人原申请之数目)，(四) 核准之理由。

(4) 政府应查究为伦道尔文中所举之豪门，有无“借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其所获得之“特权”，其内容与性质又如何？

(5) 政府应令伦道尔负责供给更多之材料与证据，以证实其所指摘之事实。并要求伦道尔文中所涉及的若干外商如西屋电气公司，威利斯汽车公司及安纳康达铜矿公司等，提出材料及证据，借以决定伦道尔文中所述者是否为事实。

无论如何，对于伦道尔此文，即使为了政府自身的名誉，政府亦应采取步骤，表明态度。除非政府默认视政权的存在确是仅仅为了维护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政府对于伦道尔一文不宜默无一点表示。我们愿意借此向政府进告一言：八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健康，以及他们应有的幸福，从事抗战，以争取国家的生

存。但是我们争取国家的生存，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要替少数特权阶级保护并扩充他们的利益。现在中国的一般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被摒弃于购买圈外，沉沦在生活的水平线以下。不仅民怨沸腾，到处是“反饥饿”的吼声，据我们所知，就是在国民党党团内部，最近也发生了“这个党到底是代表哪几种人的利益”这样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现实环境，看来是越逼越紧了，事实上已不容许豪门逍遥自在。假如政府自身缺乏勇气，不能采取剧烈措置，其结果那就势必只有等待别人来采取措置。只是要铲除豪门，须知孔宋只是豪门的代表，豪门初不限于孔宋两家。一切既成的豪门及正在生长中的豪门，俱应在铲除之列。同时铲除豪门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单单消极的行为无补于今日国家的大局，豪门在性质上是一种特权阶级，我们必须同时在根本上消灭一切足以产生特权的制度。豪门的象征是少数人饱死，多数人饿死。我们一方面铲除豪门，一方面需要努力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今日中国政治，如其不从解决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下手，则社会将永远不能得到安定，一切建国的工作亦即无从获得成功。

7月17日北平旅次

(原载《观察》第2卷第22期，1947年7月26日出版)

九、国大评论

(一) 训政问题

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很糟，糟到连国民党的党报都不得不出而指责。据我们所看到的京、沪、津各地报纸所载有关国大会场情形的记载，字里行间，大都含讽带讥，印象不好。有人认为国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开会，会场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难望理想，这是第一次的民主学习，大家应将期望的尺度放宽一点。不过我们应当指出，天下的事情，不一样也有一个不像样的限度，在限度以内，大家可以原谅，超过了某种限度，便使人难于默缄。像这样一个二千多人的会议，要希望每一议事，每一发言，都按规就矩，有条有理，自然未免求之过高。但是动辄起嘘，随便喊打，亦未免失之过分。国大代表来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们亦不能希望每个代表的发言礼貌，都能符合水准，但报载居然有人高喊“妈他民的主”，则未免相去更远。本人目睹会场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气之徒，直奔讲坛，若无职员劝解，定必扭成一团，偌大一个会场，东一簇，西一簇，乱哄哄，气冲冲，尽管主席嘶哑喉咙，要求维持秩序，可是无人理会，一片喧嚣，一团乱糟，使我们这些旁听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简直无感可想。我们细加分析，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识问题，一部分是修养问题；而两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教育问题。就知识言，本人亲耳听到一个代表发言，谓“国大有修改宪法之权，如其我们这次不修改宪法，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

任”。此种逻辑，不知何来。修宪之案，均须三读通过，举行二读会时，有一位代表大嚷，说上次业已通过（所谓“上次”，实际上是一读会），为什么还要讨论？有人告诉他议案须经三读，始能通过，这位代表还是不服。国大代表，不远千里，进京开会，而不肯在事前稍为补充补充自己的知识，严格言之，可谓有亏职守。就修养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讲理，喜欢打的朋友何必竞选国大代表？要讲理就得听反对的意见，不愿意听反对的意见的人何必竞选国大代表？民主国家的会议代表，都应具有某种水准以上的教育素质。我们应维持这种水准，我们应提高代表的素质以符合这种水准，我们不应降低这种水准来迁就代表的素质！

这次国大开会之糟，业已众口一辞。但是大家都在议论国大代表的品质，而很少有人追究这一个失败的国大的责任应由谁负。本人认为这次国大开会情形如此之糟，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国大代表所负的责任小，20年实行训政的国民党应负的责任大。议会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议员的素质如何；议员的素质如何又得看选民的素质如何以及国家政治上的风气如何。选民的素质高，产生出来的代表的素质自然也跟着高；国家在政治上的风气好，选举的成绩自然也跟着好。国民党训政前后20年。经过这20年，本来是30岁的人，现在已经50岁了；本来20岁的人，现在40岁了；本来是10岁的孩子，现在也变成为30岁的人了；至于30岁以下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在国民党的训政阶段中长大的。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无论选民或竞选人，大多数都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的公民，这些选民与竞选人的素质的高下，不能不说与20年来国民党训政的成绩无关。当初中山先生遗教，认为“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生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所以训政的目的，即在训练人民如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然而我们现在从国大的选举以及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来看，国民党训政20年的成绩究竟在什么地方？众所周知，这次国代和立委的选举，弊端百出，弄到发生命案、选官被控、绝食抬棺，笑话之多，开中外古今纪录。选举的成绩如此，国民党对于这20年来“训政”的这段历史，何以交代？再说代表素质，今日国大代表的素质，难道都是理想的吗？难道都够得上国家的水准吗？假如国内还有素质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质

更好的公民无法产生，因之使国家的政治水准得以随之提高？国民党对于此点，有何自解？我们很坦白的说，从这次国大选举和国大开会情形来论，国民党 20 年的训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国民党要是勇气，对于这点应当坦白承认。也许他们看到这二十几天来国大的情形，内心里也在惭愧。但惭愧是消极的。过去的虽然过去了，假如国民党能够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一种教训，则过去的失败犹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失败。行宪以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党还是国民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只有以国家为第一，才能大公无私；只有大公无私，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只有有成就的人、团体、党派，才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立脚！

(二) 总统问题

关于总统问题，我们要分几点来议论。

第一，在现实政治里，第一任总统是蒋主席，几乎成为一个不移之局。4月4日，蒋主席正式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一笔惊人，于是各方揣测丛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姿态，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表示。据我们所知，蒋主席这一着绝对不是一种“姿态”，这也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表示，而且相反，正是一种最积极的做法。这是一着棋，一种政策，绝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决定”。何以言之？原来在政协时代，大家制宪，都以蒋主席为对象，想用各种方法来限制他的权力，因为当初大家假定，将来的总统一定是蒋主席。蒋主席宣布不出任总统，这是一种战略，企图使围扑他的人扑了一个空。据说这是蒋主席在牯岭静思以后的决定。蒋主席是喜欢负责任的人，宪法给总统的权力加上种种限制，这一点，就蒋主席的性格来说，是他受不了的。同时，至少在蒋主席看来，在目前的政治局面下，仍须由他来主持，总统既无权，他只好改任有权的职位，这就是早在一个月以前，本刊4卷4期所载蒋主席可能不做总统，改做行政院长这一报告的根据。所以，不做总统做行政院长，绝不是消极的表示，而是十分积极的决定。无奈国民党的党人不了解他这一政策，这一谋略，还是哭哭啼啼的认为要是他们的蒋总裁不出任总

统，他们的党就完了。听说蒋主席这次非常生气，认为他的党人不仅不能帮他的忙，甚至还不能了解他。但是结果呢，各种实际形势，仍然要求非由蒋主席出任总统不可，而其救济的办法是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的大权。蒋主席不愿出任总统，本来是为了总统的权力太小，现在“权力”的问题既然有了补救办法，蒋主席自然可以“俯顺舆情”，出任总统了。这就是这次总统之选所生的曲折的一个最客观最正确的分析。而在这个分析之中，我们应可得到一个结论：蒋主席不拟出任总统，改长行政院，这多少还近于“人迁就制度”的精神；现在，为了要蒋主席出任总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以大权，则就又走着“制度迁就人”的老路了。

第二，大家都说，现在中国，除了蒋主席，还有什么人可以出任总统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着两个问题：一、在现实的国民政府政局里，还有哪一个人能有像蒋主席所有的那种统筹全局的权力呢？二、竞选就是一种比赛，也可以说是一种挑战（challenge）。现在有哪一个人敢起而与蒋主席挑战（竞选）呢（陪选另作别论）？由这两个问题，引起了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这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进而研究的，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除了蒋主席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声望和权力方面，可以勉强和蒋主席齐与并列的地位呢？十几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的政局有一种笼统的印象，认为当局御人，常采“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办法。我们看，在党务和教育方面，这一面有一个陈立夫，那一面就有一个朱家骅；财政经济方面，这一面有一个孔祥熙，那一面就有一个宋子文；军事方面，这一面有一个何应钦，那一面就有一个陈诚；派系方面，这面有一个CC，那一面就有一个政学系。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种均势的局面，大家都环绕着一个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出第二个全国性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形，据我们所能了解的，对于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实在是一种基本的、十分严重的缺陷。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全国性的领袖必不能仅限于一人。所以我们看，在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党魁，工党有工党的党魁，两个党魁在个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国家的活动中，都能保持独立的地位，所以一旦丘吉尔内阁垮台，艾德礼也一样能起而组阁，掌握国家的大舵。在美国，现在正忙大选，我们看，共和党、

民主党、第三党，都各拥有全国性的领袖，一旦事势需要，均可起而执政。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领袖，或者只容许产生一个领袖，这种国家绝对不够条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现在蒋主席业已当选为总统，我们希望以后政府当局，能多替国家培养几个政治领袖，特别是反对派的领袖。

第三，纯粹从政治制度着眼，这次我们选举总统，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两字是因为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适当的字眼。总统选举法里虽然规定可以自由签署提名，实际上那是给无党派的独立人士一种机会，以便没有党籍的独立人士亦可竞选总统，至于政党方面，按照各国通例，其候选人仍应由政党提出。这次国民党没有提总统候选人，由签署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也没有发表竞选演说，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国民党里竟然有两个人出来竞选总统。这算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学政治学的人简直没有法子解释。而尤其妙的，居正最初表示竞选总统，其后又说不要竞选了。不竞选，且罢了，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而竞选总统。嗣经记者围绕，率作片面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经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而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舆论既有所归，谗论衷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作竞选言说，以淆视听”。读了这个声明，简直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居氏身为司法院院长多年，总统之选，何等郑重，而忽竞忽不竞，真是使人迷惑；而结果呢，读者也许不免要捧腹大笑，因为居氏仍旧是竞选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随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对于政府失望！

第四，这次参加国大的政党，除国民党以外，还有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党这次都没有人参加竞选总统，这也是奇怪的事情。组织政党的目的何在？曰，希望掌握政权俾可实现本党的政策耳。竞选总统，本党不提候选人，而却去支持他党的领袖，政党史上，事不多见。去年4月，国、民、青三党共同执政，共同拥戴蒋主席，是犹可说，现在行宪，三党各自独立，法理上的立场已变，哪还能承袭三党共同执政时代的作风？曾琦还要发表声明，说什么总统要具五个基本标准，五个附带条件，真可谓“其臭不可闻也”。假如这批臭虫都赶不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请问中国的政治哪有清明进步的一天？

(三) 副总统问题

第一，关于副总统，国民党一党有四位候选人，其不合理，正如国民党一党有二人竞选总统一样，已详前论，此处不赘。严格言之，国民党应当只提一个人出来竞选副总统，现在搁起不管，听他们去自由竞争，无非顾全事实。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一切还是以顾全事实为主，以顾全制度为次。在这种政治作风之下，还谈得上什么实行“宪政”！

第二，关于选举副总统，在国大代表之间，我们最容易听到的一种论调是：“糟糕，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朋友，叫我到底选了哪一个好呢？”我们愿意告诉代表诸君：“你们错了！人民选举你们，是委托你们，要你们替他们挑选一个最好的副总统，你们不应当从‘朋友交情’的观点来作投票取舍的标准。你们这种话，初听好像没有什么，细加研究，就十分严重，因为这牵涉到你们对于‘代表’职责有无基本的认识了。”

(四) 宪法问题

第一，国大一开，就有许多代表要求修改宪法。宪法应不应修改，此处不谈，而会场上所以闹得如此一团糟，归根结底，还是吃了宪法174条的漏洞的亏，宪法174条文云：

宪法之修改，应依下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决议，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得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此项宪法修正案，应于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

上文第二款，立法院依法议决之修宪案，应于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半年公

告之，这是十分合理的，其目的在使国人注意，有充分讨论之时间，并使国大代表及政府当局都能明白一般舆论的背向。但是同条第一款为什么不作同样的规定呢？这是一个漏洞。宪法是国家大法，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机会表示意见，由二三千个代表一下子便可随便修宪，这是很危险的。假如 174 条第二款，也规定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所提议的修宪案，应于国大召开前半年公布，至少这次国大召开后，便不致因修宪问题弄得“满屋皆嘘”了！

第二，政协时代，按照张君勱的主张，将四权散布于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四权，是谓国民大会，即所谓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之国大。其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终于妥协，保持国民大会之形式，而减削其权力，使其职权仅限于（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这次国大召开，总统副总统尚未选出，第二款“罢免”一项自然谈不到；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复决立法院的修宪案也谈不到；宪法尚未实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见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务，乃在选举总统副总统；除了选举总统副总统外，并无其他权力。但国大代表，不甘寂寞，一开会就要求讨论国事，听取施政报告。从法理的立场言之，凡此皆与宪法规定不合；在宪法的条文中，国大代表并无此种权力。政府当局宣称，此次召开国大，即为行宪之始，而不料国大一开，国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坏宪法的行为，同时政府居然接受国大代表的要求，各部会首长一一到会报告施政，亦即不啻政府也跟在国大代表的后面，从事破坏宪法。所以这次的国民大会，在政府的原意，也许视之为行宪之始，而事实上，这次的国民大会，却变成为毁宪之始，国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领导毁宪，这一点是使一切爱护宪法的公民，都引为遗憾的。

第三，国大代表要求修改宪法，主要的动机是认为国大的职权太小，要设法增加国大的权力。就人情言，他们这种心理我们是极能了解的。可惜国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们只站在“国大代表”的角度上看国大，而没有从整个国家制度的角度上看国大。为欧美民主国家上下议院所有的种种职务和权力，在现行宪法上，已分由监察立法两院行使，无需再半空中杀出一个国民大会来分权。这个国民大会在现行宪法中，本来是

一个很特殊的组织。为什么有这个组织呢？最初因为中山先生的遗教中，有“国民大会”这一名目。张君勱主张人民直接行使四权，即称之为“国民大会”，其实，人民行使四权，就是人民行使四权，直截了当，还叫什么国民大会不国民大会呢？这无非是为了顾到国民党的面子，保存了中山先生“国民大会”这一个名称。后来因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对，故仍使国民大会变为有形，而改变了它的职权。这就是现在“国民大会”的来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和政府里的开明分子，想来想去，还是张君勱的办法高明，即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认为国民大会是不需要的。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已在宪法颁布之后，既然竞选国大代表，理应当于国大代表的权力，有一了解。假如认为国大代表的权力太小，太空，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则当初为什么不去竞选立委，而却竞选国大代表？在国家的整个制度中，国民大会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站在国家整个制度的角度来看，却仅仅站在自身权力的角度来看，闹着要增加国大职权，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理的。

第四，国大通过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理由是现在是一个“戡乱”时期，应当给予总统以非常的权力。我们对于这种理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算不是宪法的一部分呢？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宪法的一部分（4月19日王世杰在国民大会上解释，谓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一种宪法的补充条文，既称为宪法的补充条文，当然也就构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则我们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根本大法理应笼罩到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的一切统治的原则，决不能说，这部宪法，平时可行，战时不可行。美国在最近30年中，两次参加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有看到一到战时，美国宪法便要增加补充条文，授总统以特殊的权力。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是宪法的一部分，则为什么要由国民大会来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欧美各国在非常时期，虽亦有授权行政首领以若干特权，但此种权力，均由立法机关所赋予，国民大会非立法机关，由国民大会来授权行政首领，于制不合。（二）目前政府已把共产党称为“共匪”，动员戡乱。我们现在即从政府的立场来说，则我们认为，政府出兵清剿“共匪”，和政府派一团兵到太湖去剿匪，在性质（nature）上并没有什么不

同；不同的只是“匪”的数目的多或少，“匪”的组织的松或严，至于政府出兵剿“匪”这一行为，其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今日政府打“共匪”，要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之权，则岂不是将来政府要派兵到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去围剿湖匪时，也须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大权吗？要是这样，则我们的国家也就永远没有回复到平时的可能，我们的宪政也永远不能走上正轨了。所以就纯粹的法理立场，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理不通。（三）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讲法治，即须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不要制度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假如我们随随便便，今天一个特殊条款，明天一个特种法律，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不能达到法治的境界。所以在任何理由之下，我们认为国民大会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都和宪政的精神不符。

4月21日

（原载《观察》第4卷第9期，1948年4月24日出版）

十、评翁文灏内阁

从5月20日总统就职的一天算起，经过10天以上的时间，到5月31日，所谓“行宪首届行政院”的组织工作，才告完成。我们谨就此事发表评论如下：

一、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这个过程本身，饶有政治教育作用。如众所知，这次行政院院长一席，总统本来属意张群，其次则属意何应钦。张何都谦辞不就，才邀翁文灏出长行政院。在过去，我们看到外国一些国家（最好的例子是法国），总统邀张三组阁，张三辞谢，邀李四组阁，李四辞谢，或者一个奉命组阁的大臣，邀此人入阁，此人辞谢，邀那人入阁，那人辞谢，心中十分纳罕。因为在中国，照过去大家所看到的，只见你抢我夺，唯恐做不到大官，哪有请他做大官而居然不做的道理？这次请张群做，张群不做，请何应钦做，何应钦也辞谢不就；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说是新鲜的事情。张群何应钦为什么坚辞不就，原因很多，此处不暇详论；我们在此处至少有一点可以说的，即张何两人，都觉得这个行政院院长，不容易做，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不敢随便受命，这点极为重要。所以这次张何的坚辞不出，至少使一切热衷仕途的人物，或者我们应当更广泛一点说，使一切人民，认识一点，即做官要负责任。调子高一点说，做官要对国家负责任；调子低一点说，做官也得至少对自己的声名前途负点责任。没有把握做好，干脆还是不做。对于国家政治言，这是一种新风气，这是一种新教育。同时，十余年来，中国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当然是蒋先生。想做大官的人，最后一关都得要获得蒋先生的同意；蒋先生要派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在通常

情形之下，也很少有人辞职不就的。但是这次希望张群蝉联，张群却坚辞不就，请何应钦出长，何应钦也表示万难胜任，弄得这个行政院院长，一天两天三天的过去，始终提不出人来。对蒋先生言，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经验。

二、我们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看到中国的政治，毕竟还落后得很多。总统虽然是5月20日就职的，但是总统的选出却为4月20日之事。新总统产生后，旧的行政院即提出总辞。按照欧洲各国常情，新阁应在一两天之内组织完成。假如在时局特别动荡的时候，新阁甚至希望能在数小时之内组成，使国家的神经中枢不致因政潮的波动而中断太久，俾可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我们的新总统和过去的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一个人，按照正常情形，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应于总统就职的当天或第二天，由总统咨文立法院，请求同意。这次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直到总统就职后的第五天（5月24日）才提出来，这种情形假如发生在外国，早已构成为极度严重的政治危机了。不仅如此，院长人选的提出既已如此迟慢，而翁文灏院长的组阁工作，竟达一周之久，亦属少见。而且这次翁氏的组阁情形，与欧洲一般内阁制国家的组阁情形，很不相同。在外国，我们以法国为例，总统授命某人组阁，此一拜命组阁之大员，必须在数小时或十数小时内，决定他的“内阁”组得成或组不成，以便向总统复命。假如组得成，他当然是首相，假如组不成，他便必须辞谢，由总统另邀他人组阁。所以此人是不是首相，还要看他的组阁工作顺利不顺利而定。这次翁氏出长行政院，是先做“定”了行政院院长，然后再进行组阁的工作；这是和外国一般情形不同的。

三、因为张何不干，结果跳出了一个翁文灏，这在一般人说来，是出了冷门。就一般观感而言，翁氏出长行政院，要比张何出长行政院，情形好些。现在一般人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八面玲珑、遇事敷衍的官僚。官僚最不愿意得罪人，但是怕得罪人就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大家总觉得张群圆道有余，劲道不足，所以不一定希望他再做下去，希望愿意做一点事情的人上台做一下。何应钦本人的性情，尚称平和，但他是一个军人，中国人现在都不愿意军人过问行政，所以何应钦出长行政院，一般人也不欢迎。翁文灏的廉洁，是没有问题的，他过去的作风，亦比较朴实。由这样一个人来试试，就事论事，在现局面下，还不失为一个比较

合适的人选。不过这次翁氏组阁，不仅没有引用新人，而且完全是旧瓶旧酒；除了副院长顾孟余和秘书长李惟果两位有重量的新人外，其余几乎全是原班人马，这点实在使大家失望。我们并不是说，在翁氏所发表的这一个名单之中，完全没有清廉自守、饱学有识之士，但是这里面也不见得个个都有良好的政绩，能孚国人之望。不管人民对于政府的观感如何，至少政府自己总应当利用这一个时机，调整人事，使人耳目一新。大家都希望有新人出现，并希望新人越多越好，因为大家对于当前这个局面实在厌倦灰心，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是搞了10天，结果还是这样一个名单。是不是没有新人可用呢，还是现在这一副班底就是最好的班底了呢？我们对于这事，简直弄不明白。我们甚至不能了解翁氏这次出长行政院的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看这个名单，哪儿有一点“翁文灏内阁”的味道？不仅人是旧人，最妙的是大都蝉联原有的部会。这样一种组阁，可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没有个性（character）的组阁，或者我们也可说，这个内阁，就是一个没有张群的张群内阁。为什么翁文灏上台，而带领的仍然是一个张群内阁呢？一个新的内阁总理上台，带领的竟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旧内阁，我们很少听说过。组了一个星期的阁，到头还是这样一个名单，真是怪事。

四、关于行政院院长的成败问题，我们一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院长也都是没有办法的；谁上台就谁倒霉，谁来做就谁牺牲。现在分两层来说。第一，我们认为，除非行政院院长有左右大局的权力，否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开当前的局面。在理论上，行政院院长在国家的制度里，是一个负有极大责任的人，也就是说，握有极大权力的人，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有多少权力呢？现在政府要打共产党，要打共产党，自然就得用军事，在外国，首相对于军事的得失是负全部责任的，而在中国，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对于军事方面有权利过问吗？没有。假如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打垮共产党，为了爱惜国家的元气，解除人民的痛苦，就应当和共产党和谈，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今天做行政院院长的，有这个魄力使这个战的局面变成为和的局面吗？不像。假如真正要实行宪政，最起码的条件就得使宪法上面所规定的各种基本民权，获得有效的保障，但事实上，人民究竟有无真正的人身、居住、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的自由，其权操于党部及特务之手，

行政学院院长有办法把这种权力从党部和特务的手里转移过来吗？没有办法。行政学院院长是一个政务官，而且是政务官的头儿，然而事实上，中国的行政学院院长常常只是一个事务官。他所能有的权力，远比他所应有的权力为小，他所能做的事情，远比他所应做的事情为少。假如一个行政学院院长，他没有权力来决定整个的局面，他怎能有力量来维持这一个局面，或者打开这个局面？第二，我们认为，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值低落，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的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战火不停，政府只能消极地东拉西扯，剜肉补疮，谈不到根本的建设。建国，建国，哪里会在烽火中建起国来！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但是由于前面所述，行政院既没有决定大局的力量，他有什么办法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既没有力量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有什么办法来稳定物价着手建设？现在的行政学院院长只是一个账房先生，他充其量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零用中，搏节一点，他有什么权力可以使这个破落的门户变为一门昌盛的人家。翁氏出长行政院后，做事情也许可以认真一点，一切中国官场的虚文俗套也许可以减少一点，整个的行政情绪也许可以提高一点。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转捩乾坤，改变一个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奢望了。

五、事实的分析是令人悲观的。但是就国家的前途看，我们今日有一点是所能做所应做的，就是我们应当使一个行政学院院长是一个行政学院院长。这就是说，行政学院院长应有其独立的政策。就行政学院院长和总统的关系言，应当是总统支持行政院院长的政策，而非行政院院长执行总统的政策，就行政学院院长和立法院的关系言，按照宪法，行政学院院长应对立法院负责，但行政学院院长仍然可以在“坚持自己的政策”和“辞职”之间选一条路走，自己的政策不为立法院同意时，即挂冠而去。只有在

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上台又下台，两个上台又下台，政策才有改变的可能，局面才有打开的希望。行政院院长固然要努力赢取总统的信任和立院的支持，但行政院院长最要紧的是要知道人心的向背，得到民间舆论的拥戴。假如前前后后的行政院院长都能有这种作风，合则留，不合即去；则即使总统的意志和立院的意见，不与人民的要求符合，迟早也会迫使他们跟上民间的公意的。整个的局势和人心业已动荡到了极点，我们当然希望内阁能够稳定。但是希望内阁不要和人民脱节，较之无条件的企求内阁的稳定，尤为重要。翁氏出长行政院，一般说来，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当然希望翁氏多少有一点成就，但是假如翁氏失败了，我们也不一定就认为是翁氏个人的失败。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撑支得了的了。

6月2日 中山医院

(原载《观察》第4卷第15期，1948年6月5日出版)

十一、政治失常

最近政府有几件事情做得实在不成体统。第一件我们要说的当然是11月11日行政院通过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政府在八一九发行金圆券时，规定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4元，这次的修正办法改为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1000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20元，将金圆券贬值了五分之四。政府在发行金圆券时，大唱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调子，并且说谁破坏了金圆券，谁就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现在，我们看，政府自己率先破坏了金圆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国家民族的敌人！当10月杪^①11月初全国骚动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局宣布即将有“更好”的办法颁布，所谓“更好”的办法，大概就是那个金圆券发行的修正办法了，其中决定将民间缴兑的金钞吐还出来，以便取之于民者，仍用之于民。然而吃进去的时候，黄金一两只兑金圆券200元，美金一元只兑金圆券四元，现在吐出来时，黄金一两却要金圆券1000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圆券20元，一“取”一“用”之间，赚上了五倍，这笔没本钱的买卖真不坏。抗战末期，政府财政困难，宣传黄金储蓄，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到真要支付黄金时，却来了一个六折，凭空扣去四成；这事大家当还记得。现在旧戏新编，又要一手。多年以来，政府把人民当着一团米粉，捏在手里，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亏，心里恨透，可是没有办法。再说八一九政府的经改办法，规定人民所存金银外币，一律须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逾限而未

^①10月杪指10月末。——编者注

兑者，即视为触犯刑法，现在又允许人民持有金钞，并将金钞的价值，提升五倍，以前服从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服从法令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而大大沾了便宜。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后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实也一再证明：相信政府的最初总是给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后就给政府扔下不理睬了。修正办法第 11 条又说：“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存期满一年者，除照章计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与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圆。在金圆未铸成前，得按规定比率兑取黄金或银币。……”一年之后情形如何，谁都不敢说定，而一年以后的金圆券贬值到什么地步，尤其不能想象，假如今天真还有人到中央银行去定期存款，此人殆为白痴无疑。所以这条条文，撕破了脸皮来说，就等于要花 2000 元金圆才能兑到一两黄金；这叫做明吃一半，暗吃一半，真是算盘精极！

第二件我们要说的是翁文灏内阁的辞职问题。这件事也出乎常情之外。我在 11 月 3 日写了一篇论翁阁辞职的文章，可是 4 日中英文日夜报一律报道，翁氏坚辞，并已不到政府办公，翁阁的总辞书也已全体盖章，即将送府，翁阁之辞，似成定论，深恐文章刊出时，已成马后炮，所以在付印前数小时又临时抽了出来。不料我的文章刚抽了出来，翁氏却又回行政院去办公了。这次经改失败，翁氏的责任无可推诿。真正的来说，这个大责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负之（财政部部长当然有责任，但财政部隶属于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败，行政院院长的责任远大于部长的责任，故此处不独立论财长的责任），有欠公道，因为拆穿了说，翁也不过是一个账房先生，既不是当家人，也作不了多大主。但就宪法的原则言，这件事总是要翁负责的。所以从政治的责任言，翁的一辞二辞三辞坚辞，都对。问题是他虽坚辞而当时竟未能坚辞到底。这次经改的失败，其性质不可谓不严重，其影响不可谓不广远，无论就个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责任言，翁氏绝无继续负责的可能。严格言之，就是 10 月 31 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有关经改的补充办法一事，亦属不当。内阁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执行的政策的成败，政策既败，内阁即垮。八一九的经改办法，政府亦已自承失败，在此种情形下，行政院应当立刻呈辞，任何补充或修改的办法，都应由后任来决策办理。当翁氏上台之初，胡适之先生捧场，谓翁氏有勇气。我觉得当时翁氏并不是有勇气接受那个

阁揆大任，他只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这个组阁大命罢了。翁氏既无勇气拒绝任命于前，亦无勇气坚决呈辞于后。不错，当前的局势是危急的，政务不宜一日无人主持，但是从宪法原则来说，这个责任是属于总统的，而非属于行政院院长的。易言之，时局既然紧急，总统便应早日另定阁揆之选，已经呈辞并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长，不能因为总统的迟疑不决而勉力维持下去。至于总统先生，行政院院长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政治责任，其辞呈应无不批准之理；因为假如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过失的行政院院长，还不使之去职，则所谓“政治责任”也者，岂不成了好听的空话？翁氏一辞再辞，总统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总统对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对僚属气度之厚，假若一味坚留，则既破坏宪政的原则，亦置纲纪于不顾，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都是不当的。

第三件我要批评，而为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赋予傅作义的权力的问题。按照报上的记载，要点有二：一、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不须事前请示中央；二、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与中央所颁布的法令有抵触者，以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为准。凡此记载，虽未见之正式公报，但也未见政府有何否认更正，想为事实。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举例言之，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议，不得变更之”。现在假如傅氏要变更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土，则中央是否承认傅氏之变更为合法？宪法第171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有与宪法抵触者，则是否仍以傅氏所颁布者为准？凡此都是大有问题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许不成立，因为只说傅氏的法令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以傅氏的法令为准，并未说到与“宪法”抵触的情形，如与宪法抵触者，自然无效。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宪法第116条明明规定：“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第117条说：“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机关解释之。”宪法明白规定地方法令不能与中央法令抵触，抵触者无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张傅氏的法令如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应以傅氏的法令为准，这种事情完全是违宪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规与中央法律抵触发生疑义时，应由司法机关解释之，现在假如硬性承认傅氏法令与中央法令抵触时，即以傅氏法令为主，这是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

大局越来越紧，各种现象日见失常，但失常也有一个失常的限度，当权者虽然希望保持他们的政权，但政治的常规则究竟不能不“永矢咸遵”。上述三事，都是荦荦大者，实际上，近来当局各种措置，大都有失体统。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

(原载《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年11月20日出版)

第二章

报纸、出版、编辑

一、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10月24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送立法院审议。本刊函约韩德培先生撰文评论，以供当局参考。韩先生这篇文章，是从政治的和法律的两个角度上着笔的，所论极为详尽，我们极望立法院审议这个《草案》时，对于韩文所论，能予采纳。我现在再就条文的本身，就韩文未触及的地方，补充意见如下：

一、《草案》第二条：“出版品分下列三种：（一）新闻纸，指用一定名称，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间，继续发行者而言。（二）杂志，指用一定名称，并装订成本，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间，继续出版者而言。（三）书籍及其他出版品，凡前二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属之。新闻纸或杂志之号外或增刊副刊等，视为新闻纸或杂志。”

上文发生下列疑义：

1. 用一定名称之出版品，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间，继续出版，但并不装订成本，在此种情形之下，是否即不作为“杂志”论？

2. 用一定名称，并装订成本，其刊期在三个月以上，（如每100日出版一期，或每四个月出版一期）继续出版之出版品，是否即不作为“杂志”论？

3. 有一种出版品（如市上流行的一种“丛刊”），其编制与杂志相仿，其刊期大体上每隔10日、半月或一月出版一次，但并未明白规定，在此种情形下，该出版品究为“杂志”，抑为“书籍”？

4. 《草案》第二条最后一句：“新闻纸或杂志之号外或增刊副刊等，视为新闻纸或杂志”，所谓“视为新闻纸或杂志”，其义含糊不清：视为

“新闻纸”或“杂志”乎？抑视为发行该项号外、增刊、副刊之该新闻纸或杂志之一部分乎？如系前者，则该“号外”“增刊”“副刊”之出版，必须按照《草案》第九条规定，于事前申请登记，非奉核准，不得发行。如系后者，则报社（新闻纸）即可出版各种副刊（即“杂志”），杂志社亦可每日出版增刊（即新闻纸），或其他副刊（即杂志），而不须另行申请登记。

上举四点，足见原文用字，颇多含糊。立法院于审议时，应求其明确清楚。

二、《草案》第九条前半段：“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者，应由发行人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于10日内转呈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后，始得发行。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并转请内政部发给登记证。”

上文发生下列几个问题：

1.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核准与否，其权在省政府或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但同时又须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这儿发生的一个问题：即省政府或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的“核准”，是否即为最后之决定？抑或须俟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以后，才算获得合法的发行权？如系前者，则内政部登记证之获得与否，便无意义；即使没有内政部的登记证，亦无碍于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果系如此，则又与《草案》第十条、第十五条所规定者不符。如系后者，即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须于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后，才算完成依法申请登记的最后程序，才算取得合法的发行权，但《草案》只说“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并转请内政部发给登记证”。而对于内政部发给登记证的时间，却无明文规定，实有不妥。因为既然认为要俟取得内政部的登记证，才算取得合法的发行权，则该新闻纸或杂志，虽因省市政府的核准，可以先行发行；而如内政部的登记证迟迟不发，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始终在一种尚未获得合法根据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势必影响该新闻纸或杂志的业务计划。按照过去情形及《草案》规定，内政部的登记证应当是依法声请登记证程序中的最后一步，因此我

们认为：修正的出版法对于内政部发给登记证的时间，亦应有明文之规定。我们认为内政部于接到省市政府的公文后，应于30日内发给该项登记证。

2.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应于发行前填具登记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主管官署，于10日内转呈省市政府，而后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是则自申请至核定，前后仅有20天的时间，不能谓不迅速。新闻局局长10月30日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并特别提及此点，谓以前的规定为“15日”及“28日”，现在一律均为“10日”，使核定期间缩短一倍以上。但是问题不在核定时间的缩短，而在假如不在限定时间以内核定，又怎么办？按照过去经验，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最感苦痛的，是依法申请以后，常常石沉大海，迄无下文；甚至有经过六个月以上而仍不见批复者。因之，为解除这种情形，并减少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的困难起见，我们认为：修正的出版法应当规定：假如在向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申请登记，于30日后仍不为核定者，该申请人即可径行发行该申请登记呈文中所指之新闻纸或杂志。

3.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核准与否，其权在省市政府。但细查《草案》，关于此项核准与否的标准，只有一条，即：“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这个规定的反面应当就是：只要不是与规定不符者，即应核准。但是问题不在此；问题在假如声请登记，与规定并无不合，而省市政府批驳不准登记，则其补救办法应如何？在原则上，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其核准与否的权力，完全操之于地方政府，是否妥善，很可研究。在京沪平津一带，地方政府在各种顾虑下，人民要求发行报纸或杂志，比较上或尚容易，而内地及后方边远省区，如将此种权力，完全交于地方政府，则人民发行报纸或杂志的权利，恐将遭受更大的限制。因为内地的民主空气比较稀薄，中央也不能处处顾到，在此种情形下，恐将发生亲我者予之，不亲我者拒之的情形。就理论上说，宪法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之自由，行政官吏如侵犯人民这种权利，是为违宪，人民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诉讼。实际上，今日中国人民是否能行使此种方式，殊为疑问。因此，我们认为，是不是在修正的出版法中，应当更积极地明文规定：只要与规定相符，即应核准；同时规定：地方官署无故批驳，不准发行新闻纸或杂志，申请人可以向

更上级的机关诉愿，以为补救？我们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供立法院审议此案时的考虑。

三、《草案》第九条后半段：“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之事项如下：（一）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二）发行趣旨；（三）社务组织；（四）资本数目，器材设备及经济状况；（五）刊期发行新闻纸者并载明其版数；（六）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七）发行人及编辑人之姓名、年龄、籍贯、经历及住所。”

《草案》第十条：“第九条所定应申请登记之事项有变更者，其发行人应于变更后七日内，按照登记时之程序，申请变更登记。……”

《草案》第二十八条：“……不为第十条之申请变更登记，而为发行新闻纸或杂志者，得于其为合法之申请变更登记前，停止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

按照上引条文，凡第九条所载各项，如有变更，便应声请变更登记，否则即将遭受停刊之处分。我们参以实际情形，此种规定，困难滋多：

1. 资本数目，器材设备，经济状况。先说资本。在币值这样不稳定的状态下，任何事业，它欲继续支持，势须时时增资。其事至明，不必举例。再说器材，譬如一家报馆，本来没有汽车，今年买了一辆汽车，这算不算增加了“器材”呢？至于经济状况，含义更不清楚，上一个月稍有盈余，这一个月勉可维持，下一个月或者亏折甚多，这算不算经济状况有了变动呢？假如上述的例子都算，则一家报馆或杂志社，恐怕一年到头，每个月都要申请变更登记。其事之不易行，昭昭甚明。

2. 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所谓“所在地”，不知如何解释。“所在地”之变更，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形：

- a. 自甲省甲市甲县迁至乙省乙市乙县。
- b. 在同一城市，自甲街甲巷迁至乙街乙巷。
- c. 在同一街道，自甲号门牌迁至乙号门牌。

条文中所言“所在地”之“变更”，不知究系指上列三种情形中的哪一种。若系第一种，则犹可说。但因为发行所所在地既自甲省甲市甲县迁至乙省乙市乙县，则照本《草案》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等之规定，其“地方主管官署”业已变更，自应变更登记。但若包括第二种第三种，则对于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便极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所谓发行所所

在地之变更，包括第二种第三种情形在内。)譬如在上海这种大都市里，搬个家是极寻常的事情，而且照一般租赁契约，都规定期限，期限满后，房主可以叫你搬家。在此种情形下，关于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即须申请变更登记，未免使新闻纸或杂志之经营，太不稳定。至于印刷所之变更，也属同样情形。特别对于杂志，它可以这一个月交甲印刷所承印，下一个月交乙印刷所承印，再下一个月又交丙印刷所承印。假如每换一家印刷所，便须申请变更登记，亦未免骚扰太甚。

因之，我们认为：“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之事项”中，当应求其简单。即以第九条第六款而论，需要在登记申请书中载明印刷所之名称，但事实上，办一个杂志，核准与否，尚无把握，还哪儿谈得到交哪一个印刷所承印呢？至于变更登记，应当仅限于发行人之变更为限，因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若有变更，则一方面对于旧的是“注销登记”，对于新的是“声请登记”，不应作为“变更登记”论。其余社务组织、资本数目、发行所地址等若有变更，应令发行人呈报备案，不宜作“变更登记”论。关于此点，我们希望立法院审议时，能作合理的修正。

四、《草案》第十五条：“新闻纸或杂志应记载发行人之姓名、登记证号数、发行年月日、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我们以为关于“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并无记载之必要。我们认为新闻纸或杂志，其责任已由发行人负之，印刷所不应再分负任何责任。既不分负任何责任，亦即无将“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记载之必要。这次上海市节约运动委员会通过杂志用纸节约的办法，不正正当当的通知各杂志社，(本社至今未收到任何用纸节约的通知)而却规定叫各印刷所不得承印超过页数之杂志，企图通过印刷所来控制杂志，我们甚以当局不走正路而走邪路为可惜。印刷所和杂志社的关系是业务关系，除此以外，即无其他。我们希望政府在合法合理的程序下管理出版事业。而不要企图通过商业性质的印刷所来控制言论性质的出版物。

五、《草案》第十七条：“新闻纸或杂志登载之事项，本人或直接关系人请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者，在日刊之新闻纸应于接到请求三日内更正或登载辩驳书，在其他新闻纸或杂志应于接到请求后第二次发行为之。……更正或辩驳书之登载，其地位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

上文最后一句，发生困难。举例言之，假如一个报纸的头条新闻，

有记载错误，被记载错误的本人或直接关系人请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是否应在头条新闻的地位，将该更正或辩驳书登出来呢？按照《草案》，是应当这样办的，因为《草案》规定：“其地位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但考诸古今中外，从未有一个报纸，其头条地位是登载更正或辩驳书的。

同时又可能发生一个问题（虽然在事实上不致于发生），即假如有一项记载，被记载的人认为记载错误，提出辩驳书一篇，竟长达10万字，则这个新闻纸或杂志应否予以刊载呢？如不刊，则违反法律。如刊，则照目前报纸或杂志的篇幅，恐非为之出一特刊或专书不可。（假如是杂志，则它又违反了“纸张节约”的规定。）关于辩驳书字数的问题，亦应有补充的规定。

六、关于《草案》第四章（二十一条至二十七条）出版品登载事项的限制，韩德培先生文中已有详论，我们完全同意。其中关于第二十六条：“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规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记载”，此条假如不能完全取消，我们主张在这条条文之后，加上下列文字：“中央政府此项禁止或限制之命令，应于命令发布后一个月内，咨请立法院追认；立法院应于接到咨文后10日内决定对于此项命令之追认与否；如立法院不同意此项命令时，该命令应即作为无效。”

关于《出版法修正草案》的批评，本人仅补充陈述几点意见，主要的部分均包含在韩先生一文之中。在根本上，我们反对另设《出版法》来约束出版事业；出版品的一切责任问题，尽可照民刑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则出版法的制订，应力求其合理。我们竭诚希望立法院审议此案时，能考虑并采纳我们的意见。

11月29日

（原载《观察》第3卷第15期，1947年12月6日出版）

二、辛勤·忍耐·向前

——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本刊年出2卷，每卷24期。一卷出完后，休息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2卷第1期定3月1日出版。

我们除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以外，在这一卷中，未尝有一字涉及本刊自身；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先让读者自己就本刊的言论、风度、水准、内容，获取一个大概的了解。在这半年中，我们得到许多前辈、朋友、读者的爱护关切，使我们增加不少工作的兴趣和努力的勇气。在这第一卷的最后一期，我们谨述本刊诞生的经过及半年来的各种情形。

(一) 发起·筹备·诞生

在三十四年^①冬天，我们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16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须发6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11月11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10月8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个星期的筹备时间。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

^①指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编者注

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言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亦应归因于《客观》的影响。有许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了为什么我们骤然放下《客观》，另立《观察》。我们无意在此追述那些业已过去的琐碎事情，只能就原则上补叙一笔。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得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所发表的议论不能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于言说的苦痛。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

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

第一次的发起人会议于三十五年1月6日在重庆举行，决定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关于这个刊物的生命能否维持。当时我们笼统地建筑在两个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当时国内还缺少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战中，昆明重庆等地都有水准很高的刊物，但因战时邮递困难，环境限制，都未能布及全国）。假如我们自己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各方面的前辈及朋友，无论识与不识，一定乐于支持我们，为本刊写稿。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我们的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则本刊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并与各方取得初步的接触后，决定以全副力量并持久决心来创办这个刊物。我们认为像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去努力的价值。

我们认为今日中国实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物，并可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而说话。而我们之所以要想供给大家一个说话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因我们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今日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此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者。

关于编辑部分的筹备工作，大体上都是在重庆办理的。我们拟了一张“拟约撰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撰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撰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履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号，可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长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

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八位先生迄无复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履约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的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事务方面的筹备工作，较为艰难。第一是股款不易措筹。我们预定的股额是1000万元，当时（三十五年1月）根据上海方面的报告，我们估计每期的总成本是50万元，如有600万元，即可着手（200万元为开办费，400万元为八期的周转金）。措筹此数应无困难，但事实上不若想象的那样顺利。我们这批朋友，多是以教书为生的。读者一定充分明了，

在抗战的八年中，教育界人员是如何的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时，常常止于“口惠”，其间还遇到使人极其难堪的事情。

但是也有令人感动的事情。我有一个学生竟然征得了他父亲的同意，卖掉了几亩租田，来助成我们的刊物。还有好几位《客观》的读者，知道我们另筹《观察》，愿意入股。我们那时筹款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请他们再为考虑。我们表示：一、一般公务人员都非常艰苦，若是生活优裕，略出余力，以助文化，自然不失为一种义行，但若仅从生活零用中，节省出钱来入股，我们实在感觉不安，不忍接受；二、现在社会诡诈百出，读者和我们向未谋面，似亦不能单凭我们的文章就相信我们，我们劝他们慎重出之。结果还是有一位读者在薪水中抽出了五万元入了一股。

我于去年3月中旬，由渝飞沪，只带来一小部分股款。那时物价激涨，一般言之，似非有2000万元不能出刊；但是我们连1000万元，尚感不易。正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在去年4月5月，南京方面两次以高级公务员见委；但我实乐于有这样一个艰苦的时期以锻炼自己的情操。我们做人做事，说不该半途而废，见异思迁。就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几月。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

到6月中，股款渐渐像个样子，7月底，大体已近收足。事务方面的第二件大事是“房子”。在上海，房子就是金条。以我们这戈壁之数，绝对放不得手；但是没有金条弄房子，几如登天之难。后来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总算贯彻初衷，未出金条，月付租金20万元，说定以半年为期。刊物出了几个月，前途如何，较有眉目，到那时，我们容易放手做事；所以只租半年，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条件。

各事进展到八分程度时，我们开始发函约稿。我们最初原想在7月出版，但是酷暑将至，学校放假，各地复员，我们深感此时出刊，“天时”不利。考虑再三，决定守到9月1日创刊。这个夏天确是一个热闷的夏天，但是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夏天！

(二) 发行·定阅·财务

刊物出版以后，各方面的反应非常良好。发行情形完全超过我们预期的数目。第一期究竟应该印多少份，事前无法得到科学的根据。一部分朋友甚至怀疑我们这样一个硬性的高级刊物，是否可以销过 3000 份。我们第一期决定印 5000 份。我们虽然定 9 月 1 日为本刊的创刊日，实际上创刊号的出版日期是 8 月 30 日（星期六）。在 8 月 29 日，我们已发出 4700 余份。可是在第二天的下午，本埠批销人立即电话添批，本社驻京办事处于 9 月 2 日 3 日连发两封快信，4 日并用电报催促加寄，据说第 1 期 700 份在南京两天之内全部售出，各书店均派人至本社驻京办事处添批，无以应命。第 2 期我们仍印 5000 份。这个决定，实在属于一种“商业政策”，在各方面极其切迫需要的时候，我们仍旧控制印数，控制批数，使在发行方面造成一种抢购的现象，增强购买人与批销人对于本刊的心理重量。第 3 期增印至 7000 份，第 5 期增印至 8000 份，第 6 期增印至 9000 份，同时创刊号及第 2 期在各方的殷切需要之下，再版、三版终至四版。在再版三版之中，许多读者亲至本社索补，即使只剩了破缺的，读者也一律愉快购去。至第 10 期时，9000 份仍有不敷分配之势，自第 13 期起，遂增印至 1 万份。其发行数列表如下：

第 1 期	初版	5000 份	再版	1000 份
	再版	1500 份	3 版	1000 份
	3 版	1000 份	4 版	1000 份
第 2 期	初版	5000 份	第 12 期	9000 份
	再版	1000 份	第 13 期	1 万份
	3 版	1000 份	第 14 期	1 万份
第 3 期	初版	7000 份	第 15 期	1 万份
第 4 期	初版	7000 份	第 16 期	1 万份
	再版	1000 份	第 17 期	1 万份
第 5 期	初版	8000 份	第 18 期	9000 份
	再版	1000 份	第 19 期	9000 份

第 6 期	9000 份	第 20 期	7000 份
第 7 期	9000 份	第 21 期	7000 份
第 8 期	9000 份	第 22 期	7000 份
第 9 期	9000 份	第 23 期	7000 份
第 10 期	9000 份	第 24 期	8000 份
第 11 期	9000 份		

出至第 11 期后，销路渐趋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多种的：一、在水准上，我们自己检讨并未下降，但在读者的心理上，或许感觉本刊内容，已不若最先几期的齐整。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刊物办久便老了！”我们自己并未因销路的下降发生忧虑。我们有我们的水准，而我们对于水准的是否下降，远较销路之是否下降为关切重视。不过因为稿件不宽，我们在编辑时，亦确有窘促之感，因之亦难免影响刊物的生气。但我们并未以不合水准的文字填凑篇幅。在那几期，在编辑技术上仅仅可以批评的一点，即是不该同时刊载二篇续稿（自 15 期我们同时刊载了两篇续稿）。这两篇长稿都是高度的硬性论文，本刊本已极其严肃沉重，同时刊载两篇长篇论文，对读者的口胃，确是过重的担负。二、季节关系。天冷了，跑书店、跑报摊的人，渐渐减少，据内行报告，在这个时候，一般刊物的销路，都向下跌。三、自 18 期起，我们增加了售价。四、而最重要的原因，则为邮资的涨价，每一份的航空邮费，自 122 元增至 310 元。本刊是一个全国性的刊物，有半数均散布在川、黔、滇及西北、华北一带，这一带都是需用航空寄递的。邮资的加价，对于京沪杭一带的批销，自然不受影响，对于后方远地一带则影响颇大。在后方远地一带，邮资的涨价对于直接定户一部分，尚无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同业的批销，则影响极大。一方面是售价增加，一方面是邮资涨价，遂使后方同业的批销成本提高，因亦使刊物在后方门市的售价增加。后方的生活程度本较上海为低，以生活程度低的地方的购买力来购买生活程度最高地方的书刊，再加上批销书店的利润，自然要影响售卖的数量（所以我们希望后方读者均能向本社直接定阅，在经济上合算得多）。五、最后一个原因，接连的阳历年关和阴历年关，各地同业大都不能按期汇付货款，我们因为放出各地的账目为数太大，本社经费有限，已有难于负担之势，遂不得不自动减少批数（因为垫付的邮资，其数可观）。我们可以说，销路即使

稍降，8000份的数目应可维持，但因我们自动减少批数之故，所以我们自第21期起即减印至7000份。那时正是阴历年底，又是第一卷最后的几期，我们存意平平维持过去，以待春天来到，自第2卷起，重行推动。最近几天因年关已过，各地同业陆续有款汇到，本期回复增印至8000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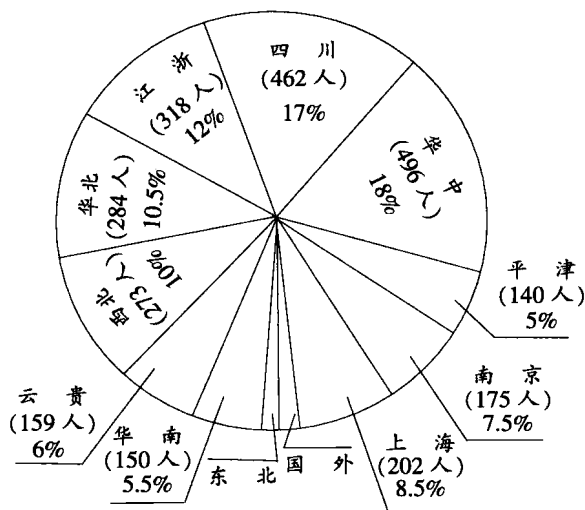
关于发行方面我们尚须顺便一提的：一、上述发行数字，都是实在的，并无一般虚报的习气。我以发行人的身份，向社会报告这个发行数，我负人格上的责任。二、我们在发行方面可谓未曾尽力推动，这个发行数是一个自然的发行数，非已极尽其力之结果。我们所以未能极尽其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本刊草创，一切开支力求节省，故办理发行的职员，是兼任而非专任。这一兼任的职员，他本身另营书刊业务，以致事实上未能全力顾到本刊的业务。我们现在深感兼任之不妥，故已另聘职员，专职办理。三、发行是经营一个刊物最感棘手的一部分工作。各地同业虽然纷纷批销，但大都不能预汇款项，或者第一次汇了一笔货款来，而以后不按期源源汇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因为货款已完，停止寄刊，则刊物的发行数字势必渐渐下降。但如继续寄刊，则飘荡在外面的账，越放越大，纵然每一客户所欠数目为数不大，但全部欠款的总数，实在可观；其中邮费都是我们垫付的。一个刊物总希望和各地同业，维持联系，非不得已，不愿中断；其间实极焦人。

关于直接定户，截止本年1月31日止，共为2709名。正如批发一样，这个定户数也是自然的，我们并未出以人力的推动。我们除在创刊前分散过一次宣传品以外，以后即未再在此方面有所努力，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事繁人少，每日应付日常的工作，已经筋疲力尽，分不出精力再来从事推广工作，另一个原因，我们认为要推动定户，必须先有通盘的计划，中途零零碎碎的做，无甚补益。定户的进度表则如下述：

创刊号出版前	63人	第13期出版日止	1910人
第2期出版日止	141人	第14期出版日止	1985人
第3期出版日止	306人	第15期出版日止	2073人
第4期出版日止	513人	第16期出版日止	2151人
第5期出版日止	676人	第17期出版日止	2266人
第6期出版日止	855人	第18期出版日止	2347人
第7期出版日止	977人	第19期出版日止	2433人

第 8 期出版日止	1139 人	第 20 期出版日止	2506 人
第 9 期出版日止	1293 人	第 21 期出版日止	2563 人
第 10 期出版日止	1174 人	第 22 期出版日止	2610 人
第 11 期出版日止	1682 人	第 23 期出版日止	2709 人
第 12 期出版日止	1794 人		

2709 名定户的地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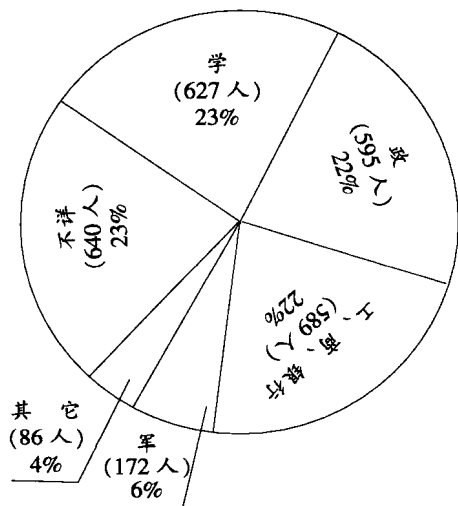
注：“华北”包括冀、鲁、晋、豫、绥、察、热等省。

“西北”包括甘、陕、新、青、康、宁等省。

“华中”包括湘、鄂、皖、赣四省。

“华南”包括港、粤、闽、桂、台等地。

2709 名定户的职业分类



注：“其他”包括律师、医生、教师等。

本刊未曾向读者调查职业，此项统计，系根据定单存根而制，故一部分定户职业，无法分类。

这 2709 名直接定户，其地域分布及职业分布，我们统计制表如上。

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的基本读者，也是这个刊物最忠实并最关切这个刊物的读者。现在有些刊物，号称拥有数万直接定户，或征求数万直接定户，我们对于他们的气魄，只好敬佩。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能有 2700 余名的直接定户，已是得之非易了，因为现在一般刊物，很少能得到一个像样数字的直接定户。不过若就本刊基础而论，目前的定户数，显然是不满足的，我们呼吁各地的零购读者，都能早日直接定阅，并希望已经是我们的直接定户，能再为我们多介绍几个定户。一般读者所以宁愿零购而不愿定阅，主要的原因是恐怕这个刊物中途夭折。但是我们相信，当读者读了这篇报告书后，或者可以了解，我们主持这个刊物，不是一件随便轻率的行为，除非因政治打击而遭封闭，我们决不中途停止。很公平地说，在任何理由之下，直接定阅均较零购省事省钱。特别是外埠远地的读者，论迅速，寄给远地书店的刊物，因系成捆，邮递间有延搁等情况，而单册刊物，则甚少延搁，必可早到。（此系指邮运而言，至于本社寄刊，寄户及批发，均系同时提前一日付邮。）论经济，远地书店出售本刊，因为利润关系，常售 1500 元或 2000 元一册，而直接定阅，连航空邮资仅须 1100 元左右（第 2 卷第 1 期起售 1000 元一册，定户八折，实收 800 元，外加航空邮资 310 元），定阅实较零购合算得多。

关于财务，按照本社《征股简约》第四条：“出版满一年时，主持人应向出资人提出财政报告”，我们应于今年 9 月，向股东提出财政报告书。但我们愿意在此提出简略的报告：本社的资金是 1000 万元，但是现在在账面上，本社的资金已超过 2000 万元。我们愿意向股东说明，我们在筹备时期，从未开支过一文车钱，也从未开支过一文交际费。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迁移，我们都没有用什么钱。甚至在开办的时候，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没有用过什么开办费，一切家具都是借用旧的，借以节省支出。而且我必须说，我们是绝对“干净”的。一切比较大的支出，如买纸、付印刷费等，都由我亲自经手办理，在良心及人格上，我们可说绝无弊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社会上主持独立的事业，我们认为我们的信用及前途较之金钱远为珍贵。至于刊物本身，可以自给。

(三) 作者·读者·编者

编辑经验是一种苦痛的经验。读者的立场、口胃、期望、要求，各各不同，任何一个刊物，都无法使每一个读者完全满意。读者对于一个刊物的要求，都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出发的，而一个编者，他必须从全盘着眼。举一个最普通而最为一般人所忽视的例子：京沪一带的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大后方的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很大的距离。通常一个刊物编者，最容易犯一个毛病，即只顾这个刊物发行地带附近的读者，而忽略远地的读者。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性的，发行数的一半都在后方远地，我们在地域上必须以全国的读者作为对象，而不偏重于某一地区的一部分读者。

我们这一个刊物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的意见，在今日这种“两趋极端”的局面下，我们认为最最需要提倡这种“自由”与“宽容”的精神。所以我们一再申述我们的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中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意见不同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非非得编者同意不可。我们最注重者，是文章的内容与态度，亦即文章的水准与风格。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文章，各言其是，无统一的论调。在我们自己，我们不以此为病；甚至可以说，我们且以不一致为贵。（假如以后我们有几个朋友发表意见相同的文章，那也仅是偶合，而非设意如此者。）记得有两位读者曾来面谈，问本刊有无具体主张及能否对于青年作进一步的具体指示（指组织而言）。关于第一点，我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无具体主张；关于第二点，我说我们无意为此。曾在或将在本刊上写文章的人，他个人或许对于国事有具体的主张，但是“我们”，或者说本刊，至少至目前为止，还谈不上这点。我们自承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些基本原则，论评国事。但我们做的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中国“热心”于组党的人太多了，你一个党，他一个党，我们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就编者个人而言，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

生所言：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见第13期张文）。“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许多读者感到本刊的“分量”太重，太严肃，甚至说太枯燥了。有的说本刊不够“刺激”，说“刺激”的文章太少了。关于这点，须分层说明。第一，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在本刊的基本编辑方针上，中学生不在我们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一个高级刊物是显然无法“轻松”的；我们绝对拿定这一方针，不稍动摇。其次，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刊物，我们绝不感情发言；一切感情冲动的文章，概所不取。就事论事，本刊过去确曾发表了几篇“斤量”相当重的文章，在我们看来，有时严厉的8个字，其斤量远在看似泼辣而实无重量的8000字以上。不过这几年来，大家太苦闷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读到所谓“刺激”的文章，感情越冲动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读者；但此与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们无意如此，更无意仅仅为了吸引读者而向此方面发展。我们创办本刊的目的是替国家造福，我们绝不忘怀我们最初的动机。因此，据我们的一般印象（我们尚未做过读者调查的工作），本刊的读者，大部分是在30岁，或者至少是25岁以上的读者。我们不拟迁就读者的口胃而改变我们的方针。第三，一般读者都感觉本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没有时事短评，因而使这个刊物大大减低了接触现实的程度。关于这点，我们完全承认，并亦充分同感。我们愿意在此坦白陈述我们的困难，而困难的症结，在于人力的限制。不仅本刊的撰稿人都在外埠，就是本刊的发起人，也都散处各地。这种时事短评，要认真写，固可由一人执笔，而必得至少有两三个人经常讨论，才能避免过偏或不及的弊病。现在全部的编辑责任都在编者一人肩上。要约稿，要复信，要阅稿。退稿不算，就是单单发表的稿子，每一篇稿子要读三遍。第一遍是初读，大体决定可用与否。第二遍是精读，间或修饰其文字，并计算其字数。在发稿之前，还要最后认真地读一遍。特别是通信，要做大标题小标题及文内子

题，平均一篇通信，至少花费三小时始能编好。而最主要的，是编者不仅仅是主编这个刊物，实际上是主办这个刊物；我十分之六七以上的精力还是花费在事务方面。调度款项、核对账目、管理人事、购买纸张、兜拉广告、各种设计、校阅大样，以及对外一切有人事关系的事务，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自从本刊创刊以来，我每日工作的时间，平均在 11 小时左右，有时多至 13 小时。半年以来，我们虽然心情宁静，意志坚定，但是身体疲乏，精神困顿，我们实已尽心尽力；而这一切显然是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编者已无余力构思，也无必须的时间以获取为撰写时评所必要的情报与根据。我们又不愿草率落笔，宁缺毋滥。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但我们靦靦地说，至少在第 2 卷中，我们还无法增设时评的一栏。

我们过去退掉的稿子很多。有前辈的，有多年友谊的朋友的，有股东的，有撰稿人的，有读者的。有第一篇用第二篇退者，或第一篇退而第二篇用者。有一次，有一位前辈，我们向他求了四五次稿，他确是爱护本刊，在忙中抽暇给我们写了一篇，而我们仍未能刊载。在人情上讲，退稿确是一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稿件的取舍，绝无偏私；而且我们事实上稿子常感不敷，但是为了刊物，应退者还是应退。我们希望各方面能鉴谅我们。至于本刊篇幅，绝对公开，毫无门户之见。在第 1 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文章，共为 35 篇，约占所刊文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通信及尾页犹不在内）；第 14 期新疆专辑就是投稿。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我们用稿绝无成见，只要文章在水准以上，无不采用，特殊有价值的文字，甚至为之出一专辑，亦所不辞。

有许多人批评本刊每期的作者履历介绍，我们在此解释几句。一般刊物每期都可由编者写一编辑后记，编辑后记主要的目的在介绍本期作者。但这种介绍，时有失之“肉麻”或轻重不匀之弊。我们仅仅简单地刊出作者的身份或职业，实是一种比较大方的作风。有人以为有许多作者已经大家知道，无需介绍，或无需每次介绍。但其间包括几个问题：一、有一部分作者虽然大家知道，但也有一部分作者，读者对之尚不十分熟悉。何人应介绍，何人不应介绍，并无客观的标准，故我们一律介绍。二、京沪平津一带的读者，也许对于许多作者，均极熟悉，但大后

方的读者，未必熟悉。本刊遍布全国，不能亦不应仅以东南一带的读者情形为标准。三、有人主张每一个作者第一次为本刊作文时，介绍一次，以后即不必再为介绍，但是在理论上，我们无法承认每一期的读者都是读过以前各期的。每期有每期的新读者，所以每期的作者均应介绍。四、在编辑技术上，假如只介绍第一次给本刊写稿的作者，则这一期也须只有一个新作者，而我们决不能在介绍作者的那个方框里冷冷落落地只排一行，稍有编辑经验的人，即知绝无此种做法。批评这一点的朋友，大都根据其自身的知识程度或社交地位而有这种意见，但我们当事人是从全盘着眼的。而且我们这样做至少并不“伤雅”，我们愿意让这个办法成为本刊的一种刊例。而且我们愿意再报告一点：这个办法对于我们的业务，未始无助；内行的朋友们甚至还赞赏着我们这种做法。

编辑部分需要报告或解释的，已如上述。我们愿意在此向所有为本刊写稿的先生及各地的特约记者表示最大最热烈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刊未由获得为本刊所已获得的那些荣誉。我们要求各地的撰稿先生及特约记者，继续支持我们，源源以大稿见惠，充实本刊的生命。在编辑方面，伍启元吴世昌两先生给编者很多帮助。创刊以前一部分稿子是伍先生代约的。创刊时，伍先生正在上海候轮赴英，我们共同讨论最初几期的编辑计划，他并作许多有实质的协助。其后吴世昌先生复员东下，他经常提出建议，并在各方面协助，以迄于今。

自第2卷起，我们又增约了胡适之先生等几位为本刊撰稿人，均经函允担任，并此附告。

(四) 办 事

我们的办事基本精神是负责、迅速、公平。不过在中国社会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希望贯彻这种精神了。我们自己检讨，实在愧惭得很，一切还不能做到理想的地步。

先说我们和作者的相处。我们对于作者，都是最尊敬并最热诚的。我们向作者索稿，从来不写“八行”信，从来不叫人代笔。我们每次去信都是恳挚的，而且大都是长信。说实在话，有时一位作者给我们写

4000字，但我们前前后后所给他的信，恐怕有时竟不止4000字。有些作者有时或者不免要感到我们迫稿迫得太厉害了，但是我们相信，当他一想到我们一切都是忠于一个刊物，或者会同情我们，原谅我们，而不加责怪。作者的来信，我们大都立刻作复。稿子来后，大都立刻汇奉稿费。当我在筹备时期，常常上午9时收到稿子，上午11时就立刻跑到银行里去将稿费汇出了。那时也毕竟比较空闲，常常在收到信件的10分钟以内，就写了复信，立刻跑到邮局去。（当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行为，几乎近于疯狂！）现在事情一多，时间已不够用，但重要的信仍旧立刻作复，延搁的情形难免没有，大体上不多。对于稿费，我们相信为本刊撰稿的先生们，不甚关心，但在本刊一方面，我们必须时常顾到作者的利益，我们已提高过三次。就中国社会情形说，稿费的菲薄是最不合理最不公道的。我们自愧尚无力量作何改革，我们每次提高的数目，均极寒酸，我们仅仅只能使作者获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确是在认认真真的努力事业。

一般读者和我们的信函往还，可分两部分来说。一是写给编者的，一是关于定阅的。关于投稿，不用的稿子我们大都立即退回，甚少压搁。可用的，稿费亦提前汇出，只有可用而在最近一、二期中尚无刊出可能的，则稿费延至刊出后再寄出；此因本刊经济有限。稿费项的周转金数目不大，故未能无限止的一律先付。关于建议改善内容的信件，我们大都一一保留，供为参考。编者个人过去的习惯是“有信必复”，近来事实所限，无法一一遍复，所以凡无特殊需要者，即不再复。编者愿意在此对于过去惠函诸君，一并表示谢意。最使编者困恼的，便是若干读者提出种种问题，或关大局，或涉人生，如要复，非1万或8000字不能毕辞，在这种情形下，编者实在无法答复，只好写一封短信去道歉。

关于定户的来信，本社也尽力查复或照办。定户的来信是本社同人目前最感繁重的一项工作。有的是改地址的，有的是改寄递方法的，有的是补购以前的刊物的，有的是中途未收到要求赠补的，有的是续定的，有的是托代购其他书籍的。每一定户，当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后，他当然希望我们立刻将他所嘱咐的事情办好。但一切困难都由于一个单纯的事实，即绝大多数的定户来信时，都不注明他的定单号码。续定刊物，必须知道他以前的订费至何期截止，始可前后衔接，补购刊物的须在他

名下上账，至于更改地址或更改寄递方法，更须知道他的号码，以便寻觅签标。我们现在有二千七百余名定户，要在二千七百余名中去找寻一个人，何等困难。要是再写信去问，则往还需时，读者总觉得我们服务不周。现在我们有一个职员，专门负答复读者来信之责，他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只能复三封信！这真是不合理，不经济！有的读者来信，字迹潦草，甚至他们的签名及地址，无法辨识，以致无法答复，在读者是不满，在本社更是不安。有时读者从银行汇款订阅，常常不注明起寄期数及寄递方法，甚至根本不注明汇款人姓名及地址而又未另函通知者（关于此点，也许是解款的银行将汇款人的附言单失落了），以致读者久候无复信，而本社亦苦无法作复。有些读者的刊物中途间有邮失，或被他人擅取，来函责难，我们只好再补他一份。……像这类事情，日有数起。我们特为陈述，希望以后定户惠函查询，务须注明定单号码，如其定单遗失，可阅封套上所贴签条上的号码，以利查复。我们愿意为读者服务，并尽量提高服务的效率，谨请读者协力合作。

本社过去在办事上最弱的一环是发行课（定户课与发行课分开）。前已言及，协办发行的职员是兼任的，事实上未能全力灌注，因之各地同业来函，时有搁置不复之事。我们对此极感不安，已分函各地同业致歉，并说明正谋改善，现已另聘职员，专任办理，希望以后各地同业来函，能够随到随复。

关于本社同人福利，我们尽力顾到，自从去年8月成立以来，迄今为止，已调整过两次（编者自己的薪水，从未调整，现在还是拿去年8月份的数目），每次调整的数目虽然有限，但是因本社经济有限，一方面要顾到同人，一方面也不得不顾到社本。每次调整都是我们自动的，并非出于职员的要求。本社职员对于这个事业，有兴趣，有热忱，物质生活虽苦，精神生活却很愉快。

关于我们对外应付的款项，从无拖欠或延搁之事。过去24期中的稿费，除有二三笔因去函作者询问汇款正确地址，尚未付出外，其余均已随时汇出。如有尚未收到者，请即函告，以便查理。纸张费，广告费，印刷费，都如期一一照付。承印本刊的印刷所老板，他说他做了二三十年印刷生意，还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顾客。我在任何忙碌的情形之下，总于应该付款的时候，在社里恭候他来取款。

此外，还有一件事，该在此报告，即在过去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他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刊物绝不能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五) 尾 语

在这严冬的寒夜，我已费了整整两个通宵，向社会报告我们这半年来的经过。行文至此，东方微白，实已不胜倦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读者先生，让我们大家鼓舞起来，挺起我们的胸膛，睁开我们的眼睛，冷静我们的头脑，坚定我们的意志，来从事具有新理想的新社会事业。大家来鼓励我们，协助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愿在这儿毫不害羞地向广大的社会宣告：我们认为我们今日所做的一种工作，就是一种真正的“建国工作”！

三十六年2月1日

(原载《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出版)

三、323 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本刊于第 1 卷第 24 期上，附刊“读者意见书”表格一纸，征求读者发表意见，以作本刊改进的参考。这个“读者意见书”原是为我们自己参考用的，因为我们非常希望知道读者对于本刊一般编辑态度以及各栏所刊文字的反应，借以改善我们的缺点，或者增强我们的自信。我们并无意思要将它公开发表。我们并不认为读者的意见有整理后公开发表的必要。但是一部分读者来函要求发表，我们在冗忙的工作中抽出了两天的时间才写成这篇报告。

发表意见的读者共为 323 人。这个数目还不到本刊第 1 卷平均发行总额的二十分之一（第 1 卷的平均发行总额约为 8000 份左右，现在已上升至 11500 份）。发表意见的读者在发行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过就实际情形说，有三百多位读者热心将意见书填就寄回，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通常情形之下，一个刊物如不能赢获读者的爱好，当它征求读者意见时，可能根本没有人理会。应征人在地域上的分布还算普遍，远至迪化、雅安、绥远、兰州、昆明、峨眉、太原等地，都有寄来。应征人的年龄，最大的是 64 岁，最小的是 17 岁（在高中二年级读书），18 岁的则有 11 个人。绝大多数的则在 20 岁至 40 岁之间。其统计如下：

20 岁以下	19 人
20 岁至 29 岁	143 人
30 岁至 39 岁	90 人
40 岁至 49 岁	32 人
50 岁以上	5 人

(表中各栏,间有不填者,故各类统计的总数,并不符合应征人的总数。下同此。)

关于教育程度:

曾受或正受高等教育者	218人
曾受或正受中等教育者	73人
自学或仅受初等教育者	23人

年龄和教育程度两项的统计,使我们以前的估计,略须修正。我们以前估计本刊的读者“大部分是在30岁,或者至少是25岁以上”,现在至少说明,30岁以下的读者,占着很大的比率。(我们不承认这个读者意见表的统计,可以作为完全正确的根据,一则应征人数在发行总额中比例不到二十分之一,二则可能30岁以上的读者,应征的兴趣不及30岁以下的人高,应征的比较少。)至于中学生是否为本刊的读者一节,我们曾说过:“本刊的基本编辑方针,中学生不在我们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这个基本方针,我们不拟改变。但我们从读者意见书中,则知中学生中仍有不少阅读本刊者。

发表意见的读者所服务的方面,非常广泛。除了注明“政”、“学”、“商”、“军”、“警”等笼统名词者外,有主任科员、税吏、××警察厅秘书,新自美国归来、银行行员、军佐、××农民银行主任、工厂技术员、上海××日报主笔、医师、纱商、著作家、警察、“由前清两江师范学堂毕业担任中学教员二十余年后到粤参加北伐担任各师师部秘书多年后任皖苏等省县长六任”、大学讲师、留法、新闻记者、会计、气象员、×××师参谋、教授、邮务员、上海××报总编辑、矿局职员、律师、××青年会总干事、空军通信员、××铁路局秘书、南京市参议员、××省政府秘书、小学教员、荣誉军人、合作社社员、电报局报务员、陇海铁路××车务副段长、法院推事、电力公司职员(以上职务名称,均摘自意见书,其中一部分地名或军队的番号,编者改用××代替,以免引起当事人发生意外的牵累)。其统计如下:

学	102人
党政	63人
工商	56人
军警	31人

关于本刊在各界传布的情形，我们愿意在此顺便报告几点。（一）据新自华盛顿返国的顾翊群先生谈，据他在南京与各方接触的结果，南京的高级政界，大都阅读《观察》。他甚至说：“华莱士主编的《新共和周刊》在美国的地位，还不及《观察》在中国所获有的地位。”关于顾先生所说的后面的一点，我们愿意在此谦虚地表示：我们认为他这句话只是一种鼓励。我们目前还不能十分正确知道南京高级政界阅读本刊的情形，我们仅仅知道立法院孙院长曾经专函本社订阅本刊。可能有六位到八位的特任官员经常阅读本刊，司徒雷登大使可能间或披阅本刊。此外在当地零购或不以真姓名或自己姓名来订阅的，我们无从查考。实际上，今日中国身负高级行政责任的官员，到底有几人还能保持阅读的习惯，也实在是一个疑问。但我们相信，在有阅读习惯的高级官员之中，本刊的传布似已相当普遍，并受到广泛的重视。至于全国各地的中上级及中级官员中阅读本刊的，则为数甚夥。xx省政府的秘书处一处即有12个人直接订阅。（二）工商银行界阅读本刊的极多。无论1卷24期所刊2709名定户职业分类表中所载，或如此次323名读者意见统计中所载，工商银行界阅读本刊的，都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年来工商银行界所吸收的人才，较之10年以前，素质提高不少，所以本刊在工商银行界受到极大的欢迎。前次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先生认为本刊富有阅读价值，曾派人来社订阅本刊多份，分寄该行上海总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级干部阅读。（三）最可注意的一个现象，即在军警界中，本刊亦拥有很多的读者。上次发表的定户职业分类表中，军警约占百分之六，这次的统计约占百分之十。军警界中的读者，常有信来表示对于本刊的拥戴。有一位驻在河南的师长，曾来信表示，认为军界同志应当多读本刊，他在信内并附了4万元，订阅两份赠给另外两位军人。至于教育界人士阅读本刊之广泛，则已不需在此多述。据说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某一间房间内每期均人手一册。

关于“读者意见表”中所列各栏，读者的答复统计如下：

态度：中正	243人
稍偏右	46人
稍偏左	32人

太偏左 2 人

认为本刊态度“稍偏左”者，大都为军界读者。

内容：大体满意 195 人

很充实 95 人

不够充实 33 人

专论：大体满意 109 人

颇多精彩 176 人

略嫌空虚 37 人

观察通信：大体满意 126 人

精彩的通信很多 143 人

精彩的通信太少 25 人

关于科学文字及国外通信，大多数的读者都赞成每两期刊载一篇。关于“观察通信”，大多数赞成每期刊载两篇。这三项答案，可以证明发表意见的三百多位读者，他们在填表时都是很郑重的。他们的意见也都是很正确的。假定科学文字及国外通信能够交换地每隔一期刊载一篇，确最理想。可惜实际上还不能做到如此程度。科学文字的难处在深入浅出。本刊不是一个专门的科学刊物，不宜刊载过于专门的科学文字。最理想是那位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文艺修养的人，这样用文艺的情调来写科学文字，合“专门”与“通俗”于一炉，始能使一般的读者都能接受。过去戴文赛先生在本刊所写的几篇科学文字，曾经广获朋友间及读者间的好评。戴先生是本刊的基本撰稿人，所以能够比较经常地为本刊写稿，此外则我们还没有得到其他科学家的合作。在没有把握之前，我们也不敢冒昧去请人写稿，就怕寄来的稿子太专门，不宜刊载。至于国外通信，住在国外的朋友们，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兴趣，都和在国内时不同，他们为本刊写稿，完全是基于友谊，所以不易作硬性的规定，除了时时去函催稿外，只好有刊无缺。至于观察通信，则尚能符合读者的希望，经常每期两篇，间或三篇。

关于文艺，赞成刊载论文的 120 人，赞成刊载游记、传记及散文的 209 人，赞成刊载小说的只有 54 人。其中关于小说一部分，大多数反对刊载连载的长篇小说。在“意见表”里，编者曾说明：“四五千字可以一次刊完的小说，极难得到，二万字的小说较易得到，务请读者发表

意见，是否欢迎刊载须分五六次始得刊完的小说，以为编者参考。”赞成刊载小说的人，所以如此少，主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不赞成“连载”的缘故。赞成刊载游记、传记、散文的人所以特别多，显然是因为大家想于读了前面严肃的论文以后，能够读到一篇比较轻快的文字。关于文艺部分，当第一卷快结束时，我们原拟自第2卷起增加篇幅，同时也就打算扩充文艺栏的地位。这个计划后来因受金潮影响，未能实现。在那时，袁昌英先生本已说好要寄一篇小说来，我们临时只得去函请其停寄。李慕白先生这篇《海外忆》，还是在第1卷时寄来的，我们当时决定留至第2卷陆续刊载。就前后连贯而言，《海外忆》包含一个发展着的故事，但就每篇言，又近似一篇散文。所以我们仍照原议刊登。不过关于李先生这篇《海外忆》，却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三位撰稿人及一位读者曾特别来信批评编者选用此文。在本刊过去，还从未有过特别反对某一篇文章之事。我个人对于这三位朋友及那一位不署名的读者，都表示感激，因为他们能够坦率相告，足以表示他们对于本刊及编者的关爱。我并愿乘此表示，我永远欢迎并希望朋友们能随时告诉我对于本刊所发表的任何文字的任何意见。另一位撰稿人则来信说《海外忆》写得很好，又有一位朋友则又特别说起有许多人（他并举出了几个名字）很喜欢读这篇《海外忆》。意见的不同，实由于各人的标准和兴趣的不同。由此亦可以知道，编者在选稿时应如何的斟酌审慎。

又有很少数的读者根本主张不要文艺栏，认为文艺稿子应由其他专门文艺刊物发表，不必在本刊占据篇幅。但是绝大多数的读者显然同意本刊辟载此栏。

在“趣味”的一项下，“过去《观察》分量太重，太严肃，但我可以接受”者，为227人，“希望稍为轻松一点”者，为100人。这一项答案使我们大大满意，并增加我们的自信。这表示本刊的编辑方针是健全的，而大多数的读者亦能够接受我们的编辑方针。事实上，自第2卷起，我们增加了“观察漫画”、“观察文摘”、“读者投书”三栏后，当可使本刊较第1卷为活泼。就一般言论态度上言，第2卷亦略较第一卷为积极。

关于办事精神一项：

很认真

180人

不认真	1人
去函即复	70人
去函缓复	13人
去函不复	1人

未和本刊发生接触或函件来往的读者，此栏大都未填。

关于寄刊是否按期收到一项：

按期收到	152人
不按期收到	18人
常常失落	11人

我们对于定户寄刊，是很认真的。所谓认真，一指不使遗漏，二指不使脱期。本刊出版以来，从未脱期。无论是去年的中秋节、双十节、阳历年、阴历年，以及这次的五一劳动节，印刷所尽管放假停工，装钉所尽管放假停工，而本刊总尽力赶办，按期出版。此处所谓“不使脱期”，系指星期五的邮班而言。定户刊物，都是提前一天，在星期五付邮的，在星期四的晚上和星期五整天，本社全体同人，犹如在前线作战，汗流浹背，紧张万分，务使应寄各地刊物，能在邮局或火车打包以前交柜发出。

关于“推荐第1卷中最好的五篇”一项，我们郑重考虑后，决定略去不刊。第一，我们那张“读者意见书”是在很匆忙之中拟成的。所谓“最好的五篇”，这“最好”两字实有语病。就字义上，“最好”应系指最有价值而言。但是“最有价值”与“最受欢迎”是截然两事。最有价值的文章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文章，反过来说，读者最“喜欢”的文字亦不一定就是最有“价值”的文字。并且专论、科学、通信、文艺等，性质不一，亦很难使读者作公正的选择。如要合理，我们应当将各栏分开，至少也应当将读者“最喜欢”的和读者认为“最有价值”的分开。若笼统地要读者推荐“最好的”五篇，出发点既然有问题，所得的结果亦必不能正确。这个错误应由编者个人负责，而错误的造成，实由于未能深思，而且缺乏经验。第二，1卷凡24期，读者对于后面几期所刊的文章比对前面几期所刊的文章，所得的印象较深，而且有许多读者甚至并未能看到前面的几期，有许多则并未24期都看过，这样的原因亦易使这个答案的统计减低价值。第三，就编者个人言，亦愿略去这一项统计，

以为回避。不过编者愿意在此笼统地提出，在第一卷的写稿人中，张东荪、潘光旦、吴世昌、伍启元、戴文赛、王芸生、戴镛龄等先生都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其中除王芸生先生外，其余都是在第1卷中撰文比较多的人，此点亦不无关系。读者对于周东郊先生写的《新疆变乱记略》专辑，均一致推崇，并认为是三十五年度国内报章杂志上最难得的文字。此外，读者认为“观察通信”是本刊一大特色，而对于边疆报道之详细，尤为一般报纸或刊物所不及。

我们从读者意见书中，可以看出目下一般的需要与倾向：一、大家要求每期有时事短评，要求专论触及现实，这表示今日一般国人非常关切国事。二、很多的读者要求多刊学术性的文章（指第1卷中的“特稿连载”而言）并愿意分期刊完。在“推荐”的名单中，张东荪先生的《中国之过去与将来》、《士的使命与理学》，潘光旦先生的《派与汇》、《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胡先骕先生的《思想之改造》，萧公权先生的《圣教与异端》都有多人推荐，张先生的两篇及潘先生的前面两篇，得票尤多，这足以表示今日一般读者的求知欲很高。三、很多读者都推重本刊有关边疆的文字，并希望本刊继续多刊有关边疆方面的文字，这足以表示今日中国一般人的民族意识很强很普遍。

读者其他的建议很多。其中关于“漫画”、“文摘”及“读者投书”三部分，我们已一一实现。关于“观察一周”（即时事短评）的困难，已详1卷24期“辛勤·忍耐·向前”一文。我们愿意在此报告，自第3卷起，可望增设此栏。有几位读者主张增加股额，由读者入股，扩大事业基础，并主张自办印刷所，甚至主张将来办一日报及通信社。这些建议固然意思很好，但是目前言之不免过早。英谚有云：不到桥边，不想桥对面的事。编者个人做人做事，受英人的影响甚深，请读者相信我们，我们办事绝不感情冲动，绝不夸大，绝不乱来，沉着努力，量力行事，一步一步走，一切慢慢来。

最后，编者愿意在此向应答的三百几十位读者表示出乎衷心的感谢：你们给我指示，你们给我鼓励，你们之间有许多位以那样的热情，写那样的长信，并替我们介绍定户，给我们种种有实质的帮助。我在此一并表示我们最大的谢意。编者只是一个舵手，这只船的前进，要靠大家撑持，大家努力。当编者想到，他在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大城市中的这样

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希望娱乐没有娱乐，需要休息不能休息，在这样惊风骇浪的波涛中，在这样长夜漫漫的黑暗中，苦苦地撑着这条船，他虽不禁感触多端；然他相信：他必终能噙住眼泪，带领着他那数以万计的读者，向那光明的前程行进！

5月12日记

(原载《观察》第2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出版)

四、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 《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5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令文如下：

查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本市为戒严地区，应予取缔，依照戒严法规定，着令该报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被封的三家报纸，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左翼报纸。所谓左翼报纸，大体上是指这家报纸在思想上比较前进一点，在言论上比较激烈一点。按照出版法规定，报纸的负责人是“发行人”。据我们的看法，这三家报纸的发行人，大都只能算是经营商业的人物，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能够多赚几个钱的问题——进一步，希望多赚几个钱，退一步，至少希望收支平衡，能够维持这一张报纸。若说他们有“颠覆政府”的意图，那真是捧了他们。至于这三家报纸的编辑人员，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大都是些比较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民主分子。这是很正常而且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若想进步，便需要多几个这种分子。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个个都是唯唯否否，请问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生气？我们所以能够抵抗日本，苦战八年，不为暴力屈服，就靠我们国民有这一点独立意志。若说“左”，老实说，这三张报真不够“左”；若说激烈，这三张报亦不够激烈。要是比起南京那位泼妇骂街的反共专家某大炮，文汇新民等两报上的文章简直是“温吞水”。我很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

新民两报的作风（我不常看《联合晚报》），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壮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

我认为这三家报纸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言论，而是由于他们的新闻。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所愿让大家知道的事情，统统已归中央社独家发表了；假如这三家报纸专门刊载中央社的消息，我敢拍拍胸脯担保这三家报纸绝不致被封。无奈中央社的消息许多人不要看，而且不要看中央社消息的人愈来愈多，而这三家报纸的编辑部同人，又都不识时务，自以为负有神圣的新闻使命，拼着命要在中央社的新闻眼以外去找新闻。不幸他们所登的新闻，政府越顾忌，读者越要看。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

这次学潮，当局弄得焦头烂额。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人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不过我们不承认这被封的三家报纸有任何“阴谋”要煽动学潮，甚至“意图颠覆政府”。当然，报纸在任何公共生活中都是要发生一种消息传播的功效的，但我们不承认，有了这几张报，就可以掀起学潮，没有这几张报，就可以消弭学潮。据我们所知，《文汇报》屡有查封之说，恐怕还是因为上海幸而有这位开明民主的吴国桢市长，所以《文汇报》至少还能出版至5月24日。这次大概正如The Evening Post主笔先生所感觉的：“政府的重要领袖们多少有点孤注一掷的情绪”，而终致出此一着。三报被封的理由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对于这个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我们亦无意在此辩论。只是我们要公开宣称：我们在同业的立场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查封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希望政府善为补救，设法使上述三报早日复刊，以恢复民主国家新闻事业的常轨。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学潮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愿略加论列。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英大事件和交大事件都是局部问题，姑且不说，就是15、16两日南京中大金大两次饥饿游行的新闻，不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亦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可是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按：21日该报第二版因参政会开幕，新闻确极拥挤，但假如《大公报》重视这次学潮的话，该日该版其他零星新闻，都是可以腾让出来的。）同时，像南京五二〇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的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5月19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请愿为“暴力的革命”，5月22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而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不在这儿提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亦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的言论决不致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于他们的报道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不能不出而一言。在5月25日《大公报》第4版上，《大公报》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什么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些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

“花边”登出来（请阅最近数月《大公报》第三版下半面，其事数见）。在《大公报》的编辑标准中，大概像在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5月25日是星期，该报例刊“星期论文”，但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25日不写短评，为什么26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28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四日，《大公报》对于此事始终不置一辞。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大公报》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还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文汇报》被封后，《大公报》对于学潮的新闻，已有改变。）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能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八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面，我仅和《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分服务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5月28日

（原载《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31日出版）

五、艰难·风险·沉着

——本刊第2卷报告书

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宣布：本刊第2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息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3卷第1期定8月30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段风暴的日子。无论经济环境或者政治环境，都使我们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只是我们虽然精殚力竭，然而心情却极宁静。我们认为只有以单纯始能应付复杂，以沉着始得克服困难。我们能够撑过这段日子，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读者的爱护，和本社同人的合作。

(一)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这半年使我们最透不过气的，就是各种开支的激增，纸成为目前本刊最大的一笔支出，在每期成本中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第1卷结束时，纸价尚未超过5万元一令，但到第2卷第1期付印时，纸价狂涨到每令15万元之左右；在短短的半个月內，纸价的上涨竟达三倍以上。2卷1期以后，纸价继续上涨，自15万到20万、25万、30万，目前则在32万元左右；较之第一卷结束时，纸价上涨八倍。本刊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平时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因之纸价激涨，对于本刊实为一种难于忍受的打击。

排印工及装订工一再涨价，上涨的比率也不在纸价之下，其统计如下：

种 类	· 2卷1期起	2卷10期起	2卷15期起
-----	---------	--------	--------

五号字排工(千字)	18000 元	24000 元	43000 元
六号字排工(千字)	21000 元	28000 元	50000 元
印工(每令)	32000 元	43000 元	80000 元
封面印工(千页)	11000 元	15000 元	27000 元
订工(每册)	2 卷 1 期起	49 元 3 角	
	2 卷 6 期起	59 元	
	2 卷 10 期起	78 元 5 角	
	2 卷 13 期起	88 元 5 角	
	2 卷 17 期起	115 元	
	2 卷 22 期起	131 元 6 角	

本刊每期出版，例在上海《大公报》封面地位刊载广告一次。2 卷 1 期出版时，《大公报》的广告费每行仅 26000 元，现在则涨到每行 7 万元。本刊稿费 2 卷 1 期时千字 1 万至 12000 元，现在提高到千字 3 万至 4 万元。本社同人的薪金，现在较之 2 卷 1 期出版时，亦提高至百分之二百以上。检查上列数字，本刊各种开支，2 卷结束时较之 2 卷开始时，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而本刊的售价，2 卷 1 期时为 1500 元，现在为 3000 元，仅增一倍。在第 1 卷中，我们还经常保持两页地位的广告，借以增加本社的收入。自第 2 卷起，因为要增加文字的容纳量，广告所占的篇幅，已自二页减为一页，甚至连一页也没有，所以本刊目前广告收入，已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

(二) 销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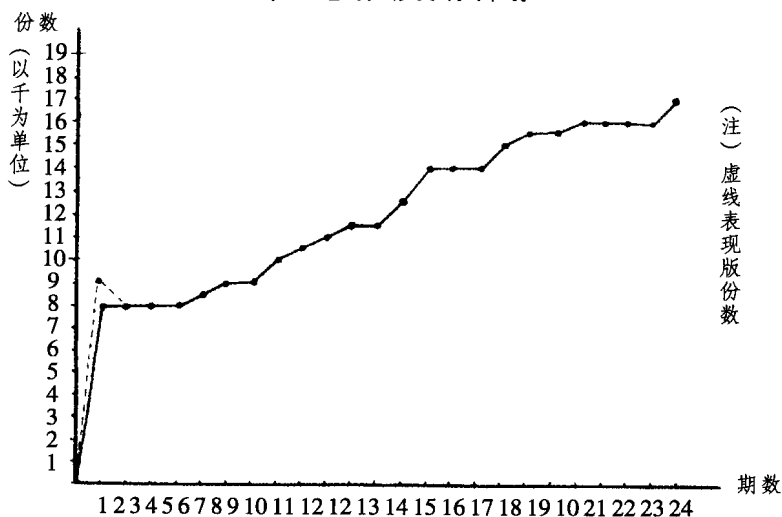
然而我们能够有这样困难的情形下支持下去，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销路的增加。我在第 1 卷报告书中曾经提到，当我们创刊号试印 5000 份时，即使是我们最关切的朋友，甚至亦怀疑本刊是否能够销行到 3000 份。当我们后来印到 1 万份时，在出版界中有经验的朋友们，一致承认我们单在这方面，已经是一种成功。因为照一般估计，像我们这样一种刊物，销行到 1 万份几已达到了它“可能的发行数”。我们自然希望一路向上加，但也不敢存太大的希望。因为我们深切了解当前的环境太艰难，许多条件都

是不利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刊物的发展的。从政治环境说，本刊是一个政论的刊物，许多意外的阻碍自在意料之中。就教育程度说，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自不能像软性刊物之那样易于吸引读者。就经济情形说，现在一般读者的购买力非常薄弱，特别是公教人员和学生，而本刊的读者，公教人员和学生占很大的比率。再从业务环境说，交通如此困难，邮资一再加价，都是影响刊物的发行。只是种种不利的情形虽如上述，而实际上，第2卷本刊的发行数，始终在很稳健的增加状态之中。本刊第1卷最高印到1万份，其后降到7000份，其中原因曾详第1卷报告书（1卷24期）。所以2卷1期出版时，我们很谨慎地只印8000份（其后再版1000份）。因为第1卷时期，各地同业拖欠的货款太多，所以自第2卷起，采用“现批”政策，不先汇款来的，即不发刊。又因为第1卷时期，印数与实销数常常脱节，故自第2卷起，严密管理，印数多少，纯视实际需要，决不多印，以减浪费。就在这样发行紧缩印刷紧缩中，本刊的发行额仍然逐步上升。到2卷11期，已从8000份升至11500份。2卷13期因有评论学潮的文字，我们放胆增印至12500份，2卷14期印至14000份。实际上，我们虽然增印至14000份，但仍不敷市场上的需要。别处不详，单在上海2卷13、14两期，都是在出版后两天之内全市抢购一空的。2卷14期后，发行数继续增加。至2卷20期，增印至16000份。2卷21期发行时，16000份已不敷分配，但因邮资加价及售价加价的原因，我们采取保守态度，暂不增印，以观外埠各地发行的反应。迄至本期，复增印至17000份。兹将第1卷各期再版数暨第2卷各期发行数列表如下：

第1卷	第1期	4版	800份		
	第2期	5版	700份		
	第3期	4版	700份		
	第4期	3版	600份		
	第5期	3版	600份		
第2卷	第1期	初版	8000份	再版	1000份
	第2期		8000份		
	第3期		8000份		
	第4期		8000份		
	第5期		8500份		

第 6 期	9000 份
第 7 期	9000 份
第 8 期	10000 份
第 9 期	10500 份
第 10 期	11000 份
第 11 期	11500 份
第 12 期	11500 份
第 13 期	12500 份
第 14 期	14000 份
第 15 期	14000 份
第 16 期	14000 份
第 17 期	15000 份
第 18 期	15500 份
第 19 期	15500 份
第 20 期	16000 份
第 21 期	16000 份
第 22 期	16000 份
第 23 期	16000 份
第 24 期	17000 份

第二卷各期发行曲线



实际上，在发行方面，由于种种限制，我们并没有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第一、我们为稳扎稳打起见，采取“现批”政策，凡不先汇款来的，我们一律不批。或者汇款已完而未续汇的，我们即停止寄刊。此种办法，虽然稳，但亦势必因此放弃了一部分市场。第二、我们规定货是不能退的，因之各地同业实际可以销 100 册者，也只愿批 70 册或 80 册，这个情形也大大减低了我们的发行数。第三、有少数地方的同业，高抬本刊售价。据我们所知，当本刊售 500 元时，贵阳昆明一带已售 1500 元，本刊售 1000 元时，贵阳售 8000 元一册。此种情形，对于当地的读者固为极大的剥削，对于本刊的销路，也有不良影响。第四、在若干地方，本刊遭受不合理的压迫，如长沙、衡阳、芷江、济南、太原、三原、建瓯、沈阳等地，本刊均被禁售；对于本刊当然也是一种打击。

在发行上，本刊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分布普通，关于这一点，今日国内恐怕没有一个刊物甚至一个报纸，可以和本刊比拟，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局促于华北东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发行，亦多以京、沪、东南一带为主要市场。我们很难相信兰州、成都、贵阳、昆明的读者能看到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庆 3 版，3 版若合为一体，其分布之广，便约与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开，我们便难相信台湾的读者能看到重庆《大公报》，昆明的读者能要看到天津《大公报》，西安的读者能看到上海《大公报》，本刊虽在上海发行，但其分布并不限于东南一隅；以京沪杭为中心的东南一带，在本刊的发行额中，仅占 1/3，其余 2/3 都是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这是本刊在中国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个情形。

(三) 定 户

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最基本的读者，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一个刊物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直接定户，以巩固刊物发行的基础。当本刊第 1 卷结束时，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征求定户的工作。我们的办法是，在平时不零零碎碎的征求定户，到每卷结束时，才征求一次。我们所以如此，一则本社同人平时很忙，已抽不出时间向此方面努力；二则零零碎碎的

征求定户，看不出征求的成绩，集中一次做，容易看出征求的结果；三则旧的一卷业已结束，新的一卷即将开始，在心理上这个时期最适合征求定户。上次我们征求定户，大体上向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我们想经过本刊撰稿人的帮助，在各学校征求一批学生新定户，二是我们吁求本刊原有的直接定户，就他们的同学、同事、朋友、亲戚之中，替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我们最初对于前一方向怀有很大的期望，因为本刊撰稿人遍布国内各大学，他们对于本刊大都关切，假如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以为可以征求到一批新的学生定户。不料事实与理想相反，这一方向征求的结果，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惨败。无论在哪一个大学，我们都没有能够得到任何收获。这事实使我们第一次开始了解：今日一般学生是生活在何等贫穷之中。各方面都说学生没有钱定阅刊物。那时我们定阅还只先收2万元。2万元在当时充其量只合到战前的一块钱。我们很难相信，在战前，大学的学生竟会拿不出一块钱。然而现在，大学生拿不出2万元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事实也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在5月学潮中对于学生抱持同情。这次我到北方来，我和学生接触的结果，使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可是第二方向，即吁求本刊原有的定户给我们介绍新定户，却又出乎意外地获得可观的成就。竟有不少读者，那样热情地无条件地支持我们，替我们分头介绍。他们真是尽心尽力，竭诚竭忠。有不少位读者附来长信，慷慨陈辞。他们认为，在平时，是我们在服务，他们在享受，而他们欣慰他们亦终于获得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对《观察》尽一点力量。他们认为，假如一个人永远只是享受他人的努力，坐视他人的努力，那是一种不可恕的自私，因之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也有机会略尽一点义务。这些信件，使我们极度感动，并且获得更大的力量。我们深切感到：在这种混沌的，常常令人悲观的中国社会里，仍有公道的存在。我们并且认识：这一种无私的同情与援助，就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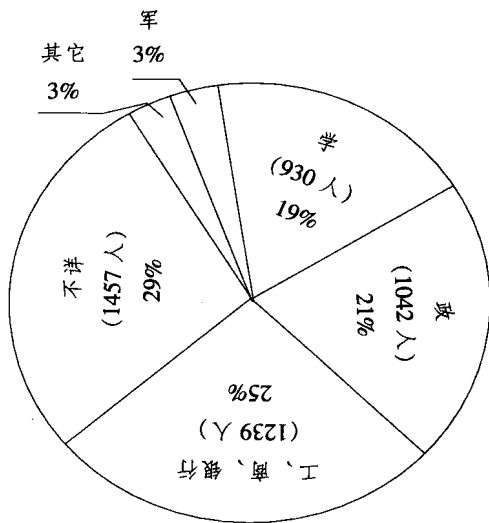
第1卷报告书中定户的号码是2709（至1卷23期出版日止）现在则已增至7682号。各期定户的进度表则如下述

第1卷	第24期出版日止	2800
第2卷	第1期出版日止	3311
	第2期出版日止	3541

第 3 期出版日止	3802
第 4 期出版日止	4005
第 5 期出版日止	4157
第 6 期出版日止	4258
第 7 期出版日止	4425
第 8 期出版日止	4656
第 9 期出版日止	4796
第 10 期出版日止	4934
第 11 期出版日止	5052
第 12 期出版日止	5191
第 13 期出版日止	5369
第 14 期出版日止	5558
第 15 期出版日止	5757
第 16 期出版日止	6025
第 17 期出版日止	6276
第 18 期出版日止	6572
第 19 期出版日止	6842
第 20 期出版日止	7094
第 21 期出版日止	7269
第 22 期出版日止	7489
第 23 期出版日止	7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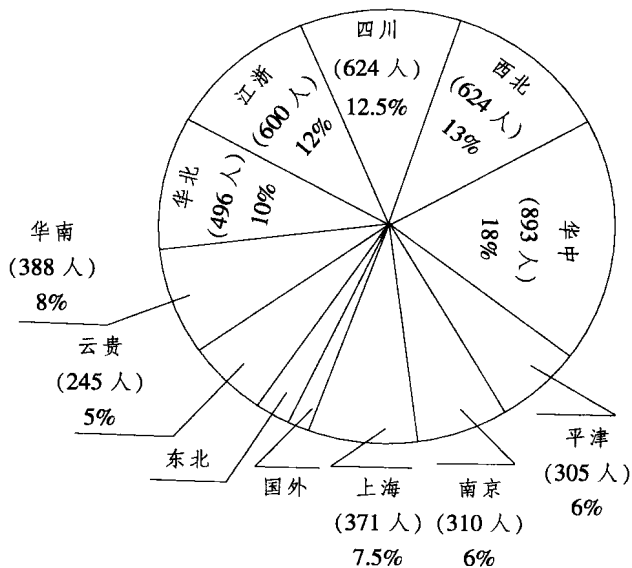
所以第 2 卷的定户，应为 $7682-2709=4973$ 名。这 4973 名直接定户，其地域及职业分布，我们援例统计制表如下：

4973 名定户的职业分类



注：“其他”包括律师、医生、教师等。本刊未曾向读者调查职业，此项统计，系根据定单存根而制，故大部分定户职业，无法分类。

4973 名定户的地域分布



注：“华北”包括冀、鲁、晋、豫、绥、察、热等省。“西北”包括陕、新、青、康、宁等省。“华中”包括湘、鄂、皖、赣四省。“华南”包括港、粤、闽、桂、台等地。

关于下列统计，有几点须加解释：（一）我们说第2卷的直接定户的数目是4973名，并非表示本刊现在拥有4973名直接定户。定户无论是新定户，或是旧定户来续定的，每天汇款来订时，我们都增加了一个新号码。据我们统计，凡是本刊旧定户，订费用罄时，大都是续订的；中止的为数很少。所以这4973名里，有许多都是业已满期的定户，本刊目前的实际定户，仅在2500名左右。（二）在第1卷和第2卷两次报告的定户地域分布统计中，各地的百分比，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仅四川省，第2卷较第1卷为小。可能的解释是原有一部分定户已移到了东南或华北一带。西北及华南两地的百分比，第2卷较第1卷为大。可能的解释是本刊在西北一带的读者渐渐普遍，由于西北交通不便，许多地方的读者不一定能够买到本刊，所以直接定户的数目增加。至于在华南一带，我们在过去迄未推销，定户的增加亦足表示在华南各地，本刊渐次获得较多的读者。（三）职业分类中，第1第2两卷的统计，第2卷学界定户的百分比降低。第1卷统计学界定户占百分之二十三，第2卷统计仅占百分之十九。工商银行界定户的百分比增加。第1卷为百分之二十二，本卷为百分之二十五。这个变动最可能的解释是学生的购买力越来越薄弱，工商银行界的定户大体上尚未受到此方面的影响。（四）我们很抱歉定户职业分类表中的“不详”部分竟达百分之二十九，致使此项统计的正确性大大减低。主要的原因是本刊初创，各事缺乏经验，我们过去始终没有举行过读者调查。此种统计大都是根据本社的定单存根制就的，但在定单存根上，有许多定户无从判断他们的职业。我们现已开始补救，在以后的定单上，都附有定户调查一栏。我们希望读者合作，于定阅时，顺便一填，以便我们在第3卷报告书中，对于定户的职业，能有比较正确的统计数字发表。

现在第2卷业已结束。我们援例在此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新的定户。我们仍旧吁请本刊原有的定户，能替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我们并欢迎原有零购读者直接定阅，变成我们的定户读者。读者先生：我们在期待着你们的支持和合作。

(四) 编辑

关于编辑部分。第1卷结束时，我们打算自第2卷起，增加篇幅至32页。在我们的编辑计划上，自第2卷起，我们打算增辟“读者投书”、“观察文摘”和“观察漫画”三栏，并扩充文艺栏的篇幅。在此种计划下，原有的24页自然不敷分配。但就在第1卷出完，休息的两个星期中，金潮泛滥，百物齐涨，其中纸价的上涨最可骇人。在这种情形下，扩充篇幅的计划只得收起。但原定增辟的投书、文摘、漫画三栏，则决计使之实现，文艺篇幅无法扩充，而刊载学术理论文章的“特稿连载”一栏，不得不暂时取消。“尾页”也随之取消。并腾出一页广告地位以容纳读者投书。照目前情势看，恐怕我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无法考虑任何涉及增加篇幅的计划。

一般说来，第2卷的言论态度较第1卷为积极。“专论”部分，学理的文章减少，触及现实的文字增加。我们极愿保持这个趋向。“观察通信”亦较第1卷时期为能配合时事。“读者投书”，据各方面报告，甚受欢迎，甚至本刊所刊的读者投书，并已成为其他刊物发表的论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本刊所刊“读者投书”所以广受欢迎，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短，二则因为大体上每封投书尚能言之有物。不过我们总觉读者投书，还是冗长的多，所发表的投书，大都要经过删节修饰的功夫。我们希望以后读者投书，尽量简短，即使仅有一句，亦无不可。“观察文摘”未能做得理想，总因人力有限，篇幅有限，所以选摘的范围太狭，也无法每期都有。

稿子经常不宽裕。但稿子不宽裕是一件事，稿子选择的水准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应该分开。照我们大约统计，全部来稿中，刊载的约占百分之四十，退还的约占百分之六十。我们自信我们用稿在大体上还能保持客观的标准，避免偏私。稿件用否与是否是“撰稿人”或是否是“教授”并无必然关系；“撰稿人”中的稿件也有许多退还的，外来的投稿，只要重量够，我们极愿采用，并给以应有的地位。譬如2卷10期所刊钟伯平先生的“学潮平息以后的认识”，就是投稿；这篇文章应当刊第

一篇，我们就给它排第一篇。我们十分欢迎全国作者读者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内容。

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刊物本身的性质注定了它是无法逃避现实的。因此环境越艰难，本刊所可能遭遇的风险也越大。在5月学潮的一段动荡环境中，我们几乎每一期都是处身于死亡的边缘上的。我们当然欣幸我们终于平安无事，但是来日大难，真正的困难恐怕还在后面。我们说过，我们愿以单纯应付复杂。我们将继续本乎我们的良知，发为言论。我们相信我们一切发言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愿意在此吁求政府当局，尽量放宽宽容的尺度，容许国内继续有无私的公正的言论。

本刊自第2卷起增加漫画一页，由孙方成先生执笔。读者对于本刊漫画的批评，我们还不甚清楚。相熟的朋友如钱钟书萧乾等先生都曾表示称赞。然而孙方成先生和本刊的合作，却近乎传奇。我们在第1卷中，曾经采用周东郊先生的投稿，并为之出了一个“新疆变乱记略”专辑。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用稿及对人都能尽力做到无所偏私。第2卷中类似的情形就是孙方成先生的漫画。在第1卷快结束时，我们收到孙先生投来的两帧漫画。那两帧画并不好，但其中略略有一点点“味道”。我就约他来谈，并请他将他过去所爱的画稿全部带来。他的通信处是由一个朋友转的。他并没有照约定的时间来，但终于在迟了几天以后来了。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化学，毕业后曾在黄海化工研究所任实验工作五年。可是他忽而希望在漫画方面寻觅他的前途。他带了一点仅有的旅费便到上海来了。他说他在上海人生地疏，到上海后第一个给他同情的是西风社的黄嘉音先生。我检查他的画稿，大部分都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发现有两帧，造意和技巧都已够得上英美报纸上的漫画的标准。我考虑了一下，我便答应给他一页地位。我只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能了解，像《观察》这样一个刊物，给你一页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感动。他默默地说：“我了解这点。”最后他走时，我劝他，我希望他专心替《观察》画，不要再向别处投稿，因为“一个人的意思只有这么一点。一个人的精力应当集中，集中便有成就”。本刊所载的漫画不完全是成熟的。然而我知道孙先生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并尽量做得最好。我当初决定给他一页地位，仅仅是因为我在他的画里发见一种“希望”。

我们在生命中奋斗了多少年，可是我们很少遇见有力量帮助我们的人，给我们热情，给我们鼓励。在这个社会上，不知有多少青年，仅仅因为无法得到一个机会让他一试，就此埋葬了他的天才！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坟墓，充满了冷酷，充满了阴沉，它只毁灭人，它不创造人！我是在这种情绪下毅然给这个漫画家一页地位，让他一试。而我所以在这篇报告书中花费这么多字记述这段经过，亦仅仅因为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凡有力量帮助他人的人们，能够对一切有希望的青年及其事业，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支持；至少给他们一试的机会。

本刊立场编制，大体上业已定型，我们在此已无新的事情需要报告。原定自第3卷起增辟的“观察一周”，经同人考虑后，决计展缓实现。但自第3卷起，将增设“书评”一栏，业已经约好几位先生分别担任。

(五) 事 务

一、一年以来，本刊各期幸能按期出版。无论是过新历年或旧历年，中秋节或端午节，印刷所及装订所尽管放假停工，我们总在事前作适当的布置，以免脱期。去年过旧历年时，印刷所放假至五日之久，但本刊亦未脱期。一切能在事前知道的问题，我们都设法解决；最困难的是临时突发的问题，有时使本社同人手脚无措。譬如自6月中旬至7月中旬，上海的印刷业及装订业，经常在罢工状态之中。有时正巧我们要上印了，印刷所罢工了，或者正巧要送装订所了，装订所罢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本社同人只要有法可想，总是多方设法，以求按期出版。装订所送刊，经常分为三批，即星期四晚上送一批，星期五上午送一批，星期五下午送一批。有时星期四晚上的一批送了来，我们照例是先将直接定户的刊物漏夜封好，有余再将一部分外埠同业批销的包好。可是星期五突然接到通知，说装订所罢工了。以致定户的刊物虽然全数发出，而同业批销的刊物却大部分不能发出。最不巧的，同一地点的同业，有一部分凑巧在星期四晚上打了包，其他一部分原定在星期五上午打包的，临时因装订所罢工，无法寄出，以致该地同业，一部分早收到，一部分迟收到，以致引起误会。这种情形虽属意外，确是遗憾。我们希望各地同业

赐予体谅，我们并将努力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情形。我们愿意向读者及各地同业诚恳表示，在一切可能的环境下，我们必定竭尽我们的能力，总期各地读者及同业都能按期收到。

二、关于售价，本刊大体上要比其他刊物定得低些，并涨价涨得慢些。譬如别家售 2000 元时，本刊仍售 1500 元；别家售 2500 元或 3000 元时，本刊才增售至 2000 元；现在有许多刊物已售 4000 元，本刊只售 3000 元。（本期篇幅增加，改售 4000 元。）即使有几家刊物目前售价仍与本刊相等，但因本刊广告篇幅少，六号字用得更多，本刊容纳的文字数量至少要比别的刊物多五分之一，我们亦仍然可说本刊的售价较他家为低。其实就开支说，本刊开支要比其他刊物略重，但因销路较大，所以售价虽低，亦能维持。我们认为办刊物不是做买卖。我们一方面要顾到本社的收支平衡，一方面也愿意顾到读者的负担。

三、关于稿费，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已调整过七次，自去年今日的千字 4000 元，提高到目前的千字 4 万元；增加十倍，约等于一年来一般物价的上涨比率。我们所以经常提高稿费，一方面希望借此使各方面获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确是当一件事业在办，另一方面也表示我们时常顾到作者的利益。我个人的办事性格是干脆明白。我平时最讨厌“稿酬从优”四字，因为“从优”两字并无明白的标准，稿子到了你手里，你爱给多少就给多少，这不是一种公道。所以我们的稿费虽然菲薄，但是向例公开宣布，而不半吞半吐不着边际的说“稿酬从优”。不过我们虽然经常在提高稿费，无奈物价跑得太快。自第 3 卷起，我们再将稿费提高到千字 5 万至 6 万元，以后当视实际情形随时调整。

四、定户的来信，仍然是我们事务上的一重负担。我们当努力在最快的效率下一一答复。我们要求读者来信时，姓名及地址的字迹务必不要过分潦草，我们有时收到读者的来信，因为字迹过分潦草，竟致无法复信。有的读者甚至连地址也不附。有时读者在信封上是一个名字，信纸上又是一个名字，我们复信时不知究竟应写哪一个名字。（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只好把两个名字都写上。）又，我们希望各地读者汇款订阅的，最好不要在各省的省立银行汇款，因为省立银行汇款时，他们常常不将读者的附言一并送来，以致尽管收到了款子，还是无法寄刊。有的省立银行甚至仅仅通知本社有款到，何人所汇，甚至款数多少，也不通

知，要本社自己去认，符合的就付款，不符的就不付款。但订阅的读者又不一定另外来信，以致我们根本无法取款。目下本社尚存有这种汇款通知单好几笔，都搁在抽屉里。至于来函续订或更改地址而不附定单号码的仍旧很多，要使我们在七千几百号中去找出一个名字，确是一件难事，我们为补救这个缺陷起见，决定开始编制全部定户索引卡片。但是我们仍旧要求读者来函时，尽可能的体谅我们，将各种必要的事项都注明出来。

(六) 一 年

我们原定以一年为试办时期，现在一年匆匆过去，我们愿就一年来的经过，综合说明几点感想如下：

第一，本刊创刊之初，各方面纷作推测，或疑本刊与张三有关，或疑本刊与李四有关。今日中国一般社会，似乎一致假定：办一个刊物一定有背景，一定有什么人在出钱。这是一种成见。我们相信一年来本刊所发表的文字，足以证明本刊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并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本刊确实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关系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本刊的发行数足以证明本刊可以自给，无须仰求“外援”，因此我们认为，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给一切怀有成见的人们以新的认识：即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

第二，目前一般社会虽然充满着混乱，到处是不合理现象，种种事迹令人悲观消沉，但是我们感觉：假如我们真能正正经经，认认真真，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们仍旧可以获得若干成就。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力量，去开垦我们的前途。我们希望一般年轻的朋友不要消极。我们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我们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我们国家的生命。

第三，一年来的经过使我深切认识一点：假如一个人他本身是持正

的，他在无形中可以抗拒许多邪道的侵袭。我们过去常常听到许多传说，说什么人被“收买”了，或者给他官做，或者给了他钱。我们愿意在此向读者报告，一年以来，政府方面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直接或间接，明示或暗示，向我们有过任何接洽。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绝对维持本刊的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我们并愿在此附带报告，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对本刊施用过任何压力或干涉。

本刊草草，已出一年。在这一年中，本刊的立场、态度、编制、风格以及做人做事的一般原则，大体上已树立一个规模，我们愿意遵循这个传统及方向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前途奋斗！

三十六年八月一日 北平旅次

(原载《观察》第2卷第24期，1947年8月9日出版)

六、《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 刊出后的响应

本刊3卷3期刊载了李克佐等留美八位读农同学的一篇《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他们预备明年夏天回国，回国后预备创办若干生产农场。在那篇文章里，他们大体上陈述了他们的理想和计划，在字里行间，他们充分表示他们有一种新的建国精神，想以实际的工作来改造社会，充实社会。他们希望在回国以前，能先得到国内人士的赞助支持，共同为理想而努力。本刊的一贯态度：对于一切怀有新理想、新计划、新精神的人或事业，赞助支持，愿意尽力给他们各种便利。所以在那一篇文章的后面，我们表示：假如政府当局，社会各界，或本刊读者，愿意和这八位留美同学通信商讨，或给予赞助者，本刊愿意代为转达，俾使双方可以直接通信。

3卷3期出版后的第三天，我们就收到沈亦云夫人来信，表示赞助，原信云：“安平先生：昨日课毕归家，见案头《观察》3卷3期，急取《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及衡哲先生的前置辞二文先读。通篇似言我所欲言，示我所欲知，不觉兴奋累日。云以不辨菽麦、畏牛羊为异类之身，孜孜不舍于一隅之农村，原因固多，以知识阶级了解困苦之农村及与无告之农民为友之意，实居大半。自问工作同人，咸具灵魂，惜以外行之故，似土地庙中供的关公，致文武不相称，用力多而成功少。今之为农村事业者，或出之政府，视人事为转移；或出之商人，以余唾为农民之福利，养猪食肉，养鸡生蛋而已；亦有借以号召，强购民地，此则等而下之矣。此三者，云所幸免者也。对此八位青年及其同志，彼决心，彼办法，无不钦佩赞同，祝其成功。敝山（编者按：莫千山）先准

备其所需一单位之地亩（编者按：240市亩），供其实验，欲稍多亦可。即不来敝山，亦愿为棉力所及之援助。舍下除山中公益事业外，无一亩私田，故以此相邀耳。附《莫干山小学15年》一册，敝山内容历史略可参考，并烦转寄。（下略）”

其后又收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职业教育科陆厚仁先生致留美八同学信云：“仆在教育部办理职业教育行政工作，内心希望于各职业学校者，正如尊论中之能于校内有质际的生产农场和生产工场之类。只是目下极难推行，其主因还是在缺乏真诚实干不移之人才。先生等既志切实干，鄙见极盼将来初步能在几处农业职业学校内来实行。在南通现在办有一所‘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内设农艺、园艺、畜牧、农产制造四科，在南通有实习场地200亩。另在如皋还有田2000亩，正可作新式生产之实验。此外海南岛有国立琼山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陕西有西北农学院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目下国内各农校所用教材，恐怕都是旧的，教育恐怕也大都还是以书本为主，纵有广大场田，但设备恐亦陈旧贫乏。先生等如不嫌屈就，极希望将来能替这些学校革新一下，一面也好把生产农场实验推行出去。……”

又收到前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王公珩先生致留美八同学信，大意叙述辞官之后，正有“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计算。王先生并已拟有一套计划，就他自己的计划及留美八同学的意见，一一提出商讨，并认为政府方面，社会方面，甚至金融机关方面，都可设法请求协助，对于留美八同学的需要，王先生说可以负责设法代为进行。

又收到南京姜国楹先生嘱转的信：“我的家乡在湖南邵阳，那儿的教育颇发达，土地也还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现在善后救济总署设有一个乡村工业示范组织在城里，正在进行创办肥料厂、炼油厂、碾米厂和其他乡村工业。不过那儿是山地，没有广大的平原。山上可植桐，平地可种水稻，其他副产物也很多。如果你们认为这种环境可以适合你们的需要而又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即刻回乡去做开路先锋，宣扬你们的主张，假我半年时间，便可组成一个合作农场，筹集资金。你们回来后，我可以陪同你们去参观设计，正式进行工作。”

又收到南京司法行政部聂健英科长嘱转的信：“司法行政部近年来在各处创办外役监，利用人犯，开办农场。现有安徽宣城一处，定于明

年1月成立。该监有耕地5000亩，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犯人生活，职员薪俸，以及一切设备，全由国家供给，收获除以百分之十缴解国库外，余者供扩充农场之用。若得志同道合之士数位，认真合作办理，三五年后，不难使该监成为一理想之模范农场，并可以此处为基础，向附近农民推行尊文中所述之理想。”

又收到镇江江苏省地政局郑君平先生囑转的信：“本人年来对于土地农村正作积极研究。苏省淮安县丰太乡有滩田七千余亩，土地肥沃，战前计划开殖，嗣以军兴未果。刻仍拟继续前愿，业经拟就复兴合作农场计划（兹附上一份）亟欲征求同志合作。兹读宏文，尤钦钧见，愿让地千亩，以为君实验农场之需。有关各项手续，容俟诸君海外归来，再行面洽。”

又接常熟张礼纲县长来信：“编辑先生：读贵刊3卷3期创办生产农场刍议一文，深佩李君等真能为中国农民谋出路，为中国农村谋复兴，为中国建设作打算。礼纲从事县行政工作前后八年，由黔而苏，无时无地不感觉知识分子未能负起其应负之责任，以致无知无识之农民，经常在水深火热之中呻吟。前在贵州时，试探以教育为中心谋农民生活之改善，在江苏太仓时，亦曾试探以乡村工业及棉作改良为中心，谋农村经济之复兴。终因为时间及人力所限，未能收效。阅此文后，大意与礼纲所见者不谋而合。乃乘县参议会开会之时，提议将县农场借与李君等作为试办生产农场之用（场地约80亩，位于常熟小东门外），该议案已经大会通过。特函奉闻，并请转函李君等，如其志已决，场地大小适宜时，即进行议订详细办法。礼纲籍隶江阴，距常熟城仅40里之遥，且与地方人士颇为熟悉，即离职后，仍可用私人身份进行是项事业，深愿能用此办法，求得中国农业一条光明大道也。”

又接重庆民生公司繆成之先生致编者信：“……鄙人愿向李先生介绍，在重庆北碚地方有两处可供他们理想之经营。一在北温泉斜对面大渡口处，有二百六十余亩。地临江边，前由慈幼院植有果树三千余株，地面年可出包壳将近100老石（即300市石）。近为一友人购得，正感无法经营，如李先生等人愿意借作试验，决可办到。又鄙人在北碚相辉学院附近有山林及熟土约100亩（其中有田20亩），极愿让供李先生等试验，如需贷款，亦可设法。北碚为名胜区，有卢作孚先生之乡村建设及

前中央农业试验场与相辉学院农艺系，一切实验，可收相互观摩之效。”

又上海中央银行业务局朱汉民先生，愿意介绍李先生等分租露香园畜植公司杭州集团农场，并表示可以不受其原有计划之限制。

又天津南开大学张俨先生，愿意将他们兄弟所合有的四百多亩田，在粤汉路湖北蒲圻茶庵岭车站两侧，供给李先生等作生产农场。

此外，陕西泾阳吕致芳先生愿以全部田产约 200 亩供作试验农场的基础。南京余棣北先生、杨作仁先生，上海张光华先生、严沛然先生，九江芳英先生，丽水潘瑞沧先生等都有信和八位同学讨论，严沛然先生并附有他的计划大纲。北平杨姿蕊女士则以封好的一封信托我们代为转美。

以上这些信件我们业已分别用航空挂号或普通挂号寄美。我们所以除了将信件直接转美之外，还要在此地摘述如上者，主要的意思，希望全国广大的青年认识：我们今日所处的这个社会，虽然是处处黑暗，处处腐败，处处不合理，但是仍旧有许多有热血有志气的有心人士，散布在全国各地及各职业阶层。只要我们自己有理想、有计划、有决心、有勇气，我们仍旧可以凭我们的热血、决心、智慧、人品，创造事业，改革社会，充实国家的生命。单单消沉、悲观、牢骚、愤怒，是无用的。我们不应当向消极的方向走，应当向积极的方向走。以后读者有信嘱转寄美者，我们当随时代转，不再在本刊上披露。我们要求留美八同学的是：你们收到本刊转寄的信件后，对于他们的意见或帮助，不论你们同意与否，接受与否，均请一一答复，使寄信人能早日收到回信。

（原载《观察》第 3 卷第 5 期，1947 年 9 月 27 日出版）

七、白报纸！

最近物价腾涨，其中以纸价涨得最凶。当前几天其他各物逐渐回跌时，纸价仍然继续上跃，冲出 100 万元大关（每令），最高叫到 120 万元。这种上涨的情形，实已超乎情理。在 8 月 15 日前后，纸价约在二十七万一令，到 9 月 15 日前后，纸价就涨到五十三四万左右，在短短一个月中，上涨百分之百。这时出版界已经透不过气，许多刊物不得不被迫提高售价。一直到 10 月 5 日，纸价尚逗留在 60 万元一令之数，但自 10 月 7 日起，纸价即作高速度的上升：

10 月 7 日	68 万元
9 日	70 万元
11 日	80 万元
13 日	87 万元
14 日	90 万元

自 15 日起，报纸的商情表上已无纸价的记载。16 日《大公报》第 2 版报道纸价已涨到一百十几万元一令，同日我们向纸商打听纸价，已叫到 120 万元。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尚未在报纸上看到主管当局对于纸价的抑制的消息。18 日《大公报》第 4 版始有警察局出动彻查纸商的记载。并载纸商同业公会的理监事，于 17 日召集同业，决定切实减低纸价，并规定门市售价每令为 85 万元，只许减低，不准上涨。

中国杂志界的经济力量大都非常脆弱，没有巨额资本可以购存用纸。期刊又例不作新闻纸论，享受不到官价纸的配给，只得向市面纸商购用。本刊用纸，存底素薄，最近恰巧用完，而在这种疯狂上涨中，又无法购

买。但本期在 21 日必须付印，我们在 18 日动员全社同人，出外购纸，经整天的努力，结果还只买到 22 令，只够一期印刷需要量的三分之二（因此本期只出 20 页）。我们在河南路、交通路、福建路、山东路、广东路一带的纸店都问过，有的说 95 万一令可以卖十几令给我们，有的说 85 万元一令，限购一令，有的则干脆说没有货。结果我们在山东路的怡成纸号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时间去买到了三令，在山东路汇丰纸号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时间去买到了四令，在广东路涌生泰纸号买到一令，交通路震泰丰纸号买到一令，福建路义昌兴纸号总算卖给我们三令，广东路万亭和纸号买到两令，广东路德泰丰纸行买到两令，以上都是 85 万元一令。另外一家江西路五马路口的程梅记纸号，最初去时，说 95 万元一令，可卖十几令。但因看见我们出门时抄录他们的店号，再回去买时，他们便说没有货了。吵了好久，最后大概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抄录他们的店号，不晓得我们什么来路，好歹总算以 85 万之价卖了五令给我们。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志成纸号，我们过去一年来，大部分的用纸都是向他们买的，最初讨价 95 万，后来我们说报载同业公会限定不得超过 85 万元时，他们便说“没有货”了，最后顶多只肯卖半令给我们。而且许多纸号都要我们出具正式函件，他们才肯卖“一令”给我们。

照目前这种纸价，实非中国的杂志界所能忍受。假如一个刊物的发行数是 5000 份，则其成本为：

纸 8 令（以 85 万计）	680 万
排印工及装订	约 550 万（排印工日内又将加价）
稿费及行政费	约 800 万
广告费及杂费	约 200 万

共计 2200 万左右，假定每册售 5000 元一册，再扣除一个七折的批销佣金，即使完全收足，也只能收入 1750 万元。假如一个刊物的发行数是 i 万份，则其成本：

纸 16 令	1360 万
排印工及装订	约 750 万
稿费及行政费	约 800 万
广告费及杂费	约 200 万

共计 3100 万左右，如完全收足，亦只能收 3500 万元。事实上，上述估

计，在支出方面是最节省的，实际上的支出或者不止此数，而收入方面，绝无每期可以一本都卖得不剩，或每一本的钱都可以收得回来。而且支出都是现款，收入则常常在一二个月以后，甚至三四个月以后或永远收不回来，收入时与支出时，其间的币值又不知要打了什么一个折扣。因此杂志的经营，在这种惊风骇浪的物价中，苦痛不堪。印刷所是做买卖，纸商老板也是做买卖，但杂志的发行人，他和读者的关系并不是纯粹一种商业关系。这是一种文化事业，他们要顾到读者的购买力。

我们总希望民营的报纸或民营的刊物越多越好，同时亦希望每一个刊物都能逐渐增加他们的发行数，替我们国家的出版记录增加光彩。但是要希望民营的刊物多，要希望已有的民营刊物能够存在下来，就得使它能够自给，能够收支平衡。要希望刊物的发行数增加，就得顾到读者的购买力。刊物的售价越低廉，购买的人越多；购买的人越多，成本便可减低。我们不希望看见一个一个民营的刊物都跨下去，到后来只剩了官营的或党营的刊物；这不是国家的体面。我们不希望各种物价的重压，使每个刊物隔一个月或几个星期就得要涨一次价，弄得读者都买不起。现在一般刊物的发行数，向不公开，我们不知其他刊物的发行确数，但现在大多数刊物的发行数，均在1万份以内。按照上述成本，可见今日中国一般民营的刊物，都在极其困难之中撑持着。有许多刊物，确是成绩昭著，极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这些优良的刊物一个一个消灭，政府在道义上似亦未能尽其维护文化事业的责任。在纯粹民营，纯粹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许多刊物中，如《世界知识》，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社会上素负声誉，而且他们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确可矜式，但他们在一个月前，即已从每册4000元增售至6000元，在最近的纸价上涨中，恐怕他们又非涨价不可。刊物为了要平衡收支，不得不涨价，但读者的购买力有限，其结果势必使发行数降低。而且在上海售6000元，在华北便须售7000元或8000元，在后方恐怕售至一万元甚或一万数千元。以后方生活程度的低，要读者以一万元或一万数千元来买一册刊物，实已超过他们的能力。又如《时与文》周刊，虽只出版半年，但是极其努力，业为目前许多领袖刊物之一，我们虽不知他们的经济情形，但在这种纸价的狂涨下，想亦深感艰难。就是已有30年历史的《密勒氏评论》报，在昨天（18日）出版的一期上，第一篇社论就是陈述该刊在纸价暴涨下的压

迫（该刊现已售一万元一份）。许多优良的刊物，都困于经济，不能维持。我觉得政府对于有成绩的文化事业，不能漠视不顾，虽然政治上的看法彼此不同，但大家都是同样抱着一腔热忱，为祖国的前途努力。目前对于一般刊物的生存最大的威胁就是纸价。以本刊而论，现在每期纸的费用，即使照 85 万元一令的价格，亦已达 3000 万元左右，占到每期总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纸价的波动，简直影响到一般刊物的能否生存。本刊在 5 月间曾向中央信托局申请购纸 40 吨，公事搁了两个月，到 7 月中旬才批下来，准购两吨。纸是日本报纸（纸质较劣），但须照加拿大报纸的市面行情七折购买。5 月间我们申请购纸时，市价仅 20 万元一令，7 月间批准时，市价已超过 30 万元，即使打了七折，还比 5 月间申请时的价格为高，而两吨纸不敷本刊一月之需。最近上海市书业公会才准分给我们 300 美元的配额，这批纸何时可到，尚不可知，而 300 美元的纸，亦仅敷本刊半月之需，因此本刊过去所有用纸，纯系照市价向纸商门市零购。本刊发行数略较其他刊物为大，其间已比其他刊物稍占便利，然而在最近纸价的腾涨下，亦已难于支持。其他发行数较小的同业，其困难更可想见。这次纸价的暴涨，显然出于人为。我们希望政府，一方面使纸价回复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希望能回复到 9 月底以前价格，同时对于官价纸的分配，亦应求其公平。外间早有传说，说政府听任纸价上涨，间接以陷与政府政见不合的言论刊物于自行消灭之境。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传说。

10 月 19 日

（原载《观察》第 3 卷第 9 期，1947 年 10 月 25 日出版）

八、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 白报纸配给情形

最近英商《字林西报》、美商《大美晚报》和上海报业公会，因为白报纸配额问题，引起严重纠纷；上海报业公会于三十六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42次会员大会决定第四季白报纸配额时，认为《字林西报》和《大美晚报》在纸张篇幅上，未能遵守公会公约，故将《字林西报》的白报纸配额，按照第三季配额减去百分之九十，即自9400元美金减为941元美金；《大美晚报》的配额按照第三季配额减去百分之五十，即自8458元美金减为4229元美金。被处罚的两报连日以极大的首页新闻地位及社评地位，向报业公会提出抗议。在性质上，这本来是一个同业公会之间的内部问题，但在趋势上，几乎变成为一个涉及国际性质的外交问题。输管处主任委员张公权于12月20日致函《大美晚报》，谓白报纸配给额之最后决定权，在输管处而不在报业公会，并谓该处对于《字林西报》及《大美晚报》之配额问题，将有公平之解决；遂使情形略趋缓和。我们现在愿就一年来白报纸配给情形，陈述意见，希望政府能使白报纸的配给制度合理公平。

白报纸的价格在三十五年一年中，极其平稳。从三十五年年底起，开始波动：经常在25000元一令的白报纸，5万、10万、15万，跃涨不已。在白报纸曾经最高涨到150万元一令的今天来看，15万一令的价格，不啻是黄金好梦，令人恋忆不止。但在三十六年2月间，一般文化事业的经营者，对于这种涨无止境的白报纸价格，已都惶惶不安。在这时候，政府决定以国家的力量来扶助文化事业，遂有白报纸配给制度的施行：在政府每三个月一次的进口限额中，以一定的数目，配给文化界

出版界，使得到配额的出版机构，可以向政府购买外汇，订购报纸。其后白报纸的价格，一日千里，20万、30万、50万、80万、100万、120万，一直到最近最高的150万（一令），白报纸的价格越涨，白报纸配额的重要性便越增加。正如《字林西报》在这次的配额争端中所说的，假如他们不能获得他们原有的配额，他们势必被迫停刊：这话既非夸大，也非威胁，在实际上确有可能。事实上，今日中国的出版界，无论是报业、书业，或杂志业，无不为此高涨的纸价压得透不过气来。以本刊论，我们在三十五年9月创刊时，纸价只有25000元一令，现在涨到150万元左右，约涨60倍之多，但是我们创刊时的售价，只有500元一份，即以本期增售7000元一份的售价言，本刊的售价亦仅上涨14倍。这个在同一时期内，纸价已涨60倍，售价只涨14倍，都是确实的事实，而其对比的强烈，则令人看后不禁心弦震荡。除非报纸、书籍，或者杂志，它的销路或者它的售价能与白报纸的价格作比例的增加，否则终将血干汗尽，垮了完事。但是报纸、书籍、杂志，无论是销路或者售价，要和白报纸的价格作比例的增加，均不可能。普遍的贫穷使报纸、书籍、杂志的销路越来越呆滞，一切出版物的销路，不仅无增加之望，反有下跌的趋势。经营门市的人都在叫苦：看书的人多，买书的人少！肚子都吃不饱，还有什么钱买书呢？支出的增加，使出版品的售价必须增加，售价的增加使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少，而销路越少则售价更越须增加；如此循环，出版业的前途便越来越黯淡消沉。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获得白报纸的配额，借以减少出版品的成本，勉力撑持，以维护文化事业的生存。

过去一年中政府所实行的白报纸配额制度，我们认为其中最可批评的地方，即上海一地在全额配额中所占的比率，实在太大。据我们所获得的材料，即以最近这一季，即第四季（包括三十六年11月12日及三十七年1月）的白报纸配额分配情形说：第四季的配额总额是二百五十余万美元，但上海一地的书业分到八十余万美元，约占总额的三分之一；上海一地的报业分到六十余万美元，约占总额的四分之一；国民党党办报纸刊物分到三十五万余美元，约占总额的八分之一弱，上海的纸商业分到二十余万美元，而除上海以外的全国各地的非国民党党营报业，包括北平、天津、汉口、广州等地，一共亦不过分到三十余万美元。易言

之，在全国的白报纸配额中，上海一地所分配到的，几乎占到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十六年夏天我在天津旅行时，平津同业大都表示上海书报业享受的配纸数额太多。在同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李俊龙副部长视察河南一带时，当地的同业也一致呼吁，要求享受白报纸的配额。这一年来，内地报业因受纸价的重压，被迫缩小开数甚或停刊者，时有所闻；西安纸荒的严重，几乎使西安全体报业解体。再以上海报业的分配情形而论，即以本季（第四季）而言，据我们获得的材料，其分配情形如下：

《新闻报》	147544 元（美金）
《申报》	91577 元
《大公报》	83533 元
《正言报》	29100 元
《东南日报》	28700 元
《和平日报》	26262 元
《前线日报》	22157 元
《益世报》	22157 元
《商报》	22157 元
《大陆报》（英文）	20919
《华美晚报》	10223
《新夜报》	10223 元
《时事新报》（晚刊）	10223 元
《大晚报》	10223 元
《新民晚报》	10223 元
《大众晚报》	10223
《自由论坛报》（英文）	9172 元
《中华时报》	7911 元
《金融日报》	7064 元
《立报》	5935 元
《大美晚报》（英文）	4229
《俄文日报》	2764 元
《字林西报》（英文）	941 元

《英文回轮日报》	400 元
《铁报》（小报）	5960 元
《飞报》（小报）	4305 元
《小日报》（小报）	2500 元
《力报》（小报）	2500 元
《罗宾汉报》（小报）	2100 元
《诚报》（小报）	1600 元
《活报》（小报）	1500 元
《风报》（小报）	1500 元
《东方日报》（小报）	950 元
《辛报》（小报）	920 元

上列数字可以帮助我们明了目前上海报业白报纸配额分配的一般情形。但以整个国家为单位来看，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分配是公平的。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开封、西安、兰州、迪化、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南昌、广州、福州、沈阳等地，各有其优秀的报纸，在各区域的地理岗位上，负其传播文化的使命，我们绝不能如此厚于上海一地而薄于全国各地。我们认为这种分配比率，未免太偏。政府应以全国为单位，就各地报业与出版业的需要与贡献，衡量实际情形，作合理而公平的分配，不宜将感情完全侧重于京畿附近的一二个都市。

再就上海一地而言，在过去一年中，白报纸的配额情形，物议甚多。最通常的两个毛病：第一个是分配不平，有的人家配得多，有的人家配得少，多的多到超过其实际的需要，少的少到远不敷其实际的需要；第二个是分到白报纸配额的人，当他利用所分到的白报纸配额时，不一定能符合国家所以要分给他白报纸配额的本意。国家所以要给各报馆各书店各出版机构白报纸的配额，其目的乃在减轻报业、书业、出版业在用纸方面的负担，亦即间接减轻读者的负担，用以传播有益于社会的文化及思想。白报纸配额的目的是，并非借此以补贴各受配对象的庞大而近于浪费的行政开支，或借此以肥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囊。白报纸的配额不是一种分赃、救济或补贴，受配对象应当将所配到的白报纸，用之于印刷报纸或出版书籍，不得将配到的白报纸作为受配对象在业务上的一种资金，发生买卖行为，以此周转或以此赢利。但一年以来，实际情形

与原定目的，未必能完全符合。无论报业或书业，有些人家所分到的配额，是否不超出其实际需要，不免令人怀疑。在报业方面，据我们所知，曾有人提议在报业公会内组织一个小组委员会，调查各报的实际发行额，用以决定该报所得到的白报纸配额是否超过其实际需要，但这个提议始终行不通，因为大多数的报纸都不愿公开其实际发行数。12月27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周报第一篇社论中就有这样的叙述：上海每一家报纸都虚报他们的发行额，用夸大的发行额以便招揽广告。《密勒氏评论》周报甚至怀疑，上海有些报纸，为了要求配纸，夸大他们的发行数。《密勒氏评论》周报的记者说：他们曾经听说，有一家报纸自称日销6万份，但报业公会于分配配额时，知道其数不确，所以打了一个对折，只给了那家报纸相当于日销3万份的配额。那一家报纸发行人，一方面向报业公会抗议其议决的不合理，一方面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实际上这家报纸仅仅日销2万份（《密勒氏评论》周报108卷4期108页）。张君劭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们所需要的白报纸是一家半官方报馆分给他们的。一般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单就上海一地言，白报纸的配额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这种不公平的情形同样见之书业方面。我们甚至又可以说，书业分配白报纸的情形，比报业更坏。报业每一次决定配额后，其配额清单虽不向社会公开，但在报业公会的会员之间，是公开的，各会员还有机会知道每一家所得到的配额。书业公会则除了理事们之外，其他会员很少知道每一次白报纸配额的实际情形；一切都操之于少数理事们的掌握之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先生，曾有一次口头要求书业公会公开白报纸配给的清单，但被询问的人则要求巴金先生用书面提出来。其后文化生活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万有书店三家联名正式致函书业公会，请求公开白报纸配给账目，但书业公会迄无只字答复。有许多人都怀疑书业公会的理事会员，利用其自身为“理事”，都能分得相当多的白报纸配额。这种怀疑有无根据，只须书业公会一方面公布其理事名单，一方面公布其过去各次配纸的清单，便可证明。在书业中，有许多的确在认真出版有价值的书的出版业，他们所分到的白报纸配额，非常微小，远不敷其实际需要，以致有许多稿子，业已排好，打好纸型，而没有白报纸付印。但有些出版色情书籍的书店，却可以获得为数甚大的白报纸配额。又有些书店，白报纸配额虽然分到不少，但极少出书，

就靠分到的白报纸“坐吃”。所以现在上海有一个新名字，叫“吃白报纸”。前几天，上海《新民晚报》上有一段新闻，说有一家书店，要抛出白报纸，价达200亿之巨。这个消息假如是事实，则大可证明书业中的确有人配到了白报纸而并不用以出版书籍。政府以国家外汇购进的白报纸，配给出版业，原是鼓励并帮助出版书籍者，而受配者却用以作为他们的业务资金，移作非与直接付印有关之用；这实大违政府施行白报纸配给制之原意。更进一步说，我们认为白报纸的利用，应以有益于社会的文化事业为限。我们绝不同意以国家艰难的外汇购进的白报纸，浪费在印刷大篇幅的商业广告或娱乐广告，或者印刷色情海淫的文字。前述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三家致函书业公会，一方面要求书业公会公开配额清单，一方面曾质问书业公会为什么出版黄色色情书籍的书店却可获得极大的白报纸配额。我们认为这种质问极其重要。白报纸的配给，既要公平，亦须合理。一切分配超过了其实际需要，或用分配到的白报纸去印刷无益于社会文化的图书，或者干脆分到报纸而不出版书籍，“坐吃白报纸”，这一切情形我们都认为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不仅浪费着国家的外汇，并且间接剥削了全国学术界文化界的作者读者的利益，有害于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我们更须进一步地明了，目前白报纸价格的如此飞涨，亦与这种配额制度有关，因为绝大部分的白报纸配额都给“既有对象”分去了，所能剩给纸商的数目也就有限，所以纸商在供需不平的情形下，囤积居奇，高抬售价，其结果，使一切不能获得政府配额的出版业，统受其累。

关于本刊自身，我们亦愿在此略述数语。我们过去的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我们在三十六年5月曾一度向中央信托局购纸，请求购买40吨，公事至7月才批复下来，准购两吨。中央信托局的纸是日本纸，但须照加拿大纸的市价七折计算。事实上，我们申请时，市价仅20万元一令，但批准购纸时，市价已超过了30万元，即使打了七折，实际支付的价格，还比5月间申请时的价格为高，而纸质则远不如市上所购的西报纸。据说最近上海有二十几家科学期刊联合向中央信托局购纸，只批准了一吨，每家只分到二令左右，我们觉得这简直是滑稽。我们于加入书业公会后，书业公会在第三季配额时，曾给我们300美元的配额，仅敷本刊半月之需。我们因为书业公会的配额不敷本社实际需要远甚，

故于三十六年 11 月 27 日以双挂号公函一件致书业公会，正式请求该会派员惠临本社，调查本刊的实际需要。我们的挂号信收据是上海第五邮局第 0147 号，并于翌日（11 月 28 日）收到书业公会的“收件回执”。但迄今一月，书业公会既未接受我们的请求，派员调查，亦未有只字之答复。我们致函书业公会的态度是诚恳的，而且我们认为我们这种请求乃是基于一种合作的精神，愿意协助书业公会明了其会员的实际需要，以作为该会下次决定配额时的参考。本社现除出版周刊外，并将出版丛书，丛书的原著且已陆续寄到，本社对于配纸的需要，比以前更为迫切。我们绝对不能承认，那些色情的书报，在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比本刊所作的贡献更为重要。那些色情书报都可获得为数可观的配额，为什么我们所分得到的独如此之少！我们对于这种不公平的情形，难于缄默！

白报纸的配给制度已行一年，现在又是一个年度的开始。我们认为政府对于过去一年白报纸配额的情形，亟应加以调查：究竟过去一年中的白报纸是如何分配的？其实际用途的情形又如何？在书业方面，到底过去一年中出版了多少书籍？哪些书籍？其用去的纸量与配给的纸量是否相符？我们希望政府加以调查，并公布其调查结果，使一般社会都能明了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形。对于过去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政府应根据调查所得，作进一步的改善。

12 月 30 日

（原载《观察》第 3 卷第 19 期，1948 年 1 月 3 日出版）

九、风浪·熬炼·撑住

——《观察》第3卷报告书

经过这紧张的、困顿的并且富于戏剧性的半年，我们欣幸我们终得向读者宣布：《观察》第3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4卷第1期定2月28日出版。

这半年真是一段熬炼人们灵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气，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机，一面是经济性的压迫——后者尤较前者使我们疲惫吃力。但是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风险，经费如何艰难，我们的一贯方针是：撑住舵、沉住气、向前撑。我们相信，这还仅仅是遭遇困难的一个开始，更大的困难也许还在后面。

(一)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整个的局势愈来愈摇摆颠荡，反应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也必然是大家愈来愈困难。法币愈来愈不值钱，物价也就愈来愈跳得快。就本刊说，创刊号每份售500元，1卷24期售1000元，在第1卷的半年之中售价只涨了一倍。2卷1期售1500元，2卷24期售3000元，在第2卷的半年之中，售价亦仅上涨一倍。3卷1期售3000元，3卷24期售1万元，在这一卷的半年之中，售价却涨了三倍多（如将发行数的增加和篇幅的减少两点一并算入，这半年间售价的上涨，并不止三倍多），这也可以反映最近半年来各种物价及工价激增的程度。在这一卷中，我们最感重压的就是“纸”的负担。我们曾在3卷9期和

19 期上两次专文陈述此事，纸的问题确已成为目前国内文化界出版界最严重的问题。在 3 卷 1 期时，纸价为 30 万左右一令，其后 40 万、50 万、70 万、80 万、90 万、100 万、120 万、150 万、180 万、200 万，最高曾一度冲到 230 万一令，在六个月内大约上涨百分之七百。现在本刊每期纸的成本，占到每期总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这半年来，我们几乎天天在为着纸的问题焦虑紧张。

排印工及装订工也一再涨价，兹将 3 卷 1 期和 3 卷 24 期各种价目比较如下：

种 类	3 卷 1 期	3 卷 24 期
五号字排工（千字）	4 万 3 千元	13 万 2 千元（日内又将加价）
六号字排工（千字）	5 万元	15 万 3 千元
印工（每令）	8 万元	26 万元
封面印工（千页）	2 万 7 千元	9 万元
纸型（每页）	3 万 2 千元	10 万元
订工（每份）	131 元 6 角	307 元

根据上表，排印工及订工的上涨，在这半年中，为百分之三百多。稿费 3 卷 1 期时为千字 5 万至 6 万元，现在提高为千字 15 万至 20 万元，亦提高百分之三百左右。本社员工的薪金开支，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例很大，在三十六年 9 月份（3 卷 1 期时），每月员工薪金总额仅七百余万元，现在（三十七年 1 月份）已达 5000 万元，一方面薪金本身调整了，一方面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职员的人数也有增加，因此每个月的薪金开支，也成为本社目前一项不轻的负担。其他一切杂项的开支，都随着增加。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率当在百分之五百左右。但售价的增加则仅为百分之三百三十。因为第 3 卷的发行数，比较第 2 卷的发行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收支两方还勉可求得平衡。

（二）销 路

本刊的发行数，第 1 卷约为 8000 份，第 2 卷 16000 份，第 3 卷

25000份，增加的比例约为“一、二、三”之比例。本刊销路如此激增，我们自愧并无任何足堪重视的贡献；一切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和读者的爱护；同时也可以说，这充分反映今日国内对于这样一个真正没有背景的言论刊物的需要。

本刊第2卷临末各期发行16000份（2卷24期发行17000份）。自第3卷起，另在北平出版“华北航空版”，委托北平新实书店代理发行，每期发行3000份。华北航空版发行后，在乎、津、华北、东北一带，上海本社即停止寄发，但3卷1期，上海仍印16000份，沪平两地合为19000份；“华北航空版”的发行，使本刊自第3卷第1期起，发行数即从2卷24期的17000份跳到19000份。华北航空版在这半年之中，根据北平代理发行人新实书店的报告，迄为3000份，未能有何增加。这可能因为东北及华北各地的战火，使刊物的销路愈来愈狭，因之难望推广。上海方面的发行数则自3卷1期到3卷11期，迄在上涨的趋势中，3卷11期以后，发行数即停滞不前，逗留在一万四五千份左右。战火的蔓延，交通的阻隔，以及售价及邮资的增加，都足以影响刊物的销行。兹将第1卷第2卷各期再版数及第3卷发行数报告如下：

第1卷	第1期	5版	1220份
	第2期	6版	1220份
	第3期	5版	1220份
	第4期	4版	1180份
	第5期	4版	1300份
	第6期	再版	1500份
	第7期	再版	1300份
	第8期	再版	1160份
	第9期	再版	820份
	第10期	再版	1010份
	第11期	再版	1050份
	第12期	再版	730份
	第14期	再版	1200份
	第20期	再版	1200份
	第21期	再版	1220份

	第 22 期	再版	810 份
	第 24 期	再版	830 份
第 2 卷	第 1 期	3 版	1200 份
	第 2 期	再版	1330 份
	第 3 期	再版	1200 份
	第 4 期	再版	1500 份
	第 5 期	再版	1500 份
	第 6 期	再版	1160 份
	第 7 期	再版	1250 份
	第 8 期	再版	1060 份
	第 9 期	再版	1000 份
	第 10 期	再版	900 份
	第 11 期	再版	1020 份
	第 12 期	再版	650 份
	第 13 期	再版	1200 份
	第 14 期	再版	800 份
	第 14 期	3 版	600 份
	第 15 期	再版	1000 份
	第 16 期	再版	900 份
	第 17 期	再版	800 份
	第 24 期	再版	500 份
第 3 卷	第 1 期		19000 份
	第 2 期		19500 份
	第 3 期		21000 份
	第 4 期		21500 份
	第 5 期		21000 份
	第 6 期		21000 份
	第 7 期		22000 份
	第 8 期		22000 份
	第 9 期		23000 份
	第 10 期		24000 份

第 11 期	25000 份
第 12 期	24000 份
第 13 期	25000 份
第 14 期	24000 份
第 15 期	24000 份
第 16 期	25000 份
第 17 期	25000 份
第 18 期	25000 份
第 19 期	24000 份
第 20 期	24000 份
第 21 期	24000 份
第 22 期	24000 份
第 23 期	24000 份
第 24 期	25000 份

按照上表，本刊第 3 卷的发行情形，前半期是上升的，后半期是稳定的。但是本刊第 4 卷的发行数是否能够再向上增加，或者是否能够保持已有的数目，我们不作任何乐观的预期。主要的原因是战争使大家越来越穷，而普遍的贫穷使买得起书刊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书刊本身的售价，由于成本的增加，势不能不一再调整，另一方面邮资的加价使书刊在发行上遭受极大的不利——后者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尤较前者为甚。售价的增加，在京沪东南一带比较说来还不发生任何太大的影响。即以本刊目前售价 1 万元一份来说，现在这 1 万元在一般都市人民的生活中已无任何重量。在上海，看一场电影连车钱就要花到五六万或七八万，吃一碗最起码的肉丝面连小账就要花到两万元，坐一次公共汽车也要 1 万元，三轮车夫或黄包车夫对于 1 万元的生意简直已经不感“兴趣”；说到后来还是刊物最便宜，花 1 万元买一份《观察》可以消磨一个宁静的周末。但是在远地，情形就不同。远地寄刊，势须航寄。定户航寄，航平每份就要四千多元，航挂每份要七千多元。同业批购，用航挂寄递，每份的邮资平均均合 3000 元左右。这一笔邮资的负担可观，而这笔负担最后当然仍落在读者头上。远地同业还要加上他们的利润，这样一来，本刊在后方各城市的零购价格，亦就可观。后方的生活程度本较京沪一

带为低，现在却要他们付出较京沪一带读者所付出的更高的代价购买书刊，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困难，可以想见。本刊在发行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全国性，发行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散布在大后方各大小城市乡镇之间以及边远地区，因之邮资的加价对于本刊业务上所生的影响，大于仅仅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发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因之我们一方面希望后方的读者尽可能的向本社直接订阅，同时我们也吁请全国各地同业，并和我们合作，尽各种方法以减低批购的成本，从而减低门售的价格。我们希望各地同业尽可能的用“航空图书小包”寄递而不用“航挂”寄递，因为“航空图书小包”的邮资只合到“航挂”邮资的三分之一。用“航空图书小包”寄，不一定比“航挂”慢。假如当地同业共同约好，都用“航空图书小包”，则大家仍都同时收到，亦不致增加业务上的竞争困难。此外各地同业在规定本地的门售价格时，我们亦希望他们尽量采取薄利多销主义。过去有些地方的同业利润定得太高，比如在贵阳昆明，本刊售 500 元时，他们已售 1500 元或 2000 元；这样的情形，对于读者、经售书店及出版者三方面都是不利的。我们又希望各地同业对于本刊的门售价格有一个标准，不要把《观察》像一般商品似的有早晚市面不同的价格。譬如在台湾，就有这种现象。当我们售 6000 元一份时，最先到的一批《观察》，在市面有时喊到台币 150 元一份（合国币 14000 元左右），过了几天，售价从 150 元减为 120 元，100 元，或 80 元。这种情形也非我们所愿闻。其实当本刊售 6000 元时，在台湾售 80 元台币，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平时一贯的方针是想尽可能的减轻读者的负担，我们要求各地同业在精神上能和我们配合合作。

自从“华北航空版”出版后，华西及华南的读者来函希望我们出华西航空版及华南航空版，以期减低内地读者的负担。在原则上，这不仅是我们愿意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出航空版有许多条件，不若想象中那样简单。本社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直接派人到各地去自己发行航空版的程度，航空版的发行势非委托当地书业代理不可。但我们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代理对象，代理对象最主要的条件是负责任，守信用，按期和我们结账。假如我们不能按期收回账款，而在各地出版航空版，这不啻是一种“自杀”。我们当然愿意随时留意并尽可能接洽此事，但至少目前还无任何好的消息可以宣布。不仅没有好的消息，我们反而要向华北

读者宣布：我们的华北航空版也终于只能出到3卷24期，自第4卷起，不拟继续发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理发行本刊华北航空版的北平新实书店未能履行契约，按期和我们清账，拖欠的数目在全部应付的账目中所占的比例太大，而且势必越欠越多。新实书店也有新实书店的困难：战火的蔓延使他们无法推广销路，收款的困难使他们周转不易，北方纸价的昂贵也加重他们的负担；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是同情的，了解的。但就新实书店和我们的“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讲，这样越欠越多的情形，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我们考虑结果，只得将华北航空版暂停发行；将来如有可能，再设法恢复。

(四) 定 户

关于定阅部分，第3卷中最大的改动是将“按期记账法”改为“硬性规定法”。以前是预收若干订费，一期一期的扣除，款尽通知续定。但定户对于这个办法，感觉不便，一致要求硬性规定：三个月多少钱，六个月多少钱。因为照以前的办法，定户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订费什么时候完，以致续定时常常中途脱节。况且硬性规定以后，刊物假如加价，读者即可不受加价的影响，多少可以得到一点保障。我们认为读者的要求非常合理，所以自3卷5期起，即改用硬性规定的办法。

定户在这半年中仍有增加。兹将过去三卷中增加的情形列表如下：

卷 数	定单号码	定单数目	实际定户
第1卷	1—2709	2709	1600左右
第2卷	2710—7682	4973	2500左右
第3卷	7683—14414	6732	330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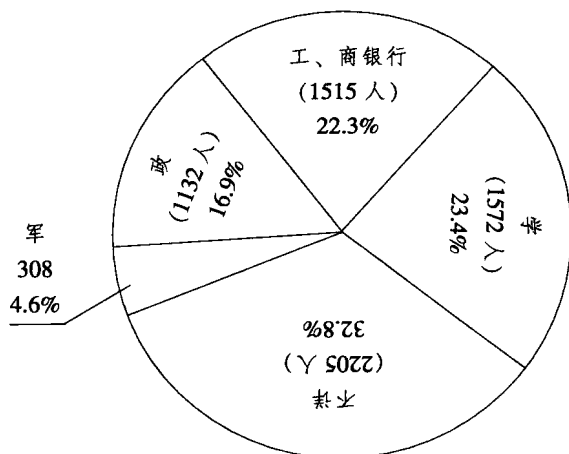
根据上表，在第2卷的半年中，定单的数目为第1卷的180%左右，在第3卷的半年中，又为第2卷的180%左右；增加的比率稳定而有规律，与1、2、3三卷发行数的增加的比率大体近似。我们向例每一个读者来订，不论是新定户或旧定户续定，每次都给以一个新的定单。一卷有24期，但定户有定三个月12期的，所以每卷的定单总数，并不表示就是每卷的实际定户数，绝大部分的定户在半年中都占着两个定单号码，因之我

们在第1卷中，实际的定户在1600左右，第2卷的实际定户在2500左右，第3卷的实际定户为3300左右。第3卷因有华北航空版的发行，华北的定户大都径向北方方面定阅，不再直接向上海定阅，其间减少了一部分可能的定户数。

第3卷定户的地域以及职业分布我们援例统计制表如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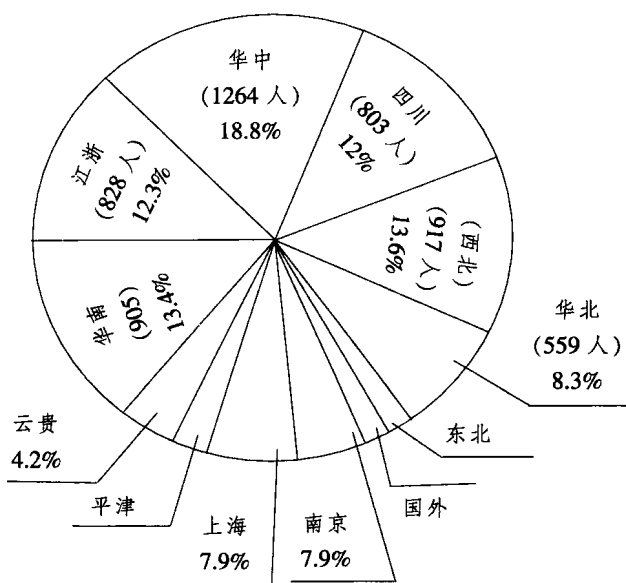
关于征求定户的工作我们实在没有尽力去做，没有主动地接下去争取。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人手太少，没有专人负责设计推广的责任。我们仅仅在每一卷完了以后，向本刊的读者呼吁一次，希望读者帮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过去两次呼吁的结果，成绩很好。由于最近物价的波动，我们现在益觉有增加定户的切迫需要。本外埠同业和我们来往的虽然很多，但总不免有拖欠货款或延期付款的情形发生。譬如有些同业，特别是本埠的同业，总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算一次账，而结账时还要给我们“期票”。以目前物价的波动，上一个月的法币价值和下一个月的法币价值，相距极大。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常吃亏：有时在账面上不赔，而在法币的实值上，等于赔了。这样做下去，我们的资金势必愈来愈小，而终有一天不易维持；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感到周转的困难。因此在本刊一方面，只有设法增加直接定户，才足以保障我们的财务基础。至于在读者方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定阅总比零购为便宜。既可避免按期零购之烦，又可避免中间书店所增加的一层负担。譬如以台湾来说，以零购八期的代价，至少可以订阅12期，定阅明明比零购为合算，为什么不直接向本社定阅呢？汇款即使麻烦，每半年或三个月也只麻烦一次。我们对于直接定户的刊物，向例提前付邮，比较当地书店早日到达。特大号对于定户并不加价，售价涨了定户也不受影响。本社自3月底起，又将出版丛书，所有本刊定户，一律可享八折优待。我们在此特别向广大的读者呼吁，未直接定阅的，希望赶快向本社直接定阅，已经定阅的，希望再帮我们介绍几个新的定户。本刊的定价，大体上总比别的刊物便宜，就是涨价也比别家涨得慢，这就因为本刊销得多，成本合得轻。所以一个刊物的销路大，刊物与读者两方面都是有利的。帮助本刊增加销路，也就是间接减低自身的负担。一件社会事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携手合作，大家合作于大家都有利，希望所有关切爱护本刊的朋友们，给我们帮助，自动的、出于本心的、尽可能的替我们多介绍几个新定户。

6732 名定户的职业分类



注：此项统计，系根据定单存根编制，故大部分定户职业，无法分类。

6732 名定户的地域分布



注：“华北”包括冀、鲁、晋、豫、绥、察、热等省。
 “西北”包括甘、陕、青、宁、新、康等省。
 “华中”包括湘、鄂、皖、赣四省。
 “华南”包括港、粤、闽、桂、台等地。

最近我们常常收到读者来信，建议我们接受读者捐款，以增加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对于这些热心的读者先生，心中不胜感激。但是

我们总不敢接受这个建议。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到底还没有到非向读者呼吁捐款的地步，一方面我们平时一贯的做人原则是要求公道。“公道”之一，就是权利与义务必须平衡。在读者，无条件的捐助我们，固然是出乎一片热心，但在我们，则不免受之有愧。我们凭什么白白地收读者先生们的捐款呢？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公道，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现在想起：一切愿意捐款帮助我们的朋友，与其用捐款的方式帮助我们，不如用介绍定户或赠送朋友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你们可以订阅几份，分送给你们的朋友亲戚，一方面我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定户数量，一方面你们的朋友又可因你们的赠送而读到本刊，同时也就扩大了本刊言论的影响。中国还没有赠送刊物给朋友的风气，而这风气在欧美早已十分盛行，并可作为过年、过节或庆贺生日喜庆的馈赠礼品。现在正是阴历年关，订阅本刊赠送朋友最合时宜。一切愿意支助我们的读者先生，请考虑我们的建议。我们需要更多的定户！我们需要更多的定户！

(五) 编辑检讨

关于编辑部分，在内容上，大体说来，第3卷要较第1、2两卷充实。假如拿第3卷和第1卷一比，印象就极明显：第1卷显得疏落，缺乏劲儿，第3卷似乎紧凑得多，味儿浓一点。虽然自3卷10期起，我们因故不得不将篇幅自24页减为20页，但自3卷1期起，我们即已一方面扩大版面，增加每页容纳的字数，特别是尽可能的多排六号字，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封面一页以外，自第2页至第20页，每一页都已充分利用，整整的19页都是文章，没有一点浪费的地方。所以，平均讲来，本刊所容纳的文字数量，要比其他页数相同的刊物所容纳的文字数量多出百分之十至三十。我们每期平均总刊载10篇左右文章，有时候登到13篇之多（读者投书不在内）。这种充分利用每一寸篇幅的结果，至少在数量上可以帮助刊物充实其内容。

专论部分是我们最感困难的一栏。说起来，每期3篇，一个月也只有12篇，但是每期在编辑时，常感捉襟见肘之苦。稿件的不宽裕，一方

面使编者不能就各篇的性质加以配搭，一方面多少影响专论栏的重量。我们自问还没有随便发稿填凑篇幅的行为。但是专论栏的不够结实，却是我们自己深深感觉到的。编刊物的工作，本来是一件“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工作，事实上，要期期精彩，篇篇精彩，也确是一件难事。但读者可以如此原谅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如此解释。我们应当再加努力，来增加专论栏的分量。

关于“观察通信”这一部分，成绩比1、2两卷为佳。在第3卷中，大体上，每期的“观察通信”都还站得住。其中有若干通信相当出色。1、3两期中的三篇有关魏德迈的通信，都包含若干特殊材料，特别3卷1期的第1篇，有许多都是根据原始材料——直接从魏德迈嘴里得来的材料写的。3卷7期的“刘伯承南下记”，博得广泛的重视和赞赏，3卷21期上的两篇沈阳通信和22期上的成都通信，也可算得好通信。而第3卷“观察通信”栏中最出色亦最受读者推崇的，当然要推本刊专稿关于战局分析的文字。我们希望本刊第4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3卷的标准，除了我们自己继续努力外，还希望全国读者源源惠稿，大家来充实本刊的内容。

国外通信第3卷远较第1、2两卷为充实。在24期中一共登了17篇国外通信，这个成绩不该算坏。除美、英、法三国本刊原有的通信网外，第3卷的通信网复伸展至印度的新德里和日本的东京。国外通信不若国内通信那样容易接洽，我们希望国外的朋友们继续帮忙。

外论选译这一卷只登了七篇，太少，希望自第4卷起，增加这方面的材料。根据第2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读者对于这一栏都有热烈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约定专人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

书评是第3卷开始的，在24期中登了16篇，也不算少了。

关于科学与文艺，第3卷比较第1、2两卷有显著的减少。这也是我们根据第2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而决定的。读者大都不欢迎本刊刊载科学文字。关于文艺，也有许多读者希望减少，主张由其他文艺刊物负这一部分的责任，认为《观察》应当多腾出篇幅来登政论的文章。因之我们在第3卷上，即很少刊载科学文字，文艺则不规定每一期都有。文艺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时我们乘此向读者表示：我们的确相当接受读者的意见，并见之于事实。

关于投稿的情形，我们也愿在此附带报告。一个言论刊物本来应该是为全国作者读者所共有的，我们极其诚恳的希望本刊能成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发表意见的园地。我们自问在取稿上并无成见，只要文章好，有分量，我们都登。这一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很多，尤其是观察通信。我们现在发表统计如下：

栏 别	第 3 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 论	72	17	25%
观察通信	80	39	50%
其他各栏	85	37	45%
共 计	127	93	40%

读者投书一栏本来是供给一般读者发表意见的，但发表的意见应与公共生活有关或有公共的意义者为限，纯然属于个人生活的诉苦，不在录取之列。提出的问题太限于地方性质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发表，因为投书很多，其间不得不有大小轻重之别。对于任何个人的批评，应以政治性质的批评为限，不应涉及法律性质的私人攻讦。最不能使我们同情的一种投书，就是不负责任的攻击任何机关或个人的投书，投书人既不署名，也无地址。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极其自私，极不公道。投书人如有必要，可以不署真名，但必须将真名及地址，让编者知道，投书人至少应对编者负责。这一点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接受。

(六) 政治危机

在第 2 卷报告书中，我们曾宣布：“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对本刊施用过任何压力或干涉”。三十六年 11 月初旬，我们第一次遭遇政治性的困难。毛病出在 3 卷 9 期编者所写的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上面。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物对于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反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观察》的发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会局曾以公函召本刊发行人于 11 月 7 日在社会局谈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秘书长于 10 月 27 日来访未遇，后来约期于 11 月 9 日谈了一次。两次的谈话都没有什么严重。除此以外，则未

有任何人（无论是否代表政府，代表国民党，或以朋友身份）和我们谈过有关《观察》的问题。正在社会局和市党部方面约我谈话的时候，听说中枢已有急电到沪，致吴国桢市长、方治主任委员、潘公展议长及吴开先局长四人，不主张查封本刊。这个案子似乎应该可以过去了，但11月11日的晚上，编者个人的安全发生困难。不得被迫暂时离开原来的寓所。

新闻界有许多朋友对于本刊极其关切，上海市党部要求查封本刊的消息最初是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们的。南京的急电，不主张查封本刊的消息，也是另一位新闻界朋友告诉我们的。11月7日，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首先揭露本刊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其后上海、香港、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报纸陆续记载此事。新闻报道引起各地前辈、朋友，以及读者的殷切的关怀。由于各方前辈朋友发乎内心的支持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使事件至11月下旬渐渐地缓和了下来。

在这一个风浪时期，本社同人始终照常工作；编者虽然暂时离开寓所，但工作并未中断，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环境纵有波折，我们的心境始终宁静。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他。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糟到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还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人与人的相交，经久知心；刊物与社会的相交，亦复如此。只要我们自问无他，我们亦不需战战地顾虑他人有无误会？仅仅站在一党一派的利益上来打击我们的，那只是一种过失；国事糜烂，已至于此，我们还有何暇来计较这种过失！

我们今日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神经极度衰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谣言、曲解和没有根据的忧虑。各地既遍传本刊被封的消息，而又看到本刊仍旧按期出版，于是以为其中必有“道理”。这情形可以香港读者梁子奇君投书中所引12月15日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

所刊的消息为代表。香港《华商报》的记载云：

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曾于9月25日出版的第9期上刊载了储氏所作的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痛骂美帝国的援华是要变中国为美国的附庸，顺便骂了南京政府。……南京当局在10月10日左右就下令封闭《观察》。此时储安平就以“失踪”闹，但是《观察》并未停刊，反出了一个“言论出版自由”的奇迹。奇迹的出现，是因为储安平“失踪”到陈立夫李惟果公馆里请罪悔过，表示改变言论态度的结果。CC们所以能允储安平悔过自新，是因为《观察》已拥有三万个读者，是全国第一流的杂志，CC们如不加利用，不是饭桶了吗？而储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读者中获得的“公正”态度，在《观察》上发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论，以赎前愆。……（按：本刊3卷9期的出版日为10月25日。要求封闭本刊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是南京的中央党部。要求封闭本刊当在11月初，不是10月10日左右。去年12月27日纽约《华侨日报》也刊有与香港《华商报》同样的记载，文句一样，大概是同一来源。）

在通常情理之下，假如编者真的到过陈立夫李惟果公馆去“请罪悔过”，假如本刊真的出卖给什么人了，我们还居然刊载梁子奇君的投函并一字不改的转载香港《华商报》的记载，那我们假如不是天下的大奸雄，亦必为天下的大傻瓜。可惜我们既然才不及奸雄，自问亦不致愚如傻瓜。编者和李惟果先生是在最近一年中新识的，编者和陈立夫先生，至少到今日为止，无论在私人酬应或公共集会上，还没有晤过一面。编者在那一个时期也没有去过南京。我们的一贯态度是我尽我心，不求人谅。打击来了，以宁静坚定应变，不以张皇失态应变。当11月11日夜晚11点多钟，我因为无处可住，要到某处寻觅一宿，踽踽独行，经过外滩江边，想到这地方白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何等热闹，而这时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个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构成一幅凄凉的人生画图时，我心中亦仍宁静雍容，既不悲伤，亦无忧虑。意外的风浪竟然使我得到

了一个意外的假期，利用难得的闲暇，整理学校的讲稿，写信和朋友叙旧，并获得机会在太阳中作时间较长的沐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也不急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刊物幸能继续存在，但许多人又说我们的态度已经“转变”了；这也是目前这个神经衰弱的社会中极易发生的心理状态。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整个的社会已陷入一种严重的神经错乱程度。譬如本刊第2卷第21期登了读者杨光时君等十位投来的一篇文章后，许多人便传说《观察》右倾了。这次查封之说既成过去，便有人以为《观察》转变了！我们对于这一切传说，素不作任何辩护，我们认为最好的解释与辩护就是每期《观察》的内容。举一例言之，当我们业已知道本刊已发生政治危机时，我们对于北平周炳琳等48位教授寄来的关于民盟事件的宣言及董时进先生投来的对于民盟事件的评论，毫不犹豫的照常发稿，在心中绝无任何有关利害得失的考虑。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煽我们，我们不会被人煽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其方向。

我们认为我们在第3卷中所遇的风浪是一个极寻常的风浪；大的风浪也许还在后面。我们在此感谢一切在此次风浪中，无论是出面的或不

出面的前辈和朋友，他们的支持使本刊终得解危。我们同时感谢一切关切本刊的读者，他们的热心和同情增加我们努力的勇气！一切帮助本刊的朋友们，我愿我们的努力不致辜负你们的期待！

三十七年2月1日 上海

(原载《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出版)

十、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分子，群策群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

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而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则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髓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于消灭，尤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言英国，丘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丘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诋，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丘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拖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个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就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的想想，你们过去所作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作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谓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今日政府又是一个建设性的政府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点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实行吗？我们一贯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3卷13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一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有日矣，政府果曾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福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民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缔一切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效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

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原载《观察》第4卷第12期，1948年7月17日出版）

十一、吃重·苦斗·尽心

——《观察》第4卷报告书

我们在一种既无幻想、亦不泄气的情境下宣布：《观察》第4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5卷第1期定8月28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个苦痛的半年。物价的高压，带有政治意味的中伤，以及当前政治环境的险恶，无不使我们在这半年中，身心交瘁，困惫不堪。然而我们在无比的忍耐和沉毅中，终于又苦斗了半年。照大势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写《观察》第5卷的卷终报告书，但是我们愿意向读者保证：只要本刊存在一天，我们必定努力一天。

(一)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我们在第3卷报告书中，已经盛言物价波动和币值贬落的情形，可是在第4卷中所遭遇的困难，远较第3卷为甚。在第3卷的6个月中，支出方面，排印工及订工仅上涨300%，稿费上涨300%，员工薪金增加700%，占支出中最大比例的纸，亦仅涨700%，收入方面，售价上涨率为330%。在第4卷中，情形大大不同，在第4卷的六个月中，各种支出，增加的比例，要较第3卷的六个月中所增加的比例，大上六七倍。现将各项数字列表于下：

种类	4卷1期时	4卷24期时	上涨百分比(约数)
纸(每令)	250万	4200万	1600%
五号字排工(千字)	20万	450万	2200%
六号字排工(千字)	23万	530万	2300%
印工(每令)	42万	950万	2200%
订工(每本)	308元	8000元	2600%
稿费(千字)	20万	400万元	2000%
员工薪津	5000余万(2月份)	14亿(7月份)	2800%

上列开支，排印工及订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内一律上涨 2200% 以上（即 22 倍）。纸的上涨虽然仅达 1600%（16 倍），但由于发行数的上升，纸在整个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来愈高，目前纸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 65% 左右，所以纸价的上跳，我们感受的压迫极大。稿费的调整，上涨率为 2000%（20 倍）。员工薪金的增加，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调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员的增加：业务既繁，人手势须比例增添，所以薪工的总开支也跟着增加。至于其他杂项开支，如水、电、电话、煤气、房金、文具、车费等，上涨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平均当在 2000% 以上。

(二) 销 路

本刊的售价，4 卷 1 期是 15000 元，24 期是 20 万元，上涨的百分比是 1300% 强。本刊是一个民营刊物，平时全赖业务收入。但是开支在半年中上涨 20 倍，而售价仅上涨 13 倍，这个差额，就靠由于发行数急剧上升所增加的利润来弥补。本刊的发行数，第 1 卷平均为 8000 份，第 2 卷 16000 份，第 3 卷 24000 份，照过去 3 卷的比例，第 4 卷的理想发行数应为 32000 份。但是刊物的发行数越大，它的上升的可能比率越小，加之售价一再调整，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敢希冀第 4 卷的发行数能够超过 3 万份。当 4 卷 1 期印 24000 份时，我们心中，以为假如在第 4 卷中，万一能够销到 3 万份，那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在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形下，

本刊的发行数急剧上升，终于造成5万份的纪录。但是至少在编者自己，对于这种销数急剧增加的情形是没有什么兴奋的；相反地，销路的急剧上升，只有增加我们的不安。我们平时一向愿意“向最好的目标去努力，向最坏的结果去着想”。我们愿意事业循序发展，不愿意一步跨得太快。至少上海的许多书报业同业可以证明，我们曾一再要求他们减少批数，因为我们并不愿意销路跳得这样快。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事业，我们应当求根基的牢固，不应当仅求表面的膨胀。爬得快的人跌得也快，膨胀得快的事业垮得也快。也许编者这种性格太“保守”了，但是对于一个务实重行的人，过分意外的膨胀，确不是他心理上所能骤然接受的。同时，销路的增加也增加了编者所担负的担子，而这种担子，事实上已超过了他能负担的能力！销路越是增加，编者发稿的斤量越重，他深感每一篇文章，每一句句，发到印刷所去，无形中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摆在编者面前的情形，常常使他深夜自省：他已经不适宜做这样一个5万份刊物的主编，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已经跟不上刊物的发展了。他常常在脑子里思索，有没有什么适当的人可以来主持这个刊物，他愿意做一个助手。这绝不是夸大的谦虚，编者的确常常为此惭愧，他觉得他已力竭智拙，有些对不住这个刊物。

从另外一点来说，一般朋友都认为这个刊物确已打进了社会。本刊的主要读者约可分为三类：即青年学生（包括教育界人士）、公务员（包括军人）以及工商界人士，除这向来有的三种主要读者以外，这个刊物的影响已向多方面放射出去。政府高级官员的阅读本刊，已极普遍。我们并不是说，政府高级官员阅读本刊，足以增加本刊的身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讲到后来，本刊究竟是一个政治性的刊物，本刊应当打进他们的阅读生活。军人方面看本刊的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要在本刊原有的三大类主要读者以外，成为另外独立的一类了。广大职业群众，这些群众平时甚至可说没有任何阅读习惯的，现亦接受本刊的影响。湖北沙市的一个香烟摊贩曾有读者投书寄来（未刊），台湾一个农夫，受了当地党政人员的压迫，也有投书寄来（未刊），南京一个印刷所排字工人也有文章寄来（刊4卷19期），我们在上海亲自知道的，确有许多平时根本没有阅读习惯的群众，现在也要每星期买一本《观察》看看。去夏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招生，公民试题有《试评日常所阅读的日报及

刊物》一题，绝大多数的投考中学生都阅读《观察》。我们两年来夜以继日的努力，总算收到了一点小小的效果，但是树高招风，影响越大，招的忌讳也就越大，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回到发行数上说，目前虽然销到 5 万份，但是由于航空邮资的一涨再涨，以及售价的期期提高，我们相信第 5 卷的本刊（假如不被查封的话），发行数是一定要下降的。在我们自己，我们希望回跌到 3 万份左右，假如我们能够稳定在 3 万份左右，我们就已经很满意的了。究竟如何，且看事实。现在将这半年来本刊各期印数附刊如下：

第 2 卷	23 期	再版	860 份
第 3 卷	第 1 期	再版	1200 份
	第 4 期	再版	750 份
	第 6 期	再版	1100 份
	第 7 期	再版	1100 份
	第 10 期	再版	1100 份
第 4 卷	第 1 期	初版	24000 份
		再版	1500 份
	第 2 期	初版	25000 份
		再版	1000 份
		3 版	1500 份
	第 3 期	初版	27000 份
	第 4 期		27000 份
	第 5 期		28000 份
	第 6 期		30000 份
	第 7 期		30000 份
再版		1000 份	
		31000 份	
第 8 期	再版	1000 份	
		32000 份	
第 9 期	再版	1000 份	
		34000 份	
第 10 期	再版	1500 份	

第 11 期	35000 份
第 12 期	36000 份
第 13 期	40500 份
第 14 期	41500 份
再版	1500 份
第 15 期	44500 份
第 16 期	45000 份
第 17 期	46000 份
第 18 期	48000 份
第 19 期	48000 份
第 20 期	50000 份
第 21 期	50000 份
第 22 期	50000 份
第 23、24 期	50000 份

(三) 定 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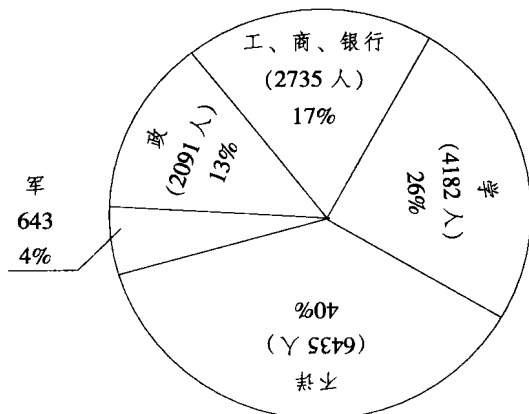
在第 4 卷中，定户也增加得很多。我们过去十分希望我们能实实在在有 6000 个甚或 8000 个定户，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定户和我们所希望的数目相差很多。第 1 卷中的实际定户约为 1600 名，第 2 卷约为 2500 名，第 3 卷约为 3300 名。我们在第 3 卷卷终征求定户的目标是 8000 名，由于许多读者的热烈支持，这个目标终得在第 4 卷中实现。在没有举办半价定户以前，定户数已接近 7500 名，半价定户举办后，定户的名额骤然增加了 1500 多定户，达到了 9000 名左右的纪录。在整个的发行数目中，定户数目在全部发行数中所占的比率，大体上亦甚稳定，兹列表如下：

卷数	定单号码	定单数目	实际定户	发行数	定户数在发行数中有百分比
1 卷	1—2709	2709	1600 左右	8000 份	20%
2 卷	2710—7682	4973	2500 左右	16000 份	15.6%
3 卷	7683—14414	6732	3300 左右	24000 份	14.7%
4 卷	14415—28946	16086	9000 左右	50000 份	16%
半价本	1—1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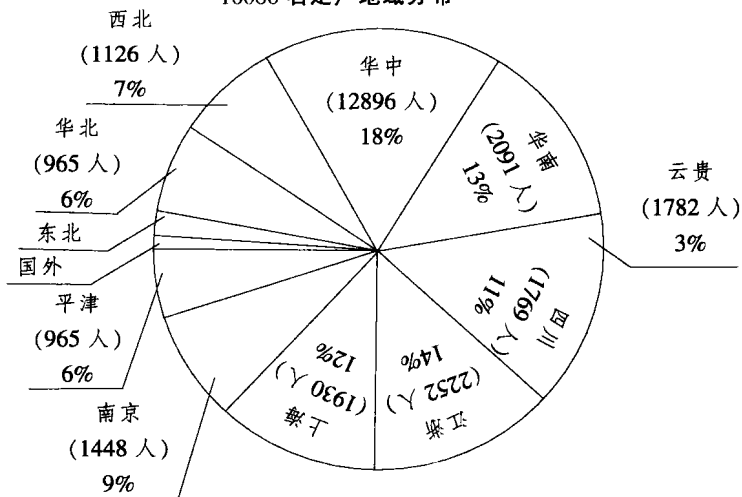
关于定户部分，这半年中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停收六个月的定户，一件是举办半价定户。停收六个月的定户，完全是因为物价波动得太厉害，为保障本刊的健康，不得不如此。举例言之，当4卷1期未出时，预定六个月仅收20万元，但现在一期就要售20万元，读者可以想见，假如我们再继续接受六个月的定户，则本刊不知要赔累到什么地步，实际上，照最近物价这个样子的波动，我们连预定三个月都有些踌躇，不过为顾到读者的方便，不好意思再将三个月一定改为二个月一定罢了。（最近日报已决定半个月一定，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足见物价压力之深。）不过自4卷18期起，我们已将过去“12期收10期的钱”改为“12期收12期的钱”，借以略略弥补由于物价波动太烈而致蒙受的损失。凡此都是很不得已的，只好请定户原谅。

我们久想为清寒读者有一点服务，所以决计在福利金项下拨一部分款子出来举办“半价定户”。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半价定户自4卷13期起举办。我们原定名额1000名，但事实上，超过了预定名额百分之五十，共计1500余名。“半价定户”，我们的本意是为清寒读者所设的，我们并希望以三分之一给予清寒的学生，三分之一给予清寒的公务员（包括军人在内），另以三分之一给后方小城市中的读者，但事实上很难做硬性的分配，而且，这1500名的半价定户中，是否个个都是“清寒”的读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只好在增设半价定户的启事中，最后一条提出良心的呼吁，希望“如非经济极端困难者，幸勿占取‘半价定户’名额，以免剥夺真正经济困难的读者的权利。”但是“良心呼吁”在这个年头，到底有多少效果，实可怀疑。譬如上海一些商业公司里的职员，也来定“半价本”，照普通情形来说，以上海生活程度之高，又在商界供职，论理可以订阅普通本，不必订阅半价本。又如同济

16086 名定户职业分类



16086 名定户地域分布



大学有一个寝室里倒有四个人来订阅四份“半价本”。照我们的意见，假如他们经济宽裕，便应各定普通本，假如经济困难，便应四人合定一份半价本。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便宜货便大家掘括，既不尊重举办人的原意，也不顾到是否剥夺了他人的权利。这种情形都使我们伤心。此外，定阅“半价本”的，上海因为近水楼台，容易捷脚先登，所以这次的半价定户中，上海及上海附近的读者，占绝大多数。真正后方偏僻角落里的读者，能享受“半价本”权利的，反而寥寥。我们心为不平。我们现在决定，自第5卷起，仍旧继续举办“半价定户”

1500名（额满截止，不再通融）。但为保障真正清寒读者的权利起

见，过去那种自由写信来定，没有一点限制的办法，势须修正。我们现在业已印就一种表格，凡是清寒的读者，希望享受“半价定户”的权利的，请先来函索取表格，填就寄下，由我们审查，通过后才给予订阅“半价本”的权利。这个新办法当然增加我们自己很多的麻烦，并亦增加我们的开支（如表格，复信，审查的人工等），但我们举办“半价定户”的目标既在使真正清寒的读者得到阅读的权利，所以我们亦不避麻烦，务使订阅半价本的读者，都是真正清寒的读者；同时使我们为真正清寒读者服务的初衷，亦得贯彻。

（四）观察丛书

《观察丛书》虽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观察丛书》和《观察》周刊是配搭平行的，成为本社目前两大主要业务，并为一般读者共同关切，所以在此略作报告。我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周刊只能刊载短文，并且大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我们另出丛书，以便容纳较有系统，字数亦较多的著作。（二）有许多作者，有著作物出版，而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出版人。所谓合适的出版人，包括水准严谨，出书迅速，印校认真，版税正确等等条件。由于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和各方作家的合作，他们对于我们业已建树良好的友谊和充分的信任，所以我们愿意来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现在一般出版界都很消沉，大家都很少出书，《观察》周刊略有赢余，我们的目的既然不在谋利，愿意以周刊的赢余来帮助丛书的出版，使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并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已出九种，大体说来，各方对于我们的努力，批评良好。各位作者对于我们的出书迅速，印校认真，以及版税的迅速，一致表示满意；读者的反应可于各书预约之多及销行之畅见之。吴恩裕先生的《唯物史观精义》在10天之内销完初版3000册，现已出到四版。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载誉一时，现已出到四版。张东荪先生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一个月以内销完初再两版5000册，现已三版。其余各书大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再版。这些情形在目前的不景气的出

版界中，都算是不多见的。

不过，《观察丛书》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新写的太少，大部分都是集子。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困难，由于环境的动荡和生活的不安，已很少人能够好好地坐下来写整部头的新书了，这也是一时之间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我们以后当尽力设法增加新写的数量。

此外，还有几件事要一提的：（一）通常出版人和著作人所签订的出版契约，都是由出版人一方面拟就印好的，开列了几十条，把保护出版人的利益的地方，想得周周到到，而著作人只有在印好的契约上签字盖章，毫无发言的余地，甚至契约签了，书隔了两年三年不出版，著作人也毫无办法。我们认为这种情形是不合理的。出版一本书，乃是著作人和出版人的一种合作，对于契约，应当双方都有发言机会，所以我们这次的契约，是由我们先起了草，寄张东荪、潘光旦、朱自清、费孝通四位先生，请他们发表意见（就请他们四位代表后来的作者），然后才缮写签字的。（二）我们的版税最初规定是一年结算四次的，于3、6、9、12四个月月底结算之。第一批六册是4月5月出版的，第二批是7月8月出版的。在通常情形下，第一批六册的第一次版税一定是在6月底付的，第二批四册的第一次版税是在9月底付的，但第一批六册的版税，我们在3月底就付了，第二批四册在7月里就付了，原因是因为各书发行预约，预约收入中的百分之十五应归作者所有，应归作者所有的，出版人不应搁下不发。在目下物价的情形下，假如应当3月底付的款子搁到6月底再发，那作者真是损失太大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信用及公道的问题，我们办事或做人，都应当Fair。（三）不仅如此，关于版税的结算，我们鉴于6、7两个月中物价上跳的情形，认为三个月一结还是太慢，作者吃的亏还得太大，因之，在7月底我们又进一步的，又一次为中国出版界创一个新的纪录，决定自8月份起，《观察丛书》的版税每月结算一次。我们希望我们这种努力能够对于中国的出版界有一点影响。（四）《观察丛书》出版后，我们收到许多书评，投寄《观察》周刊。但我们为避免嫌疑起见，我们已订下一个原则：《观察》周刊不刊观察社出版的任何书籍的书评。以上数事，都与整个出版界的风气有关，所以我们愿意提出报告。

最后，《观察丛书》是赔本的，即使销路如此好，也还是赔的（因

为纸价跳得太快了)。但是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关于丛书的出版，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只是照目前的物价情形，我们简直不敢再在此地有所报告，举例言之，我们出版何永佶先生的这本《中国在戩盘上》，成本要用到 25 亿以上！事情真不好办！真是太难办了！

(五) 业务上的苦痛

业务上的苦痛，一言难尽，现在择要分述如下：

1. 照编者两年来的经验，纯粹就业务的观点说，上海出版事业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本地同业的结账办法。上海本地的习惯，是先将刊物或书拿去，隔若干时候再结账付款，在半年以前，我们要在出版以后一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才收到钱。假如物价

不跳，出入还小，现在物价波动得这样厉害，这种结账办法，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存威胁了。举例言之，今年阴历年关一过，纸价陡然的从一百七八十万（一令）跳例 500 万一令，在短短半个月中上涨三倍；6 月里，纸价又在短短半个月中，从 600 万跳到近 2000 万；7 月初，又接连从 2000 万跳到 4000 万。物价这样一日三涨，要在十几天后才收到货款，在收到货款时，一块钱只值半块钱甚至只值三角钱了，所以在 2 月及 6 月的两次纸价大涨风中，本刊亏折很多。有一次《大公报》举办出版事业座谈会，文摘社的贾开基先生说：现在销路越大的刊物其危机越大，碰上涨风，赔得越多。这是内行的话，一点不假。在读者方面，他们都是按照刊物定价实付的，在我们的账面上，也是有利润的，但是实际上则赔了本，就因为在十几天后才能收到货款，那时物价已涨了很多，收到的钱甚至补不进原来用去的纸张，以致不能维持再生产的程度。假如一直这样下去，刊物迟早要弄到关门的。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费尽口舌，力求改善。上海同业事实上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们也十分了解，所以我们愿意和他们一步一步改善，我们总期我们能够维持再生产的最低要求，因为假如这个最低要求不能达到，出版事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2. 这半年来业务上第二件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有许多地方的定户，收不到刊物。最大的原因就是有许多地方已有出面或不出面的邮政检查制度，经济的或间或的检扣本刊。这种现象很普遍，其中以沈阳、天津、青岛、西安等地情形最严重。这些地方的定户纷纷来函责难，并要求补寄，但补寄的事实上仍旧不能收到。弄到后来在我们方面是复不胜数，补不胜补，在定户方面是责难四起，一片怨声。我们真是苦痛极了。除了“邮检”的原因以外，也有由于中途遗失或者被人误取，因而使定户不能收到本刊的。在读者方面，他们的观点很单纯，认为凡是收不到刊物，好像责任就得由我们来负。又有些地方，竟会两期同日收到，甚至先收到下一期，后收到上一期的，在这种情形下，读者总疑心是我们没有准期出版。在9000份的定户管理中，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绝无错误或疏忽，假如真是由于我们的错误或疏忽，我们应该向定户道歉，并力求改善，但是假如把一切收不到，或者不能按合理的时间收到的责任都归之于本社，那是冤枉的。从本社发出到到达定户手里，其中要经过许多路程和阶段，在这些路程和阶段中所发生的意外，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这样解释，目的非在推诿责任，我们仅仅希望定户能够了解事实并给予我们体谅。至于我们有错误或疏忽的地方，我们自当随时改正。

3. 定户的来信始终成为本社工作同人最大的负担。来信的内容很杂，最主要的两类就是查失索补和更改地址。刊物遗失的责任不完全在我们一方面，前已言之，但是除了像沈阳、天津、青岛、西安那种大批邮扣，无法补寄以外，其余零星的索补函件，我们大都体谅定户，设法补寄。不过我们愿意在此说明，关于补刊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苦恼的。不补吧，定户自然不满，而且他们残缺一期，定觉遗憾，补吧，不仅是刊物本身的成本，还要包括信袋和邮资，我们的损失是很重的。这个问题真是无法两全。

至于更改地址，我们当然应该照办。不过我们也要解释几句：一、我们每收到一个定户，就要给他一张定单，同时根据定单用蜡纸写成签条，然后油印。所以定户更改地址，我们必须重行写印，所需的人工、蜡纸、油墨、纸张，这笔额外的负担不轻。二、我们每次寄刊，虽于星期五付邮，但是由于定户太多，剪贴标签的工作，在星期一，甚至在上星期六，即须开始，标签剪下以后，即按平寄、挂号、航平、航挂四种

分类，分类以后，要在几千个份数的标签中寻觅一个，就不容易了。所以，举例言之，即使在星期三收到一个定户的来信，要求更改地址，在这个订户自己，以为本星期六的一期必可按照新地址改寄，而事实上，我们要到下星期出版的一期，才能照改。定户不知实际困难，每多来函责难。三、有些定户，在订阅三个月中，要更改地址二次甚或三次的，我们虽然应当照办，但是对于我们确是一重负担。（譬如在7月，由于学校放假了，平均每天都有20个至30个定户来函更改地址。）四、目下交通情形并不正常，刊物的改寄和定户本人的移动，有时不免要脱节，这种情形也只好请定户忍耐原谅，不要一味的责怪我们。

4. “复信问题”是最难使读者满意的一个问题。许多读者为了此事对本社表示不满，或者因为我们搁而不复，或者因为我们复得太迟。我们愿意说明几点：一、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复信工作没有做好。编者自己是最恨有信不复的，所以平时一再叮嘱本社同人：读者来函，务必答复。工作同人当然有他们实际上的困难，如来信太多，来不及复等。但是事实上有困难，应当设法解决困难，这是本社内务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内部的困难就将读者的来信搁置不复，（实在没有复的必要的信可以不复）因为假如复信工作做得不好，则无形中就等于在破坏本社的信誉，减低读者对于本社的信任，并抵消本社全体同人在其他方面的努力。所以我们从第5卷起，决定将复信工作，另派专人负责，以免延误。二、来信的太多，其中一部分责任仍应由我们负责，因为假如我们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效率，如减少错误，避免疏忽，复信迅速等等，则亦可减少来信的数目，所以我们仍应在根本寻觅原因，以期减少来信的数量。（因为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查询或质问的。）三、我们虽然尽我们的本分，力求改进，但同时也希望读者和我们合作，有许多信件可以不写的，最好不写，俾可节省双方的时间，现举两例说明：芜湖安徽学院有一位朱建纲先生，3月24日来函查询4卷4期为何没有收到（他是挂号的）。查4卷4期是3月20日出版的，在目前的环境下，上海到芜湖的邮件，偶而不能在四天之内到达，也是一件很可能的事情（挂号本比平寄慢），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希望定户稍为等待一下，勿径函查询。（像这种信件，我们认为可以不复的。）又如，广州中山大学有一位定户，是新定户，当他看到广州市上已有《观察》出售，而他的一期尚未收到，便来信质

问，实贝则州市上出售的是航空寄去的，而他的一份是注明要挂号寄的，挂号的当然比航寄的慢。像这类自己没有弄清楚而即来信责难的，例子很多。至于因不注明定单或字迹潦草到无法认清，以致我们无法查或无法复的信件，为数尤多，凡此我们都希望定户体谅，能自行注意，俾间接增加我们的办事效率。四、我们虽然对于复信问题，力求改进，但我们也愿让读者知道，我们复一封复信，成本也是相当大的，平均言之，复一封信至少要花成本15万元左右。假如以7月份为标准，一个职员的月薪是1亿，则每天的薪金是330万，一天平均复40封信（因为不仅复，还要查），则每封信的人工成本就要8万元，再加上信封、信纸、邮资及收发人工，当在15万元以上。这样的负担也不算轻了！

5. 最后我们自己也知道，在最近三四个月中，我们得罪了不少读者，这是我们极其苦痛，而又无法可想的。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过度的波动，几乎使我们无法维持正常的营业，特别是购买丛书的，款到时，书价又涨了。假如买二本以上的，还可以以书款迁就书价，譬如本购五册的，给他买四册，本购四册的，给他买三册，购者虽然扫兴，但总算有一交代，最困难的是只购一册的，于是只好去函请其补款，可是购者并不立刻将款补来，搁上10天半月才补，补到时，书价又涨了！像这类情形，真是伤透脑筋。定户也是如此，由于物价变动太剧，本社登记定户，计算刊费，均照款到时订费为准，但由于定价变动太快，以致定户来款，常常不足，只好酌扣寄刊，读者每不了解，表示不满。

（六）编辑检讨

关于编辑部分，这半年也是苦痛之至。先说专论。按理说，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重心应当在专论部分。可是事实上呢，本刊的重心现在已移到“观察通信”上面去了。读者来信或朋友见面，都盛称观察通信的精彩，但是我们读了这种信，听到这种话，内心暗自惭愧。当然，我也愿意很公平地说：专论不像“观察通信”那样容易“讨好”读者，因为通信是雅俗共赏的，专论是硬性的，高级的，不容易使个个读者接受的。不过，本刊专论的不够充实，也是事实。一个原因是好文章本不易

多得，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大家对于写政论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编者在4卷20期《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所说，现在大家都十分消沉，没有兴趣批评政府，这话确是：实际情形。像我们这些办刊物的人，因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写，但是一般而论，现在许多人对于当前的局面，都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张东荪先生最近在《增产与革命》一文中开头有几句话，很可代表这一种趋向。张先生认为“时局严重已超过了说话的阶段”，而“向现实的当局说话”，则“自政协被破坏以后久已不做此想”。这一种趋向也多少影响到稿件来源。编者自然应当尽心尽力，广征佳稿，但是有无成就，不敢先说。

第4卷中比较满意的仍推“观察通信”一栏。编者在第3卷报告书中说：“我们希望第4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3卷的标准。”大体说来，这点算是做到的。观察通信中最出色的当然是军事通信，也就是这些军事通信，使政府一再对《观察》表示不满，而企图加以封闭。据在政府供职的人说，为什么《观察》的军事通信写得那样好，又详细，又正确？他们说，假如《观察》的军事通信写得不那样正确，政府倒可以不必那样怀疑了！这个逻辑似乎是：政府认为一般社会上的人都是饭桶，只有共产党不是饭桶，所以《观察》的军事通信因为写得太好了，就不免要疑心到共产党一方面去了。其实真是天晓得！过去《观察》有几期军事通信对傅作义稍有颂扬时，左派的记者（《时代日报》）还公开的不负责任的说，说《观察》是傅作义的宣传机关呢。此话真是从何说起！

除“观察通信”外，第4卷中的“国外通信”和“外论选译”两栏，还算正常。国外通信在24期中登了16篇，平均每三期中有两篇。“外论选译”在24期中登了13篇，平均每二期中有一篇。我们希望第5卷中也能保持这个状态。

一般读者对于“书评”一栏的兴趣都不高，本卷24期中只登了六篇。

由于物价的高压，自4卷19期起，篇幅减少，仅出16面。减少篇幅的目的是为了不愿增加读者的负担，但是在编辑上，对此苦痛不堪，因为篇幅减少了，容纳的字数比例减少，文章不能多登，无形中使读者容易发生内容不够充实的感觉。有许多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愿意多负担售价，不愿我们减少篇幅。但是来信的读者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读者，不知后方的读者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如何？第5卷起，究竟恢复20面或仍出

16 面，我们希望读者表示意见，以供我们参考。

关于投稿录用篇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体上和第 3 卷差不多。我们愿意在此说明，《观察》的篇幅是绝对公开的，我们十分希望这个刊物能够真正成为全国读者所共有的刊物。我们不希望一个刊物仅仅只有少数的作者在写稿，而且为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公共舆论，也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大家来参加，才能增加其力量，因之我们经常盼望有新的作者来参加这个写作的阵营。我们对于投稿，认真阅读，取舍绝无偏私，只要合乎水准的有重量的文章，我们无不乐于刊载。我们希望各地作者读者踊跃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内容，第 4 卷中投稿录用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的百分比，现在统计如下：

栏 别	第 3 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论	62	18	30%
观察通信	76	29	40%
其他各栏	90	41	45%
共计	228	88	40%

(七) 流言与警告

在政治上，这半年来我们始终蒙受不利的打击；大别言之，可分两类。一类是飘浮在空中的无根的流言，一类是当局对于本刊的警告，甚至有查封本刊的意图。先说谣言部分。谣言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笼统的怀疑我们和当局有什么“勾结”，一类则简直很具体的传说本刊已出卖给什么人什么人了。怀疑我们和政府有“勾结”的人的理由是：假如《观察》和政府当局没有“勾结”，为什么《观察》会出版到现在？特别是 4 月 8 日《大公报》登了《时与文》和《世界知识》被政府警告以后，这种怀疑格外普遍。因为《观察》不仅没有“问题”，甚至警告也没有，其中必有“花样”。其后我们又听到更为具体的谣言。谣言竟然肯定地说，说《观察》已经出卖给 CC 了。凡是一种谣言，向例当事人是不大容易听到，或者听到时也已是谣传很久了，因为只有很好的朋友才愿意将这种谣言告诉当事人。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流言时，也只是淡然一

笑，其后传说渐盛，有一位关切本刊的读者写了这样一封信来：

编者先生：最近好多人都纷纷地说《观察》月前曾经与 CC 派谈判过出顶事宜，结果以 CC 只肯出价 60 亿而未果。我倒不相信这些话，我只相信你的人格和脾气，但是，为了正如你所说过的“这社会是一个神经极度衰弱的社会”，而且人言可畏，我劝你不要太对这种已经散布得颇广的恶意流言不理不睬。最好你能在 4 卷 13 期中拿一小角来辟谣。

PS 记着，一定要辟谣啊！

一高中学生

5 月 17 日

我们读后，对于这位“高中学生”当然是很感激的，但是冷静考虑后，我们仍旧不愿有所表示。其后又有朋友自南京来函，文云：

久不晤教，近况何似，念念。近日道路流言，于先生颇为不利，金言贵刊因已得官价配纸，态度渐趋转变。先生之清操亮节，弟所深知，然啧啧烦言，三人成虎亦不免于惶惑矣。弟于此事，至为关切，盼能以详情见示，用释鄙怀，忝在知交，当不以为渎也。

谣言是哪一方面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也无意知道，假如是由配纸而起，则 4 月 26 日苏联方面在沪主办的《时代日报》的出版消息有下列一段记载：

《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日前赴京列席国大，已于昨日返沪。闻该刊自下月起，新增配纸 180 令，合共 300 令，故将在百物飞涨时维持旧价云。

编者曾在 4 月 24 日出版的 4 卷 9 期上写过一篇《国大评论》。编者为了想评论国大，曾去南京，借了朋友的来宾证，到国大会场旁听一次。就是中共办的《华商报》，也常刊南京通讯，所以到南京去采访新闻，想

来不致被视为和政府有何勾结。编者在《国大评论》文中曾述及我曾到国大会场旁听过的话，故《时代日报》所刊编者赴京一节，仍系根据编者《国大评论》一文而来。但在普通常识上，旁听与“列席”有很大的分别，《时代日报》称我为“列席”，究系笔误，还是另有意昧，我弄不清楚。至于配纸，众所周知，都是每季一配，向无每月一配之事。这半年来，我们向书业公会提过好几次抗议，就是6月25日，我们还去了一封信，说我们在4、5、6三个月中用了1100令纸（周刊及丛书），而他们仍给我们300美元配额，只够买六七十令，仅敷本社实际需要量的十六分之一。说到头来，自有配纸制度以后，截止今日为止，我们一共还只拿到130令纸（仅敷本刊半月之需）。假如《时代日报》该项记载，是一种恶意的中伤，那末我们承认，他们的确相当成功了，因为文化界中到处都在传说，说“《观察》配纸增加了，态度转变了”。最妙的是，天津《益世报》的上海记者，把《时代日报》这个全无根据的消息，全文照抄，打了一个电报到天津。我们曾分别正式去函《时代日报》及天津《益世报》更正，除此之外，我们无意作任何辟谣的解释。我们还是一贯态度，如我们在第3卷报告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不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根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关于政府方面对于本刊的种种，编者不十分详细，兹谨就所知者，报告如下。3月20日，编者接上海市府新闻处来函，邀去一谈，当在上海市府新闻处看到了内政部给《观察》的警告，罪状是“言论偏激，歪曲事实，为匪张目”。这个公文是我亲眼看到的，不过有一个谜始终不能解答，即这个公文我们始终没有收到。当4月8日《大公报》载《时与文》和《世界知识》受到警告时，我们心中还暗自疑心，以为新闻登错了呢，因为内政部警告本刊的公文，是编者亲眼目睹的。不过我们后来也没有去查理此事。由于最近传说政府打算查封《观察》，我们才知道在2、3月间，有人已想查封本刊，但内政部未将查封令发出，可能这就是那个警告令的来历。目前政府对于《观察》最伤脑筋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军事通信，据说在最近半年，政府中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几次讨论到这个问题。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极其严重。我们的军事通信实际上也只是报道事实，但事实的发展，常与政府不利，所以政府认为我们这

种暴露性的文字，颇足影响士气。最近南京《新民报》被封，政府曾公布一篇罪状，据传《观察》也有同样的一张单子，把过去我们所刊的文字，一一开列。对于封不封的问题，编者已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表明态度，此处不赘。政府对于《观察》当然是讨厌的，也许从“军事通信”开刀，在技术上最为顺口。不过目前所有的刊物，大都刊有有关战局通信，假如因为刊载有关战局的通信而要查封，则恐怕将来所有的刊物，都只好被封大吉。我们不知政府对于这种情形，即每一个刊物都有战局通信这一情形，如何处理。至于本刊，这半年来，有人好几次劝我们不刊战事通信。我们的原则很简单：封或不封，那是政府的“权力”，但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 Nonparty 和 Independent 两字，Independent（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

1948年8月1日

（原载《观察》第4卷第23、24期合刊，1948年8月7日出版）

十二、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 任务·编辑方针

1946年元月，我们一些朋友在渝倡议发刊《观察》，以人民身份，论议国事，期对国家，有所荃献。经过八个月的筹备，于同年9月1日，在沪创刊。其后历经为公众知悉或不知悉的艰辛颠困，于1948年12月24日出至第5卷第18期时，终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刊物被封，同人被捕，资财损失，社务解体。上海解放以后，在各方的鼓励指导之下，本刊决定复刊，现自11月1日起，继续出版；并为顾到各种实际情形，暂时改为半月出版一期。在本刊停刊的10个月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空前的伟大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化，为人民多年切恨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之下，终被击垮，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建国的政治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在这个伟大的历史革命中，社会上的一切都跟着时代向前发展。复刊后的《观察》从解放前的《观察》中发展来，成为一个新的《观察》。我们谨于复刊之初，一述我们在这个时代洪流中的新的转变，以及今后的工作方针，借求全国读者的指正。

（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

我们倡议发刊《观察》，正在日寇投降之后，旧政协召开之日。蒋介石窃国当权，前后垂20年，20年专政的结果，民生日敝，国运日蹙。

日寇既告战败，正是中国翻身的千载良机；毛主席赴渝商谈，尤为国运黯淡中最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筹出《观察》，是想稍尽人民责任，加强民主力量，督促国家建设。无如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强作乱，撕毁政协，迫害民主。他只顾他一己的权势，无视国家的前途；纵容他的皇亲国舅，家奴党棍，到处搜刮，吸吮民脂，对于人民苦痛，漠无所动。还要昧尽天良，舔着美帝的屁股，残杀本国的人民，使人切齿痛恨。忧国之士，目击这种腐败黑暗的反动统治，迫于义愤，誓难缄默。自从本刊创刊以来，我们始终以人民的身份，一本正义，满怀热情，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痛加抨击，坚决斗争，即使特务环伺，刀枪当前，亦仍言所欲言，一往直前。

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的内心里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解放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和我们过去所接触的、所了解的、所追求的，在基本是完全不同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每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但是由于中国有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由这样一个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武力——人民解放军的日益壮大，今天，武装的革命力量打垮了武装的反革命力量，把中国的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使一切在怀疑中的、苦闷中的、徬徨中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而中国的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是由中国共产

党介绍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次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帮助了所有的中国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重新来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我们现在大家得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我们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并进而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我们在各种实际工作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学习与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开始走第一步。在我们开始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去解剖揭发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致我们在客观上不知不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我们的确是具有一腔热忱，愿意献出我们所有的生命与智慧为人民服务，但这几年来，我们并未和日益壮大的人民力量联系起来，只孤立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因之这些工作，便都不免流于自流，不能建立有组织性的群众基础。……这一切，在今天，我们应该勇敢地毫无保留地给自己以无情的批评。有些朋友认为在过去的那种环境中，我们只能够做到那样程度；朋友们用环境的困难来原谅我们或者勉励我们的这种好意，我们是感激的，但我们自己不愿用“环境”来掩饰、来辩护我们过去在工作中所表现的缺点，因为造成我们过去在工作中所表现的缺点的，基本的原因不是环境上的困难，而是我们思想上的落后。

现在，我们大家找到了新的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介绍了马列主义这一普遍真理。马列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者呆板的条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实际的具体的工作里去。在中国，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的伟大的领袖，他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历史革命中，把革命理论和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他是中国人民的灯塔，他是中国人民的舵手。他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渡到光明，从旧的社会走进新的社会。我们应当在他的伟大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自己，改造我们的国家。

我们还愿在此更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中国的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 47500 万中国人在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的封建的统治，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看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即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像是一次奇迹，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毛主席及中共许多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者还想在中国觅求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暴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形。今天中国的人民，都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克勤克俭、务老务实地从事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本社同人，将在这样一个新的认识下，站在文化岗位上，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努力。

(二) 工作任务

《观察》过去发行了两年半，它的最高发行数是 105000 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刊物复刊的主要意义不是在延续它过去的纪录，而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分担一部分工作任务。复刊后的《观察》的工作任务，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先说对读者的部分。《观察》过去的读者，就数量上说，假定每份平均以 10 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 100 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土兵。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陆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地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在这样广阔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数以百万计算的读者群众中，在解放以前，在思想上，已经有一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读者，他们早就跑在我们前面了；解放以后，这种跑在我们前面的进步的青年的读者，在数量上更加多了，但是我们相信，在广大的地域、广大的群众中，像我们自己这样在思想上比较落后，而又有一种要求进步的意愿，决心努力学习、加紧改造自己的朋友，也一定是很多的。今天政府的政策，除了对那些少数的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以外，对于广大的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中的人民群众，都是要照顾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思想上、知识上、工作上、生活上，各人的情况彼此不一，因之这种照顾的工作，也就必须要有很多的人在一个总的方向和不同的方式下，来分工负担。在我们这方面，本刊应当特别照顾的，就是那些和我们自己情况相近，即思想上比较落后而又具有要求进步的意愿的广大读者群众。在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读者一起学习；在我们自己力求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读者一起进步。互相勉励，互相教育，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使大家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提高。

对于那些跑在我们前面的进步的青年学生读者，我们在此对他们表

示最大的最热烈的敬意。在他们面前，我们是惭愧的，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国家毕竟进步了，我们又为国家的前途和光明而庆幸。对于这批进步的读者，我们一方面敬重他们，愿意跟在他们后面学习，一方面我们还诚恳地希望他们继续鼓励和帮助我们，帮助这个刊物以及这个刊物所带领的读者，是他们的一种工作，一种责任。由于今天中国社会上封建主义的余毒还很普遍，前进青年在和旧社会的斗争中可能还会遭遇到困难和挫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保证我们一定热情地支持这批前进青年，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来鼓舞他们的勇气，坚定他们的信心。同时，在知识上，我们也将就力之所及，不断地继续供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有时工作和文化不能兼顾的缺憾。

其次说我们的任务中对政府的一部分。人民解放战争在基本上已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全面的建设工作即将开始。我们应当多方面多地联系一切进步的学者、专家、工程师、对于主办生产事业有实际经验的人，以及目前正在主持实际生产事业的人，根据他们过去10年20年30年以上的研究生活，根据他们过去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宝贵经验，在即将来到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撰写专文，提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计划、方案、报告，以供社会讨论，以供政府参考，使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进行，尽可能更完美，更迅速。此外，我们应当介绍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的各种事务中所反映的意见，使政府得到更多的机会了解民间的意见以及他们在工作中及生活中所存在着的种种困难。对于各级政府有违反政策或有所偏向的行为，本刊亦应根据具体事实，提出积极性的批评，帮助政府推行建国的工作。本刊并将站在舆论的立场，协助人民监察机关，监督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忠实执行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及一切决议。

(三) 编辑计划·工作态度

本刊过去编制上的特点是综合性，分栏选材，力求多样，借以照顾到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本刊今后的编制仍拟维持这一个原则，务使每期内容，不致流于单调。从本卷起，我们决定增设社论一栏，陈述本社

同人对于半月中所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意见。“专论”栏包括马列主义理论的介绍研究，思想改造的讨论，以及对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各种问题的论述。一个建议而附有具体的计划或方案者，列入“建议与方案”栏；这栏是新增的，但这栏的稿件也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又新增了“报告”一栏，包括工作报告、学习报告、调查报告及参观报告等，目的是希望各方面把实际的工作经验、学习经验或调查参观所得，提供出来，彼此交流。又新增了“介绍与翻译”一栏，希望对苏联及东欧各人民共和国多做一点介绍工作。特别是对于我们伟大的先进的友邦苏联，无论在政治理论上、科学技术上、建设经验上，我们以后必须对他们多学习，多了解，所以对于苏联的介绍，更为切要。“观察通信”仍旧保存，不过内容上有了根本的改变。过去的通信大都是暴露性的、批判性的，今后的通信应该是积极性的、鼓舞性的。只要我们能深入群众，联系群众，通信的题材应当是比过去更为广大的。国外通信需要时间联系，一时不可能多刊国外的通信，我们当逐渐地努力去建立我们的国外通信网。“人物及事业”一栏，侧重介绍战斗、生产、劳动、妇女各方面的代表性的英雄人物，并介绍有利于人民的各方面的有全国规模性的各种生产事业。我们打算把过去的“读者投书”一栏改为“读者讨论”栏，供给读者讨论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或其他关涉国家各种事务的片断的建设性的意见。关于这一栏，我们当在下一期或下二期再作比较详细的说明。本刊过去有一个时期曾按期刊载一页“观察漫画”，后因篇幅缩减，未能继续，现在决定恢复。本刊过去又有一栏“观察文摘”，摘刊刊载于全国各地报刊上的重要文字，使本刊的读者阅读本刊时，能同时阅读到散布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的有价值的文章。我们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栏。以上是本刊编制的一个轮廓，在实际编辑中可能还要有一点灵活的变通。这些栏目我们究能做到多少，一方面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看各地作者读者能给我们多少帮助。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向这样一个目标去进行我们的编辑工作。

在工作中，我们将充分建立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在我们编辑部的内部，各种编辑工作都将在集体讨论的方式下进行，希望在这样一种工作态度下，能减少或减轻我们所可能发生的错误。这种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我们希望能够同样应用到我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上，对于文章的

内容彼此能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使我们的编辑工作不致流入自流。我们顺便在这儿说明，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后处理稿件的时间，包括用舍的决定及稿费的致送，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速，这点请求作者原谅。最后，我们还希望更进一步把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广泛地扩大到本刊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希望读者一方面踊跃惠稿，一方面能对本刊的内容经常提供意见。意见从读者群间提出来，到达编辑部，经过编辑部的讨论研究，再传达到作者群间，最后，把反映了读者意见和接纳了读者的意见的刊物，仍旧送达到读者之前，使这个刊物能成为读者、作者、编者三方面努力合作的一个结晶。

此外，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将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时时接受群众的意见，时时检查自己的缺点和可能发生的错误。我们将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在最大的努力下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深知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存在着许多困难的。掌握问题能不能正确？稿件来源有没有把握？业务收入够不够自给？这一切困难都活生生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应付困难的唯一道路，是面向困难，提高耐心，在一点一点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广大的读者们！我们从我们的心底里发出一股凝紧而热烈的感情，在这儿遥遥地向你们招手，呼唤。我们很坦白率真地向你们陈述，复刊后的《观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十分软弱的。但是我们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的意愿却是坚定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结合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教育，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提高。我们也希望一切先进的朋友带领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国家的工作，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进步，也就是帮助我们的国家进步。

1949年10月16日

（原载《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出版。

本文是《观察》的复刊辞，发表时署名“本社同人”）

第三章

教育、司法、农村

一、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

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载该报11月20日南京专电：“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开除后，必须呈报教部，并由教部通令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对此项开除学生，不得准其入学。此项规定，因日久不免忽视，现教部已重申前令，飭令各专科以上学校今后应严格执行，绝不准通融，以整学风。”我们认为此事深有不妥，爰为文论述，并为青年学生呼吁。

一、学校开除学生，总不出下列两种原因：或者认为该生学业太坏，不堪造就；或者认为该生品行不端，不堪训诲。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惩戒，超过了某种限度，自然应该予以处罚。但是今日中国一般大学，关于课业及训育的标准，并不一致。先说课业。有的学校学术水准高，有的学校学术水准低；有的学校功课严，有的学校功课宽；有的学校以学生有无特殊心得、是否能融会贯通来衡量学生的造诣，有的学校只以机械的考试、学生是否能背熟笔记或教科书来决定学生的成绩……在这种差别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日中国的一般大学之间，甲校与乙校之间，乙校与丙校之间，丙校与丁校之间，甲校与丁校之间，在学术水准及学生程度上，是有距离的。因之，在甲校或许是一个“低材生”，但这个在甲校不过是一个“低材生”的学生，可能转到丁校之后，却变成了丁校的“高材生”；至少，这个学生在甲校是被认为成绩低劣者，他到丁校后，不一定同样被认为不堪造就。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教育部当局或一般供职教育界的人士，不致认为我们这种说法为无据。因之，在甲校因学业太坏而被开除的学生，他的实际程度，不一定比丁校的在校学生来得坏。但程度还不及这个甲校开除学生的丁校学生既然仍可在大学读

书，而程度比在丁校在校学生程度好的学生，反而因甲校之开除而不得转入其他学校，永远剥夺了就学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再说操行。今日中国一般大学，由于各校的历史、环境以及主持的人物的不同，在训导方面，其标准和作风，也并不全国一致。有的学校采取严格管理制，有的学校采取自由发展制；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上课下课、按部就班的学生，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有创造力有新理想的学生；有的学校对那些对于国家大事关怀热心的活动学生，总是不甚放心，处处加以管束，有的学校则对于有领导力有活动力的学生，中心赞赏，处处予以鼓励和指导……因此，同样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成为校方最顾忌的学生，但在乙校可能成为校方很赏识的学生；同时同样一个行为，在甲校校方可能认为这个行为超越了常轨，破坏了本校的秩序，但在乙校校方，可能认为这个行为是无所谓的，可以原谅的。在这种差别之下，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是一个“败类”，但到了乙校可能变成一个“人才”；在甲校，他的才智迄被埋没，在乙校，他竟然获有机会发挥他的才干。同时，一个学生，他的品行（包括他的思想、胆识、组织能力、服务精神等等），在甲校可能被认为不堪训诲，而到了乙校可能被认为后生可畏、大有作为。因之无论从学业或操行的观点看，要使一个学生，被一个大学开除后，全国其他大学便不再准其入学，这是不合理的。教育的目的在发挥理性，理性的目的则为求合理，求公道。因之我们认为教育部规定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的学生，全国其他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这一规定，与“教育”本身的意义，背道而驰。我们希望教育部对于这种规定，能重作考虑。

二、在从前君主时代，地方上出了一件命案，就成为了一件“大事”，有司可以因此丢官甚或搬动脑袋。共和以后，民命反而越来越不值钱了，试看今日，民命与蚁命，究有何异！在学校里，情形亦正相仿。在我们做学生的时代，可能一年之中没有一个学生记大过，两年三年中没有一个学生被开除；开除了一个学生，那就全校骚动，极端严重。可是现在，学校开除学生已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而且现在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集体开除”，一开除就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成了韭菜根，一刀切下去就是几十根。我们不知道这还是教育的权威“涨价”了呢，还是学生的价格“贬值”了呢？从前开除一个学生那样郑重，现在开除

一个学生甚至几十个学生这样轻易，难道现在的学生，无论就学业的原因或品行的原因，真的那样不堪造就吗？假如说真的学业不行，为什么不在录取的时候，将录取的标准尽量提高？假如说品行不端，然而各校训导，平时对于学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究竟有没有切实的指导。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新教育，名为德智体三育并重，但体育不过做到开运动会，德育不过做到上纪念周。现在的学生，伙食这样坏，有的学校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基本的营养、空气、日光都不够，还讲得上什么体育。要学生帮政府忙的时候，如发动青年从军等类，于是把学生大大捧一阵，学生要是对于国事有所表示，而不利于政府时，便把学生大大打一阵，这还讲得上什么德育。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新教育，大体上说来，不过是一种“书本教育”而已。按时上课就不扣分数，考满60分算及格，读完多少学分升级，读完四年拿到文凭。请问今日中国有几个大学能注意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大学，比较有一种优良的传统，学生沐浴在这种传统里，经过四年的熏陶，使他在做事做人上渐渐地得到一种正常的训练；或者一个学生幸运地亲近了一位优良的教师，受了他的影响，在性格上渐渐定型。但就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看，这种情形是占极少数的。（这也就近似牛津导师制的精神。中国有许多人很向往这种导师制，后来教部也规定各大学设立导师，但是中国大学里的导师是“带兵式”的，或者“保甲长式”的，凡是教师都是导师，每个导师带上几十个学生。不说在各种条件上根本无行“导师制”的可能，因之有导师而不知其所属的导生有多少者，导生经年犹不知其导师为何人者，就是中国导师制的真正目的，亦不过是要叫这个导师管管几个学生，不要他们乱惹是非，闯出乱子。所以结果中国大学里的导师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至于一般大学里，除了上课、考试、分数、文凭外，还有什么做人做事的训练？一年复一年，墨守陈规，一批一批的毕业，糟踏了青年的生命，糟踏了国家的光阴。现在许多学校，这样容易地开除学生，可是学校当局是否已经尽了“教”与“育”的责任？在目前这种教育制度之下，大学的主持人，纵然有这方面的理想，但事实上又是否能够有所作为，贯彻他们在这方面的理想？同时政府当局所行所为，又是否能够激发青年向上，能使青年身心安定？大环境恶劣如此，却希望学生乖乖如彼，其可得乎？青年容有错误，也当网开一面，让他有条路走。越是

开除学生容易，越不能实行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这种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是迫人堕落，迫人自杀，迫人走险，其结果与教育的本义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对于教育部这个规定，不能赞同。

三、但是教育部为什么要有这种规定，而且认为此项规定，日久不免忽视，又要重申前令，飭令各校严格执行，绝不通融，以肃学风？假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术水准和训导作风都是一致的，则施行这个统一的办法，犹有可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此事教育部非不知之，但仍有此种规定，而且重申前令者，据我们的观察，其动机不是教育的，恐怕仍然是政治的。政府显然企图用这种严峻的措置，以压制对于现实日益不满的学生情绪，希望学生只管书本，不管国家。我们认为政府用这种严峻的手段来对付有热血而无凭借的学生是不公道的。而且在原则上，我们反对政府用一切以政治控制为出发点的办法来控制教育。政府应当让大学学生在学术上自由发展，在思想上自由发展，在公共生活的训练上自由发展，只要这种发展是合理的，合法的。我们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们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稳定谨慎，青年人可贵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社会。政府应当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缔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风气，使一般纯洁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的大环境下，潜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的良才。我们对于年来各大学学生的活动，素极注意，对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竞选这一类事情，亦不惜篇幅详加报道，这就因为我们认为：今日这一批青年在这种校内活动中所受的民主的训练，与20年以后中国政治的趋向大大有关；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在要能看到每一个社会现象它在日后所可能发生的社会影响。我们衷心希望政府当局能创造一种新的风气，以这种新的风气来积极地激发青年的抱负，熏陶青年的操守，而不要单在消极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青年的活动，削弱他们的活力。

12月5日

（原载《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年12月13日出版）

二、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 工作和监狱工作

本文为记者所著《东北参观报告》一书哈尔滨一章中的第二篇。参观时间是今年5月，记述时间是今年8月。

（一）哈尔滨人民法院的工作

我们没有去东北以前，早就听到朋友传述关于东北老区中司法的改革的情形。传说的人都盛称那种以人民利益为本位的司法精神，以及以“司法的最高任务在改造”为出发点的监狱工作，所以我们到达哈尔滨后，了解哈市的司法工作及监狱情况，便成为我们参观日程中一个很突出的课目。

司法是国家制度中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的学者虽然极力辩护，说司法并非单为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设，而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公平的法权，但事实上，在那些国家中，法律只是保障既得利益阶级、剥削劳动大众的工具，而司法就是现实这样一种性质的法律的制度。中国俗语有云：“法院大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14个字说得透彻之至，钱就是“理”，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受到法律的保障，没有钱的人就变成法律欺侮的对象。再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得到知识，才能利用他的知识去保障他自己的权利，反抗他人的压迫，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得到知识的机会，就要受人的剥削，就要终身为资本家流血流汗，牺牲至死。旧的社会制度既然是剥削劳动

大众的，旧的社会制度中的一部分——司法制度，也必然是保障有钱的资本家，剥削没有钱的劳动大众的。革命的目的在推翻这种剥削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司法制度也势将有个彻底的改革，以符合保障人民利益的目的。

新中国的新的司法制度，目前尚在创造之中，所以我们对老解放区中的司法工作及监狱工作的状况，先有一个参观了解的机会，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 * *

哈尔滨市人民法院是 1946 年 8 月 23 日成立的，他的任务在维护革命法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国家利益。哈尔滨过去本来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名的复杂的坏码头，各种不良分子都集聚在这个城市里，各种犯罪的行为，都发生在这个城市里。但自从中共进入哈市以后，总的来说，社会秩序有很大的改进。自从哈市人民法院 1946 年 8 月成立后，到 1949 年 3 月为止，共审判刑事案件 4896 件，民事案件 3900 件，非讼案件 3501 件，三项共计 12297 件。其中的民事案件虽然数字上升，但犯罪案件则逐年减少。1948 年度的刑事案件是 1827 件，比 1947 年度的 2055 件减少了 228 件，亦即下降了 11% 强。在监狱收押犯人人数上，1948 年度共收 2688 人，比 1947 年度的 3581 名减少了 893 名，亦即下降了 25%。以哈市人口与收监犯人的比例来说，1947 年度的收监犯人仅占哈市人口的 0.44%，1948 年度则下降为 0.33%。

我们现在分五点来叙述哈市人民法院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情况：

一、法律问题。一般人不明实情，以为解放区没有法律，或者不讲法律，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解放区是讲法律的，而且是很尊重法律的。在解放区中，一般人对于法律的看法是：法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不可侵犯，所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当然也不可侵犯。

不过由于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还在研究设计之中，所以统一的法律尚未订出，新的司法制度确立有待，在一切都在摸索与过渡的阶段之中，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一部分人不根据具体情况，仅仅笼统的按照过去的形式来测量今日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以为解放区没有法律，这是错误的。哈市人民法院的王怀安院长说，他们审判案件，大都是有法规作根据的。总的来

说，东北施政纲领是今天东北解放区的根本法。个别的来说，关于财产权，有人权保障法为根据；土地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纲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补充办法；债务则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处理债务的条文……当然，这些法规条文，都是单行的，今天还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全盘的法律，但是全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目前这个过渡时期即成过去，自然会有一套系统的法律产生。

有明文规定的单行法规，即照单行法规审案，没有法规根据的，就根据政策审案。判决的轻重，要看：（一）所犯的罪行违反人民的利益到什么程度；（二）犯罪行为的性质，如所采的犯罪手段、犯罪的动机等，恶到什么程度；（三）犯人对于自己所犯过失的态度如何等，来分别处理。同时，即使有条文根据者，审判时，亦应入情入理，耐心说服，不应官僚主义地完全死背法律条文。

二、审判制度。仍旧是三级三审制，即县市法院、省法院，东北人民法院，一共三级。关于律师，在原则上，仍旧承认律师制度，但是暂时不准律师出庭。旧社会中的事实说明法律上虽然规定人人均可聘请律师为其辩护，但由于律师业务是私人经营的，取费甚昂，所以只有有钱的人才能请得起律师，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力量去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而且在过去，由于律师品质的不齐，有的律师名为法律的保障者，实际上成为法律的破坏者，从中制造纠纷，剥削当事人，对于社会破坏多而贡献少。东北当局，在这个过渡时期，决定暂时不准律师出庭，俾使司法工作更能接近群众。为了便利当事人诉讼起见，1948年5月2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指示各地法院可采以下办法，即（一）设立缮状处，免费或低价代人民缮写诉状；（二）准许人民以言词控诉，由法律人员加以笔录，不必拘泥状纸形式；（三）监狱设缮状员，专为监犯免费写诉状。这些办法都是使司法工作直接深入群众，使人民处处便利。

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现在还没有能够推行。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宪法103条规定：“各级法院之审理案件，除法律特别规定之情形外，由人民陪审员参加举行之”。按照1938年苏联法院的组织法，凡享有选举权的国民，皆得为人民陪审员，而且这种人民陪审员的选举，是采取全民普选制的，即由各区公民按选举区选举的，也并无财产、身份、教育等等限制。而且其他各国采用陪审制，通常仅限于刑事一部分，其权

限亦有一定，不参与案件的审问，在苏联，人民陪审员，民刑事均可参加，并在执行职务时，享受法官的各种权力，即对于庭审的延期与否、证人应出席与否、犯罪者应逮捕与否，以及证人与犯罪者的审问，人民陪审员都有发言的权力。这种人民陪审员制度，使人民直接参加司法工作，使司法工作直接深入民间，将来中国可能也要采行。但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在东北老区中，还未能试验推行。

三、案件情况。两年多来，哈市人民法院处理的民事案件，以婚姻案件占大多数。婚姻案件的内容，包括离婚、解除婚约及姘居案件，而姘居案件在婚姻案件中又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是哈市特有的现象，因为哈市姘居情形比较普遍，假如姘居几年后不愿再姘，那就要要求分散。婚姻问题中包括着虐待、重婚等等问题，所以婚姻案件的增加，也可以反映女性群众的觉悟，要求从旧的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民事案件的第二位则为房屋案件，包括租权上的纠纷等等。此外则为商业性案件及一般财产纠纷。

刑事案件中最多的的是偷窃案件，这类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占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哈市有一种惯窃，他们有句俗话：“娼妓是他的妈，监狱是他的家。”这种惯窃，毫无生产技能，只有偷窃技巧，生活堕落，意识无赖。最初人民法院采取宽大政策，加以说服，稍押即释。但他们出狱后，还是继续偷窃，老百姓提抗议，说捉了又放，放了又偷，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对于这些人，刑期较长，可能长到二年三年之久，并重视改造，进行教育，教他生产技能，改变他的劳动态度。这些惯窃都是有组织的，一人入狱，其他同党即担任输送，常常送好的东西给他吃，所以虽在狱中，生活仍很舒适，现在已禁止送东西给惯窃吃，并要求他们长期劳动，希望在劳动中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哈市人民法院成立以来，以处理案件的总数来说，可说是一年比一年多，但其中主要增加的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则显示下降的趋向。刑事案件的数字下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表示社会的治安在进步之中。民事案件的增加，要分两层来分析。第一先分析民事原告的阶级，以1949年前三个月哈市人民法院所处理的1040件民事案件为例，在这1040名民事当事人中，工人234人，占22.5%，城市贫民269人，占25.9%，独立劳动者132人，占12.6%，三者合计占当事人的61%左右。

这些劳动大众，在旧社会中，是被剥削的、被压迫的，现在社会翻了身，这些一向被人踩在脚下的人，也抬起头来，不愿再受人家的欺侮、压迫、剥削，所以大部分的民事案件都是由他们原告，这是社会翻身过程中必然的现象。第二个原因是诉讼的程序非常简单，不用状子，不收讼费。在审判的过程中，法官也没有什么架子，以亲切谈话的方式来调解民间的纠纷，人民因为“打官司”太方便了，以致过去许多不必要打的“官司”，如夫妇之间的一时口角等，现在也牵到法院里来。

现在结案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一般说来，根据过去的经验，案件在一周内结案者，占到46%，二周内结案者，占30%，案件中的90%都可以在一个月內结案。过去那种打官司要打上十年八年，甚至子承其父地打下去的情形，现在是没有了，这也是新社会中新司法的特色。

四、外侨案件。哈尔滨80万人口中，外侨有3万，国籍有二十几国，其中以苏联波兰二国侨民最多，这两国的侨民占到外侨总数的90%。

外侨人数在哈尔滨总人口中，虽然只占到4%弱，但在司法案件中，外侨案件却要占到20%左右。在外侨案件中，根据1948年度的统计：

原告华人	被告外人	占18.1%
原告外人	被告华人	占37.5%
原告外人	被告外人	占41.5%

对于外侨诉讼案件，是根据主权独立、民族平等，及劳动人民间的国际主义精神来处理的。凡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者，统予保护，违反法令者，统予制裁。审判外侨时，法官用中文，外侨可用该国语言，另再翻译。在1948年度外侨民事案件253件中，当事人有苏联、朝鲜、波兰、匈牙利、日本、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九个国籍，再算上非讼案件，则还要加上南斯拉夫、葡萄牙、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一共15个国籍。在1948年度审理的刑事案件127件中，因违反我人民政府法令而被判徒刑者，有172名，其中六名被处极刑。外侨在中国的法院的判决下，被处死刑，在中国的司法历史上是新的纪录。

五、监狱问题。新社会中的监狱作风和旧社会中的监狱作风在基本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新旧政权的性质在基本上就彼此不同。在旧社会中，监狱的作风是恐怖与黑暗，在监狱中严刑拷打，有时肚子也吃不饱，卫生方面则又脏又臭，不通空气，整个的环境使人恐怖畏惧，利用恐怖

来使人不敢犯法，这种情形完全是消极的。新社会中的整个司法的精神是教育和改造，在监狱中，给犯人以“人”的待遇，顾到他们的饱暖，顾到他们的卫生，告诉他们犯罪的原因，提出新的人生态度，要他们改造，要他们重新做人，变成社会上积极有用的人，教他们生产的技能，要他们从事劳动，并提高文化的学习，积极实行了“通过劳动改造犯人”、“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结合”的方针。执行这样一个监狱工作，最初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首先要使在监狱中工作的干部，面向犯人，要爱护犯人，照顾犯人，教育犯人，把犯人当做“人”来看待。八一五后修理监狱时，他们先修监房，办公室和职员宿舍则放在最后修。去年有一次扭秧歌时，也扭给犯人看。最初有的干部不愿意，说平时审问犯人，现在在犯人面前扭秧歌，下次再审问他们时，岂不是没有“尊严”了吗？但是为了要贯彻干部面向犯人的作风，所以决定试一试，结果犯人大乐，犯人看到推事也居然来扭秧歌给他们看，犯人觉得人民法院看重他们，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关于生活上一些问题，如大小便、灭虱子等，均由监狱干部和犯人在一起讨论，共同努力，力求改善。大概犯人初入监狱，一天到晚就只想出来，可是经过半年的教育，劳动成了习惯，都愿在狱中学得一技之长，以便期满出狱后可以自力谋生。犯人有各种生活小组与生产小组，力谋自给自足，借以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犯人经过教育后，都能自发工作，并努力立功。狱中的外侨犯人，在生活上、劳动上，都和中国犯人同样待遇，同样管理，外侨犯人中也有立功的。至于在监狱中组织生产，应该实行“组织在监生产与社会就业相结合”的原则，换句话说，教犯人生产技能，并不应从监狱本身的条件或利益为出发点，应顾到犯人出狱后就业的难易，以及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需要。举例来说，为了适应北满条件，最近哈尔滨监狱中除了已有的许多工场以外，又增设了马尾工场，一方面使学会了这项技能的犯人，出狱以后，就可以立刻得到职业，另一方面社会上也确实需要这种技术工人。

(二) 哈尔滨监狱参观记

哈尔滨监狱可实在不像一所“监狱”。当我们刚刚进门的时候，这就

像一所住宅，或者说，一家“公馆”，门口及周围气象，没有一点“监狱”的味儿。最出乎意外的是：我们进去后先在他们的会议室休息，这间大会议室，四壁和天花板都油漆一新（是紫罗兰色的图案），天花板上垂下的电灯罩也是富丽堂皇，比普通机关里的会客室或议事室漂亮得多，而这样一间漂亮的会议室，就是监狱中的犯人合作修起来的。

在监狱的内部，也不像监狱，而是像一所学校，或者充其量像一家工厂，除了部分犯人，如特务、重犯、未决犯等，还像是在“监狱”中的样儿，固定地被看守在监房中以外，其余绝大部分的犯人，都在各工场做工，是很自由的。监房共分老监房、已判监房、未判监房、病监、女监五种。一般说来，监房里的光线和空气，都是足够的，只有一两间监房里面的犯人比较拥挤一点，这多少是受了房屋限制的影响。一律是双层大铺，被褥整齐。我们去参观时，被看守在监房里的犯人，有的在读书（课本是“犯人初级读本”），有的在记笔记，有的在下象棋，在一个走廊的角落里，还有两个犯人在那儿编剧本。有一个未判监房中，有一个犯人正在读报给其他犯人听，大家脸上都显出津津有味的样子。有犯人俱乐部，下分四系一室，即福利系、卫生系、教育系、文娱系，及资料室。犯人有犯人的壁报，我们看到犯人写的字，画的画，都不差。另外有一大间图书室，有书1500册左右，犯人可以借到监房里去阅读，图书室的管理员也是由犯人中推选出来自动担任的。每天午后1时至2时半，是学习时间，学习的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晚上或者讨论，或者娱乐。女监也非常干净，女犯大都坐在铺上做缝纫工作，其中还有几个苏联女犯；女犯案件中最多的是通奸，其次是偷窃。生了病的犯人另外有病监，使病犯和普通犯人隔离，以便治疗。

哈尔滨监狱的主要特点，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过的“通过劳动改造犯人”，“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结合”之外，最使人钦佩的，就是监狱能自行组织，从事生产，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增加国库的负担。哈尔滨监狱中的生产组织，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值得广为宣扬的经验，可供全国各地的监狱引为模范。1947年春天以后，东北当局决定监狱要搞生产，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这样，可以使国家对于每个监狱只要负担最初一个时期的经费，不致长期支付，借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哈尔

滨监狱于1947年7月，领得生产基金500万（东北券，在我们参观东北时，折合人民币约为16600余元），就以这个500万元起家，搞到1948年10月，已能达到经常1000个犯人的经费自给。这500万在当时只能用来购买一些简单的工具如斧、锄等，当时就由犯人出外去做零工，在劳动所得中，慢慢儿的把生产资本累积起来，才能慢慢儿在监狱内建立工场。工场中的机器则由政府拨给。现在监狱内已有猪鬃、被服、印刷、织布、铁工、木工等六个工场。织布工场中就有30架织布机，织白布及毛巾等物，我们是5月9日去参观的，看到墙上所张贴的前一天（5月8日）的生产纪录是五四式布65匹，毛巾40打。在印刷工场中，排字部、印刷部、装订部、绘版部、制版部，设备粗具，印刷机有七架，切纸机有二架。在被服工场中，缝纫机多到50余架，做军服及子弹袋等。不仅工作的人是犯人，就是管理及记账的人也都是犯人。犯人一般工作时期是每日八小时，另加学习二小时，但与军需有关者，可能每日工作10小时。在这种生产努力中，到1947年冬天，在监狱经费上，办公费及犯人菜金即能达到自给的程度。1948年10月，就达到了经常1000犯人的经费自给，包括着1000犯人的囚粮、菜金、囚衣、取暖、医药、办公、修葺各费在内。1949年起，除了上述各费的全部自给外，还有盈余。根据1949年4月的统计，生产的收入共达4054608分。每“分”按照当时哈尔滨的物价，约值东北券8000元左右，这就是说，哈尔滨监狱1949年4月的生产收入，当在东北券300亿元以上（这是一个不精确的约数，目的在使读者有一个概念）。在这个收入里，分配开支如下：

犯人经费自给	25%
再生产投资	40%
房屋修葺费	26%
现金周转金	9%

监狱生产在性质上是一种国库收入，所以在法院及监狱中的工作干部，他们是国家的公务员，他们的薪金费用由政府负担，并不在犯人生产收入中支付。监狱生产收入仅限于上列三种用途，即经费自给、扩大生产及修理监狱，这三种用途以外，再有多余，即归国库。监狱的会计是独立的，除了政府指派的会计外，日常账目都是发动由犯人自己来管理的。犯人因为知道没有人在剥削他们的劳动生产，所以生产情绪都普

遍提高。

在监狱中，劳动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教育，但各工场的生产都有一定的标准，超过了标准的，可以得到奖励金。犯人工作好不好，以下列四点为标准，即数量质量、节省原料、互助精神及学习成绩。好不好先由犯人开会公评，最后由监狱决定。去年有一个犯人，他的母亲去看他时，千方百计凑一点款子，想带给她在狱中的儿子零花，因为在旧社会中，犯人没有钱便要在狱中吃苦头的，不料那个犯人非但不要他母亲带来的钱，并且因为狱中刚刚发了他7000元的奖励金，反而分给他母亲4000元。他母亲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回去后就到处说，现在的人民政府真好，犯人进了监狱，不仅不吃苦头，还会挣钱，她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到了极点。犯人得到奖励后，最初大都用来买零吃的东西花了，最近在监狱的教育下，都改变了，都用来作购买书籍文具了。

犯人的劳动收入虽然很多，但犯人的生活标准，不能超过普通的老百姓，因为假如超过了老百姓的生活标准，则老百姓就要说话，说他们犯了法，可是生活倒反而比老百姓好了。这样就要犯脱离群众路线的错误。不过由于监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犯人都生活在有组织的情况之下，所以卫生水准要比外面一般老百姓为高。在伪满时，犯人的死亡率高到15%，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百分比。由于人民政府重视人民的生命，改善卫生环境，哈尔滨监狱1947年的犯人死亡率为1.8%，1948年则更降为0.8%了。

犯人期满出狱时，除“出狱证明书”外，还有一个由狱中发给的“鉴定书”，说明他在狱中的各种情形。他出去报新户口时，邻居都会要求看这些文件的。

在东北解放区中，不能以金钱来代替刑罚，所以在监狱中，还没有罚款代刑的事情，但是假如犯人的在狱已超过原判的三分之二，他的坦白态度和工作态度特别好，也可酌量予以减刑。

1949年8月记于北京

(原载《观察》第6卷第4期，1949年12月16日出版)

第四章

人物品评与交往

一、记田汉先生

我认识田寿昌先生，还在七八年之前。那时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南国社第一次在上海梨园公所公演，上演的戏有《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和《名优之死》等几个剧本。在那次公演最末了的一个晚上，我和赵家璧兄同去看了一次。我们看完戏回学校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洪深先生的“名优”，左明先生的“小丑”，万籟天先生的“诗人”，唐槐秋先生的“老画师”，以及特别是唐叔明女士所饰的“卖花女”，他们在舞台上的灵性的挥发，使我受了极深的感动。在那种万籟无声大地如死的夜色中，我伤感地在操场上徘徊了好久。不是单纯的敬佩，不是单纯的感动，我那时心灵中汹涌着的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冲动。

那时南国社除了干小剧场运动以外，同时他们又发动了一种学校戏剧运动。全赖有这一点理由，我方能够私幸和这一位热情而丰富的戏剧家接近。可惜因为我没有一点可以夸耀的天赋，所以我始终只做了南国社一个最没有实用的分子。

那时候，田先生住在金神父路底的新新街新新里。在那样一个污秽喧嚣的角角里就住着这样一个有光辉的人物。他的房子是一楼一底所谓的“弄堂房子”。你一路进这41号的门牌，“一个戏剧家的屋子！”什么都是杂乱无章：桌子不放在桌子应当放的位置，床铺没有床铺的尊严。一个模型舞台放在天井里，舞台道具成了这屋子里唯一的上宾。你要没有容忍，你走进他们的屋子真会使你吓得连忙溜了出来。一个小屋子里充满着的是人；声音，烟雾。每个人都是那样放肆的嘻笑歌唱着，每天

都是那样的忘形放浪着。然而这一阵嘻笑歌唱忘形放浪，并不是一团漫无意义的荒唐，它是一股热情奋斗的表现。那一个平凡的屋子里有一般不平凡的气氛，假如这一股可贵的空气是一个车轮，那田汉先生就是这一个车轮的轴子。

田汉先生是一个最富于感情的人物。他不说话时，他的冰冷实在使你可怕。可是他的感情一来，简直是一道洪水。他高兴时，什么笑话都说，什么戏都唱，他从来不腴腆他那一口湖南的嗓子。他这十多年来干戏剧运动所以有今日的成绩，他的热情是他最大的功臣。他凭着他的一股热情，对于一切不消极，不失望，不灰心。他凭着他的一股热情，在干戏最吃紧的当儿，可以自朝至夕，可以夜以继日。他凭着他的一股热情，使大家受苦追随，甘之如饴。无论有多少人在他周身喧嚣乱叫，他依然能够坐下来写文章，制剧本，这也还是因为他有一股热情。他的一股热情可以使你扫除一切耳边眼前的扰乱，而一心一意的执笔抒写。

田寿昌先生不仅仅是一个戏剧家，他实在还是一个诗人。他在《湖上的悲剧》一剧里说：“诗人的袋子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真对，田先生的袋子里什么都有，也就是没有钱。他从前在上海干戏剧运动的时候，洪深先生是唯一适当担任帮他筹款的人物。田先生欠缴房钱，成为家常便饭。上海的房东实在不容易对付，可是古怪，田先生的房东竟然是一个好人。他看看这屋子里，什么都觉得新奇讶异，这种新奇讶异的空气居然会盖没一个市俗的可憎面目。

还有一个人是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田汉先生的母亲。她真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一个能够了解儿子，能够成全儿子完成他的专业的慈母。屋子里那种浪漫的氛围，对于这位老人竟然显得那样的和谐。我常常在田先生家里吃饭，一大碗青菜，一条大黄鱼，一大碗蚶子。老太太偶尔说几句湖南话，我看她的精神上简直没有一点勉强。田先生屋子的“食客”没有一天没有，没有一餐没有，特别是又快要公演的一阵。我有一次听说田老太太甘愿当了她的皮袄，来维持这一份庞大的伙食。

我和田先生隔别了五六年，这次竟然在南京重逢。他的面貌我觉得已经衰老了不少，但我觉得他的精神，他的热情，还像从前一样。我今天到他的寓所去了一趟，这简直是七八年前的新新里41号的一次再现。

我对于这一位人物，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在此写下这一点卑微的记忆，吐出我心中这一点真实恳切的情感。

(原载 1935 年《中央日报·文学周刊》第 38 期)

二、幸福

亲爱的小兄弟：

这两天我早就应该给信你们了，可实在近来又够忙。昨天下午，偶而写下了一段短短的小品，题目叫《幸福》，今天早上忽而想到抄一份给你们看也好，因为借此我可以不再去想别的话写了，以下是正文。

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对于幸福都是憧憬的。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影子，这影子跟着他的主人跑，而且永远占据在和他主人身体所占据下的那空间之另一空间。关于幸福的憧憬也是这样。

然而幸福给每个憧憬着幸福的人却是幻灭。

什么是幸福呢？

“憧憬的现实就是幸福”。

但憧憬是没有底的渊。

只有跳在圈圈外面，才能细嚼到圈圈里面的胜味。因为你不是孩子，所以你也觉得孩子时代是神仙的；因为你病了，你也觉得健康是幸福的。

西湖是明媚绮丽的，这样，大家在春天跑到西湖去。但纵然一个人淌在平软的湖面上，他看到的，还是在他船身以外的岛亭或山景。

所以，幸福，永远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兑现的“现实”。纵然一种幸福的憧憬到了现实，那时，那现实了的又不叫“幸福”了。

知识和欲望是正比例的。欲望的原型是一双新的袜筒，知识的脚，一日伸了进去，袜筒就永远没有还复到原来那样紧小的希望了。但知识和欲望虽然是正比例，而知识与幸福却成反比例。如知识为零，幸

福就无限大。

大部分人希望以增加知识而得到增加他们的幸福，结果是一个不幸的相反。

知识是无边际的，从此边际的诸知识中的某一种知识所吐出来的欲望，又是一个无边际。这无边际的欲望的光射到无边际的所得对象上。在一所得对象上系下了满足的丝，立刻，另一所得对象又和你的欲望在传情，在一切无边际中，你的能力和年龄是有限止的。

幸福的憧憬从几千年前挂下来，仍旧向无极的“以后”挂下去。幸福的憧憬将和人类进化线并行着。

幸福是夏夜的风，不会使人风凉到厌的。

中国人的恋爱，常在失恋后一个自杀，日本人的恋爱，常在顶热恋的时候双双自杀，这是日本哲学的高一筹处。

(选自《给弟弟们的信》，开明书店 1936 年初版)

三、论张君劢

国大召开，民主社会党提名参加；该党领袖张君劢以此大受物议。一部分报纸在其电讯、评论、漫画之间，对于张氏备施讽刺，似非将此人前途毁灭，不足快意。每日读报，感触万端，谨一论之。

先论民社党参加国大问题。在民社党本身，他们对于参加国大与否，可能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政协立场”，一个是“宪法立场”。就“政协立场”言，这次国大的召开，确与政协程序不合。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参加政协，系以民盟代表的资格为之。以民盟内部政团关系的复杂微妙，民社党是否必须遵守民盟的约束行事，本为一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至少道义上，张君劢既为民盟盟员，并以民盟代表资格出席政协，似宜忠于守约，尽量避免使其领导的政党参加与政协程序不合的国大。至言“宪法立场”，严格言之，在“政协立场”上既无参加国大之理，亦即无所谓“宪法立场”。但此处却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政治家的理想与感情的问题。我们查考张氏一生，中国这几十年来立宪运动，几乎无不有其参加。今春政协审议宪草，张氏独多贡献；重庆白象街张氏寿会，到者无不以此为颂。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这次国大召开，拥护政协者，均表反对，但事实上，国大势在必开，宪法势在必制；就说现在，国大业已闭幕，宪法亦已通过，不论将来和谈是否重开，政府能否“联合”，我们怀疑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能被推翻（依法修宪为另一事）。就是民盟中最急进的罗隆基，在答复记者询问和谈前途时，也不得不说：“最伤脑筋的国大及宪草问题，将暂予搁置，放在最后再

谈。”（12月22日《文汇报》）可见政治这样东西，一方面是原则，一方面是事实，国大既然势在必开，宪法既然势在必制，而张氏又复一生献身立宪大业，则他自必较他人更关心于这部宪法的内容，更期望一部较为理想的宪法能够制成，所以他仍参加国大召开前夜在南京举行的几次审议宪草的会议，并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假定国民党总裁能保证这部宪法在国大通过，他声明他将同意他所领导的民社党参加国大。张氏主要的目的：和谈须待从长努力，先将宪法通过了再说。由于这一种“理想与感情”的背景的不同，他遂走了与民盟不同的道路。我们对于民社党的参加国大是不赞成的，但是对于张氏的用心和动机是了解的。

次论政治权术问题。我们提出三点来讨论。（1）现在大家都在争取民主，争取民主的总目的是要把国家弄好，提高人民的生活。在现阶段上，争取民主，就是希望国民党开放政权，使国内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机会过问国事，为国服役。就与国民党的关系言之，在这个争取民主的运动里，并非要打倒国民党、排挤国民党或消灭国民党，而是希望能联合国民党共同从事建国大业。但国民党是20年来的执政党，在人情上，掌握着权力的人总是不肯轻易放手的，所以一切国民党以外的人，需要联合起来，造成一个足以与国民党相抗的力量，俾在此种相抗的力量下，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其既有的一部分权力。因之，在这一个争取“民主”的运动里，国民党以外的力量，不能自乱步骤，自相分化。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主要地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我们看到国大召开前夜，国民党对于民社青年两党之全力罗致，情急可知。在此关口，民社党参加国大，不啻捧国民党的场而拆民盟的台，在大战略上，实欠明智。（2）张氏希望通过一部近于理想的宪法。但是我们很怀疑，今日国大通过的这部宪草，是不是因为有了民社党的参加而始得通过的？据我们看来，国民党之不能通过《五五宪草》，必须通过如此次国大通过的这部宪草，实出于一种“时代压力”。这种“时代压力”，一部分发于国内，一部分来自国外。国民党的领导层，环顾大局，不能不顺应潮流。国民党之不能采用《五五宪草》，决非为了张君勱一人，也非为了民社党一党，它之非通过一部较为民主的宪法，实势有所必然。当张氏既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双方提出保证后，他自不能不履行其诺言（民社党参加国大），然而此举是否必要，仍可辩论。就政治权术言之，我们认为此举实属缺乏经验。

(3) 张氏既同意其领导的政党参加国大，而其本人又不参加，此种处置，中外不多。张氏原意：他本人不参加国大，保持一种“超然身份”，俾于来日和谈，能有所努力。但实际反应，与张氏想象者，甚多出入。各方指摘，纷至沓来，竟使张氏在和谈运动中的根本地位，发生动摇，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治家所能走的路也越来越狭窄了。今日政治家一言一行，竟不能不极度审慎，以免一失足而成千古之恨。

三论各方面对张氏的批评观感问题。(1) 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的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我们可以反对国大，但不必看见有人不参加国大便私心窃喜，捧他一下，有人参加了国大，便一股醋味，挖苦他一下。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张君劭当然负很大的责任，但我们也不能以全部责任归之于张氏一人。张氏可以左右他所领导的政党，但他不能绝对命令他的党员，因为民社党不是一个领袖独裁制的政党。同时就张氏个人而言，我们还须查考其过去，默察其动机，论政的人，绝不能幸灾乐祸，滥施诛伐，对于有希望有操守的政治上的人物，我们应当鼓励他，劝勉他，安慰他。这是我一个月来每天读报的感想。(2) 这次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在感情上自足引起旧日第三方面其他同志的愤懑。对于最近民盟函请民社党退盟一节，我们认为其事亦甚合理。合则合，不合则分，毋须勉强。不过我们愿作一言者，即解决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两条路线，一是协商路线，一是革命路线。就国家情形说，只能走前一条路线；就是共产党也未主张要走后一条路线。既然要协商，便希望各方面的力量团结合作起来。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各方表示惋惜，但张君劭个人的学问、操守、私德，在今日中国，还是属于第一流的。我们对于张君劭之是否继续为民盟盟员一节，不欲置议，但我们希望在来日的和谈运动中，大家捐弃成见，放平感情，集中人才，以收事功。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不啻分化自己阵线，他们做错了；但第三方面若因此分裂，也就完全中计。张君劭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计一私名利，若因此次挫顿，竟然被摒于民主运动门外，我们不免要

感到这个社会的太残酷了。

最后我们愿对张氏进献一言：报载先生一月以来，闭门家中（12月27日《大公报》），一月来先生之心情，吾人不得知之，但一个有抱负有信心的政治家，对于一时的得失毁誉，当不介意。先生今日须坚守者有一事，即绝对不参加传说中的政府改组。民社党参加国大后，各方对于先生均表惋惜，但对于先生之人格，仍持信仰。人之相交，贵相知心；若先生自问一切为公，则先生之苦心终必大白于天下。权术可以不深，人心不可不察。

（原载《观察》第1卷第19期，1947年1月4日出版）

四、致傅斯年的信（二封）

（一）

孟真先生赐鉴：

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力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大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及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动；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想。我们又不能在上海随便找些人叙会；这是我们主要的苦痛。我只能这样说：我自信能以相当长的时期主持这个刊物，长线放远筹，只好一步一步走。我是一个量力行事的人，我希望一切事情要“水到渠成”，慢慢的实现理想。目前，只希望这个刊物在大体上能立得住。假如能照过去的水准支持到两年以上，两年以后，我想可以发生一点影响。现在业务上可以自给，一般论者对于我们也都有很好的反应与感情。只要我们自己不自暴自弃，谨慎从事，这个事业或者可有成就。最近五六个月，我每天平均工作 12 小时，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刊物上，如兜拉广告，买纸，调度款项，人事管理，核计账目，校阅大样，都是我的工作，虽然终日疲乏，但精神上还是十分宁静愉快，我们应当尽心尽力，替国家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

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政治局面下是苦闷并苦痛的，先生所言极其同感。我想我们最要紧的是立住脚跟，心无所求，假如不想做官，即无须迎逢国民党，假如不想投机，即无须迎逢共产党，心无所求，才能言所欲言，不偏不倚，不计功利，尽心为之。

目前最困难的还是稿子。稿子总不够，同时又要维持这个水准。回顾 20 期来，大体上还能维持原有水准。先生所附《内蒙自治问题》一文，应当使国内各方面都能读到，所以想在《观察》发表一下，先生想可同意（《观察》有四分之一的读者都在西南西北各省），顺便附致薄酬 4 万聊申谢忱，务望哂纳。1 卷即将告终，2 卷正待开始，先生因病因忙，尚未为《观察》写过稿子，我们很切迫的希望先生能给《观察》第 2 卷第 1 期写一篇文章以为支持，并乞于 2 月 10 日以前掷下，务乞俯允为禱！

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1947 年 1 月 13 日灯下

(二)

孟真先生赐鉴：

在京晋谒，辱承留餐，畅聆教益，欣幸无似。翌日即返沪，未能再谒，甚为怅怅。金祸泛滥，纸价暴涨，印工倍增，本刊经营益增艰难。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说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如承俯允，曷胜感禱。敝刊第 2 卷第 1 期之最后付排期为 2 月 22 日，甚望先生能于 20 日前付邮寄沪。此次在京，无意中闻一谰言，谓本刊与孔有关。今日之世，乃恒以小人之心度人，鉴于本刊过去批评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并曾抨击宋子文，遂推测或与孔有关。此事原不足辩，

惟觉先生文章中，能对孔亦施以激烈之抨击，则外间谰言本刊，亦将因先生之文可以洗清矣。专肃，即请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年2月16日

社址：上海吴淞路444弄11号

如承，先将题目示知，以便预告，尤感。

（选自《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95年12月16日初版）

五、读孙科谈话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6月20日在南京接见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同月22日在同一城市，又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内容先后见6月21、23两日上海《大公报》。我们披诵孙氏谈话，滋多疑惑，谨评论之。

一、根据6月20日对合众社记者谈话，孙氏认为：（一）目前中共在东北反攻，系受苏联之赞同与指示。（二）中共军队优良之军火均为前日本军队之配备，盖胜利后日本军队向苏联投降，苏联遂将日军配备移交中共。（三）中国军事当局业已获得证据，有半数受苏联训练及配备之韩军参加中共作战。（四）旅顺及大连现被中共用作关内外军需之给养转运口岸，故苏联不允中国军队开入该两地，实违反1945年8月之中苏条约之精神。22日孙氏对《新民报》记者的谈话，则称：“余日前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在唤起英美之注意，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上订明苏联应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而苏联容许中共军队前往，不许国军登陆。大连虽为自由港，然属中国之商港，中国军队自海道前往，因苏联阻碍，乃拟改道营口登陆，而苏联忽在国军欲登陆之前夕，自营口撤退，交与中共，致国军不得已始改由葫芦岛登陆。又如外蒙问题，阿尔泰区显为中国领土，外蒙军队如无苏联支持，亦何能侵入。故国军之不能接收大连，反让共军先行人据，均在于苏军之占领期间内，其责任应由苏联负之。大连为我领土，我们为何不能在大连登陆，这是根据什么条约？苏联已违反中苏条约，亦等于否认大连之领土主权

属于中国。苏联支持中共、韩共、外蒙，为人人皆知之事实。因此东北已成为国际问题之所在地。中国军队至今不完全接收东北，除中共负直接责任以外，苏联应负间接责任。”孙氏接着说：“中国若失东北，即对美国为威胁，对世界和平亦为威胁。美国应有所表示。”归纳上引孙氏两次谈话，可得三点：（一）孙氏认为“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二）孙氏认为“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三）东北既已成为国际问题，美英两国领导下之西方强国，应加以注意，特别“美国应有所表示”。我们要提出来的问题是：孙氏既认为“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并称：“中国军事当局业已获得证据，有半数受苏联训练及配备之韩军参加中共作战”，然则孙氏有无向国民政府建议：由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假如没有，孙氏为什么不提出这个建议？假如孙氏已提这个建议，政府是否业已采纳履行？这是一层。其次，假定我们承认孙氏所述：“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但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中国的交涉对象是苏联而非美国，我们应当找苏联说话。孙氏于指摘了苏联种种罪过以后，除了忽而上下文不接气地说了一句“深信建立中苏间之友谊与合作为可能者”之外，并未对苏联作一句正面的责难，却侧过脸来专门向美国说话，可谓文不对题，找错了对象。其三，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中国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假如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居于最主要地位的中国，不首先负起责任来直接和苏联解决困难，却只希望美国有所表示，我们认为此种态度，既不勇敢，亦欠公道。我们应当自己先挺起来，然后希望人家来支持我。自己挺不起，只想人家来替我们撑腰，替我们收拾，这种心理和作风是要不得的。

二、孙氏在谈话中所希望获得美国（或美英两国领导下的西方强国）的“援助及鼓励”，包括军事给养、借款及政治支持三项，其中尤以军火为最重要。孙氏说：“中国之美式训练及配备军队，现缺乏军火，故亟需自美国获得接济。‘东北之得失’端赖于此。”又说：“华盛顿与伦敦之支持南京政府之宣言，当有裨益，然亦不能代替军火。”这恐怕是孙氏谈话中最实在的一部分。我们的意见是：孙氏有无考虑，美国所愿意“援助及鼓励”之中国政府，究为何等情形的中国政府。照我们的意见，美国所愿意援助及鼓励的中国政府，必须为一个建全的及民主的政府；

健全系指行政效能而言，民主系指政治作风而言。现在的南京政府是否符合这种条件？本刊本期所载 N.Peffer 这篇论文，官方想必早已读到。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形，相当了解。近一年来，南京政府天天在喊宪政，可是宪政宪政，实际上哪儿有半点宪政的影子？在这次学潮中，世界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现存政权的真面目，必可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麦克阿瑟在日本事半功倍，把日本人统治得乖乖的，而马歇尔在中国，七上八下在大热天跑庐山，花了这么许多冤枉钱，到头悄然而去，反弄得一般民间对于美国的友谊，一落千丈，美国所为何来？费孝通先生说得好：“马歇尔应当已经明白，他本来要扶植的对象实在不太扶得起。”“更使他（马歇尔）失望的是在这个政治权力下，连美式装备都全失其效力。”（阅本刊 2 卷 16 期文摘栏费文）。近来国内国外都有美式配备落入共军手中的传说，一方面希望美国供给军火，一方面原来慷他人之慨，将整批的美式配备送给中共，这个问题美国不能不考虑。现在据一般的看法，认为即使美苏不幸终致战争，美国也不是非有中国不可。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不能失之“幻想”；自己这样腐烂，这样堕落，一味巴望别人援助，实在近于“一相情愿”。孙氏关于这一部分的谈话，仅仅公开了一个秘密：即今日南京政府军火的缺乏已到了如何严重的地步！政府大员在谈话中如此露骨地表示切望美国军火的接济，尚以孙氏此次谈话为首。

三、在孙氏 22 日一次谈话中，记者曾询孙氏，如其美国反响冷淡又如何？孙氏答称：“美国反响冷淡，即等于放弃中国，是在中国之外国势力，惟有苏联，则政府将重新考虑态度。”我们认为孙氏此言，甚不得体。孙氏所谓“将重新考虑态度”是指什么呢？这可分内政外交两部分来推敲。若从内政上说，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当系指目前的内战而言。目下的事实是“战”，则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在逻辑上当系指“和”。但中国的内战，公平地说，并非美国所要求者，故我们不能认为“战”即为对“美国支持”的一种义务，“和”即为对“美国不支持”的一种报复。况且孙氏已斩钉截铁地说：“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所以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当不是指内战而言。就外交上说，按照孙氏语气，在逻辑上似乎是：假如美国放弃中国，则中国只好倒到苏联怀抱里去了！我们觉得此种谈话，

甚成问题。在常识上，孙氏一面表示“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一面又假定假如美国放弃中国，中国即将倒到苏联“势力”中去，其事是否可能，实可怀疑。再进一步说，中国自有其主权，自有其独立的国格，对于任何一个外国的对华关系，根本上谈不到什么“放弃”“不放弃”。按照孙氏谈话，不啻公开认为中国已是别国“势力”之内的东西，所以假如甲国放弃中国，中国只好投到乙国的“势力”中去。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孙氏这种论调。在国际社会中，外交运用，当然极尽奥妙，但如公开宣言，便近似无赖。我们很坦白的说，我们认为孙氏此种谈话，已经迹近一种 blackmail “敲诈”。孙氏为今日国民政府的副主席，以国府副主席的身份发表此种谈话，孙氏个人声誉的损失，其事小，国家国格的堕落，其事大；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郑重提出，表示异议的。

四、只有一项事实我们尚难判断：即孙氏此次谈话究竟是授意的，还是自发的？假如是授意的，那就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假如是自发的，那只是代表孙氏个人的。但即使是后者，孙氏既身为国民政府副主席，我们亦不得认为他在这样严重的政局中发表这样露骨的重要谈话，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见解，而一无政治意义。照我们的看法，这次孙氏的谈话，只有一个意义，即孙氏谈话的目的显然在观测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的反响。因为从技术上说，假如南京政府真正不能支持，它尽可以以最机密的外交通牒照会白宫，正如英国在1947年2月27日正式照会美国它不能继续担任它在海外的任务，要求美国先来接受它在希腊的任务一样。南京政府派往华盛顿从事外交接洽的人员很多。假如仅仅是对杜鲁门和马歇尔等呼吁，实无须孙氏公开发表那样毫无掩饰的谈话。美国朝野对于孙氏谈话，将作何种反应，须由日内的电讯报道说明之。不过一个国家由其副元首发表语气如此坚决，无甚转圜余地的谈话，事不多见。然而我们亦正可从孙氏的谈话中，明了今日南京政府业已面临如何严重的政治关头。

6月23日

（原载《观察》第2卷第18期，1947年6月28日出版）

六、致胡适的信（三封）

（一）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僨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1卷24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12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

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力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筹，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2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鼓励和赞助，前辈也有鼓励赞助有希望的后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2卷第1期写一篇文章（2月15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1947年1月21日，农历大除夕

(二)

适之先生：

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3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8月18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年8月12日

(三)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20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我想先生对办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

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10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年9月22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

七、评蒲立特的偏私的、 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 (William C. Bullitt)，本年7月，衔《生活》、《时代》发行人亨利鲁斯之命，来华考察，10月10日在《生活》杂志发表访华报告 (China—A Report to the American)，长达万言。中央通讯社不惜工本，全部用电报拍回，各报纷加披露；官方及官方的报纸一致颂扬。吾人披诵之余，谨述其意见如下：

第一，我们统观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苏防苏。蒲氏以这一个中心思想为出发，他认为目前最有“统治中国的威胁者”就是苏联；他认为中共是“苏维埃强权政治的工具”，他认为苏联意欲利用中共这一工具把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他痛责已故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会议中的错误；他认为在1947年2月12日杜鲁门总统演说以前的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可笑的态度”；他叙述马歇尔于1946年1月10日使中国政府与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定，但是“苏联的计划是利用马歇尔所斡旋的停战时间，尽量把共军自华北运往东北，而把接收自东北日军的大量武器，配备共军，利用停战时间，到中共军队装配齐全的时候，苏军再行撤退”；他又叙述马歇尔使华失败返美后，美国对华抱旁观政策，停止在军火上及财政上支持国民政府，但“苏联在另一方面却装备了我们的敌人”——蒲氏此处所谓“我们的敌人”，显系指中共而言，这表示蒲氏业已认为中共同时亦为美国的敌人——，蒲氏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蒲氏认为假如斯大林控制了东北，“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关系异常重大”，最后对于美国本身也有严重的后果；因此，蒲氏认为美国必须对于国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盘的援助，“仅仅取消美国对华禁

运军火的命令还嫌不足”，蒲氏认为杜鲁门总统应该像罗斯福总统在邓克尔克撤退后英法严重缺乏枪炮弹药时所做的一样，采取迅速的行动；蒲氏述及现在美国有数十万吨积存的弹药，弃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烂生锈，他主张将这些物资宣布业已不适美军使用，作为废弃，然后以一元作价五分，售给中国。同时为避免中国的“通货膨胀瞬即会像脱缰之马”起见，美国政府应即在后此的30天内贷给国民政府7500万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经济财政军事方面作全盘的援助，以三年为单位，在三年以内，由美国贷给国民政府13.5亿美元，其中6亿元作为三年计划中的信用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的物资，如美棉、烟草、小麦、石油、汽油以及机车、铁轨、卡车等，另6亿元为三年计划中军事方面所需的费用，用以装配旧的军队，训练新的军队，再加1.5亿元作为外汇平衡基金。这是蒲氏援华方案的纲要，而所以要全力援华，其目的乃在“把每一个武装共产党徒驱除于中国领土”，“阻止斯大林霸占中国”。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蒲氏所攻击苏联的种种事实是否正确的以及蒲氏所建议的各项办法能否实现，我们在此所欲讨论者，乃是蒲氏的议论的动机和态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间牵涉到许多问题：一、蒲氏不愿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然则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二、在过去几年中，到底是苏联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还是美国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三、今日美国，如蒲立特先生者，因为恐惧苏联，主张全盘的援助国民政府，反苏反共，但过去几年中，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膨胀，以及这次像蒲立特先生这种建议，是否可以使苏联感觉愉快，感觉安全？凡上三题，蒲氏一字不着。蒲氏一开头就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4.5亿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美国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既然可以如此说，苏联又何尝不可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4.5亿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苏联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可以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苏维埃帝国主义者”，苏联又何尝不可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蒲氏可以说：“我们（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苏俄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我们”，苏联又何尝不可说：苏联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美国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苏联？假定苏联亦发表与上列蒲立特所宣称的相同的议论，至少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间并无任何轩轻。

然而假如每一个国家，都恐惧别的国家控制中间某一个国家，大家都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对方国家统治这某一国家，则世界还有什么和平？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自主，业已成为一个世人共同感觉的事实。蒲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议由美国贷款给中国，卖军火给中国，替中国训练军队，帮中国打垮共产党，监督贷款的用途，管理军队的给养，而且主张“派麦克阿瑟将军于现有职务及权力以外，加上大使衔的总统私人代表的称号，飞往中国，和蒋主席拟订一个共同的计划，以防止苏联的征服中国”……蒲氏之企图由美国来控制中国，已极明显。蒲氏一方面不愿中国陷入斯大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图使中国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实上美国业已独霸中国，一方面蒲氏还在大声疾呼，宣称苏联企图“独霸”中国，蒲氏这种议论，实在有欠公允。就我们中国人自身来说，我们久已苦痛于我们有一个落伍的腐败的政府，在20年的统治中，把国家搞得越搞越穷，越搞越弱，越搞越乱，以致引起强邻的窥伺。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一个略有野心的国家，不论是过去的日本和英国，或者今日的美国和苏联，哪一个不对中国转念头，打主意？不过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权利指摘对我们有野心的国家。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而在这种情形下，蒲立特先生有什么面皮猜猜然一面倒的抨击苏联？蒲立特先生为什么要援助中国，他有什么理由要独爱于中国？拆穿了说，他不过是要利用中国，正如他在他的文章里开头所说的，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抗苏联，以保障美国的利益罢了。美国有钱，美国企图用金钱来收买中国，要中国人替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理由要独厚于中国，要借钱给我们，援助我们？统观蒲氏全文，我们认为蒲立特先生的整个出发点是偏的，而他的动机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蒲立特先生主张援助中国，实际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国民政府。理论上，政府本来是代表国家的；但在历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国家的；目前的中国，就处于后一种情形。就对外关系上讲，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反美，也不愿意反苏，都主张同时与美苏友善，甚至希望中国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中国有无能力

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这是另一问题，但至少表现于近两年来中国的言论者，大多数人都不愿中国成为美苏双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国的现存政府，因为要维护他们个人或集团的权势利益，他们坚决排斥共产党；因为排斥共产党，连带仇视苏联；因为仇视苏联，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国怀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拨美苏之间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做法，并不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附和。至于在内政上，中国现存政府之业已失去人心，其明显确切，一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无须我们再在此处浪费笔墨。魏德迈将军在致美国援华会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声称：中国人民只求能供给粮食与居住之任何政府，对于倾向苏联一举所包含之种种复杂问题，不暇顾及。（美国新闻处华盛顿 10 月 16 日电）魏德迈将军这种观察是正确的。对于中国一般穷苦的老百姓，国民政府也好，共产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么政府也好，他们都“不暇顾及”，他们所急切关心的是能让他们活得下去，让他们有果腹之粮，御寒之衣，以及躲避风雨的房屋。这同时也就说明：这 20 年来的中国执政的人物，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尽其应尽的职责，甚或根本对于这种基本问题，没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20 年来南京的官员所发生兴趣的，是政局的演变，权势的得失，而非一般社会经济生活的改革与改善。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凄惨，业已到达为一个大文学家所无法描写的地步。在内地城乡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艰苦，更不必说，就是在这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 11 点以后，许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门汀走道上，躺着手脚蜷缩的无数贫民，就在这萧瑟的秋风之中，获取他们为维持他们像游丝一样的生命所必须的睡眠。这些人本身并无罪孽，然而他们却过着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叙述我每晚所目睹的这种凄凉景象，我亦仍然不禁热泪盈眶，悲从中来。然而一切对于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真正具有兴趣具有抱负的人物，他们无法有机会为祖国服役，而掌握权力的人，则仅知如何巩固并发展他们自身的权势与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我们依然不能获得我们应有的各种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对派人物经常生活在恐怖与不安之中，政府经常用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和存在，而其方则花样百出，巧妙无穷。然而政府还要扯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倾向民主和决心实行宪政。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

中国 20 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没有路轨，可以向外国买钢轨枕木，无法耕耘，可以向外国买种籽肥料，要发展工业，可以向外国买机器原料，要改革币制，可以向外国贷款，惟有道德的堕落，非一时所能回复，也非向外国借贷所能改善。因此我们很公平地说，这个政府确已与人民脱节！与人民的需要脱节，与人民的福利脱节，与人民的意愿脱节。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国内国外所公认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能满足中国人民。这个政府不仅已与人民脱节，而且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脱节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在它的统治下，人民将愈来愈没有希望，饿死的人必然愈来愈多，自杀的人也必然愈来愈多，而原有一块钱的，在它的统治下，亦将渐渐变成为五角，变成为二角五分，变成为一角二分五厘，以至终于变成赤贫。这个政府业已成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这样一个政府，就是蒲立特先生主张美国支持援助的。蒲立特先生建议援助的，就是这一个“政府”，而并非中国这一个“国家”。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要使这个政府成为美国的工具，代美国来驱使中国的人民为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

蒲立特先生的动机既然如此，既然企图利用国民政府为保护美国利益的工具，因之他便大捧其国民政府及其领袖人物，一面倒的敌视中共。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 20 年来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国何致弄到今日这样民穷财尽的地步，替共产党造机会？假如 20

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声势？假如 20 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徬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率直的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制造共产党培养共产党的因素不先消灭，哪里能消灭共产党？照现在的样子，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 10 个共产党，消灭了 10 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 100 个共产党。在蒲立特先生的建议里，他建议由美国来训练中国的军队，供应中国的军队，指挥中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膨大，并非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脆弱，反过来说，并不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增强后，共产党就将消灭。今日中国的问题之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者，已为识者所公认，而这个曾经两度做过一个大国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这样近视，这样胡想，我们真是替近代人类社会文化水准的低落伤心！蒲氏又建议大宗贷款中国，以解救中国的财政危机。他主张在三年内贷给中国信用借款 6 亿美元，用以购买美国的食物、原料与机器；他实在是间接替美国货做买卖。我们不相信在这种混乱的行将崩溃的局面下，单靠外国的贷款就可在根本上稳定中国的财政，改革中国的币制。在抗战中，政府曾经发行大批关金，企图稳定当时日益贬值的币制，但今日关金价值如何？前车不远，昭昭可鉴。我们认为整个的局势不趋稳定，一切改革币制的努力都属白费。因之我们认为，在蒲立特先生的访华报告里，不尽他的动机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总之，蒲立特这篇文章并无任何可取的建议。他是一个反苏人物，他之有他这一套，实极逻辑，而他之能洋洋洒洒发表其意见，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下，亦极自然。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他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却是一种投机。照最近各种趋势观察，美国殆将改变自马歇尔返美以后以迄于今的那种袖手旁观的政策。美国政府之将积极援助国民政府，虽其方式、数目、条件如何，尚不可知，但援助之来殆无异疑。蒲氏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种建议，又于来华以前，先访东京，其间机微，至堪寻味。

10 月 17 日

（原载《观察》第 3 卷第 9 期，1947 年 10 月 25 日出版）

八、论程孟明案兼论社会有心人 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

1月27日上海《大公报》载：律师程孟明去年12月26日接到邮局“欠资”1500元的一封信，程律师认为邮电加价还没有完成立法程序，邮局补收“欠资”等于收受“不当得利”，因于第二天向法院控告上海区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要求“返还欠资”1500元。这个案子经上海地方法院推事凌元庆“不经言词辩论”，判决程孟明败诉。判决理由，认为此次邮电加价，系经国务会议第16次会议通过，国务会议依法为国府之最高国务机关，有制定立法原则之职权，并依历办成案，国务会议以修正法律规定而先饬执行者已有实例……因此认为国务会议有权宜处理之权，也就是说，邮局执行法令加收邮资，非不合法。

1月28日同报又载：程孟明律师经地方法院判决败诉后，复亲撰诉状，向地方法院控告承办此案的推事凌元庆渎职，原文如下：

为自诉渎职事，按有审判职务之公务员为枉法之裁判者，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定有处罚明文。被告为上海地院民庭推事，有审判之职权，其审理自诉人与上海邮政管理总局为欠资不当得利事件驳回自诉人之诉，应认为枉法之裁判。查原判所持驳回自诉人之理由，系采本月8号南京之电讯，谓国务会议有制定立法原则之权；邮电加价案既经国务会议通过，即可生效，且已经有实例云云。而判决之时间系在本月20日；自诉人曾于本月9日具状续陈理由，驳斥该项电讯（即原判所持之理由），被告不得诿为未睹。于本月20日作判决时，对该状只字不提。

盖自诉人在该状申述国务会议固有制定立法原则之职权，但无制定法律之权，立法原则并非法律，故国务会议之权宜处理似不能发生法律之效力，即不能认为有法律上之原因；已往实例，显属错误，宪法公布以后不容再误，理由至为充分；一经斟酌，即无从驳回自诉人之诉，久为被告所深悉。故一笔抹煞，只字不提，竟以驳回，实属故为枉法之裁判。

我们对于程孟明律师个人，一无所知。我们在此要评论的是这个案子所代表的精神：

一、这个案子的法律目的在要求“返还欠资”1500元，而在这个要求的背后，表示自诉人否认这次邮电加价为合法。我们若以常识判断，将无人能承认：程孟明律师控告的真正目的乃在追回那“1500元”！程孟明所争的，不是那“1500元”的法币，而是“不承认任何非法行为”的一个原则。他争的是原则，不是金钱。

二、程孟明第一次控告的对象是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但是我们必须假定：程孟明和李进禄之间并无任何私人的恩怨。程孟明所要控告的是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而不是李进禄先生。控告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与控告李进禄先生，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公事的，后者是私人的。这个案子，程孟明要控告的实在是上海邮政管理总局，而这个被告上海邮政管理总局的代表人恰巧是李进禄。这个案子虽然涉及李进禄，但与李进禄私人并无任何关系。我们已假定程孟明与李进禄私人之间素无恩怨，因之，程孟明不因与李进禄个人无恩无怨而不控告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同时控告了上海邮政管理总局局长李进禄后，并不表示程孟明和李进禄在私人之间已有任何纠葛介蒂。我们必须分清，这是两件事。程孟明在第二次控告中控告地院民庭推事凌元庆，其意义同。

三、这次的邮电加价，即使在政府自身，也曾引起极大的波澜，立法院和监察院都强烈表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在我们这个“法治”二字已失去严峻的解释的国家里，各种事情都在糊里糊涂中混，在邮电加价业已在“无声”中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下，程孟明律师独独要提出法律控诉，否认这个邮电加价的合法地位；这就表明，程孟明律师这个行为在

这个混乱、消沉、没有是非的社会里独具一种意义。程孟明律师大概是一个个性坚强而又具有正义感的人，再加上不幸他又是一个律师一个以维护法律为终身志职的人物，使他在他良心及性格的混合感情中，很自然地发生这种为维护法律争取正义的行为。在常识上，在目前这种社会情形之下，他这个“官司”打得赢打不赢，恐怕人人都能不卜先知，但是他却要干一下，干一下不算，还在干下去，连判决他败诉的推事他都控告起来。他第一次的控诉业已败诉；他第二次控诉的结果如何，现在不知。但我们要注意的，不是他那“官司”的赢输，而是他在这个案件中所表现的精神，一种争是非而不计成败的精神。

我们于叙述事实并加分析以后，兹愿一述其感触。我们认为程孟明这种精神，正是今日中国最缺少并亦最需要的精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是一个只有权力而无是非的时代。一切有权有势有钞票的人，都可横冲直撞，逍遥自在。甚至知识在这个年头也变成了压迫弱者的工具，知识已与道德脱离，良心与公道在这夜雾中几乎不能发光。前些日子，上海有一家正余纸烟店藏有白银1万多两，被官方没收，当局竟拟处分：银圆每枚以法币一元强制收兑。照这个办法，那一大箱白银，只能换得1万元法币两张，该店店主19年的积蓄，到头落得只够买一包香烟。然而当局却说，这个强制收兑是有根据的，因为民国二十四年11月3日使用法币以后，当时规定法币一元兑银圆一枚，三十二年9月23日财部公布的“银币银类兑换法币办法”也是规定法币一元兑换银圆一元的。合理不合理是另一问题，法律如此规定，是没有办法的。（见三十六年11月26、27上海《大公报》）执行的人只管根据法律，然而存在的法律是否合理近情，却无人过问。一切与人民福利权益脱节的法律，竟没有人加以废止或修改，而一切剥削人民福利权益的法律，则如雪天的雪片，源源而降。社会上不是完全没有正人，但法律不能保障正人，结果正道被邪道压伏，谁出头谁就倒霉。在这种情形下，大家都惶惶恐恐，战战兢兢，到处是“明哲保身”。好人既都明哲保身，坏人自然越来越无法无天，以致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完全失却了道德樊篱的没有生气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政府正用各种力量以求社会的安全，企图维持现存的局面，但在现局下，却到处潜伏着不平、积怨，和难于遏制的愤怒。目下到处流露着不稳的情绪，而有为都变成为消沉，建设都变成为破坏。

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但是国家到底是我们大家的。有志气有血性的人还是应当自动起来，为正义争一争，为是非争一争，成功失败是一件事，我们责无旁贷又是一件事。今日中国最缺乏的精神就是一种战斗的精神（fightingspirit）；全神贯注，勇往直前，或者与恶势力奋斗，或者向新事业创造，方面虽异，战斗则一。这种战斗的精神是今日拯救我们国家的唯一力量；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战斗的精神，我们的国家实已名存实亡，毫无希望！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有其前途。就我们的体验言，在今日中国，无论哪一地域，哪一阶层，哪一职业，哪一年龄，都有不甘自弃的有志之士，凭其热血，希望把国家弄好。我们号召今日中国一切有志气有血性的人们，应当提高我们的情绪，坚定我们的信念，唤起我们的勇气，不要放松我们的劲道，向我们的理想迈进。程孟明律师这种打官司的精神就是我们极好的榜样。在落伍的、没出息的人的想法中，以为这是胡闹，以为这是神经病，听说上海有些报纸记载此事，所用标题，都带些挖苦味道，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头等有价值有意义的行为。我们并不知程孟明律师为如何人，但这个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我们不管这个人姓张或姓李，我们所提倡的是这个案子所代表的精神。我们要将这个社会从旧变到新，必须先使我们自己的观点从旧变到新，我们对于一切事情应有一个崭新的看法，一个跳出旧圈子的看法。我们要和旧的奋斗，战胜旧的，打倒旧的，才能将新的提长出来。时局越来越使我们苦闷！但苦闷何用！苦闷是消极的，我们要从苦闷中冲出来！

本人心中有一个意思，多年迄未吐出，现在乘此一述，请求读者指正。我常感今日社会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我们遇到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应当使之合理公平。改革社会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以暴力在根本上推翻这个社会，一个是在既存社会制度中求其改变。现已有一部分人走着前一条路，我们没有走前一条路，但我们应该在后一条路中多做一点事情。做总比不做好，多做总比少做好。现在一般老百姓受的欺侮太多，受的委屈太甚，“法律”究有多少尊严，此处不谈，但我们的正路是在法律之下控诉。“打官司”有三个条件，即有钱、有时间、有法律知识。这些条件非人人所能具备，因之，我们认为，在律师界中，不乏有志之士，他们是不是愿意牺牲一点时间和收入，来做一点公共事业，

替我们的国家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在理想上，一切受非法压迫而打不起官司的人，我们应当替他们打官司，为他们申不平、雪冤枉、解苦痛。这个理想是伟大的，但在实际上，也许一时未必办得到，因为今日一般人民中要申雪的冤枉苦痛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规定一个范围，挑几件有关大原则的事件做一做。譬如政府如有任何违宪违法的行为，我们即进行法律诉讼。打官司要钱，但我们相信社会各界必有很多热心的人士，愿为这种为公共福利而奋斗所需的费用，捐出钱来。新闻界言论界的朋友也必有人愿意参加，来共同讨论诉讼的应否进行或传播案件的情形。官司一级一级打上去，一直打到底。打赢了，全社会有利，打输了，至少可以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与了解，从而促进法律的改革。这是一个促进法治的运动，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

我们愿意再进一步说，在争取言论的自由上，本人一向认为言论界自身所负的责任，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同样，在争取司法的独立上，司法界的朋友所负的责任也比其他人士为重。司法界的朋友不要以为我们这种建议是和司法界为难，我们的目的实在毋宁说是帮助司法界的朋友争取司法的独立。所谓司法独立，就是要不受权势的干涉。按照戴雪教授（Albert Veuu Dicey）之言，法治的真正意义是“武断权力之不存在”。要争司法独立，必须坚决抗拒任何武断权力的侵犯。司法界的朋友假如感觉力量单薄，我们全社会来做他们的后盾。我们上述的建议，乃在引起社会广泛注意今日中国法律的效力及其尊严。我们要帮助司法界的朋友在法治的精神下完成其任务。我们和司法界的朋友是合作的，不是处于对立的。和我们处于对立地位的乃是坏的法律、坏的法官，以及一切破坏法律侵犯法律的人，而非法律、法官，或一切维护法律的人。

1月30日 上海

（原载《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出版）

九、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 90 人的来函，已刊本期投书栏。编者另接北大一个学生来函，内云：“目前的情势愈来愈严重，陈雪屏吴铸人一再扬言学运由共党操纵，并竭力分散师生之间的团结，煽动学生与难民之间的仇恨。吴铸人并公开警告出席学生集会的三教授（指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先生）。这虽是恫吓性质，亦未始不可能造成闻一多事件的重演。”这个学生又说：“各种事实的教训，已充分证明：要在现政府下求改革，只是一个幻想。”

这一年来国内的情形变化相当大。军事上的变化和经济上的变化是大家看得到觉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觉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情绪上的变化。去年 5 月 6 月，南北各地都沉沦在排山倒海的学潮之中，那时参政会正在南京开会，一部分参政员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国共之间的和谈。一般社会，包括学生在内，亦都衷心希望和谈恢复。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害，大家都是为国家着想。其后参政会开会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观，极端分子在会场中占着压倒的优势。那时我们就接到北平方面的来信，说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学生）对和平最后一次的呼吁，这个阶段一过，学生的情绪可能要转入另外一个更积极的阶段了。去年 7 月作者在北平耽了三个多星期，听说许多学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丢开一切，头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们觉得在“这一个”区域里耽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已不愿再将精力和时间浪费在那种毫无实际效果的呼喊上，他们决定去做一点更实际的工作，做一点更有效的工作。当一些朋友谈到

这些情形时，一方面在心底里佩服这些青年有勇气，有决心，一方面都叹息当前的环境竟把青年逼成这个样子。有一位先生恋恋地说：“走的都是最优秀的！走的都是最优秀的！”

这一年来，就学生一部分说，最触目的现象，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敌视的程度越来越深。在政府一方面，只要学生一有什么活动，就恶意相视，咬定他们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在学生一方面呢，则对于政府，已老老实实，直截了当，指这个政府是一个反动的政府。政府和学生，实际上已俨然成为敌人。为什么会弄到这个样子呢？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实在使人太失望了。作者对于国民党20年来的执政有一个一贯的看法，用一句话来点穿：即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他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他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多弄一点钱；假如政府颁布一个新的法律，那就因为这个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动，或作为政府某种行动的一种法律根据。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他都没有兴趣，或者装聋作哑，或者敷衍了事，或者干脆不管。人民没有饭吃，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衣穿，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他管吗？他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政府只管束穷人，不管束富人。在重庆时代，威尔基、华莱士要来了，就实行清街，一切没有饭吃的穷人都在被清之列，以免有碍观瞻；国大开幕了，下关和浦口的难民都被驱逐出去，以致发生蚌埠的抢案。大家痛恨豪门，要求动用他们在国外的财产，可是政府不敢碰一碰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大家要求实行民生主义，使耕者能有其田，可是政府没有决心，不敢有损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统治怎能叫人拥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顺眼，没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高兴。一切公共的舆论都不能改变政府的作为，官做他的官，党办他的党，脸皮老老，肚皮饱饱，这叫人怎能服气！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

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决不是基于任何个人的利害而发生的，这是一种客观的环境所促成的。而且，我们还应该说，这种变化正在“时间”的推进中加速其程度。本刊4卷7期刊有一篇读者投书，说：“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过来了！一般空气很紧张，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静。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似的。”这最后的一句，极堪玩味。据我们所能感觉到的，现在北方一般青年的心情，都在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为什么大家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就因为今天我们所见所闻，不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社会上各种恶势力、恶习惯的根基实在太深了，这使我们简直不敢希望在这个现状下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过来。最近国内一般言论界，大都非常消沉，这消沉是一种可怕的消沉，这转向也是一种严重的转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了解这种消沉，不在根本上设法挽救人心的转向，而仍然走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强力去压伏人心！

在这一个无声的变化中，唯一可以觉察到的，就是学生的态度。在这一年中，学生运动有几个引人注意的特征：第一，学生已经成为了人民利益的发言人。综观年来学生运动所争取的，归纳之不外两点，一是人人要有饭吃，能够活得下去，这就是他们所喊的“反饥饿”；二是人人应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不能无故遭受迫害，这就是他们所喊的“反迫害”。他们所争取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他们自身的权利，他们的呼喊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第二，在学生运动的技术上，他们业已到达为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他们所常常歌唱的“团结就是力量”。他们的团结程度，确为前所未见。政治是有物理性的，压迫愈大，反抗亦愈大，他们的如此团结亦可反证当局压迫的厉害。不仅是一校一地团结，他们业已做到了全国团结的程度——至少在精神上，他们的团结是全国性的。所以一校出了事，他校立刻响应，几个学校宣布“联防”；一地出了事，别地方的学生立刻响应，呼吁、控诉、捐款、全力支持。第三，勇敢，坚定，他们完全成熟。他们在现实的分析，理想的追求，办事的能力，

奋斗的精神上，均已表现出惊人的成就；他们已隐然成为一个推动时代的巨轮。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政府如何对付学生呢？据我们的观察，政府对于学生已怀有一种超出常态的恐惧心理，因之政府对于学生的态度，完全陷入一种变态的状态之中。政府业已有一种牢不可拔的成见，认为学生的一切具有政治性的行动，都是受共产党利用的。在这一个大前提下，于是政府对于一切“闹事”的学生，完全不把他们当作“学生”看待。我们看，这一年来，只要学生有什么公共集会，政府便是出动大批军警，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上海（同济）的案子，成都的案子，北平的案子，政府用刺刀，枪柄，麻绳，木棍，石子，机枪，马队，飞行堡垒来对付学生，造成极度紧张的空气，引起社会极度的不安，发生令人难以相信的残暴行为。学生无论闹得如何凶，讲到后来，学生总还是徒手的，以有武器的军警来对付没有武器的学生，无论如何总是残忍的。成都的警察甚至用刺刀在女学生的阴户里拌搅一下（见本刊上期成都通信），实在惨绝人寰。只要一个政府稍为有一点人道的精神，我们相信绝不致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学生。

我们认为政府遇到学生有所抗议时，应当很冷静地考虑学生的抗议有无理由。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他们希望人人能活得下去，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错吗？他们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难道我们能够说他们做得过分吗？他们不满意这个政府，难道这个政府是能使人满意的吗？今日政府所要做的，所应当做的，不是防范学生，不是压迫学生，不是打击学生，而是自己反省，自己改革。政府应当自问，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可以使人民满意，如其不能，人民当然有权利表示反对。这是现代政治潮流中的不移之论，没有什么稀奇。假如政府希望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应当多听一些人民的意见，多做一些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尽量减少人民的苦痛，增加人民的福利。政府果能如此，还有什么人要反对政府？就是有少数被野心家利用的学生，要闹也是闹不起来的。

这次北平和成都两地所发生的暴行，实在使我们难于缄默。而据北

平来信，似乎第二个“闻一多事件”正在制造之中。我们认为这种事件，即使替政府着想，也是万万再发生不得的。政府希望安定，但是政府难道觉得今天的局面还不够动荡吗？政府今日的处境还不够危急吗？政府已经做了许多错事，远者不论，即以近事而论，国代和立委的选举，都增加了政府及国民党自身的离心力量，这次副总统选举，又发生了这样大的风波，这事的后果目前还没有露骨表现出来。假如什么地方还要再发生类似闻一多的案件，我们敢说立刻要闹出大乱子来。我们希望政府及各地地方当局，能够慎审处置，不要操切用事。闯祸容易，收拾乱子就难了。

4月27日

(原载《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出版)

十、悼志摩先生

这年代随处爱给人忍受一份不可言说的苦难，摆着晦涩的脸，教你气促。全是秋冬景象，一切都挂上死亡的颜色，等着长青芽还远。国度如深山里的小部落，睁着眼睛看别人家的长进和热闹。孕成的大乳石，只要凶运一到，便是一声吓倒人的崩坏。黑漆里有的是伤感的袭击。

虽然时季在一种窒塞的国难的气息中，可是对于这一颗大星的陨落，志摩先生的罹祸，我相信在一般困乱的心槽里，当更渗下了一滴苦汁。他关切的朋友和他忠信的读者，将全感到他们自己的损失；为我们的诗人志哀着。10年来中国文坛的收获，志摩先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由他来砌起了一座楼屋，正还待他的经营。每个人，对于这熟悉的名字，都有着一种亲昵的感情。他的恩泽是一道最和丽的光，大家都收到他的照耀。

我初次认识他是在五年前的一个春天。那时，有若干人想排演一个脚本：茶花女，在华龙路新月书店三楼谈话，在座有余上沅先生江小鹈先生吴瑞燕女士这一些人。志摩先生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虽然这一次谈话以后也没有再有问闻，可就在那时，我感到他的热心永远是大家一个最好的监督。

过后一两年，他收下了光华的聘书。一次更接近的通气是不消说得的。这人初看上去，和他应酬似乎很费力。可是你和他熟悉了，你便明白这正是他的率直，他的诚挚；他诗人的节气。他对于后进，有的是一份提拔的心热，如他在《诗刊》第2期上说：做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见。除非你不去找他，要不是，一开口就像10年前的老朋友，

不跟你来一些虚套（有时虚套只是一种骄傲）。

要他写东西有一丝苟且是不来的。他在《猛虎集》上说，他有时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或一个字眼也得拼忍到成天半日。字眼一到他手就全标出了它们自己的分量。这认真是我们绝大的师法，我说不仅是在文学的努力上，便是在为一切学问或为人上也一样。

在他自己的功绩上，散文的成就比诗要大。他文笔的严谨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散文原是诗的扩演，他会对我说，内涵是它的骨骼，辞藻是它的外表；一座最牢的房子，外面没来一些现代美的彩色与轮廓，仍不能算定成它建筑上的艺术。他的文章，各色各种爽口的好水果全有。你读过他的作品，便知道；香艳的如“先生，你见过美艳的肉没有？”哀悱的如“我的彼得”。

我最末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1月里。那时我预备去北平。有一天去看他，三个钟头前，他正从北平回来。听见我也上北平去，说：

“好极了，咱们的朋友都在向北平流。住北平只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远像一只蜗牛般的躲在屋子里。”

年轻是他的本分。在自剖里，他自己说：“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他的兴趣永远是雪天的白瓣，他的灵感永远是波涛的汹涌。

为了自己文学修养上的稚浅，我想住北平后，常去他处承教承教。有一天张东荪先生告诉我说志摩先生已经到了北平，可第二天，我又为了别的缘故，回到了南边来。去年春天编《今日》，问他要稿子，他来信时还记念到这江南的好妩媚；我在西湖时，曾经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

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分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

但是天不为这荒芜的中国的文坛多延留几年这卓越的诗人。就在“一球光直往下注，轰的一声炸响”里，炸倒了这破碎的文坛上的中柱。

当我有一天晚上读了第一家登载了关于他罹祸的不幸的消息的Evening Post（是家璧拿来我看的）以后，我的意境中，一时体味到一支说不出的苦涩，一次至大的哀悼。我跑到或写信给每一个关切志摩的朋友或读者，报告他们这一份不能补给的大损失。

三月江南又是一片好春天。在今夜，在这十六分外圆的月亮下，凭我向往对他的一宗刻实的信心，写下这短短的两千字纪念他。我祝福他在天的灵魂永远的轻松着；他的精神永远是不死的。

(原载《新月》第4卷第1期)

第五章

杂 论

一、独幕剧

血之沸腾

人物：薛耐根 年23，工人。

黄忠道 年28，工人。

黄恕道 年26，工人。

汪氏 年20，耐根之妻。

看护妇 年20余

时代：现代——某年5月3日。

地点：上海

布景

一间医室。因为这医院是一个工厂所附设的，所以布景很简单，间架也很小。左边一扇门，通外走廊，右边两扇窗，窗外可望见远处的烟囱。房内有两架床，床上都铺着洁白的被单。上面靠壁，放着一张八仙桌，下面则有面盆架和几椅等件。

(启幕时，台上无人。)

看护妇 (在门外，时门犹未启。) 就这间罢，好在时候不很长久。

(门启，黄忠道恕道很吃力的将耐根抬进。三人都穿着蓝布工衣；耐根面色惨白，头上扎着绷布，鲜白的绷布染了些血迹，衣服上也有不少。左手几乎完全裹在绷布里，仅露出几个手指。

看护妇接着跟了进来，穿着一身看护服，右手拿着药瓶，右手和左手，又合捧着一只盛着半盆水的白面盆。)

忠道 这张好。(说时以嘴指左边的一张)窗子下面，光线可好一点。(忠道恕道将耐根很轻的抬在床上。恕道从另一张床上抽了条被单，盖在耐根身上。)看护妇(将面盆放在面架上)大约还有半个多钟头，才得醒啦。恕道不十分危险，也就得咯。

看护妇 不过，为的是，流的血太多咯!(走至床前，话声放低)至少，亦得住个把礼拜。(将药水搽在耐根面上和手上。忠道恕道都弯着背俯视着。全场沉默。)忠道(抬起头)窗可要开么?看护妇(间)开半扇也好，好在吹不到他的头上。今天风很小啊。(忠道开窗)

恕道 今天是东风，(走到椅边坐下)
(忠道站在床边，望着窗外。全场又沉静了起来。)

看护妇 (药水已搽好，凝视耐根面。)又是加薪么?(间，无答语。)弄成这个地步!

忠道 还不是旧戏新串?!(间)咳，吴阿姐，好在都是一样的啊，现在顶糙的米，都出300外了!就说我们两个罢，都还没有家小，但是，一个老娘，已很觉得勉强了，何况还有女子的呢;(看护妇走到面架前洗手。忠道转身，先望了望她，再本能的望着耐根。)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多少次失败了，但是，我们也并不因失败而就灰心!这本是前天全体会议所议决的议案，但是，是的，不知有多少次了，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过!

看护妇 是的，不知有多少次了，而从没有这一次……

忠道 他们去要求的时候，全工场的秩序，仍是很好啊!便是要讲到激烈罢，他也不能算是最激烈的一个。同去八个人，虽也有被打的，但谁也没有像他，他一样，被打得头破血淋，况且他又是第一个给他们打的。

看护妇 当真，他们也太轻看了人命了，拐起手杖就打，张总管的一根手杖，着实不轻啊!

忠道 况且，况且加薪的事，与张总管更不相干啊?!

恕道 天下的事，一个果，总有一个因啊!(立起)你还记得?前天

的事？的确，那时候，他是过于激烈了一点。不过也不能说一定就是说张总管啊！耐根在那天上午的纪会上演讲，不是这样说着的么？他说：“现在一般帝国主义的走狗，简直狗都不如，狗都配不上！因为他们的人格，比狗的狗格，都不如！叫他们走狗，简直还带着恭维！……他们不知什么是良心，什么是义气！他们的眼睛，只看得见白闪闪的洋钱！只有白闪闪的洋钱，能够掀开他们的眼皮！他们只晓得奉承外国人，他们的神主！他们只要有位子可升，什么都做得出！甚至假若他们的父亲也在厂里做工，那他也许会将他自己的父亲，都开除掉！……他们不顾到什么是公众的幸福，什么是工友的利益！（兴奋）他们只会拍马屁，只晓得洋钱……帝国主义的走狗，压根儿连狗都不如！”……这，这同去年程闽强的被开除掉，不是有些相像么？程闽强不是张总管的表亲？据说，张总管之所以得长大，都是程闽强的娘的力量。可是因为闽强嚷着要组织工会，给这狗种一个有机可乘，反而让他升到了今日之总管的地位……

忠道 程闽强的开除，是他缠鬼？

怒道 怎不是？他的升到总管，就是为了这件事！老实说，程闽强就是应当开除，他也应该从中帮帮忙，现在，哪晓得，反而是他的主意……这件事，谁也都明白！

（全场沉默各人面上隐现着愤慨的神色）

汪氏（门突启，全场视线，都惊异地集中于她。她面上充着惨黯，显是刚受过重压的惊痛过的，混身也颤动得厉害；先看见忠道。）

忠阿哥，怎的了！（即趋床前）

看护妇 他现在还没醒啊！

汪氏 可不要紧？

忠道 血流得过多了一点，住上个把礼拜便得咯！

（汪氏流泪，看护妇和怒道，均走近床边。）

看护妇 但是，要做工，至少，也得息上一两个月啦！

汪氏（一顿，转身望看护妇。）一两个月么？

看护妇 是的，因为他的手筋打弯了啊？！

怒道 但是，也要算侥幸了呢？（间）离太阳正不过半寸啊！

汪 氏 离太阳正只半寸么？（问）医生怎的说？

看护妇 医生还没来啦，这是我同他扎的！孟医士照例不到 10 点钟是不会来的；现在大约是 9 点半吧？

汪 氏 他是怎样给人家打的呢？被打了不少人么？

忠 道 只有他伤势最重，又是加薪啊！

汪 氏 加薪?! 我也常常听见他说什么加薪！就讲我吧，我到了他家七八年了，他到现在还不是和我初到他家的时候一样?!

恕 道 薛阿嫂，是的，火山里的火。郁闷了长久了！

汪 氏 是的，恕阿哥！但是，现在呢？到底是怎样的？

看护妇 听他说吧！（嘴指忠道）

汪 氏 忠阿哥，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忠 道 怎样么？结果，他的头是打破了！

汪 氏 他……

忠 道 我告诉你吧！加薪的事，是酝酿得长久了。在前天，前天是个劳动节，在厂里开了个纪念会，这条议案，便是在这个会上通过的。薛阿嫂，当真，凭良心讲，现在的生活程度是这么高，每工领这一点，哪能够呢?! 这并不是我们的无理的要求，或想从中捣乱啊！况且，我们也从没有过无理的要求！好比说今年新年上的俱乐部的事情吧，若可以，我们也就并不怎样坚决了。我刚才同吴阿姐都说过，就说我们两个吧，是清清爽爽，没有什么纠缠的，但是，连一个老娘，也几乎都养不活！现在什么都贵！我们当然是没有非凡的奢望，但是，饿了肚皮，也得做工么？这样一点，薛阿嫂，你说可能够支配吗？

汪 氏 可不是么？忠阿哥，像我们一家……

忠 道 ……这因为是全体的意志，又鉴于以前的失败，所以，除了阿生和他以外，临时又举出了六个代表，合正副会长一共八个。……

看护妇 还有六个，是哪几个呢？

忠 道 黄宝宣，刁正龙，胡民生……嗯，还有……

汪 氏 你不是么？

忠 道 我是个候补。

看护妇 候补？很有被打的资格！

汪 氏 就这样么？后来又怎样呢？

忠 道 后来么？

恕 道 啊，现在不知怎样了，让我去看看。

忠 道 好，你先去。“毒狗”来了，我即来。

恕 道 好！（下）

忠 道 当他们去见华经理的时候，张总管，那个有八字须的，也在华经理的房里。他们提出要求的时候，华经理是绝对的否认；但这事与张总管，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一味的知道谄奉！他（嘴向耐根）和他们冲得顶厉害！自然啦！他们有他们的爪牙，这里都是些手无寸铁的！他的头，便是亲给张总管打破的！他拐起他手里的一根手杖，就朝他头上打去！

汪 氏 手杖？

看护妇 是的，手杖！张总管的一根手杖，不很轻啊！厂里是谁都晓得的！

忠 道 他们所凭借的，是杀人的利器；我们所凭借的是一肚的热血！少量的热血，是终于暂时的屈服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整个工场里的空气，已显着严重得非凡！一切的机器，都成了没有目的地在自然流通着！一切的工作，是都无形中停顿了下来！几百个工人，是不谋而合的集了起来！走狗又来显出他们的神通，但可绝对的止不住我们多量的热血啊！我们自有我们的对付，阿生，大概已在那儿召集临时会议了。（间）当真，这般狗种，算得什么东西！像华经理一样，整天的吃着鸦片。年纪近五十了，还不住的在买姨太太！便是张总管这只狗，也有了姨太太了。他们吃花酒，坐汽车，算得什么。但是我们要是每工加几分，都不承认！反派我们说是捣乱，胡闹！不要讲加的工资，是厂方出的，就是由他们自己出了，又怎样？他们一个月，做衣裳都做掉几百块！还要看影戏，看京戏；一块钱，现在合二千多个小钱了，在我们看来，的确就是两千几百个小钱！他们有了钱，只晓得向自己腰袋里塞！（颇愤，这时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们同他们出了力，还得受他们的压迫，侮辱，给他们殴打！我们出了力！并得不到怎样的酬劳，怎样的报答的

啊！他们不过是有几个臭钱，但生产的劳动！还不是我们的血汗！现在，啊，我们是觉醒了！我们决不再把自己的血汗，来当他们的补药！

汪 氏 可不是么？一开工厂里所出的东西，哪一件没有我们，就能成功，哪一件不是我们的血汗的结晶！他们只会赚钱，只管赚钱！他们绝没有想到我们的苦痛，并且也绝不会想到他们所赚到的钱，就是我和他的生命，血汗，苦痛的代价，他们的良心，真所谓好心没有好报啊！讲到加薪吧；诚如忠阿哥所说，的确，这不是一件无理的要求啊！现在什么东西，开口总是几角几分，一两个铜板，简直不上眼。就是每天所吃的米，有时还不够开销！哪儿像他们一样：天还没暖，就混身绸的；还不怎冷，就皮的上身；鱼呀，肉呀，还说什么不能下口！他们哪儿会知道像我们的一种苦痛！我们的痛苦，真是受了说出口，当真又去告诉谁呢？能够告诉的两个，还不是和我们一样？（问）现在他又这样，说要过一两个月，才得做工，忠阿哥，你想，我一个人，叫我一个人怎样……

耐 根 （突然大声，并作奋力坐起状，而终以力不支，仍睡下。）资本家的走狗啊！你们……（气喘得厉害；三人均大惊，群趋床边，汪氏及看护妇极力照料病人。）神圣的工友们啊！啊，你们快些一致联合……起来……来……打倒……

忠 道 （握耐根手，极恳切貌。）耐根！

汪 氏 你怎样了？（流泪，声颤动。）

耐 根 杀绝……杀……那些走狗……

看护妇 他现在的神经，错乱得厉害。（话声很低）

忠 道 耐根！

耐 根 什么？我们现在几乎将我们的终身都卖了给你们了！你们所享受的意外的权利，不是我们给你们造成功的吗？！现在你们……

忠 道 耐根，你现在在医房里，在这儿！

汪 氏 你现在在……

耐 根 反，反而来压迫我们！你们无理的来干涉我们的一团，我们一

切的自由！你们……

看护妇 来替他搽些药水。（至桌上拿了药水和他搽。）

忠道 耐根，你现在在这儿，在医房里，你可有什么不舒服？

耐根（间，似较清楚。）在这儿，在这儿干什么？这些不是人的！（间）这儿是病室吗？这儿是病室啊，让！去……（奋力坐起。但终于被汪氏和看护妇捺下。）

汪氏 医生不久将来来了，你等一等吧！

耐根 医……

看护妇 孟医生，马上要来了。

忠道 孟医生马上要来了，耐根。

耐根（间）这样欺侮我么？连你们。（间）我不要，我不愿意多留在这儿一刻，认我……

忠道 耐根（大声）保重你自己身体，你要知道，你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怎样的重大！你将留着你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去牺牲在伟大的使命前啊！

耐根 忠道，你说作兴不作兴，他们的权利，都是我们造成给他们的啊！……我们，难道，就永远这样屈服了吗？！我们的勇气，消灭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快快鼓起我们的热血吧！……啊！火山是终有一天要爆发的啊！……

忠道（间）你现在流的血量很多，你应当休养休养。你得平静些，外面的事自有阿生！你充实了你的身体，再作猛锐的斗争吧！（此时忽隐隐约约陆续地传来了一种民众的骚动声，但声音很微，忠道仅小小的一顿，其余也许还没有听见。）

耐根（若此时才见汪氏）你？

汪氏 你且静一点吧，你自己的身体，总得要紧。现在不觉怎样？看护妇痛得厉害么？

耐根 忠道，他们现在怎样了！要继续斗争啊！

忠道 现在么？……自然啦！

耐根 还好。（间）还是让我去吧，忠道，我们一同去。

忠道 耐根，我们的意志是这样的坚决！从此以后，我们不能再像以前般沉默了！是的，我们要鼓起我们的热血来斗争；但是，你

的血，流的太多了！

耐 根 嗯……

汪 氏 你要平静些才好！你的伤痕离你……

忠 道 是的，离你的太阳穴很近啊，便是你的左手，也伤得厉害。你能明白，我想，在事实上，你是非好好的休养不可啊！

耐 根 (问) 不致于成废物吧？

看护妇 这是不会的。大约休息个一个月的光景，便可以好了。

耐 根 一个月么？真的？不致于成废物吗？(问) 我快活得很，忠道，但是，他们的寿命，延长了啊！(问，朝汪氏) 你还不回去吗？

汪 氏 陈太太说，上半天没有什么大事。

耐 根 她晓得了。

汪 氏 是的。

(沉默。恕道匆匆上，门未带上。忠道迎上去。)

忠 道 怎样了？现在！

恕 道 双方冲突得厉害！

忠 道 怎的？

恕 道 (问) 我们走了以后，阿生便召集了一个临时紧急会议。就在会场上冲突起来了。

忠 道 怎的？

恕 道 他们来干涉了啊？！张总管非但不肯认错，并且还出言恫吓；指挥了那些厂里的巡捕来弹压！人数我们的多呢，巡捕打伤几个！

忠 道 他们还没有了解他们的为什么要受伤吗？华经理呢？

恕 道 华经理早走了，张总管还在。我们两方面也伤了不少啊；他们就是乱打！金生，陆金生被打死了，淌了一地脑汁……

忠 道 怎的！（大惊，汪氏和看护妇也大惊。）

恕 道 给巡捕两木棍打死的啊！阿生也伤得很重！

忠 道 阿生！

恕 道 快要到了，我便是半路上遇着他们的。我比他们跑得快。外面的秩序坏极了！

忠 道 现在呢？(气愤之极)

(当恕道进来时，耐根便很留神地听他们讲话。但这时余三人都

全力听恕道说，所以并不留心到他。这时，他已离床站起，但以体力不支，仍作摇摆欲仆状。）

恕道 现在还在打……秩序混乱极了！（摇头，着急状）

耐根（此时，离门还有两三步）让我……我……我……去……去……

看护妇（顶先瞥见耐根，时耐根已将出门）啊呀！薛……

忠道（迅速转身）耐根（大声）

汪氏（狂喊）你——

（忠道汪氏恕道看护妇均奋身追出门外。）

——幕急合——

——28之春，某日晨，在沪西。

（原载《流沙》第6期，1928年5月30日出版）

二、《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序

编这本小小书的用意，在乎使每一个人，能从这一集子里，知道目下中国一般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你还可等待一些日子来告诉你：政府当局是否能满足一般国民所要求的，是否能尊重一般国民所主张的？目前，在中国，有若干现象，使你知道了伤心。“忍辱负重”与主张宣战成为一对照；一般小百姓在哑着喉咙喊取消一党专政，少数在野元老或政客在通电主张国事公诸国人，若干在朝要人（不论南京广东），也说“我们赞成取消一党专政”，“我们正在准备取消一党专政”，然而言论不自由如故，集会不自由如故，民众运动之被压迫也如故：这所构成的对照事实可说明证实的更大严重性。这几天，报纸上大登其日内瓦的消息可是自己则忙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既然救国会议并非和平会议，可是和平会议我们暂时也不便说它不算救国会议。除非中国人真的甘心永久的被日本压在下面，则和日一战（不一定是武力的）无论如何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纲领等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们对政府功效检督的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

10月 安平

(原载《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储安平编，新月书店1931年11月初版。这本书收有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武埴幹、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贯彻》周刊社、王造时、陈启天、《时事新报》、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的20篇文章。)

三、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这是一篇记录。我草拟这篇记录的目的，在希望这篇文字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一份有用的材料。事实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这样一种材料，或者这样一篇记录对于他们是否有用。因之我对于应否草拟此稿，犹疑不决。最后还是出于主治医师的鼓励，他认为这种经验非人人所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种经验的人又未必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能把这种经过记录下来。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寻常的经验，所以鼓励我把它写出来。

这篇记录包括“感觉”与“心理”两个部分。关于“感觉”部分，我想凡是用过闷药的人，他们当时所感觉的，大致不会有太大的距离。至于“心理”部分，则要看各人的教育，职业、性格、环境等等情形而定。

关于我的病症及投住医院的经过，此处一概从略。我和我的主治医师约好于3月31日上午9时施行手术。我并在前一天知道，我们将施行全部麻醉。在13年以前，我曾在沈克非大夫的主治下，割治过盲肠炎。那次用的是局部麻醉。我在那间四周都是玻璃窗的宽大的手术室里，在那没有一点声音的寂静严肃的空气里，听到那低微而清晰的剪刀声音。这次我似乎乐于施行全部麻醉，借以减少我对于痛苦所发生的恐惧情绪。

3月31日，星期一。这是江南最标准的春天，满天的好太阳。我在上午8时3刻以前，在病房里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于8时50分被抬进手术室。我的主治医师周寿祥大夫早已完成了他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坐在椅子上等候我。当我被抬进手术室时，我以很愉快而自然的表情向他招呼“早安”。

我被抬上手术床后，各种工作即开始进行。直到此时止，我还不知道施行全部麻醉，是用打针的方法，还是用嗅觉的方法。我非常希望知道闷药的有效时间是多少。他们说五分钟。我说五分钟内可以完毕一切手续吗？主治医师说五分钟内可以完毕。我虽然不再追问，但是心中很疑惑。他们的意思显然是企图安慰我，表示手术在很快的时间内（五分钟）就可以完毕。事实上，手术的时间曾经延长至10分钟至12分钟之久。假如他们当时告诉我手术需要10分钟始可完毕，或者可以提高病人相信的程度。

另一位医师开始在我的口部四周涂油，并将脸罩罩住我的脸部，只留出鼻孔让我呼吸。我此时已知闷药将用嗅觉的方法施用。我那时唯一的希望，（在这儿，我只用“希望”两字，不用“要求”两字。因为“要求”是一种含有“意志”成分的表达，“希望”则仅是一种“感情”成分的表达。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安排在一种不能让我有任何“意志”的环境之中！）是希望闷药不要用得太早，以致手术尚未完毕，而闷药药性业已终止。但是在我自己觉得一切尚未准备完毕时，他们已经向我施用闷药了。我在一种微微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中被动地吸嗅闷药。

据我自己的估计，从我吸嗅闷药至失去知觉时止，只有三四分钟的时间。三四分钟是一个极其短促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心理状态纵然十分复杂，因为时间太局促，所可能引起的心理活动，毕竟也是有限的。我现在尽我的能力来记述我当时所体味到的奇异的感觉和当时的种种心理状态。

关于闷药的气味，我还不能用“痛苦”两字来形容。假如我在此用“痛苦”两字，我势须责备我自己近于夸张，因为这种气味是可以忍受的；虽然这种气味至少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气味。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种情景很难描写。平时我们在白天，或者在有或强或弱的灯光的夜晚，即使闭上眼睛，但多少还有一种“光”的感觉。除非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闭上眼睛后，才觉得当前确是一片“纯黑”。在那时，我的感觉，似乎只有真正在“一团漆黑”的夜晚闭上眼睛时的感觉，仿佛近似。但是更进一步剖析，上述比拟还不能完全尽意，因为我们即使在一团漆黑的夜里，闭上眼睛后，觉得一片“纯黑”，但这种“感觉”，似乎还是以眼睛为主

的感觉，换言之，即那种感觉，还是一种经过“视觉”的判断的结果。而我那时的感觉，似乎已经超出“视觉”的范围，而是觉得整个的脑袋所感觉的是一片“黑”。而且这种“黑”的感觉，因为闷药在一口接一口地吸嗅下去，所以一步逼一步，愈来愈深。我们平时在电灯光下，骤然之间电灯灭了，那时候所感觉到的“黑”，还多少有一种“光”的比例作用在内，从原来的有光程度，变到骤然的无光程度，遂觉当前一片漆黑。而我那时所感觉的“黑”，那种难于形容的黑，是愈来愈黑，一阵紧一阵的。我们通常总爱用“如堕深渊”四字来形容这种情景，但这四个字并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也很少人有过真正的堕入“深渊”的经验，普通用“如堕深渊”来形容一种心情，多少只是一种象征的用法。“如堕深渊”，就逻辑上讲，本有一点点“下沉”的性质，而我那时，显然并无“下沉”的感觉。“下沉”是一种自上向下的活动，而我那时并无自上向下下沉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的样子（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上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抱持有一种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感伤！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伤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即将伤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极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犯罪，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霎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感伤”！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然而这种感伤竟很“轻微”，主要的功用应归之于我们的常识。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死”，而是一种知觉的暂时的停止。所以一切引起的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我当时几乎纯然没有一点涉及私人利害问题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珑，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欢喜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8月至三十五年2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

死不瞑目之感。

以上是我在施用闷药那短短的三四分钟以内的心理活动，事实上，在那后半段时间，心理活动已渐渐趋于衰颓。最初的一阵“黑”的感觉过去后，意识一点一点柔弱起来（此处还不能用“迷糊”两字，这时意识还是很清楚，但不活跃，故用“柔弱”二字）。我遵从医生的吩咐，嘴里轻轻地数着“一、二、三、四”。心头似乎有一阵轻微的难过，左脚脚趾部分曾有发麻的感觉。在那快要失去知觉之前的极度短促的时间里，我还意识到我的两手不知如何安放才好（我这时心性微微有一点紧张），后来就有两旁两个人将我的手捏住。在我知觉尚未丧失之前，我还感觉到医师已用一种液质在施行手术的地位四周涂抹。这时我已渐渐地快要丧失知觉。当时我似乎对于一切都自愿地同时又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愿”指自愿施行手术而言，“无可奈何”指用闷药后情形而言。前者属于意志部分，后者属于感情部分。）我没有放弃的只有一点，就是嘴里仍继续的在数着“一二三四”。我那时又忧虑，不要一切都已失去感觉，而独独我的神经不能停止，则我仍将要受到手术的痛苦。这当然是一种由于没有经验而发生的过虑。至少那时，我是一切“听天由命”了。数着数着，我似乎竭力叮住这个“一二三四”，以挣扎“我”的存在。但是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 my 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着了一样。据医生告诉我，我最后还要经过嘴里乱哼，手脚抽动，表示心头非常难过的一个阶段，如此以后，全身肌肉才开始松弛，真正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一个阶段，我自己已经知道了。

* * *

当我已被闷昏以后，甚至说一个人死去以后，究竟他的灵性仍旧有无活动，我不易作确定的回答。关于一个人死后究竟仍旧有无灵性一节，亦即通常一般人所涉及的有无灵魂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少到今日止，尚无任何确切的结论：而人死了又再活，以便叙述其死后的经验者，其事显亦不多。我这篇记录，其中有两点与张东荪先生即将在本刊发表的一篇监狱回忆录中所记他自杀的经验，可以互相印证。这儿先说一点。据东荪先生报告，他某次自杀以后，他“觉得”非常舒服，好像一个身子很轻，在云端里飘着似的。他既然自杀了，何以又“觉得”非常舒服，好像身子在云端里飘着，这似乎说明人死后多少还有一部分灵性的存在。

我亦似乎感觉，我在被闷昏以后，仍有一种灵性的活动。不过这种灵性活动的内容、性质及情形，我于醒后亦不能详细记忆。我至少在刚刚醒的一霎那，确是感到我在昏睡中似乎仍有灵性的活动。而且我觉得在昏睡中的情境，极其甜蜜，而且极可留恋。至少并无任何苦痛，似乎即永远停留在那个境界里，亦是很好的。假如我于刚醒的时候，即运用我全部的脑力来捉捕我在昏睡中的种种情境，是否有所收获，关于这一点，我很难答复。我当时至少并未企图这样做，同时我当时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势须斫伤我的脑力。我只能很不确切地说，我似乎感觉，当我在昏睡中，仍旧是有一种灵性上的活动的。

* * *

我终于醒了过来。当我醒过来约摸 10 分钟后，我立刻在极度疲倦的情形中，睁开眼睛看我的手表，时为 10 时 20 分。因之我估计我醒来时，大约为 10 时至 10 时 10 分之间。易言之，我至少在昏睡状态中延续至一小时之久。（据医师报告，在施行手术期间，继续施用闷药，故至此时始醒。）我醒来时，正巧外面有哭声，我第一个反应是：“隔壁的人开刀开死了，我开刀没有死。”而立刻接着而来的第二个修正意见：“隔壁的人死了（因为不一定是由于开刀而死），我刚刚是上了闷药，现在醒过来了。”这个反应是很单纯的；即我庆幸我自己的没有死。但是据我自己的分析，我不承认我这个反应是出于一种意识的活动，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我愿意在此表示，关于这部分的解析，恐怕有不少需要斟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学力上的根基，故引用名词（term）或有错误之处。因之我这篇记录，还只能算是一种 raw material，心理学家如欲采用时，尚须详为订正。〕何以言之？因为施行手术是我自愿的行为，而施用闷药无伤生命则为一种常识，故我绝未发生任何对于“死亡”而起的恐惧，因之醒后也不致有庆幸未死的意识。所以我认为我那时庆幸自己没有死，并非一种智力的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为一种生物所有的自然反应。此处即欲述及与东荪先生自杀经验可以相互印证的另一点。东荪先生在自缢之后，被他人解救时，发现他的两手在拉着套在颈子上的绳子。既欲自缢，而何以在自缢后又要将两手去拉开颈子上的绳子？由此可以证明，一个人在意志的支配下，可以求死，所以在社会上有各种自杀案件的发生，他们都无

“意”于生，唯求一死。但是作为一个“生物”，人是不愿意死的，所以蓄志自缢者，于自缢后，仍以两手去拉开颈上的绳子，这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行为，与意志无关。

还有一事可以证明我当时之私幸未死，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即我当时一方面有私幸未死之感，一方面我尚未恢复我的意识，因为当时我甚至对于我究竟身在何处一节，亦茫无所知；而对于以前一切事情也是一片模糊。大约经过四五分钟的有意识索后，我才大约想起我自己是睡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里，其后一二分钟，我又努力睁开眼睛一看墙壁上的颜色（墙壁上白下绿），以求证实我确是睡在病房里面。

在醒后最初的五六小时内，整个人感觉非常疲倦，昏昏欲睡。此时发生一件意外的插曲，即在我醒后还不及一小时的光景，我的助手照例挟了一包稿子来医院看我，履行我们习以为常的接洽工作。他或者未能知道我是刚刚上了闷药才醒过来的，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星期一上午是每期的最后发稿时间，当时有一篇稿子非我看过不能付排。事实上，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当时都无力阅读即使是一封短信，何况是一篇稿子。我当时非常虚弱，面色惨白，我甚至即使闭上眼睛，亦觉光度太强，故须用手遮盖着我的眼睛。结果我只好招呼我的助理读给我听。（我实在很希望他能够读得响一点，借以节省我因听而需要花费的精神，不过我并未如此表示。）他显然未能了解我当时是虚弱到如此程度，并拆读若干来信，我也竭力支撑地听下去。我相信这一个插曲增加我脑力受伤的程度。

在当天下午4时以前，我始终在沉睡状态之中。闷药的气味，那令人不快的气味（近似火油的气味），时时逗留在我的嗅觉里，令人厌恶。一直到晚上9时以后，我才忘记这种气味的存在。

在下午四五时，我大体上已清醒之后，忽然怀疑到刚醒时我所听到的哭声，是否仅仅是我当时的一种幻觉。事后追问看护，始知当时有一个病房确是死了一个病人，而所发的哭声确是一种真正出自内心的悲哀的哭声。

4月18日追记

（原载《观察》第2卷第9期，1947年4月26日出版）

四、诗

自 语

语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到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您，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接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废历二十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原载《新月》第3卷第8期)

五、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一)

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达会议^①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美国一般社会平时所有的那种浅浮、放狂、享乐的生活方式，向不为世人器重，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击力、组织力，以及勇敢坚毅的牺牲精神，俱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罗斯福总统不仅使大局从逆势中扭转过来，并且赖有他所独具的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使这个战争，从一个实际上纯然是一个利害冲突的战争，变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原则、有灵性的战争。他所领导的大西洋宪章以及他所号召的四大自由，成了无论在前方后方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生活的千万男女心灵上所共有的一个神圣的鹄的。当中国的政府、人民、军队，依然被驱于中国西部的山谷地带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传

^① 即雅尔塔会议。——编者注

来，不知引起中国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

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苦痛的。我们不满意目前美国种种对华做法，但我们不忘情在战时美国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无可抑止地仍然缅怀已故罗斯福总统的崇高伟大，但我们明白今日之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

(二)

在过去数月中，美国对华政策，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摘。美国在华活动，大别可分两项，一为美军驻华，一为参加调解。先说美军驻华。美国驻华的理由，根据去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声明：

“为了继续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此次战时经常的合作，为了符合波茨坦宣言，并且为了清除在中国境内日本势力残留的可能性，美国特定一种确定的义务，使日军缴械和撤退。

“因此，美国曾经，并将继续，协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被解放地域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美国海军现留华北即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同一声明上，又说：

“美国已经为了恢复因日本侵略东北而首被破坏的和平，被迫付出巨大代价。除非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除非中国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则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坏，也将遭到危险。这是美国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的目的。”

我们根据上引美军驻华的理由，陈述下列意见：

1. 在理论上说，世界和平不可分。美国牺牲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物资，其目的在求世界的和平。凡足以威胁或破坏世界和平者，美国有发言的权利和义务。这个理论，我们不欲否认之。在战时，中国和美国同为盟国，并肩抗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之。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承认美国有在中国境内使用武力以协助中国国民政府使日军缴械和撤退的权利和义务。

2. 美军驻华的理由，既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境内使日军缴械和撤退，则我们认为，此项使中国境内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显然应以中国国民政府为主体，美军处于协助的地位；充其量，中美双方平肩协力共同合作，使日军缴械及撤退。

3. 但是我们愿意知道，在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上，中国国民政府有未充分发挥他全部的心力和能力，以尽他应尽的义务？我们同样愿意知道，日本受降已逾一年，日军的缴械和遣散的工作，迄今有未全部完成？如已完成，是否美国即可认为“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撤退驻华美军？如其尚未完成，何以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反以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行动？

4. 假定美国容许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分用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和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活动，我们不得不认为：此即足以表示美国谅解、默认，甚或鼓励中国国民政府得先不履行其对同盟国并肩对日作战中所应负责任，而以其全部力量从事于自相残杀的内战。

中国现在在事实上已是一个全面内战的局面。在这一个内战中，无论美国有未在任何形式之下给予内战中两造之任何一造以任何直接的支助，但至少，美国有未考虑过：美军驻华、物资转让、经济贷款，以及其他行为，在事实上，足以使今日中国内战中两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倾向内战的鼓励？美国有未考虑过在这方面美国所负有的道德责任？

5. 假定美国认为：即使“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中国尚未“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美国是否仍将“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统一与民主是两件事，假定中国业已统一，而并不民主，则美国是否继续“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直至美国认为中国既统一而亦民主时为止？

我们即使在十分心平气和的检讨下，亦不得不说：美军继续驻华确是一种不合事宜的行为。美国也许认为，在华驻军，可以有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但事实上，这个假定无法成立。这几个月来，中国的“和平”绝无任何足以令人安慰的进步，内战的范围和程度反而与日俱深；这足

以表示美军继续驻华绝无助于中国的缔造和平统一的工作；美军继续驻华这一行为，仅仅使在中国内政上业已非常复杂混乱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更多的意外的纠纷，同时并因此引起许多在中美国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评和指摘。在理论上，除了战胜国驻军战败国以外，我们亦绝难承认，乙国之国内和平，可以以甲国之驻军而赢致之。

(三)

其次论参加调解。根据上文所引同一声明，美国参加调解中国内争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盛、团结、民主的中国”。调解的原则为：

“美国认清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假使这个政府基础能扩大，包括国内别的政治分子，则中国的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改革将被推进。因此，美国强调主张国内各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的全性会议协议办法，给这些分子在国民政府中一种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

这一段文字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修改 20 年来中国一党训政的政治，使之从一党专政的国家变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该声明最后并说：

中国如照上述路线走向和平与团结的时候，美国准备以各种合理方法援助国民政府，重建国家，改善农工业经济，建立军队组织，足以为维持和平与秩序而尽其国防上与国际上应有的责任。

“在推进这类协助之中，对于中国在合理条件之下为了用于中国全国的健全经济及中美间的健全贸易的发展而计划的向美要求信用贷款及借款，美国准备加以有利于中国的考虑。”

去年 12 月 15 日杜鲁门总统发表的对华声明，确是非常公正、合理、友好的；它符合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愿望。今日中国人民所要求者，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是民生改善。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

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除了这些基本民权的要求，中国人民并进而要求政府（无论执政的是甲党或乙党）能对人民负他在政治上应负的责任。消极方面要肃清贪污、提高效能，积极方面应有所建设，这些建设并应与他执政时间的久暂成为比例。在经济生活方面，中国人民切迫希望政府能施行若干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限制一切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人民非常切望在政治及经济方面都能得到改革，发生不流血的革命；而努力寻求这些改革，目前最切迫的要求是和平安定。内战绝对打不得。打内战要死人，要烧房子，要掠夺农民嘴里的米粒；打内战使币值愈来愈贬低，工商业愈来愈萧条，一般国民的情绪愈来愈消沉；整个国家因内战而陷入于恐惧、怨愤、悲观、麻痹、苦痛、绝望的境地。这是全无意义的大消耗大浪费，这是误国害国、灭国的大悲剧！

上面这一段最简单的陈述，我们相信就是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呼吁和要求。但是我们正视今日中国的大局，不要说毫无开国规模，甚至亦无建国气象，一切活动作为仅仅是在撑持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当前中国政府上的最有声色的滑稽杰作，就是政府说的都是甜的，做的却是辣的。当政的人物嘴里天天在喊民主，但是一切真正的民主活动，在中国却普遍而无例外地在各种不同方式的压迫下，遭受限制、阻碍、取缔和威胁。这简直是不可理解并亦不可信的作风。在现行政治风气下，贪污已经成为常态，不贪污反成为变态。公家机关的腐败黑暗，已至难以想象的程度。然而人民除叹息并默默地忍受外，竟无一点有实质的反抗能力！经济生活愈来愈恶劣。蒋主席今夏在牯岭声称，如若中国尚有一人无衣无食，即是国民党的革命使命尚未完成。这真是仁者之心！可惜国民党执政 20 年的结果，本来有白米吃的，现在已无白米吃了；本来可以一天吃两餐饭的，现在只能吃一餐饭了；本来穿长衫的，现在不穿长

衫或是穿不起长衫了；本来有房子住的，现在没有房子住了！我们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不知有多少人沉沦在饥馑和寒冷的死亡线上。就是在这不夜的城市里，街头巷尾，也到处都是无食无宿的流民乞丐。在这样一片锦绣山河的土地上，竟有万万以上的人民，过着与畜生生活无殊的生活。而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下，还要从事内战，活生生的把人民的血、肉、皮，掺着人民的汗、泪、血，建筑少数人的“权力之殿”！人道！人道！人道何在！政治家的良心何在！

一如上面叙述的这样一个落伍、黑暗、悲惨、无人道的国家，假如美国确是关切中国的前途，关切中国人民的幸福，显然不是美国所希望，并所能坐视的。美国参加中国的和谈，在政党的纠纷上，企图调解国民党及其反对党之间的冲突；在统治的精神上，企图使中国变独裁而为民主；在国家的內容上，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繁荣。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中国之幸，美国之幸，世界之幸。调解党争的本身显然不是一个目的，调解党争的目的，仍在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繁荣。同时，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的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解决中国党争问题仅仅是改革中国政治问题的一项，甚至可以说，这一项，确是非常迫切的一项，但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劳苦大众的生活，培植中产阶级的力量，鼓励开明进步而有现代化头脑的民主自由分子的抬头。中国的乱，在经济上的原因，是大家太穷了，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沉沦在生活的水平线之下；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中产阶级没有力量，没有组织；在道德上的原因，是有抱负、有操守、有能力的人无法为国家服役。（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对于这样一个总括的目的，美国既然过问中国问题，就须一方面调解目前中国政治上最切迫的党争问题，一方面亦须从根本上压迫政府作事实上的种种改革。一切民主活动，只要合理而无损于社会的安全，应当容许其存在。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对于为作者所重视的一部分，可谓一无努力。在法律上，美国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国民政府，美国当然尊重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我们绝对非常公道地同情：美国之欲支持国民政府，诚亦事理之常。但是，

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应该是有条件的。易言之，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必须这个政府真能向民主之路进行。而我们历观往事，面视实际，我们实难发见任何足使美国必须支持今日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的理由。

(四)

再进一步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但是我们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没有能力，20年的统治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局面，到头要外国人来“调解”，使外国人要来“调解”，甚至使中国问题竟成了莫斯科三国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人格尊荣，实在给那些台上的人物剥光剥尽了！但是尊荣是一种感情，而政治却是一种现实。我们很含羞地说，假如因外国的插入过问，而使中国人民获得和平、民主、自由，则亦不失为一项“满意的交易”。不幸今日中国人民，已被动地做了一次“无所获的抛出”。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的美国，但历史家告诉我们，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同时也促成了一个近代的自由民主的英国。乔治三世时代的英国是最反动顽固的。美洲殖民地的税收，要由威司敏斯特决定，这一原则，广泛地说，就是人民的意志权利一无保障，统治权悉操于少数专制人物的掌中。赖有英国军队在美洲殖民地吃了败仗，于是皇党的威风大杀，人民的力量抬头。在中国，单说抗战期间，亦有同样的事实：“武汉时代”在当时中国政治上，却成一个局面，另有一番风气，时实正承南京沦陷，徐州被围之后。三十三年中国军队自长沙至贵州作疯狂的溃败，日本进叩贵阳之户的时候，政府威风稍敛，民气一度昌扬。历史说明：一个以军队为统治资本的政府，当他每打一次胜仗，他那捏紧不放的心理亦必随之增强。所以鼓励这种政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就无异鼓励这种政府加强他加紧控制的倾向。在另一方面，现在美国是有钱的国家，中国是贫穷的国家；美国是强大的国家，中国是衰弱的国家；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我们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

跟着美国走；在经济上，没有钱就向美国要；在内政上，请美国参加和谈。我们几乎可以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在精神上实已亡于美国了！我们不欲否认，美国之过问中国政治，到头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方面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同时也须真为中国的幸福前途公道打算。能如此，中国人民会得在心底里感激美国，否则，美国必将失去众多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就是多年以来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所要获致的。

三十五年十一月 上海

(原载《观察》第1卷第11期，1946年11月9日出版)

第六章

英国与印度

序

本书著者兹徇出版人之请，就本书内容作一简单之说明：本书主旨在考察 1600—1943 年（3 月）之间之英印关系。本书不仅就过去英印历史关系加以扼要之叙述，并进而就各有关问题及未来局势作审慎之研究：广土众民之印度何以灭亡于一个商业公司之手？东印度公司究以何种凭借造成此史无前例之殖民征服？东印度公司之吞并印度究否系英国政府所授意？此一历史久长实力宏厚之殖民公司何以终又消灭？（以上第一章）印度民族运动演变之背景若何？何以印人对于 1909，1919，1935 各次之《印度政府法》不能满意？英国对印所能让步者为何？所不能让步者为何？克利浦斯访印之行何以终于失败？（以上第二章）英国能允许印度独立乎？印度能在外交上得到有实效的援助乎？印人之民族意识已成熟乎？仅仅依赖民族意识即能推翻外族的统治乎？甘地政策之评价若何？在何种原则下印度始能获得独立？印人之独立愿望在短时期内有实现可能乎？（以上第三章）上述各端俱为本书著者努力考察者。

惟本书著者愿在此表白一言：他自始至终未尝蓄意在本书标题下撰制论文，因他深知他对于本书所涉的问题并无充分之知识；只因他所执教的学校曾邀他讲演，一时的兴会终使他草成此稿，因之，本书的体裁自不能如通常所希望的那样严谨，而材料的出处亦多未能一一注明。

在战争时期从事著述，已多困难，何况他所寄身之地又复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小镇，在那儿既无任何特别材料供其参考，也无“灵通的消息”有助于他安置结实的判断。他最初实未计及此稿可以出版；他今将此稿

付梓，亦仅以应一般欲考察英印关系者之需求而已。

著者的谢意应向其友人陈之迈、俞颂华两先生表示；他们对于本书的出版，曾赐予匡助。

著者

1943年4月1日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

一、从贸易进而为征服

(一) 印度之被发现^①

1498年5月17日，葡萄牙人法斯哥·达·加玛（Vascode Gama）经好望角而达印度，在印度半岛西南部的科利库特（Calicut）地方登陆，为欧人寻求多时的直通印度航线，至此实现。印度和欧洲的直接往还；自此开始；而我们叙述英国和印度接触的历史，也可远溯于这可纪念的一天。英人最初一次实际抵达印度的航行，约在1590年与1594年之间；而当 Armada 海战正在进行之时，英国在土耳其一带经商的商人，已有越过印度大陆而旅行远东者，他们回国后对于波斯湾、印度、以及麻刺甲等地种种情形的报告，且曾大壮日后东印度公司发起人之胆。但我们论及英人对印度的经营，要当以1600年为始。1600年的最后一天，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unto the East Indies）成立，女王依利萨伯给予该公司一个特许状（charter），允许自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由该公司独家经营。这种“特许状公司”，原是十六七世纪殖民贸易组织的特色，终16世纪，新发现的世界，无论是非洲、美洲或者印度沿岸，大都为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所占；他们自不欢迎外来者侵入他们的范围或分享他们的所得。所以那时西葡两国以外的殖民商人，既须防御海盗出没无常的抢劫，复须对付先至者的无情的抗拒；凡此均非具有海陆作战的组织和权力不可。特许状公司类都自国家得到若干外交及军事的特权，并得在殖民地行使

^① 此级标题为编者所加，原书只有标号。下同。——编者注

统治，独占贸易；这种特许状公司，当时的英、法、荷、瑞典、丹麦、普鲁士等国都有。但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成立后，颇受国内各方面的攻击。这个公司最初的资本是 68000 余镑；此数在今日诚然渺不足道，而在 350 年以前的英国社会，已属可观。海外购货，须付现款，而运入者大率是奢侈之品，故有者谓其现金外流，有损国计。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第一批船只，满载桂皮，丁香和香椒等香料，自印返国，赢利达百分之九十五；这种厚利的贸易，自使众人心动，故有者诟其垄断专利，妨碍私人的经营。私营虽为法律所禁，但利之所趋，在 17 世纪末叶，私营东印度一带的贸易者，不乏其人。1689 年，又有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The English Company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之成立。有特许状的商人和无特许状的商人之间，已纠纷叠起，自新公司出现后，经商印度的竞争，益趋激烈。新公司在政治上接近于辉格党（Whig），故双方的争斗，竟使下院亦为之哗动。当时各方面都力阻老公司特许状的继续，幸赖金钱的力量，老公司的特许状终得延长未断。据屈勒味林（G.M. Trevelyan）所记，在 1688 年至 1700 年的 12 年内，Sir Josiah Child 为保护老公司的垄断权力起见，曾贿送于阁员及议员者，达 10 万镑之巨。新旧公司互斗的局面，自不宜长此不变，终以财政大臣哥德芬（Lord Godolphin）之斡旋，两公司在 1708 年并而为一，名曰英商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双方既携手合作，遂群策群力，从事印度之经营。我们通常所称的东印度公司，实指这个联合公司而言。

当时印度沿海，是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霍金（Hawkins）舰长虽在 1608 年访问亚格刺的土酋，获得在苏拉特（Surat）地方设厂的许可，但他们之能否在印度立足，全看他们之能否战胜葡人。1612 年 11 月 29 日，葡舰四艘企图在 Tapti 河口外围捕英船，为英方贝斯脱（Best）舰长大败。日后英人之能在苏拉特、康倍湾（Bay of Cambay），以及附近内地设厂，实均赖此一战。同年 12 月，英人复得莫卧儿（Mogul）帝国的敕书，得在印度大陆居住贸易。1612 至 1622 这 10 年之间，英葡两国的商人在波斯湾和阿刺伯海上，屡起战争，但葡萄牙自被西班牙合并（1580）后，国势日弱，所以无论 1615、1620、1622 年各次海战，胜利无不属于后来者一方。1622 年一次的大胜，波斯湾上被称为葡萄牙人在亚洲殖民

地中的珍珠的奥马兹 (Ormuz)，亦复被英人占领。

那时英人一面在苏拉特一带经营，同时复东向而趋麻刺甲海中的丁香群岛；但他们在此一带所遇的敌人，实远较荷人为强。在抵御东方的葡萄牙人时，英荷两国的商人，原能互通声气，但当葡人在东方海洋中之势力不振后，英荷两国的商人，转而彼此仇视。那时的荷兰，西班牙的威胁已成过去，法兰西的威胁尚属未来，故国土虽小而竟富强惊人，锡兰岛和丁香群岛的葡人先后为他们所逐，印度群岛全为荷兰商人一家之天下。1623年，有英人九名在丁香群岛安倍那 (Amboyna) 地方被荷兰总督 Van Speult 拷问至死，诟其图谋攻击荷兰堡垒。詹姆斯一世的英国，对此竟无法对付，直至1654年，克伦威尔时代，英人始能一报安倍那之仇。

英人既被逐于丁香群岛，只得改向印度大陆发展。所以英人之经营印度，其始率在西部之马拉巴海岸 (The Malabar Coast)，1625年以后，始移向东部之卡鲁满德海岸 (The Coromandel Coast) 发展。1639年，Francis Day 自莫卧儿帝国在半岛东南部海岸购得土地一方，建圣乔治堡 (Fort St. George)，以作贸易的根据地。东印度贸易公司早于1611年，已在东部海岸的 Masulipatan 地方设厂经商，至此亦将该处的主要工厂移至圣乔治堡；这个圣乔治堡就是日后的马德拉斯 (Madras)，而为英人在印度获有土地的嚆矢。所有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半岛东部海岸以及孟加拉湾一带的贸易居留地 (Settlement)，自1658年起，都归马德拉斯管区 (Madras Presidency) 管辖。

英人在马德拉斯一带经商时，其目光复北投而注视于奥理萨 (Orissa) 及孟加拉湾。1633年，Ralph Cartwright 北航至卡塔克 (Cuttack) 附近之 Harisphuv 海口，与奥理萨土酋谈判通商，翌年，莫卧儿帝国即允许英人在孟加拉贸易。1651年，孟加拉湾上之主要港口呼格里 (Hugli) 即有英人经商，而六年以后，呼格里即为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湾上的总经理处。当英人在东南海岸孟加拉湾上的进展顺利时，复思在恒河下游之三角洲建立其势力。1679年，公司曾得莫卧儿帝国的敕书，允许英人除于苏拉特一地外，可以豁免纳税。但这项文告为当时莫卧儿帝国的孟加拉总督 Shaista Khan 所拒。东印度公司在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资本曾加扩充，武备亦见增强，那时公司当局，如在国内的 Sir Josiah Child

和在印度的 Sir John Child，都主张在与莫卧儿帝国的争斗中，必须以武力从事，所以 1686 年，公司方面决诉诸武力，以维护其“权利”翌年 9 月，英人陷加尔各答（Calcutta），莫卧儿帝国求和，加尔各答乃成为英人通商口岸之一，英人在呼格里的工厂，也迁至此处，并于 1700 年建威廉堡（Fort William）；此即日后的加尔各答的核心。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经营，自此悉以加尔各答为枢纽。加尔各答且自 1773 年，成为英领印度的首都，直至 1912 年印度政府迁至德里（Delhi）为止。

至于英人在印度西部海岸的情形，英人除在苏拉特营商外，对于既有商业价值复有战略价值的孟买（Bombay），早已注视。因为孟买位于印度半岛西部海岸的中心，而又居于莫卧儿帝国权力以外；在该处设防可以不致触犯莫卧儿帝国。1661 年，查理二世娶葡萄牙喀德邻公主（Catherine of Braganze），葡王以葡国在印度的商埠孟买为嫁奩。1668 年，查理二世即以每年 10 镑的租金，转租于东印度公司。公司曾在孟买设防（1670），10 年以后，孟买便一跃而超过苏拉特，成为英人在印度的一个主要港口。所以，在 17 世纪末叶，英人在印度已拥有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三大商埠，而日后英人之在印度之自经营贸易而建立帝国，亦即以上述三地为据点。

（二）总观东印度公司之历史

总观东印度公司的历史，约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自 1600 年至 1748 年，为时几 150 年；在这一时期里，东印度公司的活动，殆属纯粹的商业性质。后一个时期自 1748 年至 1858 年，凡 110 年，在这一时期里，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和组织的性质，已从商业而变为政治的了。我们现在进而叙述者，即此后一时期内英人在印度的历史。

这一个时期内的东印度公司，我们须将它在印度的征服工作和它自身的改组以及消灭，分别加以考察。16 世纪为西葡两国分霸殖民地的局面，至 17 世纪即生变化，西葡荷三国的殖民事业，先后衰退，英法两国急起直追，至 17 世纪末叶，向在西葡殖民帝国下的版图，大都落入英法

两国掌中。英法两国既均思树立海权，争霸世界，其终将发生冲突，实极自然。18世纪英法两国所从事的战争，不仅牵涉甚广，抑亦延续极久，所以有的史家亦称之为英法的二次“百年之战”。在这费时费钱的争霸战中，印度实居重要的地位。英法在印度的斗争，严格言之，直至18世纪末叶，犹未中止。法人始终阴与印度土酋结合，策动反英，直到拿破仑失败后，法人对于印度的野心，才算收敛，法人在印度的势力，才算真正肃清。但若论双方形势，则英法在印度的冲突，至1748年已达最高峰点，1748年以后，法人即开始转入失败的命运。

吾人将1748年作为东印度公司前后两个时期的界限者，因东印度公司之在相当范围内行使一种政府的职能，实以是年为始。这一年，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组织军队，有一小队印度兵（sepoys）成立。莫卧儿帝自1707年奥朗则布大帝（Aurangzeb）逝世后，即趋于分裂瓦解，德干高原（Deccan），孟加拉和乌德（Oudh）等地的总督，均变为半独立的君主，整个的印度半岛渐入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故无论因为防御土人或防御法人的攻击，东印度公司组织军队，以资自卫，均属必要。那时法国在印度的杜普雷克斯总督（Dupleix）正是雄心勃勃，想在印度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而将英国的势力逐出于印度以外。莫卧儿帝国分裂的局面，正大有助于他的经略。他于1750年竟推倒印度南部加那的克省（Carnatic）的总督，扶植另一受其操纵的僭主，使之脱离莫卧儿帝国而宣告独立。此事自足给予马德拉斯一种威胁，亚科特（Arcot，加那的克之首都）王位之争夺，终引起了英法的战机。最初是杜普雷克斯所向皆捷，英方幸赖克莱武（Clive）之英勇，得于1751年攻占亚科特而死守不放，法人终于挫败，而其所扶植之僭主亦不再有人保护。是后这种斗争绵延于全岸，而1757年普拉西（Plassey）之捷，实为其中最主要之一役。

普拉西之战的直接原因虽为“黑洞事件”（“Black Hole” of Calcutta），但其幕后仍为英法之争。“黑洞事件”不过是孟加拉的少年总督苏拉哲（Surajud Dowlah）排英思想中所造成的一件偶然事件，而苏拉哲的后面，则站着杜普雷克斯的影子。当克莱武从马德拉斯北驰营救加尔各答时，原拟双方订一息事的条约，但正巧英法这时已正式宣战（七年战争），而在英法的冲突中，苏拉哲复立于法国的一边，克莱武乃布阵于恒

河下流的普拉西地方，一战而苏拉哲的政权摧毁，另由克莱武荐举米雅法（Mir Jafar）为替；此人觊觎苏拉哲之职位，为时已久。同时英法在印度迄今为止的表面的和平，既已撕破，法人在孟加拉湾上的根据地成德拉哥（Chandernagere），遂为英人所夺。1760年，法人在万德华须（Wandewash）遭受决定性的大败，1761年，法人在印度的首都朋第舍利（Pondicherry）亦陷入英人之手，法人在印度的势力，至此江河日下而一蹶不振。“亚科特之战，英人将其敌人的势力逐出于印度南部，普拉西一役则使法人退出了孟加拉一带。”米雅法除献款150万镑外，复将加尔各答周围882方里土地之使用权，割让于东印度公司。“法人对于他们的失败，自难甘心，他们曾在暗中煽动土人，对英人作各种暴烈的攻击，但这种并无实效的屠杀案件，正供给英人征服工作中最适当的借口，1764年的巴克萨之战（Buxar）就是最好的例子。巴克萨一役的结果，是莫卧儿帝国将孟加拉，乌德和贝哈尔（Bahar）三省划归东印度公司，法人的势力在这些地带完全被英人肃清，而莫卧儿帝国至此亦更受治于英人。英人久思在孟加拉建立根据地，盖孟加拉位于恒河下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印度天府之称，其在形势上，进可扼德里之咽喉，退可与马德拉斯成指臂之势，英人今竟如愿以偿；日后不列颠印度帝国之创立，实即肇基于此。”

法人的势力既被逐于印度，英人乃得独占经营，在以后的100年内，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和商人，几乎席卷了印度的全部。克莱武以后的征服印度的人物，当以华伦哈斯顶斯（Warren Hastings 1772—1785），康华理斯（Lord Cornwallis 1786—1793），卫尔兹力（Lord Wellesley 1798—1805），哈斯顶斯贵族（Lord Hastings 1813—1822），本庭（Lord William Bentinck 1828—1835），和达贺胥（Lord Dalhousie 1848—1856），等人勋绩最著，虽然有者以武功得名，有者以文治见传。华伦哈斯顶斯接任克莱武所遗留的大业，他在印度的13年，虽引起多方的责难，但他对于日后不列颠在印度的帝业，实有一手擎天的大功。他抵印后，即决定取消双重政府制度，盖当时孟加拉虽在实际上受治于东印度公司，但印度的土著政府在名义上仍旧存在，后者在英人看来实为建立有效率的行政制度的一个障碍。他这决定使东印度公司从此无论在名义上或事实上都成为了孟加拉的直接统治者。但华伦哈斯顶斯的眼光自然不能仅注视着

不列颠印度 (British India) 的边界以内，他看出中部印度的马刺塔邦联 (Mahratta Confederacy)，实为不列颠在印度权力的一大危险。我们前曾提及，莫卧儿帝国自 1707 年奥朗则布大帝去世后，即日趋瓦解，那时马刺塔的大权落于世袭首相即所谓 Peshwa 者之手，他在浦那 (Poona) 自设朝廷，同时其他土酋亦各在 Guzerat, Malwa, 及 Tanjore 等地组织小朝廷，而奉 Peshwa 为宗主。华伦哈斯顶斯的政策，在消极方面竭力防止马刺塔邦联的权力扩张，积极方面自亦希望一展他的前任在孟加拉所施的故技，主张浦那的王座的候补人应由英方推荐。那时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已发生战争，1777 年，当法国已准备在美洲反抗英国时，她复希望在印度帮助马刺塔邦联来打击英国，他曾派遣使节至浦那提议缔结同盟。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实力尚弱，但孟买管区和马刺塔的发生冲突，迫使华伦哈斯顶斯不得不出兵援助。在这第一次的马刺塔战争里，英方经过多年的苦斗杀夺和赖有华伦哈斯顶斯超凡的英勇，才在失败复失败的形势下，转入胜利的局面。不巧马德拉斯当局的不谨慎的行为，复触犯了南印卖索尔王国 (Mysore) 的君主 Hyder Ali 卖索尔，德干的君主以及马刺塔一部分的土酋，联合抗英。哈斯顶斯和马刺塔草草议和后即趋军南下，他复利用外交手腕拆散了他敌人的阵线，而专与 Hyder Ali 作战。这个南印度的回教君主，虽专制而治政公平，年事虽老而精力仍壮。不列颠在印度的真正势力，惟有他能充分认识。但马德拉斯当局的不正当的设施，终使他觉得与英人为友尤较与英人为敌为危险。Hyder Ali 的军队，有骑兵，有炮兵，而且有良好的组织。他攻势之猛，所过之处，田庐为墟，英人到处溃败，Hyder Ali 的骑兵且直叩马德拉斯之墙，幸经哈斯顶斯在陆上的力战和在海上的援助，马德拉斯始告无恙。1782 年，Hyder Ali 年老病故，1784 年英人与 Hyder Ali 之子 Tippoo 议和，各自恢复原有的土地。

华伦哈斯顶斯在行政方面也有所改革，如整理公司的财政，创置警察的制度等。但这方面的历史的建设，尚有待于康华理斯的宏图。康华理斯的不朽之名，实得之于他对孟加拉土地问题的永久解决。印度的田赋，直至此时，仍袭用莫卧儿帝国之旧制，由那些几乎是世袭的收税员征收，而税收的数额，竟一无标准。自经康华理斯整理后，孟加拉的土地税，始有一个规定的税率。康华理斯是英国政界上有身份的人治理印

度的第一个人，而庇特（pitt）首相之遴委印督，亦非毫无选择。当英人初获孟加拉时，在印度的英人不免有欺压抢夺的行为，海外冒险的目的，无非是发财致富，何况东印度公司的那些书记先生们又类都是俸给苦微，他们全赖各种不正当的方法，始得无负于他们的跋涉海外。这种堕落的风气在华伦哈斯顶斯的任内亦未能遏止，康华理斯的使命即是必须免除凶暴与苛政，而使印度得到安全与保障。他继华伦哈斯顶斯之后，从事贪污及勒索的防止，他提高了公司职员的待遇，禁止他们私自经营或收纳贿赂。公司的职员受到明白的训诫，他们的职务不是经商而是从政。孟加拉之日后成为不列颠印度的模范省份，实为康华理斯政绩的最好证明。

康华理斯任内之另一可述之事，就是第二次卖索尔之战（1790—1792）。这次战争由康华理斯亲任总司令，而德干君主及马刺塔邦联且与英并肩而成三角同盟。那时的印度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各土酋的眼光狭小，自在意中，他们虽被他人利用而犹不自觉。三面来袭的攻击，自非 Tippoo 所能抵御。这一战的结果，卖索尔的版图，丧失一半，这丧失的土地即由胜利的一方共同分割。此外 Tippoo 复赔款 300 万镑，以偿英人的损失。那时印度的地图，已有一种“变色”的趋向，但最积极的征服者，犹未莅临；等到卫尔兹力踏上了印度的土地，不列颠在印度建立帝国的气势，乃大为膨胀。

卫尔兹力治印的主要目标，是要使英国成为印度的最大权力，一切王公土首都须听命于这个权力而不能享受任何实质上的独立与主权。他在印度的时期虽短（1798—1805），而他在印度的功绩，实不可磨灭。他曾消灭了卖索尔君主 Fippoos 的统治（第三次卖索尔战争 1799）和击破了马刺塔邦联的权力（第二次马刺塔战争 1802—1804）。我们曾在前面提及法人在印度的活动，在拿破仑失败以前，并未完全停止。卫尔兹力既图扩大不列颠在印度的权力，防止法人侵印自为他治印政策的一部，而他的卖索尔与马刺塔战争，亦无不与防法有关，因为后者与法方均有往还。Tippoo 在康华理斯任内虽为英方所败而犹未臣服，他希冀得到拿破仑的援助，恢复他在 1792 年所丧失的土地。卫尔兹力要求他参加英方所谓的 Subsidiary system，即接受英方的保护与辅助；卫尔兹力的提议，自不能为他所欢迎。1799 年 1 月 26 日，拿破仑致函 Tippoo，宣布他即将

趋前予以解救。拿破仑虽派兵驰赴叙利亚，但一支土耳其军队阻于该处，远水不救近火，所以在 1799 年春天所发生的第三次卖索尔之战，不及三月，Tippoo 的首都 Seringa patam 即告陷落，Tippoo 本人亦死于战场，这个卖索尔回教君主的统治，完全消灭，其土地为英方及马刺塔分割。

卖索尔刚被粉碎，马刺塔又成为卫尔兹力次一行动的目标。马刺塔邦联的武力，甲于中印，他们聘用法国军官，以欧洲方法训练军队，并阴受法人各种军事上的援助，那时拿破仑的埃及之战，正在开展，卫尔兹力除组织红海远征军，驰赴埃及外，对马刺塔武力的扩张，不得不设法加以打击。恰巧马刺塔邦联的土酋发生内哄，卫尔兹力乃得联甲制乙，参加战争。英军由卫尔兹力的兄弟，即日后以滑铁卢一役名垂千古的威灵顿（Wellington）和赖克（Lake）两人统率，他们先后在 Assaye, A-lighur 及 Laswaree 等地获得大捷，马刺塔邦联的土酋割地求和，而甲于中印的武力，至此乃得击破。

卫尔兹力所表现的膨胀政策，并不仅止于上述两项战事，他又曾与介于马刺塔与卖索尔之间的海达拉巴（Hyderabad），缔订条约，规定非得英方同意，海达拉巴不得雇用其他欧人；此约用意仍在防法。他与印度土酋缔结的勒克瑙（Lucknow）条约，使英人的势力，得以伸入印度的西北边省。在他的任内，奥里萨也接受了英方的保护。卫尔兹力所用的方略，凡自恃武力不愿臣服于英方的部落，他便出兵讨伐，愿意接受英方控制的，他便和他们签订永久的条约，使他们永远依赖英人而受其保护。这些小王国在内政上仍享受相当的自主权力，但政治实受一个驻扎当地的英籍代督（Resident）的支配。卫尔兹力是认为“维持英印双方的均势，是不可能的”的第一个人。他认为只有使不列颠的势力在印度占有压倒的优势，始能维持印度的和平。

但卫尔兹力的武力征服政策并不为东印度公司所欢迎。武力征服政策势必在财政上引起巨大的耗费，而且军事上的活动也足以影响贸易上的经营，当时的庇特内阁，亦并不完全同意卫尔兹力之所为，此可于卫尔兹力任期未几即被撤回，国会里一部分企图施以弹劾，以及侧重文治的康华理斯二次拜受印督之命，诸事见之。那时在印度仍有战事进行，康华理斯曾奉命不惜一切代价以恢复和平，可惜他抵印度未及 10 个星期即因病去世。但卫尔兹力的帝国政策，虽不为当时所支持，而欲认真中

止，盖已势有所不能，所以后此的继任者大体上亦仍在跟着卫尔兹力的路线前进；此项政策的最高峰点，就是 1877 年维多利亚的加上印度女皇的称号。

卫尔兹力未完成的工作，留给哈斯顶斯和达贺胥去获取他们在不列颠印度历史上的地位。印度北部尼泊尔 (Nepal) 的廓尔喀 (Gurkha) 山民，强悍好战，时出掠劫。当他们南下蹂躏恒河大平原时，受害者自然有英人在内。哈斯顶斯贵族莅任的翌年，即从事尼泊尔的战争，最初虽遭挫顿而终将廓尔喀人的统治摧毁，1815 年所订的 Segauli 条约，使尼泊尔虽保持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完全受英国驻尼总督的控制；这条约一直有效到现在。尼泊尔是英人在印度大陆上进行征服工作中唯一没有“效忠英王”的一个地方，它现在则成为印度陆军的募集之地。同时印度中部又开始骚动不安，一种称为 Pindaris 的马匪，在德干高原大肆掠劫，他们的人数在 2 万以上，到处乱窜，使英人颇费周折。哈斯顶斯决心加以肃清，他指挥的军队，数在 10 万以上，到 1817 年下半年，始将他们击散。这一批劫盗为生的流寇实际上和马刺塔邦联的土酋都有勾结，而阴受其庇护。品达里斯之战刚结束，而第三次的马刺塔战争又起，战争之进行，为时甚短，其结果则马刺塔邦联消灭，大部分的土地并入于孟买管区，英人在中部印度的隐患，至此大除。

当时一般人的观点，认为印人的文化落后，愚蠢无知，正是不列颠在印度政权巩固的保障；但哈斯顶斯贵族与他同一代的人们的意见相反，他是第一个注意到印人教育的人。在他任期内，他曾设立印度学校，出版印度报纸，发起研究印度语言，聘请印度学者搜集并翻印度的法律，并年拨教育费 1 万镑以作复兴文学及发扬科学之用。那时一般人对于印度的教育问题，究竟使印人永久封闭于他们自己落后的文化里，抑或将欧洲的文化移植于那衰老的古国，意见不一，盖两者之间究竟何者对不列颠为有利，殊难预断。此事直到本庭任内，英人始决定将欧洲的文化及欧人生活的方式，移植于印度，授印人以英语及欧洲的教育。

本庭是康华理斯以后注意于内政的一个总督，他的声名与孀妇自焚 (Suttee) 的禁绝和杀人强盗 (Thug) 的剿捕两事同垂不朽。印度的陋习，丈夫死亡后，妻子为表示她的贞节虔诚，须与丈夫的遗尸一同焚葬，如其丈夫身死远方，其妻亦须自焚以殉。这种风俗无论从任何一方面来看，

终是一种原始社会里的野蛮的遗毒。这种陋习在印度若干地带，业已渐次绝迹，但在孟加拉及判查布等地，仍极流行。据官方统计，这种孀妇自焚的事件，在1817年发生700余起，1818年发生800余起，1818年以后的8年，平均每年有600余起，本庭于1829年12月4日明令禁止这种不人道的悲惨的风俗，并规定任何人教唆或压迫或帮助孀妇殉夫的，以有意杀人（culpable homicide）论罪；这一改革使他获得如马可梨（Macaulay）颂赞的“将不列颠自由的精神灌入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改革者”的称号。那时印度杀人越货的盗匪或专事暗杀的刺客，出没无常，本庭予以剿捕，在他任内，被捕者达1500余人。他在司法方面也有所改革，他又设法解决因第一次缅甸战役所引起的财政失衡的问题。此外，他使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亦得受雇于东印度公司，1833年所颁布的新的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内注明：“凡印度的土人，或诞生时即为国王臣民者，不得因其宗教，诞生地点，家世或者种族的颜色而取消其任官受雇之权”；这种声名足以代表本庭政策的一种倾向。

英人在印度的征服工作，可以说大体上完成于东印度公司时期最后的一个总督达贺胥（1848—1856）；他是卫尔兹力以后在不列颠印度历史上最堪注意的一个人。无论武功文治，在他任内，都是政绩辉煌。那时英人在中印南印将土著王公的势力已扫荡殆尽，只有西北方面，不列颠势力的巩固，尚待努力。判查布（Punjab）在形势上位据恒河上流，俯瞰着孟加拉平原，而其居民西克人（Sikh）又是好战之徒，时与西北丛山中的土民相接。他们若一日得势，英人在印度的政权自将日夜不安，何况拿破仑的威胁方去，而“北方活熊的祸患”又开始闪现于英国政治家的眼帘。故在两次的西克之战中（1845—1846，1848—1849），英人无不作殊死的格杀。英人与西克人的争斗虽烈，英人在两次战役中所蒙受的损失虽惨，但西克军队终得因此消灭，判查布也于最后一次的战役中并入于不列颠印度的版图，不列颠在印度最后的一个隐患从此消除，而不列颠印度的统一局面也至此完成。

达贺胥任内领土的扩充，不止于这一片西北大平原，他还吞并了一些土著王国如乌德、萨泰拉（Satara）和那哥不尔（Nagpur）以及下缅甸的几个省份。他的吞并乌德（1856），且未发一矢，未损一卒。乌德在华伦哈斯顶斯时代，实际上已成为了英人的附庸，1814年以哈斯顶斯贵族之

怂恿，脱离莫卧儿帝国而独立。帝国主义国家之吞并殖民地，假使没有其他借口，内政不修也可成为正当的理由，乌德的被并就是最好的例子。

达贺胥除了在领土方面推行卫尔兹力的膨胀政策外，他复思在内政上，无论是道德的或者物质的，俱有所改进。他是不列颠在印度建立帝国以来最注意于交通建设的一个人。他建立了全印度的公路网和运河网，他开发恒河，筑造铁路，并设立电报，减低邮资。他又以款项补助各种学校，在文官的制度里引用竞赛的方法等。达贺胥治印八年，他以为不列颠的统治足以增加印人的幸福；所以他一方面尽量扩大统治的面积，一方面复竭力将一切新的制度推行于印度。

(三) 英人征服印度之历史

吾人叙述英人征服印度的历史，殊可至此而止，此非谓在达贺胥以后，英国在印度的侵略政策即停顿不前，乃谓至达贺胥时代，英国在印度的帝业已大体告成。当英法争霸印度的时候，以杜普雷克斯之才智与经略，英人以全力应付，犹恐不足，普拉西一役后，法人在印的势力虽日趋衰微，而其暗中所煽动的土酋的变乱，亦殊使英人坐立不安。自拿破仑颠覆后，英人在印度的权力，遂暂时不感受任何威胁，而于1824年至1904年的80年中，英人乃得数次从事于印度外围的战争。在达贺胥之前，有第一次缅甸战争（1824—1826）和第一次阿富汗战争（1837），在达贺胥任内有第二次缅甸战争（1852），在以后，有不丹战争（Bhutan War 1864—1865），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8），俾路芝斯坦（Baluchistan）的合并，第三次缅甸战争（1885—1886），以及1904年寇仁（Curzon）总督任内荣赫鹏的远征拉萨。（Francis Younghusband 返英后，曾著有 India and Tibet 一书，追叙渠于1904年进兵西藏之经过，商务印书馆有孙煦存译本，书名《英国侵略西藏史》）。上述各项战役，其结果虽异，而目的则一，无非求不列颠印度统治更巩固的保障，其所以然者，盖不列颠印度的本身已壁垒稳定，故转而推行一种边疆政策，以屏护这经百余年心血而获得的帝业。

但我们于披叙历史之余，不免衷心感触，即印度的面积凡180万方

里，约当俄罗斯以外的欧洲的全部，在 18、19 世纪，其人口亦在 2.5 亿至 3 亿之间，较之于当时英国的人口，20 倍犹不止；东印度公司者，一行商耳，然则何以这样一个广土众民而又文化远古的国家，竟灭亡于一个商业公司之手？这至饶兴趣的问题，诚值得我们一加考察。

东印度公司究以何种凭借，造成这史无前例的征服历史？我们默察其间线索，觉得英人征服印度的手法，实不出“分化离间以印灭印”八字。莫卧儿帝国自奥朗则布大帝去世后，一些权臣抚督或军阀土酋，纷纷崛起，各据一方。大帝薨后仅五年，其权臣 Chin Kulich Khan，通常被称为 Nizam-ul-Mulk 者，即在海达拉巴自封为 Nizam（海达拉巴君主的称号）。另一权臣 Ali Khan，则于 1720 年在乌德自封为太守（Nawab）。HydevAli 则因拥有军力，自为卖索尔之王。马刺塔邦联的土酋，他们向未完全臣服于莫卧儿帝国者，至此亦奉 Peshwa 为首，恢复其源有之流寇生活。皇帝等虚设，号令不出都城。而那些各据一方的小朝廷，又复互相仇杀，整个的印度半岛，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的局面原为外族插入的最好机会，何况那些无知识的土酋，又好引求外援，而不知引狼入室的危险？1748 年 Nizam-ul-Mulk 死后所引起的王位问题，两个候补人的背后，各都有一个外族的势力，而海达拉巴继承之战，法英两方的参加，亦成为印度受欧洲统治的历史的最初一页。苏拉哲和米雅法因争夺孟加拉总督一缺而引求外援的结果，竟为日后不列颠印度帝国的发端。其后卖索尔和马刺塔的一再勾结法人，反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其所以然者，他们徒知求救外族而不知团结内部，有时且协助外敌攻击同胞，或借以自肥，或借此邀功；其间事例，不胜枚举。他们被人分化而不悟，受人利用而不知，而终被各个击破，无一幸免。

但这种联甲制乙各个击破的策略，并非创自英人。拿破仑攻侵奥地利或普鲁士时，曾使巴威和符胜堡（Bavaria, Wurttemberg）为其同盟；而拿氏这种方法，60 年前杜普雷克斯即已施之于印度。法人在印度的势力虽为英人所逐出，法人在印度的策略却为英人所袭用。他们以纵横捭阖的手段，操纵印度的王公与疆吏，使之自相残杀，而坐收渔利。他们实在也是“积小胜为大胜”的信徒，逐年蚕食，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

但此处所言的“以印灭印”，并不仅仅是“亡六国者六国也”之谓。

当英人开始征服印度时，英国的人口仅有 1200 万，而除了印度以外，英国犹有事于地球上的其他地带。在克莱武时期，英国正与法国从事七年战争；华伦哈斯顶斯时期，美洲燃烧着独立的火焰；而卫尔兹力督印的时候，英国正沉沦于拿破仑战争之中。英国人口既少，而又不像普鲁士那样的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则何以她竟能有如许的军力，散布到印度去从事殖民地的征服？抑有进者，英人参加欧洲大陆上的战争，类以海军为主，她仅在财政上接济大陆上的同盟军队，而自身并不有多大军队参加陆上战争，然则她竟何以一反传统的作风而独力负担一个完全大陆性质的战争？1818 年最后一战的马刺塔战争，英方直接驰奔于战场上者，凡 10 余万人，英人竟何以于滑铁卢之役的后三年，即能有较威灵顿将军驻在西班牙的人数还多的军队，驻扎于印度？

我们一究实际，即知此项征服印度的军队，实印兵多而英兵少；同时，我们若因之即谓印度之被征服，实被征服于印人而非被征服于英人，亦不为过。东印度公司的武力与印度土酋的武力相遇，诚可以一当十。1757 年普拉西之役，克莱武以 2400 之众，击破苏拉哲之 5 万大军，1803 年 Assaye 之捷，威灵顿统率之军队，仅 4500，而对方则拥卒 3 万。于是世人以为此皆由于欧人种族之优越，马可黎（Macaulay）就是这一类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在论克莱武一文中，对于英人之远较印人优越，一再颂扬。实则印度土著固不足抵挡欧洲军队，而印度兵士之能够接受欧洲人的组织与训练，以及学习欧人作战的效率，初不在欧洲士兵之下；所以杜普雷克斯早就有见于此，在朋第舍利招募印兵（Sepoy），组织他们，训练他们，用以建立他理想中的东方殖民帝国。英人征印的规模，大都袭自法人。1748 年英人在马德拉斯成立了一小队的印度兵，实亦萧规曹随，仿效法人所为。且据史籍所载，获得普拉西之捷的克莱武军队，2400 人之中，有 1500 名是印兵，欧人仅占 900，由此可见种族优越之说，益不足信。在印度之战中，双方的成败，乃由于有无组织能力，科学设备，以及领袖才能，而非由于种族上之优秀或低劣。东印度公司既是欧人的组织，他们的组织力量是远较印度土酋为强，他们军事科学当然较印度土酋进步多多，所以“组织”及“科学”，才是东印度公司真正致胜的因素，而印人英人在血统上其能力既无高度的差异，所以英人乃利用印人来做他们灭亡印度的工具。在诺斯首相的管理法（Lord North's

Regulating Act, 1773) 通过以前, 易言之, 即在英国政府的手指尚未伸入公司之前, 东印度公司的军队, 其中欧人只占七分之一, 七分之六都是印度兵。在 1773 年, 欧印士兵的比例, 减至一与五之比, 即欧兵 9000, 印兵 45000。1808 年, 其比例为 25000 的欧洲兵对 13 万的印度兵。1857 年“兵变”时, 其比例为 45000 的欧洲人对 235000 的印度兵。“兵变”以后, 英人怵于前事, 乃将欧洲兵的数目增加, 印度兵的数目减少, 约成一与三之比。但无论如何, 所谓印度军者 (Indian Army), 其绝大部分都是印兵, 而欧人只占少数;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自始至终, 印度军乃是一种印度土著的武力, 而非欧洲人的武力。这种印度兵, 都受公司的饷给, 他们只知主人而不知兄弟, 只知金钱而不知国家, 在所有的战争里, 他们之忠于他们的雇主, 正于英人之忠于他们的国旗。他们是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的真正工具, 而东印度公司亦赖有他们的血汗, 才建造起不列颠印度的殖民帝国。

英人的“以印灭印”, 不仅在人力方面如此, 即在财力方面亦复如此。拿破仑举兵 10 年, 侵略全欧, 但他从未发生财政上的困难。他的策略是以战养战, 就地搜括。这种方法英人实早施行于印度, 华伦哈斯顶斯 1781 年的 (Cheyt Singh 事件和 1782 年的乌德公主事件 (Case of the Begums of Oudh), 就是最好的例子。(按: 当时华伦哈斯顶斯正与马刺塔及卖索尔发生战争, 需款孔急, 乃向贝拿勒斯土酋 (Cheyt Singh 索款 5 万镑, 以供军需。他认为 Cheyt Singh 既受东印度公司之保护, 当东印度公司在困难之时, 自应有所贡献。Cheyt Singh 拒绝供给此款, 华伦哈斯顶斯乃以 10 倍之数罚之, 迫令 Cheyt Singh 献款 50 万镑, 并亲赴 Banares 逮捕 Cheyt Singh, 而民众群起反抗, 华伦哈斯顶斯只身逃出, 仅以身免, 是谓 Cheyt Singh 事件。但军用仍极迫切, 华伦哈斯顶斯乃令乌德之君主 (Nawab) 筹饷若干, Nawab 并非富有, 因其父亲之遗产均握于其母及祖母之手, 即通常称为乌德公主者 Begum of Oudh, 华伦哈斯顶斯乃派兵协助 Nawab, 将该项财产自彼二女子手中夺取。) 当英国和拿破仑从事战争时, 浩大之战费, 惟赖举债与增税, 方得弥补。两者之最终, 均为加重人民之负担。英国之所得税制度, 创自该时, 盖战争已进行六七年, 仅赖发行公债以应军需, 已不可能, 庇特乃于 1799 年决定创行所得税, 收入在 60 镑以下者免征所得税, 150 镑以上者, 征税 5%, 200 镑以上者

10%。征税的税率，随战争的延长而增加，据阿雷微（Elie Halevy）在其名著《英人小史》中所记，1805年，庇特将150镑以上原征5%者，税率提高至6%，1806年，财相Henry Petly又将之增至10%，并将免征标准，自60镑降至50镑，以裕税收。在1814年，所得税之收入，达1600万镑，在所有战争税的总额里，占到三分之一强。战争的延长或扩大，就是人民负担的增重，人民对于战争的负担既如此重巨，人民对于战争的进行及战争的前途，自然倍觉关切。但反观英人在印度所从事的征服战争，前后100数10年中，英国政府既未因此征兵，亦未因此举债；此亦即英国人民对于印度以及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实际情形，所以茫无所知的原因。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无论兵力战费，都是取给于印度，东印度公司以印度人的生命和印度人的金钱，灭亡了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古老国家。

除上述各端外，东印度公司之吞并印度，亦尚有一项足以重视的便利，即“政府的支持”。最初的英印关系，严格言之，原只是东印度公司与印度的关系，最初英法在印度的冲突，也只是英国在印度的商人和法国在印度的商人的冲突。东印度公司原是人民的组织而非政府的组织，但这种公司的设立及其所享受独占权利，却为政府所特许。它在海外的发展，自与人民的利益有关；而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又常互为表里，所以英国政府对于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自不能漠视而无所关切。抑有进者，东印度公司之征服印度，并非始于公司与印人之冲突，而系始于公司与法人之冲突。那时英法两国都在海外广殖势力，以争世界的霸权，所以两国到处发生冲突，而欲消灭对方的存在。当法人在海达拉巴王位的继承问题中，思统治德干而将英人逐出于马德拉斯和孟买时，于是英法在印的逐鹿，入于剧烈的阶段。从那时候（1748）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终了时止，在那70年中，英人在印度所从事的战争，多少可以视为对法的战争。因之，东印度公司在印所从事的战争，虽非政府名义，而在一般英人的眼中，已视之作为一种国家的战争（National war）；盖公司与国家，在当时英人的心目中，已是二而为一，不可分离。所以，东印度公司除了它本身的军队外，复常得可观的皇家军队的援助，在1857年“兵变”中，政府曾派兵增援公司，即其一例。

(四) 东印度公司本身之变质以至于消灭

我们于叙述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的历史以后，将进而叙述东印度公司第二个时期里的另一面，即东印度公司本身的变质以至于消灭。东印度公司原是一种人民的组织，但因为这是一种特许状公司（Chartered-Company），易言之，公司的权力与权利都以国家所颁给的特许状为根据，则在若干情形之下，自受国家的牵制，盖国家必须在此若干情形之下，始愿颁给特许状或延长特许状的期限。这种特许状公司，在17世纪的英国，原不止一个，它们分别与不同的国家从事贸易。但当英国的国力日臻富强以后，政府可以经由领事、海员或兵士，以保护在海外居住或在海外贸易的商人，所以那些特许状公司先后消灭，硕果仅存者就是这个“英商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存在，原与当时英国社会的一般思潮不合，所以它的取消，亦屡为各方所要求。但东印度公司终仗金钱的力量，得以一再延长（Renew）其特许状的期限，如在1730年，公司以40万镑献于英王，得延长其特许状14年，1744年期满时，公司以贷款100万镑于政府，复得延长36年。只是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虽一再延续，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之所为，终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过问。东印度公司本是一种商业公司，但当这些商业公司的书记先生，一旦发觉他们已成为印度的主人时，于是横霸与暴虐的政治，继而开始，他们每一个人只知如何搜刮剥削，而可怜无援的印度土人，遂成为了他们腰囊饱满的牺牲品。克莱武本人就是此中的代表，他自贫苦的小书记而变为百万的巨富。他们这种强夺勒索的行为，不仅有辱于国家的荣誉，抑亦足以毁灭他们在印度的基业。同时，这种腐败堕落的行政，自足使整个的公司陷入危境。1772年公司以财政困难，向国会借债100万镑，政府一方面在财政上予以援助，一方面乃通过法案，以求公司行政的改革。

1773年管理法通过后，政府的手开始伸进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规定将孟加拉省长（Governor of Bengal）改称为印度总督（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除孟加拉外，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亦受其节制。除总督一人外，管理法复规定任命参事四人，合总督共为五人，组织参事会

(The Council)，总督即为该参事会的主席。总督及参事任期五年，第一任由国会指定，以后由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推荐，但须得英王同意。同时，总督及参事如非董事会的请求，英王不得将他们调换。至于公司的董事会，由 500 镑以上的股东于 2000 镑以上的股东中，选举 24 人组织之。董事之任期为四年，每年改选四分之一。除上述各项外，复规定在加尔各答设立一个最高法院，内有皇家法官一人，陪审法官四人，前者由英皇任命，用以受理不列颠印度境内之案件。管理法规定，所有法官及参事都不得经营贸易，不得收受印度土著的赠馈，董事会的任何措置均须呈报政府，征得同意。同时，公司的特许状，每次的期限规定为 20 年。

这个管理法自然有许多缺点，如最高法院及总督之间的权职，并无明文划定，因之使双方很容易发生摩擦；总督虽有权管辖马德拉斯和孟买的当局，但这种权力并不充实到能使他推行他的政策。事实上，马德拉斯和孟买当局也并不服从总督的命令。更不幸者，参事会原须与总督相辅相成，而结果自 1774 年第一次会议以来，参事会始终与总督处于敌对仇视的地位，随处与总督为难。华伦哈斯顶斯之赴印原奉命要恢复有规则的行政和秩序，改革在克莱武任期中所有的那些不荣誉的行为和堕落的风气，盖当时无论是辉格党或托立党的政治家，俱以拯救印人为己任，此在柏克 (Edmund Burke) 的文章，福克斯的信札以及小庇特的演说中，均可见之。但哈斯顶斯纵有诚意而在此方面亦无所成就，且后因他自己在危难的环境中所做出来的种种错误，使东印度公司不良的行政，依然受到国内各方面的攻击，华伦哈斯顶斯本身就是被攻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之，当时仍感有一种改革的需要，俾使总督能发挥他的权力，不致被他的下属所牵制，有如在 Philip Francis (参事之一) 左右之下的参事会遇事即与华伦哈斯顶斯作对一样。同时，这个总督必须不仅仅对一个只知金钱的商业公司负责，而应直接对伦敦政府负责。

在这种情形下，诺斯首相管理法通过后的 10 年，又有福克斯所提印度法案 (Fox's India Bill, 1783)。福克斯的印度法案之主要目的，就是将东印度公司的政府整个取消，而使之完全直属于政府。这个法案主张设立一个七人委员会 (A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f Seven)，所有公司的权力，都操之于这个七人委员会。这个七人委员会的人选，第一次即在该法案内指定，任期四年，四年以后，再由英王任命，而在此四年中，

除非上下两院请求，英王不得免除任何一个委员的职务。这个印度法案虽在下院通过而终被上院否决；福克斯和诺斯的混合内阁亦因此案而崩溃。

但这一次内阁的倒阁，并不能如通常那样归咎于内阁所提的那个法案本身所引起的困难，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原因，此点我们可以庇特1784年所提的印度法案终得通过一事为证明，原来福克斯与诺斯本为政敌，前者为辉格党，反对“美国战争”，曾对诺斯猛烈抨击，后者为托立党，“美国战争”的责任，主要地应由他负责。这两个政见相背的人物，竟于1783年组织混合内阁（名义上，首相仍为 Duke of Portland），实有违英国政治家的传统精神，他们结合的动机，只是一种自私，这种动机的结合自不能维持永久。人民对于混合内阁既无信仰，对于混合内阁所提之法案，亦发生同样的感觉。同时，该法案内规定七人委员会的委员第一次在法案内指定，即等于说第一任的人选均由福克斯任命。因此，在英王乔治三世看来，东印度公司之直接受治于政府，无异东印度公司直接受治于辉格党，扩大了辉格党的政治势力，而辉格党正是企图恢复御用特权的乔治三世的死敌。所以乔治三世授意 Lord Temple 在上院宣称，凡赞成“印度法案”者，不仅非英王之友，抑且为英王之敌。印度法案遂在上院否决，而是年12月18日，混合内阁亦被乔治三世免职。

庇特拜受首相大命，年仅25岁，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通常人士均称之为小庇特（The Young Pitt）。当庇特的背后有着全国及国会的支持，乔治三世才发觉这个年轻的首相，并不如诺斯一样的可为他利用。福克斯的印度法案虽未通过，但克莱武和华伦哈斯顶斯在海外所建立的版图，自不能听其长此混乱而不加整顿。1784年，庇特乃提出他自己的印度法案。庇特这个印度法案曾被下院否决，但当下院解散重行大选后，这个印度法案终于通过。庇特的印度法案，主张设立一个印度事务委员会（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或简称监督部（Board of Control）。这个监督部由六个枢密大臣（Six members of the Privy Council）组织之，内包括财政大臣（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及一个部长。监督部的职权为“制裁、处置、及监督东印度公司所有一切行为，以及与公司属地之军政、民政或赋税有关之事项”。实际的事务仍由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掌理，除了总督以及其一二重要人员以外，其余的推荐权亦

属于董事会，不过较为重要的职员的人选，英王保留有不批准之权。至于在实际的运用上，董事会的权力都操之于由董事会所选出的三人秘密委员会，不过法案规定所有重要事务，他们均须请示监督部，监督部之权力，事实上则由监督部主席（President）一人行使。所以庇特的印度法案，其将东印度公司和政府发生的关系，较之福克斯的提案略为温和，因为它并未将公司的统治权完全自公司的手中移至内阁和国会。监督部的主席，实际上等于一个部长，而成为每一任政府（ministry）里的一个重要分子，他在印度事务方面之对国会负责，一如其他部长在其主管的事务方面之对国会负责一样；印度的行政也就因此成为了英国政府整个制度里的一部。

庇特的印度法案通过后，管理印度事务的政府，遂有两个，一个是在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的政府，其首脑是印度总督，一个是在伦敦的监督部，其首脑为该部的主席。对于印度事务的最高处理之权，这时已自东印度公司抽提了出来而属于伦敦的监督部，益以法案规定印度总督除非遇有非常事变，无权任意宣战，所以在印度一切不正当的征服工作，伦敦方面已取得加以控制的权力。东印度公司原是一个以贸易为目的的组织，而自 1784 年以后，这个贸易公司的管理权，乃落入于与贸易无关的人的手中。

不仅在政治上，东印度公司的权力自 1784 年已大为削弱，就是它在商业上的特性，也逐渐消失。前曾提及，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自 1773 年后，规定每次有效 20 年。1793 年重订（Renew）的一次，尚无任何足以重视的事件，1813 年重订的一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及航运的专利权，则俱被取消，而印度的贸易至此乃开放于所有的英人。那时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及航运专利权仍旧保留，但这部分保留的权利，也于 1833 年完全取消。于是东印度公司已不复是一个商业团体而仅为一个行政团体。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版图则仍被承认，为期亦为 20 年，1853 年最后一次的特许状，规定公司的地位将随时由国会决定。东印度公司自 1833 年起即已名存实亡，它的躯壳的存在，仅为了在技术上和经验上有所帮助，而这个名存实亡的组织，也终于在“兵变”以后完全消灭。

1857 年的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表面上虽是由于一种宗教性质

的偶然事件，实际上却是已经在印度酝酿了多年的不安与愤怒的一次总爆发。达贺胥认为不列颠印度的良好行政，足以增加印度土人的幸福，所以他尽量推行他的“保护政策”，扩大他的统治领域，而凡是他认为政治黑暗的王国，他即予以直截了当的吞并。他既蓄意要建立他所谓的不列颠印度的良好行政，他自须推行许多新政，如建造铁道，修筑公路，开浚运河，行使汽轮，设立电报，提倡教育，宣扬耶教等等。但他的急进的政策，引起了印度土人极大的不安。达贺胥在内政上的一切设施，仿佛代表一种趋势，即印度原有的文化将被消灭，而代以英国的文化，印度原有的宗教也将不能保留，而印度人必须成为基督教的信徒。印度一般土人的这种感觉，这种忧虑，诚不免有误解或过分之处，但他们既处于一种被人肉食的奴隶地位，他们之发生疑虑与恐慌，实极自然。同时，土著王国之——被英人吞并，使印度原有的统治阶级，既愤怒而又惶恐，尤以乌德及萨泰拉（Sattara）之被吞并为甚，前者的理由是内政不修，后者的理由是王位无嗣。印度的风俗，养子（adoptedson）与亲生子之地位无异，而印度人的宗教观念，如一人无子，即罪大无穷。但当无子的萨泰拉君主（Rajah）出世时，达贺胥不承认其养子为继承人而遽将萨泰拉并入了不列颠印度的统治，他的行为乃被认为最有罪恶而不合宗教不合正义。达贺胥对于印度土著里的有身份的阶级（Influential Class）的意见和感觉，也漠视不加注意，尤以对乌德及西北省份的士绅阶级为然。他在下级职员의怂恿下，尽可能的剥夺他们已保持长久的各种权利。日后“兵变”之大都发生于乌德及西北一带，这也是一个原因。至于历次被英人废黜的王公及其亲属对英人的怀恨，自更弥漫了印度的每一个角落。

但这种不安的情绪，不仅传播于受治于英人的印人之间，并且在印度的军队里也酝酿着不满的心理。印度军队在数目上，以印度兵为主体。英人在印度占领如许土地，以及最近的征服判查布，都是这些印度兵的力量，英人在印度占领了这许多土地而能平安治理，也是这些印度兵的力量。但印度兵虽为英人如此效力，他们并未得到相等的酬报，他们并未受到英人的重视，他们的服务与他们的收获并未得到平衡。那时在印度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谣言，谓英人治印，自普拉西战争起（1757），百年为限，于是为印度军队主体的印度兵，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梦幻，以为自

己就是来日国家的主宰。这种心理自然更足以鼓舞他们因不满英人而图谋举事的情绪。印度人本有不越海洋的忌讳，但达贺胥主张印度兵也应调至印度以外的地带服务，其继任者坎宁总督（Lord Canning）且更予以明文的规定。印度军队里的不安，原早为敏锐的观察者所见到，只是达贺胥一再漠视有关的报告，使这种兵士的不满怨恨和土人的愤怒恐惧，交相溶流而终有 1857 年之变。

“兵变”的直接原因，原是一件极偶然的琐碎的事情，那时东印度公司颇以法人所制造的来复枪轻捷灵活，乃购买大批发给印兵，其弹药筒口涂以牛油或猪油，以便临时只须以口啮去，即可取用。但牛油与猪油正为印度教徒与回教徒所忌，而印度兵不属于回教即属于印度教。英人实未尝料及这种不谨慎的疏忽，竟能引起不列颠印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风波。印度兵对于英人本已不满，益以印人的煽动，谓英人之将牛油猪油涂在弹药筒上，是蓄意使他们丧失其宗教上之等级（Caste），俾得强使他们信从耶教，因之印兵大哗。1857 年春天，他们原想在加尔各答附近发动，但终于 5 月中在德里附近的 Meerut 发生叛乱，变兵直趋德里，德里、孔坡（Cawnpore）及勒克瑙（Lucknow）等地，先后失陷，自英人经营印度以来，其所遇之局面之危急，未有过于这时候。所幸马德拉斯、孟买、以及孟加拉的大部分均未叛变，叛乱也没有波及卖索尔及马刺塔，判查布不仅未转入，且成为了英人重行征服乌德的军事中心。英人竭其全力，费时经年，始将“兵变”完全平服，但因救平兵变而耗费的金钱，竟使东印度公司政府的预算无法平衡，迫使伦敦遣派当时最负时望的财政家 James Wilson 赴往加尔各答整理公司的财政，则此次“兵变”范围之大，情况之危，亦可想见。1857 年印度的兵变，震惊了英国全国，一般人对这辽远的土地开始注意，政府当局则认为兵变的发生，乃证明东印度公司已丧失其统治印度的权衡，而印度的行政，亦不复是东印度公司之事而已为国家的事务。1858 年 1 月，首相判麦斯顿（Palmerston）提议将印度政府自东印度公司移归英王（The Crown），判麦斯顿旋以他事辞职，继任首相德贝（Derby）亦于是年 6 月提出新的印度法案，取消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土地及权利均移归英王，东印度公司政府的官吏成为英王陛下的官吏，总督原名 Governor-General，自此时起，改称为 Viceroy，公司的军队并入于皇家的军队。伦敦监督部至此撤销，另设一

个印度事务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一切有关印度的大方针由他决定, 印度总督由他向英王推荐, 印度的税收由他支配, 关于印度的事务, 由他向国会及英王负责。印度事务大臣之下, 设立一个印度参事会 (Council of India), 这是一种顾问性质的机关, 参事中的半数, 必须在印度居住或者工作 10 年以上, 所以他们大都对印度问题有丰富的经验, 以备印度事务大臣的咨询。原有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 当然不再存在。同时在加尔各答的总督之下, 另设一个行政会议和一个立法会议 (Executive Council, Legislative Council), 以为总督之辅佐。有 250 余年历史的东印度公司, 至此乃永远成为历史上的名字, 同年 11 月, 维多利亚发布告印度王侯庶民书 (Proclamation by the Queen to the Princes Chiefs and the People of India), 允诺容许人民宗教自由, 印人与英人一样有被雇用之权利, 王公的权利与尊荣亦被尊重, 总之, 印人所有的权利与习俗, 皆将受到保护。

(五)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历史上的怪物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历史上的怪物。这个最初只有 68000 镑资本的商业公司, 竟在 200 年后, 统治了 38 万方里的土地和 6000 万的人口, 它的资本总额至 1812 年时已达 2100 万镑, 它的军队在“兵变”时约有 28 万, 自它组织成立以至于消灭, 前后凡 258 年。但有这样悠久的历史, 巨大的资本, 广阔的领土, 以及可观的武力这一个商业公司, 何以最终仍被消灭? 不仅它的政治上的权力丧失无余, 就是他的商业上的专利亦被剥夺殆尽? 东印度公司在距它本国遥远的土地上进行征服, 究系出诸它自身的野心抑或受意于它所属的政府? 何以英国经由这个商业公司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反将这个征服印度的机构撤裁? 此中演变, 其解释究为如何?

现今一般人都承认英国推行帝国主义的政策, 乃是狄士累利 (Disraeli) 执政以后的事情, 而为德国的英国通 Wilhelm Dibelius 所称的最鼓吹帝国主义和殖民事业的三本书, 狄尔克 (Charles Dilke) 的《大不列颠》 (Greater Britain, 1868) 和西徠爵士 (Sir John Robert Seeley) 的

《英国的膨胀》（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883）和《不列颠政策之长成》（The Growth of British Policy, 1895），亦都出版于 19 世纪后期。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并未在印度执行并吞政策（Policy of annexation）。至 19 世纪初叶，英国在印度所占领的土地诚然已属可观；三个管区的土地已可彼此衔接，卖索尔、德干、马刺塔都已屈服于英人，英人在印度内地的势力也已如水银之入地无孔不钻，而锡兰也复为英人所得；但这些并不属于一个预定的计划，而系得之于意外，甚至可以说得之于一半勉强的意绪之中。前曾言之，东印度公司之征服印度，并非始于公司与印人之冲突，而系始于公司与法人之冲突。18 世纪，无论在美洲或印度，英法均成为非我活即你死的可怕的敌手，那时在美洲，英国以新英格兰和维基尼亚（New England, Virginia）对抗法国的阿加底亚和加拿大（Acadie, Canada）；在印度，英国以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对抗法国的朋第舍利、成德拉哥和马黑（Pondicherry, Chandernagore, Mahé）。1740 年至 1760 年可说是英法争霸世界的决斗时期，而 1748 年英人之在马德拉斯招募印度兵，设练军队，实为保卫英人在印度海岸的工厂，以防法人的攻击。马德拉斯管区之成立，其意在保卫圣乔治堡和圣大卫堡（Fort St. David），孟加拉管区之成立，其意在保卫威塞堡，而两者之目的均在抗法。法人对于印度的野心，既直到拿破仑颠覆后才真正消灭，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自 1748 年至拿破仑战争终了时止的 70 年中，英人在印度所从事的战争，也多少可以视为对法的战争。但当初期的自卫战争过去以后，征服性质的战争继续而来的时候，无论是伦敦的监督部，公司的董事会，或国内的一般政界，财界，都开始感到不安。卫尔兹力和哈斯顶斯贵族的膨胀政策，东印度公司固然因其耗费钱财，影响贸易，竭力反对，就是伦敦政府亦并不以他们之所为为是。所以庇特内阁下令卫尔兹力火速寻求和平之道，不要暴师经年。劳民伤财。他的印度法案的主要目的，即在防止公司在印度的胡作乱为，而使伦敦方面能对之有所控制。庇特提出其印度法案时，他曾公开宣称，一切征服印度的计谋，都与英国的意愿、荣誉、及政策，不相符合。当他派遣康华理斯继卫尔兹力为印督时，他曾嘱康华理斯不惜一切的代价，以恢复印度的和平与秩序。而在福克斯的印度法案中，对于印度的军事行动，也有更具体的规定：任何土著王国，若未侵犯公司的土地，公司不得侵入或

攻击之，非得七人委员会（Commissioners）之同意，公司不得占领任何土地。

但何以如庇特所云：一切征服印度的计谋，都与英国的意愿、荣誉、及政策不相符合？何以英国并无意在印度建立殖民帝国？盖自美国独立战争发生以后，英国对于殖民事业即感到厌倦与嫌恶。他们在独立战争中已饱受教训，对殖民政策遂无复推行的热忱。1768年所设立的殖民地事务大臣一职，也于1782年撤销；此事实最可说明当时英国对于殖民事业的态度。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英国外交政策，是在海权方面，寸步不让，至于一切吞并领土的要求，则预备放弃。基于这个政策，所以英国才会容许美国于加拿大及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之间，伸一楔形地带，在巴黎条约里才会将西印度群岛的马知尼克岛（Martinigo）和哥德卢普岛（Guadeloupe）让与法国，并允许法国在纽芬兰海岸捕鱼，假如法国不在印度海岸建立武力，亦可恢复其原有之工厂。那时英国还有许多占领的地方，如地中海上的爱奥尼亚群岛（Ionian），马耳太，直布罗陀，大西洋上的圣海伦那岛，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Mauritius），但英国之占领这些地带，并非为了扩大领土，而只因这些地带，都是战略要点，或是航运的供给站，凡此均与海权有关，故自不欲放弃。而且殖民事业并不是一个毫无负担或一劳永逸之事，在殖民事业行进的初期，殖民者、无论其因抵抗土著或因抵抗当地的企业，无不希望得到母国的援助，这种援助自然要使母国在财政上加上巨大的负担，那时英国于屡次战争以后，财政上业已困难不堪，自无力再负担任何新的战争费用。至于殖民地巩固以后，年月既久，殖民地与母国之间便会引起许多冲突，因为到了相当时间，殖民地即将要求有他们自己的国会和自己的责任政府；殖民原以富强国家，而结果反增加国家的累坠与苦恼，引起各种冲突和危险。当时的英人，不能忘情于北美殖民地的丧失，尤不忘北美殖民地之丧失所给予他们的教训，因之对于殖民事业的悲观论调，在19世纪中叶以前，非常盛行于英国。当时一般人感觉殖民地对于母国实是一种艰巨的负担，而因地理上的关系，原为母国所扶植的殖民地，终有一天会脱离母国而独立。牛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Goldwin Smith）于1862年至1863年间在伦敦《每日新闻》（Daily News）所发表的信件而集成的《帝国》（The Empire）一书，就是这种悲观论调里的代表著作。据说

1867年英国国会讨论关于加拿大政制的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n Act）时，其情绪且远不及讨论增加狗税时来得热烈。当时英人对于海外殖民之不感兴趣，由此可见。所以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英国并无在海外扩大领土的企图，英国政府并未蓄意在印度推行任何吞并的政策。

但是政治上的事情，常常会陷入于一种其势不能罢休的地步；此于向外发展的过程中为尤然。英人之在印度从事战争原是为了自卫，但其后的战争竟延续不断，印度的土地也一再的并入于英人的统治，不列颠印度的版图，不论其为事前计划，或出之意外，总之日见扩大，膨胀政策虽欲中止而不可得。无论政府对于这辽远的殖民帝国，为欣快抑为勉强，而这个已经建立的帝国，势不能任其毁灭于商业公司的书记阶级而视若无睹。当时英人反对侵略印度者，不乏其人，而对克莱武，华伦哈斯顶斯及卫尔兹力的措置失当，抨击尤力。华伦哈斯顶斯的被弹劾固为众所周知，就是克莱武和卫尔兹力，他们也几乎处于与华伦哈斯顶斯同样的命运。1773年管理法通过时，各方对于克莱武的抨击，竟使他神经受到极大刺激而成为他1774年自尽的原因。1805年卫尔兹力返英时，国会里也有人主张加以一种罪名，以惩戒其在印度的恶行。一般的英人，对于印度的注意，固犹在“兵变”事件之后，盖他们那时对于印度情形，毫无所知，何以英人在印度都能腰贯累累，他们实莫名其妙。但政治上的人物，对于当前的情形，则已感到忧虑。那时的印度，在他们看来，已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地狱，即使当时对于印度最善意的批评家，亦认为在过去一世纪中，印度的政治已至无可言说的腐烂的程度，他们恐惧在印度的英人的品格将因此堕落，他们尤恐惧在印度英人的堕落，将更影响于国内一般英人的品格。此种恐惧容或过度，但并非毫无根据。在克莱武时代，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当他们在印度的恶行，使他们已成豪富以后，回到伦敦来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者，实繁有徒。那时英国的选举制度尚未经过改革，不仅贿赂风气仍极流行，就是国会议席，也可以金钱收买。这些道德堕地而腰囊饱满的东印度公司商人，挟其金钱上的势力，开始渗入了英国的政治生活。他们原属于不见经传的家世，而又怀着亚洲所行的一套理想，他们之渗入英国政治，自足以破坏英国宪治的平衡，威胁英国传统的宪典。难怪老庇特（The First Earl of Chatham）要

在上院大声疾呼：“亚洲的财富涌到了我们这里来，不只给我们带来了亚洲的奢华，而且给我们带来了亚洲的政治原则”，他的祖父及父之在国会里的议席，就都是因在印度成了豪富而回国以金钱购买到的。所以纵然不列颠印度的树立，非当时政府之本意，而这个既成的帝国基业，终使政府于最后不得不视之为一个 National matter。东印度公司的行政与道德，不仅影响这个殖民帝国的前途，抑亦牵涉整个英国的荣誉，间接复影响英国国内的政治风气。因此先有诺斯的管理法，继有福克斯及庇特的印度法案，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对在那辽远的土地上的一切行为，能有所控制。只是当时在英国国内还流行一种力量，即对于印度与英国发生直接关系的恐惧。他们不赞成将印度直属于政府。福克斯的倒阁和庇特印度法案第一次在下院的失败，这层也多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自 1807 年以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及伦敦的监督部，在一再磋商关于 1813 年特许状满期后再行重订的各项有关问题之中，对于公司的政治权利，竟未加以严重的讨论，因为他们觉得，如其政府对于不列颠印度的事务过问太甚，必将引起反对党的反对，后者认为政府如对印度负担太重，实属危险。亦正由于如上所述的背景，所以自 1784 年庇特的印度法案通过后，至 1858 年的 60 年中，伦敦政府和印度政府的关系，大体上无所变化。但年月的转移，使伦敦政府的直辖印度，大势所趋，终不可免。1857 年空前的兵变发生，东印度公司之不克统治这样广阔的版图，真形毕露，东印度公司乃终在德贝内阁之下，被结束其最后的命运。

现再就经济方面，略加考察。18 世纪后半期至 19 世纪前半期的 100 年间，是放任主义最发达的时期。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方法大起变化，人民的经济生活与前迥异。新式的经济生活和旧式的管理方法一遇，自然引起许多冲突，所以当时的思想界都反对国家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要求国家给人民以工商自由。这种工商自由运动，原不限于英国一国，但英国既是工业革命的创始国家，她在经济方面的自由运动，自亦较其他国家走前一步。1776 年的英国发生了两个革命，一是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一是亚当斯密所著《原富》（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的出版。《原富》的主旨即在力言国家对经济事务应采不干涉的政策，认为自由竞争可以鼓励生产，对于生产、劳资、物价、贸易，政府不出而过问是经济学上最好的原则。法国的大财政家科尔伯特（J.B.Colbert）有

一天问一个制造家，问彼将以何道增加国富。制造家曰：“先生，勿干涉，勿过问。”这种经济上的放任思想，实为当时各国人士所一致信奉的主潮。这种工商自由的放任思想，自与垄断贸易的特许状公司，冲突不合，所以亚当斯密在《原富》内，对于这种独家专利的贸易公司及东印度公司的腐败，也痛加鞭挞。其言有曰：“自英有东印度以来，民不仅欲经营彼土不可得，即购彼之物产亦必出至昂之价而后得之。此所昂者，不从公司之罔利使之然也。暴殄之所糜，奸欺盗窃之所亡失；专利之公司，所无能免者也。而其损必使购者弥之，此印度之物价之所以有日长而无日廉也。噫，专利谬矣，而后之专利者，其术非尤谬者欤？”《原富》出版后所发生的影响甚大，单就庇特一人而言，亚当斯密的学说，即成为庇特日后所推行的政策的基点。当后者在剑桥肄业时，他曾细读《原富》，而仰崇《原富》之著者，以其为师。庇特身为首相时虽年仅二十五，而一任首相，竟长至16年而不坠（1784—1801），这样一个人物，其在18世纪后期英国政治里的地位及影响，自非其他任何人可得与之比拟；而《原富》的精神在他任内亦到处可以发见。东印度公司的存在，久为舆论所攻击，它在政治方面，自经1773年及1784年两次的法案通过以后，已受到各种的限制，其在经济方面，公司的权力也将因时势所归而逐渐缩小。1793年重订特许状的一次，国会议决迫令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每年必须载运普通商人（Private merchants）的货物3000吨一事，就是它的专利权快要摇动的一种征兆。

1810年左右，英国若干改革运动，重复抬头。Francis Burdett重新提起了国政改革的问题，坎宁提起了天主教徒解放问题（Catholic Emancipation），在这种空气里，东印度公司的问题自亦不丧失其应占有的地位。就商业界全部而言，可说几乎是全体都反对这个独一存在的专利贸易公司。1812年英美发生二次战争，英国在美洲的市场，大受影响，而东方的印度，遂更受人们的注意，但当时大家都深切感到，印度贸易的真正障碍，并不是印度土人而实为东印度公司，盖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贸易，使其他商人不得参加。撤销公司的专利权，乃为当时的舆论所一致要求。当时伦敦有一部分商人，还相当支持着东印度公司，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货运都在伦敦起卸，公司专利权的丧失，无异伦敦港口专利权的丧失。这些伦敦商人自以为是不列颠商业之王，而以富有教养接

近绅士为骄，但他们在东印度公司一事里，终敌不过北方及中部的商人。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北方及中部的商人，虽为伦敦商人所轻视，而其势力则开始为社会所觉察。国会里因东印度公司的专利问题所引起的剧烈辩论，前后凡达 18 个月之久，反对者一再要求承认所有英人都有与印度公开贸易，自由贸易，无限制的贸易之权（opentrade, freetrade, unlimited-trade）。在 1812 年，国会里收到许多请愿书（Petitions），1813 年下院中充溢了自由贸易的呼声，甚至外相卡斯尔累（Castlereagh）也终于采用亚当斯密的言语。特许状虽然依然延续 20 年，而印度贸易的专利权则予取消，印度贸易的门户至此大开。

公司专利权取消后的结果，竟能为亚当斯密的理论作一佐证。Cunningham 在其《不列颠印度及其统治者》一书内，曾就 1820 年至 1830 年之间印度的对外贸易与同时期的英国对外贸易作一比较，在此时期，英国的对外贸易自 8000 万镑增至 6.5 亿镑，凡八倍余，而在该时期印度对外贸易激增，竟较英国为尤甚。东印度公司虽已成立 200 余年，但在 1813 年以前的贸易，实毫不足道。贸易的激增乃在 1830 年以后，这大可证明印度贸易的障碍，并非印度土人的妒忌，而实为东印度公司的独占，专利权使少数商人成为豪富，而将多数商人拒绝于千里之外，一旦时势改变，这种专利制度自难存在，所以东印度公司的印度贸易专利权于 1813 年宣告取消，其所保留的中国贸易专利权，也于 1833 年完全丧失。

二、从要求进而为抗拒

(一) 印度并非无民族意识

西徠爵士在《英国的膨胀》一书里，说印度只是地理上的一个名词，正如“欧洲”或“非洲”之为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样；在政治意义或其他任何意义上，并无所谓“印度”。因为并没有“印度”，所以在印度也就没有“外国人”，也就没有“外族征服”；印度没有任何民族团结的观念与意义。《英国的膨胀》出版于1883年，西徠爵士所说的是19世纪末叶以前的印度。他的话我们同意一半。在英人统治印度之前，印度原曾受治于外族，屡次外族的统治和政治的不进步，社会的不安定，使久困于贫穷灾祸之中的印人，所关切者不复是统治者来自何方，而为统治者能否给他们秩序与和平。英人赖以征服印人的工具就是印人自己，在英人的统治之下，印人亦殊能俯首贴服，安之而无异动。但吾人若谓在印度一无民族意识，不免失之偏颇。在不列颠印度的征服中，印人的反抗，向未消灭，其中最剧烈的一次就是1857年的一次。英人称这次的变乱为“兵变”（Mutiny）而不称之为革命（Revolution），盖在英人的心目中，这次的变乱仅限于若干地带，而未波及全国，他们亦不承认在这次变乱中有何民族的意识在内。对于外族的反抗，有时由于对外族的仇视，有时由于恐惧自己的灭亡，印人仇视英人和恐惧被英人吞并的情绪，在“兵变”时，确升到了沸点。我们容或不能说抗外就是民族主义的表现，但反抗外族的意绪至少是民族意识的渊源，反抗外族的行动至少是民族

意识里一种最原始的行动。只是 19 世纪中叶以前印人的抗英，散漫而无组织，为私而非为公。他们想逐出他们的外敌而不知如何始得将他们的外敌逐出，他们不知团结内部，盖他们的目的和范围，只限于自己的一个小部落，他们也不知设若他们的外敌一旦被逐后，他们将如何处置他们自己的前途，他们自始至终并无一个一致性或者永久性的目标，他们虽思驱逐英人而终被英人各个击破；此所以西徠说印人并无任何民族观念。

但民族意识究有普遍与不普遍，浓烈与不浓烈的差异，若谓某一个民族毫无民族的自觉，殊难定论。民族意识最先原只发生于少数的有志之士，经他们的鼓吹宣扬，才渐普及大众；民众意识最初只是一脉浮泛冲动的感情，一股笼统含糊的希望，须经不断的挫顿磨炼，不断的研究思考，才能成为强烈坚定的信念，从而转为一种有组织有目的行动。民族意识非自天而降，正如西人所谓 Nationalism is made，须经多年的酝酿冲荡，始克有成。而在向为西徠所称没有任何民族意识的那方土地之上，不仅在他的大著出版两年之后，即产生了一个成为日后民族运动的堡垒的团体，而在 60 年以后的今日，这方土地上所激荡的民族高潮，且成为不列颠的政治家最绞脑汁的一个难题。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对立的，而前者却又为后者所带来。落后的国家虽一时为先进的国家所征服，但他从这个征服国家所吸收到的文化和科学，终将使他复发生一种颠覆外族的统治而恢复自己的独立的企图。现在无人能否认印度的民族主义是英国统治印度的产儿。英国的统治印度使印度第一次共同效忠于一个君主，虽然这一个君主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而生活在距他们遥远遥远的土地之上。英国的统治印度使印人渐渐认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英语在印度的采用也使印人于他们无数不同的语言中产生一种比较有统一性的新语言，此新语言虽属外族所有，但殊有助于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的了解。在英人统治下的印度教育，至 19 世纪未有相当的发展，1896—1897 年，印度的各级公立，私立或教会学校，已在 15.2 万校以上，学生约为 435.6 万左右，其中高等教育及中等教育两级，学校约在 5400 所以上，学生约在 55.4 万左右。维多利亚在《告印度王侯庶民书》中声言的印度人民不论其种族宗教如何，俱有受官被雇之权，只要他们有适当的教育才能与人格足以执行他

们所担任的任务，大足鼓励一般青年之留学欧土。留学与旅行西方，自然俱有助于新观念之产生，益以达贺胥以来交通政策之推行，无论铁路，公路，运河，电报电话等，都有可观的扩张，这种交通网的设置，固足便利英人对印的控制及贸易上的经营，但亦大有助于印人的文化及智识的传播。所以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思潮，不仅越过高山大海而吹到印度，种种为印人前所未闻的理论，且能经过学校及交通的网络而广播至大城市以外的角落。印人之受治于英人，已不止一个世纪，与英国统治所俱来的一种西洋文化，使印人终于看到了印度以外的更大的世界。在上世纪末新世纪初的10年间，在非亚两洲有两件大事，殊足使印人发生深刻的刺戟。1894年意大利在非洲阿多瓦(Adowa)被阿比西尼亚大败，使印人开始一种信念，即物质上的优越势力，并不为他们平时所想象的那样可靠，而刚毅的民族意志，在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中，仍为可贵的因素。10年后日俄之战的第一等历史意义，即日本的胜利，使久被欧人侵略欺侮的亚洲人，开始明白白人之统治世界，只是历史及科学的事实，而并非一种天命。后一事之激动印人，自较前一事尤甚。

印度民族运动的中心团体是国民大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简称I.N.C.)。这个反抗英人统治的团体，最初却为英人所创建。英人休谟(A.O.Hume)在印服官30年，他既身历1857年之变，遥想将来，他觉得印人终有一天会起而颠覆英人的统治。休谟相信优越的西方文明及英国政制，所以移殖于印度，这种文明与政制的移殖，且于印人英人双方皆有裨益。印度的民族运动既终不可免，统治者自应求所以缓和之道，他认为最理想的办法，莫若运用政党政治的方式，使民隐得以申达，仇英的情绪亦因有所宣泄而得以消灭。他的意见曾得到当时印督杜弗林(Dufferin)的赞同，后者希望由此能产生一个效忠国事的在野党。他们的希望原极自然，因为英国传统的政治，就是一党在朝一党在野，国会里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王陛下的反对党”(His Majesty's Opposition)这个英王陛下的反对党，是英国的“政治的游戏”里的一个必要分子，正如没有两个球队成不了一场足球比赛一样。所以这一个英国式的在野党的组织，其目的乃在减少印人仇英的情绪，使之转而效忠英国，巩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他们希望这个在野党在印度政治的游戏里所表现者，其精神与操守，一如英国国会里的反对党在英国政治的游

戏里所表现者一样。但我们若从今日看来，休谟固不免沉溺于理想，而杜弗林要亦缺少应有的经验：伦敦国会里的反对党所以成为“英王陛下的反对党”，因为它有一天也会变成“英王陛下的执政党”，而殖民地的政治终究是一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政治。在19世纪后期，议员民选的思潮，在印度已传播甚广。印度一些自由思想分子早就要求立法机关的职权的扩大，当他们有了国民大会这样一个组织，其将利用这个组织为印度说话，乃势所必然。但就国民大会初期的历史看来，他们的活动大体上亦殊能与创建人的原意相去无几。国民大会成立（1885）后最初的20余年，印人要求的重心，大率为印度政府里印人的发言权力。1905年年底国民大会的主要要求，还是在总督和各省省长以下的行政会议增加印人的位置。但此非谓印人对于立法部分并无要求。印度的立法制度曾于1861年及1892年两次改革。后一次的改革使中央立法机关里“非官吏议员”的议席增加，省立法机关的若干议员可由地方法团如各市区、各大学及各商会推荐任命，立法机关的职权稍见扩大，行政事务立法机关虽尚无表决之权，但至少讨论之权。只是职权虽稍见扩大而终不失为仅是一种咨询机关的性质，对于崇拜代议政治的印度自由思想分子，自难使其满意。19世纪后期为狄克尔、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及西徠等鼓吹的前进的帝国思想，使英国对印度的压迫，无论在道德方面或政治经济方面，至新世纪之初，均已达到了最高点。在此种情形下的印人，不仅先后深受波尔人在波尔之战（Boer War, 1899—1902）中所表现的坚毅的民族情绪及宗教感情之感动，及日俄战争的结果的鼓励，自由党在英国的执政，也使印人燃烧起希望的火焰。民族主义这时在亚洲已放出可怕的光辉，中国、波斯和土耳其都在努力与欧洲的势力相斗争，在大潮流的激荡中，印度的民族精神自然亦随之大为提高。国民大会里除了原有的温和分子外，急进派的势力此时渐复抬头，1907年国民大会的决议案，乃进一步要求享受自治领的地位，一如加拿大在不列颠帝国内所享受者一样。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中，由于各种国际的及国内的急剧的变动，使印度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情绪。1905年印度北部曾发生了一次猛烈的地震，加以1897年及1900年两次波及一亿左右人口的大饥俄，使社会的安定大受影响。同时印督寇仁因为民族运动的中坚人物大都是孟加拉人，企图将孟加拉分裂为两省，以杀印度民族运动之势，而受到

孟加拉人殊死的反对，于是群众到处集会，反抗英人，抵制英货，暴动与政治的暗杀，亦极流行，1908年后发生印度民族运动历史里的第一次政治罢工。这种混乱的局面和可怕的气氛，使英人于用武力严厉压制之余，不得不思有所改善。盖弥漫于19世纪末叶的狂妄的帝国主义，在波尔之战中大受挫折后，似有稍加收敛的必要。当时的印度事务大臣是摩莱（John Morley）。摩莱的一生均为进步思想奋斗努力，所以他决定对印度当前的制度加以改革，承认印度自由思想家主张印人须参加印度政府的要求。1909年国会乃通过了一个摩莱和印督明陀联名的改革法案（Morley-Minto Reform Act），又称印度参事会法案（Indian Council Act, 1909）。

这一个法案的要点是：

（一）印度事务部里的印度参事会，增设印人参事两席，一席给信印度教的印度人，一席给信回教的印度人；

（二）印度总督下面的行政会议，增设印人政务员一名；

（三）将印度总督下面的立法议会，议员名额增至96人。其中60余名为官吏议员，30余名为非官吏议员，非官吏议员中之20余名，应由民选。

（四）省立法议会，（当时的不列颠印度，分为九省，其中六省有立法议会）过半数以上之议员，须为非官吏议员，或由民选或由省长派任。

这一个法案是自国民大会成立以来，或者说自印人要求参加印度政府以来，伦敦政府第一次所给予印人的答复。伦敦的印度参事会之有印人，以此为始；印督下面的行政会议之有印人，以此为始；中央立法机关的职权，略有扩充，而民选议员的风气，亦自此开始。但这一个法案并未满足印人的要求，反对的声音到处可以听见。因为行政会议虽开始有印人而为数实在太少，立法议会的议员，大部分亦仍为总督所任命的官吏或为总督所指派的议员；立法议员并非悉数由于民选，同时，立法议会并无真正立法的权力，其在实质上仍处于一种被咨询的地位，立法议会所通过之案件，如不得总督之批准，仍不得成为法律，立法议会所讨论者，殆都为总督交议之案件，而终其极立法议会对于总督，毫无控制之权力。所以在印人看来，立法议会只是一个辩论俱乐部（Debating-club），与真正代议制度之下的议会，相距甚远。但印人的不满和摩莱的

建议，其间并无矛盾，因为后者原就无意将代议制度推行于印度。摩莱虽是一个良好的急进者，他却拒绝接受印人关于在印建立代议制度的观点。他认为英国的议会制度不能在印度芽长，因为民主政治就是多数政治，而要少数服从多数，必须“少数”与“多数”在基本的信仰上能有共同的基础，所以民主政治必须在一个协调的社会中间才能发生作用。而印度的社会即缺少这种协调。在此种情形下，若欲实行议会制度，则其结果将不是民主政治，而且是与农村大众脱节了的少数职业阶级统治的寡头政治。所以他仅能介绍者，即为将选举的原则应用于立法部分，至于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前者只能影响后者而不能控制后者。

(二) 初期印度民族运动

初期印度民族运动的主要要求可说是一个如像英国所有的那种代议制的立法议会，这一个希望在 1909 年的改革案里，未能得到满足，因之 1910 年后的印度继续困处于骚动的空气之下，反英的集会仍极盛行，反英的文字也充斥于报章杂志。印度的报纸自 1888 年印督力朋 (Lord Ripon) 撤销禁例以来，即享受着如像英国报纸所享受着的自由。1910 年印度政府下令限制报纸自由，实行检查新闻，并取缔骚动的集会。当在印度的大地上继续有印英的斗争时，大不列颠帝国的其他地带，复发生了刺激印人感情的事件：1913 年南非联邦禁止印人在该邦经商、务农和置地，加拿大也拒绝印人的入境；这些使印人觉得在不列颠帝国内，无处不压迫印人，侮辱印人，而伦敦的帝国政府既未能予印人以任何援助与保护，亦未能给予印人一种地位，使他们自己可以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印人对英政府更觉不满，对于自治领的地位，要求益烈，但这些愤怒的情绪，当欧洲的炮声一起，亦即立刻消除。初期印度民族运动究不失为一种忠君的民族运动，他们虽希冀自治而仍愿戴英王为皇，所以 1914 年 9 月 8 日乔治五世的诏书，竟能使印度出兵 130 余万，负担战费 1.46 亿镑，人民及藩邦王公亦纷纷捐献巨款及购买公债，而其价值尤无可衡量者，印人的矢忠，使英政府得将其驻在印度的 5 万正规军，调赴他处作战。

乔治五世的诏书虽要求印人矢忠帝国，参加战争，但也给印人带来了新的生命，因为诏书宣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由与文明。在这种新的希望下，印度一面努力参战，一面加紧自治运动。1915年国民大会开会时，主席辛哈爵士（Sir P. Sinha）宣称，印度之自治不仅为英国之义务，抑亦于英国为有利。1916年国民大会和回教同盟（The Moslem League）携手合作。回教同盟于1906年，与国民大会常立于相反的立场，国民大会成立之初，原公开于各党各派，所以1890年开会时，702个代表中，回教徒占156人。但当国民大会里的大部分人主张对于英国的统治有所要求时，回教首领力主信任英国之统治，所以在阿勃梅德爵士（Sir Saiyid Abmed）领导下的一派回教徒，终于脱离国民大会而去，而1906年的回教同盟，实际上乃在英人的鼓励下组织成立，用以对抗国民大会。但自土耳其受德人之煽动，倡大回教主义以后，印度的回教徒看到英国的攻击土耳其，乃在宗教的热情下，转与国民大会并肩要求印度的自治。1916年10月，立法议会里的19个民选印度议员，联名上书英政府，要求战后对于印度的情形，有所改革。12月，国民大会和回教同盟组织了一个“自治同盟会”，发表宣言，向英提出了一个联合的改革计划（The Congress-League Scheme），其主张要点，约如下述：

- 一、印度为一自治国家，其立法、行政及财政上均完全独立；
- 二、印度在不列颠帝国内之地位，与其他自治殖民地同；
- 三、印度之统治权应自伦敦移至印度本国，另由印度派遣代表，驻扎母国；
- 四、印度事务大臣之俸给应由英国负担，印度事务大臣之于印度与殖民地大臣之于殖民地同；
- 五、预算须经立法会议决；
- 六、印度成立国民军，印人可任军队中之高级军官；
- 七、中央及地方行政长官，半数以上应由印人担任，并由各该立法机关中之印度议员选举之；
- 八、印度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只能处于襄助之地位。

英国的政治是最富弹性的，英国的政治家是最能应付现实的；欧战既酣，对于印人既有所要求，伦敦方面自不得不有若干足以满足印人的表示。1917年劳合乔治提议组织的帝国战时内阁（Imperial, war cabi-

net), 除各自治领的首相出席外, 允许印度亦得派一代表参加。同年在殖民地事务大臣主持的帝国会议 (Imperial Conference) 中明白宣言“印度为不列颠帝国中一个重要部分”。帝国会议承认自治领为不列颠帝国内的自治国家, 他们 (自治领) 和印度在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上, 都享有相当的发言权力。

“印度为帝国中一个重要部分”的“重要部分”四个字, 究竟是指什么, 始终没有见到任何具体的解释, 但印度在不列颠帝国的地位, 似已超出于一般殖民地之上, 且由于印度代表之参加帝国会议及帝国战时内阁, 她几乎在事实上已享有自治领的地位。同年 8 月 20 日, 印度事务大臣蒙太鸠 (Montagu) 在下院发表了著名的“不列颠治印根本政策”四点:

一、在每一行政部门中, 增加印人的合作;

二、逐渐发展自治制度, 以便来日进一步在印度实现责任政府, 而成为不列颠帝国内之一完整部分;

三、上述这种改进, 必须采渐进方式;

四、决定上述这种改进的步骤及时间者, 必须为印度政府而非为印度人民。

这一年冬天, 蒙太鸠且亲自赴印, 会同印督齐姆斯福德 (Chemsford) 考察印度的情形, 以便提出改革的方案。蒙太鸠的治印政策四点在下院发表后, 在印度曾引起很大的反感, 因为他的演说既承认应以自治领的地位俾予印度而又承认目前尚非其时。但印人对于他们所怀抱的希望仍极热烈浓厚, 盖那时在佛兰斯德、美速不达米亚、以及东非等地的战场上, 效忠于英王的印人, 数达百万。他们无不自视为不列颠帝国的一个公民, 一如加拿大人所自视者一样。益以威尔逊总统在 1918 年 1 月 8 日发表了历史上的 14 点, 主张“以自由、坦白、及绝对公正之态度、处理殖民地之争执”, 适当顾及“殖民地人民之利益”, 并希望“根据特殊公约组织国际联盟, 其宗旨在国际间互相担保大小国家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威尔逊总统这种崇高的言辞殊足鼓励久困于凌辱生活之中的生灵。但希望在未实现时, 并无实际的价值。蒙太鸠与齐姆斯福德在 1918 年 4 月联名发表了一个“蒙太鸠齐姆斯福德报告书”, 又名“印度宪政改革报告书” (Report o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al Reform)。报告书的精神和八个月以前蒙太鸠在下院所宣言者相同, 他认为可以在印度树立

西方所认识的议会政制，只是他认为当时的印度尚未至立刻可以实行责任政府的时期，因为选民团体尚待创造，而其代表显示尚未获得充分之政治的及立法的经验，所以其结论虽以建立责任政府为最终目标，而此种责任政府之建立，尚须一步一步求其实现。

1919年英政府以蒙太鸠、齐姆斯福德的“印度宪政改革报告书”为根据，在国会里提出一个“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这个提案经二读通过后，由上下两院组织联合委员会在赛尔朋贵族（Lord Selborne）主持之下，从事严密的讨论，他们决定接受“印度宪政报告书”内所标示的原则，并检讨此提案所涉及的各种政治的及行政的问题。国会最后即照这个联合委员会所修正者通过。

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先将印度中央政府（通常称为印度政府，有时又称为印度帝国政府）和省政府的职责划分清楚，中央政府的职务和省政府的职务，都特别规定，大概与印度全部有关的事项，如外交、国防、关税、邮电等，均属中央政府，同时凡未经明白列入省政府职权以内的事务，亦皆归中央政府处理。中央政府对于省政府保持若干控制及指导的权力。至于财政来源，中央与省亦各分开，省政府之财政来源有土地税、国产税、森林税等，这些税收都由省政府所属各部征收，中央政府之财政来源则如铁路、邮电、关税、所得税、盐税及鸦片税等，由中央政府各部门征收。中央及省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组织，约如下述：

（一）中央政府的行政机关，仍如旧制，即在印督之下，设一行政会议，行政会议里有政务员八人，分掌财政、内政、教育、商业、土地、交通、法制及卫生等职，外交由总督自理，军队由印度军总司令（英籍）兼任，印度军总司令是行政会议里的一个非常议员。这个行政会议是不列颠印度政府里的最高行政机关，而除此行政会议之外，其总督之下还设有一个政治部，是处理一切在英人保护下的印度藩邦的事务的。行政会议里的印度政务员原为一名，新法则增为三名。

（二）中央政府的立法机关，改为两院制，一称参议院，即上院（Council of State），一称立法院，即下院（Legislative Assembly）。上院议员的名额是60名，其中33人须由民选，由总督指派的官吏议员，不得超过27人。选民的限制，如财产的限制等很严。下院议员的名额是144

名，其中 103 人须由民选，故下院议员民选的比率，较之上院略大。选民的限制，较省立法机关选民的限制稍严，较上院议员选民的限制稍宽。当时上院议员的选民只有 1.7 万余人，下院议员的选民约在 90 万左右。选举并未采用纯粹的地域代表制，大学、商会以及具有特殊利益的阶级俱有选举权，此于宗教上的所谓少数民族为尤甚。当选举的原则在 1909 年确定时，回教徒即要求分别举行团体选举，易言之，立法机关中的一部分议席、应由回教所选出之回教徒代表占有之，那时回教同盟与国民大会的携手，对于此点曾有过协定，所以在 1919 年的新制内，选举仍采用团体选举制，并将议席比例地分配于各党派，譬如上院的 33 名民选议员中，即规定印度教徒占 16 名，回教徒占 11 名，基督教徒三名，西克教徒三名。上院的议长由总督简任，下院的议长则由下院推举，但须得到总督的批准。

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其主要的一点，即总督及行政会议里的政务员，均由英王任命而有一定的任期，他们对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负责，并不对立法机关负责。总督可以停止或否决两院中任何一院的决议案，只要他认为他的这种措置与不列颠帝国的安全有关，同时总督所提的案件，假如两院中有任何一院通过，他即可认为他的所提的案件业已成为法案，假如总督所提的案件，两院均不通过，则总督也可由他自己负责，径以命令颁布之，与经过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案，具有同样法律效力。财政提案虽须经过下院通过，设若为下院所拒绝或删削，而总督认该项费用与其行政为必要者，也可以自己的名义支用之。

(三) 省的行政机关，在省长之下，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保留部分 (Reserved department)，一为转让部分 (Transferred department)。保留部分的事务，为保安、司法、劳工、财政、土地、水利、移民等。所谓“保留”者，意谓上列事务，其管理权仍由英方保留，而上列事务以外之若干事务，可以转让与印人，由印人自己管理，故一部称为“转让”部分。保留部分所列各项事务，即归省长及省长之下的行政会议处理。省长以下的行政组织，各省不一，省长亦由英王任命，受德里的总督的监督而对伦敦印度事务大臣负责。所以保留事项都由省长办理而并不对省的立法议会负责。

转让部分的事务为地方教育、路政、农业、工商、卫生、及地方自

治等。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原是在印人要求自治的空气下产生的，所以法案内仍规定将若干事务，让交印人管理。同时在这转让部分方面，相当的实行了英国内阁制的精神，即由省长任命省立法议会里的多数党领袖来主持转让的事务。这些由省立法议会所竞争出来的政党领袖，他们的执政久暂，是以能否得到省议会的支持为断。在通常情形下，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或施政的成绩不为省立法议会所信任时，他们即须辞职，有时亦由省长予以免职，俾使能得省议会支持的人物上台。

(四)省立法议会的议员，1919年法案规定百分之七十须由民选，百分之二十为省长所指派的官吏议员，其余百分之十则由不易推选代表的阶级或各种社团中指派。选民仍有相当的财产上的限制，惟限制的程度则各省不一，有些省份，如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联合省、判查布等，一部分女子也获得了选举权。所以按照1919年的法案，省立法议员的选民，自3.3万增至600余万。

至于省一级的行政与立法的关系，省长之于省议会，其地位相当于总督之于中央立法机关。省政府里的转让部分，当然是完全对省议会负责而依赖其信任，其保留部分，省长及其行政会议，亦愿和省议会取得接近，但接近的目的乃是要使省议会能同意他们的政策，而非使他们自己去迎合议会。反之，省长的政策如不能获得议会的同意，他仍可独行其是，而不须任何顾忌。他仍可用自己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对于议会通过的法案，他如认为有危险性的话，可以拒绝同意，或请求再议，或转呈总督核办，如他所提的财政法案，议会不通过，他可径以省长的名义恢复之，又如遇非常事故，而他认为与该省的治安安全有关者，他有权措筹任何的费用。

1919年的法案规定关于印度政府之任何改革，至少须于10年以后方得考虑。10年以后，英政府应派一个国会调查团，(Parliamentary Commission)赴印，调查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实施后的情形，缮制报告，以定究竟印度是否可建立自治政府，或就已存在之政制加以改革，扩大或限制。所以要由英政府派员调查，因在该法案内，明文规定，关于印度政府改革之时间及式样，只有国会可以决定。

(三) 印度政府法

这一个“印度政府法”是在1917年下半年通过的，而在这个法案通过以前，印度的骚动，已很严重。蒙太鸠和齐姆斯福德联名的“印度宪政改革报告书”发表后，国民大会即表示反对，并提出印度议会为印度的最高主权机关，财政自由，地方自治，以及废止欧人的选举特权，新闻纸法，革命运动镇压法等的要求。这个要求提出不久，大战即告结束，英国对印度的态度，遂一反前时而转趋强硬。在此种情形下，印度的骚动自然更加剧烈，群众示威和罢工事件到处都有，1919年1月仅孟买的纺织工人参加罢工者，即达12.5万人。印度政府在伦敦政府的支持之下，对于当前骚动的局面，决采用严厉压制的手段，乃有因劳拉脱法官（Justice Rowlatt）的建议而制定的“劳拉脱法令”（Rowlatt Act）或称“叛乱法”（Sedition Act）之颁布。这法令授权政府停止陪审制度，剥夺上诉权，和施行各种严刑，以抑制革命及秘密团体的活动，后来连一切公共集会也都在禁止之列。但印人在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指导之下，并不理会劳拉脱法令，劳拉脱法令或较劳拉脱法令更为严峻的任何法令，并不足以消灭当时印人的反英情绪。以致印人和印度政府的冲突，日趋尖锐，而终有1919年4月判查布省阿木里沙地方（Amritsar）的屠杀案。阿木里沙地方的银行及若干建筑，被印人捣毁，有几个英人被印人所杀，印政府乃派旅长戴危（Dyer）前往镇压。4月13日印人在广场集会，集会在当时既为法律所禁，戴危乃下令实弹扫射，死者400余人，伤者1500余人，而射击的停止，仅仅是因为所带的枪弹已经用完，这个大屠杀案不仅震动全印，即英国国内也有谴责之声，国会乃派亨透调查团（Hunter Commission）驰印调查。这个大屠杀案完全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一种适意的游戏，因为后者的生命在前者看来，永远在前者掌握之中而可以一任其喜怒来驱使，戴危不仅在射击以前未下警告，不仅在已能控制当时的会场而犹继续射击，并且戴危在被审问中，根本承认在当时可以不发一弹而制定扰乱。调查团的报告，虽对戴危谴责而并未能揭发全部事实的真相，戴危虽被召回国，而在印度及在英国的英人

竟纷纷募集捐款并赠以宝刀，以慰劳他“勋绩”，印度政府也送了他一笔巨大的养老金，上院对于他则备致褒颂。当时印人对此所掀起的激怒，我们自无须再加以一字之形容。虽然戴危后来仍“受到印度政府，印度军总司令，英国陆军会议，英国政府以及下院的严厉惩戒”，但正如康脑脱公爵（Duke of Connaught）于开始实施新宪法时所说的“阿木里沙的暗影已拖长在全印度之上”。

在这种局面下，“印度政府法”之难于受到欢迎，势所必然；何况这个法案的精神和内容，和印人所要求所希望者不相符合！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仅仅改善两点：

（一）自治的范围稍为扩大，省一级的若干事务移归印人自理，总督的行政会议里的印人，亦由一名增至三名；

（二）各级立法机关里的民选议员，比率增加，选民的数目亦大有扩充。

除一小部分的温和派赞同这个新法案，庶得循次渐进以求责任政府之实现外，比较急进的人物，对于新法案均不能感觉满足，因为他们所希望者，是一个自治领的地位，1919年印度政府法所规定的印度政府自然不是一个自治政府，总督只对伦敦负责而并不对印人负责。行政会议既隶属于总督，所以行政方面自以总督之意见为最后之意见。总督又得否决立法机关之议决案。立法案原须得到两院之通过，始得成立，两院不同意时则由两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之，独总督之提案，两院之任何一院通过后即生效力，如均不通过，总督亦得径以命令方式行之，如在非常时期，他且可于不待伦敦的批准而执行若干权力。在预算方面总督有支配之权。总督既不对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亦无权力以控制这一个“印度的无冠的皇帝”，所以无论从行政与立法任何一方面观察，总督之权仍为至高无上。总督是英帝国在印度的权力的象征，他的至高无上，就表示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之仍为至高无上。同时在省一级保留部分和转让部分所划分的事项，英帝国之不愿放弃它在印度的控制，亦极为明显。

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以“两头政体”（Dyarchy）见称于世，实则所谓“两头”者，亦仅指省一级而言。这样的制度并非举世所无而实其来有自，且当我们披读英国的殖民史时，即知20世纪的几次印度政府法

案，无一非英国处理殖民地所用的老办法。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与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对加拿大的统治，殊不乏相似之处；1909年及1919年的两次印度政府法颇似1791年之加拿大政府法，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里的“两头政体”，其精神亦渊源于1839年的达刺谟（Lord Durham）报告书。1791年的加拿大政府法规定立法机关分上下两院，上院议员由英王任命，下院议员则由大地主及有资产者选出，政府的首长是英王任命的总督，总督再在议会中选任若干人为政务员，组织行政会议，以为总督之辅佐。政务员对总督负责，而总督则向英王负责，所以行政并不对立法负责。1909年及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与此相似，两者的立法机关都有一部分民选的议员，而两者的立法部分都无法控制行政部分。这种政制实是介乎绝对专制与议会政治之间的一种杂凑的制度，所以印人说英国简直在拿四不像的议会制度和印人取笑。这种制度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就是立法与行政常处于冲突敌对的地位，立法既不能控制行政，立法便常会故意与行政为难，行政既不对立法负责，所以行政也即无须顾忌立法或牵就立法，这是一个有火而无烟囱的办法，1791年的加拿大政府法曾为加拿大多年不安的一个源泉，这种不满的情绪于1837年至1838年之间终见之于行动。1837年下加拿大所发生的叛变，是立法与行政长期冲突的一个结果。1837年的叛变使英政府感到加拿大之改善已刻不容缓，因此乃有1839年加拿大总督达刺谟对于改革殖民地政制的报告书的发表。

达刺谟报告书的主要特色，就是主张将殖民地事务分为两类，一类为帝国事务，一类为地方事务，前者由英政府处理，后者则由殖民地自行处理，达刺谟报告书中所谓帝国事务，为下列的五项：

- 一、关于殖民地的宪法及其政府之组织；
- 二、关于殖民地的外交；
- 三、关于殖民地的商务；
 1. 殖民地与英国本国的商务；
 2. 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之间的商务；
 3. 殖民地与外国的商务；
- 四、关于殖民地公地的变卖；
- 五、关于殖民地海陆军的指挥权及驻军权。

上述五项事务，达刺谟主张由帝国保持，绝不放弃，但与帝国并无

关系的内政，则听由殖民地自行处理而不加干涉。达刺谟报告书之价值，乃在替英政府定下了一个处理殖民地事务最巧妙而又最现实的办法，它一方面使殖民地获得相当的自治权力，一方面又能保持英帝国实际上所享受的利益与在根本上控制殖民地的权力。易言之，这个报告书完成了一种使命，即使殖民地的自治与帝国的统一获得了一种和谐。达刺谟报告书成为了日后不列颠帝国中若干殖民地政府组织的一个蓝本，1852年南威尔士（South Wales）起草宪法委员会所草的南威尔士宪法草案以及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无一不是达刺谟报告书的翻版，只是1839年达刺谟报告书里的“两头政体”，在1919年印度政府法里，仅行之于省政府一级，而未行之于中央政府。达刺谟当初将殖民地的事务分为帝国事务及地方事务（即在1919年印度政府法中所谓的保留事项及转让事项），以为前者将永远操于帝国政府的掌握之中。不料时势的推移，达刺谟报告书中所谓的帝国事务，现在已大都消失；1865年伦敦国会通过的殖民地法律时效法案（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使殖民地获得自行修改其宪法的权力，1862年由于A.Mills的提议，国会议决，享受自治的殖民地，应负其本身的防御之责，盖在广大的殖民地上驻扎军队，对于英政府实是一重艰巨的负担，所以在1860年至1867年之间，英国先后将在澳洲、加拿大、纽西兰等地的驻军撤退；殖民地商务的控制权，自1859年以后，英国也逐渐丧失；至于公地之变卖，殖民地认为这完全是内政问题，非英政府所应干涉，英政府对此也终于让步；殖民地的外交权，于殖民地屡次争取之后，1912年伦敦国会乃通过，关于不列颠帝国的外交，以后应予自治殖民地以参考的机会，1917年的帝国会议，承认自治殖民地在帝国外交事务方面有相当发言的权力，1921年的帝国会议承认与全帝国有关的外交政策，仍由英政府负责，但自治殖民地应为决定帝国外交政策之一分子，易言之，英国外交大臣在决定每一帝国外交问题时，应先向自治殖民地征求意见，而在1926年的帝国会议中，根据贝尔福（Balfour）报告书所订的原则，自治领政府与英政府在不列颠帝国内处于平等地位，彼此的内政外交各不相属，至此自治殖民地的外交权亦归自治殖民地所有。这种因时势推移而起的变化，实非达刺谟所逆料。盖殖民地的内政既由殖民地自行处理，则殖民地当然要树立一个管理达刺谟报告书中所称的“地方事务”的自治政府，这种负责处理“地方事

务”的自治政府，其职权终将渐渐侵入“帝国事务”的范围。在英人的眼中，印度的情形与加拿大等自治殖民地的情形完全不同，英人也不欲使对印度的统治与对其他自治殖民地的统治走同样的轨道，所以达刺谟报告书中所创议的“两头政体”，在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中，只施行于地方政府，而不及于中央政府。

北美13州的臣民在七年之战中，曾为母国尽力不少，战争的结果，英国胜利，但胜利的英国，在财政上非常困难，1765年首相格棱维尔(G.Grenvile)乃不顾殖民地人民的反对，颁布了印花税法(The Stamp Act)，规定殖民地所有一切正式文件，或契约，均须黏贴印花，借此以裕国库。北美殖民地人民对此作殊死的抗议，他们尤伤心于殖民臣民效忠母国的酬劳竟是无情而又无理的压迫与榨取。没有一个历史家能否认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以及后此为英政府所坚持，英国国会可向殖民地自由征税的原则是后来美国独立革命的一个原因。而在150年后，世人又有一次机会看到历史的重复。在上次大战中，印度有一百二三十万人在欧洲、近东及非洲的战场上供英人驱使，而于英国胜利之后，印人所得到的乃是劳拉脱法令，阿木里沙屠杀，以及一个没有自治权的宪法。历史的学生可以看出，假如像1791年的那种加拿大政府法，能早三十年施行于北美，则1776年的美国独立是否发生，无人能武断。假如印度于为争取文明与自由而牺牲了10万生命之后，所得者不是如前面所提及的那些东西，或者在凡尔赛和约至慕尼黑协定之间，英国的保守党内阁对印度所持的态度不是那样顽固，则当1939年9月11日乔治六世号召印人为“人类将来之一重要原则”作战时，所得的反应也许不是“袖手旁观”。吾人尚能忆及，当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公布后，英国的保守党曾以此对自由党大施抨击，他们认为英国所退让的太多，软弱的让步是一种重大的过失，他们讥笑这次的印度政府法是“人道家的幻想”，“一个种族自有一个种族的需要，像印度这样的种族，竟想将英国的议会制度移殖过去，不啻发狂”。英国的政治家原是最能接受历史的教训的，也许时间隔得太久了，一个世纪以前在北美及加拿大所发生的事件，已逸出于事忙责重的英国政治家们的记忆，但是康脑脱公爵的言语在一短时期内尚不致消失其价值，因为我们今日仍看到“阿木里沙的暗影”拖长在印度大陆之上。

(四) 失望所生之反动

意料之外的失望所生的反动，亦属空前，1920年以后的印度民族运动，乃如草原上的野火，竟不易遏止，而圣雄甘地的名字亦自此插入历史的版面。甘地原是不列颠帝国的一个忠实臣民，他在南非洲时曾一再协助不列颠帝国而获得许多勋章，大战中印人对英人的矢忠效力，他亦殊有功。他曾亲自在法国驾驶救护车，一如他在波尔战争中所为者一样。当1918年春协约国形势危急时，他曾鼓吹印度应作最大的努力以协助争取战争的胜利。甘地本人正如印度的许多温和分子一样，相信英国对于忠心耿耿的印度必有所厚酬，但劳拉脱法令和阿木里沙的惨案，使他觉得过去“袒护多行不义之政府”，实属一错再错。甘地曾在南非因维护印人的利益而有组织消极抵抗运动的经验，他决以同样的精神来领导印度的自治运动，他的政策通常被称为“非暴力的不合作”，当国民大会于1920年的特别大会上通过了甘地的政策并拥护甘地为领袖后，甘地乃成为了那时印度民族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不仅国民大会接受甘地的领导，就是回教同盟也因协约国在色佛尔(Sevres)会议上对土耳其态度的恶劣，归附到了“非暴力的不合作”旗帜之下。新兴的印度工业家，也赞助甘地领导的自治运动。印度在大战中，许多工业受了战争的鼓舞，大为蓬勃。印度的企业既日见发达，他们自希望获得自治领的地位，俾可享受到保护他们自己的工业的自由。共产党在俄国执政后，企图进而策动全世界的革命。列宁最初计划由波兰以出德国，使中欧全部赤化，当此着失败以后，乃改思由阿富汗人印度，以策动亚洲之革命。列宁相信在东方各国中，以印度的革命最易成功，因为印度是亚洲除日本以外的第一个工业国家，工人约在850万左右。所以那时无论实业家或农工阶级，都参加反英的民族运动。而当东非洲不列颠的肯尼亚殖民地(Kenya Colony)限制印人居留区域的消息传至印度时，遂更有助于甘地的伟大的事业。

甘地所主张的不合作，是一种全面的印英不合作：印度政府的各部门，印人均不参加，不做印度政府的公务员和警察，拒绝总督的召见，

不自动谒见总督，不出席一切官方的招待或宴会，不受印度政府或英人的雇用，无论其为工友，伏役或奴仆，不遣送子女入印度政府所办的学校，另由印人自己创设学校以继续印人子弟的教育，印度律师不出席英国的法庭，印人也不在英人的法庭进行诉讼，印人自己另成立仲裁机关以解决民间的纠纷，不存款于英人所设的银行，已存者提取其存款，不纳租税，不购英货，拒绝参加选举，拒绝收受英国政府所颁给的勋章；不合作运动笼罩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方面。甘地所主张的非暴力，则须不怀恨，不复仇，不咒骂，不攻击，不侮辱对方，须自动受逮捕，须援助被越轨的印人殴打英国的官吏，那时接受甘地的领导参加不合作运动者，数达千余万。他们纷纷将子女从公立学校领回，将讼状自英国法庭撤回，抵制英货，拒绝纳税，辞去官职，退还封爵和勋章，当时放弃官职爵位者，可 2.5 万余人，而为甘地的特别鼓吹自己纺织，服用土布的结果，使英国纺织品的输入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五，兰开夏 (Lancashire) 的资本家因此亦大起恐慌。同时甘地的“非暴力”，完全是东方式的宗教的诰诫，而远出于西洋人理解的能力之外。甘地要他们的信徒虽被打成肉酱亦不回手，自己触犯了法令须自动去要求被捕，被越轨的印人殴打的英国官吏，他们必须去加以保护，因此当成千的印人围着监狱要求被捕时，印度政府之手足无措，不难想象。而被殴打的英国官吏受到无数的印人的慰问援助时，其所作感想亦使人难于猜测。只是“不合作”易，而“非暴力”难，感情激荡之后而欲自我收敛，殊不可能，同时不合作运动很自然的带来了工人的罢工和农民的抗租抗税，盖自 1919 年以来，印度的农业，每年均告歉收，农人工人同样陷入于困窘不安的局面，暴动和罢工之事，因而不断发生，单 1921 年一年，印度所发生的大小罢工事件，达 400 余次。是年 11 月，英皇太子游印，印人亦出以“不合作”的态度，甘地且追尾太子的游迹，随处发表反英的演说，使皇太子的游历成为一个最不愉快的游历，而印度政府，不仅未如甘地所希望的“痛改前非”，且以武力从事，大捕印人，1922 年 3 月，甘地也以鼓动民众暴动论罪，被判监禁六年。

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第一次是失败了。1921 年 12 月国民大会曾议决“大会坚决以更生动的力量，继续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直到完全解放，印人掌握政权时为止”。1922 年 12 月的国民大会却决定停止这

个不合作运动，这是甘地，国民大会中的其他领导人，以及大批不合作运动的热心信徒被捕的自然结果。但以不合作运动为纲领的民族运动虽然消失了，而民族运动的本身则并未停止。那时回教同盟又与国民大会分裂而回复到对立的地位，同时国民大会若干领袖如达斯（C.R.Das）和老尼赫鲁（M.Nehru）等另组织了一个自治党（Swaraj Party），不过他们虽另组自治党而并未脱离国民大会，他们仍留在国民大会里从事立法议员竞选的活动。他们主张建立自治政府，而从参加议会入手，希望在立法机关内尽力与印度政府为难，阻碍 1919 年法案的实施，从而促进印度宪法之提早修改及自治政府之早日实现。自治党至 1925 年，即在国民大会里得到多数而取得领导地位，是年 9 月该党在下院提出一案，主张：

- （一）印度总督应对议会负责；
- （二）无论中央地方，议员均应全部民选；
- （三）财政由议会监督；
- （四）议会有修改印度宪法之权；
- （五）扩大地方自治之范围。

1919 年的“印度政府法”，曾规定以 10 年为期，10 年以后再由国会派员至印调查，以决定 1919 年的“印度政府法”是否须加以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印人在当时即认为 10 年之期，为时太久。1924 年 12 月，议会里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议决这个“两头政体”的试验，是一种失败；对于这一点，英籍议员也具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要求缩短 10 年之期而提前成立自治政府。1925 年夏，印督勒定（Reading）应印度事务大臣倍恩汉（Birkenhead）之邀，自印返英，商议对策，他们认为国会不应认为印度成立自治政府的时期业已成熟。7 月 10 日，倍恩汉在上院很谨慎的就印度现状有所陈述，他于回顾 1919 年的改革案时，特别强调这个政府法之未能得到印度的合作，以及印度各方面领袖的仇视，所以缩短 10 年之期的要求，英政府并无考虑的意思。但自治党所提的自治案，终于在议会里通过，英政府鉴于过去的事例，和当前的情形，感到印度政治的调整，恐已等不到 1929 年，所以原须至 1929 年方能派至印度调查的调查团，乃于 1927 年底，决定提前成行。这个国会所组织的调查团，代表英国三个政党，而以西门爵士（Sir John Simon）为团长，所以通常又称西门调查团（Simon Commission）。调查团的团员既限于国会议员，自无印人在

内，但西门调查团的任务虽仅限于调查与报告，后此印度的宪法之是否修改，将以调查团的报告书为根据，所以与印度人民的前途如此关系重大的团体，而无印人之参加，非印人所能容忍。并且自治领的宪法，其制定权或修改权，仍操之于他人，亦令印人痛定思痛，所以西门调查团自始即不受印人的欢迎，在极端仇视的空气下，勉强进行其工作。

1927年冬，老尼赫鲁的儿子被称为激烈的尼赫鲁，自欧返印，他同情社会主义而主张印度必须完全独立。尼赫鲁回印之后，国民大会随即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左翼，即印度独立同盟（The Indian League For Independence）。是年12月在马德拉斯举行的国民大会中，即要求以完全独立为印度民族运动的目标。同时，退隐中的甘地于1928年重又出现，为国民大会里右翼的领袖所拥戴而成为国民大会的领导者。这一年，国民大会组织了一个“尼赫鲁委员会”（老尼赫鲁），负责起草印度新宪法，用以抵制西门调查团行将发表的报告书。老尼赫鲁是国民大会里的温和派，他们的目的，是使印度成为不列颠帝国内的一个自治领，所以这个委员会所起草的宪法，当然是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成立一个责任政府的宪法。这个宪法草案自不为左派的独立同盟所接受，但终以甘地的支持，在1928年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但附有一项条件，即假使英国不能于1929年年底实施国民大会的议决案，国民大会即将进一步主张完全独立，并重复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

甘地和老尼赫鲁的希望终被现实打破，国民大会里原要求取得自治领地位者，也以希望渺茫而转趋积极，1929年国民大会的主席一职，甘地虽当选而于慎察情势后，仍让位于年轻的尼赫鲁。在那年年底的国民大会上，英政府既未接受前一年国民大会的要求，于是尼赫鲁所提的“完全独立”案终于通过。决议案强调自由解放的要求，而对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抨击激烈，他们认为“印度的不列颠政府，不独剥夺印人的自由，且专以剥夺印人为目的。而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精神上，置印度于衰亡之境。所以他们“确信印度必须断绝对英国的关系，以达到完全独立的地位”。

印度之终必要求独立，实为历史演进不可避免的结果，凡尔赛和约以后的印度，在各方面都发生新的变动。民族意识因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而带给了广大的下层民众，印度民间对于英人的仇恨，原极普遍，但这

种仇英情绪，此时开始从原始的性质，进步为政治的性质。上层的领袖人物以及青年知识阶级，由于各种国内及国外的刺激，对于印度目前所处的地位，也不再能忍耐。大战结束后，欧洲若干久被压迫或久被瓜分的民族，获得了独立或复国的机会。大英帝国内的加拿大、澳洲、纽芬兰及南非洲，也先后变成了自治领，爱尔兰在长久的奋斗之后，终于成为一个自由邦。亚洲除日本于一个不长的历史中，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之外，中国在大战结束后所发动的新文化光芒里，使人看到了她来日所具有的可能的希望，而1926年中国国民党在广东的北伐，以及1928年的莫都南京，使这种希望已进入于实现的阶段。菲律宾人民也在努力争取独立之中，而他们所遇的主人都较印人所遇者为开明。在此种大环境里，欲使印人于环顾四周而无感于中，殊不可能；印人在心理上始终自尊其为世界一大民族，他们有远古的伟大的文化，他们至少在亚洲应处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此于近年来印度若干领袖所创由中国、印度、缅甸、锡兰、阿富汗、尼泊尔、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伊朗、伊拉克以及泰国等组成一个亚洲国家联邦（Asiatic Federation of Nations），而以中国与印度为以联邦之领袖的一建议中，可以见之。但在心理上及幻想上，印人自尊如此，而在现实的环境中，印度在国际间所处地位之无可骄傲又如彼，印人内心中所激起之烦恼，当可想象。印度的教育继续在发达中，据1925—1926年的统计，印度各级学校，公立的、私立的、以及教会设立的，其计有23.7万余所，学生约在1050万左右，较之30年前的数目，增一倍有半，其中高等教育及中等教育两级，学校约有1.1万校（专科以上之学校计290校，中学计1.08万余校），学生约在180万左右（大学生约为8.7万余人，中学生171万余人）。留学欧洲的人数亦远较大战以前为众。帝国会议，战时帝国内阁，及巴黎和会等之有印度代表参加，复使印度若干领袖，增加其经验及声望，而一般印人的自尊心，亦因此助长不少。社会方面也有新的变化，贱民阶级开始觅取组织，以保护他们自己。农工阶级的政治意识，在苏俄的鼓励下大有开展。妇女也企图走出旧日的樊笼，而踏进社会，女子受教育的比率虽不高，1925—1926年，大学生里的女性仅占1.5%，中学生里面的女子占到8—9%，但1925年国民大会的主席，就是一个女子。交通方面仍在进步之中，1926年印度的电报，已达9万英里；电话由政府经营者计1.6万架，

另 2.8 万架分由各大城市的执照公司承办，散布各地的邮局，约在 2 万局左右；铁路也超过 3.8 万英里，较之同时日本所有的铁路几及四倍，同时中国的铁路线几及五倍。铁路的铺筑固有便于征服者的统治，但铁路也容易使分散的区落彼此联络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凡此种种，都足以使印人及印人的领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前途引起深思。奴隶固非他们的天命，而印度之于英国，与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之于英国，亦情形不同。印度与英国，并无相同的血统，相同的文化，相同的宗教，相同的语言，而且也无相同的利益。英国的兴趣遍及全世界的每一角落。而印度的兴趣仅灌注于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缅甸、泰国、安南、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以及苏联与中国，在此种情形下，印度实无任何理由必须逗留在大英帝国的金圈子以内，而共戴英王为皇。他们和英国过去的历史，并不足使他们对于过去的历史有所留恋而希望或愿意保留这种历史的连系。因此，急进的青年群，逐渐倾向于“或则全存”“或则全无”的途径，而主张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在实际上，并无一个印人对于这最终的目标，有所异议。温和派之以自治领为满足，仅仅因为他们的态度较为现实，以为跨过自治领再踏上独立之路，较为容易。但因统治的英国政府过分吝啬之故，遂使原有的温和派领袖，也变为激烈的及怀恨之人，于是自 1929 年以后，遂不复在印人口中听到要求自治领的声音。

(五) 和平不服人

争取“完全独立”的手段，仍为“和平不服从”，于是为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第二次出现于印度（1930 年 3 月）。食盐在印度为政府所专卖，但盐税之重，远非一般贫民所能负担。甘地乃决心破坏这个法律，以作一个“不服从”的开始。他和他的一小队志愿者，经过辽长的路程，到康倍湾的但地（Dandi）地方去取海水烧煮私盐。这一群圣徒，遍历全国，受到万民的尊拜，而反英的火焰，跟着他的足迹蔓延全印；这一次不合作运动，其波及的范围，较第一次尤广，其程度较第一次尤烈。甘地的“食盐长征”，仅仅是印人蔑视英人所订的法律的一种

信号，当时辞去官职，拒绝纳税，罢工暴动，风涛汹涌，孟买一地参加大罢工者，即达 20 万人，在大城市中，铁路和街道的交通，俱为成千横卧轨道上的印人所阻断；这种形势在 5 月中，更趋激烈，于是甘地、尼赫鲁以及国民大会的其他常务委员，又复被捕入狱。

西门调查团的报告书在此时（1930 年 6 月）发表了，在印人眼光中，这两厚册报告书装满了压迫印人的文字。报告书承认印度民族运动的存在，但认为这种民族思想仅限于一小部人民；只是此一小部人民都为印度的代表阶级，其言论及地位在印度皆发生相当的影响。报告书建议将来的印度采用联邦的制度，但报告中建议的中央政府，较之既存的中央政府，并无任何实质上的改变。总督之权力依然极大，报告书并主张将两头政体亦行之于中央政府，对于省一级则主张将自治的范围扩大。报告书对于印度建立责任政府制度，以为尚非其时，印人必须在议会生活里学习更多的政治经验，以作为他们来日担任国事的准备；实际上西门调查团是失败的。“印度问题”的核心是印人要求世界，特别是英国，承认他们应有的地位，印人应当与英人平等，正像亚洲人应当与欧洲人平等一样。但西门调查团仅着眼于印度的情形之是否已经成熟至可以建立自治政府的地位，西门调查团只顾检视过去，它只是追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的后面，而未能迎头赶上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何况西门调查团所建议的改革之速度，并追不上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的速度，故西门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时的印度，与调查团在进行调查时的印度，情形又起了新的变化。

这个被印人视为“极端反动”的西门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印人愤怒的情绪，更为高涨。1930 年年底，印度监狱里监禁的爱国犯，竟达 3 万余人。当时麦唐纳（R. Mac Donald）的工党内阁、印度事务大臣本（Benn）和印督欧文（Irwin 即现任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都主张扩大印度自治的程度，为欧文所提议的圆桌会议，终于 1930 年 11 月 12 日在伦敦举行。参加的 89 个人间并无甘地及国民大会的领袖，他们宁愿留在狱中而不愿合作。但宁愿留在狱中的人们在 1931 年 1 月也终于无条件的被释。出狱的人们听到刚从伦敦回印的出席圆桌会议的代表所述的会议情形，大为不满，甘地重新开始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但在 3 月间，他和印督终于缔订了一个《欧文甘地协定》，甘地方面同意停止不合作运动，

印度政府承认撤销妨害人权的法令，释放因不合作运动而被捕的人，容许合法的罢工。但这个“休战协定”因欧文的去职而未能实行，所以在整个夏季中，印度仍在骚动和不安中渡过。9月，圆桌会议在伦敦重开，甘地经勒令的斡旋和许久的踌躇，终接受了邀请，而以国民大会代表的资格出席。

圆桌会议的举行完全是一个失败。一方面，英印的观点根本冲突，无法进行希望中的谈话；一方面，印度本身对于印度的前途，亦意见分歧。回教徒和印度教徒的争论，在第一次圆桌会议已成为不易解决的难题，前者要求市乡选区，印度教与回教徒须分别办理，因回教徒在全印人口中，只占三分之一弱，他们深恐在来日的自治政府下，将受印度教徒的歧视，因此又连带发生了印度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的特殊保障问题，要求这种特殊保障者，除回教徒、西克教徒等外，许多印度藩邦亦在其内。在这种纠纷复杂的空气下，麦唐纳宣布在印人自身对于市乡选区制度和少数民族保障问题未获解决之前，印度的新宪法，无从考虑。而所谓分别市乡选区制度和少数民族保障问题，在甘地等看来，不啻是英人暗中阻碍建立印度自治的手段，因为他们煽动回教徒和各藩邦王公反对印度教徒的统治，达成分化印度不使印度统一的目的。

甘地刚从伦敦返印不久，又被逮捕（1932年1月）。那时麦唐纳的工党内阁坍台、保守党重新执政，所以对于印度的态度，转趋强硬。印督威灵顿曾颁布许多严酷的紧急法令（Ordinance），思有以镇压当前因圆桌会议的失败而更趋险恶的局面。那时陆续被捕者，尚有国民大会主席奈杜夫人（Mrs. Sarojini Naidu）以及其他许多领袖，就是国民大会的本身也被封禁，认为是不法的团体，所有大会的财产亦被没收，什物亦被查封，舆论都受到严苛的统制。至5月底，因违反威灵顿所颁的各项法令而被捕者，几达5万之数，但要求独立的印人，只有加多，未见减少。

原定召集的第三次圆桌会议，因国民大会和回教徒同盟两方面都拒绝参加之故，使英人大为不耐，于是包尔温（Stanley Baldwin）内阁中的印度事务大臣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乃于1932年6月21日宣称，关于印度少数民族问题，将先由英政府拟定方案，然后再召集圆桌会议。英人的方案在9月公布，将印度的选区团体分为12个，如印度教徒、回教徒、贱民阶级、西克教徒、基督教徒等，分别设置市乡选举区域，同

时在省立法机关里，各该选区团体的议席数额，都加以比例的规定。英人拟制这种方案的理由，是实践他们对于保障印度少数民族的诺言，回教徒及贱民阶级等方面对于这个办法相当满意，但国民大会派对此自然抨击甚力而誓难承认，因为这个方案使印度趋于分裂，选民之投票，非以印度公民之资格，而系以印度某教徒或某阶级之资格。印度之宗教以及阶级的私争，将由是而益趋尖锐。第三次的圆桌会议仍于这个选举计划公布后在伦敦举行，甘地因为威灵顿总督在不合作运动未停止以前拒绝释放之故，故并未能代表国民大会参加。先后三次的圆桌会对于印回之争，始终未能解决，对于印度的将来，则决定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印度联邦。翌年，英国国会里乃成立了一个两院联合选定委员会（Joint Select Committee）从事印度新宪法的制订。至于国民大会，自被禁以后，便停止了正式的集会。1934年5月，国民大会决定无条件的取消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后，始在当局的许可下，恢复其合法的地位。甘地则是年秋退出了国民大会。

西门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五六年中，经过无数次的辩论与研究才制成的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是英国国会史上最长的文件，据说当时的印度事务大臣霍尔爵士，为了这个法案，曾答复质问1.5万起，演说600次，披阅报告2.5万页。两院联合选定委员会开了150余次的会议，始于1934年11月完成其草案。这个新宪法规定印度为一个联邦，由英属印度与印度藩邦构成之，其首脑就是英皇任命的印度总督。中央立法机关仍为两院制，两院议员的名额，则较1919年的政府法扩增。计上院为260名，其中英属印度占156名，藩邦占104名，成六与四之比；下院为375名，其中英属印度占250名，藩邦125名，英属印度部分所占的比率，较之上院略大。两院中的英属印度议员，俱由民选。省立法机关的组织及名额，各省不一，马德拉斯、孟买、孟加拉、联合省、及贝哈尔等五省均采两院制，其余的省采一院制。英属印度和藩邦的议席，也作比例的支配，同时，无论中央立法机关或地方立法机关，英属印度议员的议席，俱按照选举法所规定的办法，分配于不同的选民团体，这些选民团体的分类，大都以宗教为标准。选民资格的限制则放宽，所以照法规定，可有3500万的成年男女获得选举权，约当英属印度人口百分之十四。

在新宪法里，行政仍未完全对立法负责。关于全印的财政、外交、国防以及宗教方面的大权，仍操之于总督，关于这些“保留”事项，他仍只向印度事务大臣负责。因之如叛乱的防止，金融的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保障等，总督俱有处置的权力，甚至在非常时期，他且可暂时停止全部宪法的运用。除了外交、国防、宗教、财政以外，则由联邦议会所产生的阁员执政，他们对联邦议会负责，故旧日省一级之“两头政体”，此时实施行于中央政府。省一级的自治范围，在新宪法中有相当的扩大，向之仍为省长管辖的保留事务如地方财政、警察法庭、监狱、土地等，新宪法俱规定划分转让项中，而由省立法机关产生的多数党内阁主持。省长只在非常时期维持治安及保障少数民族等事件，保留其紧急处置的权力。

1935年的印度新宪法仍未改变一个传统的事实，即英国掌握着印度的最高主权，立法机关并未成为一个纯粹的真正的代议机关，而这个纯粹的真正的代议机关即为数10年来印人所日夜追求者。且议会里的议席，代表藩邦的议员，回教徒的议员，基督教徒的议员等，在议会里构成了可怕的数目，而这些议员，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均将处于袒护英人的地位，而使英国的势力即使在议会里也仍然保持不可忽视的优势。总督的权力，仍无法律上的限制；有之，能限制他者仍为英人而非印人，仍在伦敦而不在德里。所以地方自治的程度和议员民选的比率虽有增加，而对英国的统治印度，并无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国民大会曾于1934年决定要求设置民选的有制宪权的立宪会议，此时乃在尼赫鲁的领导下，正式通过反对新宪法的提案，同时各地复有新的罢工发生，作为坚决反对新宪法的表示。新宪法规定其中省一级，自1937年4月1日起有效，联邦部分则须得到相当数目的藩邦的同意，始生效力。经过总督的多次疏通，国民大会乃决定对新宪法的联邦部分继续反对，而对省的部分，表示同意。在1937年的大选中，在11省中国民大会获胜了八省。最初他们虽在大选中获胜而仍不愿参加实际的行政，又经过若干月的延宕，终在甘地的影响下，国民大会勉强参加新宪法关于省一级的运用，而在1937年7月以后，英属印度中有八省由在省立法机关里占有多数的国民大会执政，但在原则上，国民大会始终反对1935年的新宪法。

(六)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般人预料二次大战发生后，印度可能成为英人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这种预料并未失败。印人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印度概不参加。要印度参加战争必须获得印度的同意，而印度只有在能给予印度以自由与独立的条件下始愿意参加战争。印人这种态度在战事发生前后的各次国民大会前后的议决案中，表白无遗。1939年8月，世界的局面已极紧张，印度军队被调至埃及和马来半岛者，为数不少，8月11日的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此曾表示反对。大战爆发后，印督林里资哥（Lord Linlithgow）从9月3日宣告印度正式参战。依照印度现行宪法，宣战权并不属于立法机关，因之印督于事前亦未送交议会讨论。但在印人的立场，要印人参战而不先征得印人的同意，自非印人所能容忍。但印人一方面既不同意印度的被迫参战，另一方面又不同情德义的侵略行为，所以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在9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暂时保留其对欧洲战争的态度而先要求英国宣布战争的目的。在那一篇宣言中，国民大会申言：“印度之和平与战争问题，必须印度人民决定，任何外来之权势决不能对彼等强施此项决定。印度人民亦不许其资源为帝国主义之目的而被利用。任何强迫之决定，及为印度人民所不赞同之目的而利用印度资源之企图，不得不为印度人民所反对。——合作必须双方立于平等地位，彼此同意为双方皆认为值得之理想而努力。英法两国政府业经宣布彼等系为争取自由民主及消灭侵略而战，但以过去不久之历史观之，诺言所宣布之理想与真正之动机及目标，其间往往背道而驰之例证，实属不一而足。——如此次战争为保卫现状、帝国主义之属地、殖民地、既得利益及特权，则印度将不与其事，但如此次战争所争者为民主，为根据民主之世界秩序，则印度对之深切关怀”。因此印度之参战与否，须先英国表示其战争的目的后始能决定。国民大会请求英国政府声明作战目的是否在维护民主政治，又此种作战目的是否可以立即应用于印度？该宣言并要求英政府立刻宣布印度独立，及成立由印人组织的立宪会议，自行制定宪法。

这个宣言并未获得期望中的反响。印度事务大臣哲特兰德爵士在9月17日上院的印度问题辩论席上，严厉指责国民大会的态度，说他们“在远望天上的明星时，忽视了当前的实际困难”。10月10日的全印国民大会乃通过一次坚决主张印度独立的强硬决议案，答复英国。又一次方兴未艾的英印斗争，自此开始。当时英方对印度的地位续有说明，10月17日印督代表英政府肯定说明自治领地位为改进印度政治的目标，10月26日，英内相霍尔也宣布印度将尽速获得完全自治领的地位。1940年1月10日，印督再度宣言英政府将予印度以1931年威斯敏斯透制定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内规定的自治领地位。但这些声明都无补于实际，因为印人所要求者已不是“自治领”三字。所以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屡次的决议，都是些“拒绝政府建议”，“不支持战争”，“不与英人合作”；八个省份内国民大会内阁，在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及1940年3月21日的全印国民大会均坚决反对英国强迫印度参战，要求英国立刻允许印度独立。

1940年4月18日，印度事务大臣哲特兰德宣言：英政府绝对不承认印度独立的要求。这时印度政府颁布了严酷的国防条例，以作镇压骚乱的准备。在法国崩溃中，英内阁的首相及印度事务大臣虽都易人，而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始终如一。1940年下半年，反抗运动终见之于行动，其路线仍是甘地的和平抵抗，而其中心精神是“非战”。这个和平抵抗运动的目的，乃在表示印人并未自愿参加战争，同时非印度完全独立，印人不能表示满足。因从事此项“和平抵抗运动”而被捕下狱者，络绎不绝。国民大会主席阿沙德（Azad）和尼赫鲁等都在其内。他们虽下狱而英印间的僵局则并未因之而稍见和缓。

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连名发表了通常被世人称为“大西洋宪章”的美英联合宣言。该宣言第三条规定：

“尊重各民族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此项权利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使其恢复原有之主权与自主政府。”

“大西洋宪章”发表后，曾在印度引起了新的希望；但这个新的希望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丘吉尔于同年9月曾作如下的声明：

“联合宣言并不在任何方面改变吾人关于印度、缅甸及英帝国其他部分的宪政发展的各种政策的声明。——在大西洋会谈中，吾人心目中主

要事物乃在纳粹统治下之欧洲各国家民族的主权与自治。”

丘吉尔内阁对于印度的态度，在此声明里表露无余。那时印度总督下面的行政会议扩大至 12 人（后来又扩大至 15 人），以便增加印籍政务员，但在国民大会看来，这只是一种收买与贿赂而于根本问题毫无关系。但前此以反战的罪名被捕的一些人则于 1941 年年底被释，同时太平洋的战争爆发后，形势又起了新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非战”与“不抵抗”与现实不合，国民大会的领袖人物间的意见入于分歧，1941 年年底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反战运动由甘地个人领导，于是 1941 年下半年以非战为中心的和平抵抗运动，实际停止，1942 年 1 月 15 日，甘地且宣布尼赫鲁为其继承人。

日美日英宣战后，英国在远东的战争，日趋失利，英国国会及各方舆论，均一致要求政府妥善解决印度问题。因为印度的资源，人力和地理形势，在战争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印度的物力，人力，如不能得到印人充分的合作，便难望加以充分的利用。新加坡的失陷复使印度问题的解决，不容再缓，在此种情形下，英政府乃于 3 月 11 日，宣布派掌玺大臣克利浦斯（Sir Stafford Cripps）赴印谈判。克利浦斯于 3 月 23 日到达新德里，他在印度前后 20 日，和印度各政党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但 20 日的紧张的谈判，终无结果，而克利浦斯在 4 月 11 日的招待记者席上宣布撤回对印度的全部建议。

克利浦斯携印的英政府对印的建议，据 3 月 29 日路透社德里电，约如下述：

一、战后之印度为英帝国内的一个自治领，其地位与其他自治领完全相同。

二、未来印度自治领，采行联邦制，由英属印度及各藩邦组成之。

三、一俟战事停止，即从事印度新宪法之制订，这个未来的印度新宪法，即为未来印度自治领的法律基础。至于制宪机构之组织，于战事停止之时，各省应举行总选，一俟总选结果揭晓之时，所有各省立法机构之下院议员，应即成为单一之选举代表团。依照比例，代表团选出制宪机构，制宪机构之人数，应等于选举代表团总人数十分之一。同时，藩邦既为印度联邦之组成分子，藩邦自亦有参加制宪之权。至于参加制宪之各藩邦代表，其与各藩人口总数之比例，应与英属印度制宪代表人

数与英属印度人口总人数之比例相同，在制宪会议中，各藩邦代表与英属印度代表之权力，亦相同。

四、基于上述程序所制定之宪法，英国决予承认，并立即施行。

五、但英属印度内任何一省，倘不愿接受新宪法者，应有权保持目前之宪法地位。新宪法并应规定此等英属印度省份，倘于将来决定重行参加新印度联邦时，仍可加入。此等并不参加新印度联邦之英属印度各省，倘表示同意，则英国政府准备与之协议，商定另一新宪法，此另一新宪法之地位与新印度联邦宪法之地位完全相同，其制宪程序亦复类似。至于各印度藩邦，无论拟接受新宪法与否，倘在新形势之下需与英政府进行谈判，以修改两方之条约关系者，则两方应举行此种谈判。

六、在印度处于严重局势之时期内，及新宪法草成以前，印度防御问题之统制与指导权，应由英国继续担负完全之责任，作为英国作战努力之一部分；惟印度军用物资之动员，应由印度政府在印度各民族合作之下负其全责。

印人对于克利浦斯的访印，原相当兴奋，英印双方的僵持，终须以谈判打破之，而克利浦斯者，尝被誉为“东方自由的堡垒”，因为克利浦斯素来主张英国在欧洲应与苏联合作，在亚洲应与印度合作。克利浦斯的人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认为英帝国对于印度问题将有新的决策，新加坡陷落后，伦敦《泰晤士报》曾于3月27日以“中国与印度”为题，谓英国应有新政策以适应新时代与新环境，因之克利浦斯的访印，被世人认为是“以新精神来实现新任务”的一个开端。但经过几天的谈判，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于3月30日、31日、4月1日连续商议之后，终觉英国这个建议，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在原则上与印人的主张根本不合，而若干所说明的问题也非印人所能接受。国民大会所要求者，在性质上是“完全独立”，在时间上是“立刻”，而英国的建议则为“战后”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自治领”的地位原是印度所日夜盼望祈求的，但这种盼望祈求，已为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他们现在对于“自治领”一词，已不感兴趣，正如尼赫鲁所云，“余不愿闻自治领一词，更不愿见印度处于如澳洲或其他自治领同样之地位中”，而20年前的旧事，亦使印人对于英政府的诺言，不再感觉其有何分量。英国建议中关于制宪程序及允许各省及各藩邦有自由加入新印度联邦之权的一

点，尤引起印人的愤怒，认为直到这时候止，英政府尚欲保持其传统的政策，分化印度而阴使其难于统一。若照建议案的办法，“英属印度内任何一省，倘不愿接受新宪法者，应有权保持目前之宪法地位”，则在原则上，英属印度之任何一省，均有不参加新印度联邦之自由。同时此等不参加新印度联邦之省，又许其“于将来决定重行参加新印度联邦时，仍可加入”，则大足以鼓励英属印度各省因对新印度宪法若干地方不满意而不参加新印度联邦。在此种情形下，在制定新宪法时，将随时发生许多严重的困难，因为任何一省如对于新宪法内之若干点不满意，均可以不参加联邦为要胁。允许任何一省可以不参加新印度联邦，已使未来的印度联邦埋下摇动不稳的因子，而此种不参加新联邦的省份，且可与英政府协议，商定另一新宪法，其地位且于新印度联邦的宪法相等，则未来之印度，殆将成为若干印度国家，或成为一个大印度国家和几个小印度国家。在印人看来，英国的居心险恶，莫此为甚。且既许任何一省均可不参加新印度联邦，而在制宪时，又复由各省共同参加制宪，则亦难望每一个省对于新宪法的制订，都能有负责的精神，此对于新宪法的制订，自为一种可虑的损失。关于制宪人数，各藩邦代表与各藩邦人口总数之比例应与英属印度代表与英属印度人口总数之比例相同的一点，亦非国民大会方面所能赞同。各藩邦的人口总数，在全印的人口中约占四分之一。若按照比例，则在制宪机构中，藩邦的代表亦应占制宪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无论他们在过去民族运动的努力中或他们目下政治经验或文化智识的程度上，藩邦对于未来印度所已经有的贡献以及将来可能有的贡献，在质在量均占不到如此比例的分量。在印度的复国运动中，他们显然未尝有任何足以重视的努力，而各藩邦的闭塞落后，统治之专制，对于印度之进步只有阻碍而无促进。而且他们过去大都是立在英国一面的，因为那些土著王公所要求者，仅仅是极有限的政权，此项政权足以维持他们在本邦里的统治地位，而他们所需者正就是英国所愿给者，他们大都是眼光看不到本邦以外的人物，他们为英国所保护而反沾沾自喜，惟恐印度统一后，反而损失他们的权位。所以他们过去对于印度的独立与统一，不仅不热烈参加而且从中反对与破坏，他们正是英人“分化印度而统治之”政策的最理想的友伴。他们在制宪机构中占有如此的数目，自然足以影响未来印度宪法的性质及内容，所以

国民大会对此一点，亦未能表示同意。

关于在新宪法草成以前印度的国防仍由英国负责的一点，亦非国民大会所愿接受。军事之停止与新宪法之草成，其间自有一段时间。印方希望在军事停止之后，关于印度国防之统制权即归印人，英方则主张须于新宪法草成以后，始能将军权交让于新联邦政府。英政府对于新印度联邦宪法的内容，容或把有若干观点，因之设若在新宪法未制成以前，即将军权交落于国民大会一派领袖之手，或者足以影响英方心目中的新宪法所持有的精神甚或影响新宪法本身的产生；凡此俱非英政府所能容许。所以无论制宪问题或国防问题，印英双方均罅隙甚深。正如国民大会方面人物所云，当克利浦斯提出其建议案后，印方根本不欲与之谈判，但谈判之所以仍能进行者，无非因眼前所处环境之迫切，故不能不抑制情感而谋有所解决，因之英政府之原建议虽为国民大会拒绝，但对于改变现存宪法及防御问题，双方仍各提出新的建议，希望觅得折衷的办法，以过渡此一艰难的局面；虽然双方所提的新建议仍均不能为对方所接取。改变宪法地位，在性质上及时间上，英印双方的观点既相去太远，国民大会乃提议在战争时期，先成立一个印度临时国民政府，以作过渡，而克利浦斯认为在战争时期，印度宪法地位之任何重大改变均不可能，宪法既不能作重大的改变，临时的国民政府自亦无法成立。至于国防权力问题，则克利浦斯另提一个办法，主张在总督的行政会议中增设一印籍国防部部长，目下印度的国防即由此印籍国防部部长及英籍印度军总司令两人分掌，前者掌理国防调整问题及非属技术性质之军事问题，后者则保留其军略及作战问题之实权。在讨论此一建议中，国民大会及克利浦斯两方各为其印籍国防部部长及英籍印度军总司令争取权力，最后则国民大会表示愿意接受这个折衷办法，唯附有一项条件，即英籍印度军总司令所掌之权力，仅以战争时期为限，一俟军事行动停止以后，此英籍印度军总司令所掌之职权即应移归印籍国防部部长行使，克利浦斯则答复，须俟新印度联邦成立以后，英籍印度军总司令之职权，方能完全交付印人，故其症结所在，仍与原建议中双方所争者相同，无论原建议或新提议，经过迭次的谈判，均不能觅得谅解，以致克利浦斯的印度之行，空无所得。

克利浦斯印行的失败，各方都感到极大的失望，而于印人为尤甚。

他们这几十年来都一心一意作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奋斗，他们为了独立与自由，曾流过无数次的血，下过无数次的狱，精神上物质上所受的毁坏都难以叙述。战争对于弱小民族的民族运动常是一个可贵的机会。在1942年的夏季，埃及及苏联的战事，都说明英国处境的危急，而日军之叩印度之门，德军之拊印度之背，都增强印度在战争中地位的重要。无论丘吉尔内阁的殖民地政策如何不变，大西洋宪章和26国的共同宣言所标榜的“民族自由”，已成为轴心国家以外的世界人类所信奉的标的，再非任何反动的政治家所能公开予以挑衅。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宣布以后所引起的情，现又重复燃烧于爱好自由的人士，特别是那些久已困压于他人铁蹄之下的弱小而无救援的民族的心底。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也无人能承认在印度未发生它应有的影响，中国在上海的英勇战斗，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他们对于素为他们不甚介意的中国军队，其表现的视死如归的精神，竟可歌可泣一至如此。但接着上海弃守而来的是日本势如破竹的前进，南京沦陷，中国显出一个短时期的浮动，徐州突围，广州汉口先后撤退。印度人在远远的向神州大陆上凝视着，他们正屏息以待，而渴望于看到一个结论，即装备不完的中国究将崩溃于优势的日本之前，抑或她历尽艰苦而终能撑持到底？于是印人乃陆续看到中国在政治，工业及军事的各方面的建设性的进步，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因其艰苦之奋斗而大为增高；她今日所享受的地位实为她过去100年来所未有。这一个亚洲老大的国家，数十年来的努力，总算看到了她所可能有的收获，而另一个亚洲古国，则尚有待于不中断的奋斗。尼赫鲁访问重庆归去，当有许多感触，而中国的自力更生对于印度无疑是一种鼓励与启示。20年前，他们曾经怀着光明的梦幻，但光明的梦幻终在现实的冷酷下消灭，只留下郁聚于心而无能奔泄的愤恨，他们已经受过一次的欺骗，他们不欲使自己在那有限的生命里再逢到可耻的屈辱。英人对于他们唯一的不变的要求，就是“忍耐”。英国会对他们说：“1909，1919，和1935年的法案，已使印度沿自由之路迈进到一种地步，而这种地步，其他自治领是经过了两倍的时间才达到的。”但是古普朗教授（R.Coupland）在他1941年出版的《不列颠与印度》一书中说得好：“自由并不是程度的问题，经过自由哲学训练了的一个民族不肯轻易地以比较世界其他民族所享受者为少（不管怎样少）的自由为满足”，他们对

于这种“不完全的自由”不能满足，他们对于他们所不满足的，也不能再如英人所希望的一再忍耐，于是世人乃听到一个身躯矮小而名震一代的圣人沉痛呼喊：“彼等刻已获得有生以来宣布印度自由及证明彼等真正意愿之机会，如彼等失去此生唯一之机会，此种机会在一代之间将无重临之可能，历史将谓彼等并未履行彼等对于印度之责任。”

在此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下，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42年7月14日经过九日的讨论，终于通过了“英人撤离印度”草案。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并议决授权甘地，如英国拒绝国民大会的建议，甘地得出而领导最大可能规模的新不服从运动。这一次国民大会预拟中之“最大可能规模的不服从运动”与甘地过去领导之抵抗运动，似乎性质稍异。甘地在8月6日接见孟买新闻界时，谓“任何拟议中，或业已实施之非暴力斗争，其着重点俱在和平；至绝对必要时，始成为战争”。这种“非暴力斗争之最后手段即为战争”之说，我们在甘地已往的演说或文字中，实未之前见。而甘地于全印国民大会通过“英人撤离印度”一案后。在其态度审慎语调坚决的演讲中，曾表示“如万不得已，决以全力抵抗”。盖这次的新不服从运动，已非“纯粹甘地式”的不服从运动。“纯粹甘地式”的和平抵抗，已于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消逝，甘地虽曾于1941年末拒绝国民大会其他领袖将不合作运动变成一个民众运动的建议，但形势所趋，无法再坚持他的传统的非暴力和平抵抗政策，所以这一次国民大会决定如英国拒绝撤离印度，即授权甘地领导的新不服从运动，是甘地及其他国民大会领袖的主张的一个折衷，所以性质要比过去为急进。

7月14日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所通过的“英人撤离印度”案，等俟8月7日在孟买召开的全印国民大会的批准，俾便根据它而发动行动。7月14日至8月7日的三个星期中，理应是一个十分紧张而求有益的解决的时期，但这三个星期的时间在并不如吾人想象的那样热烈之中逝去，其最好的解释莫若印度事务大臣亚梅利（Amery）于8月9日在伦敦的广播中所说的，“甘地之要求，原不足重视，英人所注意者，盖为国民大会决议之行动”，所以无论印度政府或伦敦政府，均不重视国民大会的要求，而仅密切注意着国民大会可能发动之行动。当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英人撤离印度”一案后，国民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印度各处，

以探民意之背向。这个“英人撤离印度案”于8月8日全印国民大会上，以绝大多数之赞成通过，而甘地、尼赫鲁、阿沙德、奈杜夫人以及国民大会其他常务委员、国民大会孟买省委会主席等，乃于9日在印度政府的极端行动下，一律被捕下狱。英国决心以武力来镇压变乱，印人则决心以“宁死不屈”来答复英国。

英印之间的斗争，目下即停留在如上所述的局面下。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大不列颠帝国以内除英国本国外，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南非及印度，都先后加入了战争，但其间所不同者，即前几个自治领的人民系与英人并肩作战，而印人则与英人面对作战。屈勒味林在其700页的名著《英国史》中，于总结印度一部分的历史时，其言有曰：“在兵变后多年中，良好政府的种种工作确得进步无阻。饥荒及疫疠得由科学方法而克服，而财富及人口亦有空前的增加。那真是有利于千百万无告人民的可贵的工作。但当那些有成绩的年头先后过去而未生一波之时，官僚政治亦在沾着任何专制官府所不能避免的缺陷，它只想到已成的良好工作，而对于政治空气中的变化绝少留意。如果在上者能早日即予初生的忠君的民族运动，如同1880几年及90几年的印度国民大会，以相当的让步，也许来日的途径可以平坦不少。但和暖的批评，当其初发之时，往往被英人视为谋叛，及至英人不能以谋叛视之之时，则它又确不亚于谋叛。”史家之言，殊足供人深思。

三、印度独立问题之观察

(一) 印度独立之前途

吾人于前两章中，曾就英人的征服印度及印人的民族运动，加以叙述；兹再就印度独立之前途，略作观察，以毕全书。

今日印人无一不关切着他们祖国的前途，愿以一己的不自由生命争取民族的自由生命；但我们综览全局，深觉印度之独立，在短时期内尚难实现。前曾言之，“印度问题”的核心是印人要求英国承认他们在国际社会里应有的地位；印人应与英人平等，正如亚洲人应与欧洲人平等一样。因此，我们可以逻辑地说，设若英国能允许印度独立，正如目前印人以及举世同情印人之人所希望于英国者，则印度自将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就著者看法，要英国容许印度独立，几为不可能之事；在任何情形之下，英国除非被迫，殆无意放弃这一颗不列颠帝国皇冠上最明亮的宝石 (the brightest jewel in the English diadem)，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判麦斯吞的名言：“英国无永久之友，亦无永久之敌，唯有永久的利益”；商业而离开了利益，亦即不成其为商业。印度每年自英国输入的货物，通常总占印度入口贸易总额三分之一以上；在过去，且有一年(1870)竟占到百分之八十五者。兰开夏的纺织品半世纪来多赖印度为其主要的市场，而在印度工业发达中所用的一切机器及铁路材料，亦无一非购自英国；在不列颠帝国中，没有一个自治领或殖民地，能如印度那样大量的购买英国的货品。同时，印度每年出口货物之四分之一，均

由英国船业承运，这一笔运费利益，当然为数不小，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其数额庞大，亦为人所共见，据 1938 年 1 月 14 日《印度时报》所载，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其平均利息额为百分之四·九；投资人对于其利益的保障，自不愿忽视。帝国主义国家征服殖民地的目的，不仅觅取市场，抑且觅取原料。英国是一个岛国，其土地、气候及资源，都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因之她在生活上及生产上，无一不需仰求于国外。英人日常生活中所需之肉类之百分之五十，牛油及干酪（cheese）之百分之六十五，谷类之百分之七十，以及全部的茶、咖啡、糖等，均须由海外供给，她在工业上所需之铁块之百分之三十三，羊毛之百分之九十三，铅之百分之九十四。液体燃料之百分之九十六，锡块之百分之九十八，锌块之百分之九十八，以及全部的棉花、丝、铜块、大麻、生麻和镍块，亦均需由海外购致。（Brassey's Naval and Shipping Annual 1926）。在这些物品中，印度可以供给大量的小麦、棉花、麻、茶和可观数量的小麦以外的谷类，咖啡和铁块；海斯（C.J.H.Hayes）谓单就麦的供给一项，即可成为不列颠所以要统治印度之充分说明。印度每年的出口贸易，其中输至英国者，平均亦占出口总额三分之一左右；故无论就市场或原料论，印度对于英国的商业价值，均极显著。但印度对于英国的价值，固不仅是商业的，抑亦为军事的。将官李厄（General H.Lea）于所著《萨克逊之天下》（The Day of Saxon）一书中，谓印度在世界形势中所占的地位，除英国与日本外，无有及之者，而印度将来在军略上之地位，及其足以转变世界政策之点，且将因每一次的国际纠纷而愈形其重要。我们今日翻开地图，则见英国若有事于非洲、近东、远东以及澳洲、纽西兰，无一不需以印度为其人力物力的广大根据地。在这一次大战中，轴心国家潜艇活跃，英国商轮损失甚重，于是澳洲、纽西兰、南非以及一切印度洋中的英属领地，遣使集聚印度，将以印度为根据地，调节及扩张他们的资源，以节省英国的航运。印度工业及资源的开发，也使英国在东方的军队，对英国本土及美国的依赖性为之减低。印度的人口八倍于英国本国，30 倍于加拿大，在不列颠帝国的 4.9 亿余人口中，印度占到五分之四；赖有印度，英帝国才得拥有举世一等的庞大人力。所以无论在经济上及军事上，印度对于英国的重要，均非其他的殖民地得与伦比，因此自英国占有印度以来，对于英印交通及英国在印度

统治的安全的关切，无微不至。自 17 世纪中叶起，英国在大西洋上及印度洋上所占的土地：

1650 年占圣海伦岛 (St. Helena, 在南太平洋)。

1794 年占塞舌耳岛 (Seychelles, 在马达革斯加 Madagascar 之东北)。

1802 年占锡兰。

1806 年占好望角殖民地。

1810 年占毛里求斯岛 (Mauritius) 及察各斯群岛 (Chagos, 在毛里求斯岛之东北, 塞舌耳岛之东)。

1814 年占亚密兰群岛和洛得里革斯岛 (Amurante, Rodrigues, 前者在马达革斯加岛之北, 后者在毛里求斯岛附近)。

1815 年占亚松森岛 (Ascension, 在南大西洋, 圣海伦岛之西北)。

1843 年占南非洲的纳塔尔 (Natal)。

以及这次大战中英军的占领法属马达革斯加等岛, 无一不是为了保障通达印度的航线。当法人雷赛浦 (Ferdinand Lessep) 倡议开浚苏伊士运河时, 英国朝野立刻讨论地中海与红海的英殖民地兵站问题, 而一转眼间, 即预备了新的世界交通线。直布罗陀、马尔太、亚丁、阿拉伯南部的库良摩林群岛 (Kurian-Murian), 流泪门海峡的丕林群岛 (Perim), 塞浦路斯岛 (Cyprus), 埃及, 亚丁湾上的具比拉 (Berbera), 和布尔哈 (Bulhar), 索哥德拉岛 (Sokotra), 索马里兰, 以及红海北端的赛奈 (Sinai) 地带等, 先后均为英国所占有, 所以苏彝士运河于 1869 年开通时, 从地中海到印度的交通点, 已大半在英国的掌握之中。19 世纪以来, 若非为了印度, 欧洲的外交不知可以简单几许。在拿破仑战争中, 英国之奋力保卫埃及, 亦即保卫印度。1837 年的埃土纠纷中, 英法几乎为了叙利亚问题干戈相见, 因为在判麦斯吞的心目中, 叙利亚是进入印度之路。威廉二世与拿破仑所见略同, 认为要摧毁不列颠帝国必须摧毁不列颠在近东的势力, 所以他不惜亲访土耳其及巴力斯坦, 德土同盟使德国可以经土耳其而占领埃及, 而德国的柏林巴革达铁路的计划, 尤使英国朝野寝食不安, 因为这些对于印度的安全, 都是致命的威胁。克里米亚战争, 如其不是因为印度的关系, 也许可以不致发生。在俄土之战之中, 英国若非为了印度, 也许不致如此关切。而 19 世纪后英俄两国在阿富汗、波斯等地带的冲突, 亦无一不与印度有关。新加坡的设防显

欲防止日本从东面而来的进攻。一世纪来，在英国执政的无论是保守党，自由党或者工党，他们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容有出入，但他们之保卫印度则如出一辙，他们统治印度所用的手段容有不同，但他们之不放弃统治印度的权力，则并无二致。被称为东方自由的堡垒的克利浦斯，他所能给予印度的自由，并不能超出丘吉尔所能同意的范围，而当《英人撤离印度案》于1942年7月14日经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后，工党的报纸The Daily Herald一如保守党的报纸著文抨击国民大会派的主张，甘地等被捕后，工党且正式声明“拥护政府对印度所采取之措置”。最右的，最保守的英国人固不必论，就是那左的，最拥护自由主义的，最同情印度的英国人，他的立场最后还是一个英国人的立场。当殖民地再分配的空气弥漫于欧洲时，1936年4月6日张伯伦在下院演说：“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已请求或建议过，不列颠帝国应当放弃他任何一处的殖民地，假如有这样的要求提出，也不会立时予以考虑采纳。”任何殖民地的放弃，英国都不能考虑，何况印度这颗皇冠上的宝石。近一年来，美国的报章杂志讨论战后世界和平，论及殖民地问题时，对英国多所“善意之评论与公正之忠告”。为答复“海外彼岸”那些善意的评论及忠告，英国殖民大臣史丹莱1943年3月5日在牛津演说时，即特别强调英国之殖民地必须继续由英国统治，这是“英帝国政治机构之基本原则”。旬日后（同月17日），丘吉尔在下院答复议员对此事的询问时，亦即率直承认史丹莱的牛津演说，可视为“代表政府的政策”。几百年来，英国在世界舞台上所遭遇的局面，其险恶，未有甚于这一两年中她所遭遇者，而她在东方的褴褛，亦未有过于1942年的夏天。新加坡失陷，缅甸沦亡，孟加拉湾已归入日本海军活动的范围，高加索土地已竖着卍字的旗帜，而埃及的保障也有待于更坚韧的努力，印度复于此时公开要求英人撤退，且宣称将发动“最大可能规模的不服从运动”，而在此种环境下，印度事务大臣则仍以无比的坚定宣言：“印度的独立要求，断难承认。”英国的政治家中，很早就有人在喊：“印度以刀剑得之，亦唯以刀剑始能保之”，而拥护这种口号的人，正就是目前执政的人。新世纪以来的英印之争之中，英国可以让步者让步之，但让步有一个限度，即限于枝节而不及于根本。在根本上，即在英国统治印度的主权上，英国绝不后退一寸。在印度东西两面的形势险恶如此，而印度人

民的独立要求又炽盛如彼的局面下，英国于华哈德议决案通过以后，犹始终沉默坚定而一以“唯以刀剑始能保之”的原则为应付的规律，则我们实难发见有任何理由，足以使我们相信英国能有一旦允许印度脱离不列颠帝国而去。

(二) 就外交上看

现在再就外交上看。设若印度能在外交上得到有实效的援助，不论此项援助是纯外交的（即政治的）抑或竟是军事的，则印度独立的现实性，至少将因之大为增强。但在这方面，印度的希望也极微弱。轴心国若在此次战争中获得胜利，则我们相信印度可能即在那个时候脱离英国的统治。但照现在局势，此次战争的最后胜利将属于联合国一方面，殆无可疑，所以印度在外交上的援助，恐亦只能寄其希望于联合国一方面的若干国家，而我们的观察亦以此一边为限。

事实上，国民大会在1942年夏天英印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亦仅仅向美、中、苏三国呼吁，请求他们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美国在当代的人类历史中，久被世人视为正义及自由的象征，14点和8点的创造人都是美国人。美国是最拥护民族平等及民族自决的原则的。但不幸政治理想与实际政治，常为二事。大西洋宪章的目的在阐明英美此次作战的目的，而目的之一即“各民族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权利大有横遭剥夺者”，英美两国“俱欲使其恢复原有之主权与自由政府”。但丘吉尔曾宣称这个英美“联合宣言并不在任何方面改变吾人关于印度、缅甸、及英帝国其他部分的宪政发展的各种政策的声明”，且据丘吉尔有一次演说，英国对大西洋宪章不适用于印度的“保留”，在签订大西洋宪章以前，曾得到罗斯福谅解的。但罗斯福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询问大西洋宪章适用的范围为如何时，他曾声言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全世界，并特别允许新闻记者引用他的原文。美国在内心上究竟认为印度这样一个政治团体应否予以独立，我们姑暂不论，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当英国反对着予印度以独立，美国决不会公开支持印度，或给予英国以任何外交上的压力，使英国对于印度的独立要求，作最大可能的让步。所以自从

“英人撤离印度”案经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甘地、尼赫鲁等被捕，一直到这次因甘地绝食而使整个的印度又陷入于群情皇皇的氛围止，美国官方对于印局虽然迄在密切注视之中，而始终保持缄默，不作任何表示。被称为“总统的特别代表”的威尔基，于访问中国、苏联、埃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及伊朗等国而独不及印度，也在表示美国之无意过问目前英印之间的僵局。我们很怀疑国民大会的领袖们能在目前得到美国任何足以符合他们的本意因而使他们感到满意的援助。

蒋委员长在“告印度人民书”中替印度人民向英政府的呼吁，希望英政府能给予印人以“政治的实权”，殆已达到联合国中替印度说话的程度最高标准；这是克利浦斯印行以前的事。自此以后，英印间的局势，日益恶化，而中国对印度的援助，始终未超出那个限度。中国的官方报纸对于日见紧张的英印斗争，始终以和事人的口吻发言，希望英印双方都能善用理智，以求解决，而对于双方都不作一言之得罪。中国这种态度是一个很合逻辑的结果。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现已快近六年，目前她仍在奋力作战，以求领土及主权的完整。在这种情形下，她本身尚须仰求友邦的援助，以争取最后的胜利，她对印度的援助，其不能超过“同情”的程度，势所必然。同情原是一种道义的力量，但道义若无具体的后盾，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即难望其发生影响。

苏联的情形与中国相似。在理论上，苏联原是最同情弱小民族，最愿意援助被压迫民族的一个国家。但在政治上为苏联所独有的各种特质，自德苏战争爆发以后，殆都暂时敛迹。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永远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此亦不仅斯大林一人以为然。在1942年夏季，苏联本身且处于一种存亡续绝之交，在德军的重大压力下，其抵抗作战，非常艰难，而她对于英国的依赖，因亦更甚。她自不愿有任何足以损伤英人感情的行为。1942年8月10日，莫斯科路透社电：“苏联各报今以国外新闻栏四分之一之篇幅刊载印度消息。关于国民大会议案及回教联盟情形，该报有简略记载，但大量刊载印度政府之声明。”苏联现在除在“收方”从那些过去被她称为帝国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尽量收入“接济”外，她已无力在“支方”对任何弱小民族付出“援助”。

因此从外交上看，我们看不到目前印度能自国外得到任何有实效的

支持。美中苏三国现在通常被称为英印之争最适当的调解人，但除非英政府出面邀请而这种邀请又附有英印双方在事前已有谅解可为双方接受的办法（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美中苏三国或三国中之任何一国，大概都不会出面调解。而且，即使美国或美中苏三国出面调解，不论她们的出面是由于英印的委托，或是因英印僵局之影响到联合国的作战，这种调解亦必仅为一种过渡的临时性质，英印之间的根本症结不易因此解决。在著者看来，联合国不仅在目下无人愿或能出面公开支持印人的独立要求，就是在战后的和会上，只要英国仍为战胜国方面的一个主要国家，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微弱的。

英国不会承认印人的独立要求，联合国方面至少在目前也没有任何一国能给予印人以有效的援助，所以印度的自由与独立尚须由印人以自力去争取。

（三）奋斗着的印度

在独立运动中，奋斗着的印度，使我们不禁忆及在一个世纪以前以“意大利始，意大利终，吾生一切惟意大利”的精神争取独立与统一的意大利；她们两个国家殊不乏相似之处。印度在亚洲地图上的地位，一如意大利在欧洲地图上的地位。她们同样的居于她们所属的一洲的南端，且同样以半岛的形势，跨入于海洋之中。在土地的北端，她们同样的高山掩护，而与别个国家分界。在地面上，两者都有大河从西向东，构成肥沃的平原。她们都是世界古国，她们都有过伟大灿烂的文化。而且这种伟大灿烂的文化都曾在她们本洲上发生过广大的影响。印度人民和意大利人民都爱好和平而不喜战争；而最不幸者，她们又同样的成为外族侵袭的目标凡数世纪之久。但我们于比拟之余，发见印度之于统治她的外族，较之意大利统治她的外族，犹占若干优越力。第一，意大利的面积与人口，与奥大利相近，而印度的面积则较英国超过一倍，印度的人口在英国最初征服时，比较英国的人口，凡 20 倍，照现在的比例，也在八倍左右。第二，奥大利对意大利因近在咫尺，故调度迅速而易于控制。英国与印度则相去数万里，无论经好望角或苏伊士运河，均须四个星期

至二个月以上之时间。然则在此种情形下，何以意大利于 70 年前即能摆脱外族的统治而统一全国，而印度至今独立的希望犹极渺茫？其中原因，当然非仅一端，但民族意识之浓烈与否，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意大利统一之前，虽也分成若干小国，但意大利半岛上的人民，无论其为威尼市人，西西里人，或者撒丁那人，都用同一种语言文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是他们共同的财产。不若印度之各有其信奉的宗教，而所用的语言文字的不同，又几乎至不可信的程度。这种情形自然大有碍于举国的团结。当意大利已有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Mazzini, Garibaldi, Cavour）三杰献身于祖国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时，印度的领袖及人民，犹只知各顾一己的苟安。1857 年的“兵变”，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几乎颠覆，但“兵变”以军队为主体而人民并未参加，军队的起事亦仅限于一部而非全部。印度的南部及中部均未因“兵变”而发生任何波动，而西克人则反加入英军替英国效犬马之力，使英人终于渡过他们在印度未之前见的危局。

印人久困于英帝国的压迫下，仇英的感情，非常强烈。据说一个印度母亲打死了一个苍蝇时，她那无知的孩子会得问她是不是那个苍蝇是从英国飞来的。但排外或仇视外族并不就是现代我们所谓的民族主义。现代所称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一个民族不仅企图驱逐外族摆脱外族的统治，并进一步要求由他们自己统治他们自己，他们要努力使全国统一，而求领土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虽然著者不相信仅仅依赖强烈的民族意识，一种精神上的因素，即能驱逐外族的侵犯或颠覆外族的统治，但这种坚强的民族意识的精神因素要为一个弱小民族抵抗另一个富强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民族意识使全国人民能看到他们共同的利益与共同的命运，因而使他们能团结一致，协力对外。民族意识使分散的小单位凝成一个整齐的大单位，使散漫的进而为有组织的，脆弱的变成为坚韧的，意见分歧的变成为有一致主张的。独立运动必须有组织有原则，在有原则，有组织的条件下，才会发生有力量的行动。但要有“原则”与“组织”，便须先有成熟的政治意识。19 世纪中叶以后光芒四射的民族主义的思潮，于最近二三十年中，在印度传播得相当迅速。无论在印度或印度以外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俱有助于民族思想在印度之成长，此亦整个时代潮流之所归。但这种现代的民族观念，要使其在印度普遍

存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高于一切，则尚须一段时间……^①。

还有一方面也足以表示印度人民的民族观念不够浓烈。我们对印度政府究竟建筑在何处，一加考察，即发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既非建筑于条约之上，亦非建筑于被统治者之同意之上，而实建筑于一支小小的军队上。但这支为印度政府权力的后盾的军队（广义地说，英国的军力也应包括在内），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印人。这些印度兵和印度政府的关系，仅仅是一种雇佣关系，而使这种关系存在的因素仅仅是饷给的支付。世人若问这些印度军队里的印度兵，何不发生叛变，以响应他们的同胞从事推翻英人的统治，则未免所望太奢，盖在英人的严密的组织及严密的管理下，叛变诚非易事。但我们至少可以发问，何以这些印度兵仅仅为了微细的饷给，即愿供英人驱使，而不一思他们祖国的前途？60年前，西徕即已看到此点，他说：“我们用以征服印度的军队，其中五分之四均为印人，过去我们所以能雇用他们以作征印之用，即因当时在印度并无民族观念。假如一旦印人有一种共同的民族感觉——即使仅仅觉得帮助英人维持其在印度的统治为一种羞耻——从那时候起，我们的帝国即将停止存在。”印度政府增加兵源所用的制度，以征募为主，并无威胁情事，则何以印人中之愿为英国效犬马之劳者，仍不乏其人？民族意识似尚未渗入印度的军队，我们似亦未尝闻有印度兵士参加印度民族运动之事之发生。

（四）民族主义尚未深入

民族主义在印度诚然尚未深入，但仅有民族意识并不能推翻外族的统治。我们既不信暗杀或地方性的暴动可以驱逐外敌，我们自亦不信依靠演说或宣传可以获得独立。民族意识以及民族意识的宣传，在整个的独立运动行进中，诚为切要，但单单有民族的意识以及因不断的宣传而使这种意识深入人心，并不就可以获得“独立”，获取独立，尚须依赖其他的途径。我们检视20余年来印人对英争斗所用的手段，不出乎甘地所

^① 此处文字有删节。——编者注

主张的“非暴力”。非暴力的反抗手段，在印度曾经发动相当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尚不足使印人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复国是一个积极的目标，“和平抵抗”是一种消极的方法；欲以消极的方法来争取积极的目标，其事殊难。当我们披读甘地自传时，我们很容易发生两种彼此不调和的感情：我们一方面对甘地的理想，信念，精神与苦行，不胜敬仰，一方面我们对他的见解，觉得与现实的世界格格不入。甘地企图使人类从西方的肉欲生活回复到东方的精神生活，这是甘地的伟大，而他身心的洁净，没有一点罪恶，尤使人易受其感应而深自内省。但他咒诅铁路，咒诅律师，咒诅医生，咒诅一切近代文明，他认为近代文明是一种罪恶的文明，因为“这种文明既不注重道德，也不注重宗教”，而“假如印度要抛弃近代文明，她有百利而无一弊”。他将近代文明与英国的统治印度，连成一种因果关系，“若是没有铁路，英国决不能像现在那样的占有印度”。“律师给印度的最大害处，便是他们使英国人的统治，更加牢紧”，“假如只有英国的法官，英国的辩护士，英国的警察，他们便只能治理英国人”。他主张“用自我牺牲以代残暴，用精神的力量以反抗暴力”。他说：“武装的力量一遇到爱的力量或精神的力量时，便毫无用处了。”——这使一个现实的人或者受过科学文明的洗礼的人，很难接受他的观点。甘地的思想侧重于道德与宗教。近代文明容或是一种罪恶的文明，或如甘地所谓“这种文明是反宗教的文明”，但宗教的力量在近代，日趋衰微，而道德亦不是近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水准。从任何一方面看，甘地都可说是一个身心圣洁德行高超的中世纪式的圣教徒；可惜他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与他的灵性相去甚远的时代，而他切身所转入的漩涡也不是宗教的而是一个政治的漩涡。他虽虔信：“武装的力量一遇到爱的力量便毫无用处”，至少在近代的历史里还不易找到充分的佐证。甘地曾经请求希特勒停止侵略，以免生灵涂炭，但是佛兰斯德、北非以及南俄的战场上的厮杀的声音，并不因甘地之一言而即消失，当甘地宣言他将劝告日本自中国撤兵时，举世人除为之“震惊不止”外，无话可说；而这位 70 余岁高龄的甘地先生，他这次自己以自我牺牲的爱的精神，向英抗议，绝食三周（1943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2 日），当他的生命数度濒于垂危，他的家族、友人、信徒以及全世界同情关切他的人都为之忧心如焚时，印督的态度“坚如磐石”，竟毫无所动。

当我们批评甘地在英印斗争里所采用的非暴力政策时，我们并没有忽视甘地所处的一个社会的背景。印度大部分人民都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政治意识的根底，没有受过有组织的训练，他们贫穷，他们没有武器——在这种条件之下，甘地的“非暴力”不仅深合于宗教的观点，抑亦不失为一种可能的方法。甘地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不合作运动所创导的纺纱织布及私自煮盐，是为下层民众最容易接受的道理，而甘地个人的圣洁的心灵，在宗教之国的印度，尤有助于他领导的民众运动。他是深深的信奉印度古老的避免武力伤害的阿西姆沙主义（Ahimsa），同时在印度的环境下，他认为暴力行为徒然糟蹋生命。因此，当我们以印度的社会背景为基础来考察甘地的政策时，我们殆不欲过分菲薄之。但吾人今兹所讨论者是印度的独立问题，印人日夜追求者也是印度的独立，亦即印人所称的“完全独立”，是独立问题不是自治领问题，“独立”既不应使之长成“理想”而希望能有一旦现实，则我们讨论于获取独立的途径时，自不得不出以现实的观点；此著者之所以不欲讨论与印度独立有关之其他事项，而仅欲集中于一个基本问题，即究竟如何印人始能自外族手中夺回其主权？著者衷心认为：“非暴力”并不能使印人获得独立。非暴力的运动，无论其规模发动至如何最大可能的程度，这种运动终其极仍是骚乱有余，成事不足。一切“非暴力的不合作”，“和平抵抗”，或者“和平不服从”，诚然可以增加英国统治印度的困难，使他们在物质上遭受损失，在精神上感到烦恼，但它在英印的斗争里，并不能发生决定性的力量，它并不能迫使英人因这种困难、损失、烦恼而放弃在印度的统治。萨普鲁（Sir Lèi Bahadindr Sapru）曾感慨系之，说在他“40年来的政治生活中，从未见一个印度政府像这样与舆论的主潮隔绝了的”。实则英国政府之对待印人，固不免时硬时软，但在实质上始终一贯，并无任何大的改变。英国政府有时亦颇知以“非暴力”来对付“非暴力”，假如她在必须退让而又可以退让的话，她亦诚能顺从舆论而放弃若干权力，但当“舆论”要求他放弃印度的统治，或印人的行为威胁到了她在印度的根本命脉时，她即毫不迟疑的决定“以警察力量处理一切示威运动，以军队力量镇压一切军事骚动”，而与所谓“舆论的主潮”者，不仅无所顾忌的和它隔绝，且将进而摧毁这个“舆论的主潮”。甘地之受印人的崇拜，受国民大会的拥戴，并不能表示他所创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即可制

英人之死命而登印度于独立。印度民众之所以衷心迷信甘地的“徒手抵抗”，一半因为一种宗教上的虔诚与感召，一半因为印度一般民众的知识比较落后；国民大会之接受甘地的非暴力政策的领导，一半因为保持团结，一半亦因为甘地的资望及号召力量超过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印人，而他这种号召力量仍为国民大会所依赖。我们很公平的承认，过去甘地在印度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它的地位及成就。但著者认为“非暴力抵抗”只能算是一种运动（movement）而不是一种行动（action），他以为这种“非暴力抵抗”只能用之于独立运动初期的宣传阶段，而不适用于独立运动进入于后期的斗争阶段。在独立斗争人于尖锐的时候，著者诚不知消极的徒手抵抗，能奏何效？我们历观史籍，没有一个民族推翻外族的统治，不是经过暴力的阶段的；而武力之为复国的主要凭借，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e）已于400年前先我言之。

当我们以为非暴力抵抗过于消极而难于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时，我们亦未尝不知暴力抵抗之不易。我们在前面将印度与意大利比较时，谓在地理及人口上，前者均较后者占优势；但这种优势在今日因科学发达而不复存在；而且今日印度之争取独立，实远较19世纪中叶意大利争取独立时为艰难。各种科学上的发明与进步，使少数人得以控制多数人，长距离也变成了短距离，而军事科学之一日千里，使白刃与步枪的地位，竟退至与徒手无异。科学的进步不仅限于纯军事的器械与弹药，他如交通的迅速，情报的敏捷，宣传的操纵，组织的严密，亦无一不是科学发达的结果。世界的面目已在科学的进步之下丕然一变，而在这种新的世界里，一个各方面都落后的民族，欲用暴力推翻一个先进的外族的统治，较之100年前，实困难万倍。但著者的观念，科学与组织既为西方征服东方的真正武器，如欲推翻这种征服，亦惟有运用科学与组织。民族意识对于一个弱小国家诚为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但著者很怀疑单单只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而无有枪、炮、弹药、汽车、汽油、飞机、火车等以及一切科学方法的组织与训练，即能将敌人逐出国境。我们不敢使自己相信无组织的投掷石子可以战胜有组织的实弹射击，宗教的仁爱心可以战胜科学的杀人利器。这不是理论问题，乃是事实问题。印度政府既非建立于条约之上，亦非建立于人民的同意之上，她建立于武力之上，但当印人奔走呼吁，呼吁不听，绝食感化，感化不应，印人除被迫诉之

于武力外，究有何法？这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事实问题。著者未尝不知，执持此种观点之易招批评，因当代思潮正力主运用理性以解于国际纠纷，诉诸暴力之说，自非吾人所应赞和。但以谈判方式，运用理性以解决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纠纷，此须双方处于平等之地位，始能为之。印度与英国在国际社会间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此其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其本身即非建立于理性的谈判之上者，此其二；印人过去亦曾一再诉诸理性，和平要求，而终一无效果，此其三；而且即在平等地位的国际关系中，当外交谈判行不通时，最终亦仍不得不诉诸武力，如此次联合国国家之向黠武的轴心国家宣战是；故著者明知其所抱持之观点，易受评论，而仍不拟稍移其信念。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虽然在印度成为了一种反抗英人的政治武器，实则他的精神还是源自宗教上的自我牺牲，而当我们将论及甘地，与其誉之为一个政治家，亦无宁敬之为一个圣教徒。在民族的斗争中，科学的精神远较宗教的精神为重要，科学的效力大而且速。著者很明白：一个落后的民族要凭借暴力推翻外族的统治，实是一件艰困逾常的工作，但这一条道路恐怕是无法避免的。

(五) 印度终会得独立

我们至此可以作一结束。印度是终会得独立的，因为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已成为当代国际思想中的主潮，而印人之献身于复国的工作，亦殊有视死如归的气概。但著者以为印度的独立，在短时期内，或者说至少在 20 年内，尚难实现。英国是不肯放弃印度的。只有在一种情形下，英国将容任印度拒绝其统治，即因战争的失败而使不列颠帝国溃散到无力再统治印度，在那时，英国将被迫放弃印度。我们相信，假如轴心国家在此次大战中得到胜利，则印度将在那时脱离英国的统治；虽然脱离英国的统治与获得独立自由，并非一事。但德意的败象，1942 年后起，即日益显著，英国在此次战争中，将处于胜利的一方，殆无可疑。下次大战在何时何地以及在何种情形之下发生，若非愚妄，无人遽敢预言，但我们出以常识的判断，至少在 20 年内，似乎不致再发生世界大战。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毁灭，使无论战胜国战败国都需要长期的

休养，英苏两国所缔的战后 20 年政治协定，至少也可解释为两国都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所丧失的元气，须经 20 年始能恢复。美国的外交政策自可因总统之更迭而改变，人类历史上诚然充满了许多未之前料的变化，但在短短的 20 年时间内，美国当无理由会得变到可以援助印度独立，一如在北美独立时法国所给予美国之援助的程度。英苏的战后政治协定可以限制苏联在 20 年内不过问英印关系，而中国于战后。政治上轨道，亦至少经 20 年的惨淡经营，始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所以至少在 20 年内，英帝国无崩溃的机会，而在外交上印人亦尚不能得到有实效的援助。至于印人本身的力量，我们亦难望其在短短的岁月中能发展到任何足以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权的程度。印人要达到光复祖国的自由，尚须经过一段漫长的苦斗；《英人撤离印度案》之通过，并不是印度民族运动的一个顶点，恐仅为真正独立斗争的一个开始。

1943 年 3 月 24 日脱稿

(桂林科学书店 1943 年版)

第七章

散 文

一、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

作人先生在《语丝》4卷3期上，刊登了一篇《花束序》，中有涉及“睡庙”的事，同乡人潘达仁君，因即写了《关于“睡庙求医”》一稿，刊在4卷8期的《语丝》上。潘君说：野五圣——即五通神。在我们家乡，宜兴，只称为五圣！有称为野獼孙者，误也。——之被周将军捉到，是在人家的花轿面前的。周将军捉到后，便将它们装在瓮里，将瓮投入塘池，任水流去。而且潘君说：所捉到的只有两个。……以上种种，和我所听闻的传说都不同。我所听闻的，现在便写在左面（下面）：

据说：周将军幼时，非常顽皮。当私塾里放了夜学以后，他老同着许多小朋友在城外的旷野地方游玩。在旷野的地方，是很有许多五圣的庙的。五圣的庙，并不高，大约只有我们的胸膛一般高吧。周将军常喜欢爬在五圣的庙的顶上小便，有的五圣的庙的旁边还有着香炉之类，于是，周将军遇着要大便的时候，五圣庙的香炉，便做了周将军的临时盛粪器了。在五圣，并不是不怒，但周将军是一个正人，正能克邪，邪自不敌，所以虽怒，怒而不敢有所表示。但日长月久后，周将军将香炉当为粪器，成了习惯了！在五圣方面，也似乎不能再忍，它们终于托梦给周将军的老师。老师知道后，当然是要大怒的。因为在那时，自己有了这种弟子，简直是羞耻，所以在第二天上，周将军便受了严重的责打，而使周将军衔恨五圣的程度，也愈深了。他在暗地里，曾在一张红纸条上写了“逐出铜山三千里”七个字，但因为没有什么机会而没有烧掉。

在那天的夜里，周将军的老师又做了一个梦。梦里梦见五圣都跪在地上求他。告诉他周将军要将它们逐出铜山三千里的话。它们都很悲哀

恳切地求周将军的老师解救，而周将军的老师终于答应了它们。

在第二天的早上，周将军的老师在周将军的桌上的书堆里，果然发现了一张红签条，上面写着这样七个字，但他立刻又想到假若将这条撕去而周将军是仍可以再写一张的，不妥。他想还是将三千两个字改为三十两个字妥得多。果然，周将军忽略了过去，当他的老师在假装午睡的当儿，匆匆焚化了。而在那一天的晚上，周将军的老师又梦着五圣们来谢他；自此以后，宜兴城周的30里之内，便永久没有它们的影踪了。

周将军在他的家乡，宜兴，建的功业非常之大。他在宜兴南门外的铜山，曾射死了一只当时山麓住民所引为大患的白额虎；在宜兴城里，又斩死了一条蛟——现在宜兴城里有顶蛟桥，桥长而高，因又称长桥，桥上有店铺凡数十家；而蛟桥夜月，也成了阳羨十景之一。他死后，邑人念其恩，因在城内东庙巷里，建筑了一座周将军庙。庙身甚大，但年来失修，所以日见衰败了，但香火还盛。香火之来，泰半来自外埠。因为外埠人被五圣所缠的，便常到周将军庙里来烧香。假若烧香而犹无效，那便非被缠者亲自睡到周将军庙里来不可了。据说经五圣缠了不论有几月半载之久的，只要在周将军庙里，睡上几天，病势便可日见渐减的。要是日子睡得稍多一些，被缠者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也将不再被缠了。

因为宜兴没有五圣，所以宜兴人也很少被五圣缠过，但对于这个故事，大都倒是晓得的。

1928年之春

(原载《语丝》第4卷第18期，1928年4月30日出版)

二、布洛克及其名作——《十二个》

俄国文学之长生，可以说，比任何一国都后都迟。因为在实际上，她只是在19世纪，才渐渐茂发，然而仅在这一个世纪里，她却射出了不少光辉，可以说，她已发展到了灿烂绝顶的时代了。1917年的10月，俄国起了空前的大革命，一切资本家，皇室，贵族，地主，都已消灭；无产阶级的民众，已做了新俄罗斯的主人。文学是根据于社会生活的，所以资产阶级的俄罗斯文学，因也便随了资产阶级的俄罗斯而齐灭。资产阶级的俄罗斯文学家，自然无能立足，因都逃到了国外，或者隐避在国内；许多新的作家，和无产阶级文学，就在此登了台。而她所给与世界文坛的波动，竟还要重要而深刻。各国的文坛，受了她的影响，都将以无产阶级文学为依归，而有唯新俄罗斯文学是瞻的趋况，真合上了“Last shall be first”一句，以中国的成语讲来，便是“后来居上”的意思。

在十月革命的一个时期中的俄罗斯文学是很有趣的。一般资产阶级的文学家，都逃到了国外。然而他们的所以要逃，并不是因为新俄罗斯政府的关系，因为新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在驱逐他们，取缔他们，抑或在苛待他们。他们之所以要侨寓到国外，可说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主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平日所歌咏的对象——美丽的，可爱的，婀娜的，诗意的……一切一切，都已被扫荡了个干净。他们将再没有他们歌咏的余地，他们失去了他们歌咏的主质，于是，他们将不能再顿存在他们所认为枯寂的，败坏的俄罗斯，于是，他们去找寻他们的繁华的，辉煌的，富于肉的美的巴黎，伦敦去了。然而也有一部分是仍留在俄罗斯的，他们或许也还想鼓起他们的热血，然而在实际上，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的灵感，

终于是不可能的了。

旧俄罗斯的作家中而接受十月革命的，只有倍莱 (Andrey Bely)，沙莱费莫费基 (Serafimovieh)，格罗特斯基 (Gorodetsky)，布留梭甫 (Valeri Bryusoe)，和本文所要讲的亚历山大布洛克 (Alexander Block 1880—1921) 等。其中尤以布洛克为最伟大。他是维系旧俄罗斯和新俄罗斯的一个枢纽。他是这时期中的最伟大的诗人，是 19 世纪末叶最有文学天才的一个，而在俄国，也被称为普希金的后继者中的一个最健者的。在技巧上，他或者不如 Iranov 和 Sologub，但他的诗风，是和 19 世纪初叶的伟大的罗曼谛克诗人相同的。他和 Shelley 及 Lermantov 一样，天赐的才智，鼓舞起了他们的灿烂的生命。他的天才，并不是表面的，而是含蓄在他的心灵上的。他的灵感，并不像唯美派诗人般虚渺，而是比较平实些的。他的特质是环境之认识及真理之想象。他的诗歌是罗曼谛克，神秘，幻虚，幽奥，和没有一定的规律，但都是含有深意而有他真实的生命的。他早年的诗是，有如水晶般透明，霞雾般迷眼，这些都是幻想所造成的。但自 1905 年起，则他的诗，将不再如他以前的一般温柔，而很有像 Heine 的了。——一个连接的不和音，在事实和理想之间表现了出来。他是比他早年的诗来得有力些，写实些。整个的生命，是已钻进了他的意识的园地，激烈的热望，幽奥的情感，和苛刻的讥诮，都成了他的诗的主格。他并将狂暴的呼喊和没有规律的诗歌，反映到他的环境，时代，及对照到他的生活，习惯，和生命之节奏。他的诗以克大成，于以上的几点，是很有关系的。

布洛克虽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并不曾讲过纯文艺，文学是超一切的。他也不曾将他的诗超出了实生活，他是的确确实承认：“艺术，人生，及政治，是绝对不能分开的。”而在 1919 年，他在他的 Retaliation 的序里说：“我将将我所见的许多的，各种的，一切的……都埋藏在我的心田里，而使他融合在一个声调里。”这是多么伟大呵，比一个个人主义的文学家，或一个以为艺术是超出实生活的艺术家！

1905 年第一次的革命，已钻进而且捣动了他的心灵。他在这个时候，便就从个人主义文学的国里，跑了出来。他的文名之升展，是因为他的诗，已超脱了已往的抒情诗般的雾气。的确，他自 1905 年起，以后，他的诗不再似以往般温柔，幻虚了。这点上面已说过，所以现在不

再重复。至于第二次的革命，则更给他不少活泼而有意义的思想。他在那时，他便毁灭了他以前的笨而无用的文学与生命。他认识了革命，革命的风雨将来的时候，那种伟大的必然性，已将布洛克的心灵，荡震了起来。他看见了俄罗斯的热烈的，活泼的灵魂，他便在那种感动之中，他写成了他唯一的伟大的工作——《十二个》（*The Twelve*）。

所谓《十二个》，便是指十二个红军的兵士。布洛克将他们比为引导被压迫的人类走到正义之路的天使，但在别人看来，则他们是有如残忍的刽子手，可怕的恶魔，神圣的破坏者，无恶不作的匪盗。人类是永远地幻想正义，希求正义之实现。——那十二个红军，为要实现正义，于是他们都一个个，鼓着全身的勇气，在血路上前进，而即由手执红旗的耶稣，作为前导，可说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象征。

《十二个》里所用的音阶的至上之主权，是超过了本来的范围。不但如此，并且也越出了语言的伦理上的元素。她所用的字句，则很有些是引用街头的俗语的。抒情的和写实的融解在一起，而使这诗成了无上唯一的伟大的；在这无上唯一的伟大的地位上的《十二个》，不但光荣了她的作者，布洛克自己，并且也光荣了那个时代。

然而《十二个》并不是一首革命诗，只是一首抒情诗，叙事诗，甚且可以说只是个人主义文学国里的天鹅啼鸣，而想飞到革命的一边去的。自然，布洛克的虚幻的歌咏，将成了他的过去，而且也不能再生；而《十二个》则将遗留下了她的忧愁的情绪，睡在雪里的 Katka 革命的过程，及有如生着癣疥的人的旧世界。

《十二个》是已死的过去的失望之哀歌，而同时，也可以说，是未来的希望的失望之呼声。她的精神上，确是反革命的，但她和革命的要素，则接触得厉害。暴动的事实打动了布洛克的心灵，于是他自己说：“——一切你所写及现在的，将都不能存在。因为一个新的时代，便有一群新的民众，他们带来了新的灵感，他们已不需要旧的，他们克服旧世界，便有如征服你一样。你的诗，不过是你在临死之前，所呼喊几声关于旧世界的痛苦而已。”而布洛克正也因为这是难于领会而他竟能领会了，因为他有充分的革命信仰心，因为他自己要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以及因为他要极力表白他对于革命的信仰心，于是，于是，《十二个》便产生了。

在十月革命的一个时期里，收获最充满的，便是布洛克，他的作品出版得顶多。《十二个》是1918年出的，《长短句》在1919年，1920年则有两本，便是《过去之日的那边》和《灰色的早晨》。剧曲则有《运命之歌》，《加蒂里纳》和《拉姆在里》等，其余如论文翻译，犹不在内。而在这许多作品之中，以最强烈的刺激给与俄国诗坛的，便是这《十二个》。

布洛克写了《十二个》以后，当时很有些作家在咒骂他，因为他们和他，是背道而驰了。他们怨恨他，直爽些，还是说忌妒好，到了极点，他们誓不再和他握手，甚至或竟将他看成一个奸贼。他们一直和他为难，直至他死后。他们要想破坏《十二个》，说《十二个》并不是属于新布洛克和新俄罗斯的，而是仍属于旧世界的。《十二个》所歌咏的对象，都是过去的，布洛克并没有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在《十二个》里，是充满着顶韵和音律……总之，他们是想捣乱他，毁坏他，但是，他们究竟是失了威权的一小部分，他们只是这般狂喊，而人也便让他们这般狂喊，终于没有谁来理他们。

当时俄国，是有许多文章专门来论到《十二个》的，而中当以 E-ichenvald 的态度，最不光明。——红军杀了 Katka，是因为猜忌，这是可以不可以的呢？这完全是应当的，但这红军，又被法官所枪毙！革命是充满着恐怖，革命是少不了要经过破坏之路程的。1918年之初，革命当局给与反动派以死刑；他是常带着残忍的面庞而奋斗，而向前的。——诚然，布洛克的《十二个》里，常不免要带了一些讽刺的意味，但是说他在诽谤革命，则确未免言之过甚了。

裘可夫斯基 (Chukovsky) 所论到《十二个》的，最为奇突。他的 ABCok about Alexander Block，并不见会比他别的作品下劣些。他启示了一个表面上的轻快，并不深刻的印象，一个粗简的剖解，一个有如没有什么学问的大言者，及一个仅在字面上用功夫的人。他常常说：“除了他以外，没有旁的人了。有谁会想到《十二个》好比是着革命诗？天哪！”但他晓得了，于是他立刻解释个明白。“这儿是一个强顽而难治的国家，及一个国家思想，她什么都不见缺乏，但她只是有了些神秘的丑陋——丑陋的俄罗斯！”然而，布洛克竟接受了俄罗斯，丑陋的俄罗斯了，因为他自己是个俄罗斯人，这个丑陋的俄罗斯人啊！

布洛克的爱国心，可说是非常浓厚的。自1908年至1916年之间，布洛克写了许多好诗，而这些好诗，便都是他的一片爱国心所造成的。

布洛克不但接受了俄罗斯，并且也接受了革命。他的《十二个》不是在歌咏俄罗斯能革命，乃是在歌咏革命之本身。但是，此地所谓的革命，是另一个革命，一个轰轰烈烈的。这另一个革命，裘可夫斯基晓得很详细，不久，他也许就要宣布出来。

Katka之被刺，不过是革命中偶然之一幕，而并非是属于革命之本身的。布洛克解释他自己的诗说：“这一点，我也领会得。在这儿，我听见了革命之能力，和暴动之音乐。”但谁也不明白布洛克讲这句话的因头，现在，来了一个代他剖解的裘可夫斯基来剖白他——Katka之被刺，是革命之差，布洛克以为。

但是，倘使这次的革命之于布洛克，是俄罗斯本身，正如她是，那么什么叫“Orator”呢？谁又视革命为谋叛？有如患着癣疥的人的旧俄罗斯又当作何解呢？Denikin, Milinkov, Chernov, 及 émigres 等，又是什么意思呢？俄罗斯爆裂了一半，便是这次的革命，布洛克称为半个癣疥，其余半个，他便在他自己的幸福里享福，意即他写他的作品。但裘可夫斯基则宣布，这些，纯是偏见，误会云。——

什么是夸大狂？思想上的不合？道德上的沦亡？讲话的贱卑？羞耻的乱说？——

自然，布洛克不是俄罗斯独个的，但他是倾向于俄罗斯，效忠于俄罗斯。他在这个时代，是占有重要之地位，他的《十二个》将随革命以永存。

——1928年之春，某日下午

（原载《北新》第2卷第13号，1928年5月16日出版）

三、偶感即记四则^①

1928年的文艺出版界，显呈着异常热闹。单行本的出版，在量的方面，和以往有可惊的比例，而刊物的问世，更蓬勃得有劲。这种蓬勃，热闹，给与我们的乐观或悲观，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所写的仅是一些杂感，虽则这和1928年没十分关系，但乘这种热闹，于作者是会感觉到兴趣的。

(一)

将文学分成实践的和理论的，而后者又在前者之先；实践的有如火车，理论的正如轨道；没有轨道，火车势将趋入歧途。文艺者应该先清了他们的理论，正确了他们的主张，后去努力于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工作：——

革命文学的巨潮，冲进了整个的文艺的园地。充拥了时代色彩的创作，占满了新兴杂志的篇幅和许多书店的书柜。但与理论方面的文章，却很感到欠缺；散见于杂志上的也未尝没有，但总觉太局部，太片断，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整个的，系统的，竟没有！就是所仅有的几本单行本，也只是一种旧作的凑集和短篇的汇齐，这实在是可以引为憾事的一件事！

^① 标题写的是四则，但实际上只有三则。——编者注

(二)

装订的艺术与否，不一定只限于销路之大小方面讲。就是对于那一本书或杂志的本身，也是有关系的。但有一向，我曾经看见有许多书或杂志，只愿在量的一方面好看（质的方面如何当然是另一问题）。“天”“地”和“两边”，剩了许多空白，这实在是最不经济的，尤其在读者。因为要是排得经济一些，则本来要排印 100page 的稿子，现在 60 或 70 个 page 已可排下，则这本书或杂志的定价，不是可以照比例地减少了不少，而在读者方面，所读到的在量的方面，仍没有吃亏，不是较经济得多吗？

(三)

中国文坛在中国社会上，老实说，也只有一部分人——爱好文艺和努力文艺的——加以爱护，宽泛地说是注意。但这与无产阶级文学却是生了关系的。因为有人要说：无产阶级文学是在谋促进和激鞭无产阶级的醒悟和奋斗及写出他们的苦闷和痛苦，然而无产阶级却并不接受你这份礼物和拜谢你这种好意，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同时也不能感受你这无产阶级文学，关于这一点，实在是谬误的。因为大多数人（当然是指无产者）的不能接受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是否应该属于全民众的是两件事。中国因为社会教育的不普及，大多数人是这般的幼稚，但他们的不能感受无产阶级文学，其责任乃显然是在他们一方面。我们只可以设法提交他们的知识程度，而决不能因此就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的，或竟将文学来低就他们，因为在进化的原理上，是决不可以高就低的。

（原载《开明》第 1 卷第 9 号，1929 年 3 月 10 日出版）

四、平凡的故事

这故事，我预备写给诸君知道的，实是非常平凡而又渺小的一件。是发生在一座宿舍的一间 Room 里。自然。诸君不必要怎样详细地知道关于这座宿舍的一切，只要明白这宿舍的房间，每间预备安置六个人，而也只会安置六个人的就足够。在平时，因为这个关系，住在这宿舍里的人，颇觉得太挤，虽则仍是很太平的大家住下。但这半年，总之因了另个关系，在事实上，有每间少住一个人的可能。不过，住在里面的人，自然又会感到，像这种房间，只可以住四个或三个人；实在，住四个人已觉不宽舒了的。

发生这件故事的一间 Room 是几楼几号，这些，连作者都十分渺然。作者只知道这间房间里，最先搬进来的是甲和乙。隔了一天来了丙。自此，一礼拜后，丁才到定房间的地方去说明自己也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丁之所以也住在这间房间里，自然是因了甲乙丙的怂恿，以及自己的愿意。因为他们都是老的学员，算有一丝丝交情。加之彼此的嗜好又仿佛。用膳则在一桌，散步时也难得看见只有三个人——是颇可见他们的和谐。就在他们各自己，也未始不感到这天赐的恩惠，要是从中插一个性癖不相仿佛的人，他们在以往是感到何等的不便和勉强。在乙常想，将来的家庭能有如此和谐，则这一生要算有了天大般幸福，快乐。人的凑拢是从未有像这次般巧。这四个人，几乎彼此再也寻不出别人能使自己有不满意的地方了。他们四人，这样地住下有 10 天。

甲从丁搬进来了之后，就颇有就此四人占有这间 Room 的意识。虽则乙曾说过这也许不会的。因为乙知道这个房间，在甲和自己去定之前，

还早有个戊。戊是新来的学员，据说正向当路告着病假。但这些，在其余的三人是不明白。也许朦胧地明白得一点。甲做着这个梦；这个梦，在乙丙丁，是非仅未始不赞成，并且仿佛也有些希望它能够实现似的。在第九天，他们很齐心。并且处处牺牲着自己的意见，将房间的布置，全合上了四人所同意的图案。这图案，自然较为新颖而又满含着艺术的风味。一切都显出有精神，有条理，而避去杂乱，灰黯。当他们在晚上，临睡时，说起彼此的难能，是怎般愉快，欣乐？并且还带着一些庆祝这小成功的意味。当然，他们是不会料到明天饭后，当他们从花园里散步了回来的时候，会在房门口发现多出一只皮箱和一个铺盖的。

这多出的一只皮箱和一个铺盖，是老实地表示出还有一个人的要搬入。这，在甲是要感到非常的不乐意的。他微微有些怒了。他以为这新来的，必定不懂得什么叫人，因为若是懂得的话，他先就不会再将自己的行李搬进这个房间来。他当想，人规划得好好的，预备宽舒地，愉快地享乐着，将会让你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插足？然而和连这一点都不懂得的人住在一起，则前途将要变成如何的悲惨。他立意不该让什么没有十分了不得的关系的人再搬进来。虽则不久，甲又觉得，这新来的学员，因感到彼此的不和洽难堪，而也许会自动地搬走的。

为了这个想象的说明，他们都非常容易地集中在一条线上了。他们自然还不知道关于戊的一切，但在他们的感觉里，仿佛总有这样一个确断的意念——这准是使人觉得可厌的，憎恶的东西——无可置疑地潜存着。那时戊的床，已从侍役手里搬进了房，且将铺盖放开了，当他们全不在房间时。床自然只能塞在近房门口的角角里，正好比一条狗在人家的大门角角里，安置下了一个乱草的窠一样；然而还要使人感到一点碍眼。桌子是还没搬进房，实在，房里也再没有能给他安置一张桌子的空位。四个先进来的早将地位分配得干净。桌子当然不会放在路口，以致使人家行路都不便的。但这种宽裕的割据，究竟使人有借口的可能。他们将尽量地计划怎样能使彼此的地位更充实一些。甲从一个认识的朋友处，借到一张较他自己的要大三分之一的桌子，他们立刻，仿佛世间再没有能像如此齐心的事，使甲的桌位换了个局面。同时，各自又设法将木凳换上藤的有背椅子，以及再借到两架书架……等等，实际上，几乎连椅子都再不能多放一张了的。而他们的心，于是感到镇定，就仿佛几

个军事家底布防的筹置，完全告成，专等着接触的开始似的。他们议论了许多关于策略方面的问题。第一，自然是——他们将绝对的不能让自己已占有的地盘，来容纳一个虽则是同级的新的学员。他们不睬他，如他进来的话。他们要显出彼此的非凡的和谐，就如不知旁边还有一个被排斥的人一样。……这样，这样，以便引起一种正中下怀的反应。

在这不平常的空气里，他们当然再不会看书，做事，以及出去散步。心中虽潜伏着一种未来的胜利的把握，但究竟觉得事情还挂在空中，飘荡着的。然而戊还不进来，而在他们，是要感到如何的不耐烦呢？似乎就到要发狂的地步了。他们只能极力耐静着，再思索一些，利用这个空闲，再思索一些更有效力的策略。

现在，戊的脸影，在他们的一瞥中，已给他们留下了一丝很淡薄的想象的能力了。他的两颗眼珠，实在，是多么惨黝呢？一副脸的神气，轮廓，似乎完全被一种忧郁的，怅惘的空气所包围。他的心，就好像一只小鸟飞到了一个海洋中，在漫漫的长夜里，只是感到渺茫，虚幻，恐惧。那几张不认识而带些可怕的面孔，似乎永在向他进攻着。他看出房里的布置，和他第一次，他们不在时，搬行李进来的时候，有着不同，这显然是一种残酷的表示，这使他要感到如何的恐惧，悲哀。他默想着，如何如何，则自己的桌子准可勉强安置下来。然而，可怕的面形，永使他感到疑惧。他几乎如鹰眼之下的一只小鸡，忐忑地，悲哀地紊乱着，不知所措。他想舒泄出一些微弱的呼声，然而一种重压的空气使他不能呼吸。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注意他，给他同情。他们只管自己在照样的谈笑。他曾有好几次想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可怜的，微弱的恳求说出，但他不知要向谁开口，而如其遭了对手的蔑视，摈弃，则自己更将沉落到如何不可测料的悲哀的深渊里。他只能无聊地，几乎是没有知觉地，轻轻走着。视线是不自觉地移到天花板，墙壁，电灯，房门……而他感到它们是同样的残酷。他不敢有意地向那任何一张可怕的脸，施以一瞥，因为如其恰巧彼此的视线一接触，则使自己更要感到多么不安，苦痛。他当时是很无端的在自己床上坐下了。这般草乱的一张铺，在他自己是不会感到的。他的思潮汹涌得比海里的水浪还激湍，然而没有集中，而也仿佛这汹涌着的思潮是在别人的脑海里一样。他当时感觉到的只是一些空虚，凄迷，感伤，灰黯……似乎一切不幸的，可怕的，悲惨的……

都向着他攻击。他委实是只能将自己留在一种渺茫的，怅惘的，恐惧的幻象里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呢，他们是竭力想在一种紧张的空气里表示出自己的镇静，自然。谈话是照旧的谈，但是显然有做作。而也常常转到沉默。他们实是很留神地等候着对手的进攻。他们有意地装出一种若无其事的神情，然而却又常拣着机会将自己的眼角，闪电般从书本移到戊的身上。他们都以不相干，第三者的冷静的态度观察着他，自然，这准是觉得非常冷淡，平常的。尤其是甲，仿佛这一切全是戊自己的责任。他想，如其还不搬走，则戊将愈不堪收拾了。他当然不知什么叫残酷，他只觉得这一切似乎都应该如此做的；正如一个兵士将敌人中了一弹时，自己并不感到一丝丝痛苦，心上是依然的平淡而毫无感触的一样。

房间里现出了异样的阴沉和郁闷。然而这长久的沉闷，使乙渐感到一种深刻的，莫可名状的怅惘的情调了。战争，原始人，外国人，慈善，道德，动物……一切都闪进了他的思潮。他开始感到人生的悲哀……那可伶的懦弱的面孔，渐渐，渐渐地扩大，将他的一切官能都填塞了……他忘了他自己还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有着书。他好似自己已漂流到一个荒岛上般，四周只是一些麻木的草木，岩石，狂风，流水……而无所谓人群底援助，同情，正义……这使他感到非凡的凄迷，悲伤，虚幻……而渐渐地，渐渐地缩小起来，那可伶的面孔，又……他忽感到有一种放弃不可收拾的热情要喷冒出来，他两眼蓄着深沉的忧郁的同情，凝视着那仿佛是一切弱者底象征的可伶的面孔，惘然有力地带着一些狂暴和恐怖的意味，喊了一声“戊君”。

然而这一声非凡的暴怒似的狂喊，将使戊要感到如何的惊骇，疑惧呢？他不知怎样才能——也许是不敢贸然地——凑出一个确定的答语。他像受了催眠似的走到了乙的面前，而沉默地，恐惧地望着乙；就如一个犯罪的人，恐惧地颤栗地望着法庭上的裁判官一样。他的喉咙，则好比是一只老式的汽水瓶的瓶口了，一粒圆球，塞着瓶口，任你瓶里的气是多么汹涌着；他不知要说些什么，能说什么，应当说些什么，在当时。自然，乙是明白的。他问戊“为了病吗”，也不过是一剂顺脉的药。戊定这房间比自己早得多，然而——“一个人总没有用！……单一个人，何况又是弱者呢？……一样，一样，什么地方都是，在这个时代的！”

……一样……总是要被征服，侮辱，压迫！……”——他是不免要冒出一丝牢骚的。但这和戊说是冤枉，仿佛和一切人说都冤枉；只有自己体会得，体会得……他当时的视线，在房间里的四周，不住地旅行着，似乎什么地方都可以安置戊底桌子，他感到。但一种莫名的束缚，使他还只能沉默。长久之后，是才说出“这儿好吗？我自己的再拉进些”的一句的。

戊点了点头。实在，当时他已不知道什么叫感激或仇恨，同情或残酷了。然而一种轻舒，安定……他是感到的。他就想到门房里，将自己的桌子搬进房来。当然，他意思是不愿再扰乱乙，然而乙终于原谅了他这个渺小。

而现在，房间里是分外的沉默了。他们只得彼此相视着。一种惘然的情绪，渐渐地闯进了丙丁的意识里，而甲是恍惚感到一切的岂有此理般，如一个疯狂了的人，立了起来，无目的地骂着“妈的”……这样，直到乙戊将桌子抬进了房时。

1929年4月4日 上海

(原载《北新》第3卷，第17号，1929年9月16日出版)

五、口 供

可爱的——桃妹姑娘：

……

如其你能够破费去你一些些宝贵的光阴，且也愿意来听一听这样脆弱的一种呼声，即使在你不过算它是一件消闲的事的话，而我也就要直捷地告诉你：那个可怜的人，许你现在早记不起是谁了，至今还依旧被囚在那某两种力所冲突而生出的一种摆脱不了的苦闷的情绪里哩！

事实是常给他以一种有力的暗示，这暗示，仿佛又满含了悲哀的气味；其实，在这封建思想的社会制度还没崩溃之前，谁又能担保说他自己的梦幻没有破灭的危险？而且，现在一般所谓新的女子，委实是不易使人贸然就能信任她们会完全脱去那积毒的熏染呢？所以，在平时，只要一想到青春的幻灭，谁的心中，都会不自觉地迸出一种凄怅的情调；虽则在我，你可爱的姑娘，看来还如一个鲜艳的太阳，只是隐约在晦暗的云雾里一样。

青春，呵，这是多美的，醉的，骄傲的一个名字哟！人满了 19，他的心，准还木然，正如一个孩儿，在他玩得正浓的当口，他将决不会心静地想到那不可挽救的悲哀要接着来到的，他每日还只是不住地在体味着那天赐的珍礼，享受着那无邪的生活。他对于那种珍贵的生活的末日的将到，感受不到一丝丝反映而生出难堪的预感。可是，只要一岁的增加，当你在寂静的国度里，自己体味着，今年已经 20 岁了，这样一句时，你创碎的心灵上，又将要织出多凄枪的一幅图画？！已经，20 岁了！这又内含着多深沉的悲痛？！……如其连 20 都上了历史，则人的一生，

便完全消失了一层可贵的轻纱；正如一只可爱的苹果，失去了她那淡绿浅红的果皮一样了。然而时间虽残酷地给人以无情地催迫，而环境终不由人有献呈他热情的机会。何况，现代的社会，只是一个特殊的怪物，它不懂得什么是真诚的同情和真诚的爱；现代的爱底特质，只是一些虚假，奴性，条件，游戏……而已呢？所以，我年纪虽然满了20，而终还没有一个我愿爱她的少女，来接受过我的热情！

然而这，我并不是说自己从没有给女人爱上过是很明显的。我也会有一位学问，性情，姿貌都很美好的小姐爱上了我过；虽则我她之间，终如有一道墙壁长着似的：我不会有一次给那位小姐以一些安慰，一些细腻的熨贴。这至今我还感到是过分的残酷。自己真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值得小姐们来爱我呢？只可怜那位小姐的周遭，将寻不出一个比我更年轻，更生动的异性，但结局是多么的不幸啊——她无力反抗地扮饰了一幕小小悲剧中的主角。我心至今还歉然，但又有什么法子换回呢？姑娘！事实已是事实，正如我和你一样，要硬当它没有这回事，终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相识的最初，当已超出了记忆的可能。但能在我心头上留下了一丝淡糊的印象的，怕也早是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春苞在你的心头还未冒芽，那永不见静止的漆黑的辫梢在动荡着，活衬出你还只是个天真的小孩。你见着你的友伴，老是喜笑着，揪着人伴你玩球玩毽子，向也就被人推许为一队的热闹的灵魂的。……不过我当时虽也觉得这个小姑娘满可爱，但自己当时的心，却已被另一个人占有了。而这另一个人，可爱的姑娘，我若告诉你——又哪敢打趣呢——你准会非凡的惊异罢；然而你现在，别人又岂能一定会晓得我们的这一些关系？——啊，可爱的姑娘，当时你的梅姊，是多么令人心醉，我是何等为她颠倒着啊，正如现在的你，现在的我底对你是一样。……她的一双生动的眼波，将使一个女性仇恨者见了，也会觉得可爱，永是可爱的。但社会的监视，永离不开年轻人的周遭。她那种美妙的传情，只能使我的内心，感到分外的狂烈。在白热的电光底下，含情地播弄着辫梢，一种半自怜着的神气，将使一个正在梦求着异性的安慰的青年，怎样再能去维持他自己底理智啊！……然而造物只是一个专司玩弄人类的恶魔，在事后，我所得到的，又是一些什么呢？我会在一个夜深，踉跄地跑出了寓所，为的是想也许

会因某个机会得见她一面；虽则过后不久，自己也就发觉到当时的可笑，可笑这种心里的态度。……唉，可爱的姑娘，我心引憾，今犹未已，可不知你那梅姊的心中，还有这样一个曾经得过她的垂青的我的印象否？

但，生命的波澜，永是百出不已。我和你梅姊，虽违隔了三四年，这样流水似的三四年，在她的心上，许早已没有了这个印象，然而在我，兴念及此，总还不免有所怅惘。而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间命主，却会将你和我同时又推下了另个漩涡里了呢？

当那一次，我伴了一位朋友到你校里去看游艺会的，我是感到多么忐忑啊，当发现了登时将我整个心都吸去了的你的时候。自然，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关于你的一切，这正因我们在几年前虽彼此见过，也曾一道玩过，但彼此的心上是从没有镂上彼此的原故。但枯涩的G地，却因此在我的观念上，有了意外的改变了。正好比一只石榴，我往昔只见了它那枯黄暗淡的外皮，而不知内而还包藏着娇嫩鲜红的榴子一样。记得当我的朋友和你们在谈话时，我的视线，老越出了自己主宰的能力而不自觉地会徘徊在你的身旁。而结果，使我现在不免还要疑惑，疑惑你当时的报答，是有意抑无心。啊，可爱的姑娘，我是如此不能抑止，我的周身，从没有被像这样美丽，明珠似的眼珠旅行过（除了你梅姊）。你的眼珠，和你梅姊正是一样的生动，妩媚，而较你梅姊则更有另一种可贵的风趣：在你的一笑之中，会表露出你整个的美来的。……我是从未为了一个异性而使自己底心波感到不安，而如今，我的心是多么紧张着啊！正如一个小孩子，见了一份美丽的糖果一样，他的全心，将会因此而遗忘去一切的。——即使关于他之能否得到这份糖果是毫无把握，但渺茫，无把握，岂能就此克灭下他无限的渴望，想求？……唉，可爱的姑娘，在以往，我的心，是多平静地愉快着啊，我是未曾为感到有这样沈深而幽渺的烦恼过，像见了你以后所感到的一样。实在我当时的心板上是已深深地刻下了你底倩影，心灵上是早填满了因你而感到的苦闷了。

那是某一天的下午，经了友人们几次的怂恿，我才决计去分担一部分那些友人所组织的一个剧社的责任。而在这样一个正需要着活泼的人，天才的时候，愈加要使我连想到那藏躲在松蓬的短发下的这样一张可爱的面孔和一副苗条的身材。在我的情感的理想中，似乎已判定了你准是一个非凡的天才，一个上上的角色了，除了我的思潮，定全在死去了似

的状态中之外，这样一个追求着似的幻觉，永占据在了我脑海之全部。我想，如其你来了，自然，这希望你能来的心，不单单是如了剧务或许因之会感到便利；然而，果真能时常在身旁——就如案头供置了自己所心爱的一件艺术品，则自己也会加生出多少生命的力量呢？但天下的事情，也颇有许多算侥幸；在那剧社成立的一天，会场中，坐在左角的，不是那可爱的——早经被人判定是个天才的你又是谁呢？

而就在那一天，我委实很清爽，如其回想起来的话，在当时，我是多鲜健，活跃，精神啊。而哪又料到，在两天之后，自己又会病在床上呢？

这自然不消说得是这次为了剧社的奔走太劳忙了，但实在还是由于平时自己身体之过于虚弱的原故。这也无怪，平时无人照料无人惜怜的我，加之自己还要不住地糟踏，那得不弄成一身都是病？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可贵的光阴之下，我的心，不许我过分地孤负这非凡的机会。然而焦急，幻灭，根本便是两件事，两条路。……我可怜，只能在一张小小的铁床上，度过这长夜漫漫般的二周的溽暑。而在一个心不能安定的人过来，是要感到何等分外的烦躁，郁闷啊！

那是我病将全愈期中的一个早晨。黄金般太阳，透进了纱窗，温柔地伏在我的床头。夏日的太阳，不受人的欢迎。但在一个病人，以极无聊的眼光来观照一切，似乎也得会在无趣中得到一些些趣味的。它从我的纱帐而桌上，而窗槛，这般慢慢地移去。一切经过了它的洗礼，都呈出鲜艳的色彩而不再是灰暗。而就在那时，走来了我的一位朋友。——

自然，那朋友是绝对的无心，他告诉了我关于梅的行将出阁的消息，以及你的……他说：“桃是早属于了K君的。”但，啊——我的朋友哟！你能知，你岂能知，这，这些都不是我所愿听的消息？你能料到，你岂又能料到，自你辞去之后，这样一个可怜的病人，他那微弱的心中，又会引起一些什么新的感触，新的刺激？啊——惆怅，伤感，空虚，灰惨……这，正如一个破烂了的瓜皮，一切蚊蝇飞去，仿佛都要想来吸吮些它一些膏汁一样了。但实是最后的裁判，它既给了我那整个的心之寄托的绝望的暗示，我复何言，我复有何言呢？！惆怅，惆怅何用，伤感，伤感何用……自己的苦痛，惟有自己才能静静地体味着，惟有自己才能在一种无言的状态中去体味到一些真实的人生。一切其他的同情，安慰，

还不只是一种极无聊的粉饰？

两周的长夏，终于在那惨黯的，沉闷的空气里，消逝了过去了。一种新的鲜健的情绪，使人要感受到一种神妙的感想，而就如两个世界刚交替着一般。我想，暂别后的再见，和一种旧的东方所引为美的骄的虚弱身质所呈现出的一种病后的惨白的脸色，都足使你不免要迸出一种怜惜的情意，因而加重其间的秘密的情谊的罢。然而，这自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想念，我哪能知道，像这样一个满藏着热情的憔悴的青年的一张惨白的脸，刺进了他所追求着的异性的的心，又曾进出了什么一种反应呢？

为了一个算是站在导演地位的人，和他所一起的演员的接触，是坦白而易与的原故；虽则也是经了人的怂恿推戴的，然而实际上，自己是懂得什么叫舞台艺术，有什么舞台经验？但那广大的引诱，已裹住了你全部的理智，仿佛虽明知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它容易将你拖近那苦的海，而自己是绝不会感到——这正如一个吃上鸦片的人，他已失去了他的决心，勇气，毅力，头脑……而不能离开这死的领域是一样——感到是需要一种清净的头脑去制止那种错乱的行动，和一种断然的气概去抵抗那可怕的诱惑。以致，终于是使我们愈接近那悲黯的深渊了。

你那敏捷的慧心，窈窕的动作，都使我感到陶醉，麻痹。我是向未享受过有像这般懂事的一颗心的招展，熨贴。你唱起那幽扬的歌，就仿佛是可爱的夜莺在叫着，而在波顿的歌声里，那潜在着的乐，便是人间的乐，那潜在着的悲，便是人间的悲。你舞起那醉心的舞时的腰，臂，肢，就仿佛是和风中的杨柳的枝，全没有一丝儿勉强，做作。……啊，这要使人的心，流，流到天的那一角哟，我可爱的姑娘！

为了公演的日期的催促，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到社了。虽则，病后的弱体，那堪残酷的暑气的蒸磨？然而心给我的只是一种矛盾的暗示——去或不去。真的，我见了你，就仿佛小雏之见了她的母亲一般，她的心永是安定，愉快；而反之，只是觉得怅惘，虚失。就如每当别你返寓时吧，在路上，是总没有像和你在一起般活跃，生动，高兴，而只感到自己的单独，飘浮，不安，好如一只小小燕子飞在茫茫的海洋里，寻不着一些些光明，边际一样。而到了寓所以后，则更是懒懒地，仿佛一切全失去了那主治的机关，招不到一丝集中的力量。而只能闷昏地软躺着，不住地想抓着一些些幻感，用来填满当时那奥渺的空虚。

曾有许多朋友，他们都向着我赞颂。因为像我这样一个懂事的潇洒的少年，情致是缠绵而温柔，而终于能自持，没有落到不幸的深渊，尝到苦恋的香酒。这在我的内心，虽有时也不免要感到一种为一时冲动所发生的骄傲，但只要经过一番平静的自审之后，就立刻觉到朋友的赞颂，并不是由乎深沉的观察。人能明白得他自己的心，当莫再有像他自己地清透。实际上，我的还没有尝到苦恋的香酒，只是环境的使然，自己的心，是那时候失去了一丝丝铁性的呢？正如哪个酒鬼，能见着甜香的美酒，会不愿地冲进酒坛里去的呢？

在 R 花园里的一个下午，可说是我 20 年来的生命史上最可纪念的一页了。在以往，我是未曾遇到有像那样值得宝贵，纪念，记载的事过。我将再也不会遗忘，那一天下午，那种醉心的情致。在碧清的池水边：那浓密的树叶，如伞地张展着、阻挡了酷热的骄阳的侵占，一丝丝的沁心的微风，不住地抛拂过来，就如那美丽的花纸屑，不住地洒向新人的身上去是一样。蝉，停止了它们的歌唱，鸟，停止了它们的飞翔，周遭的一切，全在静静地，默默地，仿佛是有意地造成一种不当的世界，来容这正浓情的一对。而在这样一个诗的，艺术的，陶醉的时间，我是再也没有心去向去理解自己当时的幸福了；那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有些麻木，昏沉，仿佛你身上的一切都扩大了起来，遮幕了其他一切，一切我所有的其他的想象。我当时，竟完全是一个艺术家了般，我以深刻的眼光，来观察，来欣赏，来享受这当前的唯一的一座伟大的艺术品——活的石膏像。一切世间的虚伪的富贵名利，全逐出了我的心头。只有你，可爱的姑娘，才有着真实的生命。然而，我当着这样一座真的美的艺术品之前，我的心，我的血，是要感到多湍急多紧张。我对你讲一句话，仿佛比预备一篇演讲还要慎重，比写一篇散文，写一首诗，还要细心。我站在你面前，比在任何一个盛大的宴会里，还要感到拘束，比在一个脚本里扮上任何一个角色，都困难……然而，我感到自己的所以幸福，愉快的忐忑，正是受了这种情形的反应……啊，可爱的姑娘，你说这是多么的矛盾，多么的不可思议呢？

至于在公演的一天，自然也是值得追念的一次。然而如今回味起来，则这一晚，只成了我们的过程上的一个 Climax 了（？）！

在那天晚上，一切都易于引起我事后的回忆和追想。你那玲珑的对

话，人情的动作，深刻的表情，以及风一般的舞，鸟一般的唱……，全不顾到旁人的心的安全。……但在那晚，最足使我恋念不忘，至今还追念着不忘的，还得推你那美目的两盼。那两盼，是这般似有意似无意地，她充满了生命的跃跳，潜存了你全部的微妙的情意。这实在是多么难得，难得到世间将决不会有第二。因为人的情，在自然的状态之中流露出来，永是可贵的……那如电似的一霎，只是使我隐约中，感受到有一些麻，一些酸。我将再也描写不出我当时的血，是奔放得多么湍急。但无论如何，在我还未全部麻醉之前，我是如痴地，电一般迅速地给了你以同样的答礼——这答礼，包函了我整个的心，情，和热血。我全部的心，情，和热血，在这如电的一霎中，舒泄无遗了。而你，似乎感到一丝丝内在的骄养；那可爱的两颊，全如一只美丽浅红的苹果了；于是将头掉了过去但在你的掉过去时，可爱的姑娘啊，你不是已经将我的心全带去了吗？

……

场散了，客赋归去，明亮的灯光，仿佛也有些倦意了。

然而，在这消沉的空气里，我哪料到，你又会给我以一些非凡的新的紧张呢？你邀我同走，自然，这是多平常的一件事。但至少，我当时的心，是颤跳着多厉害啊。在以前，我们虽也曾同道过，但只是偶然的事，何况，彼此是只能守着静默呢？而现在，我当时想，夜已深深，那许多尖锐的眼珠，都已钻进了夜的国里……然而，何处是勇气的源泉呢？在平滑的路上，碧绿的树叶下，并肩地，慢慢地，而终只是默然地走着。目的也是一步一步地只是向前迎展上来，而自己的心，血，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焦灼和奔流，在一个小小的心灵上，将已成了不知多少种思绪的交战的战场，向着渐渐入于昏沉的状态，而终于是，Good Night地一声别去！……唉唉，可爱的姑娘，你当时是否是有些怨我，感到失望呢？在过后，我是多懊伤着啊。我怨，怨我自己的懦，怨我自己的弱。女子，女子永是保守着，她们爱被动。爱受人的求。……但，但那唯一的凑合已如春水似的逝去了，悔，悔有何用，悔又有何用呢？

在当晚，身体上虽是感到过分的疲倦，而一种辗转的情绪，使自己保持了兴奋，再也不易睡着。在那静得连自己的呼吸都觉得可怕的空气里，只能憧憬似的，幻想着那可爱的你的当时。我想，也许你现在正在理着你的残装，预备休息了罢；也许，还正在兴奋地和你姊妹在谈着当

晚的盛况罢；也许，也许你已入了甜蜜的梦乡了罢……唉，仁慈的天，你让我迷朦地睡去了罢，让我迷朦地在梦里去寻着她去罢。在那全幻魔似的梦里，我将怎样来掏出我的心，我如血一般红，火一般热的心，来献呈给我的天使，我的美丽的，神女似的天使呢？……但，幽幽长夜，何处是那幻梦的园土，我又到何处去寻梦去呢？

我们这个剧社的结合，时间性的趣味，是非常浓烈的。自从这次公演之后，接着是求学的求学，谋食的谋食，各自东西地分散了。而我们，也就因了这个影响，以后一天少似一天般，难得有机会，能再像以前地在一块地谈一回，笑一回了。……然而，一颗经过一种热烈的磨擦后的热辣辣的心，是那易如此冷静下去？好比昨日事似的往事，永在我心头汹涌着，澎湃着。每当那鲜红的太阳，逝别了人间，迷朦的暮色，幕遮了一切的时候，我是老要带着如梦似的一颗心，仿佛有些痴，又有些疯般，孤独地，凄怆地，走到那美人曾到过的花园去徘徊一番，或在那公演的旧地，作一回憧憬似的凭吊……我每日的光阴，全消逝在一种朦胧的，梦一般的情境里。我不知道什么叫人生，光阴，兴趣……以及其他。我只能在我的慈和的老母，带着一种恐惧，颤栗，热情的神气，来给我一些熨贴，抚问的时候，才在一个无名的角角里，尝到一丝丝透上来的酸味。那一对仁悲的可怜的眼珠，在我看来，正如是一面照到我良心的闪亮的镜子，在那一种强烈的如电般的光闪下，我仿佛是开始在忏悔，在憬悟。我感到，我正如一只小山羊，已走近了危崖的边缘，立刻要坠落到深的悲痛的渊海里去了。我决不能为了自己一个人就打破了我全家的快乐。我不该再如此颓丧下去而致弄到无救的地步。我更不该只是由自己的痴心，专去和凶恶的魔鬼决斗。我该快快离开了这充斥着毒的周遭，我将快要去寻一个新的空气来消散我已往的积毒……而终于是，在一个夜深，匆匆地，正如一个囚犯越出了可怕的牢狱似的，离开了我所迷恋着的G地，而漂泊到了这海边的一个大都会里。

但是这个大都会所给予我的印象是更坏。因为在那里有着许多肉的，香的，妖媚的女人，虽然，她们只都是些绸缎店的商标，香粉店的出货器，她们的心灵，早给魔妖们熏染了，刚刻了过，正如一张洁白的纸，已掉落在灰秽的泥水里，是永不再会净白了的；但那惨绿的灯，醇香的酒，诱惑的肉，迷醉的歌声……这些，却都足使我愈加容易联想到我那

可爱的姑娘，姑娘的可爱的一举一动，和因此而所迸出的悲哀……

不过，所恃为侥幸的是在我所住的周遭，总还算清静，清静得有如在一个古庙里一般。那里有的是青青的柳枝，软软的草茵……和晚上那挂在飘渺的高的天空中的皎洁的月亮。但，虽在这样一个如在自然的怀抱里的环境里，而我终是不能立即就离开那情的纠缠。在每天的清晨醒来，心是较清静地，而也就感觉到在多么焦急着，焦急那宝贵的光阴的糟踏，即使你是想引用一个大的力量，来支配，来制镇，想将自己的精神，怎样来花用于一些算是有益的工作之上，但是每当你到了切实要做些事情时，一种不能集中的混乱的思绪，又来缠绕了你整个的头脑，使你永成为一种没有主宰了的人。……有时我又在梦中梦见你来了，这真要使我感到多过分的狂喜呢？我将不知还是应该先问你所以能来这里的原因，抑是应该先问你有没有吃饭，而如其你还没有的话，则我更将要同你到怎样一块诗的地方去，才不辜负这上天的赐惠？……但是，虚幻的梦，终于是消逝了。而在那更残梦回的当口，一颗创碎的心上，又会弹出多凄伤的情调呢？……啊，可爱的姑娘啊，一个人在追求着一个异性，为什么只能在那虚幻的梦，渺茫的梦中，才敢，才能毫不迟滞，诚真地勇敢地对着他底爱人流着，献着，吐着他底相思的泪，心，语呢！呵，你万恶的社会制度，支配了人间的一切哟！呵，你苍茫的天哟，为什么我不能早生或迟生十年呢？呵，可恶的造物哟，你为什么既要我们将同时创造了出来，而却又要创造出了这样一个社会呢？

沉寂，这样两个字，于我现在的心，是太写实了。我近来见了喜乐，热闹，就感到恐惧而要咒诅。然而我又何尝不想到，如其有那心爱的人，能时常缭绕在我的身旁，则我又将感到是多么满足，幸福呢？我准将为了你，在看电影时，要高攀地和你一起去坐那骄傲的包厢，因在那里，我们可以有更亲昵，更细腻的话。如其电影散了，再回到雅洁的咖啡店里，喝一回清茶，清淡一回，不更心折？而在那时看，我又将如何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一般青年的面前，分外地表显出自己的幸福，骄傲呢？而从咖啡店走了出来，自然，更好是再索兴到那美丽的公园里去坐，散步一回。那皎洁的月光，好似远远地在对着我们微笑。那静穆的树影，好似默默地在为我们祈祷。我将将自己的头部，全倾藏到那温暖的怀里，偷听着少女的心曲。我又将将自己的细腻的舌尖，全埋躲在

那芬芳的樱口中，吮吸着少女的甜的香涎。我将好比一个慈母怀里的小孩，只是麻醉地在领略着他慈母的心心的抚慰，又正如一个热情的诗人，只是昏沉地睡在自然的怀里，领受着那伟大的诗的灵感。……而，而，而这样，仿佛就全不必顾到还有其他的人间的一切，就期望那接着的便是世界的末日……

……

自然，可爱的姑娘，这也许是痴人的痴念罢！这也许是痴人的痴念，也许是痴，痴……罢！但苍茫的天啊，痴与不痴，又何处是它们的分水岭呢？

承你首先谈及我们以后的不妨通通信，这实在是多么中我的意的一件事啊。但是，人生又何以这般矛盾着呢，为什么我写给你的信，虽则是满长满长的，而又不肯稍为舒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喷发一些内心的火花呢？啊……理想与行动，矛盾的人生哟！

在发信时，我是早就计算到你将在什么时候好收到的了。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心波，为什么仿佛又在澎湃着般永不住地需要揣度呢？也许我揣度着，也许你正在拆开那封信了吧，也许，还没有吧，也许……啊……但若是你读了我的信之后，所反应到的又只是一些淡淡的无聊，或竟是一些恶憎的蔑视，则，则我又将要如何的失望，羞惭啊！啊，罢罢罢，那内心的莫再急湍着吧，莫再颤动着吧，且待命运的裁判，你的赦令吧！

呵呵，真的，可爱的姑娘，什么生之意义，什么是生命之力，我近来，对于这些是非常的模糊了。但在模糊中，又仿佛觉得，在当前，似乎终有这么一样东西在着似的。为什么，我近来一切的行动思想，都是没有了主宰似的？啊，精神，它需要一些安慰，灵魂，它需要一个归宿，但，但是我精神的安慰呢，灵魂的归宿呢？我感到的，在近来，每天只有两个时间，仿佛是有着光明，有着生意，而能使我的心，充满了一种在盼候什么的兴奋。这两个时间，意思是说每天邮差两次的来临。但天光阴逝去，邮差次次临到，而，这，这与我有了些什么呢？……唉唉，夜深静思心碎！桃妹哟！你这害人的妖精哟！

……

我常想，社会，它的残酷就好比一只猫一样。它顶爱将它的俘虏施

以尽情的玩弄，自然，它明白这俘虏，永是不能反抗，永只是它高兴时的一种牺牲品，它可以任意地来给自己消遣或摈弃，它可以不经心地给它的俘虏以喜乐或哀愁。……啊，我也许将变成一只毒恶的兽的尖锐的锋爪下的弱小的耗子吧，然而我又将怎样振作起来以自救呢？！啊，世上将没有人更能待你如你自己一般的忠诚的，啊，我岂真没有一丝勇气，没有一丝毅力吗？我自己，如再不拯救自己，准将堕入那永不可救的深渊了。呵呵，抛开一切烦恼吧，征服一切残酷的磨折吧。左手提起那面坚韧的盾牌来阻挡那外来的毒箭，右手握紧那锋利的尖刃去另辟一条路吧。但，但那美丽的引诱啊，他岂真易如此就给你征服？它，它不将更有它，它的策略？——

“祝你努力，永在乐园沉醉！”

呵！是这般迷媚有力的句子哟！我几乎不知那是我那颗心爱的姑娘的有意的挖苦还是残忍的玩弄，但事实上，我终于又失败了，屈服了。我双手捧起了那珍重的宝贵的，上面有着你亲手署名的信笺。啊啊！信笺的颜色是浅红得多可爱啊，可爱得就如你的人一样呵！——它的本质虽轻飘，但现在在我的手中，是郑重，郑重，比一切生命还郑重；它的本质虽微贱，但现在在我的心中，是宝贵，宝贵，比一切珍宝还宝贵。……然而，在这如梦的心里，我终又疑惑，终又伤感。宝贵郑重，但其内含有否真实的生命呢，真实的情愫呢？呵呵——我木然了，木然了，仿佛当前总是一些渺茫，虚幻，而不可捉摸，正如一个在波动得非常厉害的水浪中的月亮般，要给你得一个正确的面目都不可能的：她是如此闪耀；又正如捉迷藏般，她是永不住地在你身旁逗引，挑惹……

那是一件很有趣的故事，姑娘，在此我要告诉你的：有一个猎人，他常到深山里去捕猎。一天的傍晚，当他回家时，他是多兴奋得意着呢，当他告诉人关于他在日里所行的一件自以为是慈悲的事的时候。他说，有一次他打中了一只飞禽，但那只不幸的鸟，却并没有一枪就死去。然而那种挣扎于生与死之间的痛苦的情形，却使那虽然是一个平时决不会想到他的牺牲品的苦痛的他，也会感到不忍，也会在木木的心上，感到一些不安。于是他慈悲地再费去自己一粒宝贵的子弹，而那只可怜的小鸟，就快乐地躺在那软软的草地上，逝别了这悲惨的人间，而不知一切地结束了它的一生了！

——而这个故事，姑娘，你又将感到些什么呢？

这的确，长时期的挨苦，不及痛快的一死。世上茹苦痛的乃是在一种游移的状态中的挣扎，然而——

姑娘，这一些些，你都不能答应吗？呵，我底希望是多渺小可怜啊！我希望，我只希望，只恳求，恳求你就做一次的这样一个猎人吧！你不能做一次这样一个的慈悲的人吗！？

呵呵！——时间永无穷止，而青春是多么可怜的有限啊！在近来，一种神奥的，飘渺的声音，常在我的耳边喊呐着：“决心！决心！如其再是这样任其向下，则你将永无拯救的希望。你当鼓起你所有的勇气，来作一个殊死之战！你将庄严而郑重地说：我所爱恋着的人呀，我是在爱着你，你将将你全部的口状供诉出来，来受她的审问，她的裁判！你将不问这个结局是悲哀或快乐，而在你沉痛的心灵上，将有一个毅然的起转。呵！勇敢的人哟！你！……”

呵！勇敢！这是需要的吧！然而桃姝哟。自前天起，手不停地直写到现在了，眼花，头昏，腰痛，手酸，心碎……唉唉，桃姝，总算将这篇忠实的口供写成了。我跪着，双手将它捧呈得高高的，颤栗地呈献给我的，我的司命之主！你——我的命主哟，我在等着你最后的判决吧！我在等着你的，你的最后的判决吧！

不幸的 E

1929年1月27日

（原载《真美善》第5卷第3号，1930年1月16日出版）

六、《第四十一》^① 概略

半年前，曾同一位从俄国回来的朋友，谈起了一些关于新俄的作品，他说，拉氏的《第四十一》，是极可以读得；并且《第四十一》在舞台上的演出，他也在莫斯科看过了。其后又听说《第四十一》有了中译本，当时曾走了几家书店，未能买到，终于也就忘了。可是前几天却在秀侠那里借到了这本书，当夜读了一遍，那种描写的深刻和表现革命者的伟大，常常使读者的心弦，随了书里的叙述而紧张起来。读后十分感动，今天早上已是第三遍了。那是以一个女的叫马柳特迦的为全篇的主人，而表现着革命者的情绪的热烈，意志的坚毅，阶级的觉悟，和无限刚强的生命的力量，不为热的爱情所迷窍，不为一切资产阶级的生活所诱惑的——像那样伟大的一篇小说。提到了恋爱和革命冲突的事，我又记起了有一次鲁迅先生的演讲。演讲里的有一段，大概是说，在中国，近来有许多描写着革命与恋爱冲突着的小说，而他们的结果，是写革命战胜了恋爱；其实，像那样的写法，我觉得不如写恋爱战胜革命来得为确切。关于这一个论调，我想和中国的国民性多少有些关系。中国的国民性里，存着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先顾个人而后集团。尤其是像恋爱样的事，那是有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常常会将革命者热烈的情绪夺回来的。不过这要是遇着了真正革命者，那就是例外。尤其是在俄国，他们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使他们有一种刚强坚决的血。在这《第四十一》里，

^① 作者：拉甫列涅夫（Boris Lavrennev 1892—1959），译者：曹靖华，出版者：北京未名社出版部。

写着马柳特迦，怎样为她的敌人——一个中尉、白的郭鲁奥特罗的纤手，柔声，而尤其是那异样的碧蓝的眼睛，生出了无限的缠绵的情意。常常，当他们飘流在一个荒岛上的时候，在夜间，她老要温柔地，可贵地，像一只春天的牛犊一般的沉醉到中尉的煽起的炽热的情火里，在那时，她是完全过着了情人样的幸福的生活。然而，她是怎样也忘不了她的事业，她的革命。郭鲁奥特罗，用一种幽逸的生活来迷惑着她，结果是给她打了一个耳光；他们在一天看见远远地有一只船来，以为有救了，然而那是一只白党的船，于是她就一刹那那里记起了叶秀可夫、红的党代表，她的长官的面孔和临别的话来了：“要是万一遇见了白党的时候，不要拿活的交给他。”她叹了口气，忍住了她的爱情，拾起了地上的枪，在那时，中尉郭鲁奥特罗便听见了那地球崩坏似的一声，而，作者也就就此结局了。

作者在本书里，他的艺术手腕，十分的成功。他写红的党代表叶秀可夫和马柳特迦等 23 名的兵士，从一个重围里冲了出来，逃落到一个荒漫的沙漠里。在那里，他们因为没有骆驼，遂抢劫了一队有 40 匹骆驼的商队，而在那商队里，却发现有一个奉着白俄最高执政者的神秘使命的代表，那就是，近卫军的中尉郭鲁奥特罗。叶秀可夫为想中尉供出些更多的口供来，所以将他带往他们自己的司令部去；而在途上，马柳特迦便任为这个重要的俘虏的监守者了。

马柳特迦是一个在 300 步内百发百中的女兵士。她是递了一个“摈绝性的生活，停止生育，一直到劳动战胜了资本，得到最后的胜利的时候”这样一个愿书，才能被当局收下，当了一个义勇赤卫军的。为了她要遵行她的愿书，谁也不敢和她做眉眼。然而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不知趣的新来的匈牙利人，却将痴痴的眼死钉了她，于是结果吃了她两枪，打落下了三个牙子就逃开了。

然而，人是有情感的东西，谁没有炽烈的热情呢。郭鲁奥特罗，是那樣的英俊，有着蓝得像海水一样蓝，使女人一见就要跳到那个蓝的海里去的眼睛，这使马柳特迦在无形中撩起了一缕情火了。当他们一群人，到了阿拉尔克尔格支人的帐幕里休息着的时候，谁也都沉沉地睡去了，而只有马柳特迦和中尉对坐在火花乱飞的炉子前。马柳特迦拿了一张纸，掏出一截残断的铅笔乱写着些什么，而作者在这儿，是有着一段描写他

们的极美丽的字句的：

中尉的肩膀靠着帐幕的柱子坐着。极蓝极蓝的眼珠，顺着那笨脚笨手的写着的铅笔溜转着。

向前欠着身子，低声问道：

“写什么呢？”

马柳特迦斜着眼睛，隔着那乱蓬的，下垂的，棕色的卷发望了他一眼。

“你来插什么嘴呢？”

“或者是想写信吗？你说吧——我替你写。”

马柳特迦低低的笑起来。

在阿拉尔，后来因一个机会得到一只可以容得下四个人的船。为了要早些使俘虏押到司令部里去的原故，于是叶秀可夫叫马柳特迦和其他两个兵士押了中尉一同乘船渡过阿拉尔海而到克查林斯克去，在那里，有着他们赤卫军的司令部。船开了，叶秀可夫向马柳特迦说：

“你做船长。要是将俘虏放跑了的话，你不如死了好。……要是万一遇见了白党的话，不要活的交给他。”

不幸船被风浪冲到了一个荒岛上去了，其余两个兵士都被水浪卷了去。在荒岛上，他们只剩了两个人。在那里，马柳特迦和着中尉做着十分患难相交的朋友。中尉病了，她服侍着他。“然而她这样当心地服侍他，那不只是因为爱他，而她是因为她有着更大的责任在身上。”

“要是死了……我拿什么话去回答叶秀可夫呢？……”她这样地哭了。

革命者是要绝对负责任的，所以当有一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中尉怕马柳特迦拿着枪太重了，要代她拿。然而，马柳特迦说：

“多谢你的帮忙。不过命令上只命令我叫把你带往司令部去的……那么，我不能把枪交给你，因为我负责任呢。”

像这种话，多么激昂。马柳特迦，一个真的革命者是处处不忘他自己的责任和地位的。

人是需要安慰的。在荒岛上，寂寞的生活，格外容易将他们推入了

爱情的漩涡里。马柳特迦，一个坚决的革命者，在这儿完全是像一个非常富于情感的情人，处处用着最细腻的心情来体贴着中尉，她的敌人。她愿意将好的东西先尽中尉吃；她愿意牺牲她那写着她自己的诗的纸，给他卷烟；他对她讲着一些可爱的故事，像《鲁滨孙漂流记》等。他们完全情人样的过着安慰的，幸福的生活。

然而，一谈到党的立场上，马柳特迦是一个革命者，郭鲁奥特罗是她的敌人。她是处处记得，现在不是我们袖手享乐的时候。她说：

“地球都撕两半了，人们要为着真理都肝脑涂地的去斗争……”

中尉说：

“你说得对，地球要撕两半了。是的，把这老家伙统统都毁坏了吧，由空虚而毁灭了它吧。这地球从前是少壮的，丰饶的，还有未发现的新的无穷的富源。完了，没有什么可发现的了。人类一切的技艺都集中到那怎样去保存那所积蓄的财富，怎么样去苟延残喘再延一世纪，一年，一分钟。技术，不过是些死的数学公式。就是思想也不过是些不结果实的数目字，时时打算着如何去绝灭人类。世界上所留下的财富他们为着要多供自己使用一天，多往自己的腰包装一点，于是就要多绝灭些人类。滚他妈的吧……除过自己以外什么真理都不想了。你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又怎么办呢，你们以为发现了真理吗？想拿一份口粮和命令去换人类的活活的心灵吗？得了！这些事情我要洗手了！我不愿再来污了我的手了！”

“你是王孙公子吗？是贵族吗？你舒舒服服让别人去替你挖毛厕吗？”马柳特迦这样说。

“是的！让他去罢！让他妈的去吧！别人——谁高兴干这个让他去干吧。你听着，小马柳特迦！我们一从此地出去的时候就到高加索去吧。在那里，我有一所小别墅。我们到了那里之后，整天埋头到书堆里去，其余什么都不管它了。过着清闲幽雅的生活。什么真理都不想了——只要安闲。你也可以去读书了。你不是说要读书吗？……一切我都替你办。”

马柳特迦激然的跳起来。舌子好似钉尖一般的说：

“那么，我是这样明白你的话的，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当人们正在为自己的真理去肝脑涂地的斗争的时候，叫我陪你左拥右抱的在那温柔乡中过生活，吃着那每块都浸着人血的果子糖？是吗？”

“为什么你这样粗野呢？”中尉气闷的说。

是的，粗野，她承认是粗野，她走到他的面前，给了他一个耳光。

然而在荒岛上，谁也不能离开谁，于是不到三天，他们仍旧和好了。有一天，就是中尉听见了那地球崩坏似的轰一声的一天，中尉笑嘻嘻对马柳特迦说：“……我自己看我现在也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呢，还早着的。我还要干，还要摩拳擦掌的去同他们拼一火，叫他们都知我们还在干呢？”

马柳特迦高兴起来，说：“难道你实际上真聪明了一点吗？”

而中尉是说：“聪明一点了，我的小鸽子！如果我们现在不闻不问坐到那里读书，把世界完全交给你们管，那么你们会把它弄得叫我的子子孙孙都哭天无路呢。不，我亲爱的小傻子，如果我们的文化要反对你们的文化，那么就反对到底吧。一想到了……”

中尉说着，他要干，他是永远做着马柳特迦的敌人了。白党的船来了，马柳特迦记起了叶秀可夫的话来了，她毅然地把她所爱的牺牲了。

马柳特迦的射击是非常准的，确在 300 步之内，她的枪没有空发。她嘴里常有他妈妈的这样一套口语。每当她射一个人的时候，她老要说：“第三十九，他妈妈的。第四十，她妈妈的……”

然而当他们抢劫商队的时候，叶秀可夫招呼着她照着郭鲁奥特罗射，而她虽然说了，“第四十一，他妈妈的……”然而不知怎样，她终于放了空枪。郭鲁奥特罗本是马柳特迦的死簿上的第四十一名了，虽然偷生了几个月，而终于仍然被马柳特迦枪毙着。在第九章的开首，作者这样写着：

近卫军的中尉郭鲁奥特罗要算马柳特迦死簿上的第四十一名了。

“也算她处女的爱簿上的第一名了。”

人，那是到处都有着两种思想的……所谓为私，和所谓为公。人，谁不爱享乐，爱苟且，爱奢华，爱美；爱懒怠，爱一切资产的生活；然而革命者能将自己所私爱的一切摈弃，牺牲，那就是他们的伟大。作者将人类的性爱，怜悯，对美的渴想，与严重的国内的战争的义务的冲突，在本书里表现得十分透澈。而革命者终于为了后者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

前者的一切了。作者的竭力歌颂的重心便在这一点上。

作者是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讴歌着革命的胜利的。在苏俄，他是被人称评为“忠诚的革命的作家”，“革命军事胜利的罗曼谛克”等的。他的著作有《风》，《第七个旅伴》，《伊特尔共和国的崩坏》，《平常东西的故事》等，而尤以本书，《平常东西的故事》，及《风》等为最好。据本书译者说，他将有选译拉氏的小说集的计划，这个消息，真是我们十分欢迎的哩。

2月6日

(原载《北新》第4卷第8号，1930年4月16日出版)

附注：本文中引及了鲁迅先生的演讲，那演讲，已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因为现在鲁迅先生的方向已转到新兴阶级的一方面来了，所以在此有声明的必要。

七、残 花

昨夜，在床上，我哭了。

我哭了，那是说，我流了泪。我流泪，一滴，两滴，三滴，滴滴滴在枕头上。悲哀的青烟在我心头绞，我想放声嚎哭，但，即使凄咽也不敢。心，心在那无极的感伤之海里就像一条小小的船，失去了舵，也失去了橹。热的血，热的泪，像澎湃的波浪只管向着四周冲。我只能，只能在一片夜的荒凉里，感到孤独，孤独，无底的孤独。想想自己那两年不动的心，现在，又要重复地陷落到像往昔曾经进去过的那无底的痛苦之渊的事，一种凄绝的情调，便会萦绕到全身。五天，10天，一个月，两个月，以前，天天，她，见了我，总是一个酒也似的笑。为什么一见了她，她便会这样含情似的笑，我不懂，我茫然。然而，五天，10天，一个月，两个月，太长久了，于是在缥缈中，我仿佛又有些明白。青春就如一层虹也似的轻绡。人，他能够，凭了他的才干，去得到他所营求的荣华或富贵，然而春，春去了，正如朵朵花，将不复再会在谢后开。年来，我的心，就像死水湖里一浮萍，不跃动，也不想去使自己跃动。由你是凄凉的月，寥寂的夜，我感伤，我烦躁，我怅惘；但，我愿意我能知道，我是在感伤，在烦躁，在怅惘，好更深刻地掀起我悲哀的情绪。我只能以往事的回忆来填满我现实的空虚，以过去的创伤来麻醉目前的荒凉。每每，在四周如死，即使连自己的呼吸都感到可怕的深夜，我自己，也未尝不想：如其有一个人，她真能忠心地给我一些热的爱，那爱，可以医补我以往心头的一切痛创的话，那我，也仍然会，会招回我像当年那样热的情。每一个人，他愿意，为了爱他的那个人，抛弃了他自己

的意志，自己的幸福。即使，即使每天，在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小小事：我要不要去赴一个宴会，烫一烫头发，弄一些什么新鲜的东西吃吃，或伴她到什么公园里去散一回步等等，我也愿，像一只小山羊般的驯伏，一只小猕猴的乖巧，听她的说话，看她的气色。我情愿，愿意为一个人的奴隶，我忠心于她，永久的忠心于她，只要那个人，她，真心地在爱着我，是真心地在接受着我无底的爱。

然而她，是不是一个像那样的人，我不知道。笑，笑是一朵花，花背后有着刺。她平时，给我的印象还不坏。说不坏，那是说她多少还具有着一些爱的诱惑力。她的影子，她的笑，也像一个胎，渐渐地，在我心头长起来。每每，在月夜，在清晨，心，就像一条游魂似的丝，会飞缠到了她身旁。“这就是初恋？”我常想。说不是，然而我能说不是？世上有许多事是太玄妙了，而恋爱，恋爱也就是太玄妙了的一种。爱的憧憬正如一粒“花之子”，它栽下了你的心，将长成，将长成，将永远地朝向上长成。

但，这憧憬，是否为她所期望，我渺茫，我朦胧。在开初，我也会，体味到我从来未有过像那样幸福的幸福。不知道，每个人，当他享受到了像那样的幸福之后，在睡后，脸上又怎样。然而我，我知道，那桃色的花朵，必定时常会在我唇边漾幻出。我常常做着极其轻快的梦。梦，在梦里，她给了我以无上的细腻与熨贴。那熨贴，就像种食料，有了她，我将永不会知道有什么生命之饥饿。

昨天，整天，完全在一种倦疲和苦闷中过去了；跟了她，跟来又跑去。为什么我也会跟她们一起去，我说不出。“为的是追求她？”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我生就爱凑在人海里那样玩的对。但后来，我想到，“会不会我之去，在她要以为是为她？”我又悔，我懊悔，然而我已答应了人家的约。去，是满高兴。然而太高兴了，悲哀就像小偷般，最会正当着你高兴的时候偷偷地躲进了你的心。整天，跑去又跑来，然而我又得到了些什么？——疲倦和烦闷！为什么我不能保持我自己的尊严。要受她的辱弄，由她高兴？她给人家的是笑，是欢快，是像酒一般的醉，而我，我在她眼珠里，仿佛是多余，是不必要的。我常想，如其一个女人对你厌倦了，那你还是额角头放亮些少去和她多话好。因为，否则，那也只有更加引起你对手对于你的讨厌和憎恶。在昨天，我没有勇气去

和她多说一个字眼儿，即使多看她一眼仿佛也不敢。她的脸，她的眼睛，以前也曾使我陶醉过的，当时就像个魔鬼，使我见了怪颤栗。想不起，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触犯了她的怒，开动了她对我厌倦之机轮。幸而她高兴，于是给我半个“睬”，否则就是一鼻子冷灰。在当时，我真像一只笼里的鸟，一条缸里的鱼，失去了光明与自由，只是在受罪，在活挨。“她会不会爱我，”谁知道?! 虽然她也曾使我尝到过甜的“恋之酒”。

昨天整天我没有吃东西。每个人，他们吃饭吃面都香。但我那小小的肚皮里，仿佛即使连一粒白米也容不下。为什么我吃不下，恐怕只有她知道。甜的，咸的，那一切，天是单单为了幸福的人们而造的；被幸福摒弃了的人们全没份。我不吃，我自然饿。我饿，然而我又吃不下一些些东西。世上惟有一样东西，能使我当时吃得下，那是什么，那是她的爱。

昨晚回家夜已深，月，月从窗外的芭蕉叶里透进了我的房。熄了灯，我睡在床上。窗外的风，吹动了墙上的叶的影。月是凄清。倦游后的空虚，兜上了我的心，我悲哀，我凄然。我想哭，然而我哭不出。往事像云霞，一片片，在我眼前浮去又浮回。我愿我以后，莫再尝恋酒。但当前，我总还是像失去了灵魂的人，我追求，追求着将我灵魂吸去了的那个人。

今早醒来我头有些晕。我想睡，但我是睡不着。一天，一天便完全在说不出的懒惰中过去了。每到饭时便分外会想起她。想起她，肚就发涨吃不下。几天前，在J.Park里，她为我摘了朵花，插在我衣襟上。花，当时是鲜艳，是灿烂，正如她的情，正如我的心。然而何曾有几时，现在是，是灰惨，是憔悴，是枯残了。残花给予我的是什么，是凄凉，是怅惘，是伤感。我悼花，我悼我自己！

1930年5月于何家角

(原载《真美善》第6卷第6号，1930年10月16日出版)

八、小 病

世上有几个人爱病的？即使小病也不爱。生就是一个羸弱的体质的我，疾病，疾病就像一条混水鱼，常常会来淘混我平静的生活的泉水。每年，疾病不知要使我感受到多少苦痛和损失；我怕它，我也咒诅它。不过，在长久不病的极清闲的生活中，偶而小病一次，我却爱。小病像橄榄，它涩，它有一种清香，一种幽高的清香。那种悠然的，就像太阳还没出来的山顶上所有的那样悠然的气息，也只有，只有在这种小病中，使你体味到，使你在极微妙的意境中体味到。

一切事物，人，思想，其形态，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生如一块饼，在这面看，饼上有芝麻，有花纹，而站在那一面，除掉一个平凡，此外便看不见什么。画图画的人，当他自己一笔一笔地在画着时，他会体味到一种别人所体味不到的情趣；但，看人家画图画的人，当他看着人家一笔一笔在画着时，他也同样地会理解到一种意味，为在画着图画的那个人所不能理解到的另一种意味。在小时候，孩子们总爱听父母讲故事，故事，故事使小孩听了神往，然而，在讲着故事给自己儿女听的父母在当时所进有的愉快，便决非在听着故事的孩子的无知的心中所能理解出。常常，看见人家在赤热的太阳底下还打着球，或者因为一些小事，便不能容忍地咆哮了起来。心中常想：“那有何必？”但，当你自己在同样的太阳底下打球，同样的事件来时发脾气的时候，你非但忘记了以前看人家有那样的行动你曾经叹息着的事，并且和曾经那样叹息着时候的你，完全变成两个人了。人，在动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是这样，在静的时候，他所能看见到的，又是那样。“当局迷，旁观清。”那只是一

句俗语，然而要当局不迷，便必得要有在动中能参悟到静的功夫。动和静，也要像两味颜色，调和得恰好，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只静不能动，结果便将形成畏缩，退后，没落；反之则咆哮，鲁狂，愤事。静时不忘了动，在乎避免生命的火花之熄灭；而动时要忘不了静，就得靠自己平时的自省和反躬。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生活是变换的生活；人，他的心和脑，永在无止的波动中起落，他的欲望和行为，永向求新刺激的一个方向上飞奔。静，除非生就是阴沉的人之外，然而那只是一个寄生的货物，平常，人们总浅缺了这一方面的修养。人，人应当在动的余暇，常常，从静的孔孔中，来观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活动的舞台，这个复杂的人生。而——

而小病，小病便是这样一个孔孔，从那里，你可以看见人及己的过去，现在，未来。

如同我这样爱小病的人，我想也许很不少。但大部分，在他们的狭小的欲望中，假若他们要过那种小病的悠闲的生活，必得要住深山的寺庙里，澄清的湖边，或者幽邃的泉林里。有的人，当他名为小病时，也就真的是住的这种天堂似的的地方；那自然只好算享福。“清闲便是福”；自然，自然像千万幅柔软的绫绣，当时裹住了你的身和心。那完全如画一般的地方，在那里，有迷蒙的远山之影，有听了会洗去你心头一切杂念而飘然欲睡的泉水之声，有幻变万千的朝霞，有婉转清妙的鸟之曲，有一切你所心爱的而在都会里所没有的自然之色调。要是你爱吟诗，那尽可以随性所之地吟咏几句；要是爱沉思，则长静的四周，即使极飘微的尘声，都不会有来扰乱了你的思绪；爱痴痴地立在什么地方看一看天边之云霞的，假若你自己不想回去的话，半天，一天，谁也不会来败你的兴；动得太疲倦了，于是闭了眼睛的在床上息一回，养一养神；或者偶而和一些老和尚，老农夫，和自然更亲近的那些人们谈一些如油米柴盐等极其本色的话。……尘世的烦恼，有如云或雾，在你脚下，浮来，浮去，只是缠不上你的心，那真是何等诗也似的生活，在那里，你会渐渐地如一个仙人一般的飘然起来。

小病的生活要是这种式样的生活，才令人爱；然而要享受到这种生活，便须有钱。不过，有没有物质上的力量去享受到这种生活是一件事，这种式样的小病生活是否真的顶可贵，又是一件事。在我，如其说这种

小病生活使我爱，还毋宁说另一种式样的小病，使我更爱。另一种式样的小病，就是说，那式样，全如平凡的生活一样。人生如一舞台。有的人，他观察人生，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有的人则自己站在舞台的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但，站在舞台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的人，究竟也应站得和舞台近。住在深山的庙宇里或者什么类似样的地方，那种隐士般的生活，和现实的世界，如同换了一个地球，如同隔了一个世纪。在那样生活里的人，他顶多，只能就他本身的以往，起一番追忆或忏悔。除此之外，生活不能给予他以更多的意义；然而另一种式样的小病则不同。我小病，我的周遭，还依然是一个喧嚣的，放狂的，杂乱的世界。然而就在那无止的喧嚣，无止的放狂，无止的杂乱里，我却得到了不少比黄金更可贵的东西。每次的小病，它总给予了我以不少启示。我相信，一个病了的人，以一种极达观的，极心平气和的眼光来观照一切，他必定会了悟出一些平时所不易了悟出的奥秘的哲理的。同是一个人，同是一种行为，自己平时也是这样做，但平时的自己便不觉得那讨厌，那鄙薄，而当自己病了睡在床上的时候，看着人家那种扰动的行为，便会不自觉地迸出一种反感了。每次，我在小病后，我便会有一次更紧张的发奋，一次更有意义的自励。在小病中，除却疲倦，没有气力，没有神之外，我什么都不感到痛楚。思绪上，也许常常会流入干燥，枯闷，但有时，也便会更精神，更有条理。周遭的一切，在那更有条理的观照下闪过，那又深进一层的理解，便启示了你一向迷茫了的心和灵。你能够感受到你平时所不易感受到的人生，你能够看到你平时所不易看到的各事件，各人物的真实面目；只有在那时，你会，你才会得到一面明爽的镜子，去观照观照一切以社会发展的优性条件为出发点来看所认为完全是耗费的多余的行为和思想。

不过惟其这样，也许有人会预感到，这会使人更走到消沉的一方面去。但在我，却与这个意见恰恰相反。一切人的营营于思虑，谋划，在他们的无止息的去去来来之间，以那种超然的气息，心平气和的另一种眼光观照来，必定会感到有许多事为可笑，然而这种反感的反映，我以为必然的是和他所引为反感的事实成为相反的对照。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此，同时也更相信在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小病，小病所给个人的自然仅仅是这一些向上启示，而如其大家都能体味到像那样的好处，

我相信必定会有一个更可观的事实呈现出来。世上的人大都怕病，病，病我也怕，但像那样的小病，我却爱。我爱小病，那是因为我能够心虚意诚地去接受他所给予我的那高贵的启发的缘故。

(原载《真美善》第6卷第6期，1930年10月16日出版)

九、母亲

我生下来了六天，我的母亲就死了。还只有六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给予我母亲的印象，就像白烟一般的淡吧！但母亲所给予我的印象更渺茫。在小时候，约摸已经能够理解一些极简单的事件，像在那样的年纪的我，常常，天空布满了繁星，火萤在树梢头飞，青蛙在池沼里叫，家人们睡在那样平和的气息里的夏夜，一边纳着凉的时候，一边便好似讲故事般的会告诉我关于我母亲在生前的种种。也有时，仿佛好容易在什么箱树角角里才找到一张已经泛着黄了的照片似的，给我看，指着一个女人，说，那是我的母亲。在那样的时候，我天真的心板上，就如一块白的布，被人映上了一个我母亲的轮廓和面貌。但不久，模糊了，模糊了，也像已经奔到老远老远的了的火车所留下的烟，我依然又消逝了我心头所有关于我母亲的恍惚的印象了。我的记忆如淘混了的水，我始终抓不住一个我母亲的具体的印象；我的母亲只是像一个被白云遮住了的晨月，朦胧地，永是隐约在水浪里的天边。

我也常常做梦，然而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我的母亲。也许我的母亲时常在我的梦里出现吧，但，即使是这样，我也仍然不认识。在梦里，我时常梦见我父亲，我也时常梦见我慈爱的祖母。每次，在我梦见了我父亲或祖母之后，我便怅然。我为什么不求他们领我去认识认识我的母亲。每个人，他有一个母亲，他有一个关于母亲的印象，但是我，我有一个母亲，我却没有一个关于母亲的记忆！

所有我能够知道一些关于我母亲在生前的种种，那也仍然只是属于一种传说。每当家人们说起一些我母亲的什么时，她们总会流露出一种

惋惜似的叹息。这叹息，与其说是惋惜我的母亲早死，还毋宁说是由于怜恤我的幼孤。中国人最爱赞颂的是已经死了的人；我母亲，母亲的生前究竟怎样，我也茫然。不过，每当家人们提起了我的母亲，当在那样的时候，在我飘忽的想象中，便现出了一付阴郁的脸貌，一个流露着一个弱者的气息似的女人。我父亲，爱赌也爱嫖。在那时，我母亲，也许就已经将她自己所有的幸福，系在了她儿子的身上去了吧。当我生出来的一刹那，光明的花朵在她酒窝里一朵朵地流泛出，像落入了幸福之渊里般，她必定会感到无底的愉快的吧。儿女的生命是父母的血，一面病的我母亲，即使病乳似乎也还非常的爱惜着。据说我母亲是一个顶爱小孩的人，但爱也罢，顶爱也罢，当为她自己的血所凝成了的儿子下地后，只有六天，六天的延留，她就完结了她这辛苦的一生，就在她还只有六天生命的无知的小生物，自己的血块之前，死去了！

还只有六天生命就死去了母亲的孤儿我，因为相貌好，皮肤白，聪明，便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他家人们所疼爱。在那样异样疼爱的祖母之抚育下，我健全地生长着，一直到14岁上我祖母死去了一年止。然而，虽则曾经抚育我14年，非常疼爱我的祖母究竟是一个年老的人了；家人们之爱，也只是母爱之外的另外一种爱。我从没有听到一声亲自我母亲嘴里吐出来的催眠之歌，我也从没有体受到一次虽则是打其实心上仍然是爱的责骂！母亲，母亲像落了山的太阳，今天是不会再升上来的了；母爱，母爱像太阳发出来的光和热，为要期待像那样的光和热的晒照，那便非等到来世不可了！

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的我，母爱，母爱真的是怎样，我自然抓不到一个具体的说述。但，每每，从伯叔母给予兄弟们的爱，嫂嫂给予侄儿们的爱上，我也能怅然地感受到母爱究竟是怎样一种可贵的味道。尿和屎，世上有几个不嫌恶的；然而世上又有几个连自己儿女的尿和屎都嫌恶的母亲？许多女人，在小姐的时候，真爱干净，但一做了母亲，即使儿女嘴里吐出来的最污腻的东西，自己也仍然会毫无其事般吞咽下去。没有儿女时的女人，她们全生命的爱，完全灌注在她丈夫的身上，但，一到做了母亲，女人所有的爱，便像决了口的河水，转过来流注到她自己的儿女身上去了。儿女，儿女是从自己身体里蜕化出来的另一个自己，那是寄藏自己的灵魂的另一个躯壳。儿女的痛或甜，便是自己的痛或甜；

儿女的暖或冷，便是自己的暖和冷。世上没有生就不爱自己儿女的女人，世上也没有不将儿女的幸福比自己的幸福更为重视的母亲。为了儿女的快乐，健全，和幸运，她愿意挨苦，她愿意忍痛，她也愿意牺牲一切自己的幸福。儿女渐渐地长大了，也像看养自己种下去了的一粒心爱的花子，现在逐渐地生长起来了般，在一种说不出的意境之中，为母亲的，她脸上和心头会不自觉地流泛出微笑和安慰。儿女总是自己的肉，即使长成得更老练些，也像叶和枝，永没有隔绝的事。母亲对儿女说的话，有几句不是从心坎里迸裂出来的？假若儿女的生命是朵花，为了那朵花的生命，做母亲的，她愿意，她愿意将自己的血，永无止息地向那朵花流泻去。

母爱，母爱是人性间至上的一种爱，然而像那样至上至深的一种爱，在我这一生，是始终如梦一般的永是虚幻的事了！家人们说，我命硬，命里顶冲了我母亲；而且照八字上讲，越是我母亲死得早，仿佛于我命上还越有好处。像这话，自然渺茫。但作算这话是真的话，那是，我母亲，为了我的幸福，断送了她的生命；为了我的生命，牺牲了她的幸福！天下的小孩，日里尽管和别人玩，但一到了夜，也像立刻就要寻窠的小鸡，便非揪着自己的母亲不可般不肯放了。小孩子，即使被母亲打了，即使母亲再声的说：“不要你，”但，还永是用尽了力气揪住了母亲的腿。天下打自己儿女的母亲的手，都像米粉捻的一样软；即使骂，也为了好。但，我现在，即使要求得到像那样一次的骂，那样一次的打，也永是不可能了！祖母和父亲，在我14岁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这21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赖了祖母的抚养，以后，便只是凭了自己这天生的资质，和从流浪在外面10年的漂泊生活中所得到的世故，人情，学问，识见，应付了一切苦难困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还仍然如飘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般的我！过去，过去的生活像条已经幻逝了的虹；未来，未来如在暴风雨之前夜的天边一颗星。这两天，新秋初上，夏夜将去，每每，在群星满布的天盖下，死一般的气息中，纳着凉的时候，儿时生活，便像电影似的映上了我的心。每次，我的思潮一溅上了旧事之追忆，我便会分外地怀念到我的母亲；而每当怀念到我的母亲时，我便更会感到一种恐惧，一种来日方长的恐惧！

1930年8月13日作

（原载《真美善》第7卷第1号，1930年11月16日出版）

十、墙

现在我心上真难过。我将用什么字眼来写出我现在的心境呢？我真想哭。假若我有一个母亲的话，我必定会立刻倒在她怀里去哭一场的。也许即使哭还不能洗去我现在的哀痛。没有一样东西能真的引起我一个笑。心为另一层膜扎紧着，所有的欢笑，都是这层膜外的东西。我没有法子从这层膜蜕化出来。我眼眶里时常湿润着，我时常会感受到一阵辛酸的刺痛。我真想到附近的荒郊去将自己的身子放在草地上，让风吹；让风里的沙土刮；让只有天，草，树枝，落叶，黄土它们看见我。我不再去理会自己的活和死，冷和热。我愿意就这样睡在那儿，一直睡在那儿，一直到假若我的哀痛还有消灭的那一天，那末我就在那一天回来。我真想这样。只有这样才可以安排怀着这样一个心境的我。但是，我有哪样的勇气？我现在正挨着病，有几天不吃东西了。我真不愿再去想这些事，真的不要再去想这些事吧！但是我能？我不能！

我真找不出适当的字句来写出我现在的心境。无论如何，要是我能够哭一回，我想必定会在哭后得到一次睡眠的。只有在那睡眠里，我才能真正的抓住了我自己。

我懊悔。我真懊悔。我真的就那样的葬送了一切了吗？我愿意相信有这么一回事，我真的愿意去相信有这么一回事？我不愿意，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但是我抓不到使我不要去相信它的保证。

我认识她还不久。但她每一件事都给我满足。我真的对于她无止的满足着。更老实地说，即使我所理想着的一个人，也不比她见得更好。我能引什么一件东西或一件事来比拟这呢？字典里没有一个字可以用来

写出我对于她所感到的满足。她什么都使我做着美丽的梦。我愿意化为她眼角上的一根眼毛，永远的依附着她。

我们认识还不久，但是我们彼此都能给彼此以一种适意。她是一线光，我愿意认住了那线光，走过去。

我真感谢她，在这短短的季候里，她已经给了我从未从一个女人心上所能领受到的温柔。我奇怪天会生出这样美丽伶俐的小姐。常常，我称赞了她一些，她总要说：“真的？”像一个小孩，逗视着我。我点了点头，于是她给我将嘴唇掀了掀；其实，她相信，她爱听我那样的话。所有我对她的称赞，每一句，每一个字眼，都是从我心头飞迸出来的。我为什么要欺骗她呢？我为什么要当她的面说一句假话呢？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她为人家欺骗一次。在她面前，所有的话都是我设的誓，赌的咒。我不愿意太赞颂她，我无庸当她的面说下许多花言巧语。她所有的好处，像经过了极名贵的雕刻家般都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了；我不再会让那些模糊的。

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价值，她待我好。她真是我顶愿意顶愿意的一个人。我情愿告诉她我所从未告诉过人的话；她给我的总是温柔。假若我永有一个像她那样能安慰我的人，这还不够使我更发奋，更上进吗？我们常常在一起走，在苍茫的薄暮里一起走。我挟着她的肩，她给了我她自己的手。即使走了长远长远，还没说过一句话，彼此也一些都不感到寂寞，都不感到枯燥。我们数着我们在煤屑路上走过所发出来的和谐的蟋蟀的声响。夜做了我们顶和睦的朋友。我们紧紧地相偎着，彼此都体会到一种充实。

有一天，问她晚上有没有事，她说：“有。但不要紧。”

她知道我想去看她，于是在分手时，说：“要是想看我，那末打过了8点钟来吧。”

我很高兴的走开了。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一些些拘束；彼此都很率直了。近来我时常去看她。我知道这不很好。我不愿意使自己的心太热。我愿意在路上走得更平稳些。但是我没有那样的耐性。我一天到晚像在沙漠里般需要一种水分。我觉得只有从她的身上，我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食料。前天，我曾去看她；昨天，我又曾去看她过；今天我还要去看她吗？我不愿意使自己跑得太快了；但我没有那样的涵养，我

心焦地常常看表。

因为知道我来，她早就在门口等着我。外面冷，于是一起上客室里去坐。客室里坏了灯，然而这使我们更惬意。她偎着我的身子站着，将膝弯跪在我坐着的沙发边上。我凝视着她，从她的微笑里，得到无数的温柔。她将手给了我，于是我们这样极任意地谈着些什么。

后来我在身旁的坐垫上拂了拂，她聪明，像一只小白猫般坐下来了。当时，她像一团雪，完全溶在我怀里。我紧紧地将她拥抱着。我骄傲，我愿意给每一个人看见，我愿意告诉每一个人：“我也有这么一天，我也有了这么一天。”

我的确从来没有像那样的一天过。以前，我始终只是像一个馋嘴的孩子般站在台角边，但是现在，我当时想，我真的体受了！那不是梦，那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梦。

我们彼此握着彼此的手，像一个顽皮的小孩般，我将自己的脸，在她光滑细腻的脸上不住地擦磨着，灯光从走廊里射了进来，我感到那样的恬静；那样的光线，那样的人，那样的情境。

远远，不知道谁在奏着 Piano。我真有些感动起来了。我不知在奏着 Piano 的那个人，她有没有料想到，有那么两个人，在流着那样的幸福之泪中，领赏着她的心曲的事。四周没有一些声音，一切都像在等候着我们去完成一件事情一样。

我心上开始感到一种紧张。我竭力想将自己的眼皮闭起来；但是不行。我再也想不起我当时的心，已经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像一个母亲，一个顶可爱的小孩睡在自己的怀里。她时常将眼皮合起来，像睡在最柔软的一张床上般沉醉着。

我们不再说一句话，我们不再需要说一句话。

她时常又将眼皮睁开来。我每次看到她的眼皮又软软地，一丝气力都没有似的合起来的时候，我便会联想到一些小说里所说的事上去了。我当时真像世上最胆小的一个人，无限的恐惧着。我像野兽般的望望走廊里有没有影子闪过，窗口有没有眼睛灼视。一切都像在等着我们，为我们祝福着。我看着她眼睛，鼻子，嘴唇。脸仍然偎在她的脸上，手还是放在她的手里，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就此也许要葬送了一切。我再也分析不出当时我自己的心理，我像一只小船在狂泛的波浪上颠簸。

我觉得就是那样也够满足了。我没有野心，没有更大的妄想。但是，耳边吹过了这样的声音：“不能利用机会的人，永是失败的！”

我又依然无疑惧起来了。我当时再也不感到一丝安定，我完全在忐忑中打转着。我得承认我是太懦弱了，我缺少这一方面的经验。我成为了一个冒险家。命运仿佛在说：“看你有没有胆跳下这个海。”

她始终没有一些些制止我心头的火的暗示。由我拥抱得紧。由我的脸不住地在她脸上磨擦。走廊里的钟，打了10响，她惊讶地问：“10点了？”

“是的，10点了！”我说。她仿佛还带一些不相信。

“10点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在压迫我。我真愿意像一个小孩般在她面前“哇”的一声哭出来，让她来解脱我心头的困恼。但是我不能，我怕她笑，我怕她诅咒我的懦弱。

时间永是那么板着脸孔走它的路。像一个走了长路的我，当时委实有些气喘了起来。我看看那样似睡的她，蓦的，怀着最后的一股决心似的，像一匹野兽，愤怒了起来。

我将我所有的光明，希望，完全掷注在一个冒险里了。

我的嘴唇开始和另外一样东西接触了，和为我的嘴唇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样东西接触了。

然而，我不愿意太放肆，我随即为两个柔软的手指拨开了。两个手指并没有一丝气力，但我不愿意以气力去征服人家。我愿意尊重那两个手指的主人的心。我让自己的嘴唇移到她的颊上留下一个痕迹吧。

像经过了一阵风暴，一切变了，从晴朗变到阴霾，夏天变到冬天……我的心，猛地从山顶上摔下了地。我感到一生从未感到过的那种恐惧。

她始终不曾有过一丝强烈的反抗。她只哭，不说一句话。她几次将头伏到沙发的靠背上去，但仍然像闯下了祸的我，颤栗地将她扶在怀里了。她当时真像有些忧郁，脸上布满着阴云。有什么一张脸能比她那时的脸给我的印象更深些呢？！我忏悔了，我不该使她难过，我不该在她快活的心上泼下一盆难堪的水。隐现在一片阴云里的她的脸，是那样美；这分外使我不安，使我懊愤。我太自私了。我找不出更好的字眼来安慰她。我陪着她流泪。

我真感谢她，要是她当时竟然的走开了，那我还有什么说呢？一切

立刻决裂了，像一块石头般爆裂了。她没有立即走开，她说她难过，现在，她要去睡了，但是，因为听见我说：“那么是明明叫我走了。”这样的话，她仍然很温和的坐了下来。当时我像一个囚犯一般的愿意受她最严酷最严酷的刑罚。只有这样，才可以减轻我所犯下的罪恶。但是她不，她没有一句话，她永落在沉默的忧郁里。

我想不出话来驱散我们两人间当时的黝氛……我想到也许我们的结合，就此完了，我便觉得悲惨。我痛，我怕。我问她：“你下次不再睬我了?!”

她摇了摇头。

“你将永远的看不起我了，你将永远的觉得我卑鄙了?!”

她还是摇了摇头。

这使我感激她，无限的感激她。她虽然这样答应我，但是这能制止我心头的战栗吗？我不能从她的默示里得到一种保证。也许她不愿再和我往还了，她当时只是在敷衍我。我是已经被人藐视了，已经失去她的看重了。我怨我自己，我怨我今天为什么要来看她。

时间很晚了，但我们之间的阴云还没有消散。我不能不为她体谅到当一个少女初次体味到这种事所有的忐忑。她答应原谅我，答应赦恕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彼此已开始保持到一种拘束，我们彼此的心门都关上了，暂时，谁也不让谁躲进来了。

想到她必定会恨我的，必定会轻视我的；我说：“xx，你告诉我你现在心里的难过吧，很不高兴吗？你不愿意说一句话?”

但是，当时的她，她还有什么情绪说出一句话呢？她说她给我信。

这样又坐了长久，我们简直再也找不到以前所曾有过的一种 Atmosphere。她脸上的忧郁，像永没有消散的希望。我惨然着。

我问：“你要睡了吧。”

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去了?”

终于在她第二次的点头之后，我站起来了。

她依然坐在沙发上。我开了门，将身子靠在门沿上，凝视着她，像想从她嘴里得到一些东西一样。

她不响，但也终于这样说：“我不送你了!”

“我不送你！”我再也不会忘记那句话的。我对她施了一个礼。所有的求赦的一颗心，完全在我的眼珠里放射了出来。我悄然地退出了客室。

我退出了客室，我退出了梦之国，我醒了，我清醒了，我开始看见了自己。

但是，我能立即就回自己的寓所吗？我愿意在她窗前巡游一整夜。我愿为她祈祷，祈祷上帝不要在她心头撒下一粒不愉快的子。我祈祷她赦了我的罪。我祈祷我的罪过不再为一个人记得；我要连我自己也忘了去。

我在她窗口近边的树林里徘徊了长久。像从云天里吹散下来的歌，一声声，凄绝的 Piano 声，不住地刺过来。假若我能够跑到奏着 Piano 那个人的家里去的话，我一定会跪着恳求她，为了救救一个人，不要使他感到太惨绝，“求求你停止了把！”

像一个囚犯等着她的判决书一样，我在颠簸的波浪中，期候着她答应给我的信。我一天到晚不愿意离开我的房间。有时，像有一种力量在拉我到门口去一样，使我依立在沿马路的窗口，看看东头有没有一个送信来的人。但是，每次，每次总是一个空。每当我实在站得不耐烦，想仍旧回到房间去的时候，也总要在最末的一刹那，向着那一头望望；也许万一就在那样一霎间会有一个人送信来的。要是回到了房间，在没有跨进房门之前，也总爱先在玻璃上张一张，看看桌子上有没有人送来的信。有一次，我听见有一个怪熟悉的足步声从楼梯上上来。

“那是下人。”我心上止不住的一阵跳。下人正站在门外拣着钥匙开门。怀着像一座火山似的心心的我，屏息了呼吸，显得特别庄重。我不愿意给谁瞧到我的心，我不愿意给谁看出我有一丝丝不安的神气。我头也不回一回，要是我的，不反正迟早总是要送到我面前来的？但是天和我淘气，下人走到另一个人的面前去了，那是告诉我：“不要狂想你的，现在你是没有人给你来信了！”

我真要咆哮了，神经完全错乱了起来。我真想撕碎我桌子上的书，折断手头的笔，掷碎茶几上的茶杯之类。我想毁灭一切，让一切和自己毁灭了吧！

我不再能忍止了，我不能让自己永久的悬吊在半空里，我不能让自己永远的失去了一些些寄顿这小小的生命的東西。我将被头蒙了自己的头，在呜咽了。

我不再能忍止我心头的火了，我愿意看见地球的爆裂。我愿意让一切体解了吧，我坐起来，我写信给她。

我一口气写了四个钟头。我不知我曾经写下了些什么。但我得承认那是我心头的血所开出的一朵花，我送给了她。

我想当天晚上她必定会有信给我的。怀着无论如何是不会没有回信来的心情，我很安定地躺在床上期候着。我时常看看放在枕边的表，8点，8点半，9点……我也时常的这样想：“也许现在她正叫人送来了。”

在很倦困的朦胧中，像忽而有一件了不得的事般的，使我像着了魔般从梦中坐了起来。我看了看桌子上，书架上，被头上，枕边……但是我找不出一个刺目的东西。我很颓然地又躺了下来。我看了看表，表告诉我快11点了。房间里的人都在做梦，整座的屋，落到了死的深渊里；只有天边的一轮新月，却从窗角头瞅视着我。

长久我还睡不着。我觉得一万分的惨。是犯了什么罪，我才受下这刑罚！谁能给我这回答？

在这种气息里，我等候着她的信，等了好几天。直到昨晚，像一片落叶似的，才吹进了我的心。我像饿虎似的几乎想一口吞下去，但同时，也像失去了那样的勇气的人，怕拆那封信。

但是我终究读完了它，我知道在读完了她那样一封信之后，自己的心，又迸生出了些什么呢？一个空虚！像地球崩裂了似的空虚！它吹灭了我所有的光明。她说她实在没有话说。你能要求一个没有话要说的人，要她非说出一些什么不可吗？你能要求一个不愿意说一句话的人，要她非说出一些什么不可吗？她又说，她觉得和男人在一起真讨厌。为了自己的清闲，她不愿再多多的接见谁了。她没有说出那个“谁”是谁。她不需要说明。“谁”，必定有着那么一个人。那一个人是谁，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一切在我面前的东西模糊了起来，我消失了我自己。

我不再记得当时我的周遭是怎样。我只仿佛听见云天里有着一一种很庄穆的声音在响，那是“我的丧钟”！

我没有气力说一句话，我只回想起了以前一些的美丽的片断。

……

她曾经称赞过我，她说我有很高的见解，很好的品行，很温和的性情，很优美的姿态。……并且说，这些话都是从她的心飞进出来的，她愿意和我结识，她觉得荣幸。

……

她也曾经告诉过我，她已经没有了生她的母亲，她也没有一个真正了不得的好朋友。她常常感着自己的孤单，自己的凄零……

……

我们曾经一起坐在太阳底下晒过太阳，我们曾经两个人坐在一起划过船，将船移在深深的柳条里，谈着天；我们曾经在一个夜的荒凉里彼此拥抱着，沉默着；我们也曾经在一起拍过照，拍了照，我说：“我要每种添印两张。”

她说：“为什么？”

我说：“要是一张遗失了呢？”

但她笑，她逗着我的鼻子说：“这种照片也会让它遗失的？”

是的，她也曾，也曾，也曾那样逗着我鼻子，像一个顶天真的小孩，一面笑，一面这样和我说过的。

……

有谁会遗忘呢，有谁再会让这些遗忘呢？

像经过了顶名贵的雕刻家的手段般，那些将永远的镂刻在我底心版上了：她的笑，她的声音，她的睇视，她的风韵，她的沉默，她的忧郁，她的哭……

我们以前，彼此之间没有一座墙，没有一层篱笆，没有树木，没有草，仿佛即使空气也没有似的。我们的心，都有一扇门：像两条鱼，各人任意地在对手的心湖里游。我们不再有拘束，不再有一些些勉强。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从晴朗变到阴霾，夏天变到冬天。我们之间已竖起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墙。我是完全被摒在这座墙外了。我摸索不到那墙的顶点，也摸索不到墙的墙脚。我找不到一扇门，我也找不到一个小孔。我永久的将被摒在这座墙外了，我听不见一些些墙内的声音，我看不见一些些墙内的事情，我再也不能幻想出那墙内的那样温和的气候了。

我像一个死尸，也许将永远，永远就这样被摈在这荒凉的墙外了。

我愿意永远的站在这堵墙外面。我等候着能将我所有的泪和血去冲倒它的那样一天。但是我能有那样一天吗？迟早也能有那样一天吗？

谁知道呢？谢谢好上帝，你给我回答了吧！

1930年11月28日病中作于上海

（原载《新月》第3卷第7期）

十一、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这几天的天气真糟，糟到极点了。像一只快要断气的懒猫，你不知道你自己该说它是死了，还是活着的好。在几万片死鱼肚上的灰白的鳞片似的云层里，偶尔漏出几线淡黄的阳光，可只一转身，又仍然摆出了一副十足可怕的脸色。当真说下雨，又没多雨点落下来。只是弄得满处都湿，像一个褴褛的孩子，叫你见了愠气。

然而比这天气更坏，更没劲的是我近来的心境。我从来没有像近来般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那样不可疗治的病态里过。我不明白究竟是为了哪一点，也没有理由一定要逼着自己去回答这问题。即使因为早年就没有父母，从来不向谁诉一声苦的我，前次也接到了家里来信，说对我不放心得很。虽然过后又懊悔何必去多嘴，但毕竟暗漆的生活太使我透不过气来了，我写信给伯父，说近来身体和心境都坏到极点，似乎坏到无可收拾了，我不再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还要让自己再生存下去。家里来信劝我还是回家休养休养吧，但我觉得回去了未必心境就能好，而且也许会变得更坏了。这身体，不是一年半载会得变成健康的，挨一天算一天吧，我说，要是暑假里能上山里去住两个月，也许可以好一些。

我这个人以前是很积极的。对于自己的将来，作着若干伟大的梦。我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那样随便地在这个世上消灭。但近来，这两三个月，我的思索里逐渐沾上了一层灰色。我好笑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觉得有一种黝暗的念头在自己的心上渐渐芽长起来的危险，一方面又充分地任它芽长去。人是有些小聪明，我告诉茜这样说，不能完全说低能。但是种种不可避免的幻灭的灵感，一天天加多地向我袭击过来，为逃避现

实的折磨，我该赶快去栽培一种勇气来结束我这可怜的小生命。她来信给我许多劝慰，自然我得谢谢她的好意。她说现在这中国需要着我这种人，我的故乡也需要着我，我的家庭更在热望着我的出头，朋友们也在祝福着我的飞黄腾达。我不该太自弃了，我不该太将自己的前途糟蹋了，为什么近来不再能在纸张上领受到我活跃的气息了呢？每当她接到了我的信，这些充满着忧和愁的信时，她也很感动地引起了她自己的伤心。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读了我的信后，会那样的沉默。她该知道她自己是在思索些什么，她拣了许多好话，装在信袋里送给了我。对于这恩惠，我实在不再能吝啬我自己对她的铭感和爱了。说中国和故乡需要着我这种人，是空话，但我家里确在热望着我的出来。我自己也想，为了死去的祖母和母亲，我不能忍心让她们的灵魂感到一种不安。自己还正是一粒芝麻刚开头，真的这样将自己毁灭了也可惜。但是我不能太为了别人的希望，就全将自己放在痛楚里挨。我没有力量一定要自己这样干。况且一了万了，失去了知觉之后，“可惜”之感，也便无从凭寄了。为了这样，我觉得就让一切以前做过的梦都丢下了大海里，一切不可忘的回忆都消失在白雾里，这小小的生命所给予人们的印象，也让它在时间里淡去了吧。蜕脱这苦恼的氛围，为着自己的实惠。我真想这样了结了我这短促的一生。

自然这只是一些正在打滚的思绪，我现在还并没完全走上了极端的厌世的顶角。生活虽然使我落在没有一丝弹性的烂泥里，但朋友们却还能时常从我的酒涡里找到笑的痕迹。许多人因为一种压迫到无可解救，于是去死；但为了逃避精神上的折磨，愿意放掉在这个世上一切物质的享乐的也很有。这一种念头要是在一个人的心头一栽养到成熟，除非真有天大的力量跳进他的心，一切挽救，皆为罔效。虽说真的要去决然毅行的时候需要一种大力，但你能说，这大力，在某一时期并某一事件下，你不能充分地使你自己得到吗？

人是不该太聪明的。太聪明的人，固然有他别人理会不到的乐趣，但同时也就有他别人理会不到的痛楚。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是太强了，我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不能过分的抽烟，过分的喝酒，也经不起极强烈的震动。然而一天到晚是毫不爱惜地在浪费着自己的脑力。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

样的不懂得去珍重自己。每天很早的就醒了，好像我的眼部构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无论隔夜睡得多么迟，只消天一亮，我便不再能让自己在梦里多逗留一分钟。人家是醒了之后，许多事情才跳上他心头的，但我却是像先有许多事纠缠在脑子里，才想醒来的一样。我常常会凭空做下许多文章。我相信这一些用脑汁在空中连构下来的句子，都比我写在这一些纸上的更要华丽，生动得好几倍。只要偶尔一件极小极小的事跳上了我的心，我便不能再多睡一回。躺在床上则乱想着许多事，像一座磨，许多碎屑跳了进来又滑了出去。这些自然都是最伤身体的，但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收拾它。

我常常为许多极琐小的事，不自制地悲伤着。看见好山水，也会流下泪来。一切为旁人所引为非常满足的事，在我感受来是依然失望的。一个人不能不寻出一件适合于他的事来安顿他的心灵，但近来便没有一件事令我高兴。我怕去翻一页书，写下一个字。生活里像有着无数万个缺陷，成天地徘徊在孤独里。跑上了楼又想下去，在草地上看见春天也只悲伤。我不明白自己该怎样去安排这个身子和这颗心。我又不爱上跳舞场，不爱去戏院，有许多可以来麻醉我的消遣，我全不爱，这些自然都是生来使自己应该更多受罪，谁叫你不能将你的趣味更迁就一些呢？一天到晚在祈求着一种刺激，但又没有一件事能令我忘去自己的苦恼，近来我常常想去看一些卓别林或罗克的影片，我想别再太傻了，有机会，还是化一些钱去买几小时的欢笑吧。但为怕在片子没有开映前一个人坐在戏院子里的寂寞的袭来，也仍然使我懒得动。近来连报纸都不很去看；我一天一天地颓唐下去了。

为了这样，茜几次写信来劝我。这自然因为彼此有一些小小友谊，我不该完全隐讳说我不需要她给我的安慰。她上上海来看我了。前几天，像一阵清风地来的她，也终于又像一阵清风地去了；没有收到她的好处，却受到了更苦恼的折磨。那自然也因为天下雨，她又是那样的忙，我不该有一丝怨恨。世上的人情原都是假的，要是你自己没有力量去推倒你自己的命运，你得劝你闭上自己的嘴。我也曾经好好的安排下一些日子等她来。但雨丝只给你织出一个惆怅的梦；她走了，她走了，她在我梦里走了。

我不能当着 Gorky 的面问他怎样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女人是顶坏又

是顶好的东西。有许多青年的人，为着女人在闹死。什么都懒了，不能写下一句诗；这似乎成为一种世纪病般到处在播散传染着。我近来的心境坏是为了女人，但我也不能完全隐讳说不是为了近来的生活里缺少了这一份食料的缘故。

朋友们也从来没听见我嘴里吐出那些苦恼的字眼过。是在一个阴沉的黄昏，和几个朋友在路边散步。黑夜不能给我更深的惧怕了，星星没张开她们的眼睛。我颓然地靠在一株梧桐树上，远处的柳絮，殷勤地飘落到我头发上来，天像真要将我弄成完全不像一个年轻的伙子了一样。他们听了我的话，显出了一种不自制的沉默。从一个素来不染一些些厌世观念的人的嘴里忽而听见许多可怕的句子，似乎只有沉默才能表示出他们的惊讶。他们说准是为了一些 love 的勾当，这自然我不该承认。我写信给家里也说，一个人的心境，坏是无数个因子渐渐地凑成的。在这儿，我该说到一些成家人世的话。每个人对于他自己怀有一个最高的奢望和极低的迁就。将生活放在极机械极有规律的格局里，是许多人的愿意，维持一个平凡的一生。另一部分便不作这种安排。我自己得算入后一种。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自己究竟想飞到多高。天地是那样的大，大到可怕。许多正在呼啸着的人们，你不知道他们在你心头又得到多少崇仰和藐卑；然而他们的活动能让人家知道已不容易的了。机器的腾达将我们对于生活的胃口提得够高。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怎样凭两只空手去造成你梦里的伟大的功业和华丽的天堂！你也不能去问一问你自己的命运，问它你有没有这个命运可以使自己努力去将那像一只没栅栏的馬的“现实”牵进了你理想的圈栏！

这些都该算是很渺茫的事。在对付这当前的烦恼都感到局促之中，还要抽出工夫去想那些不可知的事，我该承认完全是自己寻上身的罪孽。一个朋友说，像落在水里般只向下钻是不行的。人单整天地在盲想，够危险。因为这里可以使你得不到一个解救。我该快些去找一些书本子来看，靠书本里的东西来抗御那些外来的袭击。这是一句顶悬直的话。如其环境不能变换我生活的情调，我只能用理智来解救自己了。但是实际上我近来对于一切事都怕，让一切都停顿着。书本上的灰尘渐渐地在加厚起来，我委实没有一丝胆量去找什么哲学来读。似乎自己也真不想去收拾这潦倒了。身体是坏到极点。常常心痛，而且郁塞得利害。成天困

倦着，我真不能告诉你每天睡眠要占去我多少的时间。明知是这样，我该更其去爱惜自己的身子了，然而不能。我为着许多事在空烦心。人生来就不是能睁开眼睛装做不见的人，心上怨恨也只该让自己知道。偶尔吐一两口血，心肠硬一硬，也便不去给以悼惜了。

这儿的的地方又坏，坏到无可形容。简直比牢狱还糟，比坟墓还可怕。我成天地咒诅着。没有勇气立即离开这地方，然而又真恨透。没有一块地方我想能比这块地方更使我咒诅的！全没有一些生机。全没有一些蓬勃的气象。一切事情都使你听了来气。我不懂得许多人很情愿地逗留在这儿是在等着些什么。朋友少得可怜，只有忍住气才能稍稍和他们敷衍几句。像这种环境真使我怕再留守下去，我真愿望自己能立刻离开这座文明的牢狱。

……

真不敢再想下去。一切都使我怕。季候是坏到这样，这10天来我没好好吃下一碗饭。看一看天对它白一白眼，它照样的似乎在想逼死我。全没办法。人生就是那样的 Sentimental，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没有停的一天的希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应该想一些方法来收拾我自己。昨天茜又有信来，说不知我究竟需要些什么。谁能够救我呢，她说，真是可怜的孩子。说可怜，也真是自己活该。对于她的温柔，我是无法拒绝的。但是我怎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又告诉她，谁能够救我呢？

傍晚时拖着枯瘦的身子在路旁散步，篱笆里已画上了很浓很幽邃的绿色。树木到处繁长着，像一个人头上长久没剃的头发样的懒散。景色完全是初夏了，那是说，又一个春天放跑了！

1931年柳花纷飞时在上海
(原载《新月》第3卷第12期)

十二、一段军行散记

(一)

1931年的下半年，中国的一般知识阶级，特别是青年学生，全疯狂在一种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的冲动里。

一个人爱他的国家，与其说是理性的怂恿，还毋宁说是感情的泛澜。爱国这一宗思想，在时代的巨轮下迸裂出来，也就会得在时代的巨轮下消灭。但在近世，一直到20世纪的目下，这一宗思想，不断的飞跃着，达到了顶点，所有在这些时代生下来的人，似曾都收下过上帝渗给他的一滴血：他爱他的家庭，爱他的朋友，也爱他的国家。

1931年下半年的中国，是枯枝上将要落下的一枝叶，一粒石子已滚到千丈深的绝崖的角线上。一窠穴蚁眼见大流排山倒海的冲过来，拔起了厦屋，拔起了摩天的大树。像一个怨秋的寡妇，中国人在那时，是哇的一声哭出来了；一个纵然是下钝的低能儿，也要卷一卷他的衣袖，将拳头在他带着泪花的红瞳子前扬一个威风。11月下旬上海中部的一座会所里，有着几十个年轻的人，有着铁一般贞坚山一般端重的心，权当他们就算是那么一个低能儿，他们也要吐一吐低能儿的黷，一次不可欺侮的血性。

这几十个青年，抛下了他们二三十年来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所积蓄下来的物质及精神的全部产业，合着他们目标相合的同志，要想爆裂出一声，爆裂出一声像狮子的狂吼；演一次，演一次像飓风卷起了太平洋

的大浪。他们要带着他们不可忍的义愤，跨过那雄壮的山海关，上山海关外去洒下一摊血，为他们老大的民族开一朵鲜艳的花。经过千百的努力，靠了同情他们的人的助手与鼓舞，在xx月x日的上午，他们检点他们的同志，有着 300 不到这样一个数目。

在这 300 不到的一支假军队里，有着他之一员。

(二)

在出发的前一天，他从北四川路的一座酒楼里走出来。他经过那密排钢骨的外白渡桥，在太阳里吐出金圆文明的沙逊屋顶，以及像一团混浆的日升楼下。他又在一些静穆而带几分萧条的马路上走过，看太阳将自己的影子，从马路的这头送到马路的那头。在那时，没有一个人再占据在他心头，也不再有一件事拨动他的记忆。

他在均匀的呼吸里回到学校里。坐在椅子上，看一回挂在他自己床头的那两幅大油画。他看过一排在书架上好好站着书，看见半段网球拍的柄横在桌子边，那上面，有着他无数次的手泽。抽开抽屉，信手一翻，没有一样东西有他的需要。他摊开一本历史，对着 Byron 的照片凝着神，在那小小的照片上，他留下了一个吻。

他草草的卷起一条被头和一条毡单。要的衣服全加在身上。一切为他所爱读的书和他自己写下的文稿，那时全宣告失散了它们的主人。

有一个朋友要他去喝一杯咖啡；能以一杯咖啡来作他们几年来友谊的收场，在这颠沛的国度里，仍不失为一宗幸运。在暮色里，他伴着他那朋友，在一条沙沙的泥路上走过；那沙沙的泥路，它受过他无数次的软步，他伴过他有数次的寂寞。

在一支淡淡的灯光下，他们对坐下来。他下意识地看看他那朋友终年撩乱的头发，和一个小小带一些红的鼻子。一切挑不起他的兴奋，在黯然里他吐着黯然的感情。

所有的那一整天，盘据了他的心的不是英雄意识，不是生命留恋，也不是死犯的恐惧；只是一个死犯在去刑场路上的无知。

他在夜色中悄悄地离开了学校。他不曾对着天空吐下一声多情的辞句，带着小小的一个衣包，在错纵的人行线里，走进了他们的团部。

团部驻在一所阴惨的会馆里。在那里，没有明亮的灯，但却有无数明亮的心。他不认识一个人，他不需要认识一个人，每个人都像是他顶亲昵的友人。

第二天下午，大队开到北站。钻动的群众向他们包围过来。像有一种大力将要转运地球，一声呼喊震碎了天空。不断的狂号，不断的鼓掌；一片的血流，一片的泪流。纸条儿从东头飞到西头，南头又跳到北头，民族原始的兽性在那里放量地挥发着。

队伍蜿蜒地行进了月台。成万的群众散布到广大的空地上和轨道上。欢呼与掌声暴风雨般在空中旋转着。

在那时，他有的是一支钢炭刚着上大火的力道，同时也有着那样的文静与沉着。他骇怕让自己的视线和任何一个人接触，他怕他为任何一个相识的友人瞥见，他也怕他的脸影在任何一个不相识的人的印象上留下淡淡的一点。

有两个他面熟而不知名的同学，要求为他摄下一张照。他自然没有拒绝他们的要求的理由。他在一次热热的握手里，谢了谢他们的关切与殷勤，他们又悄悄地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

列车要在夜间 11 点 40 分开行，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散去了。

为意外的鼓舞所充斥了的月台；在那时，便现出了一种更其深刻的冷落。从队伍进达了北站，一直到那夜深，不断的扰乱是许多同志家族的寻觅。父亲，母亲，姊妹，兄弟，妻子，未嫁妻，情人等全有。他们都像失去了灵魂的人们来找寻他们的生命，眼睛里射着悲哀的火和死之恐惧。就不是家族来闹着要拉回去，也准有许多亲戚朋友送行。一回鼓励一回祝福，一段别离一段恋情。在默对与暗泣，挥手与洒泪里，他看到不可分的骨肉的恩情和朋友的连系。

他，他没有父母，他没有兄弟，他没有姊妹。他也不愿意让这种消息在一些朋友的心坎上掀起纵然是极微小的一个浪花。他只暗暗的躲在角落里，看着人家的扰乱。一方面，虽然他感到微微的寂寞，但在那微微的寂寞里，又收到一种没牵挂的骄傲。

列车原定 11 点 40 分开行，但当道的压迫，使队伍在愤恨里，在月台上坐守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不再希望得到路局的恩惠了。他们骄傲他们自己都有两只提得起的脚。队伍决计用步行向西进发，铁石般决心克服了一昼夜来的疲困。

团旗在旷野的鲜风中飞扬着，在那飞扬的波纹里，有着那近 300 个年轻英雄的灵魂。

(三)

在一种活跃的鼓舞里他们一路向西推进着。每个人都带着伟大的忠诚和澎湃的热血。从一早起来，到晚上休息，整整的 16 个钟头里有的是矫健和饱满。没有一个人流出一分颓唐，懒惰，或萎缩。在路上，一整排旗在一行队伍前面作着前导，司令是一支号，它支配着全队的进行与休息。大队沿着无尽头的铁轨迅速地向前移动着，经过每一个城市或乡镇，他们都受到广大的群众的欢迎和招待。

在循次下，队伍抵达了 xx。也活该，是他逃不掉的一次折磨，在不经心中，他遇见了他的“Dear”。

他的加入这一次行军，在时间上是很短促而匆迫的。但就不是为了时间的短促，他也找不到理由说，这种行动要先征求了她的意见再决定自己的进退。他只在出发的前一天，曾经涂下一个条子寄给她。自问原没有再见一次的机缘了，活该中途又改了步行。

在那时，不消说，他看见一粒一粒发亮的水球在她那美丽的带着悲愁的眼角上连珠似的落下来。但她的悲哀拉不回他的决心。他默默的在她润湿的眸子里消失了他自己的阴影。

在离开 xx 时，他偷暇给她写了封信。他说：“我爱我的国家，正如我爱我的 Lover 一样。”

一个男子，毕竟有着他比恋爱更重要的责任。他不能为了爱一个女子，便抛下国家，假如他真正的爱那个女子，他一定格外爱他的国家。

(四)

经过了 10 天的路程，大队进达到南京。在南京，有一次小小停留。

这一个集团里的分子是很复杂的，各式各样的角色全有。有军事家，学飞机的，修理桥梁并器械的，当过营长和炮兵连连长的；有小商人；有艺术家，会画得一手大幅的好油画；有小说家；有诗人；有教书匠；有医生与看护，救护队是他们的分；有工人；有伙夫与杂差，一行的伙食由他们担当。如其说程度，那就更齐全，留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连一个字都不识的。这成分，真够你想起了中古时期十字军东征那可怕的情境。

每天天没亮，号子就吹破你的酣梦。贪睡是你自己的不长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寒雾中，大半是用冷水来洗刷你自己的脸；要是你起身得迟，那你的脸就得搁到点名和早操后再收拾它。从睁开眼睛起，到什么时候才有东西滑进你的肚，你全没把握知道，正如一切人全没把握知道命运将怎样来安排他们一样。有工作做的，忙着他们的工作，一片紧张里的一片杂乱，一片杂乱还加上一片紧张。每个人，从不相识到亲昵，开口没虚套，也不用安排许多曲折，说笑是大家的份。一声用饭号，于是，像大水灌进一个低塘的瞬息，一群饿狼开了闸门的狂奔，你就眼见几百双着了慌的眼睛，眼睛里冒出来的绿火，也够使天地变一次颜色。有桌子时，大家围着桌子立好，八个人，少不了一个；没桌子，泥土是你的桌子也是你的椅。大家不说一句话，只听到一片不规律的缭绕。饭量大或吃得慢的，那时全得加快，再一声令，像泰山一样的重，就由不得你多延宕一分钟。站好，归队，解散，再去洗你的碗筷，你自己的碗筷真得当心管束好，否则挨饿准是你的荣耀。

晚上，没大屋时大家分得住，有大屋就住在一起。像伤兵院里的安排，一个个地铺，在横直的线条里，一次休息号后，大家收拾起他们一天的疲劳。

在那一团里，他们有的是严肃与服从，不是放浪与自由；要的是整齐不是美。

(五)

五天五夜的挨，到头完毕了他们津浦线上的长程。

这五天五夜的长程里，他们一共吃过两次饭和十几个馒头。水在那里比在沙漠里还稀罕。每个人，像四五岁的乡间孩子，只要有食料，就得没命的往自己喉管里塞，干净与卫生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用的字眼。津浦线沿路不缺少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料买。烧鸡是头挑的吃品，其余像大饼，珍珠米燃的粥，或元宵。每个人的手，那时都变成一个厨师的手，脸是一个挨了十天八天病的吃红丸子人的脸，灰尘和着你皮肤里进出来的脂肪，像一个南非洲人用油涂着他们的脚般的粘牢在你的脸上。眼屎成了你顶知己的朋友，时时不忘地来访问你。你所有的世界是一方尺的世界，要不是，你就准侵略了别人的势力。

没有睡眠，没有食料，没有水份，没有空气与日光，像两车厢猪仔，从南头运上北头，那情况，比“动荡中的苏俄农村”中所描写的还可怕。但是在他们，他们却仍然紧握着他们的决心，一种宗教般信心永远在燃烧着他们的热情。

(六)

现在，他们那一支人马正停留在北平，他们在那儿，暂时受一些军事上的训练。身体虚弱现象的日渐露骨，煽不起他对自己发生一点恐慌。他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生活放在一种规律中，冀期能保持他几分健康。他在那儿也不和一个朋友多写下一封信，他尽量的努力着维护他心头的平衡。

一路上，他没有回忆或留恋，有的只是无止的雄壮的憧憬。紫萝兰颜色的灯光，灯光下亮地板上的婀娜的身段与腰枝，是 Fox Trot 或者 Waltz；一束皱皱的玫瑰红的窗帘布内偷跑出来的像云雀在云端里散下的歌，是 Stain Song 或者 Dream Lover；在涨红了脸将炸开了脑袋里的疯狂

与浪漫里，来一杯鲜血样的葡萄酒或者淡淡的苦咖啡；手弯里带着一个小姐的美丽与聪明，一起在春之晨看朝霞或者秋之夜看新月；这一切，不再有他的份，也不再是他的羡慕。他也不再会坐到一次天鹅绒似的沙发，看到卖淫妇一双妖媚的眼睛，在用红木砌成的地上留下一个脚迹，吐出为一个女人拂一拂头发上的灰尘的一分小心。恋愁与惜别，3000里的相思，都不再捉住它们自己的稀罕。他也不再想，让成千成万的群众，听着自己的演讲，给自己拥护，给自己鼓掌。他的心，永远落在广漠的塞外的一个帐篷里，他的眼睛就永远望着那挂着他自己的心的那个帐篷的顶。他不再让自己颈子向后画下一个小角度。一切旧尘，像落花，让流水带去，像枯叶，给西风送进黄土。他梦着摩天的关门，关门上的一额横匾；长城万里，万里城上的朔风。绝塞的严寒，凝不冻他的热血；夜半的哭泣，吓不碎他的雄胆。他要让自己去承当那几千里一片广土上的月色，在白白的月色下吹一段凄壮的胡笳；他要奔上那不长一根青草的山头，在山头上引吊一回那破碎的山河。要带着张飞般的喉咙，从这个山头一口气奔上那个山头，要在错综的山头，蜿蜒的河流和无边的平原上，洒遍他的鲜血，用他的鲜血来浇退敌人的气焰。

1932年1月

(原载《新月》第4卷第1期)

十三、来京记

自从去年7月吃了论语社几位朋友的饭以后，我和这些友人便暂时分居了。分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住山中养病去了。

其实，我又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病。比如说，我在山上，一顿能吃两碗多饭，每天略看一些书，高兴还得随便写一些文章，早晚看云霞而已。

我家对门的一个小皮匠生了12年的癩痢，还没敢昌言入山养病，而我为什么居然会屏绝世事，独往山中去了呢？看官有所不知，原来我幼有大志，虽不想做万世皇帝，可起码也得做一个如现在所谓的要人。可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要人，积2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先生病上训练起来。假如你不懂得在必要时将如何嚷着说生病了，而此病又必须休养的话，那末要人之梦，便全没你份了。

我是一直住在京杭道上顶闻名的庚桑洞里的。我为什么要跑到那地方去养病呢？原来也有一番道理。因为匡庐我虽想去，但已有了林主席；香港即使没有胡前立法院长，我也嫌他与我的根据地江苏太远，有鞭长莫及之慨；妙高台不消说更有蒋委员长在那儿，莫干山周家虽有渊源，无奈凭空又飞去了汪行政院长。我之不能往莫干山，正如胡之不能来匡庐；我之不能去匡庐，又正如汪之不能往妙高台。原来在中国，我们都必须各据一方，才好做手脚，才能培植自己的声势；这就是我所以不得已还是选定了自家的庚桑洞的苦心。

可是我住在庚桑洞里，有一件事使我心上大不满意。原来当地的那些新闻记者一个都不来晋谒，这也就难怪萧伯纳在香港对路透社访员说

中国的新闻记者幼稚了。

我在庚桑洞住下不久之后，吴稚晖何应钦和李书华三位先生都也来游洞。我不十分清楚是不是他们因为我到了那洞以后他们才来的，不过怎么我以前没有住到那儿的时候，他们从没想到去游庚桑洞呢？可见其中自有缘故，这在我倒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只是看官诸公，你们切莫误会。他们三位先生来游洞，我事前毫无消息，事后也并无任何表现，可见一无政治作用，外间流言，实属可笑。

自从他们三位先生来过之后，我那门前便渐渐有新闻记者的影子出现了。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先生问我，前次吴委员何部长李部长来游，是不是都由我招待，我颌首答之，可不料，那位记者先生就此以后将我的生活起居也时常在当地的报纸上登起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又没有给过他们津贴或其他好处。后来我遇见那位记者先生，问他什么道理，他只笑而不答，我至今莫名其妙。

不但报纸上给我登起居，并且朋友们在谈天中也便常常引到我。比如说，“我的朋友（应当改为好友，真好友）储安平现在在庚桑洞养病，”这样的话，有许多认识我的人近来都很爱在嘴里吐出来的。什么道理呢？还是其中一个顶老实的朋友告诉了我，他说，捧自己的朋友就等于捧自己，这叫 TeamWork；我恍然。

天下原无不可医的病，什么病得用什么药。比如说，金鸡纳霜是医疟疾的，情人是医相思病的，有的病则如院长部长也可医，且竟有如百龄机般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者。我去养病原是训练做要人。可是“要人病”的好坏有时全不能让自己作主，有时又自己一个心血来潮也可作得了主的。要人病大概只能生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如两三年这么生下去还不见起色，也许从此就不“要”了。有一天晚上，我忽而明白了这一层，于是第二天早上病即霍然大愈，决计下山。

做要人是有步骤的。大概先上南京，其次是上海（青岛或香港或澳门也可），终于出洋（自然是考察）。出洋之后还有余勇可买，于是再在上海挂一下律师照牌。我那时正有不少友人约我上南京去，我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他们即日来京。

从庚桑洞到南京只须坐京杭汽车即到（庚桑洞目下尚无飞机场，此注）。当我正将上车时，常州忽来了电报，说外祖母死去，于是，临时只

得转乘小轮到常州，在灵前磕了头，第二天乘火车来南京。

我以前坐火车的哲学是宁坐三等不坐二等，因为略苦几个小时，即可省出一倍车票。后来这个哲学忽然转变了：宁坐二等不坐三等，以为只多出一倍车票即可舒适数小时，又何乐不为。但最近，我的思想又更深入了，就是放弃永久主张，且待相机行事。我觉得这态度是顶可取的，因为这态度可以饱暖一世。

我两夜未能好睡，所以在车上很乏，打起盹来了。突然之间我忽然觉得有人在偷我的皮夹子，于是我斗然而起，轰轰烈烈的将那个小窃捉住了。那个小窃很可怜的向我讨赦，我也觉得他可怜，不欲深究，以防意外。继而一想，他向我讨赦是他的本分，我赦了他亦没有什么稀罕，为示我宽宏大量起见，我即从皮夹子里摸了四角小洋给他，他出乎意外，大谢而去，于是我觉得光辉满脸，甚有面子。

过后我越想越高兴，我已经有如此怀度，将来很够做一个外交大员了。

我的车票本来是买到下关的。车过龙潭时，我忽而一想，假如在南京的朋友们知道我来了（因为常州火车站的记者先生早就打了电报给南京了），他们真的在下关车站上接候，并且在月台上挂了一块大白布，上面写什么“欢迎储安平同志入京共赴国难”等的字眼，倒叫我一时为难。于是我决定为避器起见，在和平门悄悄下车。

出了月台照理是检查。我于是目空一切地从皮包里掏了一张名片给他。那个检查兵看了看名片，片子上只刻着光头的储安平三字，并无其他官衔。他看看我，忽而行一敬礼，我俨然跳上了马车。

后来，那些朋友们知道我来了，于是纷纷都来看我。当晚许多同乡给我设宴洗尘，并请演说，我早知有此一着，故演说稿在车上即拟就了。凡讲48分钟，其大意如下：

生于今日之中国，其责任较生于任何时代之中国为严重。今日之中国者，可怜之中国也。使此可怜之中国变为不可怜之中国，皆吾辈之责也。然则如何方能使此可怜之中国变为不可怜之中国乎？曰，只有一法，即全国必须一心（鼓掌），民众均服从政府（鼓掌）。盖未有内不安而能攘外者也（大鼓掌）。诸君其勉乎哉。

第二日午饭，许多老同学请客，我想他们如也要请我演说即糟了，因为他们都是老奸巨滑，很难对付的。眉毛一皱，计上心来。原来做要人必须肚子装满九套话。如九套话应用过了，还有一套，就是：“为政不在多言”。我那天就应用第十套一次，居然也敷衍过去了。

这篇来京记写完了。我以后为表示国难期间，精诚团结起见，决不高蹈。可是有一点要声明，“如林大主笔叫我写南京通信，恕咱不能答应。原来咱这傻瓜，写文章用真名字发表，如写南京通信，万一出了乱子，怕不成第二个刘煜生和王慰三？”（但我自愿写的自然例外，做中国人说话，必须多留余地。）

1933年2月南京

（原载《论语》第3卷第14期，1933年4月1日出版）

十四、豁蒙楼暮色

今天身子稍为健了些，清早在院子里散步，看见柳条都发青了。只两天没有走下床，外面的世界便变得那么快吗？新绿这色调我是十分爱的，但我又觉得这颜色太刻薄。一个中学生顶愉快的是礼拜六的晚上，一个孩子顶活泼的是过节过年的那一天；可是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永远是希望生存在百草尚未上绿那样的早春之季的吧，这样想着的我，却非人情地绷起一种暮春之感，仍然踱回到自己的房里。

我到南京已有一个多月，仅仅看见三天有太阳。今天天气还是那样的像一个吝啬的房东太太的脸，像一个高官府上的门房先生的眼珠子；总之，使你见了要苦笑不止。

饭后在床上假寐，听窗外淅沥之歌。睡了三个钟头，犹未成眠。沉入于一切杂感之我，于是披了衣服起来，撑着雨伞走出寓所。常常在许多地方，会因为看见自己的形单影只而引起若干孤独之感的吧，但索兴抱着一种悠闲的心情，一个子在外面踱踱，倒又觉得无上高雅。怀着这样一种超然的心情，随便上崇山峻岭，江河大流，荒落坟郊，或士女错综的都市公园里，都能得到一种冲淡之趣。我向台城走去，沿路风雨交集，还疏疏落落夹些雪珠。这衰弱的身子不够这样的摧残吧，但也只有风雨的狂暴可以杀威我的伤时之感。城墙由东头的山腰里铺过来，从我的脚下再伸出去，一直到北头，十分严肃。玄武湖假着城墙，若稍带一些书卷之气看来，俨然是横条一幅。村庄如睡，树木安静，湖水没有言语。纵然有雨点在逗，但在全景上，也仅仅因此加重一点灰色，如一个年轻的新寡，在严肃的城墙下，守着静穆，不敢叹息。

天十分惨淡，云是灰暗的，一层一层泛起，在远山之顶上厮摩着。紫金山一带都隐约的躲在迷雾里，仅仅看出一些轮廓。我十分喜悦这种情境。我喜悦山影在迷雾里，我喜悦月亮在迷雾里，我怕黑暗我爱薄暮。——我爱在薄暮里，像是消失了自己，像是还看见自己。

我在台城上这样闲散自在的走着。我俨然如天地万物之主，又俨然觉得天地万物间无我。既无我，也无我之叹息了吧。

这样忘形的笑着，我跨进了鸡鸣寺。

我在豁蒙楼上靠窗口坐下。这样的大雨又是这样的傍晚，我之来，真是非人情的了。我悄悄的听那壁上钟摆的滴答。庙堂里的晚钟，那样沉着的破空而来，真使人听了吃惊不止，钟声在空中持久的回荡，若有无限禅机。一个因早年失身而落魄了的女子，至此会不顾一切地去跪在神座前流着泪忏悔了起来的吧！这钟声在空中之回荡，真能使人听之默念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这样幽然神往之我，仿佛真有出世之感。生老病死之外，再加上因近代都市文明的加速而增加的幻影消灭之悲哀，真是人生无往不苦，既要加餐，又要排泻！既要早起，又要晚睡；宇宙在白昼与黑夜之循环交替中延续下去。人们大多不愿意自己叹息吧，但无声的叹息比叹息更惨。我之上台城，想略略减少我一些无声之叹息吧，但我恍惚又需要更多之无声的叹息，好用来延续自己残破的生命：人世一切真是非理可喻。

被远山背后的反光所耀，我从幻想中再去看湖光暮色。湖面被夕光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于黑暗，似亦心甘。一群不知是白鸽还是白鸥，总之是那样白得可爱的一群，在湖面上扑落飞扬，遥远遥远，终于又在水光天色里消灭了，仅仅留下一些残影在观者之我的脑子里。

八九年前常常跟着人家来此喝茶之我，至今还能了然想起小孩之我是如何的活泼。10年20年后之我，再来吃茶时，也仍能一样了想起今日之我那样冒雨而来的固执吧，这样想时，仿佛在一秒钟里已经过了10年20年般，见到将来之我，还一样如今日之潦倒。去年春天，我有

一时睡在床上，见了友人且说着“非病也，非愁也，愁病耳，病愁耳”一类的话的，这事，实俨如昨日。那时因心境坏到无可收拾，于是老在午睡里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之我，想起无福享受春绿风光，还记得有过如下的句子：

醒后依着枕头听窗外鸟鸣
春鸟偷偷的告诉我春天的多情
照一照镜子看见脸上泛起的春红
上帝准知道我当时的心境

可是曾几何时，今日又再见柳梢染上了新绿了！少年心情最难测，近来，若有理由，若无理由，我说恍惚如有所失，仿佛连发奋亦属多事似的。

曾经在我自己的感情的颜色与光彩一文里说起一个人的感情有严肃与泛滥。严肃与泛滥的程度相差到可惊，这真是我之固执了。仿佛很有决心不去再浪费时间在在一个演剧上，但忽然高兴在一个黄昏的工夫也竟会合着几个人连脚本都抄完且印成功了的（这样的事，在我真是常有的，曾经几次发奋，说非读熟万卷书不可的我，可是在颓唐来时，也仍然会让日子 10 天半个月的那样白白挨过去），这样的事，当我在第二次再发奋时，又不禁要引为可笑。没有几天前，在玮德家里和他默默对坐，两人都十分乏，反对上什么地方去跑，可是到头又都让自己将乏倦的身子抬上了豁蒙楼，在豁蒙楼上坐下，也感觉乏趣，但又无有勇气再走出来。看山也呆板，看水也呆板，一切都单调，狂饮着无一丝儿茶味之水，没有一句话可说。且看他人之高兴，及其喝茶姿势，起初倒颇感兴趣之我，忽而又觉一切人皆可怜。但也许当时更有人在以我为悯恤吧，这样想时，又意外的使自己吃惊起来。

正在那时，一个和尚捧了一盂茶走进豁蒙楼来。他在另一头靠窗坐下，和我遥遥相对。以我十分孤独，他特来伴我一坐的吧，作这样想之我，便向他招呼：“今天贵寺很冷净呀。”

那个和尚若听见若未听见，隔了长久，才“唔”的吐出一次微声。

一个俗和尚呀——我心上作如是想。

但既以为贵寺今天很冷净，又何必再问；这样自索着的我。想来又觉得十分可笑。如那和尚给了我一句答话，也许我便无从再发觉自己之可笑了吧，这样，我觉得那和尚又甚有道理。

“和尚先生这两天很凉呀。”

“唔唔。”

和尚先生还是那样的答着。和尚先生用“唔唔”来答应，是承认这两天的天气是凉吧，是承认他自己觉得这两天天气的冷吧，是承认我们这些平凡之徒应该觉得这两天天气的冷吧，或者，否定我这一句话而不欲令我难堪吧，我这一句话或是或不是吧，总之人世间一切话都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吧。

如其和尚先生答“是呀”，我又会破口而说“为什么这两天还会这样冷呢，真是非人情了呀”的吧，如其和尚先生再说，“前几天太热了呀”，我又会说“为什么天时这样的不正呀”的吧，“这样的天时很易生病的呀”的吧，“穷人真是受灾了呀”的吧，以及说“近来各处都是盗匪了呀”这一类话的吧。

如其和尚先生或开初就答，“还好呀”，我又会说“这样凉的天气你们都满不在意吗”的吧，或者我还会再说下去，说“你们冬天也仅着这一点衣服吗”的吧，“你们不想弄一盂酒杀杀寒气吗”这一类话的吧。

总之，那样无限的延长下去了呀。

同时，灾害也是那样无限的延长下去了呀。

这样思索之我，猛觉那个和尚很有些悟了呀。

于是我再将眼光扫到那一头去时，和尚先生已不在了哪。

天色渐渐更凄惨起来了，远山先后没人浓暗之中，仅仅水面上还腾起一种白色，但也极暮霭苍茫之致了。我沉下心来听禅堂里的钟声。我的幽魂像寄托在这钟声里，一个圈子一个圈子地波荡出去，虽然微弱到仿佛灭亡，但仍永远存在在那空间的哪。

正觉入悟时，忽听见有人喊：“先生醒醒哪。”

“这儿什么地方哪。”

“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哪。”

我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和尚先生带着笑站在我身边。我说：“什么时候了呀。”

“是你该回去的时候了呀。”

他一路送我，禅堂里的香好凶郁哪。

走出了山门，大好江山，如一片锦绣，全铺展在我的脚下了，可惜四边迷雾隐约，已不易辨识。一阵风扑面刮来，不是春风，不是夏风，这风颇有肃煞之感哪，熟睡之我，至此完全给它吹醒了。俯瞰城市，万家灯火已上。雨住了，天上漆黑，回房来，见病了数日之我忽而不见了的同住之友人，也许会焦急地向四处找寻了起来的吧，但我还是那样从容地走着，一路从山坡上下来，想着豁蒙楼上梁任公的句子，这样念道：

江山重复争供眼，
风雨纵横乱入楼。

（原载《新月》第4卷第7期，1933年6月1日出版）

第八章

小 说

一 春 瘟

是春天了。

天空中开始波动起了一种肉的气息，像菜花的香，带几分刺激。看得似乎更新鲜了的太阳，撒下了千万条的金丝，在屋顶上，树梢上，马路上，以及在公园中散步着的男男女女的肩头上。风像少女的笑般温和，殷勤地吹拂到人身上来。小鸟们在枝头活跳，作出许多快乐的歌曲，像是歌颂春的美，又像是赞美她们自己的生命一样。

艾小姐刚午睡醒来。能在春天午后想睡的时候睡一回，也真是件够神仙的事。因为愿意让自己能更多在那迷醉的境况中多逗留一回，所以虽然醒，也懒得动。她只偶而翻个身，将穿着一件粉红绒衬衫的手臂，伸在被外面，仿佛多少嫌那天气太热了一些似的。当真那天气也怪，一热便热得这快，连使人要换衣服都来不及。艾小姐在那半醒半睡的情况下，真不愿意去想到什么事。但是无数幻想，却像微菌般飞满在空中，随着她的呼吸，钻进了她的脑子。到头，她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只披上一件浴衣，便懒懒地坐在靠窗口的一张沙发上，眼睛望着窗外远远的葱郁的树梢，像是发呆。

因为是春天了，天气渐渐地好起来，但与这好天气恰恰相反的是艾小姐的心境。她自己也说不出到底近来有了哪一点不爽快。她有些好笑自己：懒得吃东西，懒得出去，就是日常的装饰也懒得去注意，只就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常常极无聊地坐在书桌前望着镜子，长久没有去收拾的头发，披在耳朵边，也只使她更增加几分憔悴里的妩媚。她对着台镜时常做出许多鬼脸，有时连自己看了也不免嗤的一声笑了起来。

从窗口头略略掩进来了一些风。她微微地有些凉意，于是顺手将窗门砰的一声关上。为窗门上的玻璃所反耀在白白的墙壁上的五色的太阳光，闪电似的在房里兜了半个圈，又消逝了。

是一个好下午，屋子里静得什么似的。她想，这种好季候，好情境，正该做些什么聪明事呢？她不再能想下去了，她有些发烧。

男人这东西也真怪，她想，像一只没用的猫，看见了老鼠，想吃下它，又不敢。男人真是那样的懦怯，那样的胆小吗？她懂不得。

是11天之前的一天的事。艾小姐穿着一件衬绒旗袍，挽着成先生的手臂，在公园里散步。那一天天气虽不像今天一样热，然而春意已经弥漫在所有的树林里了。衣裳一旦着得轻飘些，这也够使人感到舒爽的，加之是好天气，好伴侣，艾小姐时常像一只小鸟般在成先生身边活跳着。有时害得成先生怪高兴，只得说：

“小艾，别跌了。”

到头他们跑上了一座假山，在亭子里憩了下来。艾小姐似乎已经有些发喘，于是成先生问：

“乏了？”

“还好。”艾小姐从钱袋里取出了一块小小的绿边手帕，在鼻子上轻轻地一掩，给了成先生一个睇视，这样说。

说睇视，艾小姐是常常那样地给成先生以温柔的。不消说，那该使成先生感到无限沉醉。不过，这成先生给艾小姐的，在艾小姐自己，也得承认，是不经见的恰意。她不曾碰见一个男人温柔如成先生。她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将她拿来说明成先生的好处。她只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地常常这样想：

“世上也真有这样令人高兴的人的？”

成先生时常上艾小姐家里来看艾小姐，那自然多半因为艾小姐愿意他来；艾小姐家里对于成先生也不缺少好感。艾小姐母亲常对艾小姐说：

“小艾，即使朋友多，也总得拣尊重的在一起。一天到晚只会在女人面前打趣的男子，是近不得的。”

但自从成先生到艾小姐家里来过几次之后，艾小姐便不再听见她母亲这口吻过。最爱艾小姐的是艾小姐的母亲，艾小姐最爱的也是她自己

的母亲。她想，成先生这个人也许使母亲看了欢喜。她母亲曾经有一天问过她这样的话，她记得清楚：

“成先生家里干什么的？”

“读书的吧。”

“我说到底是书香人家的子弟啊？”

这话艾小姐听了满意。她明白她母亲的心，因为她知道得她母亲所以赞成成先生的缘故。

成先生年轻，具有普通一个“漂亮”的年轻人所有的一切条件。虽然免不了有些地方带上一些摩登的毛病，但大体上，还依然保持了一个少年老成的风度。他非常会说话，会说许多使人听了高兴的话。常常，艾小姐实在兴奋到极点，于是歪着颈子，脸朝着他看，说：

“你怎这会说？”

“我会说？……小鸟碰到好天气，自己快乐的时候，便得会叫；小鸟不该感谢那好天气吗？”

说了这话的成先生，用千万个温柔系成了两条视线，逗留在艾小姐的像朵桃花一般可爱的脸上；艾小姐用一个从心头迸出的缠绵的笑，报答了他。

11天之前的那一天，是礼拜六。成先生换着一身挺漂亮的西装，坐着自己的车子，到艾小姐家里来看她。那天艾小姐的两个小侄男儿，恰恰上外婆家去吃酒了，她一人在家怪没趣。成先生的车子刚从马路上驶到，是听惯了的声音，艾小姐忙从窗口里张了张，对，是他。

在客室里，是艾小姐先说：

“真是春来了，柳条染上一些新绿，怪诗。”

“对了，真是春天了，太阳这好，你该欢喜。”

“我想每个人都该欢喜吧，真是好春天。小豆们上了外婆家，我怪没趣。”

“我早就知道他们上外婆家去了……”

艾小姐将小小嘴唇一掀，露出一口好牙齿，说：“你怎知道？……”

“你的灵魂告诉了我，你的灵魂告诉我，说你一人在家没趣，快来看我们的小姐吧。”

“嗤，你别画符。”

“画符？”成先生一笑。像就以那么一笑结束了他们的打趣似的，于是正经说：

“不出去？”

“出去？”艾小姐迟疑了一回，问：“什么时候了。”

成先生看了看表：“刚3点半。”

“我想别出去吧，不出去不行吗？”

“随你。”

“那末上哪儿去呢？”

大家不响，到头还是艾小姐先说：

“别出去吧，我想。”

“怎么，这好天气？”成先生说；以吐一口痰的顺便，换了个位子，在艾小姐身边坐了下来。他不再说一句话，只热情地凝视着她的脸。

“那你又不说上哪儿。”

成先生想了想，仿佛独自对着自己在说一样；“3点半”，接着；“上公园里去好不？好？那你得快，别让我在这里老等……”

艾小姐一挺身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客室的门口，回头对成先生一笑，说：

“20分钟行不行？”

“一刻钟，”成先生兴奋地像逗着一个孩子般的神气说。艾小姐像燕子般从门背后飞逝了。

客堂里的空气渐渐地回复了本来的静穆。成先生无聊地走到镜子前面弄着自己的领结。

那天一直到4点钟，他们的车子才开到公园的门。像几百对的蝴蝶，无数的男男女女都在草地上，树枝里穿来穿去。艾小姐跟着成先生在各处兜了圈，接着上假山的亭子里坐去。季候真是好季候，不暖不凉，单这好季候似乎也够使人心跳了。艾小姐靠着成先生的臂膀坐着，眼望着天边飞过的鸟，心也像在天空里飞着的鸟一般的快活地在幻想里打滚着，没有些拘束。

微风在艾小姐身上拂过，有一种从她皮肤里渗出来的香，溜进了成

先生的鼻腔。艾小姐生就是那么一头好头发，一篷，像若干朵花。成先生说：

“小艾，单你这头发，也使人爱；还有肉的香。”

艾小姐听了心上是欢喜。说肉的香，没说错。不过，偶而想到了另一些事，似乎这字眼不很合乎说的人或被说的人的礼貌。她说：

“你说什么？”

“我说？——”成先生说，“你没听清——算了。”

“说这么半句又不说了，你老这样。”艾小姐爱再听那样一种话，这样撒娇着，说成先生非再说一遍不可。

成先生想了想，说：“我说你叫人爱你到死。”

艾小姐是一笑，是笑成先生的俏皮。她觉得成先生这个人真坏。（那自然是说，成先生这个人真聪明。）她想，聪明的人该做出一些什么更聪明的事来呢？

她们还没坐一息，太阳便渐渐地想从树梢头隐现下去了。薄暮预备袭进这园林，然而春天的暮色更神秘，更迷人，更能引人昏沉。艾小姐说有些冷，成先生于是将她拥得更紧了些。园里的人们，渐渐地散去了，似乎将整座的园子，交给了他们两个人一样。

春的活力流进了艾小姐的血管。他和成先生熟识的时间，也不该说短了，像黏牢了般，分不开。成先生像一团棉絮般温存，艾小姐曾经对自己这样说过，天让我睡了这温软的棉絮吧。

那时，他们都默默地在夜色里呼吸着。艾小姐像已经抓到了什么，又像还没有抓到什么似的仿佛有些恹恹。是春天了，她总不该说她近来的生活有什么不美丽。她现在正像一条鱼般遨游在快乐的泉水里。但是，年龄使她到了另一种憧憬的时期。春天的风，吹得使人想睡。她说不出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什么，她只觉得像在夏天，得到一阵风，还希望风后再来一阵雨一样。

她想起了许多事。但她不能从那许多事里引出一个头绪，抓住一个具体的东西。成先生问：

“小艾，你现在在想些什么？”

她说：“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对，不过她想，说什么都想，我这样答他不行吗？她觉得自己脸上有些发烧，而且渐渐地传到了全身了。四周没有一个人，她闭着眼睛地让自己的心在无边无际的空中像找不到归宿似的乱闯着。一双粗的手臂，要有力，要野蛮，要鲁莽，要弄得她痛，要使她像悬在空里般失去知觉，让那粗的手臂去摆布；要一个压力，山般重，野兽般莽，使她喘不过气；给她一些润润的在嘴唇上，白玉般滑，肉般腻。

她用眼角看了看成先生的脸。成先生的嘴唇像一朵红的百合花，装在小小的鼻子下。她觉得这个东西神秘，古怪；那里有梦，有死。

她也偶而将身子动一动，想因此得到一些什么反应。而在那样的时候，成先生总是用着像春风一般沉醉的声音，问：

“艾，冷不？”

艾小姐摇了摇头。

“不？”成先生说，看了看艾小姐的脸。看，是用了全副爱的心看的。从头发，耳朵，眉毛，鼻子，嘴唇，以及到微微有些饱满的乳部。艾小姐的嘴唇像樱桃般红，荔子般新鲜。成先生将自己的脸更凑近了她的耳朵些。

来吧——艾小姐仿佛听见了她自己的灵魂这样说，她不愿意动一动，然而心却禁不住地忐忑了起来。她期待着她所需要的某种刺激，一幕喜剧。她热烈地期待着，期待着——

太阳的光，百合花的香，夜莺的歌，电流般的热。

但是，像窒塞的夏夜，终下不下雨来般，渐渐地，乌云散开了去，将依旧回复到原来的气色了。艾小姐开始有些寂寞，像等一个人，等等还不来般，她小小地感到一种空虚。她说不出她心头的烦躁。她有一些恨，然而她知道她该恨谁呢？总不该恨成先生吧，因为她爱他。然而她找不到一个可以使自己恨的人。春夜多雾，远远的树梢上，蒙上一层微微的白绢，衬着远处闪现着的红的绿的灯光，凑成了一种凄寂的情调。艾小姐便在那种难言的气息下，感味到一种缺陷。

成先生看了看表，怕这样地坐下去，使艾小姐没趣，于是说：

“上××去用一些点心吧。”

艾小姐毫无气力地站了起来，像一个生了病的人般走下了假山。她

不愿意再上哪儿去。她只想早些到家上房里去躺一回。她不再有兴致说一句话，她只守着她的沉默。

成先生开始觉察到他们之间的空气有些不平常。艾小姐说晚上有事，不再上xx去吧。成先生知道艾小姐又是编的谎，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艾小姐不高兴。她只得招呼将车子直开到艾小姐的家。在车子里，成先生问：

“艾，有些不高兴？”

艾小姐摇了摇头。在阴暗中，成先生不能从艾小姐的脸上得到她一丝喜怒的痕迹。

“那末为什么看来没有像来的时候一般的快乐了呢？”

“因为头有些些痛呀。”

艾小姐这样答复了成先生。她知道这个答复是不很高明的，但也懒得去想别的更好的句子了。成先生用尽他所有的温存，想来洗去艾小姐心头的的不愉快。但是这个，成先生是失败了，因为成先生根本没有抓住艾小姐为什么不愉快的原因。对于成先生所有的慰贴，那时，艾小姐觉得一概是多余的。她爱成先生，但是那时她觉得世上最蠢的一个人便是成先生，世上最胆小，最没用的一个人也便是成先生。他为什么不再勇敢一些，聪明一些，或者更野蛮一些呢？她不愿意说出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她希望能有一个人来看破她的心；而那个人就是成先生。然而成先生仿佛太没用了，他不能给艾小姐一些体贴。那时艾小姐对成先生似乎是完全失望了，她不高兴他。她愿意车子快到家，她不再多和成先生说话，她只非常倦怠似的落在烦躁里，缺陷里吸呼着。

那晚，艾小姐略略用了一些莲子粥，很早地卸了装饰，拖上拖鞋，在沙发上躺着。偶而她像发呆般，开了窗看看天幕上的星，接着又砰的一声闭上了，再回到沙发上。房间里每件东西都守着她们原来的位子，没有一样东西能留住艾小姐的恹恹的心。她说不出究竟为了那点不舒服，她只感到有一股火在她心头燃烧着。这在她心头燃烧着的火，使她对于一切事皆感到灰色与怨恨。

第三天早上，艾小姐还没起身，便接到成先生来的一封信。

成先生说，为什么艾小姐那天从公园里回来的时候，那样的不高兴呢？是他有什么地方顶冲了她吗？他说，假若是他有什么地方使她不高

兴了，那是他没留心，艾小姐也该原谅他。他那晚回去，心上真难过。他想不出为了什么使艾小姐忧郁。并且，那天晚上艾小姐连给他一个诉白诉白的机会都没有。他愿意艾小姐心上有一丝不高兴吗？他愿意，尤其是为了自己，使艾小姐心上留下一丝不快乐的痕迹呢？原谅了他吧，他说，他愿意以他自己的幸福来洗去艾小姐的悲哀。

艾小姐读了这封信，有些感动。她有些懊悔自己那一天不该那样将自己的不高兴流露在面孔上。她爱成先生，她不愿意轻易地将她们间的爱情摇动。她颓然的将信放到靠床的那架五斗橱的抽屉里去。她叹了一口气，像是无可奈何地想，谁叫你不能更……些呢？她爱他，但也因为爱，她愿意他更能体贴她些，这样，好使她更高兴，更爱他。

那天晚上，艾小姐真想抽出一些工夫来复成先生的信。仿佛有许多话愿意和他说。她愿意教他，教他怎样去知道一个女人的心。她想，你应该在我面前更放肆些，更勇敢些。但是另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似乎又使艾小姐懒，懒得说一句话，写下一个字，到头她还只是对着桌子上的纸张发呆。

以后，她还陆续接到了成先生寄来的信札。在那些信上。成先生说得更可怜到不能生存了一样。不消说，这些信却使艾小姐读了心上更为痛楚。她愿意使成先生凭空受那么一套委屈？不过，她不知怎样始终打不起写信给成先生的气力。她需要成先生，她需要满足某种希望。是一个至诚的祈祷，祈祷这能来满足她某种希望的那个人便是成先生。那是第二个礼拜的礼拜六。虽然艾小姐没出去，但她就真的愿意有个人来看看她，就如像那样地在公园里走走也好的吧；然而那天毕竟整天地在寂寞里过去了。这几天来，天气是一天好一天，艾小姐常常呆呆地站在窗口，看看歇在人家屋顶上的太阳，杨柳梢上的新绿，空中飞过的鸟，像感到一种一切都懒散似的空虚。她说不出是什么一回事。她只感到，在自己的生活里，有一种缺陷。

一天到晚是说说不出的乏，艾小姐的母亲说：

“小艾，病了吗？”

“没有啊，”艾小姐很精干地这样回答着。她想想好笑，她想，与其说病，还不如说是瘟吧。

二、世纪与义务

(一)

1

由安藤信正、青木助武两氏的介绍订于昭和七年1月29日在东京神原音乐馆结婚谨邀观礼

山本达雄、井上美同启

2

青色广告，树和人行，带着为酒座音乐恋上了的紫色夜雾，毫无理由的向后乱奔，退出了银座，驰下坡，迎上一片平野，转入元村町二，穿破黑暗与亮的一路。

在呼吸一大口时跳下车，车停在一株白桦树下。

走进房，灯被捻亮了。

将略感倦困的身子，挨近下手的窗扉，开了窗，风带着猛劲逼走了她脑子的昏涨。

听见在寥寂中爆裂出来的 Motor 的发动声音，车子想开走了，车子是一顶桥，她从重雾的那岸过来的。

因去年5月在东京府美术馆开的帝国艺展才和白井三郎认识了的青年画家山本达雄，在他结婚的那天，她和白井三郎是都被邀观礼了。

礼堂是布置在一间四壁有着大壁画的厅子上的。虽然小小的一间，但就这小小更写出了和新郎趣味相和谐的情调。不嫌冷落也不嫌过挤的来客数目，就正好是七八十位。

新娘是帝国女专毕业生。去年8月筑地小剧场上演《狂言》时，曾匆匆见过一面。一个伶俐的身子就更见精神百倍。

她和白井三郎到得很迟，婚礼没隔一忽儿便开始举行了，是在十足的一种西洋风里演出婚礼的仪式的。

接着是宴会与跳舞。

女宾占了来客总数三分之一。因不常在外面交际的她，那时便变为一个促偏的奴隶。虽然经摆着丈夫身份的白井三郎给她介绍了几位友人和友人的太太，但，另一空气仍然使她感到自己来这场所的失算。

“这是织田太太，那也在文部省供职的织田先生你是见过的；光代女史，织田太太的妹。”

被这样介绍了的织田太太将眼睛从一付老光眼镜里，泛出一朵笑容投给了她。光代女史浅浅的一鞠躬，于是大家仍归入自己的座位。

因一种为日本女子所没有的娴淑与娇媚而使许多年轻的男宾频频用眼光向自己身边射过来的她，用手不住地抚摩着她四岁孩子原田的头。

“你就空了手从满洲回来的——”

“可是满洲的女子还不是迟早都我们的。”

一对低低的声音，接着两个粗暴的喉咙放声笑了起来，一个男子用手在另一个男子肩上拍了拍：“好孩子！”

想用头别过一半仍旧退回了转来的她，将眼光钉在壁上，希望能找出一块地方来安放她的耳朵。

曾有一次是和一位邻居出去买什么的，在市街上遇见那邻居的一位女客：

“这是我的邻居能子女史，在满洲的。”

“在满洲的吗？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现在我们是一家了。”那位女客说，又转向她邻居：“我正计算到帝国妇女协会去，要募一笔买一架飞机的款子，往满洲去啊。”这样那女客就匆匆的走了。

回到家，邻居和她分别时吃惊的说：

“累了吗？脸变得这样苍白！”

一被许多女宾用着对一个陌生人施射出的一种落寞的眼光投向过来的她，便本能地记忆起了三个月以前那一次和邻居在街头的那回事。她那时默默的守在自己的座位上，她的呼吸是沉重的，但在沉重的呼吸里，她维持着一种从容。

“上园子里去走一回吧，园子里有着很好的花卉的。”白井三郎从什么处所走了过来。于是带着原田，她跟在丈夫的后面。

一路都是很精致的建筑，西洋风的皮，东洋风的骨骼。经过了一条长廊，两边有太阳，原田活泼地在前面跳着。

“那个支那人生的。”

向着原田作着鬼脸在一个弯角处躲下的两个撒野的xx孩子，这样说时，猛看见原田母亲回过头来，又拍拉搭的一声全溜跑了。

正想到这儿时，房东太太给她送了报纸进来。

4

房东太太坐到她喜欢坐的那张小兀凳上。

没有丈夫也没有子女的那房东太太，她的慈和引起旁人对她更度的恤怜。

“是在旅顺一役阵亡的哩，”这样说时，想到自己儿子的夭亡的房东太太，老泪扑落地掉下来了。

八年前，这老女人曾和还是一个少年的白井三郎在福岗做过八个月的邻居，当白井三郎到了东京觅取房子的时候，无意中找到了正在待租的她的屋子，这样白井就将她的屋子租住下来了。

这老女人的慈和，没有一个人对于她的嗜味表示一种厌恶。她看着

能子在脱下她的衣饰，说：

“白井先生没有一起打回吗？”

“临走时候，说谁有电话来，有事又上文部省去了。”

“是吗，□□方面发动了呀。”

“你说——”

“我说□□方面也发动了呀，昨天夜里，动的。”

“你的意思是说，”能子想了想：“□□方面也发生了战事吗？不是说已经承认了所有的条件了吗？”

“但是支那又首先发动了呀，这儿的报纸都说支那人狡猾哪。”

“你听谁说的呢？”

“你没有看今天的报吗？只是刚才的号外更详细的，今天外部省在什么席上也有报告，说是支那毫无诚意哪。这儿的人们对于‘你们’支那人，仇视得发狂了哪。”

房东太太在“你们”两字上加重了力道，这力道像铁一样的重沉落到她的心底里。

房东太太站了起来，用一个母亲的眼光看着她：“今天准累了，要一些沸水吗？”

“有水呢。”

屋子里漂上一层惨淡的云。

“要是每个支那人像你这样便好了，”房东太太在低微的喃喃里走出去了。

她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房东太太的后影。她忽而叫住了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回过身来。但她立刻感到一种空洞，一种灭亡的悲哀。她看了看房东太太，于是说：

“请将门带上了吧。”

门悄悄的让房东太太带上了。她叹息了一下，懒懒的拆开那中国寄来的报纸。

(二)

1

在一个刮大黄沙的黄昏里从承春戏院走回来的她，在哥房里喝水。

“片子好吗？”哥问。

“是说一个德国女子在巴黎和一个法国男子恋爱的事的。大战爆发了，欧洲一切都在狂暴的嚣张里。有一天，那个德国女子上法国男子的家去，告诉他说她要回德国去了。法国男子留不下她，送她到门口时，德国女子伸出胳膊来和他握了握手，说“祝福你和你的国家好，再会吧。”法国男子哭了起来，带着眼泪问，“在什么地方能再会呢？”德国女子很愉快的说：“在战场上啊！这样，头都没回一回，打一个弯便不见了。”

“那是一个很可佩服的女子哪。”

“是哪——”

伫立在窗口看着窗外灰灰的天的哥妹两人，为着那个德国女子的英勇神往着。

“能式君在吗？”

“谁哪。”她飞到了楼梯边，看见在楼梯下那个熟识的阴影：“啊，请上来吧。”

这样，在她哥房里现出了一个日本青年。

“这是妹，能子，”哥的介绍。

那晚，连母亲和弟，她们都在哥房里吃了晚饭。

在她印象里占着牢不可破的对于日本人的憎恶的观念，在那晚，完全消灭了，一种为日本人所特有诚恳与率直，使和他们做朋友的容易对他们吐出一缕亲昵的线索。

这日本青年是她哥的一个朋友介绍给她哥的，她哥是一个医生，跟他补习日文。

他每礼拜来三次，这样，不知不觉中仿佛成了她们家庭中的一员。

还没满 10 个月，哥的日文已经学得够像样。与她哥的日文程度同时进步的是她和那个青年的情感。

在一个春天，她和那个青年订婚了。

那个日本青年叫白井三郎。

为了这事的忧郁，母亲病过一次。

母亲是反对这件婚事的，虽然母亲也爱白井三郎的老实。

一次听见一只老乌鸦的哀啼，母亲说：

“小的一个一个养大了，便全只管自己的飞了。”

她看见母亲的眼角角上挂下了明亮的眼泪，她猛的哭起来了，她是爱她的母亲的。

父亲在好几年前去世后，她成为母亲的第二生命。那时，她像一个孩子般用手在母亲苍老的脸上抚摩过，低低的说：“我不会离开母亲远去的。”

“要是真的带你回国的话，你是没有理由可以拒绝的，但他迟早总得回国的哪。”母亲怅惘地。

这样，母亲病下来了。

订婚那一天晚上，她不明白什么缘故在房里有劲的哭了起来。

“孩子，母亲明白你。”母亲将粗糙的手揩去了她脸上的泪痕。

白井三郎在关东xx部里供职，结婚后，他们就一直在奉天住下。1929年冬天，因为他故，辞了关东xx部的事，预备搬回东京去。同时，在文部省的一个亲戚，已经为他在哪儿找下一个位置。

但因在他们离开奉天回东京的前一个月，能式患了脑贫血急症而突然去世了的事，使他们不能不又将行期延搁下来。在非常的阴惨与孤零里，完结了能式的丧事后，她和母亲商量的结果，母亲和弟决计搬到上海去，因为她的叔在上海。

她送母亲和弟到大连。在大连的旅馆里，晚上，母亲和她都黯然地说不出一句话。

约摸夜里 3 点钟光景，听见母亲叹息。

“妈也醒的吗？”

“不懂怎样老睡不着。”

“好好睡一忽儿吧，船上是很辛苦的哪。”

母亲没有回答，像是睡去了。

过了半点钟，听见女儿在翻身，母亲低低的喊：

“能子。”

“唔——”

“你也没有睡着吗。”

“唔——”

母亲在想着什么。

“你到了东京总得自己小心，那里没有你的母亲，没有你的兄弟，也没有你的祖国了哪。”

“妈放心好了，我一切会得保重的。”

“你哥当时原因原田的父亲人好，我也为他的老实，你自己又情愿，所以我不忍坚持反对。但是你知道，你父亲是顶爱你的。”

母亲在絮语里，不时夹着阴沉的叹息。

她披了衣服起来。

“喝一些水吧。”

她坐在母亲的床沿上，捧着杯，看着母亲的额纹，她眼泪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

第二天下午4点钟，长春丸开了。船的影子一点一点的模糊起来，她打了一个电报给上海的叔，才又给南满车装回奉天去。

在车子里，她看见自己是一只迷雏了。

过后没几天，她带着孩子和白井三郎一起到了东京。这样一直到现在，她在东京已经住了两年。

自从到了东京后，她便开始感觉到有一种无从捉摸的膜，好像永远在包着她。在公共会所里，电车里，或在小巷里走过时，许多可怕的眼睛在她身上钉牢着。东京和奉天仿佛是落在两个季候不同的地球上的。

“那个满洲带回来的。”

她时常在什么角角里发现有这样低低的声音在流动着。房东太太是顶慈祥的，丈夫是顶爱她的，但她无从对她们说起这种事。

1931年9月，满洲南部的军事行动突然的发动了，全xx的空气落在一种军国潮的疯狂里。每一家报纸上，俱乐部里，宴会上，公共集合所里，私人的闲谈里，关于满洲军事的进展，是顶兴奋的题目和中心。一些老太们也不再热心去谈那些不相干的家事了，她们都称颂关东军的勇敢和给日本的光荣。她们都说：

“满洲是应该归给xx的。”

——你希望你的国家做世界上的主人吗？只有得到满洲，才能达到你这伟大的希望。

在什么一本xx教科书上，她曾看见有着这样的句子。

白井三郎每次回家时，许多关于满洲军事胜利的消息，是他带回来顶大的珍宝。房东太太看见白井回来了，便老蹑手蹑脚的跟进房。有时，见白井刚跨进门，她已经冲了出来。

“怎样了呀。”

“又克复了□□了哪。”

这样，他们欢快地庆贺着帝国的光荣。

“满洲的福气，满洲归给了xx是不会吃亏的。”这是房东太太的结论。

为了房东太太的年老与慈祥，她听到这样的话时，总是默默的低着头走开了。

有一天，她正在读着中国寄来的报纸，白井回家了，他照例又说了许多。

“但是正义是我们的！”她冷冷的说。

“正义是你们的？”白井涨红了脸。

“人类之正义！”

中国寄来的那报纸上的社评题目刻着这样五个大字。

“你看，”她递给他。

还没看到一半，猛的一声被撕毁了的报纸便狼狈地摔落到地上，像以全生命的力量去征服他的仇人似的，白井赶上一步重重的踏着那毫无抵抗的报纸。

这样，她们之间筑下了显明的战垒。

想到这儿时，她又黯然的叹息着，当天的报纸从她手头落下，她懒懒的倒在席子上。

2

她忽而想起好几天前弟来的信，于是默默的拿出了纸笔。

弟：

1月13日寄来的信早已收到了。母亲身体好了一些吗？请你代我告诉她，说我永远在想念着她，并且为她祝福着。我在这儿一切都很好，很快活，孩子也长得够像样了，叫她别成天的挂念着我。这儿一切人对我全是很亲昵的。

报上都说上海有了战事了，不知道你们住的地方要紧不要紧。母亲希望我能回国来看看她吗？我身子虽然在这儿，但是我的灵魂没有一天不是飞绕在你们的身边的。好吧，我想我迟早总可有一个时候让我回来看看你们的吧。

你好吗？你不是这学期要在初中毕业了吗？你应该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帮助你的国家。你年纪还轻，有许多是你现在所不能了解的。姊不想再说什么了，总之，你应该知道，有许多人在期待着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人哪！

能子 1月29日灯下

(三)

1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孩子和母亲平分了屋子里的静穆。

孩子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不像普通一个××孩子的脸一般的褴褛。

长着一双大眼睛，活溜活溜，全像母亲，带着一点从父亲血份里遗传下来的武士道精神，加上几分中国式的温柔，就够叫人称赞，母亲的寂寞大部分是给孩子赶走了的。

“还有水饼吗？”

孩子跪在食品厨前。

“没有了啊，回头叫爸和你再带一些回来吧。”

孩子于是玩起竹马，满地是他愉快的世界。

“给我讲个故事吧，妈。”

孩子放下竹马，揪着母亲的腰。

母亲正在做着一些针线，这样，放下针子，带着孩子坐到窗口边。

母亲说“讲个什么呢？”

孩子瞧着母亲的眼睛，想在母亲的眼睛里找出一个题目。

“从前有两个国王，”母亲说：“分住在两个园子里。老国王住的是西面的一个海棠园，小国王住的是东面一个樱花园。老国王为人很慈和，以前小国王有什么困难时，老国王常常很热诚的帮助他。小国王园子里有许多东西都是海棠园里搬来的，书是老国王给他的，许多规矩礼貌也是从老国王那里学来的。

“海棠园里东墙边有好几株大古树，树的枝叶都伸长在海棠园的墙园外，有一年，小国王家里没有木头用，便叫了许多人用梯架在海棠园的墙围上，将那些很结实的树枝截了去。树原是老国王园子里的，老国王自然应该出来讲话，但小国王为人很强蛮，不讲理。老国王因为小国王年纪小，这样，在什么地方总让小国王一些。

“哪知道小国王这人愈来愈厉害了。他因为老国王年纪老了，便常常带领一些人去欺侮老国王。后来，有一年，小国王忽而派人去和那老国王说，说小国王家里人太多了，樱花园不够住，说老国王非得将海棠园里东边的一个角角分给他不可。其实，老国王家里的人比小国王家里的人更多，更不够住。老国王自然不答应，于是小国王就带了不少人向海棠园里打过来了。”

孩子听得出神：“后来呢？”

“后来”，母亲战栗着说，“老国王到头让东头的一只角角给小国王夺去了啊，因为老国王园里的人不齐心，打不过小国王园里的人哪。”

“没有人来帮老国王吗？”

“谁来帮助老国王呢？因为大家都不愿结怨于凶狠的小国王哪。”

“那小国王厉害吗？这样的蛮不讲理吗？”孩子瞧着母亲的嘴，想了想，忽而，跳下母亲的膝盖，捏着他的竹马：“我去帮老国王，我去帮老国王。”

母亲吃惊的说：“那是个故事啊。”

这样孩子似信不信的又给母亲拉着坐了下来。母亲用手将他的头纳在自己的怀里。她以从来没有那样亲昵的感情吻着她的孩子。

2

“原田！原田！”

正在那时，门口忽而传来了一片尖锐的声音。

邻家的孩子在喊他，于是原田便像一只兔子般的滑出了母亲的手，溜出了房，母亲追到门口时，看见原田和三四个邻家的孩子正在一起大家牵搭着肩，用流星似的眼睛瞧着她。

“我们去学操，学了操去打死支那人！”四五个孩子大家一起齐声喊。

这样，原田很天真美丽的向母亲笑了笑，也排在队里，跟着一起向前走，上那广场上去了。

她默默的看着那一群孩子的后影，感到一阵幻灭，带着一股寒冷走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四)

1

群众愈集愈多，要不是警察的卖力，交通在每分钟里都得断绝下来的。

一条街面上给扰乱与怒愤散遍了。

“打杀他！”

“杀灭那恶劣的人！”

“××人是强蛮的？××人是强蛮的，杀死他，侮辱了大××的家伙！”
群众的嚣张在空中旋转着。

一个中国青年脸上流着血，衣服全给抓烂了，靠着墙壁站着，默默的看着地，在短促的呼吸里，他受下不可忍的殴辱。

据说，那个中国青年是因一些什么事和一个××苦力争了起来的，但那时，他是全××人的仇敌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吃下他。

拳头和石子不断的飞过来。

又是，一块石子流星似的中在他的左眼下，一流新的血注下来了。但是××人是没有看见这些的。

经过了长久的扰乱，靠了警察的保护，好容易将那个中国青年才送上另处去了，但无数的××群众仍然跟在后面，像一匹猫永远不甘心放跑一只耗子一样。

“杀死他！”

“杀死支那人！”

“……”

扰乱与愤狂，从这头向那头移去，移去！

一切在她看得清楚，在地球绝灭了光似的悲哀与昏沉里，她给车子送回到了家。

2

在晚上，孩子熟睡着。

均匀的呼吸说出了人类的天真与纯洁，静恬写下母亲的挚爱与真情，灯光从远远的照出孩子睡态的美丽；孩子睡着像一匹小羔羊伏在山坡上。

她坐在席子上，不打一个呵欠，怕惊破孩子的梦膜。也不吐一个叹息，唱出自己生命的累垂，屋子里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里听自己心头的一片杀喊。

三个钟头来，她是一直这样默默的坐在那里的。她像是为一些毒箭中伤了，在那时，伤毒便凶险地肿胀了起来。

许多枪刀飞过来，许多枪刀又还过去，在一次最剧烈的火线下的一条虫子，是她的心情。

丈夫是爱她的。六七年来的融和，在她生命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光辉

的记忆。

“还有什么可以消灭我们间的爱吗？”丈夫曾有一次这样谈：“世上是没有那种力了。”

但现在，她们间却筑下了一种战垒的严重的冷酷的防御。虽然她相信，丈夫还是爱她的，但，纵然还在爱着她的丈夫，似乎将他自己对于他妻子的爱，又给另外一种力量劫夺了去。被那某一种力量克服了去时的丈夫，只是像受着一种最高命令在战线上嘶跑着的一员一样，她要想将她的丈夫，再从那最高之力里夺回来，在历次的努力里，她全失败了。

这一种最高的力量，毁灭了一切人类的爱；而在这世纪这年头，这一种最高之力又似乎流染在每一处和每一个人的血管里。她当时再一眼回瞥到在酣睡里的孩子，孩子的柔弱似乎更显出一种他也将为那某种力量所吞灭的预感。

种种新的思索和旧的记忆一起涌上了她的心。孩子，那是从她自己的血份里分出来的另一个新的灵魂与生命。在那小生物的长熟上，写着她生活之意义与自己的存在；那个小生物，是她前半生和后半生之间的一个钮扣。但她只一记忆起当天下午的一景，突然，她又感觉到，孩子像已变成一匹还没有睡醒的野兽，也是可怕的。这样，她打了一个寒噤，她在飘忽里听到一个声音：

——你不能将一个仇人的血种带回你的祖国，你也不能将你自己的血份来为你的祖国多树下一个仇人！——

也正如一切人一样，她没有力量抵抗这一个袭击。这世纪，人间一切似乎都支配在这一种力量里，只有不违反这个力量，才可以得到生存。那时，她是嵌在一座磨里的一粒碎米子，因听到那个飘忽的声音，她下意识地走近孩子的床，忽而一种辛酸，将她的眼泪赶落到了孩子的脸上。孩子翻一个身，在他无知的眼睛里，射出一次圣洁的灵光。她本能地唱出了怀着强烈的母爱的催眠之歌，让自己的呼吸和孩子的呼吸，合成一种凄凉的震动。

在深夜，她忽而看见孩子从床上爬了起来，大了，大了，面盆那样

大，缸那样大，屋子那样大，天那样大……一个，两个，三个，10个，20个，无数个……扑过来了，扑过来了，他向她索取自己的生命……丈夫突然的出现在面前，睁着了眼睛，红的眼睛，射着一道热火，拿着刀，一只巨手，来了，来了，扑过来了，她向后狂奔，她狂喊了起来……

丈夫用手抚摩着她，用催眠的口吻伊唔着。

她落在一阵冷汗里惊醒了过来。但她仍然装着像睡得很好的样子，不让自己透出一次气喘的呼吸，她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在空中颤震得厉害。

(五)

1

因□□战事的激烈，××的青年全狂醉在军部的煽动里。

东京帝国□□协会发起的帝国青年特勇队，预备开往□□助战的，不到三天，来报名的就超出了500名的额子了。

在帝国青年特勇队预备开发的前一天，白井才将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这一队的事和他妻讲了。

“这是我们必须担负下来的责任，”白井说。

听着白井这样说时的她，惊惶着。

“国家的光辉与威严全挑在我们的肩子上。我们不能眼见帝国军队在□□的不进展。一个男子只有在国家不需要他时，他才是他母亲的，或者妻子的。”

如铁一般坚强，白井非爱情所能掳禁的了，他嘱咐她许多家事，看到原田，白井以非常兴奋的神色抚摩着他的头：

“你将来愿意为你的国家牺牲吗？去打倒一切你国家的仇敌吗？”

孩子抱着父亲的颈，一个慷慨的首肯。

近下午3点钟，帝国□□协会对帝国青年特勇队举行一个送别宴，白井以顶挺括的精神，带着原田一起赴会去了。

她张在窗口，看着父亲和孩子在树影里走过那顶小桥，又在渺茫里

消失了，她感到一种特殊的空洞与刺激。她对于一切像皆绝望。她将为一团漆黑吞没了。她好像自己是世上顶无希望的一条小虫，她是一个孤岛里的流落者。她记到六七年前白井的年轻，她又看到今天一身包在军服里的勇士，忽而，她看见她像是全地球上的人类的仇人一样，她自己的同伴却在另一个行星上。白井，带了原田，不对她打一个招呼就赴会去了。白井和原田，他们是同生存在一个气候下的，她自己又为另一个气候下呼吸着的生物。白井，对于任何一个支那人，正如对于她一样，是没有一丝宿怨的。但是，他要开发到□□去，他要去征服他的敌人，他相信这是他的义务，凡一切爱情和这样一种义务冲突了的时候，在白井，他便毅然的判决爱情的失败。白井所给予她这刺激，像一个工匠用螺旋钉卷进一块木板般的一样深刻的。

这刺激，又如一流洪水的泛滥。她没有力量来防御这泛滥。也无法能提起自己的身子向别处躲。她眼见他自己将立刻变成一个浮尸；洪水在无拘束的放肆里在人头上荡过。她记到祖国寄的报纸，上面载着，几十万住在闸北的中国的良善的人民在被xx飞机的投弹与轰袭下，丧失了他们的家室，几十万的良善的中国人，他们的财产与生命，便全在xx的猛烈狂暴的炮火下毁灭了！无数年轻的中国女子，受到日本兵士的野蛮惨酷的淫辱。这一些中国人，良善的中国人，正如世界上其他一切人民一样，他们是没有罪恶的，无理由应该受到这种惨遇的。他们，对于日本人民，正如对于任何人类一样，是没有仇怨的。但是，他们不能保持他们的安全，不能连续他们的生命。他们看不到人类的公道。他们对于和平的信心，正如一切人类对于和平的信心一样，是在帝国xx的军阀的蹂躏下毁坏了，帝国的xx毁灭了一切人类的公道和人性的创造。xx像一个喝了酒的醉汉，一条中了疯的疯狗，在正义与和平之头上不规则的跳舞着。她！她想到在大海的另一头的那一些亲爱的同伴；她，她想到在大海的另一头为了她自己的女儿成天挂念着的母亲；她更想到她自己对丈夫的爱的贞坚，如白石的贞坚；对孩子，生命的爱护，比看待她自己的生命还宝重的看待。但是，她对于一切人的爱和忠心，在那时，不能得到一个平衡，不能得到一个和暖，她失去了一种最终的意义。她的光明被风暴熄灭了，她的期待收到冷酷的回答。她本能地流下一道热泪，但这热泪不能减轻她心头的沉重，不能打开她呼吸的窒息，不能消灭她

对于自己生命的恐惧，正如不能洗去人类的狂欲和因这狂欲而引起一切不幸的争斗和不祥的结果一样。

世界是无可挽救的。和平如像一根着火的小小火柴，在雪地上莫能存在。所有她周遭的人，似乎都不能理解她；不，毋宁说，她们都不欲来理解她。她们对她躲避着，同时也仇视着。——一种传统的仇恨。

她在漆黑的一团里索摸着。她的灵魂在无边际的空中乱闯着，她像是想得到一个力量，想抓住一件东西。她又如落在两种力量的交战里，她需要有一个出路，一个奔投。她想到无数条路，但她常常又退了回来。她不能摆脱人类最高的一种爱的力量。

丈夫的轮廓又隐现上了她的脑膜。她看到一阵在火线下活动着的野兽，握着他们的枪，他们的手榴弹，突然，她的丈夫，猛的一刀在一个中国兵士的脑后斩过去；——

丈夫明天出发了。丈夫不是刚才问他的孩子能为国家牺牲杀灭国家的敌人的吗？孩子不是像一十分懂事的成人青年，俨然很慷慨的首肯的吗？

她忽而把握到一个意识。她想到一次从她哥那里所得到的知识，于是她悄悄的走出去了。

那晚，凄惨罩笼了他们的屋子。

她带着不可苏解的悲哀，以顶灼烈的眼睛看过她的丈夫，又猛暴的吻着他的儿子。

孩子活泼地跳来跳去，从母亲的膝盖上跳到父亲的身边。孩子是天真的哪，良善的哪，没有罪恶的哪。孩子的良善正如一切人类本性的良善一样的哪！但她忽而为另一种恐怖所威胁，不可自禁的哭了起来了。她希望有一个人来拯救她，她希望她的丈夫能理解她，她希望人类是平和可爱的，她恐怕世界的悲惨。她看着丈夫，丈夫仿佛是她当时唯一能解救她的义士，她应该告诉他，她应该说出怎样将临的一件可怕的事情。呵，她不敢想象，不敢思索，不敢再逼视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全身起一阵痉挛，她咬了一咬嘴唇，她决心了，她决心让死亡吞吃下了她。她的心沉下去了，她沉下了她的心，看了壁上挂着的自己的母亲的照片一眼。

丈夫对于妻的失常是同情的，丈夫以自己一种责任来安慰她。但是丈夫在那时，对于她，仿佛没有恩，也没有怨，她觉得丈夫也是良善的。她对丈夫忽而无理由的吐出一一种浮泛的感情，仿佛丈夫和她像是陌生的，只是大家在一条路上走着而已！

在深夜，丈夫和孩子将开始安息时，她如失去了一切知觉。

一切将宣告灭亡了，地球与人类同时灭亡了。

她有许多话想吐出来，她有许多事想知道，许多问题想得到解答。她有无数的“为什么”生长在心头。她像一个顶愚蠢的孩子，对于一切事像都是疑惑着不了解的。那时她看到丈夫和孩子都静静的睡去了，她忽而几乎禁不住要惊喊起来。但到头，她没有吐出一个惊慌的字眼，她也没有吐出一个遥长的叹息，她只在一种昏沉里渐渐睡去了——她带着两流热泪悄悄的完结了她的一生了！

2

这惊人的惨死案在第二天正午时分被发觉了。

于是，侦察长，检医官，通信访员，摄影记者全以顶迅速的速率奔集了来。孩子，父亲，母亲，全是那样良善的躺在房里，脸上泛着一层灰色。调查所得，父亲和孩子昨天下午曾一起出去赴宴过的，但据检医官诊断结果，毒质像是昨天晚上的时分含在什么流质里误吞下去的，昨天晚上他们用了些什么食料呢？检医官一时无从断定中的是那一种毒，但好似是一种缓性的毒质似的。对于这全家的惨死，大家都感到一种悯怛。但那时，检医官忽而在女尸的衣袋里无意的检到了一张纸条，这样写：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轻轻的结束了我们的生命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生来都是良善的，都是没有罪恶的。我们对于生命，正如一切人对于他们的生命一样，都是有生存的信心的。我们都愿意得到一种公道仁爱的生活，我们都愿意在这一种公道仁爱的生活里能努力为那人类的幸福努力着的无数的文明动物里的良善的一分子。

但是我们现在不幸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们的生命了。我相信，

当xx人民，知道了这一个支那女子为这一惨死案的主犯时，你们对于我，也许会觉得吃惊的愤恨的吧；但我想，一切xx人民对于我的毁誉感情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经无灵感了的哪。

虽然我一方面怀有一种公平的望想，但是一方面又无力拒绝现实的压迫。帝国xx的武力梦破坏了人类的正义，现在连我最亲近的丈夫也亲身的转入这一个狂暴的漩涡了。中国的报纸告诉我xx在中国的土地上给中国及其人民的蹂躏，我，一个中国人民，无法再使我容忍，亲眼让自己的敌人去侮辱自己的国家。一切我们目下所企图的乃是人类的和平与公道。中国为拥护人类的和平与公道，不惜巨大的牺牲，我极荣幸能得到一种权利去尽我帮助我国家为人类的和平与公道而奋斗的义务。自然，就个人讲，我同时是我的一个敌人的妻子，我的一个敌人的母亲，我对于他们，都保持一种爱，一种妻和母亲的义务。为了对我丈夫和孩子的爱，我放弃了我自己的生命了，但我更为了我对我的国家的爱，我牺牲了我自己，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了。

检医官、侦察长和通信访员等都吃惊地读着这纸条，大家脸上泛着一流恐惶的神色。三个尸身安分地躺着，屋子内外都是静悄悄的——

1932年春 上海

三、断 想

(一)

夏夜，紫雾缭绕在街灯下。四周没一点人声，仅有三两火萤随便明暗一闪。我带着一种残破的情绪在一条小巷里走着，正要打弯，忽听见有人叫，于是站住。回头看，是她。她问：

“上哪去呀？”

我说：“回家呀，刚从红桥打回。”

“红桥月亮上了莫？”

“刚上树梢：你上红桥去吗？”

“对啦，你不想再去走一会儿吗？”

我说：“你一个人吗？”

她想了想，才点了点头。

我也想了想，于是说：“好吧，你先去，我就来。”

这样，我们话说完，她仍旧向红桥去的方向走，我仍旧向回家去的方向走。

但我没有回家，我折入另一支小道里去了。在这样夜晚，和她同行，对于她或有伤害。为了一种忠诚，我情愿一个人另在小道上抄近路走；这样想着，心中亦十分愉快。

我到红桥时，她也到了。

那天是阴历十六，月亮比十五更圆。每当月色好时，红桥一带便有不少年轻男女在散步。那一带新铺有一汽车路，沿着湖面，两旁全是杨柳；为一县城诗情顶浓的地方。湖之南，高山蜿蜒，俨然一个屏风。月色轻吻着湖面，湖面平软得如一幅绫绵，风吹也不动，只是一片大白，白得可爱。

我们向南走去，她像永远是害羞着似的，但她的害羞又永远像是一种热情。她有时将肩膀偎近我，但忽而像想到了什么时，又让自己的身子抽了回去。煤丝在我们脚底下吐出合拍的低歌，我们默默的走着，十分雍容，两个心听着同一个声音。

我说：“你本打算独自上这儿来的吗？”

她说：“我本打算去同了郁和菲再一起这儿来的。”

我侧过脸来看一看她的头发。她头发均匀的波纹，正写出我当时感情的细腻温存。她说话常常是轻轻的，但在轻轻里含有一种伟大的力量，一种不可分析的美。

我们一直向南走去，走得很远，走到为普通散步所不常走得那样远的程度，便在一个水滩上坐下来。夏夜之风，在田野里掀起一阵阵的穗浪。青蛙叫得如五月榴花那样的火。远山在月色里就像在一层脂粉里，我们如沐浴于和风之中。

我们向湖面坐着，将两只手抱住了两个膝盖。看到月亮的晶澈，我说：

“真想像不到夏之中夜会这样美。”

她看着水月。她老不给我凑句，也不用眼睛对我作一凝视。但当我沉默了好久的時候，她却又用一些题材来引我说话。

那晚她穿了一件白色纱旗袍，里面衬着一种极淡极淡的淡蓝绸料。月色从天空里泻下，又从湖面上反映上来，她娴静地坐着，南风在她发丝上拂过，端正得像一个仙子。

她为我唱一两只歌，不十分说话。有一次，她悄悄的，像对自己说：“我本想秋天上上海去读书，但怕又没有希望了。”

我说：“上海不一定是个读书地方：今年去不成，明年去好了。”

那时，一条鱼忽而在水面上跃了起来，鱼鳞在空中幻出一次奇丽，

但不久，湖水仍然归入于死神之怀。她像想着什么，叹息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大概还有三四天罢，”我说：“也许动身前不再能看见你了。”

她像没有感情似的，我们默默的坐着。

月亮偷偷的移动她的脚步，天空里飘起一层薄露。时间已是午夜了，但我们都像没有气力站起来。

我们离开那儿，就像离开我们的生命一样。在归途上，我们只感觉到夜的神秘，夜的美，夜的亲昵。

我送她回家时，她热情地看了我一眼，用手轻轻地向空中一挥，像一尾燕子般飞进她屋子里去了。

这是四年前七月十六夜的事了！常常作这样回忆着的是每逢因看到一些好月色而略略感到一种寥寂之我。

(二)

五年前，我暑假回乡，在一个欢迎世界旅行家 Dr.马的集会里，无意中发觉有一个人躲在一株桂花树下偷偷的看我。我当时好像十分为那一个人的眼波动着。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丰满的轮廓和美丽的风姿。身段的均匀写下她年华的骄傲，乌黑的秀发拦在玲珑的耳朵后面，一张蛋脸上有红白相映的好血色。五官的端正，说明她一种万方的仪态，同时在眉目间还有一股不可掩没的诱人风情。一个正在 18 岁的我，当时便忍禁不住也频频以眼光向那桂花树下投去。但过后，我又竭力冷淡自己那一股凭空的感情，对于那丰满的轮廓，美丽的风姿，和两只热情的眼睛也便渐渐地忘去了。

但不久，在一个亲戚家里又遇见了她。我那时的惊讶与快乐是同时袭至的。记得有一次，她似若感慨地回忆起我们在小时一起厮磨的情景。原来是她，我想，我虽然记不起她童年时代的状貌，但她那时的风姿，却着实使我吃惊不止。

从此，我便常常遇到她，常常和她在一起玩。那一个暑假在我一生是可纪念的，我忘了热，忘了自己身子的衰弱，一暑假我一直像在疯狂

中。呵，那时我希望能够永远的挨近她。

第二年夏天我仍回到家里。隔了一年了，但这一年里我没有忘掉她。为她挑引起的一股恋情，一直潜蓄在我的心里。那一个暑天我并没有和她常在一起，但我们在每次仅有的会面下，都种下了极好的感情。她好像怕挨近我，但又十分喜悦挨近我似的。当我和她过份亲昵了一些的时候，她便常常静默得不说一句话，有时且或稍坐一会即走开了；要是我稍为冷静一点，她倒也能逗留下来。有时，身旁的人太多了，她从来不敢向我正视一下，仅仅在不注意她的时候，她便偷偷的用眼睛瞟着我。

那时，她的身材长得更丰满了。她是近乎早熟的一个少女。一个早熟的少女便有一份更娇艳的情态。天真允许她活泼，但因年龄而得到的灵感又只准她严穆。

在那七月十六的晚上，我一个人从红桥漫步回来，在小巷里和我擦肩而过的她，却先站出来招呼我。那一夜晚的情致，是不轻有的奇迹，在我这一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秋凉时候，我回到上海，因为得到她的允诺，我便开始写信给她。第一封信去，她没有复信。第二封，也没有复信。第三封，还是没有复信。但到十一月十日，我忽而收到她一封。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将我给她的三封信都退回来了。

我当时十分凄惨。但是，没有吐出一个叹息，我将那些信札存入自己的书篋里去了。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在当天的日记簿上，我写：

“记着，这一天！”

从此，我便忘记了她。那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第二年的暑天我也没有离开上海。正如一个落魄少年，我有何脸再回家去呢？

第二年的11月10日，我一个人在林肯路上散步，对自己说，像叹息：“又一年了！”

唉，我忘记不了她。

(三)

那一个秋天，她也来上海一个女校里读书了。我虽知道，为了一个男子的尊严，没有去理会她。寒假我因事回家，有一天。映小姐来看我，她说：

“云子在外面。”

我说：“请进来好了。”

映小姐说：“她不想进来了，还是我们一起上郊外去散散步吧。”

那时我心中略有惊讶。为什么一个一向十分 Timid 的她这次忽而亲来看我呢？带着那样略有一点把握似的机警，我和映小姐一起走出了大门。

虽是冬天，但气候却极和暖，没有风，一天的好太阳。我们招呼后没有说什么话，即向郊外走去。

后来我们就拣了一块较平的水滩坐下来。我将自己的大衣脱下垫在地上，三个人坐在一起。那时一片晶紫的湖面给日光耀得如万鳞闪动。远处帆影，出没在淡淡的山色里，俨然入画。我们随便谈着。映小姐聪明，她说她小时顶爱撒水花，这样说时，她便走到水边上拣石子去了。

坐在那里的是我和她。

“你这半年也在上海的吗？”

她点了点头。

我说：“上次我收到你寄还我的信件之后，一直忙，没有能够给你写回信。”

她隔了一会，像没有气力似的说：“不要提起那些事吧。”

我们默默的，默默的看着映小姐撒水花。

“初在上海住得惯吗？”我又问。

“刚离家，在一个陌生的学校里，很感到寂寞，常想到家，想到一切熟人。当时人也瘦了，一切都落在怅惘里似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只是后来也便渐渐熟悉下来了。”

我们又沉默下来。好久，她看一看天，侧过脸来，像是害怕，低低的：“还记得去年七月十六日的晚上不？”

我说：“怎么不记得？那天晚上，就好像昨晚的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春季开学了，我上映小姐家去，想约几个人一起雇一只大航船叫轮船拖。映小姐说云子本来约她在这两天一起走的。我说，不管谁，由你去支配好了。我们已经有四五个人，你们如能再约到四五个，就更好了。

因说到云子，我问映小姐：

“为什么那天她愿意伴你一起来看我呢？”

她却说：“为什么你要说‘愿意’这两个字呢？”

“我们久不通消息了。”

她说：“真的吗？但是近来云子对你关切得可真厉害。她时常在我面前说起你，问你近来身子如何了，问你在学校里女朋友多不多。她近来好像心境很不好似的。”

我沉默着一声不响。

“你们什么时候断了的呢？”她问。

“一年以前，”我说，“也无所谓，只是彼此不来往罢了。”

“我是完全了解云子的。”她想了想，说：“她的感情好似常常在变动着：实在说，云子是很可怜的。你该知道，她在小时候即和 Mr.陆订婚了，但近来她和 Mr.陆的感情好似坏透了。”

“好吧！我们后天早上 9 点班一准定，我船今天便去雇，你们约到多少人即多少人，总之，后天一准走得了。”

第二天下午，我却在路上无意中遇见了云子。

“哪一天走呀！”我问。

“明天。”

“映来看你没有？”

“来过了，我本打算明天 12 点一班走的，既然这样，就同船走吧。”

那天分别时，我们都像十分愉快。

但第二天清早，天空忽然飞起很大的雪，气候出乎寻常的冷。约好的人，都准时下了船，只云子没有来。

那一年，一些学校里都规定寒假之后再举行学期试验的，到了上海以后，我忙着预备功课没有心情去理会旁的事。这次大考完后，我的Credit算读满了，因其他缘故，决计北平去一次。动身的前一天，打了一个电话给云子，她不在校里。在浦口时，我寄了她一封短信。

我到北平后，心情宁静，决计且在北平住下半年再说。但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我看着信封，想不起是谁寄来的。——是云子寄的。

她写着：

不知怎样，读你信时，我掉下泪来了。

那天在街上匆匆遇见之后，我回去即将行李完全理好。谁知明天起来，却见满天大雪。那时母亲硬不让我走，说天气这样冷，沿途没人照料。我自然不愿意。但是母亲是爱我的。可是到9点钟的时候，我不知怎样心上又懊悔起来。那时也许你们已经开船了，我越这样想，便越觉怅惘不止。自从你们走后，第二天河道便结上了冰，直到第八天才开冻。起初几天，我沉沦在忧郁里。只是我又给自己解释，今后常一起玩的时候正多，这样想时，才略略的安静下来。谁知一切事情好像都由命运安排定了似的；早知这样，别说那天下雪，就是下铁，我也得伴你一起走。唉，当我读完了你的信……还有什么话说呢？

今天正是阴历大除夕。本埠的或外埠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宿舍里满是一片荒凉。但这时，我的心境比这一座宿舍更是荒凉的。唉！你在北平应该是愉快的，我希望你好好的生活着，常常写一些作品，能先寄给我看，这样，好让我遥想着你在北国生活的美丽。我前三四天还写了一封信给你，现在不知道又将落入谁的手里去了！

(四)

就因为这一封信，上帝知道，我却悄悄的从3000里外的古城奔回草绿风和的江南来了。但我回到了上海，没有即去看她。只写了一封信去，

说我已回上海了。

隔一天，就收到她的回信。她说，怎么我又回来了呢？她读了我信之后，好像听到一个极凶恶的消息似的，发生一种恐惧的感觉。读书的环境自然北方比南方好，她说，我是不应该那样随便回来的。在她信上，对于我这次南回的不满，好似几乎要盖过她上次对我所有的热情似的。当我在遥远的归途上，我想，云子听见我回来了，必定会惊喜不止的吧，但那时读了她那样的信之后，俨然如冷冰浇头，十分恐慌。

但在那恐慌的另一面，我明白，云子才是真心爱我的。

我们起初彼此写写信，一直到天气比较和暖了的时候，在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她才答应来看我了。

她那天到下午4点钟才来。当我立在阳台上看到她在远远的树荫里走过来的时候，我便怀着顶健康的心情奔下楼去。我开门时，她正走近了，我将手在空中一挥，她像小鸟般的偎近过来。我说：

“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呢？”

她只低着头，没有回答。带她上楼，在我房里坐下。我说：

“你不愿意我回上海吗？”

她不响。

我说：“为什么前几次约你来，你不来呢？”

她说：“学校里正小考，所以没有时间出来了。”

想到她前次来信，说身体不好，我即问她近来有没有完全复原。她说近来好了一些。她说她以前在校里，生活十分规律，心绪亦甚宁静，能准时料理功课。不懂近来为什么常常一个字也看不下去，有时整整的半天在乱想中荒废了。这样说时的她，轻轻地笑了一下。

想到从北平带回来的花篮，那时我从皮包里拿了出来。四只小小的用柳条一类的东西编的花篮，十分玲珑，里面扎好的花，颜色真算鲜艳。我又从北平带回来一副极精致的手套，我说我送给你作一纪念吧，不知戴得上戴不上，这样，她手便伸过来，我给她戴上，说：

“大小还合吗？”

她说：“还好。”

我以一种慈爱的眼光看看戴在她手上的手套，又看看她的脸。她脸

上那时泛着一圈顶美丽的玫瑰。

西方卷起半天的红霞，我们一起上附近的xx公墓去散步，在一座大理石墓坟的石条上坐了下来。石条的两旁栽着两颗菩提树，四周都是整洁的草地。她像喜悦这地方，说：

“你常到这儿来吗？”

我点了点头。

她说：“这样的好地方于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我说：“有一学期，我就住在离这公墓不远的一个小村上。我有时一天也得来两三次。我顶欢喜在清晨或向晚，一个子躺在这白白的坟墓上，默默的伴着这些长眠人，或者展开诗集读一两首诗给她们听；这对于我是顶愉快的。唉，我想不久我也会睡到这儿来的。”

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你不要这样说。你以前好似常常是忧郁的，但我希望从今天起你永远愉快的。”

我没有说一句话。我只将自己的头偎在她的肩膀上。

(五)

第二个礼拜六，我上她处看她。她一看到我，便走过来，十分亲昵。没有寒暄，我说：

“出去走走吧。”

她说好。她进去一会随即又出来，就和我一起走出她校门，永远是那样温柔地存在于我的身边。她说：

“上什么地方去呢？”

我说：“极司菲尔派克好吗？”

她点了点头，像极高兴。

那天天气美丽，她穿着薄薄的一件衬绒旗袍，脸上没一些脂粉，朴素天真。这天园子里游人如织，我们在柔软的草地上走着时，有一种说不出的轻快，看到一切像都能体味到自己的幸福。

我们在一丛树林下坐下。我说：

“这儿你常来吗？”

她说：“今天还是第一次，以前几次想来都没有伴。”

我说：“你平时在学校里，或放了假，怎样消遣呢？”

她说：“有什么消遣呢？礼拜六或礼拜天，有时上大姊二姊那里去坐一回。有时便寂寞地守在学校里。我真奇怪我近来变得那样快，我想你准能看出现在的我是如何的抑郁寡欢的。”

我回想到两三年前那样活泼鼓舞的她时，这样说：

“我希望你自己别怕，当你心境渐渐好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仍旧能够恢复你对于生命的兴趣的。”

她很凄惨似的说：“我近来常常欢喜孤独，我爱让一个子生存在我自己的一个荒凉的世界里。我的青春早已消失了，唉，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

那时，云子像不知想起了什么，使她感伤了起来。她又说：

“那天从你那里回校，心中有许多不可捉摸的美丽的幻想。我整夜没有好好入睡。第二天起身后，便去看大姊。那天大姊好似对我特别严厉。问我为什么昨天不去看母亲，我说玩。她说有玩的工夫没有看母亲的工夫吗？我一笑的说用功。你想，那时活该我的心是如何的忐忑着。”

我说：“你母亲在上海吗？”

她说：“来了上10天了，今天我本打算也去看她的。母亲仿佛就是我的灵魂，我一看见了母亲，便像把握住了自己的生命。只是近来，我每看到我母亲一次，我像多看到自己的罪恶一次。唉，我好像在欺骗着我的母亲，欺骗着你，也在欺骗着我自己。”

像一个人在独白，她又接下去：“实在说，在以前我每次见到你，都有一种不可分析的心情。我觉得你有一道光辉，叫人爱亲近你。后来，我渐渐明白到自己的身份，但是，每次我听到什么人在说起你的时候，心中总会掀起一股不平静的波浪。记得去年冬天，我们在郊外散步，你说，你前次收到我退还给你的信，你因忙，没有给我复，在那时，我听到你还要有意的提起那样的话，觉得你也太刻薄了一些。但后来我想了想，这也怪不得你。我有一种憧憬，但我又有一份恐怖。在我的母亲面前，我永远是一匹驯良的羔羊。”她停了一会：“我想你现在一定可以明白我。有时候，越是为你想，我实在越不敢挨近你。我想，像我这样一

个倔强的孩子，接近了你，于你有什么好处呢：如其我接近了你，我一定耍毁坏了你的。我自己清楚，我的感情像一流水，永远在被风暴激荡着，没有一道规律的定向。唉，我不希望你给我过多的热情，我只希望你能够心平气和的明白我。”

云子那时还才 19 岁。她为什么要讲出这些话呢？我不知道应该吐出怎样一个字眼来看护她。她的忧郁，我深深感到加重了我的负担。我们那时好像都沉沦到一种不拔的悲哀里。我们直到薄暮时分，才含情地走出公园。我送她上了电车。车子在柳丝里驶得遥远了，但我还看见她在殷殷地望着我。

(六)

从那时起，我们的灵魂里好像都感到有一种不可摇撼的安定。我们都无理由的觉得仿佛自己的身子有一种着落。我们的生活，如一个车轮，有了一支轴，能依照一定的方向行走。那时正快要放春假了，我说：

“愿意上杭州去旅行几天吗？”

回信说：“有不少功课积了下来，想乘假期整理一下。这儿有不少同学在春假中也去杭州，所以这次我不想和你一起去了。”她又说：“况且，我想，这一类的机会我们不是以后很多吗？”

春假中，我去杭州住了几天。但当我从杭州打回以后，她无理由的忽然和我疏远了起来。

她的性情有时好似很固执的，即使敏捷之我，也颇难于应付。她那学校风气守旧，有时连写信也困难，因此我怕去看她。偶而看到她时，她对我也十分冷淡，好像她从来没有和我热情过一样。

“为了什么呢？”

我这样问时，她总是冷冷的不说一句话。实在不能推却时，她便以功课繁重的一个理由答复我了。

但是有一天。她却来了短短的信，说：

“你以后别再来看我吧，也别再给我信。我希望你不要太相信了我。

我愿意保守我自己一个孤单的世界。”

可是，纵然云子那时对我那样的冷情，但我没有开始煽动起一丝悲伤。一个人在心绪恶劣时，谁不是懒得招呼人，常常爱给人看不好看到的脸？谁敢说得了云子那一时期的困顿，谁能够明白得了云子那一向的苦恼的纠缠？我觉得那时云子对我的过度的冷落，只是她对我怀有的强烈的感情所受到一种不规律的刺激的一种异动，一种苦闷愤恨中的一种弱者的歇斯底里的反映。云子和我彼此契默的一条索线，我相信仍旧没有断。我们的恋情如一颗小小青草还是在薄薄的泥土下努力地向上芽长起来的。我们纵然一时落入了似乎不拔的凶险里，但只要风暴一过，一切仍会恢复到原来的慈祥仁爱的。

但是，我这“相信”是失败了，我的容忍没有得到可喜的结果，我所期待的完全幻灭了。我一脚栽在抑郁的泥土里。那时，我突然患着高度的神经衰弱症，整晚不成眠，为了遵从医生的嘱咐，我终于在一次匆忙里，没让一个人知道，悄悄地离开了上海了。

(七)

我住在一座深山的寺院里。每天起身极早，看日出，看云海，看霞之光彩，看山瀑倾泻，看彼山，看彼山与己山间的竹浪。很早就用晚饭，不待上灯即摸索入被，生活十分悠闲，一切尘事暂时抛开。但有时在听着晨钟暮鼓，心情略感怅惘之时，仍然不能忘情于云子和我的纠葛。

我在那里一共住了10个多月，健康差不多完全恢复了过来。觉得山中生活，亦甚可爱，于是索兴过了暑天，直到初秋才再来上海。

那时云子还在上海读书。有一天，我一个子在Rio Rita划船，看见远远一只游艇里，有一个坐着的好像是云子。我就用力追上去，果然是她。映小姐也在内，她们一共五个人。映小姐看见我，喊：

“噢……×先生怎么也在此地？”

“唔唔……”

我和她们一一为礼后，即约映小姐换到我的艇子里来坐。她坐下后，我便有意的将艇子划开了些，映小姐果然轻轻的问我：

“×先生，你这一年一直在哪儿的？”

我便撒一个谎，说：“在厦门教书。”

她想了想，说：“云子好像很轻蔑你似的，说你卑陋。”

我不响，随便和她谈谈别后的杂事。

从RioRita退出来，我约映小姐在礼拜六午后到我寓所里来谈天。

礼拜六下午3点钟，映小姐果然来了在我书桌前坐下，活泼非常，笑着说：

“×先生这一年在厦门没有想起云子吗？”

“我为什么要想起云子呢？”

“但是云子却时常纪念着你呀。”

“谢谢，只是卑陋之我是值得她纪念的呀。”

这句话，她像听见像没有听见，只说：

“她有时又不允许我再在她面前提到你，但有时她自己偏又常常在我面前提到你。”

“她说些什么呢？”

“她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她好像十分想知道你的下落似的。”

映小姐随说随在我抽屉里乱翻。在书堆里翻到一册“龙池一年”，她随便的掀开来读书。

“×先生什么时候在龙池山住过的吗？”

正在收拾热水瓶之我，被她这样问时，才跑到书桌边，看见她在翻我的山中日记，说：

“去年呀。”

她抬起头来看一看我说：

“在龙池住了一年吗？你不是说在厦门的吗？”

我笑了起来，说：

“前次告诉你我在厦门教书，你真的相信了吗？”

这样，她也笑了起来，又翻下去读了一回，严肃地问：

“去年病得那样凶吗？”

我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云子也不知道呀。”

“知道了又怎样呢？”

她没有说什么，屋子里沉默了下来。

临走时，她说：

“这册日记让我带回去读读好吗？”

映小姐走后，我一个子剩在房里，想到前几天 RioRita 云子对我的冷淡，心中十分凄凉。又是黄昏了，一轮新月挂在远远天边，我落寞地偃着窗口，看到窗外天色的灰惨，低低地唱——

第一次我看见你

春雷还不曾下过地

流波的动白纸的真

一份娇态我怀慕你

第二次我看见你

八月初秋的好天气

一支不可撼的矜持

不敢挨近我愈想挨近你

第三次我看见你

三月的桃花没有你艳丽

中夜的南风你的心

叫我别怕我懂憬你

第四次我看见你

盛开的牡丹才是你的容仪

但你的眼睛吐出了你的叹息

你叹息没有一个人恋爱你

第五次我看见你

我们的热五月的榴花也不够比

天地孕成了她荒唐的大奇迹

从那时起我不能一刻没有你

这次我再看见你
像亮月在重雾里的迷离
虽然我还想接近你
我已经捉摸不到你

(八)

隔了好久，有一晚上，映小姐忽而来看我。先谈若干事后，映小姐说：

“前天云子在我处坐了半天哩。”

我说：“她近来很好吧。”

映小姐没有作声。长久，像非常怜惜云子似的，她说：

“前天她在我处哭了很久呢。”

我放下郑重的口气：“为了什么呢？”

映小姐说：“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悲伤过。我也从来没有看见她如像这一次在我面前一样的直爽过。她说她好像觉得很对不起你似的。”

我没有回话。

映小姐又说：“她又问我，说你在我面前有没有怨恨她过。我说没有。她不相信。可是，不是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一句对云子怨恨的话吗？”

“我说真的没有啦，她无论如何不相信。我只得对她发誓。只是越是你没有对她怨恨过，她便像越觉得对不起你似的。我就劝她不要这样悲伤，坏了身子。我说你对她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她又何必无端的践踏着自己呢？”

“那天我真给她着了慌。好容易才将她从悲伤中拔了出来。天色已经黑了，我留她在我处用饭，她也没有肯，我只得给她雇一辆车送她回去了。”

映小姐说后，用一只忧愁的眼睛看看我，我也看看她。——我将头低下了去。

映小姐临走时，我忽而想到说：

“我那册日记呢？”

她突然像记起了什么，说：“呵，我忘了告诉你，那天我回去后，第二天云子就上我处来，我还没有看，就给她拿去了。真的，你那册日记里写了些什么呀？”

我说：“没有什么，只是一些山中的日常生活吧了。”

两个月以后，我知道了云子出阁的日期。我写信给她，说：

“恭喜你呀。”

她没有回信。有一天，忽有人送了一个密封的小包来，里面都是从前写给云子的信。顶上面有她一封信，仅仅几句话：

“你又何必说出这样的话呢？……总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苦处，如其你能设身处地地代我想一想，你一定能够原谅我的……”

我想起那册日记，就请映小姐早些去给我收回来。但映小姐却回信说：

“我已上云子处去过了，但她说那册日记给她遗失了，怎样了呢？”

云子结婚前一礼拜，我写信给映小姐：

“云子结婚你回去吗？我本想也去吃一杯喜酒的。但后来我想，我又何必那样刻薄？一个人呼吸在两种力的争斗下，实在也是可怜的。一个人如其不能接受那一种力，她也就只能服从这一种力，因为一个人只能在一种心情下安静地生活下来，在一种生活下慢慢的创造她的幸福起来。我们既不能帮助人家去鼓舞起那另一种创造的生命，我们又何忍去破坏她这一种定运的生命。我希望我们都能让云子在她的定命中好好的生活着一个人。既不能将自己的生命悬荡在不着边际的天空中，也就不能在可能的现实的境遇里艰难地建筑下她的幸福和光明的基础。我不忍因了我，再使她扰乱了她对于她自己的新生活的情绪！我知道你也是能十分同情着云子的。我希望自此以后，你别再在云子面前说起我，你也永远不要再使云子想到我，我希望云子的心里从此没有我！”

(九)

云子结了婚已有四五个月了。我常常在友间谈话中，听到她婚后的情况，每在那样的时候，我总是默默为她祝福着，希望她能在她的新婚中开始建筑下她一生的愉快。昨天傍晚，天色十分阴惨。我从金神父路走出来，正要弯上霞飞路时，忽而看见她一个子从吕班路那一头向亚尔培路那一头走过去。我连忙将身子一侧，躲入了一间小纸烟铺子里去。我偷偷的看着她，婚后的她略为消瘦了一些。看她走过去了，我才又从小纸烟铺子里走出来。霞飞路上两旁的树枝已透上一层极鲜艳的新绿。我将身子依着一支电杆站住，向亚尔培路那一头望去，看到她在前面孤独地走着，遥远，遥远，遥远，渐渐地，渐渐地，她在淡淡的灰雾地消失了。

我带着一种落寞之感地向吕班路那一头走去，那时，天空里飘起一层轻烟似的小雨来了。

1933年春

(原载《文艺月刊》第4卷第4期，1933年10月1日出版)

四、人 世

两个孩子都住在董山湾，大的叫七草子，小的叫金蛉子。

七草子和金蛉子两户口隔着一条董山河。从七草子家上金蛉子家，须先向东走 100 多步，过董山桥，再向西折回，才到。如一个蹲在岸南，一个蹲在岸北，则也能唱山歌答和，或者说笑，或者捡石子比赛撇水花。有时月亮好，金蛉子站在杨柳树下，喊七草子。七草子听见了，便偷偷的跑出来，说：

“嗨嗨，我家吃了南瓜啦。”

接着，他们一起向东，两个子到董山桥上去聚会了。

董山河遇着水大时，有两丈阔河面。但天干时，只用几块大石头填在河心里，就可以从岸南跑到岸北去了，用不着多走白路过董山桥的。

七草子是拾柴的。终年背着一只破篮，在外面打溜。除了天雨，每天多少总有拾回来的；只有冬末春初的一季最苦，因为枯枝枯叶全给拾尽了。

但七草子不能因此便天天背着空篮子回家见父母。在那样的季候，他便常常一个子沿着董山河的河滩走。冬天水干，用木头栏着的河浜岸，露出了水面。他看看前面，看看后面，没有人，于是轻手轻脚的挨近木桩，将木桩四周被水浸腐了的木片，一条一条的剥下来，放进篮子里。

金蛉子一生最初的职务：伴着他姊守山羊。羊子在山上，山上有太阳。躺在山坡上晒太阳，嘴里唱着，羊子吃草不响，金蛉子和他姊姊都非常快活。

他姊是董山湾有名的一个会说故事的女孩儿。她说起故学来，有声

有色。一声传出去，说她讲故事了，四方八面的孩子都会跑过来。金蛉子坐在姊身边，那时候，他恍惚地感到一种骄傲。

但这种情形也仅仅维持到两年。后来，羊子给父亲卖掉了，姊上城里帮人家打杂去了，他的那份荣誉也便没落了。

他从此成为一个十分逍遥的人物。吃饭和睡觉回家来，其余便在四处荒野里溜达，没有谁记得他。

金蛉子跟七草子上各处去。后来他娘便也给他一只破篮，说多少总可以拾些回来烧烧。这样，金蛉子和七草子成为村里的一对拾柴伙伴了。

两个人一吃了饭便背着篮出去，踏踏野，套套山头。有时七草子爬上树，一支一支折下来，金蛉子看得直欢喜，代他齐齐整整的拾进篮。不让一张叶子剩在地上。

拾柴拾到傍晚，两个子躲在松树底下，用树枝在土上画圈圈。田里姑娘从路旁打过，七草子便唱：

呀阿呀得儿噫，

呀阿呀得儿噫——

只是这一调儿，没有下句接的；他的意思都在声音里说完了。

田里姑娘瞟他们一眼，大油辫子荡呀荡的只管自家儿走了。金蛉子直笑。笑够了站起来，到董山桥，他们分手了。

七草子个儿越长越大，心也越过越入世了。金蛉子仍然是一团浑朴，不懂得爸和妈的叹息，只懂得“雨大了不能出去拾柴”。

春末夏初，四野铺着一层墨绿色。那天七草子、金蛉子大家背满一篮，说说笑笑。七草子说：

“你上城里去过没有？”

金蛉子说去过，城里有狮子滚绣球，有一天跟爸上有狮子滚绣球那家人家去过的，大门真高，里面真深。他说他一边走一边看，过门槛还摔了一跤。

七草子说城里才好玩。还有车子，人坐在车子上，自己不动也能走。城里人真凶，他看看警察，警察便拿起棍子要打他。

金蛉子说云青别墅也有警察。

七草子说有十几个。

金蛉子说他爸爸说有几十。

七草子、金蛉子一起说：“我们上云青别墅去玩吧。”

他们背着篮打弯向右，一路白石田埂。董山在他们后面。落山太阳照在山上，山发紫，走过了唐阳桥便看见远远在葫芦湖里的漂湖航帆了，一路很好的风景。

云青别墅离董山湾毛四里路。着实有几座好房子，都是年来新建的。以前那地也是一片荒，后来有人来收拾，且造大房子，董山湾的人都当做新鲜话。又说那房子叫云青别墅，其后虽然又起了许多，但大家成了习惯，便叫那一带为云青别墅了。

云青别墅一带坐落在葫芦湖沿岸，衬着低低的小丘。现在那小丘上正长着满山好树林。

他们已经看见那一座顶大的宅子的屋顶，又要向左打弯时，金蛉子袋里忽然掉下两个铜子。金蛉子蹲下去拾。

将头抬起来，金蛉子说：

“两个铜子。今天给新举人推了一早磨，新举人给我的。”

金蛉子又低下头去翻翻袋，袋底有了洞：袋破了。

七草子也蹲下去。看着金蛉子手里的铜子。又接过来，摸摸正面，摸摸反面，揩揩上面的泥土。一同站起来，仍向前走，一边说着话。

金蛉子拍手拍脚的，他从早上得到了这两个铜子，就有了个主意。他想顶好让这两个铜子一直藏在自己身上，不给花用。他看着七草子将那铜子翻来覆去的摸，又两只手合起来摇摇。摇着有声音响，声音怪好听的。金蛉子是很高兴的。

他们走着，七草子摇着，可是七草子那时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一个月前他哥从牢里放出来，妈对着哥哭。哥说：“算咱倒霉，给提了去。这世界上谁不都在做强盗？像咱抢一点东西算不了什么，这年头根本是强盗的天地，谁气力大谁就得欺侮人。……”七草子那时听他哥这样说，心中颇觉新奇。他想，气力大就得欺侮人，这倒痛快。他哥还说：“咱今天走出牢，明天又是山里的好汉。做强盗的给捉进官去只算自己晦气，算不了犯什么国法。许多人做一生强盗，国家都拿他们没法。”七草子那时想着，心里也一横：“咱不还他两个子看他怎样？”他就真的将金蛉子

的铜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去了。

金蛉子眼看七草子吞了他的钱，一时好像感到迷失了自己的妈。他想喊，但又喊不出声。他的脚步滞钝下来了，他跟在七草子后面，眼睛死钉住七草子的口袋。

他们好像都遗失了本来的记忆，一前一后两个人在惨淡里走着。

后来金蛉子发了狠，便伸手上七草子的口袋里去，七草子腰一闪，将金蛉子的手挡过了。

金蛉子到头哭了起来，金蛉子对七草子一向是顺从的，但那时金蛉子心里另外起了一种力量。

金蛉子哭着说：“我的铜子！”

七草子说：“铜子是我地上自己拾到的。”

这样哭哭嚷嚷，他们真的走到了云青别墅。

既到了云青别墅，他们就在云青别墅前面停下来。金蛉子挨着七草子，揪着七草子的口袋：“铜子还我！”

七草子不认账。七草子气力大，七草子将他推开。

两个野孩子打起架来，正是傍晚闲时，许多人便站拢来看打架。金蛉子揪着小嘴巴儿，一道眼泪，一道鼻涕，头上有些小癩痢，眼睛死死钉住七草子，哭丧着脸。看的人都笑了。

猛劲揪着七草子。七草子用力一抖，金蛉子便被抖开了几步。有时七草子使大了一点劲，金蛉子便摔倒了地，一翻身再爬起来，又揪着七草子不放。他这时有一个单纯的信念：那两个铜子是他推了一早的磨才得到的，他不甘心给人白白占了去。这一个单纯的信念，支持了他当时的倔强。

过路人看了多时，有的想到自己的事，便悄悄的走开了；有的看得好兴头，临走时且高声喊着“打！”“打！”算是帮场子；有的则很逍遥地唱：

打得狠，打得巧，
大爷看打看饿了，
回去晚饭吃个饱——

其余住在附近的，都愿意看到结局，大家站住不走。看着金蛉子那股傻劲，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年人好像过意不去，带着照顾金蛉子似的口气，大声说：

“你打不过他，还和他打什么？你自讨苦吃！”

在旁看的人都觉得金蛉子自己不量力，个子这么小，鸡蛋碰石子，挨打也活该。

正在这时，云青别墅里走出了一个着制服的守门的。他家主人正想睡晚觉，那儿来的“杂种”，在门外唏哩哗啦的？他赶上一步，大声威吓！

“王八养的，在大爷门口吵吗儿？”

这么一来，看客们觉得杀风景，就先悄悄的散开了。他们已经看了好一会了，看见金蛉子左吃一个嘴巴，右吃一拳头，到底为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明白，也没有一个人出头查问。他们都是随便站下来看看的。

七草子那时正打得兴会淋漓，忽见那守门的出来，怕出了事儿，便混在人淘里一缕烟的溜走了。

那个穿制服的守门的看金蛉子还不走，看他人小，举起腿来向他面前一扬：

“你这小孩子，人没我x大，倒爱和人打架！爱打上别处去打，打死了和咱大爷也不相干。要是再上大爷这儿捣乱，大爷要你的狗命。”

金蛉子那一篮柴，打架时已给打翻了。他在那守门的威胁下，低着头抬起那只空篮哭着回董山湾。他今天没理由的吃了一场亏。大家都说他人小气力小，不该不量力耍硬气，他吃亏是活该的。他走了，云青别墅前面依然又恢复了原来的和静，并且睡在上弦月的月色里是非常美丽安详的。金蛉子一边走一边哭，他走到唐阳桥时，一股傻劲又坐下来了。他坐在桥旁的贞节牌子坊下，他懊气不回家了，他痴心要让他的爸妈来寻找，他要爸妈来给他报仇。

1933 年秋 南京

五、无名

在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地方，有一座父子岭，是茅山的余脉，绵亘在宜兴县南 40 余里的太湖边上。宜兴长兴之间，本来是峰峦重叠，风景很好的。父子岭虽然是一座小小山岗，并不高险，但因北有兰山嘴，南有香山嘴，它却蹲居正中，也就颇有局面了。兰山嘴和香山嘴这两条脉，都突出在湖中，形势雄伟，为从来江浙战争中的一块军事要地。从兰山嘴到香山嘴这二十多里的沿湖线，统名之为“大雷湾”，成一向内弯曲的弧形。京杭国道自汤渡以南，便渐渐地沿着太湖而行，当车子驶到了父子岭的山脚下时，则 36000 顷，尽在眼中，水光天色，美不胜收了。

在父子岭西南三里，有座八达岭，要比父子岭高出一倍。如从正面看去，这座山简直一无奇趣，但从山后上去，则却蜿蜒曲折，幽邃有致。去年秋天，我和伯父两人上大雷湾闲游，因贪看太湖暮色，不及坐车回城了，于是决计上八达庙去借宿一宵。

虽然已是薄暮，但我们却还从容不迫的在大雷湾的第七湾与第一湾之间边谈边走着。那时的天，一片暮霞夹着一道黑晕，远处小村落里，炊烟四起，在闲散之我们味来，真是悠然神驰，不复思家。穿过独家村，走近八达岭的山脚下时，天色已很苍茫了，只得腿里加劲，伯父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人默不一语。奋力觅径，东一弯，西一折，前面似无去路，待到尽头，又是另番天地。我们这样走了约摸有一刻钟的光景，天色渐渐地黑了，可是仰头上望，依然不见灯火。伯父虽然年近六十，却有的是好腿劲，一天能走六七十里山路，在年轻力壮之我，真是望尘莫及。他走一段，回头看我落了后，便息一下再走，这才使我们两人间

保持了还算接近的距离。但后来，我又落得太后，向前望去，在黑暗里连一个闪动着的影子也消失了，喊了两声听不到回答，在那时之我，心中也不免微有悸布起来。正在迟疑之际，脚下的路却忽又变得直陡，陡得那样毫不容情地像天险绝壁。我好不容易流了一身淫汗，走尽这一段陡级时，则有一座衰败的山门，突兀地挡住了去路，这就是八达庙了。

我在山门前正想先息一下脚，好让呼吸恢复过来，伯父却已和一个和尚走了出来。我只得带着乏倦的身子跟着他们上里走。和尚将我们带到西斋息下，又弄了一点面条给我们饱肚，伯父和那和尚像很有兴会地还在闲谈着，而我却先告辞上床休息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红日满窗。伯父早已下床，我匆匆盥洗之后，便赶着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早饭吃完，和尚带我们上庙前庙后一带去走。这座庙的建筑很古，格局也很高，只是断垣倒墙，满处都是一付衰败相。山门进来，便是一片大广场。场中还留有大殿的墙脚；屋子则在洪杨时代被毁了。沿西有一条走廊，从走廊尽头，再向西折，转过一小腰门，便是我们昨天休息的西斋所在。

整个的八达庙是包围在树林里面的。跑出山门，有四株大槐树，又直又高，据说夏天在槐树下面乘凉，真是如登仙国。庙左是一片大竹林，春天竹林里出的笋，就够庙里半年的食用了。庙后庙右则都密长着松树柏树以及还有许多我所不识的。

八达庙是坐北朝南的。我们从庙左的大竹林走出，便见一片白光；在太湖里飘着的大沙船，挂着高高的蓬，也了然可数。缥缈峰和大雷山，像着了淡灰色的服装在远远的天边蹲着，它的安详说出太湖的柔和。

那天天空里没有一点雾，为秋天所特有的那种朗爽的太阳，照在广润的湖面上，湖光，山影，尽入胸中，觉得有无限感触。终年在都市里生活着的人们，一旦跨入了伟大的自然的怀抱，对于已往的昏沉的日子，不免会若有所失的吧，而在那样无边的烟波之前，当时的我，又提起了如20岁以前所有的那般浩然之气。

伯父有事，饭后便一个儿径自下山回去了，我因为贪看湖山景色，留下来打算再住几天下山。西斋虽然不过小小三间，但却明窗净几，别有风趣。东面一间是和尚自己住的，我则住在西首一间。中间一间作为进膳之用，除了上首挂了一幅济公伏虎图之外，其余四壁，便空无一物。

我住在那儿，每天起身极早，看太湖日出，东方忽紫忽红，真是幻变万千。太阳慢慢的升上来，一角，半圆，有时则被云埂拦腰一斩，割裂为二，红得那样令人在喜悦里带一些惊叹，在神奇里发出一份祈颂。蹲列在湖里的远近山峰，在晨曦的抚摩下，也忽青忽紫，忽现忽隐，令人把握不定。再回头看西南丛山中，则又是另番景色：一片云海，浮罩在山腰之间，使我体会到为国画里所含有那份神味。四处村落里，都袅袅地冒出早炊之烟，鸡啼童唱，零落传来，在那样的荒山朝景里，真使人徘徊不止。

这八达庙虽然也是一块佛家之地，可是每天并不做“功课”，除了在济公神像之前，焚着一炉檀香之外，在庙中的其他地方，便嗅不到一缕烟烛之味。这庙里只有一个和尚，其余便只是些管理着山地农务的长工，倒也约摸有一桌人数。和尚每天起身很早，差不多天刚亮时，我便听见他在屋子里悉悉索索的声音了。他穿着一件只长到膝弯的八卦衣，倒有几分道装风味。套着一双长统山袜，外面再加上草鞋，虽然是不修边幅，却也潇洒有致。看他年龄，像也不过三十开外，可是从涵藏在他眉间的那股沉着之气看来，却又俨如已是 50 以外的人了。

这庙里还有一件突兀之事：和尚常会从灶间里捧了一碗太湖鱼进来，借此下酒，毫不避人。我是素来不会喝酒的，可是在那样的猿鹤生涯中，却也强学风雅，愿得一醉。我们常常向南对酌，坐看日暮。而在那样的时候，活是一幅不知老之将至的好画轴。

我这样闲散的住着，竟不知不觉的过了七八天，有一天，正是向晚时分，我在庙后山头上看落日余霞，和尚却悄悄的找了来，问我今晚可有兴吃一点蟹。这真是一回意想不到的赞美，我一时承不住气，连说好极好极。

和尚悄悄的先走了，我独个儿一直坐到黑夜吞吃了自己的影子，才带着悠然的心情走回八达庙。一路北向，看到了丁山蜀山的窑火，万黑一红，倒也颇起了一些身世之感。穿过走廊，折入西斋，真是好一片沉默，全庙如死，听不到一缕人声。那晚，我们就在东首一间和尚自己住的那房里晚膳。我来八达庙快有 10 天，那天还是第一次跨进和尚的卧室。原来和尚睡的却是地铺，一褥一被，下面铺了些稻草，经卷为枕，倒是简单万分。

房里除了几张几桌之外，也一无陈列。在下首靠窗处，亮着一支长烛，照着全室，半明不暗。那时蟹还没有煮好，和尚在他的地铺上打着坐。我则一趟两趟在房里无所谓的踱来踱去。

眼光偶然扫过靠着地铺的那左首墙壁，看见挂着一幅残破的横条，于是也就凑近去随便看看。不料那上面写的却是一首八行的白话诗，记得是这样的句子：

这一页白纸

不是怜惜不是悔

是天没亮

天没亮时的一片灰

这一页白纸

不会写下个字

只是无言

无言中的一次流泪

后面还有一段短跋，跋后的署款却是“无名”两字。我心里想，不料在这荒山深谷里却见此好诗，于是便说：

“‘无名’便是你的法号吗？”

和尚见问，便点了点头。

以“无名”为名，倒真是深得老子之味了。——我正这样想时，一个长工却将蟹装在一只锅里捧进来了。

我们两个人一共吃了九只，喝了一斤多酒，又吃了两碗蟹汤面，那晚在我一生，真好算是痛快淋漓的一次了。

肚子吃得饱饱，自然不能立刻就去睡觉，我便留在和尚房里。我想到几天前我和伯父在父子岭上决定了到八达岭来借宿一宵之后，我们在大雷湾走着的时候，伯父告诉我这八达庙的历史。而在当时，我忽然对那和尚感到一种微妙的神奇。

“和尚原籍哪儿啊？”

和尚一笑，说：“四海为家，没有原籍了。”

我又问：

“你家里没有什么亲人了吗？”

和尚看看我，停了一会，终于答：

“我想我们还是不必作这种迁俗的寒暄吧。”

我没有料到他居然会那样直截了当的回答我，倒使我恍惚若兜头浇了一桶冷水。但是我既让他看透了底，索兴就硬着头皮再问下去：

“来这儿有几年了！”

“三年了。”

“就是在这儿出家的吗？”

“也无所谓‘出家’啊，只是随遇而安罢了。”

和尚那时忽而在我脸上射过一道奇妙的眼光。在那一道眼光里，我仿佛觉得他明白了我；我的好问只是我年纪还轻的一种本份。

“为什么你还做和尚哪？”

“为什么你不要我做和尚哪？”

我给他这样一反问，一时无话可答：他笑一笑，说：

“为着生存哪。每个人，不论聪明的或愚蠢的，刁滑的或老实的，美的或丑的，健康的或病弱的，勇敢的或懦怯的，以及出身于富贵之家或出身于贫贱之家的，来到世上，不是都得获得他自己的生存的吗？但是‘生存’，在‘获得’的原则上虽然是统一的，在‘达到’的方式上却是各别的。我呢？我只要能够获得自己的生存，在任何一种方式下都是可以的哪。”

“但是你为什么却偏选上了这一个方式呢？”

“偏选上了这一个方式？我说你为什么偏在我生活在这一个方式下遇见我呢？”

我平时是自信很会一点诡辩的，但在那时，简直一无施展，只得另作开头：

“你能允许我让我知道你一点已往的生活吗？”

“那由你自己去想象好了。”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哪。”

“假如你以为我已往的生活里有一份勇敢的，那你就以人世间那最勇敢的一份来想象我；假如你以为我已往的生活里有一份潦倒的，那你就

以人世间那最潦倒的一份来想象我；假如你以为我已往的生活里有一份幸福的，那你就以人世间最幸福的一份来想象我；假如你以为我已往的生活里有一份凄惨厄难的，那你就以人世间最凄惨厄难的一份来想象我；总之，让你的假定来建筑起你所想知道的我的已往吧。”

“那样行吗？”

“为什么不行呢？人世间的甜酸苦辣，本来只有量的分别，没有质的分别的哪。”

“今年贵庚多少了？”

“再过两年就四十了。”

“在那 38 次寒暑的交替中，我想你的生命该颇在颠困里跋涉了过来的吧。”

“是吧。”

“这使你对于生活发生了一种疲倦吗？我觉得这正是可歌颂的哪。”

“你的意思是——”

“我说每个人在他那短短几十年的一次旅行里，对于人世间的各种境界，必须都有过一番经历的哪。”

“所谓‘境界’，你是指的——”

“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两种。在身无半文的饥寒交迫中，在百万家私的奢淫生活中，这些都是人世中的通常的物质境界；在天伦欢晤的融暖中，在客乡愁旅的荒凉中，在冲锋赴阵的奔狂中，在遭冤被陷的郁愤中，这些便是人世间的所谓心理境界；……”

“你的话是对的，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对生活疲倦了哪。”

“但是你现在却选上了这一种生活的方式哪。”

“这一种方式的生活不一定就是一种对于生活疲倦了的表示哪。”

“但是至少是一种逃世的生活哪。”

“那末照你的意思如何呢？”

“应当出来做一些事业啊。”

“你所谓的‘事业’是指的什么呢？”

“自然是为国为人类作一点服务啊。”

“假如一个人生在世上，非如你所说的那样做便不行吗？”

“这自然并不是绝对的。但通常说来，我想是该应这样的。永恒的并

不是‘人们’，而只是‘人类’哪。我们现在所谈的所做的以及所知道的，并不是属于自己的，那只是继承五千年来所遗留下来的一点，同时，还得遗留到无穷尽的以后下去哪。人类的活动是连续不断的，我们不过只是这连续不断的人类活动的行程中的一个分子罢了。我们并不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自前五千年至无穷的以后之间的一个联系，我们还是属于人类的整体的哪。”

“所以，我们来到世上，便非为人类作一点服务不可吗？”

“是哪。”

和尚笑了笑说：“这也只是一般通俗的论调罢了。”

“你对于这种论调是抱着反感的吗？”

“假如一个人不是如你那样所说的生活着，你也是抱着反感的吗？”

“是吧。”

和尚又轻微的笑了一笑，挺了挺肩：“好吧，就照你的说去，你觉得我现在的的生活是逃世的吗？”

“是哪。”

“因此，你就说我这一个人是逃世的哪？”

“我并不敢这样说。我并没有包括了目下这一种生活以前的生活哪。”

“是吧，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崇高伟大的想念，要干一番事业的吧。”

“是哪。”

“但是我也逃不出这一个例子哪，20年前的我，也是热情地怀抱着一一种理想的哪。”

“是吗？”

“为了要实现我的理想，我也曾经走遍过如刚才你所说的生命里的各种不同的物质的和心理的境界的哪，我也曾经干过最残忍的事，忍受过最厄困的生活，有过最冒险的经历的哪，可是现在呢？我却在八达庙享着闲福哪！”

“是受了什么刺激的缘故吗？”

“不是的。我以前也曾经自信自己的意志是铁打的，不会受了某一种打击便灰心的。”

“但是到底又为了什么呢？”

“20年来在人世间的奔流结果呢，哈哈……总之，我年纪还轻，你还不懂得，你还不够得去想象……”

“……”

“一种对于生命的空洞之感的袭来，有时是全无理由，全无线索的。总之，你要是再生活了20年或15年，你一定会懂得的吧。”

“所以，你现在对于生活厌倦了，是不是？”

“也并不能完全这样说。我说对于生命的一种空洞之感的袭来有时是全无理由的，这也仅能算作一种泛论罢了，不一定完全是指自己而说的哪。”

“那末就说你自己，你现在对于生活是不是觉得厌倦了呢？”

“我对于生活倒无所谓厌倦，但是我对于事业，对于所曾经有过的理想，却是幻灭了！”

“那是为了什么呢？”

“那也许是无理由的吧。不过对了尚无经历过生活的挣扎之你，总之说也是说不明白的。”

“真的吗？”

“你现在正是一个进化论者，或者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正与20年前之我是一样的哪。……其实，什么‘事业’，我说不过是一种炫眼的名目罢了，我觉得一切的根源，还是出之于‘欲’的一字的。”

“你说一切为国家为人类的奋斗，最初还是出之于一己之欲的吗？”

“是哪。但是你别误会，这个说法并不是和进化论者的思想冲突的，这只是另一种的看法罢了。”

“是否人生而都有欲的呢？”

“我以为人是生而有欲的。每个人来到世上，不都得获得他自己的生存的吗？这一种生存的要求，便是人的‘欲’的最基本最原始最简单的表现，‘生存的要求’可以说是‘欲’的核心。至于欲大欲小，那又是那最基本的核心以外的后天的滋长了。……本来，‘有欲’乃是天下第一苦事。越是爬得高的，他的身心不是越不感到安宁吗？枝叶越是拉得开的，那下面的根干儿不是越不容易承受吗？既然最终的目的在乎获得生存，那我便取其最简单的一种好了。”

“你这话我是理会的，不过目下人世间一般人，明知越高越苦，可还是一心向高处爬，自己摆脱不了哪。”

“你说摆脱，谈何容易呢？不过有时，生活却会将你折磨到使你自然而然的会觉得四大皆空的。”

“像你现在一样，是不是？你现在便完全皈依于佛教之下了吗？”

“不，你说这话，便是仍然不明白我的，这儿的的老和尚去年上终南山参禅去了，有人说我既然这样悟达，为什么不也跟着老和尚上终南山去呢？但是，假如我要这样做了，我不是又入了一魔了吗？”

和尚说到这儿，像也忍不了几十年来的生命所给予他的回忆，喟然长叹了一口气：“我现在就只是这样的生活着，我住在这儿，听不到人家的，也不想人家听到我的。我今天说的不算少了，是不是？我只是随便说说的哪。我的言语里并没有一个一贯的线索，也并没有一个是什么基础的概念，但是你得明白，人世间本来就是只有这么‘一道流动’。无所谓‘一贯’，也无所谓‘矛盾’。什么人生观，宇宙观，那都是书本上名字，真实的社会里只有‘现象’，只有‘事实’。我今天乱七八糟的说了许多，你难道想用一种哲学的眼光来分析我吗？不，这简直是一件愚蠢的工作。或者，你难道还想用另一种新的信仰来鼓动我吗？来使我得到再生吗？不，我说这也仅仅是一种梦想。人永远只有被时间支配。几十年的时间将我慢慢的冲，冲，现在将我冲在这座八达岭上，于是我便这样的住在这八达庙里，这八达庙里住着这样一个我。”

我们正讲到这儿，却见有一个人提着一盏灯笼走了进来——

“怎么这个时候你来了。”这倒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老顾带着他那这一生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付慧直的心肠，先吹熄了灯笼里的洋烛，说：

“家里看见先生快十天还没有回家，倒颇着了急。今天午后北平又来了电报，所以老爷叫我连夜跑来了。”

我先看了看他带来的电报，心里决定就明天回去吧。和尚招呼领老顾进来的那个长工，去料理老顾的晚饭。老顾出去时，我说，

“好吧，我们明天同下山吧。”

我看了看表，已10点多了。我便先去睡了，但是一时太兴奋了，上了床也兀自睡不着。我那时在八达岭的生活倒像十分留恋，虽然还不致

于有就这样终吾此身之想，但呼吸在那样闲散的心境里，却是有福之事哪。

第二天一早，我便真的和老顾两人一起下山回家了。和尚送我到山门口，我们就那样一拱而别。一路，老顾在前，我仍旧在后，走下山来。我一边走着，一边回味着和尚之言辞，颇有兴感。再回头上望时，则见一片疏林，八达岭早已消灭不见了。

一年以来，在外奔走衣食之我，对于这种闲情逸致，也早已忘怀了，但不料前天在无意中却又遇见了无名。前天晚上，我伴一个朋友上奎光阁去听白云鹏的大鼓，车过花牌楼时，看见对面来了一辆车，车上的人好生面熟。可正当我这样随便思索之际，无名却先招呼了起来：

“可不是x先生吗？”

我看见他在招呼停车，我也只得招呼自己的车子停下来。跳下车，我走过去——

“呵呵，你吗？什么时候来南京的？”

“前天”

“来南京玩的吗？”

“不，过路的，我不住八达岭了！”

“你不住八达岭了吗？”

“八达岭上月给匪占住了。”

“现在还给匪住着吗？”

“匪是给赶跑了，但我也给赶跑了哪，他们叫我酒肉和尚，哈哈……真是一个风雅的名字哪。”

我因为有朋友站住等着，不好意思多谈，说：

“你现在住在哪儿，我明天来看你好吗？”

“不，我现在正上下关去，船快开了。”

“上哪儿去呢？”

“回湖南。”

“湖南哪儿哪？”

“常德。”

“打算——”

“不，回家看看。”

“呵呵。你府上这几年来知道你在八达岭吗？”

“不不，正因这样，一旦回去看看也是好的哪，哈哈哈……真没有料到在这儿遇见你，好，我不能耽搁了。”

“好好，真是凑巧，那末我们通信吧。”

我们就这样匆匆的遇见又这样匆匆分手了。我坐上车再回头看去时，他的车子早已弯入了杨公井不见了。

1933年秋天 南京

(原载《文艺月刊》第5卷第1期 1934年1月1日出版)

六、乌鸦与马粪

在沿海边的一个小村上，住着三百多户人口。这三百多户人口当中，除了一小部分是以捕鱼为业的之外，其余便都是靠着田地过日子的；普通种米谷，有的则种果树。这小村，离开它附近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很远。只有一条河道，民船要航两天一夜，才到县城。有时冬天结上冰，则一切交通都得断塞了起来，除了起早路走，便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和外面往还了。

东面是一片大海，沿西南一带，则高山蜿蜒，地理上的天然结构，使这小村里成为一个部落，仿佛有一种与世无争似的安逸。从花开到花落，结果到果熟，整个的村庄安置在一片浑朴里。老年的在屋子里守着，年壮的在田野里来往（田野吸收了他们一生里顶长顶可贵的一段），放牛是孩子的份。一直到又是一个冬天的末尾了，于是大家安排起过一个瑞祥快活的新年。每个人都在一份平和的气息里流去了他们的年岁，他们所看到的是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月亮，从海边上拖起的大鱼和田土里长熟的金黄般的稻谷。他们听到枝鸟的春歌和秋雁的淡唱，或者就是偶而从村南抬到村北的一顶花轿前面的鼓乐。每个孩子，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他所接触到的和经历着的，都是一种沉穆朴质的气氛。他们住在低低的暗暗的屋子里。不论夏天冬天，天刚亮时全家便都爬下了床。这成为一种极自然的规律；于是女的下灶间料理，男的要是抽黄烟的，便带着短烟杆先上田里溜一圈。每个人都先做一套事才吃早饭。村上有村上自己做的豆油和豆腐，每家人家都有每家人家田垌上的蔬菜。在他们的起居里，只有“饱”与“暖”，没有“美”与“选择”。一件衣服，从祖

父传给父亲，父亲再传给自己，自己到穿不下了，还得留给弟弟。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早，睡前只用一根灯草，躺在油盏里，划开了一屋的明暗。他们从小对于生活就没有掀起任何一缕幻想，男大即娶，女大则嫁，村南失火村北的人全跑去救，村北有丧事村南的人也来帮着料理。他们这样一代接一代的，靠天时地利和自己的一份气力活下去。

大部分的人都是终生守止在这小小的村庄上的，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渔夫和贩果子的才上外方走动。他们有时也带一些新闻回来，譬如他们说电话，这儿说话那面居然能回应；他们说电灯，机关一捻便亮了，再一捻又熄了。凡是这些，都使这村庄上的人听了觉得神奇，于是从茶楼里带上东家，东家又带到西家，西家再带回茶楼。但这些新奇都扰乱不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他们没有因为这些新听见的奇迹便引起一丝不安分的念头。

也从没有一个人听见住在这村庄上的人们谈过一句“世事”。他们对于外面的“世界”，全不关心。即使是辛亥年的革命，也没使这小村上掀起过一丝骚动。他们保持着他们原有的气息与风尚。有时，谁说起：

“什么地方又在打了哪，不知道外面倒底是怎样一个世界了啊……”

但这也像三月田野里的春风，偶而一片飘过，引不起他们什么感应。这一个小村，他们自成为一个国土，他们没有什么叫文化，他们也不受外界潮浪的波动。他们是世外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继续着他们中古式的生活，但他们这份生活，是愉快的，朴实的，天真的。

他们这三百多户人口的排列，从南到北，成一弧形，端端正正的面朝大海。村庄的后面，接衔着峭峻的山崖，上面长着一片浓密的树林，远远的看来，正如一座不透风的屏障。这一片浓密的树林里，栖住着无数的乌鸦。其中有大嘴乌，有小嘴乌。它们身上都披着一团黑，那翅膀的基部，发出一种绿色，好像灼灼有光，叫人看了发生一种畏惧之感似的。大嘴乌的嘴是直的，小嘴乌是弯的，嘴根有许多刚毛，被覆在小小的鼻孔上，暗褐色的眼珠，能射出极大的一份光。脚细小，但每个趾端，却有一种极锐利的钩爪。这村上的住民，虽然每天起身很早，但它们却比他们更早。东方还才吐出一缕微白，它们便彼此唱和似的“哇……哇……”的叫了起来。接着成群的向海岸飞去，成群的，密得要使人仰望好久一回。

有时，飞得低，还发出一片声响，粗暴得像一阵海潮一样。

村后那沿山脚一带的树林里，栖住着乌鸦，据说已有几百年了。乌鸦与村民，彼此相安无事地，在这村庄住上下来。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好似都有一种感情，彼此相熟。乌鸦从天空上掠过去，看到地面上农民的劳动，在劳动里他们有一种愉快。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村上永远是流散着一份太平的气息，在这一份太平的土地上面飞过的乌鸦，也像遨游太空，极其安逸。

乌鸦每天早上从山崖飞到了海滨，一只一只扑落扑落地息了下来，挺着那短小的脚梗，一摇一摆的沙滩上踱着。“哇……哇……哇……”的没有规律的乱嚷。特别在每次潮水退落了之后，许多小鱼和贝壳，搁留在沙滩上，这成为它们最美的食料。有时，遇到看见了个大贝，于是便衔了起来，从高坠下，再碎壳而食。他们的食料，没有规定，谷类，浆果，马铃薯，昆虫，以及树屑等，全能吃。它们的嗅觉十分敏锐，即使在一里多路外面的尸体，都能找得到。常常三两只三两只的分头出去寻觅食物，一只在那儿采食的时候，其余的便远远的守着，替它巡护，防备敌人。有时，也单独的出来，在垃圾堆里，用嘴翻来翻去，或者在旷野里，看看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条蚯蚓或蜗牛。要是找到什么一时吃不完，于是便带回来藏在自己的窝里，或者藏在人家的屋瓦上面。他们每天清晨或黄昏，一群几百只，从这个山头飞到那个山头，从山北飞到山南。村上人常常在暮色苍茫中，看见从远远的天边一阵嘈杂掠了过来，又甚有条理的各自飞回了自己的窠，而在那样的时候，他们也便检点着自己的牛羊，招呼着孩童，预备收拾吃夜饭了。

乌鸦一年里顶忙碌的是两个时期，一个在初冬，一个是初夏。它们得在过冬之前，先储藏有充足的食料。初夏，则是它们的产卵时期。它们平日，有时上有稻谷的地方，或者果树园里偷一点吃，有时则在树林里或山野寻觅吃一些腐物之类。正像这小村庄上的人们一样，它们的生活也是从容而且平和的。

但近几年来，乌鸦也渐渐地感觉到了觅食的艰难，每次潮退之后，海滩上总散布了许多孩子，用着饥饿的眼光，寻觅着有没有什么被潮水刮上的水物。渔夫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大量，他们近来全成为顶吝啬的人，

不再轻易容许一条小鱼剩落在沙滩上。他们不再将死鱼丢在海边上，死鱼近来也给一部分人视为了一种适当的食料。人们不再肯浪费一些什么食物来剩给鸟兽。他们现在自己都感觉到生活的沉重。一群乌鸦每次飞到了海滩上，挺着那么短小的脚梗，一摇一摆的四处踱着，但它们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获得一尾肥鱼了，它们现在觉得这海滩上什么地方都是荒芜和萧条的。

它们也不再那样容易骗得到那些浆果。近年来，果树林里也分外看守得紧了。从果子刚很小很小的时候起，果树林里便有人看守了。他们还在地上扎着许多草人，头上戴一顶笠帽，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一阵风吹过，那些草人便一阵骚动；人们用这一种方法来惊吓那些偷食的鸟群，帮助自己的不足。要是果子快成熟了，那就更看守得紧，从天亮到天暗，再从天暗到第二次天亮，全不缺少人声的呼喊。“嘘……嘘……嘘……嘘……”不管天空有没有鸟过，树林里的人尽是怎么成天的叫着。在夜晚，则用一根手棒，挈着另一根竹筒，发出一种“笃……笃……”的声音，来表示林子里的警戒没有疏忽。有时，那些乌鸦刚刚在那些果树上息下了脚，下面一阵动，又将它们像魂不附身般的吓跑了。

稻谷这一类，那就更没有它们的份，农夫们终年辛辛苦苦的，流尽了他们的血汗，才得这么一点收获，哪里还能容许鸟群的偷食？近年来，正如那些乌鸦所感到的艰难一样，这小村庄上的人，都在无形中蒙上了一层窘蹙的感觉。在每一个人额角上的皱纹，都刻下了一份呻吟的病痛。本来全靠这一个小村上供给的全县城里的鱼市，因为县城和邻县新通了一条汽车路，于是那里的鱼市便全给沿汽车路的别个村镇上占有去了。同时，这村上的种各种果子的，就更吃了亏。同是一份货色，别地因为交通便，货到得快，不容易腐烂，并比较新鲜，水果行里就此买别处来的水果，这小村上的出品便受了一个极大的打击。本来村上出产的黄豆，有一部分是做了豆腐和豆油，供给自己本村上食用的，但是自从外地市面上的价格；涨高了以后，于是本地的黄豆也就大部分都流向于价格较高的外县去了。这一个流动的结果，再加上食盐以及各种日常必需品的涨价，使这小村上的生活程度也渐渐的抬高了起来。

每家人家都在慢慢的中落下来。本来差堪温饱的人家，近来常常发生了青黄不接的苦痛，因为钱粮的重，田都变得不值钱了。从前中等的

田，一亩可卖五六十块的，现在连那些不怕干旱不怕大水的上等田，三十多块钱一亩，也没人来领会。有一些积蓄的人家，往昔本来都爱置一点产业，可是现在村上好像染上了一种痼病，大家都感到一种虚衰，谁还有现钱拿出来买田地，置产业？就是城里面的那些大户，近年来也都感到田亩的累，再没有人将白白的“活水”来买“死货”了。每年只不过收这么有限的一点租，可是税倒要纳好几重。本来有田产的还都想抛出去，在这种情形下，田价便更加跌了下来。

在这小村上，并没有几家“大户”，“佃农”也不多，普通都是有这么十几亩田，就靠这十几亩田维持了一家数口的温饱的。他们终年辛辛苦苦，就指望秋天的一次收成。但这几年来，年成不好，都是歉收。

有许多人家挨过了端午，便家无宿粮了。好容易挨过六七月的，也终于不免发生“断火”的境象。他们眼看再过两三个月，田里便可全长着黄熟的秀稻了，但他们就等不了这两三个月。他们不能在这两三个月里饿着肚子白挨。可是叫他们上哪儿去借贷？隔壁邻舍，都是半斤八两，自顾不暇的，谁还有力量来照顾旁人？他们在没有办法之中，只得忍痛将田亩零碎的出卖一部分。但在这年成，卖田比登天还难。好容易得20块钱卖出了一亩，那简直是大面子，要得说了千万句好话，就仿佛人家已救了自己一命一样。

要是卖田卖不了的，就更糟。在那时候，他们就不能不仰求于那些“放稻的”了。他们明知那些“放稻的”是杀人不用刀的，但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自己硬着气不求他们的赐惠？那些“放稻的”，是专门在五六月，六七月上各处乡下放债的。他们知道有许多农民，家里的积粮不够维持到新稻成熟。在那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得容许他们这买卖的存在。他们将稻贷给那些农人，借一斗，还一斗二升，还得用小斗子量出，大斗子量进。他们也不要押品，他们不愁你躲赖。你新稻起田了，就得尽先还了他们的。可是从去年起，那些“放稻的”就更聪明了。他们不再用“借稻还稻”的规矩了，他们改用了“借稻还洋”的新法。借的时候，在新稻尚未登场之前，稻价自然总得贵些。譬如一担稻在那时作四元五角的，还时连利就得作五元大洋。可是近来稻价一年一年的跌下来。新稻登场的时候，市面上只到二元五，有时顶高到二元九，过不了三元的关。这样一来，要是借了两担稻的，将来就得化四担还。如其

一家人口多，稻借吃了太多的，则一年的秋收，差不多倒有一大部只好拿来还债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消三四年，就会将一家本来可以勉强过得人家活活的盘剥干净了。现在，这小村上，谁家的屋檐下不有叹息的声音飘出来？谁不都感到这年岁的难挨？上半年吃下半年的粮，大家都是一天困迫一天，日子越过越难了。

而寄存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的乌鸦，除了感觉到觅食的艰难之外，还新添了许多生活上不安全的现象了。它们每次在暮色里飞过时，总听见地面上有一片恶意的“嘘……嘘……”的声音。村人们近来对于乌鸦好像发生了一份极不良的印象，他们近来无意识的感到乌鸦这东西的讨厌，好像乌鸦多少象征了一种不祥的预兆。乌鸦所遭受到人间这侮辱是冤枉的。但同时，从没有人来戕杀它们的生命的，现在也有了。它们常常在出外觅食的时候，忽而砰的一声，天外的灾祸飞来了。不幸的就得做了那一粒子弹的目的，其余的也得在惊骇之中乱飞，现在每个人都得用许多法子来维护他自己的生命，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想到打猎这一件事上来了。每一条乌鸦带到城里去，可以卖上七八个铜子。要是每天能够打上几只，那已很够维持一家的温饱了，这样一来，相安无事地住在这小村上已有几百年了的乌鸦，就此得了厄运了。

今年夏天，村上忽而有一个消息，说村上不久要有军队开来了。这一个消息初传到这小村上时，大家都以为是谣言。这村上从洪杨以后，从来没有驻过兵。但尽管村上的人们在作着这样的疑惑，可是谣言却一天一天的证实了。村上的人们对于这一种军队的开来是反对的。他们反对的原因极其简单，他们既不是一种基乎爱国思想的反对内乱，也不是基乎人道主义的反对战争。他们最单纯的动机，就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一种恐惧。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概念：就是军队是一种“凶物”，在狂暴的炮火下，可以毁灭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的。

在七月初七的那一天，大队终于开到了。一共有三千多人。这小村上，凭空增加了几千人，便突然感到扰乱了起来，什么地方都是兵，好像本来住在村上的人，反而看不见了。七月初的季候，天气还正热，有树荫的地方都为他们占据着。有一部分还得闯到那些村上人的破屋子里

来。整个村庄那时完全陷落在不规则的骚动里，晒稻场上都堆满了稻草，一到傍晚，马匹便在村上溜达不停。

村上的人们对于这境遇感到无可如何的烦躁，可是他们除了低低的咒诅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田里的稻本来已有一两尺高了，只要再过两月，就得眼看一粒一粒谷子熟起来。可是他们有一种焦虑。他们知道战事什么时候发生？他们又知道战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每个人都希望战事能够避免。他们最小的希望：村上不要遭受蹂躏。

村上开始了许多军事上的布置。在山顶装着几着重炮，并且挖着顶新式的壕沟。子弹一批一批的用驴车运来，面粉，米，稻草，以及一切辎重，使这小村上好像一霎时之间成为了一个极富裕的区域；可惜这富裕与村上的住民没份。这样在一触即发的对峙局势中，又延宕过了一个多月，到阴历的八月十六，双方的正式战事终于不能幸免地发生了，于是像爆竹一样密的枪声和轰……轰……的大炮，便成为这小村上顶热闹的点缀了。

这昼夜不停的炮声，震天动地的在山野里回荡着，将每只乌鸦都从树林窠里赶出来了。它们像遇着了大批的猎人一样，没命的在空中乱飞，哇……哇……的叫喊着。飞了一阵，仍然飞回了自己的窠。接着，又是一阵大炮，它们又在惊骇中逃出了窠。它们对于这地面上的战争，虽然没有一点知识，但它们却本能地对这凶暴的声音发生一种恐惧的感觉。

但这浓密的枪炮，也终于成为了这小村上的一份日常的现象，使那些树林里的乌鸦听了也成为一种习惯，每夜仍能很安静的休息，不再像开初那样有一种扰乱。它们每天仍旧很自在的在空中飞翔，一面听着从那山坳里传出来的枪声，一面自己哇呀哇的叫着，像是答和。它们像平日一样，飞上各处去觅食，它们不能为了人类的战争便使自己饥饿，正如它们不能为了人类的贫穷便使自己饥饿一样。

战事开初的时候，这方面本来是胜利的，但没有支持到20天，因为西北角上的败退，于是使这方面的阵线也发生了动摇。守着这一角的队伍，连夜的退下来。它们都是用跑步式的一路向后退的。在夜晚，像潮水一样的声音，在村庄上泻过去，杂乱的脚步声，马蹄声，炮架在石板上擦出来的声音，锅灶相碰着的声音，还有一路上传话的声音。全村庄在那一霎那间完全陷落在死般的恐怖之中，不知道第二分钟里的命运。

大部分的村上人，在军队退败下来而还没到上村之前，便都先扶老携小逃出了村子。因为他们知道，败兵是世界上顶没有纪律的军队。他们都在顶悲惨的心情里逃出来，又顾念着家屋财产，又要顾到自己的生命。但这一个贫乏的村庄没有引起那些兵士们的一些妄想，同时，军情的紧急，也不允许他们有一刻钟的迟留。他们一面退时，对方还一面追，待占领到了山顶之后，立刻在山上也装起了野炮向这方面后退的队伍轰过来，可是在那样的情形之中，这小小的一个从前十分安乐太平的村庄，现在便完全消灭在这残忍的炮火下了。

对方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击过去，这小村现在却变了后方补充队和辎重队驻扎的地带。每天的清早或下午，在这平坦的海边上，便有着几百个徒手的兵士在操练着。一边操，还一边喊着，声音散布到全村。村上的屋子，一大半都被炮火削成了断垣残墙，眼看可以收获的谷子，也给军队完全踏烂，许多无家可归的这村上的汉子，这时却全受了军队的招募，编入“新兵”里面去了。

战事一时还不能结束，天气却渐渐的接近了冬天。这村庄，每到夜晚，便听见许多悲泣的声音。天还没亮，营里的马则先号叫了起来，于是一批一批的新兵便在早晨的太阳光中操着跑着。而每当傍晚薄暮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见一阵一阵的乌鸦从天空里扑落扑落的飞了地来，挺着那短小的脚梗，一摇一摆的踱着。它们很从容地觅食着沿地军队遗留下来的马粪；这正是它们近来新获得的一份顶丰富的食料。

(原载《文艺月刊》第5卷第3期，1934年3月1日出版)

七、原 记

(一)

文如恩刚跨进门，屋子里的人都喊了起来：

“文先生回来了。”

沈福原正坐在账房间里抽水烟袋，一听见这声音，立即站了起来，从门帘上那块小玻璃地方望出去，果然看见文如恩提着一个衣包和一把伞，一边和许多人点头招呼，一边匆匆的向账房间走来。沈福原一看见了文如恩，总算几天来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轻轻地落下去了。他想：

“到底有 16 年的历史了，我说哪能出得什么乱子？”

待文如恩走近了，沈福原将门窗一掀，像是迎出去的样子，说：

“如恩，辛苦了。”

文如恩是十六动身的。照往年的例子，在第六天上，他便回城了。来去路上两天，在乡下四天。但这次一直等到昨天念五，还不见文如恩回来。沈福原心上少不得要疑三惑四起来。他有时忽而耳朵特别的尖，听见外面屋子里，像有许多人在低低的说话。他想他们准是说的文如恩的事情。他认定其余的人心里全有数，只就瞒了他自己。但他又一转念，这样老实忠诚的文如恩，为他所信任了 16 年的文如恩，难道也能变了心不成？不，他无论如何不相信，他无论如何不敢在这一个方向上面想象上去。可是昨晚九、十点钟光景，另一个消息又使他整整的一夜没有好睡。有一只从东乡回城的收账航船，在张石桥地方被盗匪抢劫了。今天

一早起来。沈福原便上各处去打听，也没有打听出一个眉目。他不知道文如恩在外面究竟是生死安危，他不知道究竟庄上放在外面的款子能否平平安安的收得回来。正在那样抽着水烟袋解闷的当口，却听说文如恩回来了，心中自然不免要爽朗一大段了。

原记庄上有六个收账员，东南西北四乡，每乡一个，余外两个，则管城里的一部。文如恩是专管东乡这一路的。东乡一路，是x县一县里顶富庶的地方，也就是原记庄放款放得顶多的一段。米店，布店，洋广杂货店，以及春季里的茧行等等，东乡一带大一点的行号，十家有八九家是和原记庄有来往的。目下原记庄散在外面的款子，一共有8万多，而东乡这一路，便占了3.5万左右。因为这一路的出进特别大，所以沈福原除了文如恩以外，从来不肯用别人，文如恩又老练，又稳重，而且和气圆转，这16年来，他没有出过一次乱子。

文如恩将衣包在账台上放了下来，他有许多话急于要告诉沈福原。他那时心上的着急，委实比沈福原还厉害。他在原记庄上吃了27年饭，当了16年收账员，没有一次像这次使他心上这样不通快过。这27年的光阴，原记庄在文如恩的心眼里，就简直等于了是他自己的生命家室。那儿听说毛4万块钱的债，连1万块都没有收齐的？今年东乡一带3万五六千，还算少。往年差不多总有毛5万。只要是文如恩出去收的，至少至少也得个八成，可是今年连三成都不到，他在老板面前怎好交代得过去？

“三成还不到？”

沈福原这么又像责问又像自语似的说了一句。他没有料到会差得这样大，这样惊人。他好像一头冷水，一直浇到了脚底。照文如恩的手段，在他的算盘上，打上了一个“3万”的数目，但是“1万还没有收齐！”这短少的2万，该向那儿去挖补？

沈福原问：“恰大呢？”

“坏就坏在这一家。2万项下只拿出3500。他们说他们的钱也是散到四乡八方去了，散出去的收不回。他们说今年春上利源茧行一倒，足足倒了他们6000，虽然我们镇上是有名的金镇，可毕竟是一个小镇，小小一庄号上，那经得吃上6000这样数目的一笔倒账？洋广各业，业业都在闹穷，有时一天做不到一两块钱生意。譬如说现在年底了，照往年的

情形，目下正是市面顶旺的一季，南货店，绸缎店，洋货店，有时可以做到几百块钱一天。可是近年来，市面一天萧条一天，每家都是冷清清的，每个老板都在有苦无处申诉，他们说他们也是雇了许多收账先生到四乡八野去催，可是大家是干的油渣，逼也逼不出来。”

正当他们这样低低谈着的时候，账房间里另外又走进了一个人，那是原记庄的账房王茂松。沈福原一眼看见，便问：

“说得怎样了？”

王茂松在账台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总算少了零数，一共 2000，明天现交。”

沈福原听了没有说什么，他只轻轻叹了一口气，觉得做人太难。

(二)

前几天，余彬如写了一封信来，当晚请沈福原在翰林第吃晚饭。沈福原心想有什么事，原来余彬如要找他商量款子。余彬如一过新年，在二月初三，给他第四个儿子娶媳妇，所以想在原记庄上调划 2500 块钱。沈福原一听余彬如要向原记庄借款子，心上本就不对了胃，又听余彬如说，还得在年内要，这一下就更使沈福原打上一个冷噤。这半个月来正是他的生死关头，不知道过得过不得去，哪里还再能抽得出这筋力来管闲事？可是余彬如，就这“余彬如”三个字也得在沈福原心上感到一份分量。他是x县第一名的绅士。他的祖父是翰林，他自己也是清朝末年的一个举人。他家本有的是一份好家私。他家那大宅子在城里是数一数二的。门口有石马石狮，“翰林第”三个金字，使你一跨进大门便看得耀眼。无奈近几年来，他家也全成了一个“空墙门”。大儿子余绩咸，从前在北京政府时代，也做得一个三四流的小京官。可是后来时代变了，近年来，我们常见到余绩咸拿一根旱烟管在凤阳楼雅座里喝早茶，他在家里已经足足的守了四年，现在好像也有“终老此身，不作他想”之概。余彬如第二个儿子余绩庆，本来在上海他岳父开的一家纱厂里做事。他岳父那家纱厂，营业一年不如一年，因为受不了日本纱厂的压迫，终于倒闭了。现在余绩庆也搁在家里，一筹莫展。加之近年来余彬如合那许

多人在暗底里做一些生意。或者黄豆，或者毛竹，但每年总是盈少亏多。这样一来，就使余彬如小时候所有的那份好日子，现在全溜逃了。

余彬如的家资虽然一年一年的空虚了起来，可是他在当地毕竟是望族世家，人又能干，仍然是绅士界的领袖。沈福原虽然心中暗暗叫苦，面子上却不能不敷衍：

“可以可以，你余先生只消一句话，小号里没有不可商量的。”

那晚沈福原走出了翰林第回到了庄上，和王茂松说起了这事，王茂松说：

“现在我们哪儿还划得出两三千这笔数目去应酬？”

但是王茂松这句话刚说出了口，心上便懊悔起来。他也知道东家的难处，现在做人真不容易，要四方八面都招呼得周到。看看是一家小小的钱庄，简直比做一个财政厅长还难应付。

沈福原说：“这数目倒也并不是我们一定吃不下，只是要能过了年那就好了。”

“那我们便和他商量，一准过了年再说好了。”

“余彬如说男家的财礼就得在年内送过去，”沈福原说；“所以非要年内移一移不可。”

王茂松说：“其实是自己的年关过不得，借这个名目罢了。”

那天沈福原和王茂松匆匆谈了一下以后，因为庄上的事情，一连忙了好几天。今日上午余彬如来了两次电话，沈福原都不在，一直到回到庄上来吃饭的时候才知道。沈福原知道这事迟早都推诿不了，于是招呼王茂松下午去看余彬如一次。

王茂松说了许多好话，才算得到了余彬如的谅解，将500零头去消，2000整数，明天交货。王茂松这几年来，眼看沈福原受了许多绅商的压迫，自己也不知道代东家受了多少闲气。可是没有办法，吃了东家的饭，就不能不代东家打算，看东家面上，什么委屈都得忍受下来。

(三)

文如恩看见王茂松来了，便站起来正式交账。王茂松一听见三成还

不到，一时也皱起了眉头。近来他的心境变得十分蹙狭，好像沈福原担的斤量，都落在他的肩子上一样。他这两天的肝气也旺了，那些小伙子三天两头的挨着他骂。可是文如恩已经跟了东家 27 个年头，他是这原记庄上年代顶老的一个人了，他这样心一平下来，便觉得实在怪不得文如恩。他知道，不仅是原记，就是别家庄上，也是有了星没有了月亮，惨淡非常。而且，要不是文如恩出马，也许连这一些数目都收不到。这样想着的王茂松，就连气都一口叹不出。

“沈朝昌呢？”沈福原走到房门口，向着外面的一间问。

“已经去了半个钟头了。”有人这样回答。

沈福原现在就得等沈朝昌回来，看着他的回报如何。

沈朝昌是原记钱庄的六个收账员之一。他是沈福原族里的一个侄子。从小没有父母，就由沈福原照应，带在自己的钱庄上。沈朝昌为人倒也老实，他和许文龙两个人是专门管城里的一部分的。

沈朝昌现在正在云生稻行里。这云生稻行是x县里第一家做米生意的。老板谢云生是沈福原的表兄弟，所以云生行里和原记庄上的往来，特别做得深。谢云生是x县里有名的田贩子。用小价钱吃进来，再大价钱吐出去。平时还兼做放债押款。他的主顾，都是各乡的佃户农民。每到六七月，七八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便大家来跟他情商。有的押田，有的押山，甚至拿其他房产纸契来押的也有。谢云生有的是“现”，他四方八面都兜得转，只要对他合算，不论大小多少，他全吃得下。他有一个绰号叫“吞山海”，提起“吞山海”，没一个人不知道。譬如六月里借他的款子，到十一月里还，说明连本带利一共还多少。要是过了期，他就得将脸一沉下来，押品吞没了。

这样不消几年，谢云生手里可着实有了几万。谢云生生性泼辣，胆子又大，每年夏天，只见他五十一百的放出去，到冬天便是一叠一叠的收回来。可是从没有遇到一点风险的人，今年却也给时代的不景气拖下了困窘的漩涡。田，山，房屋等的地契，橱抽屉里堆着的是，可是十一月过去了，尽不见有人来赎取。到十一月中旬的时候，他看看还不见有人来赎押，心上倒高兴，他巴不得大家不来赎。化 50 块本的，就可以得到二三百块钱的货。可是真到了十一月底，还没有人来赎取的时候，他心中倒有些纳闷起来。照往年的情形，他家早该热闹起来了。成批的乡

下人，在他家厅上排坐着。可是今年来的了，都是恳求他延长押期，到明年麦场上再还，偏没有一个人拿得出现钱。他看着这些人的脸，心上一阵讨厌，大丈夫做事干脆，他有的就是这脾气，那些乡下人干吗摆起一付乞怜的面孔，像女人们的样？他见了就不痛快。

虽然在谢云生的家私上，也许又增加了一部分数目，可是目下他手里却没有多现钱，这使他渐渐感到有一些兜不过来。沈朝昌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谢云生是好讲义气的，所以他觉得有些对不住沈福原。但是可是他的愿？在他也叫做力不应心，没有办法。他现在在原记庄上移挪了16700多块，裕大9500多，统一3000多，还有去年在x县新开的上海分来的通惠银行2000多，以及其他地方，零零碎碎，差不多要有4万块钱才得过年关。虽然谢云生为人精明干练，可是要一时筹到三四万活货，谈何容易！这就使一向打着如意算盘的谢云生，近来也四处奔走，弄得焦头烂额。

云生稻行本来约好沈朝昌今天下午去的。可是沈朝昌按时而去了，结果云生稻行里仍旧是一筹莫展。他们除了前次还了的5000之外，其余11000千多，竟没有办法。正当沈朝昌和云生稻行的坐台张禄四缠不清楚的时候，恰巧谢云生本人到了，沈朝昌便丢开了张禄四，去和谢云生直接谈判了。

谢云生这半个月来，私底下已经派了好几个人下乡催赎去了。那些被派下乡的人，到每家债户人家都这样说：

“你们还是想想法，赎取去吧，否则这样许多地没了是很可惜的。谢先生也不忍出了这几十块钱便收没你们这许多田。要是实在不能全部还，则还一部分也好。能还一部分，便不妨将押期延长到明年四月里。”

每家债户都被他们说得很感动，他们都感谢谢云生的仁慈宽宏。但有什么办法？他们自家几年都过不了。那里还凑得起钱来赎押？许多老夫老妻想到没有钱去赎，眼看自家儿的东西就得变成别人家的了，他们也只能在阴暗的油灯下流几道清泪。他们一年辛苦所巴望的秋收，想不到连这么一点债都还不了！谁不说是大熟年，谁不在欢喜！可是新稻登场，二块二一担，他们从来没有听见稻价会贱到这般地步。

这半个月来谢云生私下派人上各乡去催赎的结果，十分不好。他积在梅镇的稻，本来想屯到明年初夏时候再出货的，因为那时自己手里实

在太紧，只得在上礼拜忍痛出了一部分货。所以当他听了沈朝昌的话，便这么说：

“你回去对福原叔说吧，我也实在为难。要不是，我哪肯有半文拖欠？现在我再拨 3000，前后 8000，算还一半，其余我们只能到明年端午再说了。”

谢云生论辈分也是沈朝昌的叔叔，加之他总算再拨还了 3000，沈朝昌不好意思再多说，就这样出来了。款子说明由张禄四明天上午送到庄上来。

(四)

沈福原和王茂松两个人愁眉不展，算来算去，好像总归过不下去。永泰，瑞昌，瑞康，协泰祥，复生，恒兴，和成，杨广生，王永盛，救济栈，中西旅社，大成，谋得利……这些户口，都是还三短七。他们说生意清淡，市面萧条，货色在栈房里白白的赔了利息，有的则反而要比批进来的价格跌低了才卖得出去。许多乡下人平时来城，拿了东西都是开摺子的，可是到年底，都还不出。平时要不肯开摺子，那生意就更清淡。门面上每天都得有每天的开消，房租，电灯，伙食，还有什么捐之类，付出的短不了一个，可是收入的有欠没现。这种小店生意，本来没有什么本钱，全靠钱庄上放出的一些款子，拿来周转活手。这样一来，眼看什么都停滞了起来，货色搁在店里，不能算钱还债。要是关闭了吧，也没有饭吃，要是开下去吧，就更难支持。每家都是半斤八两，在这个年头，一天干涸一天。

但干愁不是办法，离年关还只有四天，就得在这四天里拼命将这个局面撑着不使摇动。沈福原决计这样救一救急，他看了看表，还只 6 点 10 分，他和王茂松说：

“我们就在万春楼会吧，我现在还另有一点事去。”

沈福原出了原记钱庄，一路向东，他打算去看杨葆仁。这时天色苍茫，巷子里刮着尖锐的西北风，像快要飞雪了般，天地之间好似格外凄惨几分。沈福原一路心事重重，低着头走着，弯入了松花巷，在第 18 号

门牌前面站了下来。他敲了敲门，门开了，开门的是杨葆仁的孙女儿，便问：

“公公在家吗？”

那女孩儿说：“公公上盐栈里的许师爷家里吃寿酒去了。”

沈福原想了想，说：

“公公回来了，你告诉他说我来看过他的。我晚上10点钟再来，叫他不要出去。”

沈福原退出了松花巷，到万春楼去还早，心想上哪儿去打个座吧，就想到高介直家离松花巷不远。他已经两天没有见过高介直了，上他家坐一回儿也好，顺便再探探商会里有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他一跨进县后街高家，却见大厅上灯火辉煌，高朋满座。他本来是无所谓而去的，看见高介直家里有客，正想退出来的时候，却不防已给高介直一眼看见，连呼：

“原翁原翁，来得正好。”

沈福原只得乘势硬着头皮走进去。高介直是当地的商会会长，又是他小时私塾里的同窗，平时交情还算深契。那时厅上约摸有着十个人，全是商会里平时几个说话的，还有去年上海通惠银行分来的分行行长廖中旦也在。他们今天摆了个双台，正是12圈刚完，现在等着吃菊花果，预备晚上还得再连16圈。沈福原心想：“你们这些小子倒能作乐，离年关还有三四天了，还有闲情逸致打牌。”正这样想时，廖中旦却走了过来，和沈福原寒暄：

“原翁这两天该很忙吧。”

“没有什么，庄上的事这两天已弄得差不多了。”

沈福原态度从容地这样回答。

高介直招呼沈福原今晚就在这儿便酌，沈福原说另外还有应酬。他在高家约摸坐到7点钟的光景，便赶到万春楼来了。

万春楼掌柜的看见了沈福原，连忙站起来喊了一声：“沈爷。”

“王先生来了没有？”

“来了，在元号里。”茶房回答。

“沈福原走上楼梯，跨进元号，则见王茂松、陆锺林、史惠生等已经来了。王茂松说：

“我刚出来的时候，庄上接到县政府送来的一封信，说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礼堂开会，不知又是些什么事？”

“什么时候？”

“晚上8点。”

沈福原从王茂松手里将那封信接过来一看，也看不出什么，他说：

“让汪先生来了，再问问他看，他们裕大大概也有的。”

到7点半光景，人都到齐了。今天是原记庄作东，请的上海方面的银行里派来的收账先生，一个叫史兆龙，是汇中银行的，一个叫滕孟宏，是信业银行的。原记庄和上海的银行界往还的并不止这两家，但因为汇中里的大股东章克是沈福原的亲翁，信业的老板苏源保在40年前和沈福原是同在恒复钱庄上做小徒弟的。苏源保以前叫苏元宝，后来混到上海去，在交易所里做做，不知怎样就发了财起来，后来才改名叫源保。沈福原和他们这两人算有一点特别关系，所以原记庄和这两家银行的往还也特别做得殷勤。

陪客方面则有汪裕成，陆锺林，史惠生等，他们都是本地钱业界的人物。汪裕成就是在这城里比原记庄后开7年的裕大庄的老板。裕大庄虽然比原记庄后开7年，可是现在算来，也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他们的场面比原记还做得大，但近年来也受了时局的影响，弄得几次都几乎搁了浅起来。

(五)

据汪裕成所听到的消息，今晚县政府开会，好像也是筹款性质，不过是什么名义，却还不知道。裕大庄方面，已由汪裕成的大儿子汪萱卿代表出席去。官厅方面的事情，明知是吃亏的成分大，可是不能不敷衍，所以到8点10分的光景，王茂松便先退席，代表原记庄去出席县政府召集的临时会议去了。

王茂松走到县政府时，已有8点20分光景。一直等到9点钟，到的人差不多了，才宣布开会。由县长报告宗旨，大概是说县教育局实在过不得年关，由县政府出面，会同全市商界，协力维持。现在整整的一个

县教育局里，拿不出 10 块现洋。但是各处乡下来的小学教员，现在已有三四十个，加上城里的，每天就有一百多人在教育局里坐索欠薪，害得教育局局长牛兴已有一礼拜吓得没有到局办公了。县政府当局感到，在这年底，如其不从速解决，也许容易引起其他事变，所以决计在三天之内，筹足 5000，暂时应付了这一个扰动的局面。

这次开会非常痛快，主席报告完了，立刻有人提议，共筹 5000，那家担任 1000，那家担任 500，像流水账一样的读得十分流利。原记庄派垫 800 块，裕大庄也是 800。

钱业界推汪萱卿出来说话，说了许多苦情，说得又圆到，又恳切。后来结果，本来派垫 800 的，总算减去 300，变为 500，

王茂松想不到昨天在余彬如家里好不容易省下了的 500，今天仍旧孝敬了县教育局。

王茂松回到庄上，已 10 点 10 分了。没有一会，沈福原也回来了。王茂松将开会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说给沈福原听，沈福原明知无事不上三官殿，县政府叫去开会，凶多吉少，所以也没说什么。沈福原先打了一个电话到杨葆仁家去。——

“喂，老爷在不在家？……我原记……唔……你葆仁吗？我福原……好说好说……我大概 10 点 40 分光景来……好，好，好……”

挂上电话，沈福原坐了下来。他告诉王茂松他和汇中信业两家谈判的结果。他和史兆龙滕孟宏两个人，是分别谈判的。彼此差商下来好久，才算说定了，汇中方面解七成，信业八成。年前两天解足，那就是说，后天廿八全数划出。

“就这样，也得 4 万出头了。”沈福原说。4 万，4 万这数目，在上海的银行界或钱业界里，自然算不了一回事，可是在这内地，这种百业不振的年头，要一时兜得转这样一笔数目，实在不太容易。沈福原记得 10 年前，那正是原记庄顶旺的一个时代，和上海方面，每年差不多有毛 30 万出进。可是后来就一年一年的跌了下来。这几年来，上海的银行界对于内地的钱业不知怎样好像不信任了起来，他们明明现金过剩，可也不情愿放给内地的钱业界了。

这时王茂松把着算盘，滴滴答答的拨个不停。算来算去，好像总觉得不过气来。他一项一项的报给沈福原听，说：

“总不能全吊了给他们，自己庄上不剩一点儿油！”

沈福原听了不做声。但他那时的脑子却用顶敏捷的速率转动着。他沉默了好久，终于说：

“欠的必须还，放的收不回，这就活将夹在中间的我们夹得没有命。我们散在四乡八镇上的款子，也是从上海的银行方面划来的。我们只是都市和乡村里的一个连络人，我们从中活动了都市和乡村两者之间的血脉。乡村里不还给我们，叫我们凭什么去还给银行？银行方面，他们知道到了期，就派人来吊回他们放给你的款子，他们顾不得你的死活，他们不问你方面收得回收不回。他们不谅解，他们不能因为我们收不回，就允许我们也不还。他们干脆，到期收款，有1万收1万，有10万收10万，你要短了一个，他们便不相信你。到你下期再给他们做往还，他们就半理不睬。可是钱庄要是断了银行的路，钱庄还能开得成，还能站得住脚？所以要希望和银行方面永远做来往，就得顾全信用，不短少，不误期，可是一家钱庄越要信用，便越苦。你想，我们哪儿愿意有一分拖欠；但是没有办法。心有余，力不足，年头是这样，咱们也挽回不了这凶恶的景象。”

沈福原正说到这儿，壁上的那架挂钟铛呀铛的连敲了11下。沈福原将自己棉袄袋里的那只挂表拿出来看了看；

“真的11点了。”

他想到约好10点40分去看杨葆仁的，现在不知不觉的已是11点。好在杨葆仁抽了鸦片，晚上是他的世界，他每天非到三四点钟不睡，第二天也是非到下午三四点钟不翻身，迟了一刻去没关系。

(六)

“那末就一准这样吧，拜托你了。”

沈福原一肚子委屈，他们就将事情这样决定了下来。

杨葆仁这一枝枪已经上了23年的瘾。他现在每个月，就这一枝枪上，也得孝敬掉七八十块钱。家里可以没有隔天的粮，但他那个泥黄烟缸中却不能没有黑货。但杨葆仁虽然一大半的家资就送在他这一枝枪上，

但他现在的食用，却也就全靠了他这一枝枪才得来。他的心思特别灵，门道也特别通，别人没有办法的，他总得给你想一点道理来。托他事情，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事他都代你做得机密，决不泄漏。就这一点好处，所以虽然明知经过他的手要多吃一点亏，但许多人却仍然愿意找他。

现在沈福原和杨葆仁商量的，也就是这一类事。杨葆仁的职业，是买空卖空，替人拉拢。沈福原眼看今年过不得去，就不得不将东城的一笔产业卖出去。恰好那时刚从北京搬了回来的李太爷要买一笔产业。李太爷在北京做了20几年官。手中着实有些积蓄。现在年纪也老了，老住在北京也不是事，于是决计回到故乡，享受一些晚年之乐。沈福原东城的一笔产业，是十年前原记庄顶旺的一个时候从别人手里买进的。现在逼得没有办法，只得仍旧吐出来。前次本来说得差不多了，沈福原要25000，李府上只肯出到22000，还相差3000，以下没有讲得成。文如恩的“三成还不到”，就此使他逼得将一块羊肉吐出来。

李太爷有的是钱，他能现交。也就为了这点，这笔交易才讲成了下来。沈福原正是一个“燃眉之急”，贪图一个“快”，李太爷是贪图一个“便宜”。说实在话，沈福原东城这笔产业，即使年来市面紧，百业萧条，但到底还值得上3万多。现在只化22000，李太爷是精干出身，这一笔便宜货，自然不肯放松。

所以，只要沈福原这方面肯定了，李太爷那面是没有问题的。他和杨葆仁说明明天成事。这时杨葆仁少不得要摆出他的老调，说：

“原翁，为了你这事，我腿也给你跑烂了。在这样恐慌的年尾，市上银根这样紧，哪儿一时之间能够划得到这笔数目？在你老兄面前，我说句大话，这次你老兄这笔事情，要不是我杨老四，看谁能办得成？……”

沈福原是心里顶亮的，说：

“你老兄说一声吧。”

杨葆仁笑了起来，说：

“你原翁也是明白人，哪儿容得小弟放口？”

他们两个人彼此客气了一回，到头还是杨葆仁开了口；

“来个一成如何？我老四年来越过越窘，你老兄是知道的，今年也过不得年，就算你老兄帮了我老四的忙好了。”

“一成！”沈福原想，你这小子心倒不辣，做了这样省事的一笔买卖，

倒想一口吞个2200。这事据他知道杨葆仁并未费多少气力，并且他平时口气，一直偏着李太爷一面，从来没有帮他沈福原想一想。现在他倒想来个“一成”，他觉得杨葆仁这人心太辣，太不忠厚，太不顾朋友的生死。但他那时心上又十分清楚，他不能得罪了他。他已经套在这一个圈里，他只得说了许多苦话，他说：

“你老兄如能体谅些，我真是见情的。”

杨葆仁见沈福原还价还得太远，心上便老不高兴。但他又不忍将这事从此来一个周折，万一事情弄僵，则自己这一笔空中的好处也便落了空了。1000块毕竟不是一笔小数，要不是沈福原，他能够从谁身上吃到这样一块肥肉。这样想着的杨葆仁总算将心稍为平了下來，他装了一个泡子，说：

“原翁，香一口吧。”

沈福原是顶恨鸦片的。他自己一身便是吃足了鸦片的苦。这时看见杨葆仁将枪口送过来，只得说：

“仁翁自己请吧，时候不早，我也得回去了，明天再见。”

(七)

沈福原回到家里。已经快到1点了。他先在书房里坐了一会。他无理由的感到一种怅惘，感到一种孤独，他近来心头好像常有一种感伤在爬过。他分析不出他自己近来所有的一份感情。他像在疲倦里，又像在奋斗里。他常常在回忆着过去，回忆着过去的丰满与光荣。但过去的丰满与光荣所给予现在的他的，不是忏悔，也不是留恋，却是一种衰老似的寂寞。他已是近60岁的人了。他是一个遗腹子。他父亲在死时，只剩给了他母亲三间破屋，还有的，便是一个怀了七个月的孕。他母亲在艰难的日子中，将母子两个人的生计维持了下来。他母亲这一生的希望就完全搁在她孩子的肩子上。她母亲帮人家缝衣服，每夜得做到两三点钟才上床，每一针里都载下一份愉快的希望。她看到孩子睡在床上，在那无知的小脸儿上，泛出一份天真的笑容。母亲从他那份天真的笑容上，得到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得到在万分苦痛里的仅有的一份安慰。

沈福原在12岁上，便由沈家的族长沈三老太爷送到恒复钱庄上做小徒弟。恒复庄已关闭了有十八九年，现在是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但它是x县里顶早的一家钱庄。那时恒复庄的东家叫张金堂，是有名的方板老先生。什么事都认真，为人极直爽慷慨，但规矩却十分严。你永远不会在恒复庄上听到那些司夫们一句高谈阔论。沈福原初进恒复庄时，什么杂事全得管，地是他扫的，冲茶倒脸水是他管的，账房先生以及大司夫的便壶，也是由他倒的，“规矩”吞吃了他儿童时代的活泼，但也养成了他一生耐劳吃苦的能力。

他在恒复庄上过着，因为勤俭忠实，颇得到张金堂的称奖，便一点儿一点儿的从下面升上来。那时候人心也厚朴，又见他自小幼孤，所以大家肯照应他。他在恒复庄上过了十几年，后来张金堂过辈了，由他的儿子张小堂接了手。从此，恒复庄便一年一年的倒败了下来。那时店里另外有几个司夫和张金堂闹了脾气，于是大家合着伙儿，出来另开了一家钱庄，那就是现在的“原记”。

原记庄本来是几个人合开的。但是后来，其他几个人，荒唐的荒唐了，死的死了，只有沈福原守得最牢。他虽然自家儿做了老板，但他从没有改变过他以前的生活。他还是那样的节省，还是那样的刻苦。所以，慢慢的慢慢的，人家倒了下去，他爬了上来，原记庄终后给他一个人盘了过来。

他为人十分忠直，对于什么人都十分关切心热。他说一句话，便算一句话。他无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干干净净，周周到到，他就靠这么一分“信用”站在x县的钱业界里，他的名字“沈福原”三个字，便是一个道地的金字招牌。

在40岁到50岁这十年之间，是他一生里的黄金时代。他曾经在县商会里做过五年会长，又是当地钱业公会的会长。当地的绅商界里，什么那都少不了他。那时的原记庄，简直就是一座不朽的金库。全县里稍为有一些“底子”的人家，都是他们的存户。谁都相信原记，存起款子来，整百整百的搬到庄上来。钱庄和银行不同。银行放款是要押品的，但钱庄不用，钱庄放款完全讲信用。那个时候，x县整一个县的金融都操在沈福原手里。哪一家店号和原记没有往来？

但那个时候，市面上的银根，毕竟要比目下宽裕得多。每家入家，

也总能谨谨慎慎的过得下去。地方上也还有一种升平的气象，每逢节气，或者新年头上，唱社戏，舞龙灯，十分热闹。到年底的时候，都下人成批的从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里拥进来，每一个人都得背着满满的一篮回去。他们得买一点南货，买一点爆竹，剪一点布料，来粉饰他们一年的辛苦和另一年的开始。

那时的钱庄，可真做得。他们在贴水上，在汇兑上，很有一点好处。那时的收款也省力得多。谁不要面子？谁不顾信用？收账员一到，那些店号便一杯茶送了过来，没有一些疑难纠葛。那时他们收这末八九成可真不费力。就是短收了些，在庄上也毫不在乎。

可是这种黄金时代必竟过去了，像 10 年前那种繁荣的市面，现在永远恢复不过来了。天灾人祸，相杂而来，将人民生命的力量越弄越剥削了。收账员去收账的时候，所看见的苦脸，一年多一年了，而收回来的款子的数目，却一年少一年了。每到一一个节上，便总听见“那一家又倒闭了”的消息。逢节过年，乡下人上城的也不像以前那样挤了。

而在社会经济这样一天一天崩溃起来了的当中，原记庄无法免避这凶恶的漩涡，也一年一年的衰落下来了。

(八)

这一个衰落下来的原因是复杂的。它并不是受了某一个打击才动摇了起来的，也不是在某几个月或一年里倒败下来的。它在无形之中，慢慢的，慢慢的，像一个年纪已经上了身子的人，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发出一种衰落的现象起来了。

放出去的款子不容易收回来，这是一方面，同时，靠了存户的存款作为钱庄活动的一分生力军的，近年来也越减越少了。稍为有一些产业的人，都陆续地搬到了都会里去，于是钱庄上的存款自然而然的受了极大的影响。加之还有一部分人近来忽而不相信钱庄了起来，譬如去年春天绰号叫由三郎的由伟龙，原记庄出到月息一分二厘，他还是不肯，他甘愿将白白的两万块钱一个七厘钱存到上海的银行里去了。他用了许多方法，想吸收存款，甚至拿提高月息做号召，但结果也是无效。

可是存款一减，钱庄就受了累。你要是紧守阵线，抱一个“铁门主义”吧，那就干脆不如关门大吉。这年头真是进也难，退也难。沈福原偶然一眼照见挂在壁上他那今年秋天死了大儿子的照片，叹了一口气，想：

“这年头倒真的还是你们做鬼的逍遥。”

沈福原的太太还没有睡，这时，走进了书房，和丈夫商量家事：

“还有三四天就过年了，家里总不能没有一个钱啊。南货要买的要买了，年礼要送的要送了，要开销的这两天都得要开销。衣料要是明天再不去剪，便来不及赶做了……”

沈太太老是这么一套话，这套话这10天来也不知说了多少遍。但沈福原能怪她不成？她当了一个家，她自然有她的算盘。他自己是刻苦的，到现在，他还是只有一件皮袍子，一件蓝布单衫罩在外面。但他管得了自身却管不了下一代。小的儿女们都在上海读书，他们是用惯穿惯吃惯的。他们不明白做父亲的辛苦，他们没有知道自己的父亲小时候多苦，完全是从刻苦节俭中起家的，他们对于这一些全不知道。他们生下来时，他们已是一个钱庄老板家里的小少爷和小姐了。他们在生活里全不能有一点迁就，他们是带着“消费”的任务来到世界上的。

沈太太从小就爱子女。什么事都得听子女们的意。女儿要买金的，不愁她去买银的。沈太太一共生了三女两男。大儿子32岁了，四个月之间患了秋瘟症死了。第二胎是女儿，现在嫁给了琅玕坊陈家。第三胎也是女儿，是去年刚出嫁的，女婿在上海洋行里做事。第四胎是儿子，第五胎又是女儿，这一男一女还都在学校里。

这一男一女，从中学起，便是在上海读书的。只要一封信来，沈太太便整数目的寄出去。但近年来，沈福原常常在给女儿的信札里，责怨他们太会用钱。沈福原也不再允许他太太随便的寄钱给他们，沈福原这几年的家庭的确紧缩得多。大媳妇去年生了孩子，便由自己带了，不像以前几胎，都是寻的奶妈。沈太太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却爱打打麻将。但她近年来也不再不讲数目便坐下来。遇着场面太大的，她便不坐下来了。

这时沈太太又和她丈夫来噜嗦。沈福原那时正是满腹沧桑，那有闲情来谈家常？只得说：

“明天我招呼庄上先送一百回来吧了。”

(九)

第二天傍晚时分，沈福原正坐在李太爷家的书房里，和李太爷，李太爷的孙子李正，以及杨葆仁这几个人闲谈。他忽然听到有一份极熟的声音在外面流动着，似乎一边讲，一边走进书房里来似的。他回过头去一看，那人也正跨进了书房门，沈福原一见，心上闪过了一片阴影，但随即站起来招呼：

“廖先生也在？”

廖中旦连忙说：

“原翁请坐，原翁请坐。我来了有一刻了，一直在上房谈天。”

原来廖中旦是李太爷的三女儿的过房儿子，李府上现在一切财政出进，都是由廖中旦那家通惠分行经手的。所以今天李太爷也招呼了廖中旦一起来家里吃晚饭。

沈福原和廖中旦虽然面子上应酬得极亲昵，但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心火很不对胃。沈福原自然在当地的钱业界里，德高望重，而廖中旦则仗了上海总行的势力，在x县也十分活动。那时廖中旦向沈福原兜搭上来：

“原翁今年原记如何？”

“总算出进两差一直。这年头也谈不上什么好处，你廖先生是知道的，能够维持也就算了。”

廖中旦说：“这年头的确不容易过，顾得东头便顾不得西头，社会上也实在太枯了。”

“今年贵行呢？”

“小行里这一两年也谈不上什么出进。不过奉了总行的命令，到贵县来，追随原翁之后，替社会服务服务罢了。”

沈福原和廖中旦这样寒暄下去，话头慢慢的接近到本题上来：

“我刚刚才知道沈先生东城的那一笔今晚成事了。沈先生东城的那一笔本来是祖上的吗？”

“不不不，不，”沈福原连忙接下去：“也是几年前我从别人手里收下来的，我倒本来无意将那一笔抛开，还是杨四老说，李太爷急乎想买

下来，好明年春上赶着做 70 岁大寿。我第二个小犬明年暑天在上海 xx 大学毕业了，又闹着要什么到美国去，据说一年就用六七千，至少三年，连来回路费，怕少不了要 25000 左右。恰巧杨四老来说，我想就转让了给李太爷吧。我那第二个小犬这几天来天天都是闹着这件事，我气也给他气坏了。反正像我这样的人年纪也老了，活不了几年了，又带不了一个铅皮进棺材，剩下来的还不是他们的？他们既然闹着不休，我也就落得放手。他们自己用完了，我做父亲的也管不得这许多。现在年代一年一年变了，读了中学要进大学，大学毕了业还要出洋，不知出了洋以后还要什么。”

廖中旦便说：“这正是老先生的积德所致呢，令世兄肯这样发奋，将来准是国家栋梁，也不辜负你老先生这样一番心血了。”

那时，里面有人招呼酒备就了。

这一席酒吃了一个多钟点，散了席，大家又回到书房里来，于是卖主买主和中人都正式签下了字。到一切办妥之后，沈福原从李府上退出来时，已经快 10 点钟了。

沈福原一个子在巷子里走着。冬天的晚上，到 10 点钟左右，街道上已是很静很冷落了。远边偶然传来了一两声狗叫，这声音无理由的引起了沈福原的感伤。这时沈福原好像心里有一肚皮的悲愤，他像被谁欺侮了似的，有一种无处申诉的抑郁。

但是想到目前这一个年关总算勉强得渡过了，心中又稍为平静了一点下来。

(十)

念九的午后点心时分，沈福原从县商会里吃了年酒回到家里。这一两天来，将他真忙够了。譬如说余彬如家的款子要派人送过去了，县教育局的 500，他们也派人前来提去了；北乡南乡西乡的收账的，回来了，收支都得调划支配。李府上的款子已由通惠划了过来，他们和汇中信业谈好的数目也划出了，庄上的几笔大出进总算料理得差不多了。

他回到家里来是打算休息一下的。但他忽然想到昨天和廖中旦说的

那段话，这时他便想将渊成叫了来。渊成就是昨天他在李府上和廖中旦所说的那个明夏快在上海大学毕业了的他的小儿子。渊成明夏大学毕业，他想到美国去留学这倒是真的。他的确为了这事常常和他父亲纠缠着。沈福原平时总是拿“到明年夏天再说”的话支开了去。他那时忽而有些感慨，他感到自己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了，一方面他也急于希望儿子出来接他的手，一方面，他也再没有力量能够供他去出国留学。渊成心目中的父亲，还是10年前的正在丰满与光荣里的父亲，他没有明白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跌落在衰败的陷阱里了。沈福原觉得必须详详细细将近年来家里的境况告诉他，好让他一心一意的毕了业以后弄一个职业，帮着父亲维持这一个有十几个人口的家庭。

但是正在沈福原想去叫渊成的时候，忽而另外有一个人大踏步的从走廊里跨了进来。

“市面上似乎不稳得很……”

“四乡又有什么匪警吗？”沈福原这样问。

“倒不是乡下有什么谣言，好像有人暗中在放原记的‘风’！”

说这话的是沈福原的二女婿，住在琅玕坊的陈祖牟。陈祖牟刚吃完了饭，从家里出来，上淮叙茶楼。一走进雅座里，看见有几个人正在那儿啁啁私语。一见陈祖牟跨了进来，便立刻装上一道正经，大家放开喉咙换过了话头。陈祖牟也不以为意，照例在东角角上他老坐的一张小圆桌上坐了下来。还是一个叫小麻皮的沈奎三，偷偷的接近过来，暗暗的说：

“原记外面风声十分难听哩！”

“什么！”陈祖牟也吃了一惊。

沈奎三是有名的老实人，肠子里一个字眼儿也藏不了的。他说：

“大家都说原记现在只有一个空架子，怕这次过不了年！”

“没有这回事，全是谣言。”

“令岳这次不是为了原记周转不过来，卖掉了一座产业吗？”

沈福原这次和李太爷的买卖，原来连他的女婿陈祖牟都并不晓得。所以陈祖牟当时置之一笑，以为全是无中生有，什么奸人在暗中放谣言。然而沈奎三却说得千真万确，好像这事就是由沈奎三经手的一般。陈祖牟心上好生疑惑，所以稍为坐了一下，便匆匆的跑回到岳家。想问个究竟。

(十一)

沈福原正想追问下去的时候，却一眼瞥见文如恩乱忙忙的走了进来。沈奎三说的可没有假，原记庄真的发生了提款的情形了。沈福原虽然是经了几十年风浪过来的人，但那时心中也不免有些慌乱起来，就和文如恩、陈祖牟三个人急急的出了家，向原记走去。

走到离原记不远的地方，便看见有人陆陆续续在原记门口出进。当起初有几个人来提款的时候，王茂松还不感觉到有什么事变。过后看到气色有些反常，才明白自己庄上在外面起了谣言。越到后来，风声越传越广，自然越来越多。来提取存款的人数一多，喧嚣的声浪也便逐渐的高涨起来。那时原记庄倒闭谣言像潮浪般的在大街小巷里涨过去，冲进了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心脏。这一个潮浪在顶迅速的奔驰冲荡里立刻毁坏了全城市的平静，扰乱了全城市的秩序。像夏天一次顶大的风暴，倾覆了整个城市里的金融血脉。多少人的脑筋受了它的刺戟，起了高血压的震动。在那惨淡的夜色里，在那快要死去的地面上，那整个的城市却变得兴奋，风狂，和山崩海裂的不规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头得特别的紧张，特别的亢奋，原记庄门拥挤着一片乌黑黑的人头，嘈杂的声浪在空中一阵低落了下去，又一阵飞扬了起来。

那时公安局里派了大队的警察前来帮着维持秩序。警察从群众的后面向前刺戳进去。宏大的喝叱在这浮杂的喧嚣里，变成一个极小的声响。每个人额角上淌着明亮的汗珠，点起了脚头抬着颈子向前张望着。警察用最猛烈的力量将两旁的人浪冲了开来，于是接着腾起了一片粗暴的咒咀和妇女的哭泣。警察终于跨进了原记的大门，三两个三两个的分布在各处的要道，以防不可测料的意外。原记上所有的电火全部的捻亮着。每一个人都鼓起他们全身的精神来作这最后的撑持。他们放开全部的胸怀，想露出他们的真实，洗去他们平地所获得的冤诬。

群众在门外保持着极恐惶的拥挤。每一个提到了存款的人，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般的，松了一口气，退了出去，而一个一个又从另外的一头冲了进来。警察都用着灼灼的眼光在群众的头上扫射着。群众像潮水般

的在街心旋转地不退。

这一个凶险的风暴，使沈福原掀起极强烈的紧张，当王茂松用着全付的精力在原记庄上维持着那个颠荡的局面时，沈福原不肯放松每一秒钟的时间地在全城奔跑着。他必须全力挽回这个快要崩溃的基础。他直到深夜才从县政府里退了出来。那一晚上，他找过县长成有志，商会会长高介直，裕大庄的老板汪裕成……这一些人。他们最后在县政府里商议，如其原记不能周转，在这年底，将强烈地影响到全县的金融。于是他们当时决定一方面由县长出面，制止无限制的提款。限定每人不得提取超过他存款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由全县的银行界，钱业界，及商会方面，在明天上午12时以前筹出协款3万，来维持原记这一个提款的风潮。这两方面的担保使沈福原获得了极大的安定。

他回到原记庄时，已是上午两点多钟了。庄上依旧是灯火辉煌。王茂松、文如恩这些人还很精干地在庄上筹划着。这一下午，总共提去了存户总数百分之二十，提去了庄上现存的百分之六十。沈福原相信明天上午再由商会方面负责解来的3万协款，一定可以解除这一次的难关。

(十二)

第二天早上，天空开始飞起了极密的雪花。原记庄还没有开门，门外便已经挤满了人了。这一早上，就比昨天晚上更拥挤。原记庄不稳的消息，像冬夜的北风，无际的向四乡八处播散出去，连乡下的存户都连夜的赶进了城。这一夜沈福原留在原记庄上，没有回家。县政府的限制提款，布告贴了出去，群众间起了极大的冲动。公安局昨天派来的警察，仍旧盘旋在门口，弹压这群众的聚器。原记庄一开门，存户便像海浪般的扰动起来，警察用着全力阻止着，也不见效果，群众像出了柙的猛兽只是向大门里冲进来，连柜台都几乎要挤塌了，于是警察放出最后的威胁，向空开了空枪起来。

砰……砰……砰……

群众在空枪声里掀起极大的波浪。人头在无秩序里旋转着。前面的人向后退去，后面的人又向前拥来，秩序依旧不能立刻恢复过来。那时

公安局听见了枪声，又派来了一大队警察，这才慢慢的使秩序恢复了过来。

沈福原在外面各处奔走调度，王茂松那时就像一位大员，留在庄里镇压。他额角上微微的渗出了几点汗珠，他的心上像有一块铅压着似的沉重。他看到存户像决了口的河水，在街门口冲荡不散。12点钟敲过了，商会方面的协款还不见解来。他看到庄里渐渐的吃紧起来，渐渐的有些摇动起来，他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原记庄在当地有几十年的历史，今天竟然会变得这样的风险？从前谁不相信原记是一座不倒的金库？那时因为存金过剩，不收存户，还有许多人辗转托人来说项，即使利息低些也情愿。王茂松在原记做账柜，亲戚朋友里谁不羡慕，这是一只顶稳顶肥的铁饭碗？但想不到越到近年越难处置。他东家“沈福原”三个金字招牌，现在竟已站立不住。

一方面沈福原在外面指挥调度，一方面庄上也派了人出去四面搜罗。他们只要能平平安安挨过了这一天。他们相信可以勉强挣扎过去。可是这一上午派出去的人陆续带回来的报告，使王茂松的希望受到了极强烈的打击。他们原相信，譬如说，云生稻行一定可以再吊一些回来的。谢云生虽然是一个有名的杀人不见血的田贩子，可是他还算得一个有义气的人。以他和沈福原平时的交情，他总决计不致于坐视不救，无论如何总得卖一次气力。所以他们特别派文如恩当了这一担子重任。可不料文如恩也是带回来了一双空手。原来谢云生也因为云生稻行周转不灵，早在三天前带了第三个姨太太上上海去过年了。

(十三)

饭后将近2点钟的时候，原记庄上的现款已经到了干枯的地步。王茂松开始心慌起来。他看到聚拥在门口的群众，约摸上去，至少似乎还得有两万块钱才可维持。可是昨天商会里答应的协款，一个都没有看见交到，连沈福原本人也音信皆无。王茂松在账柜间里一阵愤怒一阵哀怨。他想到自他进了原记以来，永远是忠心事主，想不到沈福原临末这样的亏负了他，由他一个子在庄上独受灾祸。沈福原这样老诚厚道的人，难

道也会得遗累他人。自己只身远走？他不愿意这样想。但是为什么沈福原一去就没有音信，到现在还不见回头？庄上已到了山枯海尽的时候，他相信要是在十来分钟内没有接济，整个的原记庄就要崩溃了。

他这样在焦急着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剧烈地哄起了一大阵的声浪，嘈杂而狂嚣。他怀着颤抖的心情，顶起了脚向外一看，只见沈福原涨得满头大汗从许多人的包围之中挣扎出来。这x县的人，谁不认识沈福原，特别是原记庄上的存户？大家一看见了他，自然而然的向他挤拥了过来，好像他身上就又有着无数的金银一样。沈福原自从早上出去，一直到那时才回原记。在这几个钟点之内，他整个的生命都逗留在生与死的关头上面。他不知要比王茂松心上焦急多少倍。他寄托着满腹希望的昨天晚上在县府里的协款，经过无数的奔波求拜，才好不容易筹足一成半！昨晚讲好的3万，假如能够筹足八九成，沈福原想，总可勉强渡过这个关口。可是一成半！这四千多的数目，那时拿来何补大局？他得了警察的保护，好不容易才解脱了群众的包围。他带着十分灰心颓唐的神情跨进了账房间。他有一种说不出的伤痛。他那时才知道这次的风潮，全是廖中且在暗里鼓动的。他原意卖掉那笔产业来弥补庄上临时的滞塞，不料这却成为了被人家放风顶好的材料。昨晚说好的协款，3万里面就有5000是惠通的，廖中且这次却一个多不放手，连平时和廖中且有些交情的方面，也受了他的牵制，都坐视不援，眼看原记搁浅。近年来x县的金融界里，钱业界和银行界，本就分为了两大壁垒，钱业界在本地自然是根基牢固，银行界要想在当地业务发展，就非先挤到钱业界不可。可是论魄力，倒是银行界大，他们依靠了上海总行方面，暗中和钱业界作祟，钱业界常常给他们弄得叫苦不止。加之当地钱业界里，又未必彼此都是一条心肠，有些小钱庄，早被银行界收买了去，原记是当地钱业界里的头脑，所以平时就成了廖中且之流的侵轧对象。这次正是他们的一个大好机会，经他们在暗中极力鼓动，所以原记的提款风潮，来得特别凶猛。

(十四)

这一个大除夕的下午，在原记庄真不容易挨过。来提取存款的存户，

只见增多，不见减少，因为较远的乡村和邻县的储户，也都闻讯赶了来。廖中旦一面鼓动，一面将当地的金融紧紧的握住不放，就活活的将一个沈福原捏死。沈福原整上午在外面兜了多少圈子，但真心要帮他的忙的，也是“爱莫能助”。大家在那时，都是自顾不暇。要是像10年20年之前，别说一个廖中旦，就是10个廖中旦，沈福原也满不在乎。金融流通，提10万付10万，任什么人在暗算，原记庄尽可以从容应付。可是目下社会的银根如此塞滞，一个虚弱的内亏，就经不起一丝外邪的摧折。那时原记庄上除了一切生财不动产之外，就是散在各乡的放款，也抵得过各户的存款。然而这样一个实际并不亏负的钱庄，就因周转不灵，活活的迫成了搁浅的局面。在那时，整个的原记庄已经无法避免他的崩溃。挤在门口的存户仍然是那么多，刚刚凑来的四千多元，也只能延宕一个极短的时间。沈福原究竟是年纪上了身子的人了，在那种厄困紧迫的时候，健康上现出了反常的状态。他胸前好像有一块沉重石子，但是没有气力给他吐出来。他一阵阵的有些气喘。他的眼眶里突然的落下了两流热泪。

王茂松那时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奋。他看到当时的情形，他想不到惨淡经营，在当地钱业界里雄霸了几十年的沈福原，现在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他和文如恩是沈福原有名的一对内外交相，他那时说：

“沈先生，我看现在庄上已经到这个地步，今年恐怕是过不去的了，我想由我在这儿担当一切，你自己还是出去避避吧。”

实在，沈福原当时已经失去一种生命的勇气。他的思绪不再是挣扎或反抗，却落入于一种不可言说的颓唐。但当他听到王茂松这样的话时，他却摇了摇头。他自信对于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丝疏忽和欺伪。他有一颗对天坦白的心肠。他不亏负社会，他不亏负任何一个人。他不需要规避。他愿意和他的原记共同生死。

但他到底是老了，他那时因为受的刺激太深，身体上早已现出了一种危险。他经不得王茂松等再三的坚劝，他便被文如恩、陈祖牟两人悄悄的从原记庄的后门口挟了出来。

他们走出东门时，已是黄昏薄暮时分了。雪花一大片一大片的从空中吹打下来，文如恩扶着沈福原上了原记庄自己出去收账的第二号小航船。陈祖牟回去照应沈福原的太太和儿媳等，说定坐了第一号船追上来

一起在杨花墩会合，再上上海去暂住在他的三女婿家里。船轻轻地解开了缆，向东头进发。橹声在严寒的雪夜里一声一声的吐出一声落寞的声音，沈福原和文如恩在微弱的美孚灯下默默地相对坐着。而那时，原记庄里正掀起了剧烈的扰动，10年前被人称为x县的金库的原记庄，在那个时候，因周转不灵，终于宣布倒闭了。

1934年1月作，10月续成，南京。

(原载《文艺月刊》第6卷第5、6期合刊，1934年12月1日出版)

八、说谎者

卢尔他们一行人走近了佛西利亚警署的时候，太阳早已跌落到山坡的背后去了。他们已经走了七八里路，大家都觉得有一点疲倦。那个饭铺老板时常打着呵欠，嘴里吐着含糊不清的咒语。当他发出了这种怨恨的声音的时候，后面跟着的两个警察，总得给他一点小小的威吓。卢尔和约瑟两人的视线，有时不经意的接触在一起，但是他们都没有言语，他们只在一种愤怒的沉默里，向着那个目的地进发。

一走进了佛西利亚警署的大门，押着他们的那两个警察，便显得更加活泼起来。满脸爬着像常春藤似的胡须的那一个，将他们带到了一间黑暗的候审室里。坐在候审室里的一个警察，用一种毫不相关的神情，向他们两人身上投了极短促的一瞥，接着取出了两支下等的纸烟，和他们进来脸上有着常春藤的那个家伙，两人亲昵地抽了起来。

卢尔和约瑟倔强地站在下首靠纸窗格的旁边。他们渐渐的清清楚楚了这黝暗的一室。木板床，桌子，椅子，面盆架……都在黑暗中守着他们可怜的姿势。墙壁上杂乱地挂着几套破烂的制服，和两张已经成为古董的照片。那个饭铺老板，萎缩地躲在那靠门口的一个角角里，脸上流露着一付恐惶的神情，正和他平时所特有的那种鄙陋的气味十分和谐。他时常用着他那微细的眼光，在门外来往的警察身上溜着，不住地吐着轻微的叹息，表示他心中所受的委曲。

这样守候了一个钟头，才有一个穿黄制服的人来领他们出了候审室，穿过了一个污秽的天井，走进了佛西利亚警署的审案堂里。那个审问官，长着两道“仁丹”式的八字须，一双深陷的眼圈里包藏着一付十

分憔悴的烟容。他有很老练的姿势和一个沙哑的喉咙。那时正有两个人刚被审完，退了出来。那后面的一个老头儿，含着眼泪失神地跟着另一个穿黄制服的警察走进了稽押室里。前面的一个则昂然的走出了警署；他是加洛州硝磺总局罗白脱局长的侍从。那个老头儿是加洛州东乡的一个农民，他积欠着罗白脱局长 35 担的稻租。他的贫穷是真的。他 15 年来从没有对罗白脱局长有过一次积欠，但是三个月的淫雨，造成了前年加洛州有名的大水灾。这一次大水灾，对于他的损失是：出卖了两只山羊，一只母牛，和妻子的病亡。这一个损失他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复原。他几次都曾允诺缴还，但到了预定的日期，他又无法践约。他的忠直增加了他的气喘，他时常会嗽得透不过气来。他每次总是流着眼泪恳求着罗白脱局长的饶赦，他祈祷上帝给罗白脱局长加福，为了罗白脱局长的宽宏。

罗白脱局长是加洛州一个有名的吝啬的人。他从来没有允许让自己对谁有过一次施舍。那个老农夫 35 担稻租两年多的积欠，在他简直是一个例外。但是这次，罗白脱局长觉得他没有理由可以再容许一个佃户的放肆。他觉得他应该维持自己的体面。两年来他对那个老农夫破例的宽容，已使他对于自己威风的没落，十分伤心。今天那个老农夫第八次的失约，罗白脱局长十分气愤。他命令他的侍从勃罗斯将那个老佃户带到警署里去，在两个礼拜之内，他必须将他所应得的 35 担稻租全数追回。

勃罗斯带了那个苦恼的老佃户到了佛西利亚警署里。他有着罗白脱局长的卡片；罗白脱局长的卡片在警署长的眼睛里，就像一只猫在一只耗子的眼睛里一样，觉得十分可怕。警署长连忙招呼正在下着棋的审问官出去。审问官有着很机警的才能和识时务的头脑。他对罗白脱局长的侍从勃罗斯，正如他对着罗白脱局长本人一样的恭敬。

这个案件没有什么可以审问的条件。老农夫应当将他欠罗白脱局长 35 担的稻租还出来，限半个月以内还清。老农夫的贫穷是一回事，必须还清积欠又是一回事。于是审问官用着他那最有威风的神色将老农夫斥训了一场，并且以顶恳切的口吻和顶谨慎的姿势，这样答复了勃罗斯：

“没有疑问，他必须在半个月之内将所有的积欠还清。”

犯人的时间在警官们看来，委实是世界上顶不值钱的一样东西。人

类里决没有一种理由，可以叫一个审问官停止了他个人的嗜好娱乐，来立刻审问刚刚拘到警署里来的人们的纠葛。审问案件在审问官看来，就如一堆无用的报纸，无论在什么时候给他整理一下都行；除了若干特殊的例外。卢尔他们拘到警署里的时候，正是审问官棋兴正浓的时候，幸而罗白脱局长的卡片使那个审问官暂时搁下了他的趣味，在他答复了罗白脱局长的侍从勃罗斯以后，才顺便想起了还有刚才外面来报告的一个案件。

每一个审问官都有两付不同的脸容，一付是谑笑，还有一付就像现在佛西利亚警署里的这一个审问官在卢尔和饭铺老板前面摆着的一样，叫做憎怕。那时审问官用着很庄严的神色，将手指捻一捻自己的八字胡须，向卢尔和饭铺老板两人先打量了一下，接着问饭铺老板：

“你的饭铺是开在州立大学区的吗？你为什么要和客人打架？”

饭铺老板用着那畏缩的声音，颤栗地说：

“我没有动手，我没有打他。”露出了他的大腿，用手指着一块红色的筋肉：“他先打了我……这儿……这儿……”

审问官显得十分凛冽，转过头来向着卢尔：

“你是州立大学的学生吗？”

卢尔点了点头。

“几年级？”

“二年级。”

“什么科？”

“理学院物理系。”

“你为什么要打人？”

“因为他侮辱了我。”

“我没有侮辱他，”饭铺老板很性急的插了进来，但是他立刻受着了审问官严厉的呵叱，审问官向卢尔：

“他为什么要侮辱你？”

卢尔回过头来望了望站在门外的约瑟，说：

“我和他，约瑟，上他们饭铺子吃晚饭。我们守候了长久，可是我们的饭菜，还不见开出来。我们看见潘格尔他们，也是我们学校里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来得后，但是他们的饭菜却比我们的开得快，饭开得先。潘

格尔他们自然是有钱的。菜叫得多，小费给得重。……那些有钱的大学生，一跨进了饭铺子，空气便立刻热闹了起来，呼啸，狂放，他们仿佛占有了整个的世界。饭铺里的那些伙计和老板，他们的眼睛里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学生。我们这些只吃二毛钱一客客饭的人，自然不是他们饭铺子里最受欢迎的主顾。我们平时常常受着他们的奚落，”卢尔停顿了一下：“我们不希望受谁的奉承，可是也不愿意受谁的刻薄。我们只需要公平。要是我们先来，我们的饭就得先开……”

审问官斩断了卢尔的话头，严厉地问：

“这样你就动手打了起来，是不是？”

“不是。我们先和伙计交涉，可是那些混蛋他们简直不睬我们。我们闹得太凶了，于是他们的老板走了出来，”卢尔看了看那个饭铺老板一眼：“他不但不喝止那些混蛋的伙计，反而用着许多鄙陋的言语讥笑着我们。他讥笑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饭，他骂我们是瘪三，他骂我们的父母何必生我们出来……是的，我们没有钱浪费，但这可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不能随便给人家这样侮辱，他侮辱我，我就得揍他。”

审问官这时用着十分震怒的口气，呵斥着卢尔：

“不行，你无论如何不应该动手先打人。你是一个大学生，你受过了高等教育，你应该好好的开导他们，教训他们。你要先动了手，这事情就是你的错。”

卢尔看了看那个饭铺老板：“这些人哪儿是教训的对象？哪儿讲得通道理？他们只知道金钱，只知道势利。”

“那你也得先到警署里来报告，你不应该先动手打人。”

“什么叫做报告警署，报告警署有什么用？”

“我们当然有办法。”

“办法？大约在今年春天的3、4月里，也是有这么一次，我受了别人的辱骂，到你们这儿来报告。可是反而给你们嘲笑了一场，说这种吵嘴的小事都要来报告，警署还得再为我增设10所……”

“胡说，我们从来没有这回事。我们警察最大的任务，就在维持社会的和平。我们只允许人们讲理，不允许先用强力。”

“可是你们警察就是顶爱用强力的。我曾有一次，看见有一辆洋车，

天黑了没有上灯，一个警察走上前去，不问端由，便是擦擦的将那个车夫打了两个手掌。你们自己做警察的都这样，还要禁止我们不打人？”

审问官这时涨红了脸，有一团火从他的心中冒了上来，他拍着桌子，用手指着卢尔：

“简直瞎撒。你不用得多辩，总之你打了人你就犯了罪，就得受国家法律的制裁。”

审问官又回过头去，对站在旁边的那带着卢尔他们到警署来的另外的一个警察：

“你知道他们怎样打起来的？”

那个警察像触了电似的立刻紧张了起来，他两脚并直，身子一挺，眼睛望着审问官：

“报告：小的是州立大学区第五路第七站的岗位。我看见华顿饭铺门口哄着许多人，才走过去调查，看见这位先生和他们饭铺里的老板扭在一起，无从劝解，所以将他们一起送到了警署里来……”

审问官对于这个报告，好像并不感到任何趣味，于是呵责着那个饭铺老板：

“你铺子里为什么不好好的接待客人？”

饭铺老板很恐惶地申辩着：

“先生，我们铺子里是顶和气公平的，对于任何客人都平等待遇，没有一点欺侮。不过因为客人太多，照应不过来也许是有的。这位先生不原谅我们，他就先动手打了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报告岗位，要还手对打？”

“先生，我没有回手，我没有打他！”

“你还要撒谎？你知道你不好好招待客人，就是扰乱了社会秩序，就应该受国家法律的处置。你现在应该拘押 10 天，或者罚金 10 元。”又对卢尔说：“你滥用武力，伤害别人，应该拘押 15 天，或者罚金 15 元。”

审问官这样说完以后，就像天下从此太平，没有他的责任。他很有威风地将两个犯人交代了给手下的警察，自己退出了审问堂。于是立在旁边的几个警察，将卢尔和饭铺老板引到了稽押室去。那个老农夫可还在那儿一个子流着干涸的眼泪。看见他们新进来的两个人，好像有一种

同病相怜的表情。卢尔和饭铺老板分开地占据了两个角角。法律虽然说明拘押几天，或者罚银若干，可是被罚的人，大都愿意出钱，不愿意接受拘押。那时有个警察走了过来和卢尔讨论着处罚的数目。原来审问官宣判的数目，实际还有伸缩的余地。有一个警察竭力劝卢尔罚出几块钱来，就可以回家，省得留在警署里挨夜。那时约瑟也从后面跟了进来，他心中十分气愤，他对着那个和卢尔在讨论着数目的警察说：

“罚钱有什么用？”

那个警察先给了他凶恶的一眼：

“这是国家的法律。”

“国家的法律！即使今天罚了他的钱，难道以后他便不会再打人了么？”

另外一个警察用着威胁的口气阻止了约瑟：

“你是谁？这儿没有你开口的地方。”

约瑟和那另外的一个警察很猛烈的冲突了起来，但终于给旁边的几个人拉开了去。那时，那个在和卢尔讨论着数目的警察，已经将数目减到了十块。卢尔说：

“我哪儿有这许多钱？我要是有钱，我也不会受人家的奚落了。你知道，我是莫吉利亚州的人，莫吉利亚州现在正给别国的敌人占据着。我自己家里，早就家破人亡了，我还有什么钱使用？我在这儿大学里读书，还是朋友同学们零碎帮助的。我没有钱。”

“你随便先向什么朋友借一借得了。大学里有这样许多朋友，一定很容易借到的。你要是付了钱，你就可以立刻自由，何必在这儿受罪！审问官判明你本来要罚 15 块钱，现在减到了 10 块，还不知道他允许不允许。不过我知道你有特别困难的情形，要是这个数目你愿意了，则我姑且去代你和审问官商量商量看。”

警察用着顶温和的口吻这样说着。他的态度是阿谀的，他的言辞是热烈的。仿佛他一生的意义，就在那一次要求卢尔答应拿出 10 块钱似的。

但是卢尔始终不屈服。他的贫穷是真的，他的刚强也是真的。他即使有钱，那时他也一定不愿意拿出来的。他知道这些狗子的狗眼里只有钱，跑进了门没有钱便不用想出来。他甘愿给拘押在警署里，他有的是

一付好气力和一个结实的身子，看他们将他究竟怎样处置。

卢尔的刚强，使那个警察的热心渐渐地冷淡了下去。警察们一个一个的走出了稽押室，在走廊里，继续着他们平时不规律的放荡的谈笑。约瑟一个子在稽押室里无聊地来回的踱着，他的愤怒仍旧逗留在他那泛红的面部上。但他那时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他忽而挨近了卢尔的耳朵，和他在说着什么。他们用着很低微的口气说着话，接着又互相会意地笑了一笑。

又有一两个警察走进了稽押室，他们用着主人对奴隶的神气向卢尔他们望了一望，那时约瑟站了起来对卢尔说：

“那末我先回去了。”

卢尔点了点头。

半小时以后，佛西利亚警署长办公室里的电话，滴零滴零的响了起来。警署长拿起了听筒，对方的声音：

“喂，你是佛西利亚警署吗？”

“是的，你哪儿？”

“州政府，请你们警署长听话。”

“我就是，你哪一位啊？”

“您就是杜莱警署长吗？我是却而斯。刚刚我有一位亲戚，他在大学区第五路华顿饭铺里和人吵嘴，听说现在在贵警署里，是吗？”

“噢，却而斯秘书长，您那位令亲，叫卢尔的吗？州立大学的二年级生吗？……是的，是的，现在在这儿……”

“事情很严重吗？”

“不，不，不，没有什么，很小很小的纠葛……”

“要是事情并不怎么严重的话，那末我想请您稍为问了一下就让他回学校，行不行？”

“好，好，他立刻可以自由的。”

“好，谢谢你。……”

警署长正要将听筒放下来的时候，对方又继续说起话来：

“噢，杜莱警署长，可不可以请你叫卢尔来听一听电话？因为我要和他说两句话……”

警署长眉毛一皱，很为难似的迟疑了一下，但终于说：

“可以可以，请您稍为等候一下。”

警署长很勉强地差了一个警察去叫卢尔来接听电话，自己暂时退出了办公室，走进了隔壁他的休息室里。三分钟后，他听到卢尔的声音：

“我卢尔……噢，是表叔吗？……唔唔……唔唔……我刚刚在饭店吃饭，为了一点小事和人吵了起来……没有什么……唔唔……大约就可以出来的……唔唔……没有什么……谢谢你——好好——我就来看你——好好——”

卢尔放下了电话，仍旧回到了稽押室里。他在稽押室坐了下来还不到五分钟，有一个警察来领他到了一间客座里，随即他看见有一位衣冠端正的警官走了进来，那是佛西利亚的首席书记。

“卢尔先生是在州立大学读书的吗？”

“是的”，卢尔回答。

“今天卢尔先生和华顿饭铺的老板为什么吵了起来的？”

卢尔将事情的经过重复说了一遍。

“这些商人真是可恶，他们本来就靠势利吃饭，卢尔先生不必和他们计较。”首席书记这样说：“刚刚我们审问的时候，警署长正在外面开会。他才回警署，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案由。他觉得这种小商人必须加以处罚，叫他不准再对客人简慢。——卢尔先生是不是现在打算直接回校？”

“不，刚刚您们审问官已经判明我要拘押 15 天——”

“呵，这，这，我们警署长刚刚开了会回来，这事他刚刚问起过，他说先生为人正直可佩，所以招呼我们立刻送先生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给先生备好了马车，先生是打算直接回学校的吗？”

首席书记以非常流利的口才，和谦和大方的态度将卢尔送了出来，看卢尔坐上了车子，又和卢尔热烈地握了握手，用着顶有精神的口气，说了一声“再会”。

卢尔一个人坐在马车上。夏晚的凉风一阵一阵的在他脸上拂过。马路的两旁长着摩天的大树，车子在没有星子的夜晚穿过了漫长的一路。他想着适才的一幕，不禁要放声大笑。他记起约瑟在电话里告诉他，说

今晚蒙脱莱公园里有国际文化协会的音乐，约瑟现在正在蒙脱莱公园的图书馆里等着他。于是扬着那爽朗的嗓子，卢尔对车夫说：

“上蒙脱莱公园。”

1934年11月于南京

(原载《文艺月刊》第7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出版)

附录：《说谎者》自序

(一)

这是我的第一册小说集。

我最初是学习写散文的。但是我的年纪太轻，我的感情太浮，这使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葱郁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形惭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

我最初试写小说是在 1931 年春天。我在偶然的冲动下写了一篇《春瘟》。第二年（1932）的春天，我又写了第二篇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我对于小说发生了兴趣。在 1931 至 1934 这四年中，我断续地学着写，约摸也写了十二三篇小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

(二)

我写作的产量，薄弱到极点，这大约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的健康不允许我有多量的写作，我平时写了五六百字以后，我便感到疲倦。要是一天我能够写满 2000 字，这在我简直是一次自幸的收获。我想写一篇小说，常常须先经好几个月内心的酝酿；写成了以后，又需要一阵子很长的休息。

第二，我应该说老实话，我在写作的时候，实在从来没有一次有过一点为稿费而写作的动机过。我以为一个文艺作者，如其是为了要获得一笔稿费而去写作一篇作品，这不是一种艺术的态度，只是一次买卖的行为。所以，当我没有写作的冲动的时候，我就尽让我的砚台在灰尘里放肆，我的笔枝在纸堆里懒散。

(三)

我自问我自己对于文学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咒诅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方面既无适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

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我一点简短的口供。这个口供是卑微的，然而诸位先生请相信我，这一点卑微的口供却是真实的，恳切的。

(四)

这一个集子里的八篇，是从我在 1931 至 1934 这四年中仅有的十二篇小说里选出来了的。前后的次序完全以我自己的爱好为标准，这八篇在写作上的前后，则有如下表：

- 春瘟（1931 年春）
- 世纪与义务（1932 年春）
- 断想（1933 年春）
- 人世（1933 年秋）
- 无名（1933 年秋）
- 乌鸦与马粪（1933 年冬）
- 原记（1933 年冬至 1934 年秋）
- 说谎者（1934 年冬）

(五)

最后，我得感谢家璧，这一个集子的能够出版，全赖他殷勤的鼓励和督促。我又得感谢露西，这几年来她给予我的安慰，实在没有东西可以拿来衡量。我现在将这个集子献给她，并纪念我们婚前四年婚后两年——这六年来的不变的爱情。

安平 1936 年

第九章

“客观一周”专栏

一、“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第 1 期

(一)^①第二次沦陷

在 8 月中下旬前后，全国人民都沐浴在欢快及新生之中。在沦陷区的人，欢喜终于天亮，在后方的人，憧憬从此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是结果大失所望，在这短短的几十天之内，那些曾经沦陷了七八年的广大的土地，竟复宣告了第二次的沦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沦陷给“中国军事”的敌人，而这次，却沦陷给“中国政治”的敌人！第一次沦陷的结果，陷区人民身受日军的奴役，这次，则改而遭受本国官吏的那种无可形容的无能缺德的统治。重庆各报对于收复区混乱情形的暴露，竟使后方人士衷心震动。我们相信在现政府中，当不乏富有良知的爱国人物，我竟不知他们是否对于这种局面将顿脚焦虑扪心自愧。但是单单顿脚焦虑扪心自愧，仍无补于事。我认为有两事必须立刻做到：第一、一切缺德的行为，必须追究责任，整顿风气；第二、一切方法上的错误，必须改善纠正。改正在方法上所有的错误，最扼要莫过于一个原则，即各种接收工作，切莫只给接收人员接收时以便利，应当兼顾到人民的便利。进而言之，无宁说应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先最重，若能无扰于民，自然也就可以减少混乱和不安的程度。

^① 此级标题序号为编者所加，目的在于便于读者阅读。本章下同。——编者注

(二) 一团糟

再说从我们后方的人来看，在任何方面，只觉得政府没有准备，没有办法。军事，军事处处仰求美国的援助：空中运兵坐美国的飞机，水上运兵坐美国的军舰，到头，还要美军在天津登陆。财政，财政弄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收复区固然弄得怨声载道，大后方也是一片紊乱。工业，工业没有办法，到处是停业倒闭，请求救济。经济建设始终拿不出一个成功的办法；外国的工商业代表，到达重庆后，除交际外，竟无所事事，不得要领。交通，交而不通。迄今三月。连长江航运都未能恢复常态；最初是一片“管制”，现在则又一片“黑市”。这种一团糟的局面必须立刻打开，为了人民，为了建设，为了外交，都不允许长此这样糟下去。

(三) 一团糟的责任问题

但是上述这样一团糟的局面，究竟应该由谁负责？这实在是一件大可痛心的事：竟很少有人能出而公开追究这个问题，并加以指责。就我个人言，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我相信，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没有一党有推翻国民党的企图（因为在力量上他们和国民党还不能成为一个比例），没有一个真正超党派的爱国的中国人愿意国民党崩溃，而形成中国政治上不可想象的混乱。绝大多数，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论或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原因。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寄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不能好好利用，实为大可惋惜之事。国民党假如能够将党的利益稍为看得轻些，多为民谋利，多为民造福，人人之拥护国民党，国民党政权的既稳且固，那是毫无问题的。国民党即使不能完全凭借“权势”，但至少可以一半凭借“人心”，来统治中国，在中国历史缔造光荣的记载。我相信，有远见的人都希望国民党进步，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实际局面下，国民党的进步或腐化，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幸福、希望和荣誉。

(四) 用人

英国保守党在这次大选失败后，立刻组织了一个“保守党改革委员会”，在 HinchinyBrooke 子爵和 QuintinHogg 等的领导之下，从事改革，提携后进，增加党的新生。英国人夙有政治天才。我们抗战八年，经过八年战争后的中国，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大都还是那些老人。“人老国不新”，国家始终不能增长新的血液。这次派往收复区的人员，有一部分操守不佳，以致引起人民对于政府的用人，时有烦言。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政府不愿用有操守有能力的人。事实上，现在的政府也许是很苦痛的，因为“没有人！到处感觉人不够”。但是这里面实在包括不止一个问题：第一、政府如何始能知道或鉴别那些分布在各方面各阶层的人才？第二、政府如何始能使那些人才愿为政府所用。要解决前一个问题，须得使有能力有操守的人，能得到一个在营营奔走求谋干托以外有以自见的道路；要解决后一个问题，政府须先有一种可以迎合人心使人人愿为所用的作风。

此外，政府应当在积极的、建设的、为国家前途的目标下，保障人才，培养人才。一切消耗人才的做法，都应该放弃。

(五) 组织与力量

国共双方均称内战可望避免，而墨迹未干，内战已起。老百姓简直干着急，除叹息外几乎没有办法。中央社有中央社的说法，新华社有新华社的说法，我们简直无法知道真正的内情。人人反对内战是没有问题的，人人希望停止内战，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如何能使内战因人民的表示，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这是中国政治里最最现实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其有办法，几乎也就可以说中国的政治有了办法。我是很现实的。我不相信在现在，人民说不要内战，要内战的人就会听命停止内战。但我们必须终有一日，这个日子越早越好，人民的公意能发生有实效的力量，我认为要达到这一个目的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组织”，没有组织的呼喊只是呼喊，不是力量，不是命令。

阎锡山（存目）

国家的活力

因阎锡山氏来渝而一述我如上的感想，但我显然并非独指阎氏一人而言。现在中国像阎氏那样应当退休的人，不在少数。先谈文官，若干机关已实行退休制度，这种退休制度急需推及全部文官，使国家对于多年劳役公务的人，有所酬庸，而年迈之人，亦得稍享晚年清闲之福。此外，尤其重要的，应当使那特任及选任的政治人物，到了相当的年龄，到了体力上，智力上已没有能力追随时代同进的年际，有一种退休的成规。国家需要新陈代谢，以增加国家的活力，过于老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空占高位，必然阻碍年青后起之优出而为国的机会，因之使国家的活力减低，影响国家前进的速率。

美国人与中国官

鲁斯很轻悄地往南京打了一个转，却忙坏了当地的中国官吏，据《大公报》南京通讯，第一次是马超俊市长预备了盛宴，欢迎鲁斯，鲁斯飞机未到，但预备好了的盛宴不能不吃，据说要吃还要有个吃的名义，这个名义真来得冠冕堂皇：“代表南京市民慰劳何总司令！”第二次是何总司令预备宴请鲁斯，鲁斯的飞机仍未到，这次是“代表南京市民慰劳马市长”！好一个“慰劳”！真不懂，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官吏见了外国人就要那样诚惶诚恐。鲁斯是一个美国人，无论他有多大声誉，说到后来，他也只是一个美国公民，要接待美国人须先了解美国人的观念，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公民就是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都是平等的。鲁斯来中国，不是代表美国，不是代表美国的总统，不是代表美国的国会，鲁斯就是鲁斯，鲁斯所代表的就是鲁斯，他在中国不是一个“国宾”，只是一个游客，实在无须中国官吏那样小事大做。马市长、何总司令，都是国家大员，待办的要公不知有多少，你们哪里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抽出来应酬一个美国游客！中国现在有多少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你们怎能

忍心为了一个美国游客浪费那么许多金钱。我愿意在此率直地奉告所有中国的高级官吏，每当有外国人来拜访你，你顶多和他寒暄五分钟，（据说有一次某大使抵任后首次拜访某要人，那位要人大谈其天，有30分钟之久，此之谓缺乏常识！）假如来和你接洽公事，除公事外，你千万别和他说超过10句的寒暄话，假如为了交际，最好以茶叙为限，非特别必要，切不要请他吃饭。你想，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吏，哪儿有那么许多时间去和外国人应酬？和他谈公事时，要坦白、扼要、正确、恳切，承认我们的国家贫穷、腐败、分裂、没有组织，但表示愿以最大的努力和决心使中国进步。假如这样，即使你不请客吃饭，他心里尊敬你。否则，他吃了你的饭，他心里还轻视你。是否影响国家争面子争人格，也决不是在请人吃饭这一件事上能够达到的。

（原载《客观》第1期，1945年11月11日出版）

第2期

（一）理论与事实

目前中国最切迫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大体上说来，也就是一个国共问题。而所谓国共问题，在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国共的军队问题。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则全力挣扎，要保全甚至增强共产党所已有的实力。没有人会赞成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自蓄军队，从而破坏国家军令的统一，造成分裂割据的局面。全国只有一种军队，即国家的军队。这个原则，应为今日人人所拥戴，应为今日人人所遵守。共产党最近替政府军队加了一个新名称：“国民党军队”。这个名称，在理论上，实不可解。因为假如凡是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队”，则今日之“十八集团军”以及“新四军”等，固无一非政府军队的番号，岂不是“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等都变成了“国民党军队”？但是实质上，在“党治”之下，国民政府既须对国民党负政治上的责任，因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从政治的意义看，固已二者合而为一，

国民党之将使政府军队受其决策，而为合于国民党利益的行动，实为自然之事，这当然是国民党所占的便宜事；此项便宜，出入非小。不过国民党既掌握今日中国之政权，则他之在此种微妙处占有优势，亦为事实问题。

（二）国民党的病症

在原则上，我当然是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的，我之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正如我之反对国民党或其他任何政党拥有军队。军队若不与政党分手，则国家政治终无安宁之日。所以在国共会谈纪要中，政府公然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保持 20 个师，实为违反现代政治原则之事。不过政治终是一个现实，有时并不允许我们侈谈理论，政府竟不得不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保持 20 个师，自然有政府的苦衷。但是在我们人民方面完全根据事实，客观论事，是不是假定在某种情形下，可以赞成共产党拥有相当的军力，实亦不失为一可以研究的问题。我个人不相信共产党在最近的年月中即能取得政权……^①但是我绝不愿见中国长此混乱。我们有 1 万个理由要求中国政治安定，全力建设，以恢复国力，富裕民生。政治力量不能没有重心，现在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无可否认仍在国民党。所以我们能尽力来帮助国民党，努力建国大业，也就是我们尽了为国家服务的责任。虽然各人的方式不同，有的人直接参加国民党，担任职务，有的人站在国民党以外，从事批评，固无一不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与服务，国民党非无主义，非无人才，也非无有希望有朝气的优秀的后进党员。世上原无十全十美的主义，过去 20 年中，三民主义若能实现了一半，则今日中国亦必不复是今日之中国。论人才，今日国内人才固未必全为国民党所用，但国民党执政前后已达 20 年，为国民党所吸收了的人才数不在少。国民党党中也不乏朝气蓬勃思想前进的后进党员。我们和他们谈时，发觉他们的观点和我们大体一致，而其对于本党的批评，有时尤甚于我们党外人士。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一是党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有能力有朝气的有为

^① 此处有删节，以省略号代替——编者注

青年党员，竟不易在党内发挥积极的力量，以增加党的活力，这虽是两事，实则互为因果，或者毋宁说仍为一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无可否认的。也正因为有重重的腐烂的覆盖之下，使潜有新生的力量不易芽长，使许多有为纯正的青年国民党党员，终而消极地说：“我只是一个挂名国民党党员。”

(三) 进步与刺戟

但是这种现象不仅是国民党的不幸，抑复为国家的不幸，我们必须多方面努力，以促进国民党的革新与进步。对外战争原有推陈出新的功能，没有一事可以刺激一个国家从头改过有如对外战争一样。但是不幸经过八年的抗战，我们大家看看我们国家政治的进步到底在哪里？我常认为，在政治的技术上，中国是越来越进步了，因为一切好听的名词及办法都运用得应有尽有，但是在政治的本质，中国的政治是越来越退步了。贪污腐化的程度日见其深，而民不聊生的程度也日益严重，我们必须督促国民党进步，而要督促国民党，则非拥有一种足以督促它的力量不可，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只有两种人说话发生力量，一是美国人，一是共产党。美国人有飞机大炮和金钱，共产党则有枪杆子。但是在国家的立场上，我们绝对反对任何外国人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控制我们的内政。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管。

(四) 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上的需要

因此，我希望中国新产生一个反对党，一个有力量的反对党，所谓“力量”，原非指军队而言，而不幸在中国竟多少有一种无枪杆子即无力量的形势存在。正巧现在共产党拥有相当武力，他似乎可以成为想象中的中国政治上的反对党。共产党当然有共产党的长处，也有他的缺点。但是共产党有他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我并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用于中国。同时，我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话，他能完全实行他原来的主义。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我们都是有理性的，假如能有一个可以使大家有饭吃，大家过得好一点

的社会制度，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为什么要自私而不乐观其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终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其次，共产党的刻苦精神，实有可取之处。我是不赞成一味以吃苦为号召的，我希望能使个个中国人的生活标准提高，政治的目的是要使人民快乐而非使人民苦痛。但是在一般人的生活犹在水平线以下时，政治上的领导人物应先能刻苦自励。如此方能造成新的风气，而达政治清明之途。共产党这种长处正就是今日国民党的短处。以彼之长，补此之短，正是合作之道。假如共产党扩大适当军力，我们不希望他运用这种武力来直接从事军事的斗争。我们希望能使一种军事的消耗行动，变而为一种政治的建设行动，那即是说，要共产党虽有军力而能不用其军力。共产党仍当在正常的民主宪政轨道下，一方面宣传他的主义，一方面利用他的实力，使其发言获有力量，监督执政党，使执政党不能胡作胡为。一在朝，一在野，岗位虽异，而目的则同，各尽本分，以求国家的富强，民生的康乐。

(五) 某一种结论

但是希望共产党有军队而不用其军队，共产党的活动仍仅限于和平的宣传，仍应在民主宪政的正轨上活动，这一点能不能做到？是的，这是一个触及着问题核心的问题。在根本上，共产党的做法本来出乎传统的英美民主国家一般政党的做法，所以要希望他拥有军队而不利用军队，恐不免流入幻想。在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政党，我们本来不要军队，无奈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无军队即无法生存。要我们放弃军队，毋宁说我们要消灭我们党的存在。”共产党说他们本来不愿有军队，这是一句很漂亮的漂亮话。所不幸者，我们竟然能让他们说这样的漂亮话，因为在今日中国，确有无枪杆子即无法生存这种情形存在。但是真的一到了双方有军队，还要希望彼此互信互助，实未免近于理想。因为军队这样东西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军力小的一方面，必日日担心着被他人消灭，而军力大的方面，必日日恐惧对方之扩张；担心被他人消灭者，必用种种方法以保全并增长他的实力，恐惧对方实力扩张者，必处心蓄虑以消灭对方的力量。事实上，共产党恐未尝无以暴力夺取政权之念，而国民党则卧榻之旁，当然不令他人鼾睡。所以国共两方，纯粹从“党”的立场着眼者，似乎走上了这样一个看法，

以为非用武力不足以打开当前的局面。内战，内战！内战就是他们对于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个结论。

(六) 内战解决得了一切吗？

但是从我们人民的立场看，谁愿意内战？谁不反对内战？而且，即使退一万步说，中国局面终非出乎一战不可者，但是第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进行内战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内战究竟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就前者论，和日本打了八年，总算邀天之幸，靠别人的福气，未蹈亡国之祸，可是国力民力，已是筋疲力尽，怎么还经得起内战！日本已败，中国在各方面都到了千载一时的复兴机会，国际友人也殷殷以中国自强为念，而我们自己岂竟自暴自弃一至于此？就后者论，凭借军事究竟能解决得了一切吗？否则打了一半，终出于妥协，则所有死者伤者，以及遭受军灾者，他们所受的苦痛损失，究为何事，岂非天下之大大滑稽？要不然，弄不好，恐怕中国不免要变成了西班牙第二，然到做今日之西班牙者，究竟有什么趣味？可是悲哀得很，一谈到现实，人民虽然反对内战，而舍呼吁之一途外，竟无他路可循，呼吁始终是呼吁而不是命令，今日中国人民还没有力量可以命令要打内战的人停止内战！

(七) 政治上的责任心

目前停止内战的主要希望，还是系于国共两党对于人民的责任心。很明显，人民反对内战，今日之中国也再经不起内战，国际大势也不许我们再作内战，共产党为了要获取来日的政权，实不能任性行动，漠视民意，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身当执政，且已执政了20年，对于今日国家的治乱，所负责任尤重于他人。再进一步说，今日国民党要打共产党，可是请问共产党在中国之有今日，究竟是谁的责任。假如国民党20年来的治绩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生康乐，今日的共产党的势力会不会膨胀到这样大的地步。我对国民党如此责备，有些党员恐不免感觉愤愤，但是我相信有识见的国民党领袖，必将衷心接受，而自承其过失。国民党今日只知攻击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竟不反躬自省釜底抽薪，在从本身改善革新做起，实可谓缘木而求鱼。即使

共产党短于实力，完全打垮，而若政治依然黑暗，人心如此涣散，民穷财尽，鸡犬不宁，如此国家，尚有何为！国家治乱，系于一念，悬崖勒马，固未为晚。

（原载《客观》第2期，1945年11月17日出版）

第3期

（一）自相矛盾、不近人情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韩雷生最近自美来华，并于本月13日偕蒋廷黻署长至各收复区实地考察。10、11月两月间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载运物资自美驶华的船只，已有六艘，并均已抵沪；上载粮食、衣服、医药，以及车辆等物，总量达3.7万吨。战事虽告结束，美国援华会仍拟续办四五年，以为中国复员建设之助。在英国，克利浦斯夫人主持的援华基金上星期还在阿尔倍脱大厦请世界闻名的巴黎弦乐队演奏，为中国灾难募捐。全部援华基金现已超过150万镑之数。英国援华基金运动因战事结束，有停止之意，但中国至少半官方面仍希望英国友人再继续努力相当时候。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受难的时间最久，范围最广，程度最深，所以友邦人士对于我们的灾难与苦痛亦最为关切。战争本是凶事，人类遭受战祸，实为不幸。能不发生战争最好，到打过仗以后再从事救济，已是下策。对于外国的侵略，在求异族独立主权完整的原则之下，起而抗战，事非得已，然而我们今日为什么还要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对日抗战所造成的创伤苦难，救济唯恐不及，我们今日又何忍再扩大灾难，加重损失。加深苦痛？我们一方面要外国朋友来救济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在那里破坏消耗，制造战祸，这种现象，不仅在理论上非常矛盾，在人情上亦不可通。

(二) 权力

“政治”本来是一种权力，但权力的获得与权力的增强，并不全凭政治斗争，或单单在政治一方面着眼。执政党可以用各种方法以巩固并扩大其权力：可以用社会服务的方法收揽人心，用普及教育的方法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用经济建设的方法充实国家的基础，用发展海外贸易的方法富裕一般国民的财力。民智愈高则国力愈强，民生愈裕则国力愈富，国家富强，也就是执政党的威望愈隆，权势愈大。在国际上，国家地位高，发言有力量；在国内，人心归附，令出必行，而且大家蓬蓬勃勃，日新又新，一番光明，何等气象。假如投身政治生活的人，都能如此放眼，有此心胸，则他执政以后，必能知道他所应努力者为何，所应争取者为何。只知在政治斗争一途争取权力，实在已是一种非常落伍的观点，一种非常低能的做法。

(三) 事半功倍

即以今日中国情形而论，频年战祸，民穷财尽。人民对于政府几乎已无所求，但愿能安居乐业，无所骚扰。一般老百姓只要年长、保长、税吏这一类人物少上几次门，就已心满意足。假如能对他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必将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这种良善顺从的人民，真是再到哪儿去找！就是知识阶级，对于政府也没有多大苛求，我们今日并不希望家家有汽车、无线电、牛奶、地毯、壁炉以及一切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所应享受的物质生活。我们都知道自己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我们都愿意吃苦，都愿意忍受这一个从旧的中国走向新的中国的过渡时期里所不可避免的种种牺牲。我们并都有耐心，期待国家在多年的乖运里终能走上平坦的大道。我们只要求政治清明，提高效率，少作党争，少在人事问题上盘旋，少有一切消耗人力物力的消极行为，多做建设性的事业，多多注意人民的生活。这些基本条件的目的不是为一己一私的富贵荣华，而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后世子孙的幸福。只要这些最基本的要求能够实现，全国必定另有一番气象，人人将乐观奋发，个个愿刻苦自励。日本的战败正是中国的千载机会，不仅在我们自己国内的市场，已无日货倾销的威胁，就是从中东到南洋各岛，有许多市场，英美仍不足与中

国为敌。中国政府只要稍为上轨道一些，便可把国家弄得像像样样，只要把许多用在政治斗争上的心血精神收起，转用之于澄清吏治，增加效率，便可大有作为。假如有这样优越的形势而犹不屑一顾，唯知政治斗争，实在愚不可及。

(四) 美人对华观感的动摇

中国经过八年战争，对外战争甫告结果，内战即接着而来，盟国友人，特别是在美国，对于这种不幸的现象，大概无不感觉失望。假如中国的内战再不停止，美国人对中国将造成一种不可改变的印象，即不仅不能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合作，而且根本不愿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做朋友，因为中国这种分裂而不能合作的性格，实已超出了一般常情。在战争未结束以前，一般人以为一俟战争结束，中国和外国贸易即将恢复，并以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市场。现在，大家才知道事实完全相反。在英美自身，在短时间内并无余力来争取中国的市场。在英国，有许多工厂所接受了的欧洲、中东、埃及、印度等地的定货，已足足够他们忙碌五六年，一般工厂在生产上大都已无余力再来招顾到中国的市场。但因英国目前财政的收支不能平衡，所有出国货物，均须现交，而大多数目的现款交易，在目前的中国也极少希望。在美国，过去几年中工厂生产几乎全部为军用品，现在一旦和平，日用品的生产，对于本国的供应，恐须二三年以后，才能达到饱和点，故暂时亦并非急急要到远东来推销。再加中国政局的不安定，使美国商人格外缺乏来华贸易的兴趣，而一切投资更无希望。所以，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感情虽较自有中美历史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为密切，但最近中国政局的发展，假如不能在最短时期改观，可能使美国一般人民对于中国的观感，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经成熟，即将极难挽回。

(五) 美国的对华政策

至于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我们都知道这已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而已经成为了美国整个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就中国言，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已引起了一种复杂错综，而且表现着极其严重的分歧的反响。我们对于美国在战时所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当然

是非常感谢的，在战后中国复兴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仍需要美国在各方面物力人力的友好援助。美国的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自亦在人情之中。不过在目前中国这种微妙的局面下，美国或其他任何一国运用他们对华政策，均须极端审慎。我们以为美国或其他任何一国，对于中国的关切援助，似不宜操之过度，因为这将引起两种反应，这两种反应都足以造成与美国关怀中国原意相反的结果。第一，假如一个外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过分援助，将易于引起中国人民对于本国政府的责怨。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总应当像个样子，所谓像个样子，即大体上这个政府有能力完善地行使他的治权，有能力完善地执行他在责任上应该执行的一切事务。假如这件事要外国代劳，那件事又要外国代劳，样样都要外国代劳，那末中国人民必将发生一种感觉，即“我们自己的政府，究竟所管何事？”这种感觉可能引起一种对于政府不满的情绪，而此显非美国之原意。第二，一个国家虽然庸弱，但他的国民仍有一种无可摇撼的自尊心，他们不喜欢外国人过度过问他们本国的事情。假如美国对于中国的事情关切过度，代劳太多，可能使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发生一种恐惧的感觉，而这种恐惧的感觉，即使是一种误会，也大足影响中美两国所已有的友谊。

（六）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

当然，美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中国。安定不仅对于中国自身是一种莫大的需要与福利，并且对于整个远东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将成为一种重大的贡献。但是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关切中国前途的国家应当进而研究，若向远处看，究竟哪一部分中国人可以对于中国的安定作更大更多的努力。在目前，美国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因为要能安定，须先能有一个强有力而足以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同时还需要在这一个国家里面有一种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大率寄托在思想开明，拥戴民主，爱好自由，憎恶党争的有科学头脑的进步分子身子。我们历观中国最近二十余年的历史，深感过去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对于党争的兴趣太浓厚，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一切施政，常以私党的私益为首要，对于真正有关民生的建国大业，大都缺乏兴趣，缺乏热忱。政治上这种人一多，国家即易陷入乱境，而不易纳于治途。因为政治不清明，社会无

是非，秩序不安定，民生不改善，而却希望这个国家稳定，是诚难乎其难。所以就今后中国治乱而论，应当鼓励一切对于党兴趣淡薄的人，出而参政，尽量减少磨擦的空气，多从事改善民生的工作。所以，无论是美国，其他友邦，或中国国内，都应当认清：未来中国的安定和希望，实多少系于今日中国这一批进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应当用各种方法来鼓励他们，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重要的安定因素。

（原载《客观》第3期，1945年11月24日出版）

第4期

（一）共产党的前途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下院议席仅获二席。二十余年后，她在下院的议席增至191席（1923），为她二十余年前在下院所得议席之九十余倍，并于翌年（1924）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组织政府。在不到50年的时间之中，工党复进而以392席之绝大多数，掌握政权。1906年工党所得选票，仅为323185票，40年后（1945）增至11982874票，几达40倍之比率。在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能不凭借武力与阴谋，完全依靠人心的背向，而能在如此一个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充分的权力，有如英国工党之成就者，实不多见，英国工党的成功，使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常常容易联想起中国共产党的前途。

我个人觉得，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即以国民党言，假如国民党过去能依照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切实实行，政治开明，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则今日许多人也不致倾向到共产党方面去。但在过去20年中，国民党大部分的人力物力，都耗费在“政治控制”一方面，对于民主的改善，成绩很少。今日国民党不仅在政治方面害着很重的病症；整个行政陷入于一种高度腐化及缺乏效率的状态中，就是在经济方面，也潜伏着极大的

危机：党的经济政策未能与民生主义相配而行。一般中国人民不一定欢迎“共产党”。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以及在重重压制和剥削下所遇有的种种无可言说的苦痛，实为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改善，中国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准必须提高，又为全世界人士所共同承认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本是两件事情，赞成实行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赞成共产党，因为并不是必须共产党的政治能实行社会改革的。但至少到今日为止，国民党既不实行各种社会主义的改革，甚至即使温和的社会改革，则在今日中国的局面下，似乎大家只能将实行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事实上，共产党这几年来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那种政策政令的能够自上至下贯彻到底，也还有相当成绩。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徒依赖那种旧式的仅靠政治控制可以维持国家局面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非以能改善人民生活来维持其政权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下，至少就今日中国情形来看，共产党是很有前途的。

（二）共产党与“国家”

但就共产党本身言，有若干问题，尚须进而加以检讨。第一，在国家的立场上，共产党究竟是否以中国为立场；这一点极其重要。共产党之崇奉苏联，是众所共知之事。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有其好恶的自由，甲可以特别崇拜美国，乙可以特别崇拜英国，丙可以特别崇拜德国，凡此既俱为法律所不禁，则共产党党员之特别崇拜苏联，亦属合乎情理。问题是崇拜为一事，立场又为一事，二者截然不同，绝不能混而为一。我们可以崇拜任何一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民族性格，但我们绝不能忘了我们自己仍是一个中国人。假如忘了这点，则将莫知自己努力之意义究竟何在，而不啻成为了他国的工具与傀儡。在这一点上，我个人对于共产党感觉不能满意。六七年以前，中国要求英美的援助时，共产党报纸高呼中国抗战不要变质，谓中国之抗战为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之战，英美为帝国主义国家，故中国不宜接受英美之援助。可惜没有几年，苏联与被共产党报纸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英美，即同立一线；英美对苏联的援助，且数十百倍于英美对中国之援助，而为共产党所崇奉的苏联亦未尝加以拒绝。德国之为侵略国家，世所公认，并奥吞

捷，灭波，而苏联竟与之缔结互不侵犯之约，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未尝敢对苏联有一言之不敬。……※在许多地方，常常使人觉得，中国共产党较之苏联似尤“苏联化”，而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恐怕比苏联的报纸更像一个苏联的报纸。我们看英国，英国工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实因英国工党固未尚忘其本身为英国的一个政党，而非英国以外任何一国的政党。他们的立场是“英国的”。工党执政后，英国与苏联的外交，不仅未比保守党执政时的对苏联外交更为亲密，而且两国之间的争执且更加多。我认为今日中国共产党的党人必须明白，我们都是中国人，共产党是一个中国的政党，任何人忘了这一点，无论什么政党都将不会得到成功。

(三) 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

其次，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究竟是走的宪政的路线或是革命的路线？易言之，经由军事的途径抑或经由政治的途径？前者以暴力为手段，后者以和平为方法。这一点也极其重要。我个人不否认共产党有革命的权利，但问题是今日的中国再受得了受不了再发生武力革命。二三十年来内战不息，人祸天灾，年年都有，再加上八年抗战，国力民力，实在已经凋颓到了极度。中国今日需要休养生息，需要和平建设。共产党亦会承认：国民党既不足以武力荡平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足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所以双方诉诸武力，并不足解决国是，徒然糜烂地方人民，噩丧国家元气。毛泽东氏在重庆谈话，亦一再表示以和为贵，则今日中国共产党似乎宜不以暴力推翻政府为可行。但今日中国共产党拥有如许武力，并无限止地加以扩张，究欲何为？当然，若仅一味偏面地斥责共产党，亦实有失公道；因为今日共产党之所以拥有军队，国民党也应负一部分责任。但现在单就共产党一方面讨论，则我认为在根本上，今日共产党应当在原则上来努力限制国民党的权力；而不宜以自卫为名，自立军队。以自卫为名，自立军队，实已颠倒本末。共产党应当努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主张军队国家化，由种种合法的程序来限制军队为国民党所利用，提倡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才是根本的做法，才是一个大党的做法。此亦即我们所以对于在国共会谈中，共产党之只知斤斤计较于自己一党的地盘与势力表示失望。因为以拥军为自卫，在逻辑上将造成伊于胡底的形势。假如以拥军为自卫，或为求自卫必须

拥军，则这个“军”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足以自卫？假如（借用共产党报纸的名词）“国民党军队”有100个师，共产党有20个师，40个师，60个师，甚或80个师，此即能算“自卫”乎？在量上说“国民党军队”有100个师，固仍可打垮共产党的80个师。假如国民党军队有100个师，而共产党亦非有100个师不可，否则不能“自卫”，然则假如“国民党军队”有1000架空中堡垒，共产党亦须有1000架空中堡垒乎？“国民党军队”有1000架火箭炮，共产党亦须有1000架火箭炮，否则即不足以“自卫”乎？照这样讲“自卫”，则在逻辑上是无法讲得完的。而且，共产党为要“自卫”，甚至到处拆毁铁路，破坏煤矿，就我们一个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看，共产党所用的手段，终不免失之过度。因为共产党这一切行为，其目的固为对抗国民党，而受其损害者，实为国家全体。今日中国，埋头建设犹恐赶不上人家，何能再来恣意破坏。我对于国民党之强欲以武力统治全国的论调，固然反对，对于共产党之以拥有为自卫的论调，亦不谓然。

（四）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存目）^①

（原载《客观》第4期，1945年12月1日出版）

第5期

（一）蒋主席的新演词

杜鲁门总统私人代表洛克，于10月8日自美来华，考察中国经济状况，历时月半，于11月26日离华返美。在洛克离开中国这一天，中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最高经济委员会，其目的“在实行民生主义，帮助人民

^① 由于受所处时代及环境的限制主影响，储安平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偏颇、片面的缺点。对于这类文章，编者只保留题目，不收录文章。——编者注

使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今后伟大的和平建设及发展的工作上”。在这次战争之中，中国所受的破坏糜烂，时间最久，程度最深，范围最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已较现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为低，而经过八年战争的消耗，人民生活的能力，益觉艰难。战争结束，国家人民，均望徐躅苏复，不料又起内争，人民怨愤，友邦失望。然而中国之亟需建设，民生之亟需改善，又为不可再缓之事。政府成立这个最高经济委员会，表示政府正在努力打开目前这种阴霾的局面。

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会上，蒋主席发表了一篇长达 5000 言的演说。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篇新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具体问题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人民生活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物质建设的演说。也可以说，这是一篇象征我们的国家在结束结争以后必须步入另一个新的时代的演说。一个国家固然不能缺乏道德生活的标准，但是一个国家亦不能缺乏物质生活的标准。假如一个国家缺乏物质生活的标准，那也将无法建树道德生活的标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社会一般道德生活的破产，也似乎可以说就是因为人人不能足衣足食安居乐业之故。今日中国亟需全力加紧，用种种经济建设的方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以滋养国家的生命。

(二) 人民的才干

蒋主席这篇演词里有三处提及“人”的问题。（一）蒋主席述及“我们现在没有充分的有训练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去接受并经营以前日本人所办的事业”。（二）在这次经济建设中，蒋主席表示“绝对不能容忍缓慢、贪污，或自私自利的人来榨取人民，以图谋个人的富贵。这种人员必须铲除，并严加惩办”。（三）蒋主席承认“私人的才干及经营能力是一个民主国家经济进步的原动力”。

上列三点引起我三种感想。第一，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政府固应注意培育人才，政府尤应使有能力的人能够自在地循其才智，自我滋长。有天赋的人，即使不得到政府的培育，也是能自发地得到成功的，只要环境不加阻碍，不加阻止，不加斩伤。同时，培育人才，应多

培育“管事的人”，少培育“管人的人”。假如在一个社会里，“管人的人”多于“管事的人”，则这个社会，建设的速率必定降低，而停滞不前及财政消耗的程度必定增加，此实有违现代“经济与效率的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 and Efficiency）。第二，贪污舞弊侵公饱私的人，必须严惩。但事后惩罚，究为下策，与其事后追惩，不若事前预防。任用人员，能力固然重要，操守尤其要紧。今日天下非无洁身有为之士，只看政府如何使他们除奔走蝇营之外能有以自见。目前用人，既大率用推荐之制，则至少在消极方面，一员失身违法，推荐的人也应连带负责，俾推荐用人，可以不致过份徇私。第三，社会乃人之积。国民能力愈强，国家力量愈大，所以政府总要曲尽公道，鼓励人人向上，使人人的智慧的及身体的能力，能作充分优性的发挥。使社会因而得到健全的发展，国家亦可日新又新地向前迈进。

（三）交通启蒙运动

交通是流通金融传播文化的血脉，必须全力加强。但是建筑公路铁道，不要太着眼政治价值，应多注意经济价值。同时，不要只顾到全国性的大动脉，应同时顾到城与城之间，城与镇之间，镇与镇之间，以及乡与乡之间的短途交通。乡村城镇之间的交通发达以后，农村间的养鸡，种菜，水果种植作业，自可逐渐发展，而农村经济亦得日渐苏复。此实大有助于一般农民的生活；生活裕后始能谈教育，讲卫生，增加常识。所以这种乡村城镇之间的交通，就整个国家的进步与安定而论，其重要性并不在全国性的大动脉之下。这种地方交通，可由地方政府负责，只须中央政府加以督促与指导。但是单单造路浚河，还不够。必须以政府的力量来改革一般民间的交通工具。不要说自国民党执政的20年来，就是自康梁变法图强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般民间的交通方式，固未尝有何新的改革。河流上航行的依旧是用竹杆与木橹的旧式民船，路面上的交通工具依旧是两人肩抬的轿子。这种一般民间的旧式的交通工具，实为使中国社会不能加速前进的另一原因。行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之路，即须消耗一天的光阴，这在时间上精力上是何等的浪费，政府必须用全

力来推动一个交通启蒙运动。乡村间的公路上即使还不能行驶汽车电车，但至少可以制造大量的自行车及三轮车，以行驶于乡村间的道路之上。船舶也应竭力利用比较简单的摩托机器，以增加航行的速率。这些事都须政府来做，大量制造，低价出售，在自然淘汰的原则下，一切旧式的交通工具自然会淘汰。我们应当设法将“机器”插入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我认为这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四) 耕耘方法的改革

蒋主席在演词里又提及农村的情形，说“我国没有充分的现代农业原料，例如肥料，杀虫剂，与良好的种籽，也没有充分普遍的现代耕耘智识”。蒋主席认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应立即筹划一个增进我国农业的切实方案，并付诸实施”。这一个方案当然应当包括改进农民的耕耘方法在内。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不能和现代各国社会同样进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做到“以最少的金钱做最大的事业”、“以最少的人力得到最大的效果”这一个原则。在一百多年以前，英国农民的耕耘方法，无论是耕地，下种，收成，储藏以及运输分配等，固无不是依靠人力，依靠手工。但是今日英国农民已知充分利用机器，用机器耕田，用机器下种，用机器翻土，用机器收掘番芋或收割麦子，甚至就在收割麦子的机器上，一面收割麦子，一面将麦穗和麦秆分开，而分开后的麦秆在同一时候经过同一架机器，捆成了一捆，并砌得四四方方。这种科学的耕种方法，简直令人观止！大约估计，在这种机器化的耕种方法之下，一个英国农人的工作效率至少抵得上300个中国农人的工作效率。这种耕种机器化的改革，当然不是在一个短时期所能完成的。同时，我也不相信在最近的20年内，中国农村可以大量利用机器。因为这种耕种方法的改革，所需的条件很多，非像我们在纸上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但是今日我们对于农事的改革，至少应当具有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下，向农村机器化的方向进行。我们一时之间固无法完全仿照高度工业国家之那样什么都用机器，但是我们应当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以达到节省人工增加效率的目的。举例言之，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橡皮管输水的办法，以代替完全用人工辟水的办法？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比较简单的器械，以马或牛来拖行，从事翻土耕地

以及收割谷子？是不是我们可以相当地扩大农村田亩的平面，减少交错在田亩与田亩之间的田埂，一方面减少废地，增加耕种的面积，同时可以适宜于利用各种比较简单的器械或车辆，以从事耕种。凡此种种，在技术上都有赖专家的研究与设计，我们在此地所能贡献的就是一个原则：“用最少的人力求最大的效果。”

(五) 卫生状况

蒋主席又提及人民的卫生状况，认为最高经济委员会“应该集中精力以改善国内的卫生状况”。在中国的建国工作中，卫生状况的改善应该占据重要的地位。前天还有一个英国人问我，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弄得清洁，在100年以后中国能不能弄得清洁？这种公用事业，自然应当由政府出面主持，一切污水池塘的填平，内地河流的开浚，垃圾的运输及消灭，传染病的隔离，时疫症的扑灭，鼠的杀灭，公共厕所制度的建立，以及医学的研究，药品的研究与制造，医院的设立，医师的培育，护士的训练等等，都非任何单独个人之能力所及。国家必须对于这种卫生费用，给予很大的预算，并能认真从事，勿徒作为门面的点缀。但是上述种种还都是治标的办法，我们必须同时从根本上着手，来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国民的健康。因为若是只从医病着手，而不从防病着手，则一面医治疾病，一面制造疾病，不仅对于国家财政是一重永无尽期的负担，并且亦不合乎近代政治的意义。近代政治的意义是要提高人民的知识，使人民能自发地追求其幸福。所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从事广大的卫生消防工作，同时我们要在根本上改变人民的生活头脑，使他们明了日光，空气，及水的价值，使他们觉得卫生的重要，而养成一种自我清洁的习惯。假如一般人民对于卫生生活甚至一般生活能有一种新的观念，一种新的头脑，他们自然而然地会爱好清洁，减少疾病，提高一般国民健康的水准。

(六) 住宅问题

与卫生有密切关系的是住宅。现在中国除了新式都市里的一部分住宅以外，在一般城市及乡村间，对于住宅的结构与布置，大都没有什么新的改革。这种情形亟需加以注意。对于一般人民的住宅，我们至少应

当先做到之事：第一，应力求每一幢住宅的独立，勿与他人的房屋接连，如此可以增加房屋四周的空地，减少污浊的空氣的密度。第二，应当增加窗户的数量，并改大窗户的尺寸，使室内容易吸收较多的日光与新鲜空气。第三，在一般农村之间，应竭力设法使厕所和猪栏和正屋分开，以减少臭味及疾病的传染。

我认为我们既想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府似乎应当至少推行一个温和的社会改革运动。今日中国社会急待改革的事情当然很多，但不妨先就几件较为切迫而实在的项目，认真做一下。就说建筑房屋，现在各地地方政府也有工务建屋的管理，但事实上，那种工务管理，恐怕不仅无助于社会的改进，容或反有扰于人民。我认为，一方面，城市应有城市的建筑设计，乡村应有乡村的建筑设计，这些设计总应力求其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同时，对于一般人民的住宅，也应加以指导，这种指导决不是问他要几个钱才肯给他建筑执照，而是在房屋的结构上，如式样的美丽，避寒避暑的程度，日光的吸收，空气的流通，耐久与安全，对于外部风景的煦和等等，作合理的指导。近代政治原则，所以要求政府指导人民的生活，是因为政府能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而得到比较完善的途径。所以政府必须发挥这种任务。

此外，我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与监督下，可以运用地方造产所得，帮助人民改建新屋，或者全部由政府建筑，再以低价租给人民，或者以分期归还的方法，贷款给人民，在政府规定的条件下自建房屋。房屋问题实在也是今日中国民生问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凡上所述，都是我读了蒋主席最近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上所致的一篇演词以后的意见。我相信，凡是对政治有抱负的人，对于这些有关民生的问题，都是应该感到极大的兴趣的。

（原载《客观》第5期，1945年12月8日出版）

第 7 期

(一) 敬告马歇尔元帅

马歇尔元帅奉命使华，日内可抵重庆。以马歇尔元帅的身份与才识，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出使一个情形极其复杂棘手的国家，美国及全世界对于马歇尔元帅信仰之隆，以及马歇尔元帅此行使命之重，殆可想见。中美友好，已成为一种传统。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中国所得力于美国之援助及鼓励者独多；而美国关切中国来日的命运之较他国为尤甚者，亦为情理之自然。我们于马歇尔元帅莅临国都之日，愿以一个在政治党派关系上无所属的自由人民的身份，就国家前途，略贡所见，以为参考。

国民党一党执政，前后 20 年。20 年专政的结果，使国家的生命愈来愈隐弱，人民的生活愈来愈艰难。时至今日，使友邦的元首，也不得不对中国多年以来这种一党专政的局面，表示“必须修改”。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兴替，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到今日，弄到友邦元首虽不欲出面一言而竟不可得，就我人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国家的耻辱。在历史上，必有人负这种国耻的责任。但是经过多年的一党统治的中国，从各种要求上看，必须进行改革。中国民生之苦，已超出了时代所容许的程度，但是要改善民生，先须有一个有较强行政能力而又有良好政治道德的政府；世界经过两次大战，必须进入于和平稳定的局面，但要使世界和平稳定，必须消除一切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的分裂和混乱，足以威胁世界的和平。所以，我们必须希望并使中国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强盛的国家。

(二) 统一

中国需要统一。但是：

第一，所谓统一，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最高立法权、行政权（包括外交权与军事权）及司法权，属于这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但这个

中央政府必须是建筑于大多数的人民的公意之上的。这个政府中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立法机关的议员及行政部门的行政首长等，必须容许人民或其代表对于他们的进退任免有最后表示意见的权力。这个政府的一切施政，必须以国际及全国人民的福利为目标。统一不是将国家的各种最高权力给予任何一部分少数的特殊阶级，而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权力以达到他们这一批少数人物为谋取他们自己的特殊权势及特殊利益。

第二，“统一”的本身不是一个目的，“统一”只是一个条件，一个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的条件。国家的政治目的乃在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快乐，文化进步。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目的，乃在使国家能于统一以后得以履行其所应负的各种责任；“统一”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

(三) 民主

中国必须走民主的路。我认为：

第一，从事民主的运动，不应当仅仅视之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应更进一步视之作为一种文化运动。我们当然要求政治上，建立一种民主制度，但是要使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根基巩固，必须使人人日常生活及日常意识中，充分有民主的修养。要人人爱好自由思想，人人有容忍异己的态度，人人能凭理智讨论及处置一切事务。假如人人有民主的头脑及有一种民主的思想方法，则在我们的国家中才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根深蒂固而不致徒有其名。

第二，要实行民主应先使人民能自由言论。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关于后者，要使一般人民食能饱衣能暖之后，他们才知什么叫“意见”，才能进而希望他们表示意见。所以，来日的中国政府必须实事求是，选几件与民主最有关系的事情，下决心，立勇气，大规模地改革一番。这是充实中国国家生命的一个根本办法。

(四) 自由

任何一国的舆论，大都均系出之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其在今日中国

从党治到宪治的过程中，对于知识分子之出而领导舆论，尤感切要：

第一，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假如人身自由没有切实的保障，则其他一切自由都不会真正存在。

第二，言论自由包括在公共场所演说的自由，出版报纸及刊物的自由，采访新闻及拍发新闻电报的自由，私人通信的自由，印刷著作物的自由，演戏的自由。凡上种种，俱不受官方或半官方之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限制，干涉，压迫及威胁。行使上述种种自由权利时，如有触犯法律之处，政府得依法于事后追惩之。

我认为：国民党为表示其倡导民主的诚意起见，应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及国民大会召开之前这一段时间内，通知国民政府废止一切限制上述各种言论自由的法令，并明令允许人民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可自由出版报纸，出版刊物。

(五) 政府改组

为求国家进步及加强进步的速率起见，政府即须加以改组，以容纳有下述四种条件的人才：

1. 有现代的头脑者，
2. 有良好的行政才干者，
3. 有良好的政治操守者，
4. 能将国家及全国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者。

但是，我们应当充分注意：今日中国的人才并不完全吸收在各党各派之间。在多年的反常的统治之下，有操守，有政治才干及政治抱负的人，大都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今日中国各党各派之间，人才固然不少，但网罗人才并不能完全就各党各派之间求之。我们应尽量鼓励在党派以外的民间人才，参加政府，使他们得到机会以增加其种种有关实际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以为未来的国家之用。

(六) 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

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

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

(原载《客观》第7期，1945年12月22日出版)

第8期

(一) 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

这一周，重庆的政治热浪正急剧地向上高涨。数月来密云不雨的局面似乎已到了必须打开的阶段。两周以前（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了一篇长达1500言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这篇声明不仅非常明确，而且相当硬性。据未证实的传闻，杜鲁门总统这篇演词，就是奉命执行这一声明的马歇尔元帅所起草的。这篇美国对华政策声明，拆穿了讲，只有三句话：

1. 中国内战必须停止；
2. 中国政府必须改组；
3. 能够做到1、2两点，美国就借钱给中国。

马歇尔元帅来华的使命，就是促使中国实现上述1、2两点。

(二) 马歇尔元帅来华与中国

我们对于马歇尔元帅的使华，有三层感想。

第一，马歇尔元帅的使华，对于中国及中国的人民，是有益的。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建设，不希望再有内战；中国人民希望改组政府，使政治上可以有一种新的刷新：政策的刷新，作风的刷新，才干的刷新，以促进国家的进步，繁荣，及强盛；马歇尔元帅此行的任务，正与中国人民上述的愿望相符合，并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其愿望。所以中国人民对于马歇尔元帅的来华，不仅表示出乎衷心的欢迎，而且满怀期望，希望马歇尔元帅的任务能圆满完成。

第二，现代文明国家已很少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纠纷，

独中国为例外。民国以来，几乎年年有内战。经过八年抗战，世人对于中国的耳目一新，以为中国从此变成了一个新生的国家，向现代政治迈步猛进。不料日本甫告投降，中国即起内争，实在使全世界大失所望。不该发生内战的，竟发生了内战；内战应由中国人自己起而制止者，竟还要劳神友邦，从中调解，可谓丢尽国家的体面。至于政府改组，更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多少人早就要求结束党治，开放政权，铲除贪污，吸收贤能，可是执政当局，一意孤行，置若罔闻，弄到现在，外国人也出来说话了。虽然杜鲁门总统声明：“美国政府素来主张一个原则，即内政处理是主权国家的人民自己的责任，”又说：“美国政府认为关于中国团结的必要的详细步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拟出来，任何外国政府干涉这类事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大家看看这几天来重庆的局面：马歇尔元帅抵渝后，今天接见这一党的代表，明天接见那一派的代表，目的虽为交换意见，而一般印象，马歇尔元帅俨然成为了一个有关今后中国政治前途的中心人物。而且，当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发表了，马歇尔元帅已启程来华后，我们就听到已有人在作“行政院改组不成问题”的表示了。自己人作合理的要求，硬是“相应不理”，一定要“洋大人”来了，局面才有打开之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想不到竟一致于此。

第三，话虽如此，但目下毕竟是中国政治改变的一个机遇。我们为国家和前途着想，就不得不希望在这样一个难再的时期中，朝野各方，相忍为国，和衷共济，不要太重视自己一党一派的利益，能为国家开一个新局面，打出一条新出路。我们希望在野各党各派不要太诉诸感情，趋向极端；同时我们更特别希望专政20年了的国民党能反躬自省，检讨在这20年的大好光阴中，究竟替国家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情。不满国民党的潮浪，现在泛滥全国，泛滥各阶层，甚至泛滥于大多数超然于政治以外的人民的心底。国民党应当平心静气的检讨：为什么会弄到这样一个局面？是不是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纯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得失、利害或野心，或者国民党执政的成绩确实难以令人满意？国民党还是有前途的，只要党能够去旧布新，淘汰渣滓，提携有操守有才能的优秀后进党员，以最大的勇气来一次革新运动。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马歇尔元帅的来华，谋促进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进步，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不过，能够达到民主、和平、团结、进步，也正就是目下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正是平行的，相符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目前这个机会，以促进国家的安定与进步。

(三) 政府改组问题的核心

改组政府这一原则，现在大体上已不成问题；问题是在政府如何改组。国民党与反国民党者之间的政治斗争，目下不仅已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澎湃的程度，而且在内容上，甚或在性质上，似乎已进入了另一种新的阶段。执政党方面似乎倾向以“改组行政院”作为“改组政府”的解释，而在野党派对此恐难接受。因为就在野党派的观点而言，单单改组行政院并不能达到实现民主政治的目的。改组行政院仅仅是各党各派，说得好听些是共同参加政府，说得不好听些是彼此分赃，与所谓“民主”者，固仍相去甚远。今日在野各党派，似乎已经认清，“政治精神之改组”较之“政府形式之改组”为尤重要。说得明白些，在野各党派企图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其目的在使人人能服从这一个民主制度，受治于这一个民主制度，无有一人能高出这个制度而站在这个制度之上。这是今日所谓“政府改组”问题的核心。

抑有进者，仅仅是形式上的改组，如传说中的行政院改组等，对于今日之在野党派是大不利的。因为行政院改组的结果当是各党各派共同参加政府，但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后，未必能贯彻他们原来的政策及作风。经久之后，他们在各种实际的环境里，反而失去主动，同时将因他们在政治上的无作为而失去人民对他们的原有的信仰。这一点，大概也是今日在野各党派所已经看透了了的。

(四)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乍寒乍暖，已酝酿了好几个月，现在大概快要举行了。一般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前途，看法不一。有些人悲观，有些人乐观，甚至有些人且表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些意见，都不免失之偏激。我觉得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或失败，是一个程度问题，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所以我们即使退一步说，政治协商会议若能召开，其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亦无不可。民主政治本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国今日的民主制度，自古代之贤人会议，以迄今日之国会，亦莫不是一步

性率直的“眉批”。客观环境现在已充分成熟，只待我们变，向好的方向变了。

(二) 以万变应不变

国家政治，从政党的角度看，是一种看法；从人民的角度看，又是一种看法。我个人对于“政党活动”的兴趣十分淡薄，而对于“福利政治”的兴趣异常浓厚。政府的组织可以变，政府的政策可以变，政府的人选可以变，但政治的目的不能变；政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并增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与幸福。不论哪一批人来，哪一个党来，总要认真真拣几件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业，在为民谋福利的原则及目标下，大刀阔斧做一下。“福利政治”在各国都是占第一位的，而“福利政治”在中国的需要尤为切迫，因为中国一般人民的生活实在太无保障，和现代国家的生活水准实在相差太远！在我们记忆中，在中国，政治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少数人，并且也只是做给少数人看的。因为只是做给少数人看的，所以在这一批少数人的心目中，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是好的；他们觉得他们所用的人员，也都是有为有德之士。因为国家的政治都只是为了少数人，于是这一批少数人便越来越肥，而全国的百姓便越来越瘦。为卡莱尔所称的“人民状况问题”，是历来的英国内阁的第一件大事，而在中国，则很少从事政治的人注意这个问题。若问我的良心，我仍然相信在中国，绝大多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都乐见中国之强盛，都期望中国之强盛。盖事实上，未有民穷而国可富者，亦未有民弱而国可强者。“以不变应万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以后应当“以万变应不变”——什么都可以变；在政治上应以人民的公意为第一，在经济上，应以人民的生活为第一。政府总要使人民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食粮吃，有工具用，有工作做！

(三) 假如在野党派能采行我这个具体的建议， 即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政治协商会议决定1月10日举行。大家希望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时，能够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让人民能够知道政治协商会议每天在讨论些什么，各党各派或无党无派的代表们在会场上说些什么话，表示些什

么意见，从而使人民对于这些代表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发表的意见，有批评及建议的机会。据报纸所载，在野各党各派都不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新闻公开。政府方面则有人表示恐怕会场狭小，不能容纳新闻记者。这个理由当然极牵强，如因会场太小，则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做会场好了。所以看上去，大概是政府方面不愿新闻公开。我以为单单“希望”新闻公开或“要求”新闻公开，仍嫌过于消极，我们应当想一个有效的办法，使新闻非公开不可。我现在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既然在野党派赞同新闻公开，则只要在野党派采纳我这个建议，便可达到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我认为假如因为政府的反对，致使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时，不能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的话，则在野党派可以每天在会后自行招待新闻记者，因为政府可以不许新闻记者旁听政治协商会议，但政府可不能禁止各在野党派，自由招待记者。这种在野党派招待记者，可以在野各党各自单独招待，或在野各党联合招待。假如是前一种办法，则决定每天在会后招待记者的各党派，可于事前自行排定各党招待记者的时间，务使彼此不相冲突，并将各党招待的时间稍加限止，以便让各报记者回到报馆后有充分的时间写稿子。如甲党定下午8时至8时30分，乙党可定8时30分至9时，丙党可定9时至9时30分等。（假定招待记者在同一地点举行，如在不同一地点举行，时间便须另行酌量排定，使记者们有交通往返的时间。）当日会场经过的本身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各党的解释和观感彼此不同，新闻记者及全国人民便可从些不同的各党记者招待会上对于当天的政治协商得到一个轮廓，并从不同的党派的报告，得到一种比较与研究的机会。假如是后一种办法，则可由联合招待记者的党派互推一人，对当天会议情形作一叙述报告，各党可以各派代表在场，如有需要的话，可再补充该报告员报告之不足。这两种招待办法，各有得失，但只要能采行一种，即可使每天的会场详情，传布全国。新闻记者纵使不免太为辛苦，但职责所在，这种招待会即使迟至午夜12时，也必不会放弃机会，宁愿减少睡眠出席采访的。

当在野各党派自行招待记者，报告当天会场经过时，在报告中，各在野党派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或多或少地宣传他们本党的观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之事，而且是极自然之事。这样一来，政府就决不会“相应

不理”了，因为假使只让在野党派天天向记者宣传，而自己反而不急起直追，未免吃亏太甚，必不甘心，于是其结果，必定：（一）既然这样，那就不如干脆新闻开放，让各报记者直接到政治协商会议来旁听，自由采访；或者（二），在野党派每天招待记者，政府亦规定时间招待记者。不论出于哪一种，总之，我们完全得以实现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假如在野党派有诚意使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话，他们应当不具任何成见，认真考虑我这个切实可行的建议，而很乐于接受去实行。

（原载《客观》第9期，1946年1月5日出版）

第10期

（一）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的一个重要进言

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以后，政府殆将进行改组；改组的方式和程度，尚不详知，我愿就此事，对所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进重要之一言。

我认为在未来的政府改组中，所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能竭力避免参加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为最上策。这有几个理由：

第一，中国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以为在野的人物批评政府，其目的即在“做官”。这一种观念当然是不正确的。一则所谓“做官”，就是参加政府；参加政府是对国家的一种服役，并不是一件坏事。二则批评政府的人，并不一定只是为了想“做官”，自亦有人确以国事为襟怀，以民生为痛痒，作为放言发论的目标。但这种观念虽不正确，而却极普遍。并且不幸在中国，做官虽非坏事，而做官人的德行，则常不为人民所器重崇服。假如现在这些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在野党派领袖，在政府改组时，立刻参加政府，闻此一事实，极易被人民误解，以为这一批人之所以高喊民主，其目的即在“做官”，使向为一般人民所有的那种虽不正确而却极普遍的传统怀疑，得到了新的证实。而且，许多内心反

对民主的人，借此亦可大事宣传：“你们看，这一批人今天民主，明天民主，结果还不是想做官？”这种误解和破坏，其不足取，固无待论，然而对于整个的民主运动，却将发生极不利的影晌。今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都是以实现达到民主政治为任务的，为了“民主政治”的前途，他们似乎应当考虑他们的出处，务使不要因他们之参加政府而使民主运动遭受误解与打击。

第二，从事政党活动的是一种人才，从事实行政的又是一种人才。前一种人才的条件是头脑敏捷，口才伶俐，文笔锋锐，行为果敢；后一种人才的条件是精细周详，宁静任怨，有条理，有效率，有操守。这两种才干可以兼长于一人，但不一定为人人所兼有。故今日之从事政党活动者，以之司组织，策纵横，事宣传，感绰然有余，如一旦身负实际行政责任，是否能有条不紊，洁身自持，尚难断言。国事体大，从政者幸而成功，国家人民两受其赐，不幸失败，国家人民两受其累。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其最高目的是希望将国家弄好，因之我们每人在有机会参加政府时，仍不得不慎审自省，自问其行政才干是否胜任；其立身操守能否自持，而勿眩于功名，贸然决定。我们总当以国家的得失为前提，视一己的富贵如浮云。

第三，一年以来，我们若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平心承认，今日之非国民党员，其言论实较之一般国民党员为自由。这有两大原因：一、一般国民党员未必对本党执政的成绩感到满意，譬如前年湘桂战役的失败，以及去年接收人员的不法等等萃萃大端，都使一般国民党员无法为其本党作正面的辩议；二、国民党员在党内种种环境及顾忌下，反不能自由发言，不论此项发言是批评本党或攻击敌党。倒是在野党派或超党派的人，可以对现局自由评论。可是政府一旦改组以后，这种情形便将发生改变。再说实际参加政府，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单纯。要具备许多条件，参加以后，始有成功之望。就今日在野党派言，恐怕只有共产党推举出来的人，参加政府以后，较有站得住的把握，因为共产党在组织、群众及主义三者，均有根基。在组织、群众及主义三事上没有根基的人，一旦参加政府，则向之处于主动地位者，必一瞬间而处于被动地位；向之批评他人者，恐不数日即将成为被人批评之对象。若无把握，与其进，不如不进。此中机微，似宜慎审而熟虑之。

但是，平时要求政府改组，政府真正改组了，又辞而不入，言之似难成理。因此，我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建议，即各党派如决定参加政府，可由今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党派代表，就他们本党或党外，推荐他们所熟知或钦佩的贤能，参加政府。果能如此，则一，仍达到了各党派参加政府的目的，二，推选出来的人才必定更为客观，三，各代表虽替国家开了“民主之门”，而自己并不走进这扇门去，亦大足表示吾人平时批评政府，要求政治进步的胸怀。好在各党派都是济济多士，所网罗的人才，必不仅限于今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这几个代表，而此种举贤荐能的风气若能形成，则亦大可一扫多年以来争官夺位的现象。我作此进言，容不免有浇冷水之嫌，然其初衷，确是为了爱国家，爱民主，爱人才。若有不以余言为是而急功好利者，则他们将来之得失毁誉，吾人可以拭目待之。

(二) 内战停止

内战终于1月10日宣告停止，化干戈为玉帛，这实在是天字第一号的可庆事？共产党提出无条件立刻停战后，政府曾提出了一个对案，其后共产党又提出了一个对案，凡此报端均有记载，此处不须复述。据传，政府方面对共产党所提出的对案，原拟再提一个对案，但当共产党的对案提出后，中间人即认为已到了可以谈判的程度，所以终于能在7日上午10时，在“重庆东端的石屋”中，由政府及共产党的代表，协同驻华特使，就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协议讨论。据悉，内战的停止，并不单单依赖命令行之——不单单由冲突双方的司令部下令停战，并且将由美方派人会同双方代表驰赴每一战场，切实执行，使从桌面上的“停止内战”变成真正的“停止内战”。

我们真是欣幸内战终能停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反对内战。完全凭借武力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时代，业已过去；此路实不可通。我在本刊第2期“客观一周”里说：

凭借军事究竟能解决得了一切吗？否则打了一半，终出于妥协，则所有死者伤者，以及遭受军灾者，他们所受的苦痛损失，究为何事？岂非天下之大大滑稽？

现在翻读前文，再看到报纸上所载胜利大厦的一片干杯声，真是感

慨系之。这次内战总算停止，我们现在应当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想法，不使将来中国再有内战。截至8日止，大局趋势虽已极明了确切，而热河方面的战事依然激烈，甚至有些人认为非进占承德，不足以保军事形势上的需要，只此一端，即可见凭借武力来控制政治的意图，在今日中国，仍极浓厚。今日中国的政治家，应贡献其智慧，替国家打一个千秋万世之基，希望这一次的内战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内战。

(三) 谈人力车的废止

报载交通当局即将废止人力车的通行，拟分10期，至三十七年底，全国禁绝。此一计划，其动机及目的所在，不甚详知。人力车当然是一种不人道的交通制度，所以在原则上，予以禁绝，无人异议。但此事牵涉到许多有关问题。若说为了人道，则今日中国，比人力车还要不人道的制度和情形，恐还不少，假如政府的眼光确已转向到了这一方面，准备一一改善，这自是人民之大福，大可额手称庆。人力车这种交通工具存在东方各国，自有其社会背景。落后的国家缺乏应用机器的能力，依赖人力的交通工具，自然应之而生，同时，欧美人力比较珍贵，东方国家。民生凋敝，生活困难，用人力来拉车，亦即成为一种生活的方法。所以，在国家既一不能负责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二又不能供给人民的交通工具，则人力车的存在，也是一种极为自然的现象，而人力车夫不仅以此解决他们的生活，对社会言，抑不失为一种服务。政府现在既想禁绝人力车，则第一，政府对于这一批失业的人力车夫，应有一种合理的处理。一方面不要使这一批人力车夫因之而生活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要使这部分有用的劳力，旷费不用。第二，对社会言，政府既想废止人力车，在废止人力车以前，政府应设法供应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假如来日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以电车及公共汽车为主，则政府应负责供给这种公共交通工具，务使这种供给能符合实际上的需要为止；否则，必致引起社会秩序的扰乱，影响人民的工作效率。至于私人的交通工具，政府要是鼓励人民用小汽车，三轮车，或自行车，则政府应有计划地大量生产这些交通工具，以供应人民的需要，单单在报纸上说以后人民交通工具以自行车等为主，而事实上，人民并无自行车等可购，则不当解除人民所仅有的交通工具，而使不能利用交通工具以节省他们因步

行而耗费的精力与时间。我是最注重“经济及效率的原则”的，我认为国家应当负责来改进我们的交通工具，使我们可以以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工作，但要改进我们的交通工具。乃是提倡并供应比人力车更有效率的交通工具，而非单单消极地废止人力车的通行。

(原载《客观》第10期，1946年1月12日出版)

第12期

(一) 停战令下，战仍不停 (存目)

(二) 协商成就 (存目)

(三) 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

最近中国政治运动里有一个以前未有的特色，即工商界的过问政治。过去工商界大都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关起大门自己经营他们的事业。然而现在他们之过问政治，也是环境使然，因为各种苦痛的经验，使他们明白政治不上轨道，一切事业筑于沙滩，不能得到确切的保障。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自本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劳工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日见重要，但政治运动，大体上仍由中产阶级在领导着。中国的知识阶级素来关切政治，民国以来的几件大事，几乎没有一件教育界没有参加——不仅参加，而且居于领导地位。只是单单由教育界参加政治运动或发表对国是的意见，其影响虽至远且久，但在组织及持久上，总觉较为消极，由教育界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来势纵猛不久又趋平静之感。政治运动不能缺乏“组织”与“经费”，则此即为教育界人士的短处，因为大家忙于研究学术，没有时间经常从事学术以外的实际活动。除非实在看不顺眼，才出来说话。至于财力，教育界人素极清苦，糊口已属勉强，焉有余力负担经久的费用。现在工商界人也出来过问政治，争取民主。工商界人在经济基

础较有底子，所以以长补短，正补上了民主阵线里原有的缺陷。工商界人如能与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易发生有实质的力量。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

(四) 告别读者

本刊原定在重庆出 12 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误以为不待 12 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 12 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 13 期起，改由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 12 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人发付）早均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均经亲复；最近 10 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继续收到的投稿，已转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请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三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原载《客观》第 12 期，1946 年 1 月 26 日出版）

后 记

《储安平集》是“民国三大报人文集”之一。评民国的三大报人，储安平位列其中是毫无争议的。从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起，至1958年被划为右派，储安平一直埋首于新闻、报刊领域。他先后创办并主编的《客观》周刊、《观察》半月刊掀起了自由知识分子论政的潮流，成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鲜明旗帜，以至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客观、真实是报人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储安平在这条底线上走得更远，倚仗他的勇气和执著。这让他的新闻评论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同时也成就了他在民国报人当中自由、客观、敢言的地位。

本书是储安平写于1949年之前的文章和著作的合集。编者根据内容，结合体裁，将文章进行了分类，重在反映储安平作为报人的职业精神及自由知识分子的凌然傲骨。

本书编选的文章皆是民国时期的作品，在编辑过程中，编者保留了作品的民国时期风格，除了改正部分错讹之处外，未对带有民国特色的字词句做任何修改，因此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作品的原貌。

百密仍有一疏，本书难免也有错误、遗漏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10年11月